

百色地区党史资料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

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办公室编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

准印单位： 中共百色地委宣传部

准印号码： №73-213

印 数： 600 册

字 数： 40 万字

百色地区党史资料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

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办公室编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纪念百色起义65周年!



这是邓小平同志 1929 年 12 月 11 日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时的照片。

用革命的事蹟來教育我的
子孫萬代：像我所前輩
那樣，像我的先烈那樣，
永遠當一個革命者，永遠當一
個為人民大眾的集體事業服務
的社會主義者，永遠當一個共
產主義者。

鄧小平

鄧小平 1963 年為《廣西革命回憶
錄》續集的題詞。

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六十周年

邓小平题词

这是邓小平同志为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60周年的题词。

邓小平同志为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题字

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軍部舊址

鄧小平題
一九七七年
八月十七日

序 言

中共百色地委副书记 杨业兴

邓小平同志是右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军的创建者，是百色起义的组织和发动者。

1929年12月11日的百色起义，是继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9月9日秋收起义、12月11日广州起义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起义。1929年6月，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当时化名邓斌）为中央代表，并派张云逸等一批共产党人到广西。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胆略对广西省主席俞作柏、省督办公署主任李明瑞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领导了广西党组织（中共广西特委）的工作。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9月10日至14日在南宁秘密召开，传达了党的“六大”和全会精神，总结了中共广西党组织过去的工作和斗争的经验，选举产生了新的特委领导机构，通过《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等9个文件，提出了“推翻国民党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深入土地革命宣传和行动”、“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等主张。这次会议为百色起义奠定了基础。会后，广西政局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改组派头目汪精卫派人到南宁游说俞、李反蒋。10月上旬，俞、李不听中共劝告，匆忙反蒋，不到10天就失败了。邓小平同志根据广西形势的变化，把中共掌握的武装撤到左右江地区。10月17日小平同志从南宁邕江转右江溯江而

上，10月22日率领武装到达百色城，立即开始实施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宣传发动群众，继续整顿改造部队，武装工农，发展党的组织等一系列的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策划和准备，12月11日举行了百色起义，宣告成立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建立右江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东兰、凤山、百色、奉议、恩隆、思林、果德、隆安、向都、镇结、恩阳、凌云、那马、都安、那地、河池等县建立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此后小平同志又领导了右江根据地的建设，整顿军队和各县农民赤卫军组织，建立军队兵工厂和被服厂；发展党的组织，举办训练班和学习班，提高干部素质；兴办教育，把百色广西省立五中改为广西劳动第一中学，把百色模范小学改为百色县劳动第一小学，在各地创办各类学校，让适龄儿童免费入学。

1930年10月2日，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在平马红七军前委会议上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前委经过讨论，决定执行中央指示。1930年11月7日，红七军集中河池，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并整编成为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全军共7000多人（不含二十一师），十九、二十师执行中央命令离开河池；留下二十一师番号，由韦拔群回右江根据地组建并坚持右江根据地的斗争。

邓小平同志非凡的胆略和卓越的领导，使百色起义顺利地进行，右江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红七军由原来1000多人发展到7000多人，根据地成为拥有15个县、约100万人口的地区。右江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十分拥护这次革命，广大青年农民和优秀的革命分子，踊跃参加这场革命斗争，他们为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小平同志以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持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我们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同时要学习和发扬邓小平同志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艰苦奋斗精神、开拓精神和献身精神，立足于本职，扎实工作，把百色老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搞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编写《邓小平与百色起义》一书的目的之一。同时，我们希望通过编辑出版这本书，把小平同志发动和领导百色起义过程中的工作和战斗情况的记载及有关材料汇集在一起，以表示对百色起义这段光辉日子永远的纪念，并把它作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粮食，为党史工作者、小平同志思想研究工作者提供研究资料。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我们真诚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邓小平著作·书信

目 录

序 言..... (1)

【邓小平著作·书信】

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 (1)
红七军工作时期（1968年6、7月）..... (25)
答复关于百色起义和红七军史料的几个问题
（1985年6月20日）..... (28)

【历史文献】

中共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委的信（1929年8月17日）
..... (31)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
（1929年10月8日）..... (34)
中共广西特委给广东省委的信
——关于九、十两月的报告（1929年10月20日）
..... (49)
中共广东省委通知（1929年10月30日）..... (70)
中共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委的信（1929年10月19日）
..... (71)

中共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委的信（1929年10月30日）	（74）
在反对军阀战争斗争中而形成广西红军	
（1929年11月25日）	（77）
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1929年12月）	（78）
中国红军第七军政治部：	
打倒国民党（节录，1929年12月16日）	（80）
前委通告（第二号）	
——关于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12月20日）	（87）
中国红军第七军政治部：	
土地革命（1929年12月21日）	（92）
中国红军第七军政治部：	
我们的主张（1929年12月）	（100）
粤省对七军前委的指导信（1929年12月25日）	（101）
右江苏维埃政府口号（1929年12月）	（108）
右江苏维埃各级政府组织与职责（1929年12月）	（109）
陈导民：七军前委报告（1930年1月）	（120）
党员须知	（132）
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1930年1月）	（136）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	
（1930年3月2日）	（167）
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199）
中共中央给七军前委的信（1930年4月20日）	（201）

右江苏维埃政府：	
土地法暂行条例（1930年5月1日）	（205）
右江苏维埃政府：	
共耕条例（1930年5月15日）	（210）
土地革命宣传大纲（1930年）	（215）
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1930年）	（219）
王玉树关于七、八军情形报告（1930年8月22日）	
.....	（221）
前委通知（第六号）	
——目前政治形势和右江党的策略	
（1930年9月9日）	（227）
前委通知（第七号）	
——目前右江党的工作方针（1930年9月19日）	
.....	（233）
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1931年3月9日）	（241）

【回忆文章】

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	张云逸（271）
回忆百色起义	李天佑（286）
广西的苏维埃运动	雷经天（290）
纪念百色起义	袁任远 韦国清
	陈漫远 莫文骅 吴西（308）
从百色到湘赣	袁任远（315）
在红七军军部教导队里	磨力（333）
平马镇初见邓代表	黄松坚（336）

难忘的武篆野战医院生活·····	黄明政 (341)
第一次见到邓斌·····	周志 (344)
我所知道的邓小平同志·····	何家荣 (346)
邓政委来到武篆·····	黄美伦 (355)
护送邓政委·····	牙美元 (361)
邓政委指导我们工作·····	黄正昌 (365)
邓斌给我们讲课·····	陆显琚 (368)

【专题资料和文章】

邓政委在恩隆·····	陈遵诚 (373)
邓政委政委在右江党政干训班·····	黄大健 (379)
邓政委三次路经德保进行革命活动·····	许英俊 (381)
邓小平带领八军一纵围攻靖西县城郑超叛军 ·····	黄正显 (386)
邓斌和广西省立五中·····	李长寿 (394)
邓政委在燕洞会议·····	农武 (397)
邓小平在东兰·····	陆秀祥 (401)
右江情深·····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历史编委会 (407)
记百色起义前夕的小平同志·····	梁明辉 (417)
邓斌同志在百色起义中的故事·····	李长寿 (428)
一次难忘的接待·····	黄振廷 (435)
邓政委从左江到右江·····	范文 (437)

【专题研究】

邓小平同志在广西·····	卢行 (447)
---------------	----------

-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陈欣德 (476)
-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邓小平实事求是思
想的胜利…………… 卢 行 黄林毅 (524)
- 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百色起义、
龙州起义…………… 陈欣德 (536)
- 试论邓小平同志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路线
…………… 梁明辉 (555)
- 论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 农 武 (567)
- 邓小平实事求是创建人民军队的两点经验
…………… 黄林毅 (581)
- 邓小平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禁烟策略初探…… 莫亚人 (583)
- 浅谈邓小平在右江与“城市中心”路线的斗争
…………… 王拥军 (594)

【事 记】

-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事记…………… 梁明辉整理 (603)

七军工作报告^①

(1931年4月29日)

邓小平

一 八军的经过

(一)我去年由中央到龙州是二月七号，到后知道龙州已于本月一日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八军全部正在出发会同七军攻南宁，我仅与留守后方的宛旦平同志会面，得知八军及左江工作大略：1、左江政权仍在动摇时期。2、革委虽然成立，然尚无实际工作。3、大军出发后，留守后方的是极靠不住的收编的队伍。4、八军本身的基础完全在旧军官手中，甚至有好些同志都没有分配带兵的工作。根据中央不打南宁的决定及这些条件，乃停止了攻南宁的行动，并电七军亦停止此行动，并指出从主客观的条件上来估计，攻南宁必遭一个失败的结果，特别是第八军本身问题上更为危险，如到南宁打了败仗有全军覆灭的可能。

(二)停止了攻南宁之行动的第三日即得到七军由右江来的电报，报告已在隆安失败，同时我们召集了一个干部（包括地方党部）会议，决定八军暂时组织一个前委，因为

^①这是邓小平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后给中共中央写的报告。

当时我的计划是与七军汇合后八军即取消，健全七军实力。在会议中我根据中央指示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决定了八军及左江工作方针：1、以龙州为中心发动左江土地革命，一方面分配所有的同志到下层群众中去实际的工作，反对机关的工作方式，一方面分发队伍到龙州附近几县游击，发动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农会等政权及群众的组织，我们就是这样进行了。2、八军的总方向是与七军汇合向外发展，应多方设法与七军联络，八军的发展方向应向右江推进。3、加紧八军本身的改造，肃清旧的军官，分配同志以主要的工作，这一工作因作豫同志执行不力发生了极大的困难。4、迅速解决地方有反动可能的武装（因技术上不完善只解决了大半），武装农民（发了三百多枪）好组织工人农民赤卫队，以为扩大红军之基础。5、此外对于党、政权、红军的工作均有相当具体的决定。

（三）上面这些决定在短期内作出了相当成绩，但因干部的缺乏（地方工作干部简直没有）收效仍然不多，发动群众方法完全不懂，不能回答群众的问题，斗不过敌人的把戏。

（四）同时我们注意到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因为左江与法占地接壤，一般群众反法的热情很高，“打倒老番”的口号每一个群众都懂得都热烈的拥护，不过过去反法的运动为流氓及封建势力所领导，所以我们将反法运动与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与反帝反国民党联系起来作广大的宣传，收到了相当结果。在二月中旬群众大会中通过了没收海关领事馆教堂财产并驱逐法领事出境（当时并不懂得可以讲一讲外交政策），群众甚高兴，游行时亦甚热烈。我们并利用了无

线电发英法文通电子全世界，后法政府曾派飞机一架到龙州附近之上思县侦察示威，适我军一营开往游击，当即号召了千余群众，口号之声震天，士兵开枪，司机慑群众威，致飞机跌下，得机关枪一挺手枪几支，炸弹十余个。三法人，一死二重伤（住医院医治）。后阅报载法政府曾将此事向南京政府抗议，结果不知。总之帝国主义对龙州赤色政权非常重视，特别是对安南革命的影响，给法以极大之恐慌，故敌军之迫不及待的向龙州进攻，法帝之催促有很大的关系。

（五）在龙州工作不久，即确知我七军已退出右江，何往不知，并得探报，桂系将以重兵犯龙州，我们当时考虑龙州是绝对不能守的，敌来必退，同时八军如不与右江七军联络将感极大之困难，敌决定速下靖西，加紧龙州附近的群众工作，地方政权有相当基础时八军即全部向右江推进。决定后我即率一纵队攻靖西，因为与右江联络我自己去比较好，同时八军第一纵队的改造也要我自己去才有办法，靖西有电话，指挥龙州工作不成问题。

（六）攻靖西数日不下，适右江向都县委书记来到，报告右江沿岸还有果化在我们手中，故我决定带一连人去联络，转达中央指示，临行时电告龙州务须照前决定原则进行，如敌来即向右江前进，即敌不来，左江工作有相当基础时亦须照前决定迅速向右江推进，求得与七军整个的联络。

（七）我一连人冲到右江，始知沿岸完全为敌占领，七军已退入东兰一带，惟沿岸还有几个赤色乡村，故得偷渡右江，在一乡村（赤的）住了半月之久，始得机会冲到东兰，其时已是三月下旬了。

（八）到达东兰之第二日，适作豫派了两个卫队（东兰

人)亦到,报告龙州已于我离靖西之第三日失败,因侦探不好,敌人到了城边还不知道是桂系主力,以为是土匪,及至接触了两小时后听到大炮机关枪声才懂得,但结果是被敌人冲散,全部无法退右江,只得逼退安南方向之凭祥,又受敌追兵打击(旦平同志即于此时牺牲),曾一度冲向右江但无效,乃又退回粤桂边企图去玉林一带工作(作豫家乡,过去有相当的基础),但中途即发生部队叛变(叛变官长是作豫始终不肯撤换的),作豫仅得几十卫队曾一度冲向右江来联络不果,后闻将武装交给地方同志,只身到港遂被捕。攻靖西之第一纵队(龙州的为第二纵队)得到龙州失败的消息,乃经滇边向右江前进,企图到东兰与七军联络。到右江之凌云(接近苏区仅数十里),因技术上及侦探不好,受了敌人极大打击,损失三分之一,乃退贵州边界,受编于贵州一个土匪队伍(改组派收编的),仍与东兰设法联络,几次不成功,直到七军回右江才取得联络,更于七军第二次向外发展才会合起来,此时该纵队仅存二百支枪了。这部队能得到这样的结果还是改造得比较好的原故。八军失败龙州政权亦失败。

(九)八军开始成立时的武装约枪一千支(内坏枪约有三三百),组织两个纵队,每纵队两营六连,另有一挺机关枪一门迫击炮,还有一个手枪连。

(十)以上就是八军的成败兴亡史。

二 七军的经过

(一) 由百色转变到隆安之役。

一九二九年十月革命节日，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东兰农民武装为基础转变成了第七军，转变后兴奋了右江的群众，百色平马的群众大会到的群众非常之多而热烈，红军本身的情绪非常之好，战斗力亦甚强，在隆安作战中充分表现出来。

惟当时前委没有将中心工作摆在发动群众深入土革^①上面，而决定了打南宁的行动。当时前委的估量是打南宁极有把握，桂系主力在前线没有开兵回来的可能，轻视了攻坚和敌人的力量，结果到隆安即与敌人接触，经过三天最激烈的作战，敌人的损伤虽比我们为大，我们的损伤亦不小，好几个很得力的干部亦于此役牺牲，加上作战的指挥太差，双方都成为各自为战的局面，结果是我们失败了，耗费了子弹不下五十万发。

我们对于此次行动指出了不但轻视了敌人，主要的还是忽视了发动右江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右江苏维埃政权的错误。当时右江群众情绪虽已开展起来，但过去并没有经过斗争，始终是暴发户，纯粹由红军弄起来的。如果不注意用正确路线来发动群众，群众的情绪是不能保持下去且易走到失败情绪上去的。打下南宁固好，打不下，一失败下来则必给群众一个大的打击。同时当时作战完全没有运用群众的战术，单凭红军的力量，深入白色区域去打硬战，处处受敌人

^①土革即土地革命。

（豪绅民团）的扰乱。如果当时作战不在隆安而在赤区的果化，很有消灭敌人三团的可能，我们更指出这次幸好在隆安失败，如果有一小的胜利，直追南宁，有全部或大部被敌人消灭的可能。

（二）由隆安失败到向外游击时期。

隆安失败后，完全放弃了右江沿岸，平马为敌占领，我军曾一度进攻平马但无最后决心，故未成功，乃向东兰退去。此次攻平马没有决心是一错误，因为如果攻下了平马可以保持群众的情绪，事实上是可以攻下的，攻下后可以得了敌人不小的辎重。后敌人追至亭泗与我接触，战甚烈，双方损失均不小，结果双方均同时撤退。这次军事上如果有最后决心可以全部消灭敌军两团，因在作战中我较占优势也。亭泗作战时我军士气仍好，失败后则大不如前了。

亭泗战后，前委即讨论行动问题，决定向外游击一时期，乃留第三纵队在东兰右江工作，一二纵队向河池方向游击。本来是一步步发展的计划，后来变更了，一直经怀远到思恩，在思恩因不小心被敌人袭击受了一个小的挫折，后又向贵州之古州（贵州三大城市之一），结果攻下古州，子弹得到相当补充，经济也得到相当解决，士兵情绪也比较提高，本来他们当时欲直出湘南，但因未与第三纵队联络好，故又折回河池。

我们攻下古州消灭了敌军大部（四五百），对敌军俘虏的官兵均非常之优待，对贵州军队有不少的影响，甚至不少中下级官长，对进攻红军问题表示动摇，这是我们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来证明的，后来王家烈之始终不愿与我们接触，这也是原因之一。

（三）河池会议与回右江的决定。

一二纵队回到河池时，我已到东兰近一月，得消息后即赶到河池与他们会面，召集了一个党员大会报告中央指示，同时讨论到行动问题，认为：1、当时湘南驻有重兵，不易通过。2、右江群众自红军去后，失败情绪非常之深，对红军表示不满，在发展巩固右江工作上，需要红军回右江一时期。3、回右江可以发展第七军。4、回到百色可以解决服装经济的问题。因此决定回右江一个短的时期，在这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深入右江土地革命及发展改造红军，但总的方向还是迅速向外发展（此时是阴历五月初）。

（四）回右江后的工作。

回右江后即恢复了沿岸的城市和政权，在百色解决了敌军五六百武装。在百色仅十日适滇军一师经百色到南宁攻桂，我军在力量上不能与敌人正面作战，故决定暂时退到平马，准备在平马运用群众战术扰乱他，打击他的一部分。结果在果化作战有五日之久，敌人损失甚大，团长死一伤一，营长死二伤一，士兵死伤五六百。我军亦死伤官兵六十余人。但因军事技术上的缺点，没有能实现打击敌人之一的计划，仅得到两万发子弹而已，算起来我们还是吃了亏，虽然滇军对我们再不敢轻视，攻南宁失败后再不敢与赤色区域为难。

与滇军作战后即回师攻百色，因等大炮问题及被一个连长领导一营叛变（当土匪）问题牵延了一个时期，后百色加了兵（滇军）难攻下，故又改变不攻百色而在平马、田州、思林、果化一带加紧工作，相当创造右江的基础，改造七军发展七军，并在经济上准备向中心区域发展的出发伙食费。

统计在右江约有三月半之久，没有一天停止武装行动，与豪匪武装的作战简直成了家常便饭。

至于在右江的群众工作，以后专门的讲。

（五）向中心区域发展问题之讨论。

回右江时即已决定在右江仅是短的时间，与滇军作战后又提到此问题，因为：1、经济未解决。2、秋收快到，如果红军离开，则农民的收获必全被豪绅抢去，必使农民发生反感，并且农民分得了地主反革命的土地必定得到了秋收才能深刻的感到土地革命之意义。故当时决定“相当保护秋收”的原则，计时九月底可出发，结果实现了这个决定，定在十月一日出发。出发之前一日，南方区代表邓拔奇同志赶到，故改在四日出发。

十月二日在平马开了一个前委会议，拔奇同志出席，报告六月十一政治局的决议。我们接受了这个路线，决定：1、改变军队编制为三师，留二十一师在右江作为发展一军的基础，由韦拔群同志任师长，十九、二十两师（每师两团）出发。2、因恐东兰士兵逃，同时与在桂黔边之第八军的一部联络，故大部由凌云转向河池，我及拔奇同志同到东兰布置右江工作及率原第三纵队出河池。3、在河池集中全军举行全国苏维埃代表（拔奇）的阅兵礼以鼓士气，并开全体党员代表大会。

（六）河池的全军党员代表大会（十月革命节日开的）。

河池会议完全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三大口号。在此三大口号之下，消灭两省军阀，阻止南方军

阔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进攻，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不过我们认为执行此路线不是先下柳州，而是要先取得桂林，因为下桂林后才能与外面政治影响联系起来。同时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难，也必须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推进才有可能。不过在庆远、融县应创造相当基础，对柳州取一个包围的形势。

这次会议改选了前委，批评了过去的错误，并特别提到了敌军士兵运动的问题，组织了一个兵委，豪人同志为书记。

（七）由河池出发到攻长安。

由河池出发时经了一个鼓动士气颇好，到怀远与敌一个小时的接触即占领了怀远，敌人退到对河与我隔河相持。当时发生一个是否攻庆远的问题，有两个意见：一方面赞成，以为在执行新的路线，应攻庆远，且很可能。反对的意见认为庆远是敌人重镇，敌必出死力守之，没有攻下的把握，如攻不下，攻回甚难，并且我们到桂林有一条大江相阻，如不迅速渡过，敌一注意很难通过。后一意见不但不赞成攻庆远，且不赞成攻融县。我及李明瑞同志是后一意见，结果通过了不攻庆远，攻否融县到天河再看情形决定。

到天河时讨论，始终以渡河问题决定不攻融县，而经三防转移敌人视线，还占长安渡河。次日，忽得报告说融县有一小河可徒涉到长安，故又临时决定到融县。行不四十里，即在四把与敌接触，后面敌人追来，前后作战，前胜后败，结果在天河附近与敌人相持三日之久。最后乃决定脱离敌人，仍由三防到长安，沿途均有民团相扰，到三防因天雨休

息数日即到长安，其时长安已有重兵驻防了。敌人有两师，名义上六团。我们攻长安有五日之久，打得敌人胆寒，只有死守城内，白崇禧亲到指挥，斩断浮桥，背水死守。后得报告，敌人又加一师兵力，故决定撤退，退得非常之好，致敌不敢追出一步。长安作战的确建立了七军的威风，敌人称我军是全部的北伐老兵，但从实质上我们还是吃了亏。

（八）进攻武冈。

长安撤退后，至福禄渡江，向古宜前进，原拟经古宜到桂林，后因古宜已有敌军教导师守对河（又一小河）无法过，乃改经绥宁、武冈到桂林。到武冈时原本决定不攻，后因得报告说只有点民团守，故决定攻城，攻下后可以解决七军的服装，经济问题（都是当时的急迫问题）。攻了四日夜，仍决心攻下，当时估量敌援兵不会来得这样快，故一切布置忽视了这一点。到第四日已发觉不当，决定重新布置，但马上接到报告说再三四小时即可攻下，因城上敌人已无子弹，我已架好楼梯也，故未改布置。孰知城尚未攻下，敌援兵已至，以致失败。此次损伤不小，士气大挫，乃向新宁退去，又转到全州，在新、全交界之“八十山”中又受了敌人追兵一个小打击，结果算好，安全的达到全州，此时已由四团而缩为三团了。武冈作战时阵亡了一个很好的团长何子祁同志。

武冈失败后，大家认为攻桂林已不可能，七军的迫切需要是迅速找一个地方发动群众，休养补充，安置伤兵，故决心到湘南，估量湘南总有点党和群众的组织。

来武冈敌人的援兵，报上载名义十团实则约五团，宝庆两团，长沙用汽车运来一团，还有两团新成立的游击队，飞

机两架。如果当时我们军事布置缜密，以战斗力论，决不致失败得如此之狼狈的。

（九）到全州后直到攻连州。

到全州后开会讨论结果都感觉到要休养补充之严重。当时估量江华、临武一带最少可以休息一下，发动群众，故决定到江华一短期仍向小北江发展。豪人、拔奇两同志即于全州离开来中央。

在全州驻了三天，筹了点款，发了点零用钱。此时士兵失败情绪很深，逃兵亦甚多，逃的不仅是老兵，而且许多是农民。

后知敌人（桂系）来全州，故我们即照决定出道州，一路只有小的接触。到道州后已是空城一个，仅有贫民还在。城周围几里路就是豪绅的武装，侦探都难派出，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到了三四百人，都表现还好。仅驻两日，知湘军已三方向道州前进，此时我军决不能作战，仍照原计划到江华。当天奇寒，苦极，士兵冻死数人。江华的环境比道州还坏，一点党和群众基础都没有，仅没收了大批布匹发给士兵，但无处成衣。

原来对于江华一带的估量成了幻想，宁远也不能去，只得离开江华，想到湘桂边之桂东、桂岭一带工作（皆山地），得到一个被囚在江华狱中的前县长带路达到了桂岭。离江华时四面八方打起来，我军又受了小的挫折，失去了枪二十余支。

到桂岭后即布置工作，但该处豪绅力量太强，强迫农民守住炮楼不出来，如果桂系重兵来，将大不利于我，故计划又不成，乃决心继续到小北江。在桂岭住了四天，将部队整

顿了一下，缩编两团。为提起士气起见，以主要官长兼团长，李明瑞及龚鹤村两同志任之，两团组织比较完密，原来团长皆任营长，营长任连长，干部亦较前充实，故战斗力又恢复了一些。

行军三天到了连州属之东陂圩（离连州六十里）。当时讨论到是否攻连州的问题，认为如果攻连州就一定在连州工作，因一攻连州北江即不易通过，同时估量北江此时还无重兵，如能迅速行军，通过北江干路是可能的，故决定到北江湘南宜章一带工作（该处过去是经过斗争的，且多险要山地，鹤村同志很熟悉）。军行至星子圩（离连州八十里），得报说离此三十里之黄沙堡已有湘军千余人到来，名义上是两团。据鹤村云，该处有一山坳甚险，如有千余兵力守住，难通过，故又决定去连州一次，最少可以解决一些经济问题。到连州后并未决心攻城，仅作了小小的尝试，不五分钟伤死二十余人，武冈的教训使我们不能再攻。在连州因筹款问题逗留了几天，作了一点群众工作，因为敌人放火烧街，我们救火给了城市民众甚至于商人以很好的影响。后得报告粤军邓辉一团到连州来援，乃决定消灭该团之布置，并退入一好布置阵地之山地。此时我们计划仍然是要到北江。在山地住三日，一面作群众工作，一面休息兵力，但结果又得报告说并无敌人来，故决定仍出星子经黄沙堡到北江。在星子方知邓辉团亦于是日由星子出发到连州，以致失掉了一大好机会，因为在力量说来消灭该团是有把握的。

到黄沙堡果有湘军千余驻守，但不敢与我作战，仅一小接触即退守圩场，我即绕过圩场向北江前进。

在连州附近之山中时并与土匪代表有一度接洽，原因是

我们如果不能由大路去北江，必经乳源大山（匪巢）运动，接洽的目的是使他们不妨碍我们的运动，同时想派人打入进去作点工作，结果因时短，土匪心多疑忌，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十）到北江后至乐昌渡河。

到北江后即宜章、乳源交界之梅花一带工作，一切布置均是在创造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斗争并补充红军。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几天内有相当的成绩，并即刻武装了几十个农民（发枪六十支）。但不几天即得报告说邓辉一团追来，我们认为的大好机会，仍决定布置消灭该部，谁知一经接触方知侦探报告之误，敌人有三团之众，且有两团系由乐昌赶来之生力军，结果经过五小时的最激烈的作战，我们不能不失败了。此次作战的损失为向来未有，重要的干部如李谦（龙光）、章健等皆死，鹤村、振武、李显等皆伤，全军干部损伤过半，真令人痛哭。

作战失败后即退入山中，兵力疲极，失败情绪甚增，伤官兵不下二百，最难处置不过此时，后经多方设法才勉强将伤兵官安置。决定速出乐昌，向江西前进，找到苏区作一相当时期之休息。本定拂晓渡河，因兵疲足痛不能实现，至午前十时前卫团才达到河边，本部两时后才到，又因前卫团没有达到掩护渡河的任务，结果敌人由乐昌、韶州两处用汽车运兵来，致后卫团仅过一连。七军从此分散两股，我及明瑞过了河，张云逸同志未能过河，未过的一团即由他率领，过河的一团由明瑞同志兼团长。那边的消息从此割断，后经多方设法均不得达到联络目的。

在梅花时与湘南特委会了面，他们得到三中全会文件及

中央的紧急通告，因作战关系我仅看到一个紧急通告。

我们决定在梅花一带工作是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创造成了一个巩固的基础，影响湘粤均极大，因该处离乐昌、韶关、宜章均近也。

（十一）由乐昌分散到退出崇义。

乐昌分散后我们一团（五十五团）即经仁化边界到江西大庾属之内良。当时因不知大庾情况，更不知何处是赤区，故不敢冒险去，乃向崇义前进，估量如崇义一带找不到，再深入到遂川一带总可以找到。

到崇义后敌已退，知离城二十五里有红军三十五军的独立营，有苏维埃政府，经三日才联络到，并会见赣南行委之一路行委（管大、南、上、崇四县工作），当即决定在该处工作。因我们看见过中央的紧急通告，知道一点新的路线，故企图以崇义为中心创造巩固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同时加紧创造党的工作及整顿发展红军，发展方向是向粤赣大道，实现抗敌后方的任务。

在这样的方针之下，在崇义作了二十日许的工作。因当地向无党及群众的基础，即赤区也是没有的，加之干部的缺乏，故仅创造了几个区乡苏维埃政权，开始提出分配土地的问题，故只能说群众是开始起来，但如达到巩固的赤色政权，还要一个时期的艰苦工作。假使没有敌人重兵来犯，这一前途在当时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有可能的。

在敌军未来前几天，我们得到了敌人准备来的消息，但当时赣南行委书记及一委员亦到，讨论结果认为敌如来，群众基础极薄弱，七军力量亦不厚，很难站住，同时信丰自三十五军去后无武装掩护赤区，赤区逐渐失败，如七军去可以

巩固当地赤色政权，更易实现扰敌后方之任务，作用且更大，故决定到信丰去。但方决定于次日出发，敌人两团及一些民团已来攻崇义城了，因侦探不好，敌人到了城边才知道，故未与作战即向过埠退去。我即于此时来中央（时为三月初）。后知他们是向营前到遂川界，大约可以与独立师之第四团会合。近阅报载，大约他们还是在遂川一带。

我在临行时曾告他们仍须设法到信丰去，即使暂时不可能，不能不到遂川一行，也必须经过一时期到信丰，因到信丰作用较大，且七军不能独立行动，必须在信丰这样的地方与群众汇合起来才能实现其任务也。

（十二）七军的力量：由右江出发时有六七千人，二千七八百枪，机关枪八支，迫击炮三门，山炮二门，子弹平均约六七十发。到乐昌渡河时还有枪约千八九百支（给了湘南特委约二百支）、迫击炮两门，机关枪七支，山炮藏了。在乐昌虽被分散，但武装无大损失。五十五团到崇义时，有枪近八百支，迫击炮一门，机枪五挺，子弹平均二十五发，机关枪子弹每挺不过百发。到崇义后，曾交步枪约八十支给独立营及苏维埃政府。

（十三）组织：出发前是三个纵队，出发时编两师（二十一师留右江不计），每师两团，取三三制，另有一教导队特务连，每团有一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到武冈失败后编三团，到桂岭又编成两团。

（十四）党的工作：七军因干部缺乏，工作不很好，前后发展同志虽不少，但每次作战死伤的大半是同志。还有一很大缺点就是士兵同志比例太少，约占十分之四，因好多士兵同志均陆续升作官长也。

（十五）士兵成份：出发时还有一些老兵，经过一时期打的打死了，逃的逃了，到现在老兵已到极少数，五十五团不过二十人。旧军官五十五团没有了，五十八团亦然，但现在的营连长十之八九皆南宁教导队的老兵升任的。

（十六）七军党的组织：总指导机关是前敌委员会，下有师团营委，连有支部，每级均有士兵同志参加，但极弱。前委在河池代表大会改选名单为：邓斌、陈豪人、张云逸（军长）、李谦（师长）、袁振武（团长）、许卓（团政）、许进（师政）、李朝纲（士兵）、黄一平（团政）。候补为：龚鹤村（师长）、胡鹤林（士兵）、杨英（营政）。现在还在军中的，五十五团方面有许进、许卓、李朝纲，在五十八团方面的仅云逸一人。

我们到崇义决定取消前委，仅组织一团委，我兼团委书记，后决定组织上受赣南特委指挥，我去后团委书记为余惠同志（团政治委员）。

三 地方党的状况及土地革命的工作

（一）右江：

右江的指导机关是右江工作委员会，共有东兰、凤山、平马、田州、思林、向都六个县委及凌云、百色等处设特支。共有千余党员，成份上是雇农贫农占多数，余为中农，还有很少数的富农及知识分子（都是比较老的党员）。成份虽如此，但党的中心是在极少数知识分子手中，他们的基础多是破产的地主富农，多是民十六年斗争到现在的，故在党的地位上变成了党的中心。他们不但阻止了党和土地革命的

发展，且逐渐新豪绅化，把持了党及政权、军事的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太弱，常常把他们没办法。后来我及豪人自己下去，虽有相当成绩，但因干部缺乏，每县找不出一个中心，我们又不能常在下面，故甚困难。东兰的干部比较好，故成绩亦较好，土地革命比较深入。

我们在右江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是“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土地”，“没收一切反革命的土地”。后一口号主要是反富农的作用，因为富农必然走上反动的道路。我们没有提出“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分配的方式是“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由群众在乡苏维埃大会中自己选择，但我们指出，虽然没有提出平分土地的口号，结果一定要做到平分。分配土地是以乡为单位。

东兰、凤山分配土地的结果，共耕仅有两乡，多数地方是平分土地，还有一些地方是仅就没收的土地来分配。至于其他地方，名义上是平分，实际上很少地方分，处处是富农新豪绅反土地革命的作用，同时东、凤等处也发生苏维埃将好土地分配自己及亲戚的事实，故当时提出了重新分配的口号，我们出发一时期正积极执行这一口号。

分配土地中有许多的问题我们均是个别的解决，一般的问题大至是如此解决的：1. 耕牛耕具都是向富农借出的，谷种完全由原有田地的所有者拿出，不足的由富农拿出。右江穷，贫农在耕种时多无饭吃，又无钱买，无力耕种，亦向富农借出。2. 红军兵士亦分配土地，可以请人耕种。3. 瑶民分配土地，有些瑶民不愿下山，则分配山地，田地不够

时则将山地分给富农。4. 土地所有权，本来照政纲是交给农民，但因群众的表示是由苏维埃给以使用证比较安心些，有了凭据，故分配土地后由苏维埃发给使用证，禁止买卖。5. 两乡区县之间分配土地之多寡相差太远时，则以移民办法解决之。6. 森林特产祠堂庙宇极少，没有成什么严重问题。

对经济政策，小商人仍然继续营业，惟交通不便，故日用品极缺乏，特别是盐，苏维埃曾自己设法买运。各乡区办了合作社，但资本缺乏，故成绩不好。曾拟设一农业银行来帮助贫农，没有筹到款。

对于富农领导是右江极严重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可是富农的魔力大，我们党的领导力弱，故其影响常能存在于苏区中。有些区域的党和苏维埃对反富农怠工。有些区域雇农贫农比较组织得好，但又走到另一极端，无条件的反富农，提出了“没收富农财产”、“杀富民”的口号，结果使中农动摇，实际上帮助了富农。我们是注意了纠正这一错误。

右江的最高政权机关是右江苏维埃政府，各县区乡均成立苏府。苏维埃中富农是被剥夺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实质上他们仍然在领导地位，因为富农不一定在苏维埃政府中当委员，在外面一样可以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来阻碍土地革命，实现其领导作用，再加上政府中的“老”党员腐化、新豪绅化，使群众对苏维埃不满。前委为此曾公开开除右苏主席雷经天的党籍。党发宣言指出过去苏维埃的错误，准备开全右江代表大会改造之，同时号召全体民众参加监督苏维埃工作，各级苏维埃应经常开群众大会代表大会报告自己的工

作，并指出一定要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号之下来改造苏维埃，当选的一定要是能坚决执行此口号的分子，一直到最后我们出发时还是这一方针。

右江的武装很多，可以集合起来的不下三千，好坏各半，各县均有赤卫军的组织。我们出发时决定将这些武装集合起来，与留下的红军编成二十一师，作为发展一军之基础，不过这这也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赤卫军的成份多是贫雇农，富农没有，但领导的还有不少新豪绅化的老党员，私有武装的观念非常浓厚。

我们离开右江时的工作布置是加紧土地革命工作，扩大红军，以东、凤为中心，用游击战术向都安推进。

右江工作的主要困难是干部太弱，找不出一个胜任的县委书记，亦没有一个比较好点的中心，故工作推动甚难。对干部的训练，我们注意到的，除了实际工作的指导外，不断的办训练班，参加的多半是贫雇农，但成绩甚少（讲的课目均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二）沿途：

沿途没有党的组织及群众组织，仅在连州有几个湘南失败逃亡的同志组织了一个支部，但无工作。由连州到梅花一带，有很多湘南逃亡的同志未组织起来。到梅花后，有一个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后改湘南特委，该处亦无群众组织，宜章一带也没有东西，乐昌、仁化一带也没有，直至崇义后才找到一点党和群众的组织。

一路群众，穷苦的对红军感觉是好，不满豪绅、民团、县政府、国民党，亦能对我们宣传表示接受，但发动斗争不是几天的事，群众还是害怕。至于豪绅地主，闻我军到早已

跑光了，有些城市的商人都走光，故一路解决经济问题都很难，仅在怀远、全州、连州三处筹了点款，都是分配给大商店负担。

（三）崇 义：

崇义原来也没有东西，有些同志，没有很好的组织，支部很少开会，没有经常工作，天天在那里叫暴动，或者是同志拿暴动两字来要求党给暴动费，或者是几个同志作一点土匪式的抢劫就算暴动，没有丝毫注意去创造群众的基础。去年底大庾一带的钨矿工人数千，我们仅有相当影响，赤色工会未组织起来，附近农民未发动起来，一路行委即决定来一个暴动，结果还是没有暴动起来。我们到后才纠正这一错误观念，要他们很艰苦的去创造群众基础，创造党的组织。当地党的同志没有统计，成分多流氓分子，因为斗争没有起来，地方干部更是缺乏，我们到后完全由军中党来作，同时办训练班，企图训练一些干部出来，但因到的成分不很好，收效亦不大。

群众的基础虽有两个乡苏维埃，但是挂名的，且是新成立的，到后即动员全军以一连一营为单位分散游击，经常的给以工作方式的指导，结果经过二十余日的工夫作了相当成绩，创造了三个区苏维埃，几个乡苏维埃，找出贫苦农民到苏维埃工作，组织赤卫队，雇农工会，贫民农团等组织，群众情绪还好。但有一严重问题，就是流氓意识的影响，我们已注意到从发动尖锐的斗争中来消灭流氓意识。经过这样工作之后，党、苏维埃略有发展和改造，惜为时不久方进到分配土地时（赣南当时口号是彻底平分土地），敌人来了，故我军在崇义工作只能说有点影响，说不上创造了什么基础。

（四）富田事变对赣南的影响：

这件事我们到赣南才知道他们，得到的事实是如此：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 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爆发的经过是总前委派一团长率一连将省行委、省苏维埃负责人通通捕去，后二十军一团长即率一营去救回，并杀死该团长。省行委负责人回后即公开反毛，当时有一中央巡视员曾批评他们不对。此事传到赣南后，当时赣南行委即在信丰开群众大会反毛，三十五军军委得知此事，指出赣南行委之错误，并将负责人（三人）扣留，后改随军行动，停止活动，并改组赣南临时行委。此事发生后，一般同志特别是干部非常恐慌，人人自危以致不敢开口，特别不敢批评总前委。赣南临时行委对此问题的处置是在中央未解决此问题前，与总前委、省行委均断绝关系。我到后与他们讨论到此问题，批评他们这种脱离组织的解决办法不对，仍须与两方发生固有组织关系，但声明富田事件候中央解决。目前坚决按照中央紧急通告的国际路线（我只看到一个紧急通告）来布置赣南工作，哪方面的指导是合乎国际路线就服从哪边的指导。他们同意了这个意见，写信与双方面发生关系，同时指出省行委、赣南行委之严重错误。我对总前委之反A 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另一方面是可以助长A B团的发展，如赣南曾发生过A B团的分子抓住党来枪毙忠实同志的事实，且在党内恐怖之际给了A B团活动以大好机会。但同时我向他们说明反A B团之严重主要是从深入群众斗争的路

线中来解决，当然并不是说紧急的处置不能用且必要用。

赣南指导机关的同志能力甚弱，需要派一人去作中心才能将赣南工作创造起来。

四 个人的回忆

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中有很多的错误，据我现在的回忆感觉到主要的有：

（一）过去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的错误路线，结果常常是处在被动地位。在右江时攻滇军之役，攻武冈之役，攻连州之役，均是这样的错误，没有以发动群众为中心（不一定占领城市）而是以军事为中心。因为有了这样的中心错误，就不能不一路处在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至于沿途是不是注意发动群众呢？是注意了，但因有这一中心错误，实际上是忽略了群众的工作。

（二）是不是应该离开右江呢？离开右江是否反对了巩固苏区的路线呢？我以为不是的，应该离开右江，因七军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且留右江给养等等都发生困难，并且我认为七军的错误还是在出来太迟了。同时七军到江西也是对的，因为在武冈失败后，在环境及本身的估量上，须要到江西与苏区发生一时期的联系，以休养补充，当时七军太残破太疲劳了，不过由右江到江西，应该一路执行正确的发动群众的路线，而不是一直跑到江西。对于在北江发动群众，创造一个巩固苏维埃区域，我认为这一决定是不正确的，梅花一带对湘粤影响固大，正因为如此，敌人之注意力亦大，敌

必不惜一切来进攻，在七军本身力量及群众未起来之际是无法站住的。当时七军的需要实在应迅速到江西，果如此也不会有梅花之损失了。因梅花之役在该地工作的决定之下不能不打的，固然侦察不好也是一个失败的原因。

（三）集中攻坚的错误，七军是深刻的感觉。到几次的攻坚都是我们失败，向柳州、桂林、广州进攻更成了“左”的空谈，过去的事实是证明了。

（四）过去七军历史上向来有轻视敌人的观念，因之屡次上当不小。隆安、长安、武冈、梅花作战都是犯了这个错误。

（五）七军本是和平转变来的，转变后的改造工作非常不够，致有三次叛变事实之发生，都是旧的基础（包括兵油子）没有肃清的结果。党及政治工作仍有很多缺点。党的领导仍是薄弱，不能在紧急关头打破官兵的失败情绪。这固然干部太缺乏是一原因，但工作方式不够更是主要原因，当然还有七军路线之错误所形成的困难之反映。

（六）右江的错误是富农的路线，以致土地革命没有深入。固然当时是加紧了反富农的工作，但工作方式的错误，没有动员全军的党去进行这一斗争，结果工作推动不来，仍然成就了富农的路线。

（七）八军的失败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同时我认为当时八军应该早坚决的向右江推进。固然龙州对外影响很大，但是一个保守不住的地方。

（八）侦探工作太差，好几次都吃了这个亏。

（九）敌军士兵运动作得太少，特别是对桂系军中的兵运，是一很大的错误。

(十) 七军是坚决的执行力了立三路线,碰了不少钉子,做了不少错误,但是假使六月十一日政治局决议达不到七军,是否我们可以避免立三路线的错误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七军的基础是,一部分是转变过来的旧军队,一部分是斗争未深入的农民,这便是便利于立三路线发展之基础。过去攻南宁正是犯了这一错误(立三路线并未到七军),并且我们未得到六月十一日的决议即已决定向中心区域发展,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线没有传达到七军来,七军一路仍是会犯不以群众为中心而以军事为中心的错误的。这仍然是走到了立三的路线,这也是我感觉到的。

(十一) 以上是我个人感觉到的主要错误。

(原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红七军工作时期

1929年夏，蒋桂战争之后，俞作伯（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分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大队行动的。后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의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于1929年11月7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11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后，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后，即由龙州动身，于1930年2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红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

兼八军政委。1930年3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量，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后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1930年10月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口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于是在11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后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千人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于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口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

七军脱离了右江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等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1930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个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1931年初到上海了，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于我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1933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

（摘自邓小平《我的自述》，1968年6、7月）

答复关于百色起义 和红七军史料的几个问题

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征集办公室：

来函收悉。关于百色起义和红七军史料中的几个问题，我们遵小平同志嘱答复如下：

第一：关于发动左、右江地区起义、创建红七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时间问题。

小平同志说：“我是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对俞作柏、李明瑞做统战工作的。同时对广西党（当时是特委，而不是省委）有领导责任。”

“在第四、第五大队撤向左、右江时，就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并派龚饮冰同志回上海，向中央报告。到百色后，即得中央电示，予以批准，遂决定于十月革命节打红旗，建立红七军。”

第二：关于《七军工作报告》的作者问题。

小平同志说：“这个报告不是我写的，谁写的不知道。”^①

第三：关于《七军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几个问题。

小平同志说：“河池会议改选了前委，我仍是前委书记，陈豪人是前委的成员（是否兵委书记，不记得了。）

小平同志办公室

1985年6月20日

^①经中央档案馆与邓小平同志重新鉴定，确认这个报告是邓小平同志写的。

历史文献

中共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委的信

(1929年8月17日)

广西特委：

报告收到兹答复如下：

1、二中会议决议案附上，必须详细讨论，最主要的是要根据二中会议的决议，审查过去广西工作，并定出具体执行的计划，二中决议即翻印发各级党部一直到小组讨论。

2、广西自从黄、白倒后，更为军阀割据的形势，经过黄、白之长久剥削，广西劳苦群众的痛苦，已达极点。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自然容易在群众中发出较大的幻想。尤其是没有经过长期斗争的广西群众，易于接受这种改良欺骗的宣传。但是要揭穿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肃清群众对改良主义的幻想，最主要的是要从日常斗争中去揭穿，用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去证实。如果没有群众的斗争发动，仅仅靠宣传煽动，或者过□的反对军阀的口号，是收不到大的效果的。因此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是广西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你们要利用恢复群众的机会，尽可能的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去执行党的任务。但在执行公开工作的，要特别注意纠正同志中的合法观念与和平发展的思想。要深切的了解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二个不能分离的东西。尤其是公开工作的本身，就是一个斗争，要靠群众的斗争，才能争得公开路线的

执行。你们决定以南宁、柳州、梧州三大城市为全省工作的中心是对的。但是省委还要向你们指出，在三大城市中更须以梧州为中心之中心。梧州工作重要，不仅在于它是广西无产阶级的中心，尤其是在两广工作的配合与联系上，它占着更重要的地位。至于梧州工作，省委要极力帮助你们。但是以后梧州工作仍归特委直接管辖。你们的报告中对于工运的计划仅仅注意在组织上面，证明你们还保存着极浓厚的狭隘的组织观念。组织赤色工会固然是职运中的重要任务，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加紧对群众日常斗争的发动，确是困难打破群众的恐慌心理。而且赤色工会不能坚决的发动群众日常的生活斗争，赤色工会亦无法扩大与发展。你们必须集中力量注意三大城市的职工运动，更须利用目前的混乱局面，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只有斗争才能提高群众的勇气，只有斗争才能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只有斗争才破除群众的合法观念，离开了斗争来谈组织是错误的。

3、农民群众以西北〔江〕流域为中心区域是对的，你们必须照此决定布置农村中工作。你们能注意到在来省请愿的农民中做工作是对的，但决定组织全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是错误的。这是“国共合作时代”的工作路线，这全是由上而下的方式。各地农民群众的组织到现在还是薄弱的，而忽然成立农民协会筹备处，一方面是一个无群众的空机关，容易被人利用；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群众依赖政府的观念，增加群众合法运动，这是断送农民运动的办法。你们必须艰苦的从下做起，努力在各县尤其是西江流域一带发展农民的组织。过去田南、北流、玉林等县的农民运动比较还有相当的基础，你们必须加紧指导。各县党部应坚决的领导□□□□争，尤

其注意在秋收时，发动普遍全省的斗争。特委是目前应即开始在各县布置这一工作，对于已有武装冲突的地方，要特别加重游击战争的指导。

4、群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的组织，同志绝对不应当参加这个委员会。群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在目前军阀统治之下，丝毫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决不能代表群众的丝毫利益，而且必然的要成为压迫群众运动的组织。党参加这个委员会，只有使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消失，这完全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如已有同志参加，须立即退出。而且党要在斗争中揭穿群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假面具，领导群众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

5、反对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进攻苏联，是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你们应即根据中央及省委通告，讨论具体执行办法。特委即出版一党的政治刊物（周刊），最好设法石印目前最重要。

特委一切要求，省委设法使之做到。特委应注意对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省 委

25/2 文先 十七、八、一九二九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11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 广西特委的指示信^①

(1929年10月8日)

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

目前两广军阀战争已紧张到了极度，我党在两广的工作，中央除于毅宇同志来此面谈之外，更有以下的书面指示：

I、反军阀战争中的工作 路线与其危险前途

反军阀战争与拥护苏联成为目前政治形势中我党的两大任务，以及实现此两大任务的主要策略，中央在四十九号通告中已均有详细说明，可作为两广党部讨论施行的根据。惟关于反军阀战争中的工作，在两广有一工作路线的根本问题，值得中央于此加以反复的说明。中央通告中指出：我们对于这样反革命的战争，是要采用失败主义的路线，就是要使战争的双方通通失败，革命的势力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以“群众的革命暴

^①这封批示信批评了广西特委对俞作柏、李明瑞的统战工作。后来的历史说明，中央的批评是错误的。——请参看本书《综述》的有关部分。

“动来消灭军阀战争”是我们中心的宣传口号，必然使这一口号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使广大群众了解，只有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然后才能永远消灭军阀战争，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反军阀战争的一切部分的斗争——反对拉夫拉车，反对摊派军饷，反对运兵，反对增加工作时间……等的斗争，渐次汇合成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之总的斗争。这是反军阀战争中一贯的工作路线！在两广不仅完全通用，且因双方战争已起，更应加紧的执行这一工作路线，使我党争取群众准备暴动的总路线能于这次两广军阀战争中得到更大的收获。但在这里，却有一严重问题横梗在两广尤其是广西的工作形势中，稍有不慎，便将使党的全部工作路线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因为在目前两广尤其在广西的工作形势中，一方党的群众基础还不宽广，另一方广西党部却多多少少对于广西军阀政府的设施已存有幻想，很显明的现时广西军阀政府的一切设施，最多亦只是个急进的改良主义者，实际上他并不能脱离全国统治阶级的经济背景，甚至他更不能脱离广西本省的封建基础，乃至帝国主义的控制，来真正实施何等改良主义！故一般的说还只是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惟其是欺骗宣传，我们更应及早揭破群众对他的幻想，领导群众毫不犹豫的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不管现时广西军阀口头说得如何漂亮，对群众表示得如何好，只要群众的革命斗争一起，反军阀战争的斗争一起，凶恶的军阀原形将必要毕露。即使到那时还有所谓革命的军官同情于群众斗争而走到群众一方面来，也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起来后才能看出，才能证明（老实说，便是我们同志的军官，也须如此才能证明！）。否则，在群众的革命斗争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军阀

的利益还没有直接受着损害的时候，谁能保证军阀军官中革命的语调与表示是真实而可靠的呢？广州暴动前，记得在张发奎军队中有许多表示忠诚于革命的人，暴动一起，顿时起了分化，只有群众斗争才是革命真假的试金石，尤其是军阀军队中的军官，不管他直接压迫群众与否，在他的地位上，他已处在被革命的地位。况且既做军官，他必然要依靠一般军队的惯例，来束缚士兵群众的政治自由。即使他在生活上能给士兵以稍好的待遇，但在政治上无论如何脱离不了统治阶级一般的关系。否则他只有革命而投身到工农群众方面来。正确的说，即使这一军阀军队中的军官是党派遣同志混入去做的，他的作用，亦只在破坏敌人队伍，绝对不是争取群众的公开路线。故在现在统治阶级队伍中做事的人，不论其言谈如何，一二件事情的设施如何，至多只能将他看做是改良主义者，当做改组派第三党一样的反对。在目前统治阶级日益走向崩溃，群众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中，革命与反革命的堡垒只有愈加紧严，才能愈利于革命的进行。反革命的统治阶级利用各种各色的欺骗引诱以混淆革命的战线，以缓和革命的发展；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利在愈坚决自己的革命领导，才能愈获得广大的群众，一致的为革命斗争。所以现时我党在两广的反军阀战争工作，尤其是广西的反俞、李、杨、吕等军阀的工作，不应与上述的路线有丝毫歧异。这不仅在口头上接受，要在实际行动中真有反抗的斗争表现。依现时两广尤其是广西的工作情形看，我们感觉下列五种危险的条件已有多少的存在，这在工作前途上，实成为极严重的问题。

第一、在两广军阀战争发生的区域，我党领导群众的力

量极其薄弱。在广西，群众运动可以公开号召，三四月来，未闻我党有一件领导群众斗争的显著事实，是群众不起来么？不是，在俞作柏初回去时，有许多群众对他存有幻想，因之发生有农民代表找他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广西的党如立即注意于此，则三四月来，我党必早已将跃跃欲试的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形成广西党的基本力量，反军阀战争的群众基础了。因为事实的相反，不容我们不恐惧到广西党部的注意力将必在彼而不在此；不要说将群众工作放在次等的地位，便是将群众工作与军事阴谋等量齐观，或是忽视了群众斗争的发动与领导，广西党必已踏入了机会主义之门，将使广西党全部工作与党的争取群众的总路线立在分歧的道路上去了。在广东除去北江几县外，其他的战争区域如广州及中西路各县党的力量还很薄弱，假使省委对于他们的指示和督促稍一不足，他们很容易发生与广西党部现时同样的毛病，或是一动也不动，或者一无群众工作可言，群众基础的薄弱，群众斗争之未能领导，这是使党趋于右倾之最危险的条件。

第二、现时两广的军事运动，尤其是广西，士兵中的工作极其薄弱。广西甚至毅宇同志巡视后，才开始向士兵群众中求发展，但发展的数量与部队都还极其窄狭。以前则尽做的是军官运动，便是广东省委对于怎样发展士兵工作的全部计划也还很少注意，引导工农群众投身到敌人队伍中，去争取群众的工作总不如介绍同志去当军官的那样多分〔方〕注意。没有士兵群众的基础，如何能实现军事阴谋的企图？没有士兵群众的兴起，又如何能实现反军阀战争中的失败主义？即使有三数军官是坚决革命的，能执行失败主义的策

略，如一没有工农群众斗争的基础，二没有军队内部士兵群众的工作，亦终将归于失败，故不重视士兵工作而多分〔方〕注意于军官运动，必至重蹈国共合作时代机会主义的覆辙，而且要更加厉害。

第三、在俞、李及改组派统治的广西，一切政治的设施，显然是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的色彩的——不管其实质上能否实现其改良主义的企图，但政治上欺骗的影响确已渗入到工农劳苦群众中去了。因此，这一改良主义的欺骗影响，不仅可以诱惑群众，增加其对于统治阶级的幻想，延缓其革命斗争的发展，甚至已经反映到我们党内，同样发生对广西政府存有幻想的动摇同志。广西群众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同志中竟发生有猎官做的可耻行为，这都是广西工作中存在的很大危险！

第四、目前广西的统治阶级，好象对于工农劳苦群众的自由是相当承认似的，其实正因为广西的工农群众斗争还没急剧的发展起来，所以这种欺骗的面孔还能保持。一旦群众激烈起来，有动摇统治阶级存在的危险的时候，或是统治阶级受着帝国主义的威吓及其内部严重压迫时（如军阀战争或豪绅资产阶级向政府严重抗议）群众现时所被赏给的一点点自由必要被剥夺净尽，反之还要受比一般还严重还残酷的压迫。愈因群众（甚至党内）对统治阶级存有幻想，而和缓其争自由的直接斗争，则压迫之来，将愈加显其严重，愈加使群众措手不及反抗，这是目前潜在的危险。假使党的指导机关不了解这一危险，甚至党内还反映群众中的幻想而同样一无准备，则统治阶级必然反动，必将成为广西党部意料之外的“突变”。那么，危险之来，更将影响及于党内。

第五、目前两广党部的指导机关，除了广东省委大体上了解中央所指示的策略并相当懂得如何应付当前的事变外，我们对于广西特委以及许多地方党部，终觉着他们有可以发生机会主义领导危险的事实根据来令我们相信。如上边所说的群众斗争之忽视，士兵工作之薄弱，偏于军官运动，对统治阶级的某些分子存在有幻想，这不能不说是广西党的指导机关中已伏下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根苗。

以上的五种危险条件的存在，极值得两广党部予以最严重之注意，并且不仅注意，更要从实际工作中对机会主义的危险根苗予以无情的打击，要毫不犹豫的对于坚持机会主义以至军事投机路线的分子给以组织上严重的制裁。至于离开阶级立场而自由猎官做的分子更要立即开除出去，以严整党的组织。

II、目前最紧要而迫切的任务

在两广反军阀战争的工作过程中既伏下了上述的危险，党便须更加紧对于正确的工作路线之执行，中央认为现时两广工作之最急者约有下列几项：

第一、要毫不犹豫的发动群众日常斗争与领导群众直接行动，目前两广群众斗争的形势，客观上是极利于斗争之发展，尤其是军阀战争开火后，斗争的机会必要较平时为多，群众主观上虽在广西还对统治阶级有幻想，但战争到来客观上将打破这一幻想，在广东则群众斗争久已跃跃欲试，故群众斗争的中心关键，是在党与群众的关系以及党在群众斗争中的领导。只要党坚决的向着群众，在群众中寻找

线索建立关系，毫不迟疑的领导群众走上斗争之路，则群众必然会发动起来。军阀战争已经开火了，工作的形势已经开展在我党的面前，现在所最怕的就是党的犹豫不前，党的机会主义的等待。广西党过去的失策已经是过去了，现时应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沿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不管梧州是落在任何派的军阀手中，不管统治阶级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是压迫是和缓，我们的工运方针与群众工作的路线总没有变更，总须发动群众从日常斗争做起，领导群众直接行动，领导群众为自由斗争，领导群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打破其对于任何一派的统治阶级的任何幻想。战火开后，广西群众工作在我党主观之人力分配上与客观之交通隔断上必有一层困难，但必须告诉广西特委要战胜这困难，要以最得力的工作同志分配于上述的工作区域去发动群众，须绝对避免全集中于军事运动或在军运失败后便全部躲避起来的倾向。在广州在中西路的重要城市，也须依照省委原有的计划陆续派遣同志去开始工运，开始群众工作，决不应稍存等待的观念，愈因为我们能在敌人严重压迫时树立起群众工作的基础，愈才能在战争形势转变时（万一改组派有胜利可能），战胜敌人之改良主义的欺骗。如果严重压迫的环境继续下去而没有任何改变，则我们工作也只有这样坚苦耐心做下去才能逐渐树立起党在群众中的基础，才能不致使这次军阀混战的机会空空过去。否则，省委稍一犹豫，下级党部及同志必会使等待的右倾观念发展起来。在工运中铁路海员的工作是广东工作的主要对象。我们现时决不要以仅有的线索为满足，预料其工作前途没有多大困难。过去事实教训我们的是铁路工作稍一不慎，便会造成铁路工人中的分裂。海员工作便在内河我

们也还没能抓住船上的中心斗争来发动群众，这都须广东党部很细心很坚决的指导工作，决不应有丝毫粗心与大意，对于机器工会属下的工人运动，广东党亦极注意现时机器工会的活动范围，在下层产业与工厂中，已渐变成整个产业的组织，如兵工厂、电灯厂等工会都包含有全产业的工人，故我们在这种工会中的工作必然要采取对黄色工会的同样策略，不反对这一厂一业的机器工会分会，而只反对其黄色领袖与要求从业工人自己的武装组织，反对为资本家工贼走狗的雇佣式的体育队组织。广州市郊、中西路及广西梧、邕、柳、浔一带的农运，省委必须有计划的开展工作。现时在这些区域农运的主要策略还是发动日常斗争以走向武装游击，而工作的计划与人材的适当分配是目前省委急需解决的问题。各个城市乃至乡村中的反帝斗争，也不应因反军阀战争工作之加紧而不与他联系起来。要知这次两广军阀战争中各派之胜败存亡的关键完全操在香港帝国主义手里。陈济棠、吕焕炎的合作，一方反对张系入粤，一方严防蒋系军队，这显然是在大英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的组织不与老西山会〈议〉派的重新结合！故各地反帝运动必须加紧。

第二、要迅速的有计划的深入士兵群众中的工作。在目前客观的兵运便利条件已不如过去的两三月，但这是执其一端而言。

若就军阀战争已经开火来看，则目前更是发动士兵斗争组织士兵于党的领导之下的最好机会。过去士兵工作之缺乏，不仅广西，广东亦复如此。现时的中心问题，首先应从宣传鼓动上着手。在广西的军队中，早就应利用机会公开我党在士兵群众中的宣传与鼓动。我们不能因为俞、李、杨在

其军队中发了士兵欠饷，相当的允许士兵过问他们自己的给养，便以为这些军队中的士兵已无日常斗争可言。事实决不如此简单，士兵的痛苦，是与军阀军队并存的。军阀制度存在一天，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决无法得到根本的解放，军阀为要维持他的统治割据，他必然要克扣士兵的军饷，苛刻士兵的待遇，以扩大他的军队，加增他的实力。俞、李等的小恩小惠也不过在巩固他们实力的意义上，采取如此积极的态度以便取得军心。一旦军事行动紧张起来，军阀战争亦已开火，则他们对于士兵的态度，必然不可免的要与其他军队一样，即使俞、李本人，主观上是愿以士兵群众为其投身革命之基础，但当其军阀制度未被推翻以前，士兵群众还未发动起来投身于革命斗争以前，俞、李个人又何从表现其革命行动？反之，他们一切所为，在没有投身于革命斗争以前，还都是改良的欺骗客观上正有利于改组派宣传；假使我们工作不好，反而会缓和了士兵群众的直接斗争，蒙蔽了士兵群众迫切的革命要求。所以现在的中心问题决不是俞、李个人是否真心投身于革命斗争，而是我们在其军队中究做了几许士兵工作。我党在广西的各地组织如不能在其与士兵的日常接触中，向之作革命的宣传，鼓动其发动军队中的日常斗争，组织起党的秘密支部，则广大的士兵群众不仅不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行动起来，便是俞、李个人在其军事失败的时候，真心愿意投身于革命斗争，将其军队硬以命令式的发动去实行游击战争，广大的士兵群众亦难免不为其他投机与反动的军官所欺骗，而实行反对俞、李，仍然回到国民党军阀的指挥之下，来屠杀自己的工农弟兄。故任何方式的军事行动，如果不能从士兵群众的基础上，与工农斗争的联系上着

手，结果必陷于军事投机的失败覆辙。现时广西党乃至广东党如不努力于士兵群众工作的发展，急起直追的来发动士兵，组织士兵，则在这次反战争的工作中，我党又将无多大的收获。倘使广西军队中的军官的确有些真倾向于革命的，不管他们战争的前途为失败为胜利，我们工作的总路线必须在失败主义的原则下，鼓动起士兵群众中的日常斗争，组织起士兵群众斗争的力量，以准备军队中的革命基础。能如此，我们的群众基础立定，则不管军官的向背如何，皆不能动摇我党的路线丝毫。否则，我们在主观上虽也知党的路线绝对不能动摇，绝对不能迁就丝毫，但实际上必因我们无群众基础，不自觉的将以军官的赞否意见为我们决定工作的根据，至少会影响到我们议事的根据。事实上广西党的生活中已有了这些现象，急需省委、特委予以严厉的纠正！目前士兵运动最具体的办法是：省委、特委应找到得力工作人员，专门做士兵工作（中央已派去两人），督促各地方党部，加紧士兵群众中宣传组织工作，有计划的介绍工农群众投入军队，建立在士兵群众中党的宣传工作（如发传单、发行士兵报纸、发布党的政纲等），扩大军队民主化的要求，强健各地兵委的组织，严密军队中的士兵支部，特别注意中心部队中心部门的发展。至于兵运的一般具体方法与宣传鼓动的口号有过去中央的指示，可作参考。

第三、要坚决作反改良主义斗争，目前广西的统治局面，显然是改组派的政纲在统治着。不管其改良政纲能否施行，改组派是否握得实权，但改良主义的欺骗，确已影响于群众，确已缓和了一些群众的直接斗争，使群众对现政府〈产〉生了相当幻想。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党尤其是广西党

应毫不犹豫的予改组派以政治上、组织上公开的打击，要尽量多的驳斥改组派的改良理论，对于广西政府的改良主张都须加以无情的反对，对现已开火的军阀战争要加双方以攻击，号召群众直接起来反抗，对广西政府或俞、李等人的反蒋宣言如系站在政府地位，站在改组派立场，站在改良主张上说话，更必须勇敢的站在工农劳苦群众方面予以正确的批答。总之，凡现政府的一举一动，改组派的一言一行，我们必须公开党的面目与之对抗，公开党的政纲的宣传以争取和发动广大群众。只有公开的号召群众直接斗争，不断的举行反抗的示威演习，才能动员起广大群众，才能树立起革命的斗争力量，才能影响到广大士兵群众与存有革命倾向的军官，最后才能克服改良主义的一切引诱以促进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潮之总的汇合。在这里，最具体的办法，除掉上述的群众工作外，必须将香港的小日报尽量多的宣传我们的主张，以批评两广政局，以反对军阀战争，在广西亦须尽速度的建立日报，公开我们的主张以争取群众。一方面香港的日报要想尽方法传递到内地，另一方面要使广西的报纸，便在被压迫的时候也要能在群众中公开的或秘密的散布。群众的组织，我们必须毫不放松的将他们在斗争中组织起来，并且力争公开；如有些群众组织已为改组派所领导，则更应毫不犹豫与之争夺群众的领导，并以群众之力将其驱逐出去。公开一切群众组织以号召斗争，是目前广西局势中最急迫的任务之一。广东在有群众斗争与能够发动群众的地方，也要照着这一路线去做。我们反改良主义派的斗争是极艰苦而长期的工作，决不是打倒了赶走了几个改组派或黄色的领袖，便可认为满足。不但在改组派，机器工会的活动中，要不断的产生改良主义

黄色领袖，便是我们的同志，也同样会受到改良主义欺骗宣传的影响，甚至做了群众领袖，还会因其动摇妥协将自己也变成了黄色领袖；这种事实在与改良派斗争激烈的上海已是层见迭出。所以反改良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两广局势中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望省委与特委予以严重的注意！

第四、依照目前的局势看来，不管广西军阀胜与败，极端反动的压迫，终将不可避免的来到。因为广西军阀如要战胜广东二陈及蒋系军队，必须具备下列的四个条件：一须与香港帝国主义妥协；二须得到广西内部的统一，至少限度要对杨腾辉乃至吕焕炎让步；三须得到张发奎的军事援助；四须以改组派拥汪的旗帜做号召。在这样条件之下，即使两陈及蒋系军队真失败了，两广仍继续大英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将成为张发奎、吕、杨称霸乃至以汪精卫改组派为号召的天下——这便是广暴前后的局面的再见！反之，如两陈及蒋系军队胜了，两广将以蒋系为领袖，而广西复入于旧桂系之手。这两种局面，都不可避免的要走入极端反动的压迫。故问题的解决，决不系于俞、李等军阀之真正倾向如何，乃系于我们对于更反动的局面到来之准备如何。准备的主要关键，在严整我们的壁垒，公开我党的主张，以发动广大群众，由斗争、罢工、示威的反抗一直联系到准备武装暴动之总的回答。在这种工作过程中，特别对于广西的局势，我们必须坚守下列几个具体办法及原则：

(1) 对于现在统治阶级中的某个分子，不管其倾向与表示如何，当其在位一天，至多只能以急进的改良主义者看待。

(2) 对这些当权分子，我们在政治上总是与之对立

的，他总处在一个被革命地位。

(3) 即使这些当权分子中，有倾向于我党的人，但其在位一天，我们总不能与之发生正式的组织关系。

(4) 军官运动不能被认为党的军事运动之基本工作。

(5) 在阶级立场与政治责任上，我们同志不应为现时政府中任何官吏，同志中自由猎官做的人尤应绝对禁止。

(6) 无论在任何国民党军阀军队中的工作路线，总是破坏他的，绝对不是巩固他的——夺取其士兵群众投入红军或是整个转变为红军，亦仍要破坏他固有的军阀制度，而改变为我们的赤色军队。

(7) 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是时时准备能与敌人决裂的（但不是无条件的兵变主义），故应注意到工农群众斗争的经常联系。

这些都是组织上严整我们壁垒的办法，依此路线与群众斗争及士兵工作联系起来，便是极端反动的压迫到来，我们亦决不至因毫无准备而溃散，反转会有极积极的反抗表示和行动。

第五、要严防党内右倾的发展与指导机关机会主义的发生。广东省委对于这一问题要严重予以注意。省委要加强自己的政治指导，特别对于广西的指导。对于军阀战争前途的观察，不要离开帝国主义是战争中主要动力以及阶级的根据，而只从军事立场上推测双方的胜负——这便是机会主义的出发点！对于地方党部的工作要在其主要部分，严格予以检查。同志间已经犯有了右倾的错误，要用教育的方法予以纠正，但同时要检查其是否已为系统的错误或自觉的过失。如是，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如指导机关犯有机会主义的错

误，省委更须严厉的予以纠正与指斥，必要时还须予以组织上的改组。对右倾与机会主义的斗争，不仅应用在政治指导上与事后检查上，便是在经常的工作注意与布置上亦须严防机会主义倾向的发生。如广西特委的军事运动过去偏重军官运动而忽视士兵运动，这在实际上确已作〔播〕下了机会主义的种子。因此，两广党部在反军阀战争工作的布置中，必须反对任何等待主义倾向，必须在争取群众运动公开与保持党的组织秘密的路线上，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以准备群众实现“变军阀战争为阶级战争”的总的任务。

第六、要深入土地革命斗争，扩大游击区域，建立红军乃至发动可能的游击战争。在反军阀战争的紧要关头，土地革命的斗争在广东更须力求深入。在东江军队空虚的区域。农民暴动的发展，只要我们能有计划的发动与坚决的领导，则游击区域必可扩大，红军必可建立起来。省委于此，应决定一详细行动计划，指示东江特委及海陆丰地方党部，并要与朱、毛红军的游击及惠属的工作联系起来。北江清远花县乃至南雄始兴的游击战争均有可能发动起来。如果北江的战争趋于小北江及西北一带，我们更宜有计划的发动军队后方的农民的武装斗争。广西的军队如果有被吕、杨或两陈解决的危险，则我们所能领导乃至所能解决的部队，均应预为之计的将他们发动到农民群众中去实行游击战争，发展土地革命。这一计划，我们决不应以这些部队之高级军官的倾向意志为转移，而应纯全建立在我们所能领导与所能解决的实在群众力量上。假使高级军官亦有同情于此种举动的人，我们只宜将他看做是一种助力，决不应依之为发动的主力，以贻误大事！这一点是目前广西军事工作之最后命脉所系，

省委、特委要有很详细很具体的办法处置此事。

以上所指均为目前两广反军阀战争中最迫切的工作，省委、特委必须于接此信后立即予以讨论并付诸实行。其他问题，要待他信再及。

中 央

一九二九年十月八日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11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中共广西特委给广东省委的信

——关于九、十两月的报告

(1929年10月20日)

广东省委：

特委在九月初，付上八月份报告……

九月至十月的报告：

1、广西政治情势

1、省大会对广西政治估量之正确：

省大会分析广西的政治仍然是代表地主的与……小军阀……割据，永无法统一……走到……的局面，……没有办法，只有加紧的剥削群众……

2、俞氏政府……与残酷的剥削：

俞氏到桂后，就散布他的改良主义，如对农民之二五减租，自由……工会……然而广西的中小地主很难接受这些改良政策，俞氏之三令五申的减租布告，形同废纸，工人方面亦不过……几个工贼关系，以办工会之名义，压迫挟制工人的工具而已。这些改良政策，不上二月就自己揭破其面皮，而完全破产。兼已过八月初，新政府成立后，金融非常紊乱，财政始终没有办法，但总想维持其统治生命，只有残酷的向群众身上剥削，公开的贩烟、开赌，甚至百货有捐，宣布旧桂军为广东所刊发行的新省银行新币数十万。黄绍竑所

未曾有或已经□废除的剥削，俞氏均五花八门的层见叠出。民众怨恨之深，实较黄氏为甚。玉林之反对税局，右江的反苛捐杂税等反抗，已普遍的正在自发。于此可见二个月的俞氏德政了。

3、反蒋之经过：

在豪绅地主军阀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的国民党统治之下，与无敌〈数〉大军阀割据的形势中各种矛盾亦无法解决，尤其是地盘财政及反革命的领导权，只有引起不断的军阀混乱。所以反蒋战争是不可免的要到来，广西亦不可避免的要参加这次的混战，事实上只有向外发展，才能企图解决吕、杨、李等几个小军阀之矛盾。在反蒋空气酝酿之时，特委早已坚决的肯定其为军阀混战，丝毫没有革命的意义，只有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同时估量到……一方面，至少有以下三个缺点：（一）李吕……几个小军阀能够一致，俞、李能够指挥全部；（二）战争及财政可以解决；（三）广西陆军……广西……但西江战区是……不要粤方之空军牵制，果也于十月三日俞、李在南宁所谓讨蒋，吕焕炎同日在梧反俞，其表面虽然来投降，但其背景不是简单的投降，而且是旧桂黄、白，企图恢复旧桂政权，此中背景，蒋亦未始不知，但为制俞计，不得不互〈相〉利用。

反俞后，新桂〈系〉向外发展的计划……但俞、李尚可一致以对吕，如无妓女化的改组派从中活动，以俞、吕的不能忠实于改组派，不如趁此时“先倒俞而后倒吕”之计划（？）……但俞、李始终不觉改组派之向内发展，待李部黄权之变，使在坟墓中打转转的俞、李，如鬼旋风般的狼狈而逃，俞氏到桂后，亲自成立的警备三、四、五、六大队退

至左右江……之指挥，李亦将剩余部队退北部（桂林）以……指挥而向……去，改组派尚企图以桂为中心而对吕。国民党军阀之上台滚蛋本值不得去多论调他，但此次俞、李之来去，既不肯放弃其军阀的本性（自然不能的），不又不容许群众多做反革命的勾当（？）^①，而不见信于改组派，被改组派的挟制而不自觉。待将走之际，向改组派之“待机就可回来”的一句话以自慰，哀极可怜。

4、俞、李走后之广西：

十月望日，俞、李的前线部队，已经退回，粤军六十二师当已到桂平一带，反蒋黄权旅亦到贵县、贺县一带，三、四、五大队已经退出南宁，第六大队亦从贵县撤回右江，南宁治安由俞委张贯之为警备司令，以负维持市面之贵。至十七（日），吕在梧就省府主席职，南宁各机关均无人办公，俞派及改组派多逃走，南宁市面双十节后起即不开店门，新桂（系）纸币低到二八，港纸百元可换西毛（毫）二千三（百）毛（毫），市面恐慌已极，梧港交通断绝日久，闻吕焕炎联络陈济棠在梧仍打反蒋清共旗帜，稍有色采的学生，多被逮捕。

5、广西工农革命的形势：

自俞氏自己揭破其改良欺骗的面具以后，群众对新政府的幻想已无形消灭，且逐渐的认识新政府的反革命行为。以是工农自发的斗争不断的起来；南宁工人的反对官僚委派工贼与驱逐黄色领袖，以及加薪的经济斗争，确是黄氏政府统治下所未有的事实。右江各县农民的反豪绅地主的斗争，与反苛捐杂税的斗争，玉林之反对捐税机关；贵县之数千学生之

^①原文如此。

罢课，处处表现工农反抗压迫阶级的斗争之开始复兴。

6、结论：

此次国民党军阀混战的争夺……的广西地盘的局面当中，各小军阀无法补救其本身的弱点，以消灭其他军阀的基础，又无法来解决各个间的矛盾。反动的统治无办法统一，势必仍旧是数个小军阀的割据。俞、李下台后，陈济棠的势力（香、蔡二师）已侵入了桂平一带；吕焕炎之割据玉林、梧州；杨腾辉之退守桂林，与警备队之退守〈左〉右江，这样四分五裂的割据，绝没办法消灭混战。因此，工农的痛苦将益入水深火热之中，必定的只有起来反抗国民党军阀混战与压迫剥削工农的反资本家工贼豪绅的斗争，必然的会继续不断的爆发与扩大起来，这确是广西革命的客观条件，但群众的失败情绪仍未低落，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仍没有多大的领导的能力，仍极薄弱，城市工作仍不能普遍的建立起来。因此，广西目前仍不是暴动的局面，而正需我们很艰苦的深入群众中去创造工作，只有坚决的执行党的正确的路线，使群众的斗争，普遍与扩大，以促反动统治的崩溃。

Ⅰ、特委工作

1、筹备全省大会的经过：

全省大会，本定于九月一日开会，以俟省委代表之到〈来〉，直至九月十日才正式开会。当时本已起了政治任务、组织、职工、宣传、农运、军事、土地革命、妇女、CY等九个草案。在起草的时候，已经觉得太过冗长，恐不能详细的讨论，不过把“六次大会”“二中”等决议案，重复的再抄一遍，并且为恐代表失了中心，但为使久不明了党的政策的广西全部同志，切实认识起见，亦属不得不尔。待

省委代表到后，如无此九个草案，恐无法讨论。因此，再另起一个政治任务草案。

各县代表于九月一日前后，已到南宁。有一部分以各县农民协会的名义，已于八月十五日到了，他们原来是无谓的跑来打听政治消息的，特委以各人既到南宁，且离开会的日期非远，故决令其暂留，即开一短期训练班（约十五、六人），至草案起了之后，又分组开始正式的讨论草案，为预备会的形式，此次来参加大会的同志能够得到多少新的空气。

2、大会的经过：

（一）大会于九月十日正式开会至十四（日）午夜闭会，时间为五天一夜，开会地点颇适宜自由，大会开始第一、二两天为省委代表的报告，第三天为特委工作报告，及各县代表补充与讨论政治任务；下午为讨论代表的提案及产生新特委。

（二）到会代表为九县、右江特委一、区委及职工、农协三个同志参加，连前特委本身，共十九人，通知而未到会的有四县一区；未曾通知的有二县一区；CY因为本身的纠纷未能解决，与负责人的调换，未指定人出席，代表成份除特委本身外，只有市郊区委一个农民，其余完全为智识先生及农村知识分子，这是大会中最大的缺点。代表在五天的会场中精神很好，能够每个都发表热烈的意见。代表最表示满意的是广西自有党以来，从未有开过这样的会，与这样的详细政治报告，因此代表的兴趣很高，且能得到不少的影响。

（三）大会的精神。大会完全接受“六大”、“二中”的决议案，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破坏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

阴谋，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瓜分中国，拥护无产阶级的政权苏联，反对中国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反革命行为，打破资产阶级的改良宣传，在反帝、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与拥护苏联的几个中心口号之下，去发动并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从群众日常的经济斗争中，汇合到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的政治斗争。

（四）大会决定党的工作路线：今后党的工作路线，应采取公开活动的策略，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去发动并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从斗争中去争取广大的群众，扩大党的政治主张，扩大党的和群众的组织，注意于党的基础的创造，并使工农运动的平衡与配合。

（五）大会对全省工作的布置。确定南宁、梧州、柳州三大城市为最重要的工作区域，尤其是梧州应集中人力、财力去建立梧州区域的工作，以浔江流域、公路干线、交通枢纽的城市，为重要工作区域。以及玉林所属，右江各县过去曾经斗争的地方的工作的布置。

（六）中心工作。大会决定今后党的中心工作，为城市的职运，党必须用十分之八的力量，去创造产业工人、交通工人、市政工人以及码头工人的工作，尤其是交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必须于最短期间去建立这些工作，农村的组织，应以贫农、佃农为基础。

（七）新特委的产生：特委自四月文○^①同志返港后，本身工作已是不健全。七月省委派何同志来接后，实际上只有方、聂、何三个同志负责，工作上仍不健全。因此，决定在大会中改组。以前由特委与省委代表所决定一名单（七

^①应为文沛。

人)由省委代表在大会中提出,待后省委代表届时来到,由特委代表、省委代表的意见,提出七人,复由代表尽量介绍,共十九人为补选人,选举的结果,仍然是照特委的原定名单当选:张(即五月来港的〇〇)、陈(新进分子)、严(右江工作很久)、聂、雷、何等六人,余一人候省委派一宣传人材充之。七人组织一特委,工作的分配,以何、陈、聂为常委,何为书记、陈为组织,聂为职工。特委决定于大会后移梧,南宁则由特委特派员帮助工作。张为玉(林)、北(流)、陆(川)、平南巡视;严为右江巡视;贵县、贺〔宾〕阳仍由雷负责巡视(巡视为第一次而言)。现严同志为东兰工作的需要,已派去东兰,右江第一次的巡视,已派陈同志去(组织)。各巡视员均于九月三十号前出发,兹〔除〕贵县外,各巡视尚未回特委。

(六)一月半来的工作概况:浔江流域与右江东北部如□,全省工作只限于西南部……柳州、桂林一带完全没有,现有工作可分为三个区域,即(一)玉林五属;(二)浔江左岸;(三)右岸;

(1)玉林五属:有玉林、北流、陆川三角的组织。陆川正在恢复之际,只有同志数人,工作尚未健全。玉林、北流各有党团员五六十人,农民组织各二千余,县委本身不甚健全,自六月朱式岩同志牺牲后,即所谓玉林六月暴动的失败后,工作整个的随之停止,县委虽在城内,而城市工作非常薄弱,玉林五属的群众,非常勇敢,斗争的情绪亦很高,但同志不敢斗争,完全表现出为群众的尾巴主义。自九月初与特委发生关系后,工作已经恢复,已充分表现出合法运动

①即朱锡昂。

与和平松慢的右倾性，经特委的严厉纠正，但仍极浓厚的存着对政府的幻想，依赖“双十”的工作与秋收斗争，除给以通告及详细的指示信外，亦派巡视员去布置及督促执行大会的决议，现尚未接到其报告。

(2) 浔江左岸：有贵县、宾阳、平南、桂平四县的组织。贵县较有基础，为全省冠。全县有党团二百三十人，十个区委，三十个支部，工作多集中于城市及市郊，有农民的组织二十余乡，六百人，有工人二十余人，学生五百，妇女三十人，有先〔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的组织六十人。但组织不甚切实，党不能采取公开的策略，只能秘密的活动，不为（？）斗争。尤其是不能自动的去做，必要接到上级的通告，才能相机的去执行，县委亦不甚健全，不过在秘密的活动中，尚能动员全体同志，支部亦能按时开会。宾阳有同志八九人，二年来工作……与特委的关系亦不甚好，大会……工作毫无表现，现派巡视员巡视了一次。桂平、平南……的基础，本来很多，后受清党时的破坏太深，工作完全停止。一年来与特委没有关系，现已找到头绪，各有八、九个同志，并派了两个同志去工作。

(3) 浔江的右岸：有东兰……已有十分之三……有十分之四……，河池有十分之二的地区，约一百八十五的割据（堪称该区为广东海陆丰）。东兰与豪绅的斗争，本有四年之久……同志……所领导的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有组织的农民十六万，可以号召二十万的农民，有经常的武器一千一百，在黄氏清党之时，纵然与广东东江同样的摧残农民，农村焚烧得很厉害，但武装是毫无损失，八月间政局的……该地的农民斗争的勇气，又复提高，武装已完全集中，即开始

准备反豪绅的反攻，东兰的斗争确是……土地革命的斗争，但以党的领导力量太薄弱，使策略上，诸多错误处，东兰党的组织……一九二六年就有〇同志前去工作，只成立CY支部，约同志四五人，所以同志工作……不好，至与……冲突，当地领袖被安纳基派所包围，我们同志因没有上层组织，致被打击，而离开工作地，迨当年十月，以〇〇同志的表示很多，一面与我们同志私人……不免，一面开始于支部的组织。……时加以书面的指导……这一时期的工作，形成放弃。目前……与右江的……不密切，而最大的错误，……不能正确分析东兰的斗争的性质是土地革命（也可说自发的土地革命斗争）。对〇〇〇入党，开始经过机械的……而……至今年八月才加以正式批准，现在已有20同志，三个支部。……同志十六人，农民二人？来省（另有任务）并且要求训练。特委当时开办一短期训练班，计十余天，除给短期的训练外，最近且得俞氏之……二百多枪，五万子弹，加增了一部分武装力量，现已于十月……回去了。特委对东兰工作，除决定……的……外（附东兰工作计划），并派严同志专去东兰，帮助并指导……军事人材……使东兰的土地革命的深入与扩大……该县……三县党的组织亦极薄弱，只有同志八九人，均当地农民领袖同志，对党观念较好，惜未受过训练。党不发展的原因，完全……只注意于盲动……党的宣传、组织工作完全放弃，因此党亦如此薄弱，但同志在农民中的信仰较强，每县多能领导十分之四的地区。农民斗争，亦受东兰之影响，有很多的群众，有武装三百余。向都只是三个同志，有全县中部的的工作组织……同样的薄弱，但工作指示其目前的中心工作外……（九月二十八发的）十九

〔月〕初夏（复）派严同志去东兰时，顺道巡视……外，现因右江工作，因军事关系，特派○○同志前去布置。……果德、同正各有同志五六人，但同志对党的观念极坏……邕宁原有市郊、那马、三官三区的组织。现在三官工作完全没有。……那马关系较前稍为密切，但仍不建立工作，只有一个负责同志与特委发生关系，虽特委欲派人去整理，也收不到效果，市郊区还能做些少工作，组织亦无法起来，十七个同志不能召集支部会，现只有各个谈话，有时能接受党的鼓动做点工作，稍受挫折，即行退缩。

（4）南宁城市工作：两月来有相当的进步，主要的是发动了几个斗争。斗争虽然失败，而党的影响有相当的深入群众。打入了二个工会的线索，接近了几个中坚的工人。

（甲）轮船工作从八月初即开始进行。当时调两个同志与九个影响下的农民，到轮船上去当水手等职。在船务局念只轮船，已有六只有我们的人。原要计划拟从此线索入手，为轮船工作的创造〔建〕，并另调一个同志到轮船第三工会去当书记，以工会与船上工作的联系，但该项船只航行无期，到柳州的又被吕焕炎封去梧州，到现在仍发生不到好关系。有三个轮船，九月初开去柳州，到现在仍未回，……致上面计划，完全不能实现，在工会中的同志，尚能影响到一部分的工人与两个较坚决的执委，有相当的作用。因为在驱逐黄色领袖的斗争中，该同志的工作方式不能照特委的决定做去，色彩过浓，因此斗争虽然胜利，同时该同志亦受黄色工贼的……高压手段，用总工会的名义，将之调到舢板轮船联工会去（按职工会为上等船员）。原定计划虽不能实现，但已认识了一部分工人，接受我们的……

(乙) 汽车工作，现已有一支部，同志四人，内二人较能工作，且有省港工人五人。……的影响，过去着手于……的组织，然以时局的混乱，汽车多被军队封用。此项组织，又不适宜于工友的要求，以〔于〕是组织便无形停止。且汽车工人的失败情绪特别高，生活较高（每月七八十元工资），失业工人太多，稍一行动，即被资方撤退，所以总无心去发动斗争，只走入和平发展的路上。

(丙)?? 工人的工作，现在重新打入，于九月中认识了九个工人，至九月尾到十余人，发动了一个“发薪改广东毫”的斗争。得接近了八个，内有四五人比较坚决勇敢。至十月初斗争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已召集了一个……工人代表会，到十余人（是我们召集的），已开始于〔了〕罢工的准备。因为六个行委机关的被工贼与统治阶级的恐吓压迫，把斗争和缓下去。而代表会的形式，尚能保存为工厂委员会的形式，此为一月内新打入的路线。

(丁) 姑苏工人（即茶楼酒馆工会），现已新吸收了一个同志，尚不能有多大的作用，尤其不能发动斗争，与各方关系很薄。现拟从这一同志为入手于姑苏工作的创造。

(戊)? 务工人已有七个同志，多为……校校役尚未有工会之组织，现在开始帮助其成立□务工会。

(己) 农协支部（邕宁农协为公开合法机关）有同志四人，均为羌(?)同志，最近才发生关系，尚有多少作用，惟合法观念太深，市郊农运，令其恢复与组织，由该机关公开号召。

(庚) 劳工学校，为市政府所办的工人子弟学校，共八所，我们在校中共有党团同志五人，均充教员。为工作联系

起见，组织一党团。原拟从工人子弟入手，转变到工人中去，尤其是第三校，劳力工会的工人工作……

（辛）妇女支部，有同志六七人，内四人比较活动。因为劳苦妇女的工作无法入手，所以只得从事于上层妇女领袖倒台（？）而转变到下层□去。在九月底为工读学校工潮的发动，即趁此准备妇联会的恢复，以便与此学潮之联系。至十月二日，妇联会在我们领导之下而成立，开始于妇女的组织与工读女校斗争的领导，稍有眉目后，因政局之混乱无党领导，因恐慌而离开，同志亦不敢出去公开活动，事实上各机关已停止办公，妇联组织立随停顿。

（壬）……到现在乃只有六个同志，除两个比较活动外，其余均不能做工，且下层群众毫无。

（癸）“双十节”（指南宁）工作的任务，是利用“双十”的机会，来扩大党的宣传，利用此机会，以与群众（接近），以发展群众与党的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暴露中国国民党的罪恶与拥护苏联的宣传扩大，把死气沉沉的南宁工作，转到新的方向来。

3、“双十节”工作与秋收斗争工作的布置：

（一）“双十”与秋收斗争的工作，特委于九月二十日后，即开始布置。根据省委及中央的通告，决定了工作计划，指示各级党部（“双十”通告，秋收通告，“双十”宣传大纲，反军阀战争通告均附上），并派巡视员出发各县，布置这一工作，务使利用“双十”公开机会来做反帝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与拥护苏联的宣传，与党的政治主张的深入群众，使城市与乡村的秋收斗争联系起来，现尚未收到各县报告。

(二) “双十”工作的路线：“双十”工作与市郊秋收斗争及反军阀战争的联系。动员全体同志，深入群众中去活动，以政治的号召，调动群众去参加“双十”大会，转变他们的会场为我们的示威会，发动各市的斗争，调动群众到街上去。组织行动委员会（以党团特委、农协、支……等五人）。

(三) 关于“双十”工作的指挥。召集活动分子大会，及各支部会议，专讨论“双十”工作，调动全体同志到群众中去开始积极的宣传活动，尽可能的参加群众会，工作群众的各个宣传与市郊农村的飞行集会，出版“双十”刊物十期（自一日至十日）及“双十”宣传大纲、口号、标语、传单等分配各支部。特别注意于促成……工人的罢工，与轮船影响其他工人的“东毛〔毫〕”斗争。发动女工读校与……的斗争，调动他们到街上去，为“双十”示威的主力群众，使“双十”工作得到成绩。

(四) 关于“双十”工作前途的估量，在十月五日开第三次行委时的前途估量，“双十”的示威有转变会场空气的可能。估计到可调动三百工友，五百农民，二百学生，虽然因过去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太薄，但反动派所召集的“双十”庆祝大会，确实没有群众，但至少可以在几个斗争中去造成……工人的赤色的组织形式与□务工会的成立，妇联会的恢复。至六日下午以省农协机关的破坏（行委机关设在此），以上工作受到极大的打击。七日反革命的报纸登载，什么搜出重要文件二千多份，弄得市面风声鹤唳，大起恐慌，说CP于“双十”日作广州第二次的暴动。这种空气的提高，自然是反宣传的扩大，与我们宣传的不深入，从小的错误的

汇成，以至影响到全部的工作。

Ⅱ、党的组织概况：

1、南宁城市：

(一) 轮船支，有三个同志，有七个影响下的工人，二个接受我们主张的执委。

(二) 汽车支，有同志四人，五个省港工友，可接受我们的影响，但支部不甚起作用，不敢斗争，除担任一点交通外，只有和平的发展。

(三) ……支，有同志五人，支部亦不甚健全，过去训练完全没有，对个人信仰很深。

(四) 姑苏工人：同志一人，亦只能担任通信机关而已。

(五) 机关支：(县农协)同志四人。

(六) 其他：自由职业支同志三人；妇女支同志七人；CY特支同志三人；学生同志三人……工人代表会与妇联已经形成组织，而复停顿；杂务工会正开始于煽动其成立；市郊那马二区委不生不死，组织统计都未建立起来。

2、其他各地方的：

各地方的党有较健全的县委四个：贵、玉、北、东；较健全的县特支五：奉议、思林、向都、恩隆、贺〔恩〕阳；不健全的县份有二：同正、果德；正在恢复工作的县三：平南、桂平、陆川；正派人去开始工作的城市四：龙州、百□、武□、梧州；组织统计，现在开始于着手进行，此次尚无统计可以报告，大约全省的党员数量，为四百二十人，团员一百三十人；成份：工人百分之七，农民百分之二十五，

知识分子百分之二十七，妇女百分之二，没有赤色工会的组织。农会的局部组织，计二十一县，有组织的农民十七县，可以领导农民三十五万，经常可以指挥的武装有二千；妇女团体四，有群众六十人；学生会三，可以领导的学生有六百人；有少年先锋〈队〉与童子团的组织□十人。

以上的各地的组织，现在与特委的关系较好，能够有经常的关系与经常的指示，各地也能根据上级的指示或多或少的去执行。现正在向正确的路线转变。

3、各地组织的弱点：

（一）南宁工作的弱点，主要的是同志和群众的失败情绪与畏惧心理仍低落，不敢斗争，在斗争中经不起些小挫折，干部既少，工作经验亦太弱。

（二）玉林五属的党，充满着合法运动的右倾观念。同志非但不敢斗争，甚至斗争起来的时候，也领导群众到合法上去（如负责同志要群众去告状，替群众写状纸）。贵县的党不能采取公开的策略，只能秘密的和平发展，且不能自动积极的工作，依赖上级很深。

（三）右江各县的党，仍遗留着盲动主义残余的……现在积极的加以纠正。此后当与此极不正确的观念奋斗。

IV、宣传工作：

特委的宣传工作，仍不能建立起来，主要的原因是物质的困难，尤其是技术人才。如《双十日刊》，材料已经编就，而印不出来。二月来非但不能有计划的指导各地的宣传工作，连本身的工作，亦多成断续。《党的生动》与《广西农民》均出了二期，而无法继续；《双十日刊》编了四期而

只印了一期；《双十宣传大纲》与《告群众书》，发了数百份。《双十宣言》及宣传大纲等与传单标语，虽达到支部，但支部执行数量仍不多（《双十宣言》及宣传大纲等均附上），开了两次临时训练班，时间均有十余日。

V、南宁斗争：

特委自接到省委的指示及二次全省大会的决议，坚决的注意于群众斗争的发动，只有从斗争中才能扩大党的政治主张与发展组织。因此，对各地斗争的指导亦特别加紧。〈因对〉群众工作〈加紧〉的缘故，以致反动领袖、反对统治非常注意，积极的来镇压几个斗争，逮捕市郊的农民，卑劣的恐吓与严防“双十”布置。党受此打击，政治上已不能号召群众，同志的活动亦较困难。示威运动已无法举行，仍只有散发了几张传单与标语而已。几个斗争虽然和缓下去，但后来已经联系，（群众）斗争近日复有高涨之势。

VI、农协机关破坏的原因及经过：

省农协筹备处于八月初成立，虽然是机关运动的形式，但当时具有三十余县的无党群众的拥护，因此决定将其保存。现在仍有二十余县的农运人员发生经常关系，且内部组织很简单，不过用以为宣传输送机关，一面使其转变为有其群众的组织。南宁地方较小，行动困难，有的不得不借农协为谈话之用（以他是大半公开的），行委为要应付几个斗争，便于接头起见，即设于此。被破坏的原因，是《双十日刊》的印刷，每日拟出二千份，印了二次油印，技术不好，只得要农协同志到表有交易的印刷局去印。印了三期，即被

反动统治查觉，六号晚即派队围搜农协机关。事前已经风闻，将文件等已经移去，只被抄去埋在地下的各县农协的通讯录，其他完全没有损失。次日反动《民国日报》登载搜出重要文件二千余种。致一部分同志所主张（？）但事实上已多方设法，而办不到。……发之后的检查，农协负责同志亦有不少的错误，如不注意秘密技术，不执行特委对行动上的指示，文件亦不注意收藏，遇事过于慌张，尤其是不应该让机关使印刷工人知道。

……

秋收斗争的全省布置，已详前面，于此只说南宁的几个斗争：

（一）轮渡船工会驱逐黄色领袖的斗争：轮船工人早不满足于委派制度，各工友均不信仰工会，不肯缴月费，但黄色领袖更进一步的压迫工人，执委竟将工人自己选举出来的监委压迫出工会以外，致工人大起愤恨。我们即派同志去煽动。一面抓住被迫出外的监委李耀昌从中鼓动，当时工人非常冲动，即集中了八十余人，拥至工会，去质问，黄色工贼畏惧而逃，这一斗争表面已经得到胜利。特委原定计划必须从这一斗争打入工人中去，但同志不能抓住中坚分子，不能提出中心口号，因此工人退出工会，多数下船离开南宁，尚有不敢开的亦不能与之接近，只抓住了两个工人领袖外，完全不能形成组织，错过了一个机会。

（二）……工人的东毛〈毫〉斗争：南宁工人的要求东毛〈毫〉发薪，始自八月初旬（西毛〈毫〉一毛〈毫〉十三仙，东毛〈毫〉则十六仙）以总工会反动领袖之欺骗压迫，二月来除机器、理发二部工人得到外，其余仍是西毛〈毫〉

……工人之要求尤为迫切，有几个工人，已与该〔资〕方冲突，我们即派同志前去领导。至十月二日，此斗争已经起来，并已抓住中坚工友五人，指导其在各派中去联络，尤得工人的同情。于五日即召集各派代表会，到十余人，完全接受并要求我们的同志领导，一致决议先向资方提出条件，并作出罢工的准备。迨六日农协机关破坏（与中坚工人接头亦在此处），全部起恐慌，领导斗争的同志……不即与工人发生关系，致被资本家以从容的手段，联络统治阶级，以罢工为扰乱讨蒋的后方（俞、李已出兵讨蒋）的高帽，恐吓工人，此次斗争无形的被和缓下去，与此次斗争的……尚有关系的是市面谣言CP于“双十”暴动，且政局消息不好，商店于九日即停止营业，即不做门市生意，工人罢（？）亦不恐惧。现在与工人的关系，仍然保存。五日召集的代表会，亦决议要保存下去为工厂委员会的运用。且已在二次的鼓动赤色斗争。

轮船工人的反对开夜工，提出开夜工发双薪的口号……斗争时发生，特委决定于……斗争联系发动，务使于“双十”日前发动起来。工人斗争的情绪很高，斗争亦……但该项船只多为政府工〔公〕船，根本即与破产的反动政府冲突，以致统治阶级即出其高压手段，为难工人，稍有行动，派兵守船，……于六、七两日运兵赴桂平一带，该斗争亦即无形停止。

Ⅶ、特委准备移梧的经过：

特委自接到省委的指示并省代表某同志的意见，决定于大会后，特委稍移往梧州工作。于最短期间，建立起来。故

决定特委于九月三十日以前去梧，先派某同志于二十〈日〉以前去梧建立机关，及开始找线索。南宁成立一县委，特委负责南宁工作，于大会后即成立，开始工作，并指定某同志为特委特派员，留宁帮助工作，务使县委能健全于南宁城市及市郊工作，某同志帮助工作，须至南宁手续完全交给县委为止。县委于二十日成立，○同志亦于二十二日带银七十元及同职业的某同志去梧州。至十月初某同志（特委组织）出巡右江，○○二同志出巡东兰、玉林，“双十”工作与斗争的紧张，只得改变到“双十”工作结束后特委移梧。迄到十月八日反动统治的混乱，右江工作又成为重要，特再派某同志前去布置，特委本身只○○二同志负责（○同志只能打理一点技术工作），至去梧问题，实难决定。现在特委拟暂不去梧，调○○两同志返邕，以便常委集中，……县委某同志留调别处工作。已经将其取消县委书记，○○同志，因南宁不能立足，已调去梧州，换○○返邕，○同志（县委职工）调特委组织干事兼职工，……

Ⅷ、特委本身的弱点：

1、特委自经改组后，虽较前特委增加了三、四个人，以常委之不能集中，且实际上亦不健全。△同志对组织工作的（经验）缺乏；△同志亦负不了宣传工作，以致组宣二部工作始终建立不起来。秘书处亦甚薄弱，……工作完全到△一人身上，自然弄得顾此失彼。

2、物色技术工作人，现仍找不到一个。……致紧要文件无法付印，每件均延至很久，始勉强印出，对下级指导大受影响。

3、当地干部在业的很少，因此与社会关系很疏。

4、宣传工作不能建立起来，每次计划，均为物质限制。尤其是技术工作方面。

5、组织工作，亦不能独立起来。组织技术调查统计，不能实现决定的计划。

6、干部份子太少，尤其是南宁职工同志，有几个职工同志色彩太浓，因政治的关系，不能立足，为保存干部，只好调到别处工作。

Ⅷ、经济：

上略：……特委经费虽力图自给，但工作正在开始，于恢复范围已经扩大，尚未有基础；故无法做到完全自给，只有立图检〔俭〕省。

广西的交通不便，尽人皆知，船车等费，贵得不近人情，南宁至贵县来回一次，费二十元。因此，特委经济多的是巡视费，每月出巡一次，须一百三十元，如无此款，巡视即行停止。此外，交通、宣传……请批准。

X、今后工作计划：

特委对今后工作计划，决定了十、十一、十二三个月工作计划。努力于其计划之实现外，特别注意下面几件工作，为目前最迫切的工作。

1、开办训练班，于最短期间训练出二十个干部人材（分为二期），分发到各县工作，以便地方党部之建立。

2、继续党内训练刊物与出版小报（三日刊）。

3、组织部工作的建立，尤其注意于调查统计。

4、创造新的基础，实行将现在知识分子的基础，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去。

5、创造几个赤色工会，只要做到革命工人形成组织。

6、将二月来的半公开活动转变到地下去，注意于干部份子之调动。

Ⅺ、对省委的总要求：

略。

特委

1929年10月20日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11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中共广东省委通知

(1929年10月30日)

广西特委：

省委决定建立广西前委，邓斌^①为书记。前委管左右江，特委负责向前委提供情况，交通到龙州。特委如受破坏，可到前委分配工作。

省 委

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日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11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①邓斌即邓小平。

中共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委的信

(1929年11月19日)

广西特委：

报告及文件均收到。关于两广军阀战争的形势，与广西党的工作任务，省委在前次指示信中（△△同志带来的）已详细说及。现在战争的形势更紧迫，张发奎与新旧桂系联合，南方的倒蒋混乱，即在小北江及西江开始厮杀了。

现在的广西恢复到第一次两广战争之前的形势，又成为李、黄的统治，军阀战争给与（予）广大群众的痛苦，是连绵不已的增加。在目前的形势之下，确实有利于群众斗争的向前发展，广西党要坚决的抓住这一机会，发动广大群众的反军阀战争之斗争，是目前的核心任务。

几月来广西群众的自发斗争，确实有相当的增加；尤其是南宁一部分工人群众的反黄色领袖运动，更有特殊的意义。虽然群众在斗争中仍表现出许多弱点（如对俞、李政府的幻想，和平请愿等），但这一斗争的内容确实是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要求。这一点你们要深切的注意。

广西党的目前工作，应以发动秋收斗争的抗租抗债运动，为农村斗争的主要任务，并应提出部分的反对军阀战争的口号，发动群众的直接斗争，对于各地自发的反对苛捐杂税的运动，要利用各种关系，打入进去活动，坚决的反对同

志不注意小斗争的错误观念。

过去玉林、北流等地的群众，都经过相当的斗争，你们应从群众的日常斗争中，打破群众的退缩畏惧心里（理），与一切和平合法的观念，逐渐引导他们走上直接斗争的道路。目前在广西对于群众自发的减租运动，亦应予以领导。

东兰各县的群众斗争，已走上剧烈的武装冲突，党要更加紧的推进这些斗争，成为游击战争。你们对东兰的指导信，省委大体认为正确，但在指导信（中）关于“造成乡村割据的前途”之指示，极不妥当，因为乡村割据，很容易成为保守的状态，过去各地的失败，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东兰群众的斗争前途，应当是成立苏维埃区域。现时在斗争中，即应加紧苏维埃的宣传，逐渐转变农会为苏维埃，苏维埃区域必须继续的向外扩大，以打破过去乡村的割据保守观念。

省委已命令在右江的第四、五（警备大队）及教导队立即转变旗帜，实行游击战争，并以组织前委指导该地的一切工作。前委直接由省委指挥，但你们亦应经常的与他们发生关系，并设法建立交通。

对于轮船及汽车工人中的工作，你们应抓住现有的工作与关系，加紧在他们中间的活动，巩固轮船及汽车的支部组织，推动支部向着群众工作，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

目前改西毫为东毫的斗争，更成为广西工人群众最近迫切的普遍要求，党要运用过去斗争的经验，发动这一斗争，在斗争中要注意组织工厂委员会为斗争的指挥机关。

关于发动工人斗争的一切问题，必须开群众会议或代表会议的方式解决，只有发动广大群众起来，热烈的参加斗

争，才能有长时期的坚持，并防止领袖的动摇、反动，而出卖群众。

你们在△△工人“发薪改为东毫”的斗争中，能召集群众的代表会议，这是非常之正确的路线。只有坚决的执行这种群众工作的方式，才能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斗争。同时你们要注意在斗争中力争公开活动的自由，以冲破统治阶级的白色恐怖。

党在南宁城市中既已找到许多工人群众的线索，你们必须一点都不要放松，努力的加紧工作。更要扩大现有的工作范围，进行赤色工会的组织工作。

特委三月的工作计划，省委觉得太空洞太原则了。你们应根据目前的形势，针对着工作的缺点，定一更具体实际的工作计划，交来省委审查。特委必须纠正过去散漫无计划的应付工作状态，要更有计划的艰苦的推动全省工作。

广暴纪念的二周年快要到了，你们要根据中央通告，立即开始反军阀战争运动周的工作，布置（运）动周的工作路线。特委要特别注意发动广大的群众，检查我们的力量，在工作上要运用公开工作与公开号召的路线，并发动群众的斗争，一直到飞行集会、示威、游行……

省 委

1929年11月19日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11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中共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委的信

(1929年10月30日)

广西特委：

自广西政变后，未接到你们的一封报告，○○同志近由龙州来此，附带报告特委工作近况。省委对于你们的工作，有下列的指示：

I、两广战争，并不因俞作柏、李明瑞的倒台而中止。第三次两广战争的灾祸，必不可免的快要到来，因张发奎的进兵两广，形成新旧桂系与张发奎的联盟，两广战争，一触即发。广西目前仍然是一极混乱的局面，而且新旧桂系之矛盾，你然存在。客观上确实与我们以发动群众工作的机会。我们对于这样反革命的战争，毫无疑义的是要采取失败主义的路线，就是要使战争的双方，统统失败，革命的势力，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是我们在军阀战争中宣传的中心口号。应使这一口号，能深入广大群众中去，向着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的目标前进。

II、广西党的基础异常薄弱，群众的组织，除右江尚有少许外，其他各地则寥寥无几，另一方面，一部分同志，或多或少的对俞李存有幻想，因此或因俞、李的失败，更增加了党内失败的情绪。以为现在一切工作在旧桂系的统治之

下，均无办法了，其实俞、李与旧桂系，根本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俞、李的一切设施，最多亦只是口头上的改良主义者，并没有能比较旧桂系多给民众一些实际的利益。因此不管广西是落在旧桂系或俞、李军阀手里，我们的工作，仍然是应当一样的进行。丝毫不应当因俞、李的失败，而失望悲观，这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特委必须坚决的与这种机会主义的观念斗争，从艰难困苦中，一点一滴的来创造广西的工作。

Ⅲ、现在军阀战争快要开火了，工作的形势已经开展在我们面前，现在最危险的是党内同志的失败情绪与怕动主义。特委应继续加紧梧州、南宁一带交通线的轮渡工人运动及汽车工人中的工作，这是广西的第一个重要的工作。目前工作主要的路线，应当抓住群众目前最迫切的最实际的要求，发动并领导这一些日常的斗争，以提高群众的勇气，从斗争中注意扩大组织的力量，轮渡及汽车工人，还是在广东机器总工会的玩弄底下，我们必须在这一部分工人中，进行黄色工会下的革命工人组织，从斗争中揭穿黄色领袖的黑幕，和他们勾结军阀，帮助军阀战争来出卖工人的一切罪恶，一直发展成为推翻黄色领袖的斗争。省委的意见，可派〇〇同志专门负汽车及轮渡工运的责任。

Ⅳ、退往左右江的第四、五大队及教导队，省委已命令他们立即开始在左右江实行游击战争，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深入土地革命运动，并决定组织前委，统一党和军事的指挥。前委直接属于省委指挥，特委应与前委建立经常的交通关系（交通经费可由前委担负），供给他们以广西政治军事及群众斗争的材料。如龙州交通断绝时，省委的一切文件，

都须要由你们转送。不能在各地立足的同志，你们可送往前委去分配工作。

V、现在在军阀混战加紧准备的时候，吕焕炎又大招新兵，你们应命令各地选派大批同志与农会会员去当兵，开始建立我们在吕、杨、黄各部队中的兵士工作。其他各地调动同志，或比较困难，但特委应指定贵县、玉林、北流党部，必须选派同志去。

VI、在军阀混战中，特委必须命令各地党部加紧在城市和农村中发动反军阀战争的一切日常斗争，在农村中须与秋收斗争联系起来，特委必须有计划的布置这一工作。目前广西工作的唯一出路，必须从领导群众的部分的日常的斗争开始，而且要有艰苦工作的精神，才能创立起广西群众工作的基础。在广西人财两难的条件之下，更须集中力量于梧、宁交通线各县的工作。

省 委

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日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11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在反对军阀战争斗争中 而形成广西红军^①

(1929年11月25日)

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广西最近已开始形成红军的组织，广西红军的干部一面是反对参加军阀战争的革命兵士（前俞作柏警备第四大队及第五大队与教导队之一部），一面是韦拔群领导下的农军，合起来有六七千多的武装，现在他们已开始游击的战斗于左右江一带。据报载，十一月十七日他们已攻陷思林县实行土地革命，这红军实际上是群众反对战争，反抗豪绅军阀压迫而谋自卫的必然产物。这事实证明国民党军队之日趋于瓦解涣散，证明共产党的政治口号得到普遍群众的同情。而且证明革命势力的发展是愈加普遍，国民党军阀虽在拼命于两广军阀混乱的厮杀，仍然毫不放松的要以大规模的白色恐怖手段来扑灭这新兴的红军。广西的工农群众必当更密切的与广西红军联合起来，相依为命的反抗国民党的屠杀。广东的工农群众也要尽至大之努力为拥护广西红军的斗争，打破一切进攻广西红军的阴谋！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11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版）

^①该文刊登在《半周宣传大纲》第八期，1929年11月25日。

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

(1929年12月)

- 1、扩大反帝运动用民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
- 2、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 3、推翻乡村豪绅地主的统治，乡村政权交乡村苏维埃！
- 4、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汇合，实现割据两广！
- 5、实行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并制定劳动保护法！
- 6、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乡苏维埃，分给农民，凡没收之土地不准买卖！
- 7、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免之自由！
- 8、男女平均！
- 9、改良士兵生活，官兵待遇平等！
- 10、取消一切政府军阀的捐税！
- 11、实行累进税，并由苏维埃政府制定标准！
- 12、没收反革命的财产，交苏维埃政府处理！
- 13、保护交通和商人营业！

14、取消一切债务！

15、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

16、准备武装保护苏联，反抗帝国主义及军阀国民党政府进攻苏联！

中国红军第七军政治部印

（据广西博物馆所存原件）

打倒国民党（节录）

（1929年12月16日）

中国红军第七军政治部

国民党统治下没有中国的独立

往日的国民党是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新工具。对美国则出卖航空、财政，对日本则出卖济案、满州，对英国则出卖海军、西藏。现在的南京政府实际是帝国主义的代理机关，它代理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劳苦群众。不久以前更为扑灭中国劳苦群众的革命运动，在帝国主义命令之下，无理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强硬夺取中东路，代替帝国主义去进攻苏联，以便帝国主义进兵中国，实行武装瓜分。这样的投降帝国主义，做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民党政府，只有日益增加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统治的隶属性，只有日益沦落中国于殖民地的地位。国民党所提出的条约运动，请求撤废治外法权，就是要替帝国主义永久维持不平等条约，永久断送中国司法的独立。国民党对于工农革命运动的摧残对于中国革命的援助者之苏联的积极进攻，就是要替帝国主义压灭中国革命的动力，排除中国革命的同盟。劳苦群众绝对不要梦想帝国主义

走狗的国民政府能够废除不平等条约，撤废治外法权，只有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才能真正废除不平等条约，撤废治外法权，收回租界，赶走外国海陆军，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在国民党统治下，绝对没有中国的独立，只有在工农民主独裁制之下，才能达到中国的民族独立与解放！

国民党统治下没有中国的统一

国民党现在是一切封建残余的军阀、官僚、豪绅、地主、买办，以及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他的内部的权利地盘的冲突，是无法可以调和。无论封建残余势力的地主阶级也好，无论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好，（他们）都要凭依军阀做他统治的台柱，所以军阀割据之局，是成为国民党统治惟一的形式。而且我们还要特别注意的，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实际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国民党不过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走狗，帝国主义为要瓜分中国的市场与势力圈，也各自要找中国一派军阀做他的忠实工具，因此国民党的各派军阀更是无法统一，有（不）可能成为一个比较集权的中央政府，所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在中国存在一天，中国便一天也不能统一。各帝国主义各自在中国争夺市场，争夺势力范围，国民党各派军阀各自勾结——帝国主义，这便是说明如何在国民党统治上没有统一中国的可能。所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才是中国统一的前提！

国民党统治下绝对不能避免军阀战争

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他们相互之间，对于共同反对革命，扑灭革命，虽是一致，但决不能消灭他们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反而只有因为他们相互间的利益冲突不断的爆发武装战争。国民党的各派军阀，完全与北洋军阀没有两样，而且比北洋军阀的统治，还要不统一，他们都各自勾结一个帝国主义，各图在伸张其爪牙与势力。当去年国民党打到北京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是大吹大擂宣传国民党已经统一中国吗？国民党已经取得中国的和平吗？但是过了不久国民党的统一和平的假面具，便由他们自己打得粉碎，蒋桂军阀的大战，便在武汉两广爆发了。蒋桂战争方了，蒋冯又实行伙（火）并，及后不久粤桂战争又爆发。粤桂战争刚告一段落，目前蒋冯战争，粤桂战争又继之而来。现在军阀混战已在全国范围内爆发，这一军阀混战的结果如果劳苦群众不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军阀割据之局，必定依然存在，一次一次的军阀混战还是要来。所以代理帝国主义统治的国民党存在，便必然的要继续并扩大混战状况，这已成为不用解说的真理，只有劳苦群众自己起来，以群众直接行动的力量，由反对派捐、派饷、派债、拉夫，扰乱后方，破坏军事交通，袭击军队，夺取枪械，鼓动劝诱兵士掉转枪头打军官，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各派军阀，才能根本消灭军阀战争，才能获得统一与和平。在国民党统治下，绝对不要幻想国内和平国家统一。我们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国民党各派军阀利用统一反封建反军阀的名义来掩盖军阀

战争。

国民党统治下绝对没有自由

反革命的国民党，现在成为反民权主义，反政治自由的恶魔。表面用所谓三民主义来掩盖其阶级性，实际完全暴露其豪绅资产阶级专政的丑态——即国民党所谓训政时期。……现反革命的南京政府，正是厉行这种反民权主义反政治自由的白色恐怖政治和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就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专制，与真正民权主义和政治自由不能两立。现在的革命，是推翻国民党的专制。打倒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专制政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才能得真正自由。

国民党统治下苛捐杂税只有增加

国民党代表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自然非牺牲小商人农民的利益不可，农民小商人只要计算国民党统治以来，切身所受到的苛捐杂税之种类与项数，便可证明国民党统治不但与任何军阀时代没有区别，而且是比任何军阀时代还要厉害，什么铺底捐、对俄义捐、警察捐、天秤捐、土地捐、营业捐、人头捐、钱粮附加捐、公债……等等不知多少。所以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苛捐、杂税、公债，只有天天增加。农民小商人只要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兵贫民苏维埃政府，铲除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所得税！

国民党任何一派的改良宣传统（统）是欺骗工农贫□。

国民党出卖工农革命

国民党的背叛革命，出卖工农利益，结果引起劳苦群众不能忍受的反抗。广州暴动是革命对反革命的一个回答，同时也是革命深入到苏维埃的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革命深入之前发抖，同时使他觉得单是白色恐怖不能消灭革命，于是企图采取民族改良主义来暂时和缓群众的革命化。尤其是济众（案）后，这一企图更表现得明显，如南京政府之要求段祺瑞时代所谈判过的关税自主，要求修约，在野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如汪精卫陈公博派以及第三党则号召改组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注重工农利益，阶级合作以及所谓民生主义革命等等。虽然国民党各派的欺骗改良宣传，到现在都由他们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统统是欺骗工农，如南京政府之无耻的投降整个帝国主义，作帝国主义的忠顺走狗，改组派第三党之抛弃过去一切的改良宣传，勾结帝国主义，勾结军阀，专门进行倒蒋的军事运动。然而我们劳苦群众还要深切明了国民党各派的改良宣传无非是资产阶级甚至豪绅地主企图消灭革命的另一方法，并且是帮助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工具，因为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也需要在此掩盖之下来加强其对中国的统治，虽然他们主观上是非常不愿意的。所以在最近的倒蒋运动的旗帜之下，我们要特别注意改组派的欺骗宣传，就使改组派的改良宣传已非积极，我们也要积极揭破起改良宣传的反革命假面具。

国民党是反土地革命的刽子手

国民党的叛逆是正当中国革命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是正当中国革命的基本群众农民为夺取地主阶级土地而热烈参加革命的当头。所以革命发展到这一阶段，国民党就根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反革命党。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实质就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与要求消灭封建残余的地主阶级，及驱逐帝国主义，只有土地革命彻底深入和扩大，彻底的革命才能达到。国民党就在这一革命深入的开始背叛了革命，出卖革命于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所以国民党是农民的死敌，虽然国民党也宣传什么二五减租以欺骗农民，但是现在连二五减租也索性取消。农民起来做土地革命的斗争，国民党就大加屠杀，所以国民党是（反）土地革命的刽子手。

国民党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猎犬

国民党虽然出卖革命于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但中国的劳苦群众革命的要求还是没有减低，中国革命还是在大火山上面，同时中国革命的好朋友，还是在不断的援助中国革命，援助中国劳苦群众，使中国劳苦群众从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统治下解放出来，中国民族建立独立自由平等的国家，因为这样，所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要扑灭中国革命，以维持他们的统治，除以极残酷的白色恐怖，残杀中国革命群众以外，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自然非进攻中

国革命的劳苦群众的朋友及援助者的苏联不可。最近帝国主义果然命令国民党军阀无理夺回中俄共管的中东路，为进攻苏联大战的导火线，国民党还要无耻的假借民族利益的名义，鼓吹对苏联用兵。其实，事实是很明显的，国民党早已出卖“民族利益”给帝国主义者了，夺取中东路以发动进攻苏联大战，国民党不过是做了帝国主义的猎犬。国民党夺取中东路不久，日本便想独占，大队出兵满州，美法便要共管，英国是老实不客气的进兵西藏，夺取川边特别区，国民党的民族利益又在那里？倒是实际上促成帝国主义武装瓜分之更进一步。中国劳苦群众要保护中国革命，避免武装瓜分的惨祸。只有拥护苏联，打倒帝国主义的猎犬国民党！

（略）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11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前委通告（第二号）

——关于党的组织工作

（1929年12月20日）

目前红军所到区域，革命空气的紧张，群众工作的开展，已成为毫无疑义的事实。在这样客观环境之中，党能否加强对于红军之领导，并在工农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则与红军的前途及右江各县群众工作均有莫大的关系。因此，怎样使红军中及地方党部的组织工作能健全起来，实为目前严重的问题。

在最近客观形势的发展，党的组织工作，将有相当进步。如发展党的组织，数量上的增长，干部同志对党的策略上讨论相当的发展，党开始在工人群众之中树立基础，党的组织系统的整顿等等，各方面都表现进步之现象。但是这些进步均甚微弱，照目前党的组织工作之一般薄弱及组织工作上许多的缺点，仍然是党部继续发展与巩固之一个非常大的阻碍。

兹确定目前组织工作大纲如下，各级党部以最大的努力来执行，以最大力量来注意党的组织问题：

（一）确定党组织系统：

1、前委之下，各纵队设队委。

2、纵队委之下，各营设营委。

3、每连队设一支部，军官与士兵同志混合组织。

4、各营委及各支部由各直属队委指挥。教导队支部、训练所支部、政治部支部、军部支部及特务营营委直属前委指挥。

5、地方党部与所在地军队中最高党部发生平行关系，但受前委之指挥。

（二）注意中心工作：

地方党部（特别是百色、平马、那坡）须加紧注意工人中党的组织工作。农村中须注意政治、经济中心之市镇圩场及交通要道的乡村中党的中心工作。而且要特别注意贫农及农村无产阶级。又在军队中须特别注意教导队、训练所及老兵队伍中组织之工作。

（三）创造干部分子：

1、平马、百色、东兰即开办中坚同志训练班，在短期内施以基本理论之训练。

2、指导机关须经常与中坚同志谈话，分配以工作，特别注意检查之。

3、多提拔中坚同志入各种公开团体中，如苏维埃、工会、农会、兵委会……工作，并告以工作方法，在工作中训练之。

4、多召集活动分子会，报告各种重要问题。

5、每礼拜召集常委、支部书记、干事联席会议。

(四) 健全支部生活：

1、支部会议应多讨论本支部的实际问题，决议之后，即须分配工作，使每一个同志均担任一种工作（发行、交通、侦探，加入群众指导机关组织工会，组织农会，收党费、抄写……）

2、支部人数多时分小组，小组会议多讨论党的基本理论问题。

3、按月交党费东毫一毫。

4、每二天同志向支部书记或组干作口头报告工作至少一次，各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作书面报告至少每周一次。

5、支部会议应经常有批评一项，每次开会由主席指定二三人作为批评之对象。

(五) 注意集体指导：

1、党内一切重要问题均应召集各级委员会讨论决定。

2、临时问题及日常细小问题可由书记解决，但解决后应向各委员（或干事）报告。

3、在指导机关中同志（如前委委员或队委、营委委员、支部干事）应经常的注意党的工作问题，不可一切问题推在书记身上。

(六) 实行民主化：

1、党内一切问题如无极端秘密性者，均交各级指导机关及各支部讨论。

2、指导机关争执之问题可请上级决定，但尽可能召集

党员大会解决。

3、实行民主化时仍须保持民主集权制之确立，须防止极端民主化现象。

(七) 严格执行纪律：

1、下级机关须服从上级机关的命令。

2、党的一切决定任何同志均须遵从，不能随便以个人意见而更动之。

3、同志怠工或表现不好，经警告后仍不改，着即驱逐出党，有贪污、破坏党在群众中义信者，毫无疑问的开除出去，必要时可向群众宣布。

(八) 注意秘密工作：

1、未经党允许之同志绝对不准自动公开出来。

2、党的一切内部文件、名单仍须绝对守秘密。

3、地方党部须要即刻建立合于斗争的秘密机关。

4、地方党部各级指导机关应有候补组织。

(九) 发展组织：

1、最大限度的发展同志，特别注意在工人中发展。

2、发展新同志须行入党仪式，给以党的深刻影响。

3、注意在白色区域内发展党的组织。

(十) 党与群众应有正确关系：

1、党绝不能命令群众或群众团体，如苏维埃、工会等。

2、党在群众指导机关中，如有三个同志，即须组织党团，暗中起领导作用。

（十一）健全地方党部：

- 1、指定一部分同志专负地方党部工作。
- 2、军队中党部应给地方党部以各种帮助。
- 3、引进积极的农民分子参加地方党部指导机关。

（十二）发展共产青年团：

- 1、军部中不必另有团的组织。
- 2、地方党部应分一部分人力来建立团的工作。
- 3、党应加紧对于团的指导。

前 委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据广西右江革命文物馆所存原件复印件）

土地革命

(1929年12月21日)

中国红军第七军政治部

一、中国农民的痛苦

(1) 政治的：

(一) 军阀的残害 军阀割据地盘，在他势力所及的地方，都是军阀的私产，征收捐税的关卡，每个农村都有，一切日用的东西，都要收重税，结果是使农民要买的东西价钱贵了，农民卖东西不能赚钱，军阀们天天打来打去，每个农村都成了战场，筹饷，拉夫，强迫当兵，没收粮食，奸淫抢掠，杀人放火，把农村弄成饥荒死亡悲惨的世界！

(二) 豪绅的压迫 豪绅是军阀地主用以压迫农民的走狗，他包办一切钱粮捐税从中剥削，占住反动政治机关（县公署，团务局，财政局等），搜括农民的金钱，利用反动的武装——民团，警察，保安队——抢劫农村，拘捕农民，他们随时都可以陷害农民，没收农民的财产，奸淫农民的妻子。

(2) 经济的：

(一) 帝国主义的侵略 外国资本家的火车轮船到了中

国的腹地；洋货跟着到农村，农民的手艺不能做了！（如纺线和榨油的减少）外国资本家的银行，设满各大都市，军阀，官僚，地主，买办们的金钱有保管的地方，他们就加紧剥削农民！外国资本家又放债到农村，和收买土地收买平易的货物，他——帝国主义又同军阀官僚勾结借钱，卖枪给他们打仗，争官，把一切矿产租税当给洋大人，我们农民要赔大批的冤枉债！

（二）地主无情的剥削 地主倚赖他的土地，用“收租”的方法剥削农民，通常租额是十分之五，或十分之六，就是天灾水患……的荒年，也不能丝毫短少！租缴不足就算做欠债，利上加利的剥削！租田要写租约，以财产作担保，农民无力还租债，地主便没收其财产，——有时还要加上老婆儿女！农民把田种肥了，地主就要加租，否则不准种田，农民还要时时送礼物给地主，为地主做劳役，农民是地主的奴隶。

（三）高利贷 农民要应付饥寒疾病的祸患缴租纳粮的困难，就要向乡村资本家（买办和富农等）借钱。借钱要立借约，出抵押，利息起码是三分，有些是五分，甚至十分！并且是利上加利的计算，农民的房屋财产老婆儿女每每要做还债的东西！借钱每每是谷价昂贵的时候，还债又是物价平易时，再加上高额的利息，在三五月后借一要还三了！

（四）苛捐杂税 在豪绅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军阀的“三民主义的世界”里苛捐杂税的剥削可以致农民的致命！什么护党捐，受国捐，北伐捐，西征捐，什么附加捐，印花税，百货税，营业税，房屋税，甚至有猪仔买卖捐，蔗条人口捐，摊位摆卖捐，走路捐，过路捐……无微不至，无奇不

有，农民挨住冷饿，也要缴纳苛捐杂税，给国民党契弟们享福！

（五）中间人的剥削 中国有包佃制，地主不直接租田给农民，要由中间人来转租，地主与中间人互相利用。农民非负担中间人的剥削不可（地租特别加多）。

（3）雇农贫农特别痛苦 雇家卖他的劳动力给富农得的酬报分〔非〕常之少！他们要在饥寒交迫的苦况之下，替富农做奴隶——做洗烟具，提便壶等卑下的工作！贫农时时要向富农借贷，替富农做短工，受富农的剥削，他们不但生活痛苦而且有失业的危险！

二、广大的农民群众都迫切的须要土地革命

（1）农民革命普遍全国 农民受了破产与贫困和被残杀的痛苦，逼得他们起来干革命了！现在全中国无论那省那县那个农村都有农民革命的运动，——尤其是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四川，河南等省，特别的高涨，在这几省的农民，已大都分做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掌握政权”了！各地农民在反豪绅地主减租等的口号之下，都成千成万的发动起来，右江在两月内组织了二十几万农民，斗争的阶段已到了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红军有了七军！游击队有几百队！各地的农民斗争，都由抗租抗税进到武装冲突，游击战争，苏维埃区域的割据了！

（2）农民斗争的主要要求

（一）土地 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农民没有土

地，或是土地不足，——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农民斗争的第一个主要要求是要得土地——耕者有其田，这个要求在下层农民——雇农贫农尤为迫切。

（二）肃清封建势力 豪绅地主，买办和他们的代表军阀是依赖剥削农民为生存的，这些东西不消灭，农民不能解放，农业不能改善，农民斗争的第二个主要要求，是推倒豪绅地主阶级的权力——肃清封建势力。

三、土地革命的意义

（1）解放农民 推翻地主豪绅的封建统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可以免除地租，苛捐杂税，高利贷的剥削和一切封建的压迫，可以有能力改良耕种方法，发展农业，得到自由快活的生活！

（2）打倒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是封建势力；剥削的对象，是广大的农〔民〕群众。打倒封建势力（消灭军阀买办）与解放农民，可给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3）土地革命是目前革命的主要内容 现在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与肃清封建势力，土地革命可以肃清封建势力和打倒帝国主义。

四、土地革命的力量

（1）农民成分的分析 农民不是整个的阶级，就经济的贫苦来分：有富农（除自己消费外，还有剩余资本剥削人

的)、中农(自给自足的)、贫农(不能自给的),就耕作形式来分:有自耕农(耕自己的田)、佃家(租田种的)、雇农(农业工人)。

(2) 贫农雇农和中农 贫农雇农是乡村无产阶级,他们对革命的需要非常迫切,在革命的〔斗争〕中是坚决而彻底的,他们是土地革命的主力。中农(多半是自耕农)常有降落为贫农雇农的危险,他有保持土地和废除捐税的要求,他是可靠的土地革命的同盟者。

(3) 富农 富农的利益,在农民与地主之间。富农虽然受豪绅的压迫,但有些是兼豪绅和半地主的,他有造成地主的希望,所以他对于革命的态度是动摇的,革命深入一层,他必定的要反革命。

(4) 工人与土地革命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在资本家与地主分划不清,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统治工农的中国,推翻封建统治是工农一致的需要,土地革命成功,工人阶级可以增加工资,减少时间,改良待遇,政治自由,工人阶级一定以全力帮助土地革命的。

(5) 士兵与土地革命 士兵是工农的化身,他为了破产失业而来当兵,老弱退伍仍要回到田间或工场,但地主资本家不打倒,士兵回家不能生活,必要土地革命成功,保障退伍士兵的生活——有田耕,有工做,有衣食——士兵才有出路,现在士兵受尽了军阀的压迫和欺骗,已觉悟起来与工农联合了,士兵也是土地革命中的主要势力。

五、土地革命的策略

(1) 对富农的策略

(一) 富农有地主的前途，在土地革命中，他是动摇不定的。在革命初期——反豪绅反苛捐杂税的时候，他是参加革命的；到革命深入——抗租抗债没收地主的时候他便反革命了。所以对富农的策略是：

(二) 在斗争初期，要富农参加革命，但要和他争革命的领导权。

(三) 到革命深入，富农反革命的时候，便以对地主的策略对待他。

(2) 日常斗争

(一) 在豪绅地主统治下的地方。要加紧日常的斗争——反豪绅减租抗税的斗争，发动广大的群众起来，由小的斗争转变到大的斗争——这是主要的策略。

(二) 在苏维埃区域内也要作日常斗争——贫农雇农对富农要求增薪减时改良待遇的斗争。

(3) 组织苏维埃政府

(一) 推翻豪绅地主的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引导农民群众参加政权，打倒豪绅地主，镇压一切反动派，处理土地分配土地等问题，保障农民的胜利。

(二) 内地各县苏维埃要以雇农贫农为中心，组织的成分要以雇农贫农占多数，还要吸收手工业工人和士兵参加巩固雇农贫农的领导权。在工人较多的区应以工人为中心。

(4) 创造红军和农民的武装训练

(一) 土地革命斗争的区域，要尽量的成立游击队和红军，以斗争中勇敢的农民充当红军，改变红军的质量，扩大红军的组织。

(二) 同时要实行农民群众武装的训练，土枪刀叉等都是农民的武器，农民都要武装起来，尽量设法受军事训练。

(5) 斗争的深入与扩大同时并进

(一) 斗争一定要深入，坚决的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彻底扫除乡村封建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

(二) 同时要努力向外发展，扩大斗争的区域。

(6) 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

(一) 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公有，分给农民耕种，不准买卖。

(二) 凡要耕田的人，要向苏维埃领取使用证。

(三) 年满十六岁能自力耕种的分给一份，每份若干亩，由各地斟酌情形规定，以土地的肥瘠，人口的多少为标准。其余的土地按照四岁以上的人口分配之。

(四) 红军现役军官有家属者，他本身也可得一份，分得的土地，得雇人耕种。

(五) 雇农愿意自己耕种的，要分给土地。

(六) 增加雇农工钱，减少工作时间，并改良待遇。

(七) 增加手工业工人的工钱，并改良待遇。

(八) 分配土地由乡苏维埃执行，县苏维埃指导之。

(九) 老弱残废孤寡无依靠的，得由乡苏维埃维持其生活。

(十) 土地使用人须向苏维埃缴纳一成至二成为行政之用。

（7）乡村的组织问题

（一）农会是群众的组织，苏维埃是政权的组织，苏维埃一成立，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农会即取消。

（二）农会和苏维埃的成分，都要以雇农贫农为中心，绝对禁止豪绅参加，富农绝对不与他居领导地位，农妇可加入农会。

（三）雇农有特殊的要求（加薪减时改良待遇等）可于农会之下组织雇农部。

（四）手工业工人要加入农会，同时要注意手工业工人的特殊要求。

（五）青年农民是革命的先锋，要组织少年先锋队归苏维埃或农会指挥。

（据广西博物馆所存原件）

我 们 的 主 张

(1929年12月)

增加工人工资
减少工作时间
没收地主土地
分给贫苦农民
红军月饷廿元
官兵待遇平等
优待无辜俘虏
欢迎士兵弟兄
取消许多捐税
人民负担减轻
保护商业交通
红军纪律严明

中国红军第七军政治部印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据广西博物馆所存石印传单)

粤省对七军前委的指导信

(1929年12月25日)

平礼兄转前委：

若臣^①同志于十二月十四日到港，报告桂军委工作经过，以及成立前委，转变军队为红军情形，和今后的工作布置，省委对于右江情形，已大体明瞭，同时，毅于〔宇〕同志刚从中央归来，对前委工作亦有所指示，若臣同志现已赴中央报告。先将中央及省委的指示通知你们：

前委在若臣同志去后，更能坚决实行转变，发动游击战争，加紧群众工作，特别是在观念上能打破过去的错误，坚决的执行中央及省委的正确策略，认为非常满意。

现在全国混战，继续向前扩大，蒋冯战争将告一段落，而蒋唐战争又起，目前河南尚在混战状态中，最近阎张（学良）及中小军阀（如刘镇华、陈调元、王金钰、刘春荣、魏益三、马鸿逵、蒋选才、王钧、刘茂恩……）之“和平”通电更加表现出军阀割据〔据〕局面之加深与互相争夺，南京反革命政权的矛盾之剧烈。

第三次两广军阀混战，暂时算告一段落，张桂军现尚占据广西，仅梧州一地为粤军占领，但随之而起的又有两陈争夺广西地盘的冲突（陈济棠保举香翰屏为桂主席陈铭区

^①若臣即龚饮冰

〔枢〕委蔡廷楷〔锺〕为苍梧司令）与蒋方勾结新桂系（俞作柏、李明瑞）对抗旧桂系和张军之矛盾。在广东蒋系军队之第三师虽已离粤，第八、五十两师尚未他调，因之而引起的两陈冲突，将要继两广战争而激烈爆发，广东军阀内部之混战，必不可避免的要很快到来。

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下，现在帝国主义和各派军阀进攻苏联的战争，同时亦日益紧张，马上的就要爆发了，奉天军阀已开始进攻苏联的战争，从满洲里事件中完全证实，虽然在满洲里事件〈失〉败，忽然又有伯力的会议，公布了俄奉草约，但这次不能当作进攻苏联战争的缓和，而是战争更加快到来的一种把戏，现在各派军阀以及改组派第三党都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先锋队，都正争夺进攻苏联的领导权（如奉天与南京政府的冲突）。同时，在帝国主义方面，虽然有日本独霸南北满洲而发生与英美的矛盾，（如英美意法干涉中俄交涉的宣言）但在进攻苏联的利益上，仍有调和一致的可能，因此进攻苏联的战争，马上就要到来。

至于全国的群众斗争，在军阀混战中更加向前开展，日益走向革命高潮的局面。革命复兴与革命的高潮之间，并不是如“万里长城”一样，现时的革命复兴，已是向着新的革命高潮发展，尤其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战争爆发后，必然随之而起的是世界的革命高潮之到来。现在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性的最主要集合点，新的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以及他的国际性与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同样的意义。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之下，前委的工作负有重要的历史使命，在“武装保卫苏联与反对军阀混战”两大政治任务中，

我们的使命，更加伟大。因此前委在总的策略上，必须更加坚决的扩大和发展当地的红军及农民的武装组织，普遍的广大的动员右江（即田南道）的群众斗争，建立和发展苏维埃区域，并深入土地革命是目前的核心任务。

现时两广军阀，仍处于混战和冲突的状态中，加以右江群众斗争的基础与地势的险要，对于红军七军的发展是极有利的条件，但在另一方面，右江是云桂的交通孔道和两广的财源地（贩卖鸦片），是游击战争的发展必然将会引起军阀的进攻，你们对这点决勿轻视，不要单顾赖地势的险要而自骄，走上失败的道路。前委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发展右江群众的斗争，而且只有群众斗争发展与苏维埃区域的向外发展，才能保证红军的生存与扩大，并打破敌人将来的进攻。

此次第四大队的改编成为正式红军，并未经过兵士群众的兵变而带有军官和平转变性，因此在现时的红军内部，还不免含有动摇的反动的军官在内，随时都有背叛的可能，特别是在下列的两种条件之下：

1. 新旧桂系的收买利诱，尤其是俞李阴谋活动；
2. 红军的分散驻扎，更易给敌人的活动的机会。

因此在红军中必须继续的肃清动摇反动的分子，枪毙反动军官是保证红军的胜利的基本条件。你们过去对动摇反动军官的处置，有些地方尚未能坚决执行，这是错误的，自然在红军尚缺乏富有军事智识的新干部时，还须利用旧有的干部，但对于反动和动摇的旧军官，仍须彻底的肃清，一时的轻易利用和放纵姑息是不正确的，这点在毅于〔宇〕同志到中央时，中央再三要省委提醒你们十二万分的注意！！！！

在红军游击区域最重要的要立刻宣布党的十大政纲、土

地政纲，并要根据党的政纲配合右江的实际情形，公布没收土地法〈令〉劳动法〈令〉，保护妇女法〈令〉……并宣传组织专门机关实现这些命令，前委在右江群众中必须“普遍的通俗的宣传苏维埃的理论，宣传苏维埃的政权，一切具体形式和具体工作”，运用广州和海陆丰及各地苏维埃的实际政治经验，教育群众。除宣传工作外，前委还应注意在红军的游击区域建立或转变农会为苏维埃政权，万勿以为当地“群众落后”！！暂时还应以农会为中心，而忽略组织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工作（据若臣同志报告同志中尚有如此观念），这是错误的。这点也是中央的意见。

对于红军的驻扎，省委认为太分散。第一，交通的不便，七八天不能集中，困难应付敌人的进攻。第二，在向豪绅地主的武装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之下分兵是不能运用此策略的（朱毛红军是切忌分兵的）。第三，分散驻扎，因为干部的缺乏，极困难发展对兵士的军事政治训练工作，因此，省委坚决的指示你们，红军在目前必须采取集中的策略（现时中央对全国红军的指示均如此），积极的向豪绅地主的武装进攻，如此才易于以集中的红军个别击破豪绅地主的武装，并向要隘发展，以根本动摇敌人的统治。现时对于驻于凌云的军队，应集中在百色、平马一带，由东兰派赴河池发展的一营，在目前尚不须要。

红军第一步的工作，应集中在百色、平马与东兰一带，发展当地的群众斗争，使这几个中心区域成为右江群众斗争的基本力量。对于城市的夺取，在现时亦非常重要，过去避免夺取城市、主要城市的策略，必须改变。只要有胜利的可能，有群众可发动的便须向主要的城市进攻，以至占领这些

城市就是占据极短的时间，也有伟大的政治影响。红军执行这样的策略，以与全国工农兵斗争汇合起来，便可促进革命的巨潮（见中央第六十号通告）。

至于发展的方面，毫无疑问的是应向着湘粤边界，只有这样才能与广东的群众革命运动和朱毛的游击战争相联系，这对于推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有极重要的意义。上次中央指示你们要与云南省委取得联系是恐怕在万不得已时，你们要退云桂边界，现在中央已完全同意省委的意见指示你们发展前途应向着湘粤边界。

在现时游击的时候，在战术上须避免打硬仗，以免损失红军实力，特别是子弹枪械损失后补充是万分困难。但对于能消灭的敌人，特别豪绅地主的武装，不得避免作战应坚决的使之肃清，作战时特别要注意群众的发动工作，吸收群众作侦探、破坏，以至参加作战才有胜利的保证。

对于当地红军及农军的扩大和发展工作，前委亦须用于〔最〕大的努力，但是对东兰农军的改编工作，省委要提醒你们用十二万分的力量去执行！据若臣同志的报告东兰农军的领导，大部分操于富农甚至一部分失意军官之手，如果属实，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特别在右江斗争愈加深入到土地革命的时候，更加危险，前委要用各种方式排斥富农及失意军官于东兰农军之外，召募一股革命分子，特别是农会中青年雇农和贫农充当农军，并找这些分子做农军的干部，这是保证农军能转变成为正式红军，并彻底担负红军革命任务的唯一条件。

右江土匪很多，且有石山可守，不易扑灭，但如不能肃清土匪的势力，同时也是要妨碍到当地的群众斗争的，在这

一特殊情形之下，前委暂时对土匪用“招抚”的方法，省委认为是万不得已时的一种变通办法，但在“招抚”后要加紧土匪下层群众的工作。对于土匪的首领，应当立即灭除，即令这部分首领表示服从我们，亦须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坚决肃清他们，如果这类的首领，侵入到红军或农军中，是异常的危险，对于改编的土匪，应分散到红军中去，不宜只采取形式的改变，不应仍旧使之保存旧的组织系统，极为重要。

右江农民群众，原来已有相当的组织，但组织的领导权多半在富农手里，这里特别值得前委注意的问题，据若臣同志报告，你们在计划中已注意到反富农的斗争，省委希望你们要坚决的在斗争中执行反富农的策略，富农是兼有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决不包含于农民战线之内，在斗争中必然的要由动摇而走向革命的营垒〔垒〕中去。这次东兰提出抗租口号即有富农反对，这是很明显的例证。前委必须要从斗争中坚决的肃清富农于农会及农军之外，并肃清富农对农民群众的影响，是现在农村工作中之重要任务。

对于农会的组织，要积极的扩大，加紧在雇农贫农中发展农会的会员，对于中农，亦应尽量的吸收到农会来。在红军游击及群众斗争较深的区域。应快速的转变农会为苏维埃，但这一转变，自然不应机械式的命令转变而要经过相当的宣传，同时亦不应以为右江群众落后，现时无成立苏维埃的必要是错的（现在贺龙红军游击的区域，亦犯有这种错误，还在委派县长不成立苏维埃）。

在右江农村中，应积极的发动群众的各种斗争，前委应用正确的策略，坚决的指示群众斗争，推进而成为游击战争一直

走向地方暴动,右江苏维埃区域的建立与发展,必须经过红军的游击,而各县地方暴动才能胜利。总之在右江必须发动广大群众的游击战争以与红军的游击相联系是工作的中心路线。

现时在红军已占领的城市(如百色、平马),应特别加紧工会及城市贫民的组织工作,并须公布劳动法会〔令〕,改良工人的生活条件,对于其他城市的工作,亦艰苦的去建立。这也是前委的这部分重要工作。

关于党的组织方面,目前中心的任务是要积极的在工人雇农贫农中发展党的组织,并健全地方党部和支部生活是目前为中心任务。但省委对于你们要“行成两种组织”的意见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党的发展是应当向着群众中的最勇敢最积极的分子,所谓打开门的尽量发展,并非无条件的吸收,使党与群众组织用混合,而失去党是群众先锋队的作用。在党内又要形成“两种组织”的办法是不通的,至于要加紧党内中坚分子的训练,应采取各种方式(如办训练班开活动分子会议),但决非在党的组织内又有二种的组织。这点望你们立即纠正!

对于前委名单,省委完全批准,如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前委书记昭礼担任,如尚未离开,应仍由小平负责。至于以后对前委的指挥问题,省委毫无意见,由若臣同志到上海与中央解决,不过在工作的关系,你们仍须与省委发生密切的关系,这是异常重要的。

此致布礼!

粤 省 委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廿五日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11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右江苏维埃政府口号

(1929年12月)

工人农民团结起来！
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地主资本家！
打倒万恶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实行土地革命！
实行烧契约！
实行不交租不还债！
拥护中国共产党！
拥护苏维埃政府！
拥护中国朱、毛红军！
实行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苏维埃政府万岁！
中国人民万万岁！

右江苏维埃各级政府组织与职责

(1929年12月)

一、县苏维埃政府组织与职责

(一) 党务委员：

- 1、定行委员计划；
- 2、监督各部工作；
- 3、接纳各方报告；
- 4、召集开执委会；
- 5、应付临时事故；
- 6、训练工作人员。

(二) 调查委员：

- 1、调查各方情形；
- 2、调查敌人情况；
- 3、调查各部工作；
- 4、调查群众的行动；
- 5、调查事件发生；
- 6、调查群众心理；
- 7、调查队伍工作。

(三) 宣传委员：

- 1、组织宣传队；

- 2、训练宣传员；
- 3、宣传敌人罪状；
- 4、宣传共产主义；
- 5、向本军宣传；
- 6、向敌军宣传；
- 7、向民众宣传；
- 8、发传单；
- 9、贴标语；
- 10、制画报；
- 11、放空气；
- 12、编山歌；
- 13、呼口号。

(四) 组织委员：

- 1、吸收同志入会；
- 2、训练同志工作；
- 3、组织小组工作；
- 4、组织赤卫军；
- 5、组织各团体；
- 6、组织交通队；
- 7、组织建设队。

(五) 财政委员：

- 1、预算决算经费；
- 2、经理财政收支；
- 3、收入会金及月费；
- 4、向同志捐要；
- 5、向富农借要；

- 6、工作三分要；
- 7、没收公款要；
- 8、罚反动者要。

(六) 军事委员：

- 1、侦探敌情；
- 2、计划进攻防守；
- 3、联络友军；
- 4、扩大部队；
- 5、训练工作；
- 6、收买枪弹；
- 7、规定符号。

(七) 交际委员：

- 1、调和同志争端；
- 2、调和内外事件；
- 3、交涉案项；
- 4、维持中立；
- 5、保险投降；
- 6、交涉事件；
- 7、分裂敌人；
- 8、运动反戈；
- 9、拉拢势力。

(八) 文书股：

- 1、收发文件；
- 2、答复文件；
- 3、起草宣传大纲；
- 4、起草标语传单及宣传口号；

- 5、报告各级机关；
- 6、报告上级机关；
- 7、保管会印文件及宣传品。

三、区苏政府组织与职责

（一）行政委员：

- 1、确定全区的〈一〉切方针；
- 2、领导全区群众参加革命运动；
- 3、计划全区的经济建设事务；
- 4、对外代表区苏政府及区群众；
- 5、解决各乡苏政府不能解〈决〉的纠纷；
- 6、解决群众的纠纷；
- 7、指导各乡苏府的临时工作。

（二）土地委员：

- 1、调查各乡苏府所没收的一切土地；
- 2、没收全区公有的土地及农业企业；
- 3、统计全区的土地及人口的数量；
- 4、调查各乡苏府分配土地情形；
- 5、解决各乡苏府因土地问题所发生的困难；
- 6、统计全区所收获的谷物数量；
- 7、帮助各乡苏府改良耕作方法，增加农产品生产。

（三）财政委员：

- 1、管理全区公有收入的财政
- 2、支配区苏府一切费用；
- 3、管理已经没收反革命者的财产；
- 4、征收全区的土地统一累进税；

5、造区苏府的预算和决算。

(四) 文化委员：

- 1、统计全区学〈龄〉儿童及失学的群众；
- 2、编辑工农运动及政治消息的壁报；
- 3、组织并训练宣传队；
- 4、指导白话戏社及一切游艺团体。

(五) 肃反委员：

- 1、侦查一切反革命派及其走狗的住处及行动，随时捕交各区苏府处理；
- 2、侦查一切反革命的财产，即行没收交区苏府支配；
- 3、区苏府的区域绝对不许窝藏一切反革命派及其走狗；
- 4、审判一切反革命派的罪犯，决定处理方法；
- 5、负责管理一切罪犯；
- 6、制止反革命的宣传；
- 7、联络各乡苏府的密切关系。

(六) 粮食委员：

- 1、调查全区人口粮食的差比；
- 2、集中贮藏全区多余的粮食；
- 3、灾荒时全区粮食的分配；
- 4、军事时全区粮食的征发；
- 5、设法平衡粮食的价值〔格〕。

(七) 赤卫委员：

- 1、统计各乡苏府赤卫队预备队组织；
- 2、区苏府在财政的预算有余或能给养时，应调选各乡赤卫队，组织赤卫常备队一小队，以便随时指挥；

3、为保障苏府的政权及肃清一切反革命势力。负责领导赤卫队参加战争或作战；

4、负责赤卫队政治及军事的教育和训练。

(八) 青年委员：

1、负责全区青年运动，领导青年群众参加一切革命斗争；

2、教育青年群众的革命理论和行动；

3、提出青年的迫切要求，但必须先注意〈阶级的要求〉；

4、组织童子团及少年先锋队工作；

5、教育训练童子团及少年先锋队工作。

(九) 妇女委员：

1、负责全区妇女运动；领导妇女参加一切革命斗争；

2、指导妇女参加阶级组织外，亦可组织妇女独立团体；

3、提出妇女切身的迫切〈要求〉，先注意阶级的〈要〉求；

4、解决妇女的一切问题。

(十) 工人委员：

1、与区内各工会发生密切的关系；

2、帮助工会的宣传组织工作；

3、提出工人最迫切的要求；

4、确定工人运动的计划；

5、参加工人的一切会议；

三、乡苏维埃政府组织与职责

(一) 行政委员：

- 1、确定全乡的一切工作方针；
- 2、领导全乡群众参加革命运动；
- 3、计划全乡经济建设事务；
- 4、对外代表乡政府及全乡群众；
- 5、执行上级苏府关于一切工作任务的决定指示；
- 6、解决群众的纠纷；
- 7、处理一切日常事务。

(二) 土地委员：

1、调查全乡的土地。分为：(1) 地主豪绅及反革命者的土地，(2) 自耕农的土地，(3) 佃农领的土地，(4) 全乡公有的土地四类；

2、调查确定地主豪绅及反革命者的土地，即由乡苏维埃政府没收；

3、全乡的土地经过调查后，即由——土地委员分别编号签订；

4、调查土地时，同时要调查全乡的人口，以便于统计分配；

5、经编号签订的土地，即定全归乡土地委员管理；

6、按照全乡贫苦无土地的农民人数。由土地委员决定分配的标准；

7、发给全乡贫苦无土地的农民使用证，农民即依照使用证签订的号数耕作；

8、自耕农的土地，经土委编号签订后，应向土地委员依照签订号数，领使用证，同时缴出以前一切契据焚毁；

9、农民耕作所收获的谷物，数量应切实向土地委员报告；

10、设法改良耕作方法，增加农产品的生产量。

(三) 财政委员：

- 1、管理全乡公有收入的财〈政〉；
- 2、支配乡苏府的一切费用；
- 3、管理已经没收反革命者的财产；
- 4、征收全乡的土地累进税；
- 5、造乡苏府的预算和决算。

(四) 文化委员：

- 1、调查学龄〔龄〕儿童及失学的群众；
- 2、办理群众学校强制儿童教育；
- 3、实行识字运动；
- 4、设立群众书报社，讲演所，体育场及俱乐部；
- 5、制止反革命的宣传；
- 6、编辑壁报，分发上级苏府的宣传品；
- 7、写画墙壁标语；
- 8、组织宣传队；
- 9、帮助青年教育童子团及少年先锋队；
- 10、组织白话剧及一切革命团体；
- 11、打破封建社会迷信，毁弃偶像。

(五) 肃反委员：

- 1、侦查一切反革命派及其走狗的地〈址〉住处及行动，随时捕交我苏府处理；
- 2、侦查一切反革命派的财产，即行没收，交乡苏府支配；
- 3、乡苏府的区域绝对不准窝〈藏〉一切反革命派及其走狗；

- 4、审判一切反革命派的罪犯。处决处理方法；
- 5、负责管理一切罪犯。

(六) 粮食委员：

- 1、调查全乡人口与粮食的差比；
- 2、集中贮藏全乡多余的粮食；
- 3、灾荒时全乡粮食的分配，
- 4、军事时全乡粮食的征发。

(七) 赤卫委员：

- 1、调查全乡所有的武装及青年；
- 2、调查全乡的青年及武装；组织乡苏府的赤卫〈队〉；
- 3、为保障苏府及政权，肃清一切反革命势力，负责领导赤卫队参加斗争或作战；
- 4、负责赤卫队政治及军事的教育和训话〔练〕；
- 5、联合各乡赤卫队，集中组织为一中队，加强赤卫队的组织。

(八) 青年委员：

- 1、负责全乡青年运动，领导青年群众参加一切革命斗争；
- 2、教育青年群众的革命〈理〉论和行动；
- 3、提出青年切身的迫切要求，但必要先注意阶级的要求；
- 4、组织童子团及少年先锋队；
- 5、解决青年的一切问题。

(九) 妇女委员：

- 1、负责全乡妇女运动，领导妇女群〈众参〉加一切革命斗争；

2、指导妇女参加阶级组织外，亦可组织妇女独立的团体；

3、提出妇女切身的迫切要求，但必先注意阶级的要求；

4、解决妇女的问题。

四、赤卫军组织

(一) 赤卫军组织原则

1、地方性的组织；

2、阶级性的组织；

3、不离生产；

4、转变红军；

(二) 右江现行组织

1、集中各县好枪编四个特务营，为右江苏维埃政府指挥；

2、各县常备队最少〔多〕不超过一营；

3、扩大各乡预备队；

4、预备队平日回家各务所业，由县苏维埃规定期间训练；

5、指挥系统：（各县一营）

（1）但在必要时，右江苏维埃直接指挥各县赤卫队；

（2）在红军驻在地及随红军行动，并须受红军指挥。

(三) 赤卫军过去的错误：

A、组织上的错误：

1、各路组织的错误；

2、成份复杂；

- 3、换班的制度；
- 4、枪支私有。

B、行动上的错误：

- 1、烧杀政策；
- 2、单纯军事行动；
- 3、侵犯群众利益；
- 4、民团化；
- 5、自由行动；
- 6、缺乏进攻精神；
- 7、收买红军枪单〔弹〕，收容红军逃兵；
- 8、谎报敌情。

(四)今后工作方针：

- 1、严禁烧杀政策，绝对禁止侵犯群众利益；
- 2、一切行动要发动群众参加，绝对避免单纯军事行动；
- 3、肃清内部一切动摇腐化及剥削人的分子；
- 4、规定当兵年限，严禁自由退伍；
- 5、加强军政训练；
- 6、严禁〔格〕军纪风纪；
- 7、提高进攻精神；
- 8、绝对禁止收容红军逃兵，收买红军枪弹；
- 9、发展党的组织；
- 10、加紧转变红军工作。

(据广西档案馆所存原件复印件)

七军前委报告

(1930年1月)①

中央：

自军队到右江后，因交通阻断，只由龚同志赴港向粤省委作详细的报告，余均系简单的书信。中央对于其间工作，当然不知其详，兹为报告，并有系统的许多的重要问题，盼速即答复解答。

龚同志衔中央及粤省委命令来要第四大队即速转变，并限定龚同志到后，不能超过十天，即须动作。前委对于这一问题讨论之结果，完全接受中央指示之精神，但限定十天，未免过于机械，而且在工作上准备亦须略费时日。若在十天之内转变反因准备工作太差而得不好结果。故前委只决定于最短时间内以极紧张之精神，使工作上略为布置就绪，即行动作。

及后工作上准备略有头绪，且因政治环境的迫切需要决定于十二月十一日伟大的广州暴动纪念日发动整个的转变计划，于十二月十一日得到最完成，被压迫阶级鲜红的旗帜于十二月十一日高高飘扬广西右江各县了，我们亦高唱凯旋之歌。我们接受中央的指示是根据以下几点理由：

1、第四大队，只有转变到革命才有利益，当军队退到

①此时间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右江时，在工作上已无“两条路线”了，只有游击战争才是我们的出路。

2、桂系改组派对俞李残部，必想尽方法消灭，如不乘他们尚不能以大部力量向我们进攻时发动，将来极觉困难。

3、我们在第四大队中力量，及党的政治影响，有相当的把握将第四大队转变过来，同时有群众的力量，可以转变的声援。

准备时主要的工作有以下几点：

1、肃清军中反动、动摇的军官，用各种方法撤换。

2、在政治上调动广大群众参加转变工作，当时决定在转变前一、二天。召集一个全军士兵代表会议，及百色工人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平马农民代表会议以及各县群众工作之加紧，宣传工作之深入，都是调动群众之准备。

3、集中军队于百色、平马两县，以防分散时易生变故。

4、加紧党的组织工作，教育同志，使深切了解转变的意义，并推动同志们积极工作。

5、反动的武装力量、豪绅资本家的民团、商团枪支之调查。

6、各种宣传品，政纲的拟定，以及许多技术工作的准备。

7、经济的筹措，至少要有十万元的存款。

发动时情形：

到十二月十日各方面准备都有相当头绪，虽然仍是不十分充分，但时期已不许我们再延。

十二月十日，全军士兵代表会议，在百色开幕，“我们

要当红军”“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口号高唱入云。当日即通过转变第四大队为红军及组织苏维埃政府的两个决议案，会场革命空气的紧张，出我们意料之外！

百色工人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亦于当日开幕，都通过了第四大队转变为红军及组织苏维埃政府两个决议案。

十日晚百色军队要肃清贪官污吏及大商人，当时即将第五大队第五营（该营在右江）营长扣留，县长及禁烟局长，亦禁锢起来，并向商人〔会〕宣布红军第七军十一日成立，要他们转知商人勿惊惶，要照常营业。同时要大商人缴枪，商会存枪六十余支即交出，各商号私枪，亦交到二十多支，尚有数十支，无法查获，尚未缴到。县公署、禁烟局、公安局枪百余支，亦完全缴到。

同时，百色邻县恩阳之火镇那坡商团枪亦交到九十余支，但亦被逃脱数十支，缴那坡商人枪时，因连长处置不得当，发生士兵抢掠两大商号，此事发生，对红军影响极坏，引起各县商人对红军的惊惶。连小商人都怕被红军“共产”去，后虽经宣传工作，多方解释，商人亦稍安心营业，但究竟给红军留下一个污点。

在果德县之果化亦缴到商枪数十支。

其它各县，豪绅及商团武装，因数月来，农民斗争之剧烈，早已逃脱。

十一日开广州暴动纪念大会，宣布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在大会中，我及云逸同志，宣布就政治部主任及军长职，并宣布政纲，到农民、学生、群众三千余人。百色过去群众工作没有基础，此次大会到会人数，可算不少，群众革命情绪热烈，当场即选出临时苏维埃政府。会毕，并游行城

内一周。

十二日在百色枪决前所扣留之第三大队队长熊镛，在平马亦枪决县警备队长一人。

十二日云逸同志到平马，与士兵训话，并开工农兵大会，到者万余人，当场产生临时苏维埃政府，革命情绪之高潮，亦空前所未有。

十三日奉议，恩阳各县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均成立。

现在已建立苏维埃及革命委员会者共有百色、平马（即恩隆）、奉议、恩阳、恩林、果德、东兰、向都、凌云、凤山等十余县。

红军成立时，宣布目前实施十大政纲十六条，各县苏维埃以此政纲为目前政纲，兹略述如下：

1、扩大反帝运动，用民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

2、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3、推翻乡村豪绅地主的统治，乡村政权交乡苏维埃。

4、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汇合，实现割据两广。

5、实行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并制定劳动保护法。

6、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乡苏维埃分给农民，凡没收之土地，不准买卖。

7、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自由。

8、男女平等。

9、改良士兵生活，官兵待遇平等。

- 10、取消一切政府的捐税。
- 11、实行累进税，并由苏维埃政府制定标准。
- 12、没收反革命者财产，交苏维埃政府处理。
- 13、保护交通和商人营业。
- 14、取消一切债务。
- 15、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
- 16、准备武装保护苏联，反抗帝国主义及军阀国民党政府进攻苏联。

转变后的情形

在军中士兵听到了月饷20元，官兵待遇平等，兵士参加苏维埃政府等政治口号的鼓动，都喜欢得很，大家愿意当红军。转变后，即发饷一个月，每人一律廿元，实施了这一项口号。此后士兵的情绪都还好，告发官长□话和要求惩办克扣军饷的副官的事，也相继发生了。对于军官我们曾宣布走者发旅费，但因各方对俞李残部不能容，许多动摇的军官，无路可走，不得不留此。但多表现恐慌的状态，这些军官，均不使之与兵士接近，不给他们兵，只分配以不甚重要工作，如副官等之事。

工人的情绪，甚为特别，百色工人表现最好，百色工会已组织十二个，群众都起来斗争；要求加工资，减少工时，有的从每月九元之工资增加到每月廿元，资本家无可奈何，只说你们要钱的照加就是了。

平马、那坡工人亦热烈组织工会，但斗争较少，因为平马、那坡为较小城市，工人与店东多少有些关系，因之斗争情绪不热烈。

农民的斗争在平马、东兰、思林、果德、向都、凤山等

县，过去农运有基础地方与□□的武装斗争。

百色、恩隆等县，过去农运无基础，现在□□成立□□□豪绅没收地主土地的事情，略有所闻。商人因那坡抢掠事情之影响，顿呈恐慌现象，但商人又不敢关门，大商人除各地早已逃遁外，百色之大商人……逃难，在转变前二、三天，百色有烟土六□□□捣乱运往南宁……平马……。当时对于是否扣留烟土问题，在党在〔内〕争论颇久，最后仍决定放行。转变后派军队护送往宁，商人恐慌心理，亦稍□日平，商业□上即百色上游□总有烟土下来，南宁因封船，坐大船来商人见了用民船运货，我们只扣留大商人，□罚款二三家，均因他们勾结土匪之故。转变后，未向商人筹款，且废除许多加于小商人、农民身上的捐款，故商业仍照常，并无停滞之现象。商业之照常，特别是烟土来源不绝，财政问题，亦得到解决。

学生的一般表现尚可，但脱不了小资产阶级动摇的状态。转变后，教育经费给一□。军中反动军官重要的二人已处决，动摇他们的运军队，较前各县苏维埃团（？）干部之决定，多不健全尚不能引进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

军队一般的状况：

中国红军第七军，分为三个纵队，队长张云逸同志任，副队长由李谦同志负责。现第一纵队长，决以李谦担任，以便指挥。第一纵队直辖一二三三营，即第四大队，原有三营编成，三个营长均系同志，以第三营战斗为强，因该营多半是老兵。第二营训练比较好？下级干部亦较强，亦有战斗力，第一营□□。第一纵队有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各（一？）连，第一纵队战斗力不弱。第二纵队完全是东兰

农军的编成，由韦拔群同志为纵队长。有机关〈枪〉连、迫击炮各（？）二门，大炮一门，现编成三营，第一营第四连均系久经战斗之农军，枪支□□战斗力强。第二营第三营；总共有五连尚□着手□编三连以上八连，此两营枪枝多半不好，战斗力不强。第三纵队□□部队□兵三营，机关〈枪〉连一连，迫击〈炮〉连一连，第一营以第五大队第五营之两连（老兵）及新兵一连而成。第二营由前机关〈枪〉连之□兵连，军部特务营一连，前第五营一连（老兵）及□连一连而成，第三营由前第五营一连，农民三连而成。纵队长□亮同志，三个营长均是同志、特务连及迫击〈炮〉连，尚未□□军部□□队有特务营三连，□炮连一连，机关枪连一连，教导队一连，军事训练所，学生120名（以下原文遗漏——编者）。以上以第一纵队战斗力为最强，第三纵队新兵战斗力□□，第二纵队为东兰农军，亦经过多年作战，但因枪械多半不好，致战斗力不强。

政治组织，军政治部主任一人，由我负责，下设秘书一人，总务、宣传、组织三科，科下分股并有宣传队。政治部侦探之战斗，各纵队设队政治部。第一纵队设政治部，主任□□□同志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李□同志，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同志任之。各营连设政治指导员。

党的一般状况

军中前委之组织，现由导民、张云逸、何世昌、□□□手工工人，李谦、韦拔群□人组织之。导民任书记。各队委书记，由各纵队政治部主任同志任之。现军中各连，均有支部之组织。党的工作以第一纵队及□□部队之支部较好，第二、三纵队党的工作，以□基础，（以下原文遗漏——编

者)同志的数目及其成份的统计,尚未有确实数目。大约军部直辖部队及第二、三纵队共有同志三百左右。干部同志有一部分工人。第二纵队在东兰、离百色较远,未有详细报告,全不知道。右江各县地方党部的工作。第四大队□此后才能开始。现百色和平马、奉议、东兰、思林、果德、向都等县,地方党部建立起来,但党的工作人员多兼外部工作,无专人员负责,将来军走恐党亦亡,这是最严重问题,望速派赴各县党的工作人一起来此。广西特委的最近又经一次破坏,我们到此已久,只得其一封信,望省委注意此问题。

群众工作

东兰地主与豪绅地主斗争多年,但过去没有党在领导,一般群众只信仰韦拔群同志个人,他们的阶级仇恨心虽高,但政治觉悟仍低。最近接受党的政治影响,一般群众知道国民党的反革命及信仰我们党的革命。革命委员会已成立,乡区的组织正在开始。

平马、思林、果德、向都、奉议、果德县与豪绅地主,群众亦斗争几个月,反动力量□□肃清。群众武装有数千□□党但□群众□红军的心理甚□□□□临时苏维埃均已成立,各乡区农会成立,苏维埃的组织都普遍得很。

百色工作未有基础,惟工人运动颇发展,已成立十余个工会,工人群众□□得但农村基础也极好,各村捕豪绅工作都在进行,土地已没收一部分,并可深入,且未开始分配。分配问题,极感困难,望速加指示。土地党〔法〕〈大〉纲草案,火速设法寄一本来。

第五大队的转变问题

1、第五大队自从转变后,(实力)颇强,其尚存实力

若干，料仁^①、邓二兄必有转变详细的报告。此间虽有电来往，但其内容则未悉。

2、自平兄到龙后，后方（曾来）两电，其要点拟四大队即第一师，五大队改为第二师，以明为第七军军长，逸为一师长，作为二师长，但我们接受此消息后，几次讨论决定四大队仍为七军，五大队为八军，明兄任总指挥，在七军方面统不致改名称而生影响，在明兄方面，据过去我们通电话说明兄小住百色指挥，他必能□我军的影响及其声势之更大也。

3、第五大队时来电，但□工农□□各种人才工作□□□□赴□后人力亦感缺乏，中央应注意派得力人员□工作，目下右江方面人才亦甚为缺乏。

4、据五大队前委来电说公开宣传不日可见红旗飘扬于左江，我们电促其从速转变，以壮声势，合取南宁。五大队在这个环境中，非转变与七军（汇合？）^②

5、备预^③将□□□至靖西，我们已派兵二连并运〈烟〉土三万两与彼，所有文件材料已多寄去，并托购买一切军用品。因此间各用品甚缺乏。烟土三万运龙发售后，由龙汇两万元与中央之，通知备预了。

我们对于目前政治的分析及本军的方向

1、帝国主义加紧进攻苏联瓜分中国——据宁报十二月四日载消息。中东路问题有解决消息，但我们估量：（一）解决条件不明瞭；（二）桂系借此攻击政府外交失败，故未

①即龚饮冰。

②原文如此

③备预即俞作豫。

十分相信这个消息；（三）同时阅沪报十二月三日所载美英法帝国主义多□致□书与中俄，以非战公约干涉两国，并有挑拨宁奉军阀（如惋惜其错机会等），由此可见中俄两问题较前更严重，义〔意〕思〔藉〕此进兵中国，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益为加紧。故反对进攻苏联，瓜分中国，武装拥护苏联等口号，仍是加紧宣传。

2、军阀仍有不断的混战——就全国军阀混战说：（一）冯须〔虽〕失败，但其力量仍未消灭；（二）蒋战胜后，美帝益得势，英日帝国主义必不让美占利益，英日结合攻美很无可能，日必怂恿北方张阎等军阀反蒋以打击美帝国主义，而维持其他在华利益，故冯虽败，军阀的混战必不能停止；（三）张、桂等中小军阀不肯屈服于蒋，时思设立其政权，即蒋系小军阀，与蒋亦有地盘冲突，其混战不会从此停止。就两广方面说，张、桂军阀虽攻粤失利，但其势力仍然存在。桂系原退守贺县，现进至平乐等处准备反攻。广西内部军阀关系复杂，吕虽通电拥蒋，但其态度还未完全明了，且其所部多与李黄有关系，吕果叛桂投粤，内部必起冲突。因此我们估量两广军阀混战，尚未停止，而且桂系内部尚未〔有〕问题无暇他顾。据得报邕垣驻军不多（约一、二团）多抽调出发混战。

本军无时不想在军阀混战时机中发展，自转变后，将内部的反动游移等分子肃清，近来更形团结而巩固，在本军区域内（右江一带）下游一带，豪绅地主土匪等反动势力已肃清，群众组织也较好。惟百色附近因农运尚未十分发展（工会逐日有发展之趋势），而豪绅地主土匪等反动则尚未肃清。上游方面虽好，此次没有大碍，故现在已将兵力集中，

准备日内向南宁游击。我们估量南宁敌人，假定有二团人，故拟抽调步兵七营（一纵三营、二纵二营、三纵一营、特务营一营，机关枪八挺，迫击炮四门，大炮两门）往进攻，是很有把握的。假定白敌有三团，如左江部队能同时亦进，也是很有把握的。

我们的进攻南宁目的：（一）扩大党的政治影响，震红军声威，鼓起全国革命空气。（二）发动群众。（三）夺取白敌的战具、子弹及其它用品来补充我们的势力。（四）到南宁到目的。（五）六天即归回上游。至于出兵后方仍有相当的布置，假使力量有，不必即将不甚重要的县份放弃，等待回归时再占据。如白敌进兵多，则退东兰向柳州发展。

在军阀混战时期中向接近军阀作战的地方游击，在原则上不致有错误的，在实力上攻邕我们有相当把握，谅不致有何错误。到邕后工作，我们当自计划，但中央及省委的指示，仍望派人送邕。

我们的要求

1、本军发展的方向——从北江与朱毛汇合，这个策略有无错误请即批示。

2、关于土地分配问题请更详细的指示我们去进行。

3、史逐团〔遽圆〕^①在工作加紧时离开赴港，且在工作方面，一（般）的同志对他都不好，没有什么工作表现，且生活腐化（龙州方面来电说的）。应该严肃处分，以重纪律。

徐开先^②亦在工作紧张时赴越工作，也不大努力，应加

^①史遽圆即史书元。

^②徐开先即徐冠英。

警告，并着他回龙工作。

4、请派党的负责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切切。平兄前得中央电召，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彼硬要去，在龙变前一天已行。故中央走〔来〕电阻之回去已不及？工作召〔由〕前委负责，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

5、下略

完

前委书记陈导民^①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11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①即陈豪人。

党员须知^①

（一）什么是共产党？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工农兵奋斗，消灭吃人的压迫阶级，使世界无产阶级得到彻底的解放，实现“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

（二）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

1、与国民党的不同，国民党是代表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压迫工农兵及一般贫苦民众的，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领导被压迫阶级，推翻帝国主义，铲除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共产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是中国反革命的集团，共产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2、与第三党的不同，第三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领导被压迫阶级革命的。第三党是帝国主义和压迫阶级欺骗工农兵的工具，共产党是很坚决的，不妥协的，革命的先锋队。

（三）什么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不是抢产，也不是均产，更不是什么公妻，抢产均产公妻还有杀人放火等类名词，都是反动派的诬蔑，共产主义是唯物的、科学的。资本主义的敌人，解决社会问题

^①此为红军前委、右江特委对党员进行教育的教材。

的良剂，被压迫工人农人兵士的福音；“走上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道，废除剥削人及压迫人的制度——私有制，完成只有经济组织，而无政治组织，人们一天做很少时间的工就可以过很好的生活的社会——共产社会。

（四）共产主义与其他主义的不同？

1、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共产主义主张无产劳动者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民生主义主张劳资妥协。试问：资本家不打倒，阶级不铲平能够不斗争吗？共产主义主张土地革命，资产归工农兵政府支配，彻底的铲除地主豪绅；民生主义仅仅讲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只平均而已，只节制而已，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终无打倒之一日；共产主义主张资本集中，增进生产，使每个工人农人兵士都有田种，有工做；民生主义是不彻底的，绝对做不到人人有饭吃，有工做；共产主义废除财产私有制度，根本消灭社会争夺的媒介；民生主义承认私有制，社会的纷乱，永远延长；共产主义是要达到阶级消灭的社会，民生主义还有阶级存在，永远不能消灭阶级的斗争。

2、与无政府主义的不同，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一种幻想；共产主义是改造现社会和解放人类的唯一良方。无政府主义根本没有找出一个怎样去改造现社会的方法，他不要组织，不主张以权力改造现社会，试问：残暴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不有坚强的群众，有组织的计划去攻击他能够消灭他吗？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主张工农专政，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推翻根深蒂固的压迫阶级，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肃清旧社会的余孽，建立和巩固新社会。并且无政府党人在各国都已成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用来专门反共

产党的工具了。

（五）中国革命到了什么阶段？

中国革命的阶段，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不过可以开辟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因为：（1）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还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还没有肃清；（2）军阀混战，一天一天扩大，割据局面，无法统一，且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3）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及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上面指出来的三点，证明了资产阶级性革命，尚未完成，因为只有驱逐帝国主义，肃清了封建势力，统一了中国资本主义才能得到发展，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到了一九二七年见了革命高潮就惧怕起来，于是投降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因为资产阶级的微弱，没有得发展的前途，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又害怕工农的革命，故反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因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阶段之中的革命力量，现在只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士兵及城市贫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是完成这一革命的任务。

（六）为什么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领导？

封建阶级中的地主豪绅买办官僚军阀等，且〔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是压迫工农兵贫民的，是被革命的，只有消灭封建阶级才能统一中国，才能发展资本主义，才能解除工农贫民的一部分痛苦。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压迫侵略之下，除想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势力，但自身力量薄弱，仍有很多兼买办性和地主的不敢强硬的反对帝国主义和

封建势力，只有仰承帝国主义鼻息，以图稍为的发展，在革命紧张的时期，更使他惧怕革命，甘愿投降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共同来压迫群众，中国资产阶级自民国十六年背叛革命后，已证明了自身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已成革命的障碍。小资产阶级是有革命性的，但是到了高潮到来，有一部分仍可走入反革命的营垒中去，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性质是个摇摆不定的，惟小资产阶级中的农民，确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之一动力，确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尤其在中国占人口大多数受压迫最深的农民，但是，农民的意识不很坚定，乡土观念不易完全破除，很难有大的坚固的组织，且缺乏建设性，若无无产阶级领导，即能一时的夺得政权，也必然归于溃败，只有无产阶级才富有坚定性组织性建设性，所以中国革命只有坚强组织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一般被压迫民众才能完成。

（据广西档案馆所存原件复印件）

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①

(1930年1月)

编者按^②：

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记录的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必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此外中央对于这次转变后的工作布置已有一个较详细的指导信，因为这封信是根据的这次讨论结论写的，故不另发表。

一、报 告

(一) 广西军事工作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军委还未建立，这一个时〈期〉虽曾因俞××的线索派了些人打入敌人军队中去，但是士兵运动还不能有计划的开始做，且好些派去的同志都因没有好的督促使其不耐苦而离开。第

①这个文件登载在中央军委编的1930年3月15日《军事通讯》第二期。据我们考证，这次讨论会时间为1930年1月。

②此为《军事通讯》编者按。

二个时期是××同志去把军委成立，这时才开始有计划的注意士兵运动，但依然是很少的发展，虽然又有计划的派了些人到军队中去，惜都因语言不通而得不到好的效力。第三时期为吕焕炎被收买反叛时期，这时我们已在教导队各部已有了工作，教导队已带了红色。这个部队有可能拖出来发动游击战争，因此自然引起敌人注意。俞作柏要与吕焕炎打仗也想把教导队开出去，及到他失败又想一手撤换各队长官，以提防我们把教导队带走。因此引起教导队自动遣散，然而我们对于这次的发动事先并没有很好的计划，内部的组织也不甚严密，以至于有组织行动的只有二百余人，其余都东散西散。第四个时期就是俞作柏败退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已在警备大队第四五队有相当的准备工作，同时我们已将这个队伍拖到右江百色一事，决定正式成立为红军第七军，组织红军前委，七军并准备编成三纵队，以原来从南宁拖到百色的四五大队三营共一千七百人（弹很富足枪足）教导队三〇〇人另机枪营（机枪十四门）炮兵连（山野炮六门）编为第一纵队，以在凌云东兰一带有四年斗争历史的韦拔群部编为第二纵队，有精枪五百，土枪千余，该部战斗力很强，曾以少数兵力大破围剿大批军队。另以平马思林田州三处农民军编成第三纵队，此纵队共可编为三营（枪足），除此以外尚有赤卫队若干队。前委成立时已将工作大纲议定，前委至多委员九人职权管理地方党部，为军中党的最高组织系统，军中党的组织系统，前委以下分队委、营委、连支、小组，政治部分军政治部，纵队政治部，团营连各设政治委员，另在各连营设兵委其职权为管理士兵的生活秩序，监督密查军中经济。纵队政治部不能指导党部。前委中的党委每

周开会一次，前委会每月一次。军队组织军以下分纵队、营、连、排、每连精枪六十支，标枪二十支，平均一支枪有弹三百发。

(二)前委今后的工作：1、深入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豪绅财产；2、在群众斗争区立即组织苏维埃，直接由群众选举，无群众斗争区则暂设临时政权，即革命委员会，由政治部委定（编者按^①：这不妥当，讨论中有批评）；3、转变农会的组织，由富农领导转变到雇农领导；4、防止无目的烧杀主义；5、一切工作向着群众；6、扩大宣传；7、注意各中心区域各中心工作的配合；8、加紧领导日常斗争；（以前广东省委指示我们说红军只有大的斗争，没有什么小的斗争，我们觉得不然，必定要从小的斗争才能发展到大的斗争，这种意见最后已得省委同意）；9、发展工人组织——广西虽然无产业工人，但多市政工人如电气工人、码头工人、理发工人等等，我们一定要使其组织起来；10、尽量帮助农民打豪绅；11、对小商人保护，对大商人指出其为反革命虽不没收其财产，但必加重以捐务；12、废除苛捐杂税，只抽累进粮食税；13、广泛的吸收革命分子；14、应组织中坚分子——广西过去农村每每有这种情形，即是统治阶级把农民整批当做共产党员杀，农民就有这样的观念，他们就是共产党员，如现在党若公开，则将来难免有许多农民要求入党，因此我们应该将其中中坚分子另行组织起来。（但是这点省委没有同意他说党内决无两重组织）；15、健全地方党部工作；16、建立支部生活；17、准备训练党的干部；18、加紧党内教育工作；19、在公开环境中注意党的秘密；

^①此为《军事通讯》编者按。

20、加紧军队中的战斗力，建立游击战争的战术以易集中易分散为原则；21、发展方向向湘粤边界，以造成朱毛彭黄汇合的前途。22、改良待遇，官兵夫一律平等，每月薪饷二百毫（红军本来要废除薪饷制，但是七军系转变，一直还不能废除当然应要有这个前途）；23、经济公开，由兵士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开支由军需定期向审查会报告；24、组织裁判委员会，以连为单位，以军官一人，士兵三人组织之，（如遇小事可由军官解决的，当不一定交裁判委员会）。25、在成份上改造红军；26、军纪党纪的维持。

（三）红军转变前的准备工作——这种准备工作的开始，并不是在我去以后，从南宁退到右江就工作就已有相当成绩，我们在这过程中的工作：第一是撤换了动摇靠不住的军官，我离当地时，二十三连连长只有一二人是非同志，官长都是同志，排长亦最大部分是同志，是非同志的排长亦都另派有副排长，可见，整个的军官都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撤换了动摇军官时，有许多地方还不免要用政治手腕，在转变准备时期中，很少能用群众的力量解决动摇军官。第二解决许多反动派——枪决的只有营长一个，县长一人，其余无政治活动的则驱逐出境。第三派人到各地发展组织。第四，发展士兵组织，执行这个工作的方法如早晚点名呼口号，个别谈话，召集群众报告讲演会等；第五，撤换县长；第六、设法收集商人枪支——因为在广西的特殊情形，所以对于这件事的执行我们还用了许多军事阴谋的方法，不过在解决了以后都对于群众有很大的宣传。第七、解散了反动军队的武装。第八、组织宣传队——这个特别组织的宣传队就是准备分配到各连组织宣传队的基础。第九、发行士兵之友，右江

日报以及各种小册子标语；第十、开设政治军事短期训练班；第十一、加紧了军中政治工作特别定期与士兵谈话，集合报告等；第十二、废除苛捐杂税以夺取群众；第十三、保护学校特别提出一千元来补助一个中学校经费，在〈派〉同志到学校去组织委员会去发动学生的斗争情绪；第十四、派人到东兰平马一带帮助农民打土豪，土豪好些武装多望风而逃；第十五、对土匪如其已走上豪绅方面，当无疑地帮助农民攻打，否则仍以我们的影响去招抚他们；第十六、把原来的旧教导队曾遣散到农村中去的设法收集拢来，为改编新教导队；第十七、对军官加以训练；第十八、开官兵讲演会，提出中心问题以发动士兵的自动讲演能力；第十九、召集下级军官会议讨论政治行动问题；第二十、发告各界（工农商学兵妇女）书；第二十一、宣布政纲。

（四）现况——1、军政人材够用，惟缺乏党和军队中和军中的政治工作人材，士兵一般的状况因老兵不少，多流氓性，新兵则多由农民（而且受豪绅压迫至厉害的）来的，表现得还很好。不过因广西人的特性好吃好吹，因此求饷也颇切，这种毛病一直反映我们军队里，所以目前还是发二十元饷，当然我们已感到发薪的弊病，已在努力向士兵宣传造成废除薪饷的前途。2、右江经济情况：在未转变前右江十二县每月税收可得万余，税收只有两种一为鸦片税一为豆税以前豆税尽量作军用。此区商品的交换以鸦片为中心，商人都贩卖鸦片，鸦片烟公开的招股，甚至于小商人入股以求赢利的，都普遍异常。我们现在扣留鸦片已有数十万两，因为尚不能即刻用焚毁方法，故还是由加重其税务方法，约可收税十余万。此外，此区特产为牛皮药材，谷米的出产还不够

吃，每年仅收入万石，入口大宗为纱绸。货币主要的能保
险流行最广的是法币，其余还有许多杂币，但不能如法币一
样的很广的使用。此外外国货入口还不少，但安南来的倒很
少，大部分货物还是来至梧粤。总之该地的经济流通是较各
省困难。因此要解决我们以后的经济问题还需得我们要艰苦
的斗争。3、党的情况：当地地方党部的组织，可以说以前
是等于没有，只有在东兰有县委约二十余人，奉议、恩隆、
向都、果德、天保每县有一特支，每地只四五人。其中以果
德为最坏，成份多知识分子。现在右江已组织工作委员会，
整个的右江同志约近三百人，党的组织干部则甚缺乏。4、
当地农民生活很苦，自耕农多，富农较少，雇农也较少，地
主有，但还是中心〔小〕地主占优势，大部分土地都分割在
中小地主手中，故自耕农民很穷，每不够自己吃。当地的田
租是四六开（其佃农四成地主六成），佃农对其东家则完全
是奴隶式的，每每在东家打零工不给工钱。豪绅地主对农民
的压迫很厉害，因此农民恨地主的心理也很切，打击地主豪
绅的情绪也特别高。农会在右江百色一带是有组织，这种组
织大概要有枪才能加入。因此农民武装也极普遍。5、当地
商人多作鸦片烟生涯，甚至于小商人都加入股，在分红利上
虽然有许多不平均，但是内部冲突和分化就不甚鲜明。我们
目前的策略对大商人因其已走向反革命，当然要极力打击以
至于没收，对小商人因其尚能很安静的营业，明令保护，以
便在我们商品流转上不至于常碰到困难。6、工人运动情形：
当地无产业工人，只有市政工人，现已组织的有邮务工会
（有同志十多人），电政工会（有同志十余人）茹〔姑〕苏
工会，粮食工会，理发工会，正将组织的印刷工会，码头

(尽是女工)工会,航业工会,该地工人很好,武装心理特别发达。学生运动尚未开始做,只派三人去组织学校委员会,那里有中校一,我们津贴他们一千元,尚能安静上课。

8、该地土匪多流氓性,可分两种:一为大股匪专以包庇烟运,征收货税为收入,一为“牛老”或“大刀帮”,此即为半农半匪,专零干抢劫。

9、当地外国人很少,教堂也不多;

10、该地语言极不统一。

11、该地很多瑶民,因此民族问题在我们那里也常碰到;

13、军事布置:百色驻教导队特务营,机枪连炮兵连二营七连,第五大队五营驻凌云凤山一带,四大队二营(二营中有一连驻凌云)驻那坡田此;四大队三四营驻平马,第五营准备到东兰编二纵队。

补充报告

(一)转变路线问题——到南宁以后,我们就决定在短期间要将我们已有工作的部队发动游击战争。到百色后,我们即公开坚决反国民党,号召工农兵组织政府,在十月革命纪念节那一天我们曾召集了盛大的纪念会。我们曾在这会中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这是给反革命以很大的打击。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南宁动,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未准备好,且群众也没有起来,但是当然这样我们却没有一时忘□动,在短期间发动。对于发动群众的路线我们曾注意到,但不充分是确实的。解决豪绅的武装在最初的时候是要用特别的方法,及到军事上已较有根基即公开进行了。关于暴动的问题,我们很久就注意到了,但是得到中央的指示以后使我们更坚决,不过必要有准备工作。因此时间上并不能机械的确定,

直到以后军队中我们已有强固的组织才决定广暴纪念日动，但这次发动并不是上级的命令，还是经过士兵们及大会来决定的。此外右江虽便利于革命势力的存在，而同时又便利于反革命势力的存在。豪绅武装势力很大，群众斗争尚不怎样发展，要解决他也很难，这实在是很不便利于我们将来的斗争。还有反富农的路线在右江已执行，事实上当地的富农已经反革命了，公开的在农会提出来“只抗地主的债不抗农民的债”，以公开的来阻碍群众的斗争。不过现在右江的农会还有许多是在富农领导下，还须要我们艰苦奋斗——总之在右江方面发动工作的准备都好，以后如能在各方面的策略运用得好，将来前途是很乐观的。

(二)左江的情形——这次我来经过龙州，驻了两天，会着×××等二十余同志，经我告诉他们发动的策略以后，他们都表示接受，已准备发动，并以共同议定发动前的准备以及发动后的工作计划大纲。内容大致与右江相同，主要的是发动群众斗争，与解决动摇不坚决的旧军官。此地农民要求组织农会之心甚切，工人也有二千，群众斗争，一定有可能发展。此外据×××说几个龙头（如冯飞龙辈）也表现得很好，已要我们派人去做工〈作〉。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工作发展的绝好条件；同时，（□□□□□□。）总之左江的发动是刻不容缓，如左江能发动，这对全国的政治影响更大。这种斗争发展的方面，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

二、讨 论

种详——听了两位同志对于广西工作的报告我有以下的意见：

（一）发动工作的准备在总的方面就全国范围来说还算较完备，但是不能说很够了，就我所想到的，因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准备时期对发动群众的工作有很多不够，如解决军官还要用政治手腕，只是和平的转变而没有发动斗争以群众的力量来解决，这样将来一定困难很多。

（二）只是注意空洞的政纲的宣传，仍不免是照例的工作，还需要在这个政纲之下，根据个别斗争的情形提出群众所拥护的斗争口号；

（三）关于党的前委的职权因广西地方党部弱到甚至于等于没有组织的目前，可以暂时执行其管理权，但是必定要帮助其独立的组织，决不能以军队中的党的系统代替了地方党部。此外营部就朱毛那里的经验并无设立营委的必要，只有直属支部。还有革命委员会，由政治部任委，也是在原则上说不过去的，革命委员会一定要是以各革命团体的代表组织之（即六次大会决议），关于在党内要有两重组织我不同意报告所说，我还是以为广东省委所决定的是很对，如有报告人所说的现象在党公开后一定有许多农民要求入党我们可以一方面健全党的组织，一方面加大农会的作用。兵委的组织一般的说来是对，不过职权我觉得除报告人所说的以外，应该要增加一项即是兵委对军中行政有建议权。在士兵中发展党的组织要靠谈话或其他特殊方式是不够的，虽然这些也

很必要，但是主要的还是要从斗争里看出士兵的阶级觉悟性。收缴商人的枪支只用阴谋的方法是不对的，对付豪绅的武装也是一样，必定要籍〔藉〕此扩大政治意义，必定要发动农民的斗争，以广大群众的力量来解决，专赖军事的力量也是不够的，关于土匪的收编在方法上是对的，但我们一定要公开提出我们的政纲，夺取他下层群众，以后发展的方向我很同意报告人所说。在宣传方面必定要注意到与朱毛会合的前途，但百色地处偏僻点，目前就要有这样可能当然是办不到的，但必要深入土地革命以群众的斗争推向交通便利的地方发展。目前两广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向柳州发展是可能的。对富农问题报告人曾提到一点，我觉得我们更要特别深入土地革命在斗争中去□同雇农贫农的组织以反对富农。

广东老——（一）这次广西的发动总的路线是执行了中央的指示，但在发动士兵斗争工作上注意得不很充分，士兵的哗变一定要从日常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只靠上层的线索是绝对不够的，一定要提高士兵群众的阶级觉悟性，提高他们的斗争情绪，因此我们不能不说这次发动对于士兵还是很糊涂的，还是“自上而下”的形式。（二）对左江问题我很同意刚才种祥同志所说的，特别要在此地提出反军阀战争改变待遇这些问题，以提高我们的政治影响，以揭穿士兵对李明瑞的信仰。我们在左江决不要专靠×××（虽然他是我们的同志），去发动士兵斗争，而要士兵自己起来作积极的斗争，只有士兵自己起来的斗争，才不会被改组派利用去！（三）在执行工作方面过去的确有许多缺点，只注意和平空洞的宣传，而不能提出工人群众所拥护的政纲，士兵的斗争也不能与罢工运动取到联系，对农民运动也是一样，一定要

转变其为土地革命而斗争，一定是限于反对苛捐杂税，且要实行抗租的斗争，并且一定要使这一斗争与反对军阀联系起来，以他们切身所感到的痛苦来号召。在广西反军阀战争的斗争是极容易发动，虽然我们目前在农村并无党的组织，但我们也应以士兵委员会来帮助这种斗争，这种帮助仅限于杀土豪劣绅还是不对的，还要帮助建立他们的组织，以作斗争的中心领导。（四）这个区域较任何省份还要困难，以后我们一定要发动土地革命，改变红军的基础，在正确策略下来推动群众斗争，向遏困的百色区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以期我们的向目的地推动能得到群众的掩护。（五）对改良的斗争必要加紧，正因为改组派在左江一带还笼罩着许多幻想，更值得我们加紧揭穿改良主义对群众的欺骗，对革命的危险性以使群众的信仰心能转变过来。因此我们要重复的申述一下，对李明瑞绝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他斗争，加紧在群众中宣布其军阀的罪恶，加紧左江的下层群众的工作，以群众的力量来赶跑他，决无所谓暂时与他合作。（六）反帝的工作一定要加紧，在左右〈江〉一带教堂“外国人”虽不多，但是同样也是受帝国主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侵略，同时左右江又是与安南毗连，这个斗争如果能与安南的斗争取得联系，这更有意义。（七）应加紧巡视工作，在巡视中去健全地方党部的组织。（八）一定要建立敌人军队中的士兵工作，这个工作不应专是广西特委要注意，而且已经转变的红军本身也应注意。主要还是以红军的行动去影响他们的下层群众，有计划的组织兵变，不仅使其不打红军，而且要投入红军中来。（九）土匪如能接受并实行我们党的政纲，在农村中实行游击，当然可以无条件的收编；若是只

图升官发财的土匪，我们收编过来不仅是靠不住的，而且对于我们的行动有许多不利，增加了我们的危险！我们对这样的土匪，决不能马上就收编他，一定要加紧对下层群众的工作，发动其群众斗争，以渐次的除掉他的流氓无组织性，以及渐次的能在我们政治影响下，造成日后改编的前途。

（十）对于已经转为红军中的老兵十分坏的尚不改其对红军的行动不利的旧习惯，应当撤换之，如尚能留在军中的也应特别加紧其政治训练，在斗争中去注意发动其斗争的热情。

（十一）对富农我们一定要有坚决的态度，在组织上应驱逐富农出农会，特别是党和苏维埃的组织中，在农村中加强雇农贫农的组织，红军里，赤卫队中更毫无疑问的要排除富农的影响存在。（十二）党的组织要使其能有普遍平衡的发展，使其能成为群众斗争领导的核心。在组织上在斗争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城市的工人阶级，在农村中一定要健全雇农的领导，在红军中的组织也一样的要严密，一定不只是用和平的宣传方面去发展同志，主要还是要从斗争中去吸收同志。还有在军队中必定要加紧支部的工作，经过支部以提高兵士同志的政治兴趣。在左右江只是一般的宣传刊物还不够，一定要能设立一种党报，以及党对工农运动的专门刊物。

奥洋——（一）在群众斗争并不甚发展的广西，能发动一次这样有意义的兵变，而且在转变以前还有这样周详的准备工作，这就全国的范围来说，是很难得的。还可惜这次的转变不是由士兵群众斗争生长出来，而只因为客观条件的促成，由“自上而下”的方式和平的转变，这种转变只是在目前的广西能够得到这样好的成效，如拿到其他各省来，则不免要碰到许多行不通的困难。（二）关于策略问题，第一、

一定要有鲜明的旗帜，明显的政治面目，把所有的在我们影响下的武装都编成红军，提出具体的斗争纲领，必要把建立群众斗争当为主要工作，而且要自下而上的去发动工作，不要专靠军事力量来发动。第二、在农村则应组织雇农工会，使乡村斗争能集中在雇农的领导以期斗争能深入，必然使群众能明了土地的意义，必要在农民日常斗争中，把农民切身的痛苦与党的政治任务紧相联系起来；第三、反国民党的斗争中特别要注意反改组派，如对李明瑞问题还执行得不坚决，还对他有幻想，结果将逃不脱会为他出卖。第四，肃清反动武装以〔从〕各方面说来都很必要，但我们不能常用军事阴谋的方法，而是要扩大群众的影响，要以群众的力量来解决他。第五、红军的本身应注意改善其成份，一定要注意新兵的工作，渐次的淘汰无用的老兵；第六、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主要的要有进攻的、保守割据都是死路，一定要避免条件不成熟的攻坚和打硬仗，发展的方向应向交通要道敌人统治动摇群众斗争较发展的地方，不要死板的把集中与分散的策略对立，应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活泼的运用，并能起互相配合的作用。第七、给养问题，如只靠收鸦片烟税来维持，这是很不够的，应从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上来想办法，应要公开的征收，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士兵的薪饷应走到废除的前途；为要巩固红军的基础也应这样，应要使士兵群众彻底地了解红军的政治任务，应杜绝雇佣化的错误观念，以走向士兵真正得到解放的前途。（三）组织问题，我一般的同意报告人所说。不过我以为党的组织决不能包括群众的组织，党只能在群众组织中起核心的领导作用，兵委一定使之在各级都能健全起来，在目前兵委还有很大的作用，还应相

当的提高士兵民主化，以影响敌人的军队，党的组织决不能与群众组织混合在一起，应加强群众的组织，这样才不会发生如报告人所说的现象——红军所到地所有的工农都要求入党。（四）对左江问题以及土匪的收编，主要的路线还是要加紧夺取其下层群众工作，使其能在组织上质量上得到正确的转变，决不能只注意与其领袖之合作。

广东老——（一）对右江的工作，第一、一定要毫不迟疑的很快的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财产，很快的建立苏维埃，以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纲。第二、在农村中加紧农民的斗争，在军队中加强政治教育，杜绝雇佣化的恶习惯。（二）一定要加紧推动工人的斗争，以适应全国总的政治任务。（三）发展的方向一定是向桂平一带，并且即刻加紧在敌人军中如张发奎部队的下层士兵工作，以红军的行动去影响他们。（四）解决反动武装决不能仅仅只有军事的力量，应该要用群众的力量。而在左江我们马上应在下层士兵群众中，建立我们经常的工作，要加紧发动左江工农群众的斗争，加强工农会的组织。以作将来转变的基础。（六）我觉得鸦片要一定不能再用税收方法，而且靠这笔钱来给养红军，对于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坏，一定要有没收的前途。

报告人——听了同志们的发言以后，我有几点要补充说明：（一）发动群众的路线，在这次转变中是注意到的，不过还不充分，因此影响我们的基础不很坚固，这是事实。不过我们这次也并不是完全是自上而下的用命令主义专靠军事力量来转变，而好些工作还是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干，如东兰攻城很显然是群众自己起来的一次暴动，而且这次转变也是曾经过士兵代表大会的讨论和决定才执行。不过群众工作做

得不完备这是事实，尤其是军队中差不多所有的工作都是自上而下的执行，当然其所以不能执行是有客观困难的情形存在着。（如我们的军队在未转变前在南宁无餉如我们也自下而上的发动斗争，这根本是自己折自己的烂污！）

（二）目前红军前委决未包办党，如在右江就有右江工作委员会，一切地方党部的工作当然集中右江工作委员会，前委不过加重其政治上的指示，当然红军所到的地方，如地方党部很弱或甚至于没有地方党部，前委当然可以帮助工作，但主要的还是要帮助其建立独立工作的系统。

（三）军中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系统，营设营委是广东省委的指示，就目前我们那边的情形看来设立营委是很必要，因此觉得用不着变更。

（四）革命委员会由政治部委任，只是指根本没有群众斗争和没有群众组织的地方，因为不然，这将无法来维持这个政权，决不能专等到群众起来才建立。

（五）我在报告中所提到的“两重组织”并不是同志们在发言中所说到的“两重组织”，我们的意（思）是说党在广泛吸收党员之下，一定要特别注意团结活动在党的工作的周围，而并不是指党内应该要有两个组织，一个大组织一个小组织——如果是这样当然不对，也许我在报告中说明不够，特此补充说明。

（六）兵委的权限问题，觉得我们初转变的军队不能象朱毛红军中那样扩大，如果不然必定会发生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这是有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

（七）收缴反动武装（如商团等），在我们那样的情形，只能用我报告中所说到的那样的军事阴谋方法，因为不

是这样必不能得到效果（因为如预先使伪〔其〕知道他们必定带着枪跑）当然这种方法只能在相当情形之下试用一两次，而且这样作了以后，我们也曾对群众扩大宣传，使群众了解我们的行动。

（八）我们收编土匪，并不是如军阀式的“招安”，主要的还是派人到土匪中去发动其下层群众的工作，加紧对政纲的宣传，如我们已有工作基础，土匪已能接受并执行我们政纲，这样的土匪当可收编。

（九）对富农问题我以为一定要坚决，富农实际已走上反革命的路途，在我的报告中已提到，当然应加紧与之作无情的斗争，事实上这种斗争必能得到广大雇农群众的拥护。

（十）对工人运动我们曾极力的注意，在工会成立时，我们相当的提出了切合于工人切身利益的斗争纲领，并号召同业工人罢工一日以扩大政治影响。

（十一）废除新饷的问题，曾在士兵代表会议上有初步的解释，但是我们在初转变时，还不是立即废除。

（十二）改造红军当然成为最重要的任务，我们为要保持我们的战斗力，也要使这个任务能够完成。老兵为要保全目前的实力，尚不能完全淘汰，还需要分到新兵队伍中去训练新兵，当然其十分不可靠的不可训练的，应该撤裁。

（十三）工作要互相配合，不仅只是苏维埃区而且要深及白色区，必定要红色区与白色区的工作能互相配合，才是我们发展至好的条件。

（十四）派人到敌人军队中工作问题，以及要使这个工作能与红军的行动取得联系，这些在目前都很需要，但是要

真能起很大的作用则较困难，当然我们应该要求特委经常的注意到。

（十五）有同志提出要扩大我们党的宣传，要专办一个党的刊物，这些都是很对，但是我们目前并不是不这样做，主要的还是人才上和材料供给上多方面感到困难。

（十六）经济问题的解决，我以为一定要能抓着当地的情形而言，右江方面主要经济的来源还是鸦片还不在于税收，而且商品流通交换上都建筑在鸦片上。我们如果马上就做到没收鸦片则我们在经济上，日用商品供给上一定要发生很大的恐慌，当然这个没收的鸦片决不能拿来卖，也不可能拿出来卖，而且就是这样做也未必能杜绝民众对鸦片烟的嗜好，鸦片烟还是从其他处可以运卖。因此我们目前还是重其税务，当然我们还应做反鸦片烟的宣传。

（十七）左江工作，主要还是要加强我们主观的力量下层的群众工作，我们已注意到，已从右江派遣人到左江，尚待转变的军队中及群众中。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左江是急于要转变的，究竟是不是说一定要等到群众有强固的基础才转变，这是值得我们要估计。对李明瑞我们当然不好怎样还存有幻想，但是现在，在左江我们主观的力量还不够赶走他，而以为暂时利用他的线索去发动其下层群众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主要的要发动下层群众工作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

（十八）农民群众的组织，在左右江一带都没有较好的发展，发展多呈不平衡形势。当然地方党部没有很好的帮助，也是客观困难条件之一，我们以后的工作应该针对着这些困难这些缺点。

三、结 论

浩——听了报告人的报告和最后的答复，听了各同志在讨论中的发言，特将这问题结束于下：

广西在进行此次的转变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用军事阴谋利用×××的线索派人到反动军队中去作了两个多月的准备工作一直到揭起红旗，第二个时期是在转变成红军以后。在第一个时期中有许多困难点，第一是利用上层的线索去发动斗争士兵中并无基础，这样使我们不能战胜许多困难；第二是同志到里面去做工〈作〉，大多是半公开的，这样必然要在工作上发生很大的障碍，因为使反动军官知道，好些工作都不能推动；第三是地方党部没有基础，因此群众斗争还不能怎样发展，虽然如此，然而也有许多便于这次发动的优胜条件，第一是俞作柏失败，军阀战争还继续；第二是群众斗争有相当的发展，教导队和第三营之自发兵变，东兰农民经过四年来艰苦的斗争以及平马、南林〔宁〕一带的工农群众都有相当的组织，所有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转变的绝好条件；因此，所以能容许我们“自上而下”的预备两月就得到很大的成效，这种转变的方式如在除广西以外的地方，都会碰到行不通的困难，在这个时期中对群众工作，党的确注意得不很充分，所以一直到转变的时候群众的基础还不巩固。在第二个时期的困难点大都是第一个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群众的根基还是不稳固，还是存留有军事阴谋的残余。不过在这时期也同样有利便于我们发展的条件，第一，军阀战争还是继续其混战的形势；第二、群众经

过百色工作以后，将较前时期更为深入；第三，现在已有转变过来的红军，这种影响必然加大，必定可以影响广西的其他军阀军队以及群众斗争，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些便利于我们发展的特殊条件来战胜遗留在第二时期的许多困难。同时我们应该要了解，这一时期还不能怎样乐观，还是革命与反革命艰苦斗争的时候。因为广西是适合于革命的发展，也适合于反革命势力的生存，反革命的势力为要夺取左右江的富源，定会合力向我们反攻，同时给养上也会发生许多大的困难，假使我们的策略运用得不好，内在和外来的危机必然加深，这是值得我们很严重的注意。

总的形势大致如上所说，对于以后的工作布置，总括各同志的意见可分为三项：

(一)属于政治方面的：

1、应该注意政纲的宣传，应在揭起红旗的头一分钟就要宣布我们要执行的政纲，当然政纲只是宣布还不够，主要的还是要能得到群众的拥护，要以群众的力量来推动政纲的执行，因此我们必要在政纲下面提出对个别问题的斗争口号，而这些口号必要以切合于当地群众的切身要求为原则。

2、对国民党和改组派的斗争应特别加紧——这个工作在目前的左右江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的基础还并未稳固，群众对国民党以至于改组派的幻想，少部分仍存在着。特别是改组派在失败之余，必然更会向群众大施其改良欺骗的阴谋，以企图利用群众以完全〔成〕其死灰复燃的野心，这样一来，这个工作更值得我们严重来注意了，我们一定要向群众宣布国民党和改组派欺骗群众残害群众的罪状，我们一定要把国民党和改组派存留在群众中的幻想扫除。

3、目前党的二大任务的执行应加紧——关于第一个任务武装保卫苏联，无疑的在目前政治形势之下，无论在世界革命上站在中国革命的观点上都成为最迫切的要执行，在左右江虽然从报告人说曾在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那日举行了一次庆祝大会，但是仍不免是〈自〉上而下的照例工作，并没有把拥护苏联的国际意义，拥护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进攻苏联的事实（武装的挑衅与政治上的造谣）向群众宣布，使群众自动的来认识苏联。关于第二个任务，反军阀战争的执行也应该要特别加紧，广西是军阀混战的区域，这种混战之给予工农兵劳苦群众的痛苦，当然至大且深，因此这个口号也特别容易吸引群众的拥护。对于这个任务绝不仅是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要煽动兵士不去为军阀当炮灰，要以群众的暴动来破坏军阀战争的后方前线。

4、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问题——苏维埃政权一定要经过工农兵群众大会的选举，党只在选举大会中起核心领导作用，因此苏维埃绝不是几个群众的代表所组织，也非谓设临时和秘密。至于革命委员会是过渡时期的一个临时政权，他也不是由军队中的政治部可以委任的，而是各革命群众团体的代表（军队也是参加政权的一分子）所组织，在他承认以后即应宣传鼓动，筹划正式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等到经过群众大会成立这个正式的政权以后，革命委员会马上应将政权移交——这是总的原则。至于说在每个特殊情形之下，如在闭塞的广西一隅，在红军经过的地方，也没有群众斗争，也没有群众革命团体的组织，当然暂时可以由军中政治委员暂时代理政权执行，但是他主要的任务，还是立即挑动群众斗

争，发展群众组织，以成立正式政权或临时政权。必要这样才能使群众明了这样政权是他们自己的，才能使群众为这个政权而斗争。

5、关于工人运动——在左右江虽然真正的产业工人并不多，然而市政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却不少，因此工人运动值得我们很严重的注意，我们应该要提出结合于工人要求的斗争纲领，发动日常斗争，在斗争中去组织他们，必然有“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当然这应是群众斗争的组织，党在这里面起核心的领导作用。对黄色工会的策略，一定要根据中央最近的指示，在黄色工会中建立赤色工会的支部，这就是将来转变为赤色工会的基础，应公开的提出赤色工会的纲领，来号召揭破黄色工会的欺骗性，而夺取其下层群众。对失业工人我们应该引导他们到斗争方面来，在斗争中去组织他们，训练他们，建立我们的影响。在农村里我们应要号召建立雇农工会，这是乡村里的无产阶级，我们应该要使其在农村有单独的组织，使其成为农村斗争的中心领导。

6、农民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策略：第一、要立即开始执行没收地主的土地，当然这里所谓的执行，决不只是一道命令做得了，在未执行以前应加一番宣传煽动，使群众都明了土地的意义，为土地革命而斗争，当然这种说明土地的意义，必定要能通俗，只说明“土地是天生成的，是大家都有的，土地必要人力去耕种才有用，因此应该谁耕种就收获”，这样必能使农民了解土地是公有的，而杜绝土地私有的观念，实际上抗租就是走到“谁种谁收”的原则。还有个问题，就是在没收后一定要杜绝执行平分的现象，尤其以“西这样的经济条件，土地呈不平衡形，这种分配更得不到

彻底的解决，主要的斗争方向还是应着重在全国范围，若单就我们的这平分就算事，即是在平分中不会惹起纠纷，还是无用。此外我们一定要在实际去解决雇农也要分土地的问题，如富农能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当然这个问题容易解释，如果富农走了，这块土地在原则上也不应归雇农所有，应归苏维埃公管，这样才能练习防止土地私有的观念。

第二，对于自耕农我们一定要领导他走上斗争方面，尤其是广西自耕农多，这个工作更不容许看得忽略。我们决不仅领导他为废除苛捐杂税而斗争就够了，我们一定还要告诉他废除苛捐杂税只有在红军才可以真是这样做，废除高利贷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有可能，这样必然会使他们明了苛捐杂税是限制军阀政府的特征，高利贷是现存社会制度下的特征，必然可以很广大的吸引他们更明了这是自己的政权。

第三、富农问题目前在农村当然是最严重的问题，如他们在农村所提的口号都与我们相反（如农民斗争中所应要的五“抗”，他就除掉两“抗”），这样，必致妨碍我们的斗争，因此我们反富农的斗争一定要坚决，一定要以种种的方法来打击富农，在组织上，党更无疑义的要开除富农，因为他终究是剥削人的人，一定不能同被剥削的人群混在一起。在农会中，当然包括的较复杂，在这里面我们首先应强固雇农和贫农的领导，渐次在斗争中去肃清他。在苏维埃成立的露天群众大会上一定有富农参加，这时我们党的作用则应特别加大，在选举中决要使之不存留一点富农的影响，应提出雇农所拥护的政纲，如富农反对则以群众的力量加以制裁，使其再不敢在群众中活动。在军队中也必要严厉防止富农混入，排除富农的影响，这个路线的执行一定要能在斗争中。

第四、关于农会，在目前还不是普遍的建立苏维埃而是扩大苏维埃的宣传时期，还应集中扩大并加强其组织，以吸收广大的革命群众以作建立苏维埃的基础，即在将来苏维埃成立后，也还应保持其作用，不过这种作用在客观上被慢慢地消失。在农会中一定要排除富农的影响（尤其在广西据报告人说好些农会还留在富农领导中，应即注意转变）。从斗争中去强固雇农的领导作用；雇农在农会中应单独成立雇农小组，这就是将来雇农工会的基础。雇农工会的组织系统，一县有县雇农工会，区有区雇农工会，乡有雇农小组，县雇农工会则应加入县总工会，所以雇农实际上有两重作用，但不是与贫农离开了吗？——其实不然，雇农虽有单独的组织，但仍然还要在农会中起领导作用。第五、对于“龙头”问题应有坚决和明确的认识，南方的“龙头”，有些与北方不相同，他们虽然本身反对豪绅，但出身很复杂，仍带有封建色彩，特别是妨碍群众直接斗争。我们当然不拒绝派人到里面去工作，但必须是着重在转变和夺取他的下层群众，改变他英雄式土匪式的领导，并且还要有计划的派工农分子打进他们的部队里去，充实他的成份，以作将来转变的根基。第六、武装农民一定要有十二万分的决心，不愿武装农民或把武装农民看得比扩充红军本身的武装要次要，这统统是使红军脱离群众的错误观念。我们主要的路线是先武装农民，然后再使之集中，使农民能有“集体才能对敌”的观念，无疑义的我们应将所缴得的商团民团（即豪绅的武装）的枪支，尽量交给农民，然后再分区制编，加以训练，以使斗争时能集中。至于右江一带农民会会员要以有枪为原则这是不对的，这是妨碍了农会范围的扩大，而且这种规定实际上必减煞了

雇贫农在农会中的百分数，这是很危险的，这个工作路线应当改变，并应在改变过程中切实加以解释和宣传。

7、经济问题的解决——首先一定要认识现在红军所占领的区域是游击区，在目前只有艰苦的斗争以求发展，以求解决经济问题，还谈不上在敌人封锁下能割据一乡从事“经济建设”，因此我们的策略也必定要采用对于我们这个进攻的路线是有利的，第一、我们应立即取消苛捐杂税，即使苛捐杂税在右江一带是财富上最大的来源，我们也要取消，这样才能使广大的群众认识红军是为他们谋利益。第二、对于鸦片烟的问题，要有正确不背原则处置；鸦片烟的本身当然对于我们很不利，但是在鸦片的贩运上还存有商人的作用，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不根本取消他货物上的剥削，还可以从加重其税务方面去解决，即以税来给养军队，在目前政权还未巩固，群众对鸦片的嗜好还不能尽行消灭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强迫采取最后的手段，还应从群众本身来作反吸鸦片烟的宣传，并且这种宣传要普及全国，只是顾到右江一隅还很不够，然而如当地的工农会起来通过不吸鸦片烟有群众的基础即可在当地执行禁止鸦片烟，但是这种禁止范围还只能在禁烟群众中已有很大的影响的当地，如果贩运只是从当地经过而还不在于当地贩卖并不要扣留，还是要加重税务的方法来解决，并且要与商人订合同，要他们以其他白色区转运日用品到红色区来，这样既不背原则又暂时可以使经济流通。所以这个工作决不只是一道命令可以做得到，如果我们不去从群众本身上去作反鸦片烟的宣传，不用群众的路线来解决，即使发几道命令禁止鸦片烟，甚至于把所有的烟都拿来烧掉，群众还是莫明其妙，而且说不定还会得到反响。对商人

的态度，只是如我以上所说的，但是也不能容许他们在革命政权上还有过份的剥削，只是说明在帮助工农群众利益之下，容许他们存在。当然经济问题，能不能说就已经不成问题？——决不能，因为这个区域有便利的条件，也有危害的条件，这个区域过去是广西的财富区，在军阀统治时代不仅可以收得大批鸦片捐，其他货物捐并且还可以刮得大批杂捐、苛税，此后必然会引起军阀的注意，必然要受到军阀的摧残。保守割据绝不能成功的，所以敌人如追到百色，我们则应要到东兰，在东兰一带深入土地革命，以推向柳州方面发展，到龙州一定是死路，因为这一面要受南宁方面敌人的攻击，一面要受安南法帝国主义的牵制，这对于我们的发展前途是很不利的——在这种艰苦斗争中一定要深入土地革命，造成靠农民来给养的前途，这个前途虽然在目前是没有，但是一定要使同志们都了解。

8、宣传上的置〔措〕施——如创办党报和政权的机关报，都是很重要的，目前右江已进到建立政权的时期，这种报纸当然可以公开，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来认识党。主要的内容是指示，党的一般的策略指示，通告和散布共产主义的思想，这个工作尤其是在无产阶级很薄弱，党的组织不普遍的右江一带更为重要。

9、收编土匪的策略——一定要在下列条件之下土匪才能收编：甲、我们已在土匪部队里已有工作；乙、我们的武装力量能胜过他们；丙、有群众斗争的发展。在目前右江群众斗争还并未怎样起来，我们在土匪部队内部尚无工作，且我们的武装力量尚不见得怎样能胜过他们的时候，我们的策略应该是在第一个步骤，接受他们的要求派人去工作，公开

的向他的下层群众宣传；第二个步骤，便使他们公开的接受并执行我们的政纲，然后再走上第三步改编，改编后毫无疑问的要改变他的头目。（动摇而反动的，当然要号召群众的力量来解决他，即使其倾向我们的也应调开他，脱离他的部队，往其他部分工作），真正彻底改变其组织，使其转变成革命的力量。

10、关于少数民族的问题——A、中国南部的瑶民虽然大部分都同化了，但至少还保留着宗族观念，我们主要的要站在阶级观念上去同化他，宣传汉瑶平等待遇，发动其自决权反对汉人（是汉族的统治阶级而不是整个的汉人）的压迫，尤其要经常的注意他们生活的痛苦，号召他们起来作斗争，反对酋长的压迫，分化其内部；B、对安南我们应以斗争去影响他们的劳苦群众，号召他们对法帝国主义独立，同时应要与之取好的连〔联〕系。

11、学生运动的策略——在报告人说这个工作还未怎样开始做，只是在一个学校成立了上层的委员会，只是补助了学校的经费一千元。对学生过去党的估计是有些不正确的地方，如把学生一般的看法是民主主义的分子，这种解释是不大妥当，因为学生很容易接受改良主义的影响，而且好些对土地革命动摇，有好些分子到革命深入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动摇起来，所以我们只能说学生中有民主主义的分子，而不能把整个的学生看作是民主主义分子，因此我们的策略应该是以共产主义的宣传去影响他，去发动他的斗争情绪，去提高他们的政治兴趣，帮助他们组织革命的学生，再还有就是二中全会以为学生是工农的同盟者也很不妥当，工农同盟者只是城市贫农，决不会是整个

的学生。

（二）属于军事方面的：

关于一般的原则在第一期通讯上已有详细的记载，我不想在此再重复，我〈在〉此要说只有以下重要的几点：

1、一定要认定这是游击区，一定要经常的站在进攻的精神才有出路，而且根据右江的经济条件政治趋势也只有深入土地革命向外发展才有胜利的前途——总之一定要能认识这个斗争是很艰苦的。

2、士兵运动总的路线是发动士兵群众日常的斗争，过去对于这个工作实在太缺乏，现在应纠正，决不容许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发现。在此时期中，我们的政治路线一定要使士兵自动的来认识，在政治上和经济生活上去发动他的斗争。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定要防止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因为民主化的设施是有阶段的，在反动军队中应极力广泛宣传民主化以夺取其群众，分散其力量，在转变时期则应稍微集中民主化，到了形成红军以后则更应把民主化的范围，更应集中以保护政权，更应集中以应付敌人。现在我们还是在游击的时候，当然与政权下的红军（如苏联红军）有些不同，我们现在还在为政权而斗争，还未达到保护政权时期，为要扩大我们的影响，当还应相当的执行民主化，当然还是比将来保护政权的红军要扩大。现在右江还是才从第一个阶段进到第二个阶段，所以应该要能正确的运用民主化的策略，要提高群众政治的影响，要吸引士兵过问经济生活，因此即是〔使〕在现在我们已转变的红军中还是有许多斗争，但是党一定要在斗争中起核心的领导作用——这是发动士兵群众斗争的根本路线，自上而下的发动斗争一定会发生许多不好

处，如要发洋财的观念，都是因为我们过去在下层士兵群众中没有做到工作的主要原因，如我们从南宁一直到百色，这中间所做的转变工作都是自上而下的，带有和平转变性质，并不是由士兵斗争转变过来的，这样的转变一定要发生很多的困难。要解决这些困难：第一、在红军上发动政治斗争，以进步的分子来感化落后的分子；第二、必要废除雇佣制，转变过去雇佣的制度，执行这个工作的路线必定要使士兵群众能了解红军的意义和他本身来当红军的任务。第三、要消除老兵发洋财的思想与行动以及其他有妨碍红军行动的恶习惯，把老兵分散到各部队去渐次的来转变他，当然不能转变的只有淘汰。

3、士兵的成份在原则上应吸收贫农以及城市失业工人，但农民最好是能经过农民赤卫队的训练。

4、关于兵委的组织应要以群众为基础，组织系统连有连兵委，营有营兵委，纵队有纵队兵委，军为士兵代表大会。兵委的职权还是仿朱毛的经验：A、在不妨碍军事指挥之下进行管理士兵群众的生活。B、监督军中内部的经济生活（当然不能过于超过范围，如用了一笔款去秘密购买武器，当然不便公开的预先通知兵委）审查军队的经济；C、军中行政的建议；D、建立裁判委员会（每营一个）处决士兵群众间所发生的问题（当然小的问题可以由长官执行的，当不一定要提到裁判委员会解决）。

5、党要加紧对士兵的宣传，《士兵之友》的内容一定要从士兵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到他现在所负担的任务，并要切实使这个宣传与农民工人的斗争相联系。

6、应注意到敌人军队中去做工作，有计划的选派

忠实可靠的有煽动能力的士兵打入敌人军队中去，使敌人军队中我们能经常的工作，并要与这种工作经常的取联系，指示他们组织兵变的路线，响应红军。

7、对付旧军官一般的原则应改变，过去撤换旧军官的办法是用政治手腕，不能以群众的力量采取断然的手段，使群众对于他们的幻想不能消止，这是使我们仍基础不能巩固的主要原因之一。

8、关于红军的编制，七军是仿朱毛编制，这是对的，但军部本身人员应减少，一定要把人员多分到下级去工作，并应集中领导以便于调遣。驻地一定要能紧相联络，一定要能在极短时期中能够集中。七军目前应把军队布置在平马、百色一带，因平马、百色相距不远，所以一定要告诉负军事责任的同志把自己的兵力集中调遣以应付敌人，同时必要看自己的力量如何，如有胜利的把握当然可以攻坚，不然决不要冒险。因为我们力量的补充很困难，党的策略决不应任意把自己的力量拆散，要坚决的解决敌人的武装，在目前困难条件之下，间或要用些特殊的方法是可以的，但是这样解决以后，一定要公开的向群众宣传，说明我们这次解决敌人武装的意义，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其余关于游击战争一般的战术，我们在《军事通讯》第一期都登载了，所以我不在此地再重复说了。

9、红军发展的方向田南道，以东兰为中心深入土地革命，以与广东福建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汇合的前途，因此目前驻地也要按照这个方向决定，目前应把军队集中在平马百色一带，龙州绝不适宜驻扎，即是将来在龙州方面的军队能够转变，也应把队伍拖到靖西，以与百色兵力会合。

10、前委一定是指导军队中的政治，为军中党的最高机关，前委之下有政治部，政治部是执行前委的决议，在内训练士兵群众，在外参加群众工作。政治部也一定要是党的组织，政治工作人员一定要是党员。政治部主任与前委书记应分开。在总的原则方面营只设直属支部，无设营委的必要，但现在七军因分散游击，似乎设立营委较便于行动，也可以设立。政治委员一定需要且应开始执行其职权（与军事指挥人共同签署发表军事命令及布告），政治委员要与政治部分开（当然不是说工作上不相联系）。为能健全地方党部，特委一定要建立，前委应与之紧密联系。军队与政权的关系不应用党的名义，应用军事系统的名义，同时筹款这些事情一定要以政权为主要的名义，使群众更了然！

11、下层党的支部以连为单位，同时应经常建立连支的中心工作：如定期开会、定期召集活动分子开会，经常提高同志的政治兴趣，经常注意对外的宣传工作等等。

（三）属于地方党部方面的

1、党的成份须转变——右江一带地方党部的基础，据报告人说建立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富农分子的身上，这是很危险的，以后应该要转变，对于富农，我们应该如上面所说的原则驱逐出党。知识分子应严加训练，同时城市工人应广泛的吸收。

2、集中工农英勇同志做中心问题——当然并不是党内应有两重组织所能解决，应该仿效过去平浏的经验，一方面就已加入的党员当中训练其中心分子出来，一方面加强农会的组织，把群众重心移到农会中去，因此，党的组织党的指导一定要是秘密的，党的组织决不应与群众的组织相混合使

农民加入农会，不使通通跑来找党。

3、应注意中心区域中心工作的配合，加强地方党部的组织和领导，加紧巡视工作。

4、干部的调动与训练——第一要办训练班训练党的工作的干部人才，再由这些党的干部去经常的在各级进行下层流动训练班去训练党的干部，在斗争中去切实训练他们。第二应有计划的调动同志到其他区域去工作使各地工作经验能相互交换。

5、秘密工作的建立——我们虽然在公开环境中应要建立党的经常秘密工作，保障党的秘密基础，以免于红军退后党的工作基础就根本塌台！同时地方党部还应在秘密情况下与军中前委、特委发生密切的联系。

6、经费问题——地方党部一定不能只是仰给于红军的帮助，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11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 转七军前委的指示

(1930年3月2日)

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

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

I、全国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

1、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更加深刻。

目前政治形势最严重的一点，就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更加深刻，帝国主义为要迅速爆发并顺利的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解决他们的内部所包涵的矛盾，必定要先从进攻拥有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的第一个工人的祖国苏联着手，特别是苏联的经济建设在各帝国主义包围中一天天的发展，苏联的政治影响在西方的无产阶级和东方的被压迫劳苦群众中一天天的扩大，更给帝国主义以无限的威吓，更使帝国主义不得不加重进攻苏联的决心，所以杨格计划的实行，英相麦克唐纳尔的赴美，帝国主义国家武装的增加，太平洋会议

的召集，驱使罗马尼亚与波兰不断的向苏联挑战，在阿富汗原来接近苏联的政府被英帝国主义压下来，一直到嗾使中国国民党用强盗式的手段夺取中东路，实行把兵力侵入苏联境界，都是表现他们进攻苏联的一贯政策，虽然在进攻苏联和攫取殖民地的分赃问题上表示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更加来得尖锐，来得复杂。但是国际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更要来得剧烈，是很明显的了！所以自中东路问题发生以后，各帝国主义的直接行动越发加剧，日本增派驻满军队，在沈阳、满州、宽城子各地以及南满沿线各站加筑炮台和大规模的营房，英国把握着长江珠江两流域的航行权，加派军舰、海陆军来华，供给国民政府以海军人材及炮舰材料，在下院讨论英帝国“对此问题应采的行动，以及英国扩张在华航空特权，增派大批巡洋舰及海陆军来华，在“非战公约”欺骗口号之下，号召法、意、德等帝国主义向苏联提出命令式的劝告，以图制止苏联在他们一致武力进攻之下的防御抵抗，都是很明显的例证。现在中东路的问题在表面上虽已经成立了伯力的谈判，然而这决不是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态度和缓了，这只是苏联和平政策的胜利，与进攻苏联的结果，引起了帝国主义之间、中国强盗军阀之间都发生更剧烈的矛盾，而成立了暂时的协定。所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危机，绝不会因“伯力协定”而有丝毫的和缓，反之，帝国主义更会因此感到苏联前途发展的可怕，更要加紧其对苏联的武装进攻！目前南京就已再三△反对伯力条约，就是一个明证。总之，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决不是历史上的国与国间的战争，而是全世界资产阶级统率着各殖民地的统治阶级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着殖民地的劳苦群众的一次人

类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残酷的阶级战争。这次战争的危机，决不会有和缓的可能。这次战争的胜负，是取决于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所以帝国主义一面进攻苏联，一面还是要不断的镇压本国无产阶级的骚扰和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兴起，这样，必然会引起全世界劳苦群众更强烈的反抗，更深一层认识苏联是他们的领导者，这样更可以断定进攻苏联的战争的爆发，必然要引起全世界革命高潮的爆发，必然要将帝国主义的统治送到他自己挖掘的坟墓中去。

2、帝国主义之间分割殖民地特别是瓜分中国的矛盾日益尖锐。

帝国主义国家因为生产过剩增加了抢夺市场的需要。因此帝国主义之间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冲突，必然的日益尖锐，且必不可免的要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现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小的问题上都表现出来，特别是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表现的事实，现在又重演起来。杨格计划之实行，太平洋会议之召集，以及最近的伦敦海军会议，一面固然是包含得有对付苏联的问题，一面却充分表示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之尖锐，这些都不过是帝国主义在战前必要的手续上的工作。其实，国际联盟完全是英法的御用机关，帝国主义列强积极准备战争的工具，凯洛格公约正式成为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之一种企图。帝国主义国家军备之无限制的增加，新的政治同盟、军事同盟之缔结，以及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军阀战争积极在中国作军事的布置（如美国占有航空，英国夺取海军，日本在山东、满洲扩大其自由驻兵的范围等），使中国成了爆发帝国主义大战的主要区域之一。这些事实都证明了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接

近，这次战争较第一次要更残酷。这次战争的背影最主要是隐藏着英美间争世界霸权，以及美日间争太平洋的霸权的剧烈冲突，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及其集团间的主要矛盾相互纵错的表现出来。在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加紧准备期中，各国社会民主党成了最忠实最积极的工具，他积极的帮助了帝国主义作战争的准备，他更积极的压迫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的革命斗争，完成了“社会法西斯帝〔蒂〕”的任务。尤其可耻的是所谓“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想以和平的假面具来掩饰战争的准备工作，想重演一次第二国际在第一次大战中欺骗群众的故技。

3、全国军阀战争的局面更形混乱加速了统治阶级的危机。

目前政治上第二个中心问题，便是全国军阀战争一天天扩大了，全国军阀混战决不会因为进攻苏联的一致而停止的，虽然各派军阀都企图在一致进攻苏联的一致的口号之下来和缓或减弱对方的反对与冲突，来发展自己方面的势力，可是正因为这样更加深了军阀混战的危机。因为军阀战争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统治阶级争夺反革命的领导权的矛盾，军阀制度的存在三大原因（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的反映）所反映出来，欲消灭军阀战争，只有根本毁灭这三大原因。国民党各派军阀的一致进攻苏联决不会毁灭这三大原因，正因为他们都想争取进攻苏联的优先利益和领导权，都想在进攻苏联口号之下来各自扩大地盘，各自扩大势力，必然使这三大原因更加着重。当然决不说因为他们内部的冲突而减弱进攻苏联的一致，正相反，他们将会因为内战的加紧，更只有从进攻苏联的战争上来博得帝国主义的

欢心，取得帝国主义的帮助，更只有从进攻苏联的战争上散布其“爱国主义”的欺骗宣传，以转移群众的视线掩饰自己的罪过，更只有从进攻苏联的战争上来争取反革命的领导，来表示自己是进攻苏联的急先锋，来相互的指责对方“攻俄不力”！所以目前军阀战争，就在上述形式之下更加混乱起来，蒋介石自从迎合帝国主义的意旨揭出进攻苏联的旗帜，企图领导其他军阀“对俄”，以减弱其他军阀对自己的反对以来，事实上这种聪明如意的算盘，并未能完全打通。当然在“进攻苏联”这一点，是得到各帝国主义的嘉奖的。但是到底蒋介石是特别对美献媚，而要在进攻苏联的口号之下伸其势力到北方，这就根本与日本在北方的势力相矛盾了！所以在蒋介石这个计划还未实现之前，日帝国主义就指使其走狗冯系军阀实行向河南进攻了。这一战争虽然因反蒋各军阀派别本身的矛盾和日英帝国因蒋介石一再让步在当时尚未能坚决一致倒蒋而使蒋介石在形式上仿佛得到胜利，然而实际上的胜利还是归于在日本帝国主义豢养下的唐生智、阎锡山等其他军阀。在另一方面英帝国主义也随之唆使其走狗桂系军阀和改组派——李宗仁、汪精卫、张发奎等，以“蒋介石攻俄不力”为名进行夺取两广及南京政府的战争，使蒋介石在北方不得不接受阎锡山的武装调停与冯系军阀停战，而来抽暇应付两广，同时蒋介石也正因为这样更要向日帝国主义表示让步，让张学良在日本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单独与苏联进行武装谈判，而使日帝国主义在进攻苏联上得到优先利益。然而这决不能和缓在日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各个军阀与在英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蒋系南京政府的根本利益上冲突，所以在蒋介石正调兵遣将，大举南下讨伐李、张之际，而唐生智、

石友三等又在日帝国主义嗾使之下乘虚举兵豫、皖以企图进攻南京，以争夺反革命的领导权了！现在两广战争虽然因新旧桂系与改组派之间的地盘之争，和蒋介石以二十架飞机，十五只军舰、六十团大兵，大批毒瓦斯挫丧了张发奎军的锐气而暂时表现南京政府的胜利，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以阎锡山为首的北方反蒋各势力，蒋介石是无法消灭。唐生智之自动下野，石友三的暂时表示服从中央，并不是蒋系的南京政府不费一兵一卒之力又取得胜利，而是北方反蒋各军阀的缓兵之计，以武装调停来拒绝蒋介石的兵力侵入北方。至于老奸巨滑的阎锡山已亲自从太原到了郑州，一方面以四师兵力向东南进逼，一方面仍以“和平解决国是”为护符，邀同另一些北方有力的军阀张学良等发出气焰逼人的通电。这个通电发表只是表示军阀战争的局面更是扩大，已经把整个北方以及东三省的大小军阀都转入战争的漩涡，从番禺到沈阳，从珠江至白河两岸都将变成军阀混战的屠场！

最近异常紧张的蒋阎战争已在津浦、陇海两线密布着战云，阎老西已准备在北京成立政府，是战争下笼罩着更凶恶的危机。福建的军阀混战已逐渐爆发起来，两广的战争始终是维持着发展，从此全国进到更混乱的局面，连过去蒋介石的虚伪统一和平的南京政府的假面具都已经打得粉碎，任何一派军阀都不能统一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只有日益扩大，蒋介石的倒台与否，并不能成为战争继续与否的中心问题，要消灭军阀混战，只有革命高潮的到来。

4、两广混战的形势完全是全国军阀混战的缩影。

两广军阀战争直到现在还未告一段落，这一战争自然同样是受帝国主义的操纵与指使，他同样包含得有英美争世界

霸权的矛盾，现在战争的形势，自张、桂军从广东败退以后，广东军即乘胜入桂，蒋介石亦用很猛烈的兵力来协助攻桂，但因广东的两陈有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故对桂处置并不能一致，蒋介石是主张彻底解决张、桂军，有以朱绍良任桂省主席说，陈济棠则主对桂军妥协而仅消灭张军，这当然是拒绝蒋介石势力在两广发展的策略，蒋介石因北方问题的紧张，亦不能不对陈济棠的主张让步，另一方面张、桂军在暂时因为共同敌人的关系，更不能不勉相结合以准备第二次的混战，同时广东军的不一致不但不易消灭张、桂军，而且即能消灭，两陈马上必爆发战争，一样的张、桂军万一打下广东，张、桂军必然要爆发争夺广东的战争，因此，两广的混战绝不会有所停止，反之，只有更加延长与扩大。

5、客观的事实充分证明目前革命形势的复兴已经走上革命高潮的前夜。

目前全国各部分的事实证明中国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一方面军阀混战的局面只有延长与扩大，其背后隐藏着帝国主义的剧烈冲突，与世界第二次大战的危机，反苏联的冒险政策引起了一切矛盾的剧烈与复杂化；国民党一切建设废约等欺骗群众的把戏，完全破产，揭露于广大群众之前；全国的工业、农业的衰败与危机只有日益延长而深入，反之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在全国都在发展与扩大。另一方面因为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的生活日益恶化，引起了不断的群众斗争，而且这些斗争已成“平衡发展”的趋势：第一，工人阶级因帝国主义的压迫与资本的进攻，失业的大批增加，工资的更加减少，工作时间的更加延长，尤其是中国资产阶级为了与帝国主义商品竞争，更只有加紧剥削工人群众

众，因此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日益增长，不仅很快的转向政治斗争而且很快的走上武装冲突。上海数月来的大小百余次的罢工，景德镇的二十万工人罢工，北平人力车夫的大骚扰以至于演成极剧烈的巷战，汉口裕源纱厂的工人驱逐军队，青岛纱厂工人的与日本水兵及中国军队搏战，唐山近日又爆发了伟大的罢工，以及武汉、天津、香港、广州，这些中心区域的工人斗争的加剧，都不是偶然的事实，而是因为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既不能有丝毫真正的政治、经济的让步，因此改良主义也减少了他的效能，遇到了群众的斗争只有仰赖于武力的压迫，当然压迫越凶，群众的斗争越易走上武装冲突等。全国范围的农村斗争也日益加紧起来，农民群众因忍受不住地方豪绅残酷的剥削和军阀战争的惨祸，只有斗争是他们的出路。所以农民自发抗租抗税的斗争无论在南方在北方都极其普遍，游击战争的区域继续扩大，农民武装的斗争更加深入，农村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更是普遍了斗争区域，土匪、神兵、大刀会、红枪会的自发骚扰，更是满布在全国各地。第三〔二〕、红军的发展也非常迅速，不独存在两年有斗争历史的朱毛部队，彭、黄部队，贺龙部队统治阶级无法使之消灭且日益扩大其战斗力，而且赣西南、赣东北、湘西、鄂西、鄂东北、豫东南、皖西等区域都有新的发展。最近你们又在广西西部竖立了红旗。第四〔三〕，全国的兵士群众也一天天地倾向革命化，兵变的呼声已普遍到全国，军阀们从工农群众血汗里所收〔搜〕括的千百万编遣公债并不能用来改善士兵的生活，特别是军阀战争的继续延长，更使士兵沦入不堪设想的痛苦的深渊。所以士兵斗争的情绪也随着他生活的痛苦而日益增加，继续不断的在鄂西的

熊师，九江的王均部，芜湖的鲍形部，湘西的吴尚、周瀚部，安庆、埔口、蚌埠的石友三部、上海的熊式辉部，汉口的刘峙部发动有组织的兵变，这些兵变虽然有许多并不是革命的领导，然而总可以证明统治阶级也在很剧烈的崩溃和兵士群众政治觉悟的加速。第五〔四〕，中下层小资产阶级也因全国的混乱而更动摇，城市贫民更一天天的走上革命；学生群众更广泛的恢复其革命的情绪，哈尔滨的反帝示威运动，上海的许多示威游行都有广大的学生群众参加，城市反帝国运动更渐渐的复兴，所有这些事实无一不在说明统治阶级已是日益走向奔〔崩〕溃的道路，另一方面，革命形势特别是职工运动的复兴是进展到革命高潮的前夜。

6、红军第七军的出现虽在偏僻的广西并不能减低他伟大的作用与意义。

红军第七军是在上述全国客观条件之下产生出来的，是在广西群众斗争的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他虽然出现于偏僻的广西，暂时对全国尚没有其他各部分红军那样大的影响，但他在全国政治上同样有极伟大的意义，他同样是发展游击战争摧毁统治阶级促进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在他的发展前途上有严重的作用与意义，他的发展很快可以影响到全国。同时红军第七军的出现更加证明全国革命形势是在日益走向革命高潮之分析是正确的。

7、目前党的任务是在有组织的配合并扩大各部分的斗争促进革命高潮以执行武装保护苏联，反军阀战争，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加紧争取群众的工作，并要使各部分群众斗争有组织的配合起来，扩大各

部分群众的斗争，必须使工人的经济与政治的斗争配合起来，尤要注意政治罢工的发展，有计划的去组织同一产业、同一职业的同盟罢工，同时加紧赤色工会与工厂委员会的工作，推翻政府工会、黄色工会；必须注意扩大游击战争、扩大红军深入土地革命，组织兵变，组织地方暴动，最大限度的武装群众，必须加强反军阀战争、反国民党任何一派的工作，坚决使“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口号成为广大群众的要求，加紧反帝国主义、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宣传。这一宣传并须与各国革命运动的事实联系起来，加紧反改良主义的宣传和斗争，要坚决认改良主义是目前革命最严重的敌人。只有这样，才能执行反军阀战争，武装保护苏联，以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准备革命高潮的主要任务。

8、在执行这一主要任务中必须加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与反对尾巴主义反对取消派的工作。

在这样的客观条件和执行党的重大任务之下，党及无产阶级的领导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成了党的最主要议程。因此必须坚决的反对尾巴主义、反对取消派——机会主义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工作。尾巴主义的结果不但不能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且必然脱离群众、出卖群众、取消派更已成了统治阶级消灭群众斗争最得力的工具，已经公开的变成了工贼。只有坚决的反尾巴主义，彻底肃清取消派才能握紧党的领导与保证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Ⅱ、对于过去工作应有的认识

1、第一阶段的主要缺点是仍未能将士兵运动当作最中心的工作。

我们到军阀军队中工作，最主要的工作是发展士兵运动这是毫无疑问的。广西军委在第一阶段中（即南宁时代）的确对于士兵运动没有多大成绩，且系由军官来作兵运的方式，兵运的工作并没有深入。固然这还有兵运人〈才〉的缺乏，地方党部没有帮助，在军中工作人多担任了公开的职务要忙于应付公开的工作等原因。但军委本身仍未能将兵运看作最中心的工作的确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教导队的事件便是很明显的例证。

2、第二阶段中虽然已经注意到发动群众的路线，但仍余留了不少第一阶段工作的残余方式。

离开南宁到百色后，你们在策略开始转变到正确的道路，坚决的提出了反国民党与短期转变作游击战争的路线。但在实行中虽然已经注意到一切工作向着群众，然执行得极不充分，工作方式还余留了不少第一阶段的残余，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工作，极大部分是采用由上而下方式。许多主要的改变没有使之成为士兵群众的普遍要求，但凭一纸命令来执行，更没有注意到发动士兵的斗争来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即在驱逐反动长官的问题上也没有采用由上而下的斗争方式，但是由上而下的政治手腕或军事阴谋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绝不否认在初期到右江的动摇时期，可以采用由上而下的军事阴谋与政治手腕，但仅仅这样就非常不够。这样仅是一

种和平的转变，不能使士兵群众感受到一种刺激而深刻的感到红军的成立是他们从斗争中得来的，增加其拥护红军的决心。过去你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红军第七军的基础现在仍极不巩固。

3、在工作无基础之下，俞、李的失败与军阀战争的继续，给予了你们转变最大的帮助。

在七军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深刻的认识，在过去工作的错误与群众工作无多大的基础之下，要是俞、李不失败，你们一定得不到现在这样的结果，且有陷入很深错误的危险。要不是军阀战争的继续，你们在动摇的时期必不能抵抗敌人的进攻而有瓦解的可能，更无余力来发展整顿自己的力量。这一点帮助我们对于过去的认识有很严重的意义，每一个同志都应了解没有强健的士兵运动基础，只有几个上层的军官是于我们的工作很难有顺利的前进的。如果不改变过来，将来必然要遇到很大的危机。

4、和平的转变不能当作一般的原则，且包含有很多将来工作的困难。

因此，每个同志都要认识，和平的转变，绝不能当作一般的原则来运用。只有斗争才能创造很强的基础，没有斗争绝不能创造坚固的基础。就是你们现在已经转变过来了仍要严重的指出你们的基础不是巩固的，仍然有受敌人运动发生兵变等事件的可能。你们必须继续加紧士兵的教育，以及红军的改造工作，提高士兵群众向外斗争的情绪，只有经过如此的艰苦工作才能补救基础不巩固的危机。

Ⅲ、以后工作的主要路线

1、扩大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是最主要的路线。

红军在现在的任务最主要的是扩大游击战争与深入土地革命，一定要了解只有向外发展才能解决红军的一切困难、才能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只有坚决的执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彻底肃清乡村中的封建基础，才能掀起广大群众的斗争勇气，才能引导他们为土地为政权而斗争。红军亦才能在广大群众的斗争情绪之下求得存在与发展。右江的群众斗争尚停留在反豪绅阶级上，仅有极少地方开始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工作，且大都为富农所领导，如果不马上作深入土地革命的工作，必然会使群众的情绪低落，东□在打倒豪绅之后，群众感到没有事做，勇气忽然低降，是很明显的例证。你们必须严重的注意到这一主要路线之执行。

2、游击区域的工作仍然是斗争的路线，在一切问题的解决上必须联系到将来的前途。

因为中国统治阶级的矛盾与地理上的便利，可以使有些苏维埃区域可以得到相当的时期的存在。所以在许多区域发生了“保守”观念的严重问题，如各地的事实证明了保守观念的存在必然使苏维埃区域遭受失败的结果，我们必须了解想在很小的范围内求得长期的存在或者幻想实现社会主义的建设这是绝不可能的。只有斗争，只有扩大到一省几省或全国政权时才有这样的可能。这一前提必须坚定的认识，不然，必很易跟着农民的保守观念跑而走向失败。游击区域的党必须在一切问题上打破农民的保守观念，鼓起他们向外发

展的斗争勇气，一切问题的解决与宣传必须联系到将来胜利的前途。

3、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但须坚决反对烧杀政策。

彻底摧毁封建势力是在民权革命阶段中最中心的任务，红军众的工作，其结果群众固然是觉得红军好而存依赖的观念，但到了红军没在时群众便不敢起来。同时苏维埃和工会亦很易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只凭由上面的命令，而忽略由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拥护这一工作。这些非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必然发展苏维埃政权的危机，使之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来拥护与巩固。由下而上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右江过去执行得极不充分，以后必须严重的注意到。

6、建立苏维埃政权，应使苏维埃政权建筑在广大群众的信仰上。

苏维埃政权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完全是不同的形式，议会制度表现了官僚主义的发展，并且是资产阶级压迫广大工农群众的工具。苏维埃则反是，他是站在生产地位的广大群众直接参加政权的反官僚主义的最好形式。同时他也〈是〉由工农民主独裁转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他对剥削阶级是专政形式，但对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本身却是最民主的形式，正因为如此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因此各地苏维埃的建立必须适合于广大群众参加政权与反官僚主义的原则，现在红军所到的地方无疑的应该要计划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但是，正式的苏维埃政权一定是直接从群众代表会议（绝不是仅限于各地革命团体代表）选举出来，绝无所谓还有什么“秘密的”或是“临时的”。在正式苏维埃政权还不能组织以前，最初的政权形式是临时的，这临时政权即是革

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委员会的参加人绝不能由红军中政治部委任，而是以革命团体的代表（当然红军代表也是参加这政权的一部分）成立之。在这个临时政权成立以后即应着手组织群众、鼓动群众由下而上的建立正式的苏维埃政权，等到这个正式政权宣告成立，革命委员会即应政权移交——一般的原则是如此。但是如果你们所到的地方也没有群众起来，也没有工农革命团体的组织而反动的县长又不得不撤消，这时候当然不能不管他，或者让他处在无政府状态中。这时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就应该暂时代理执行这种政权，他主要的工作应是组织群众，广泛的发动群众以准备召集苏维埃大会建立苏维埃政权。

7、实行党的政纲，必须与群众斗争的具体纲领联系起来。

政纲的宣布与实行在扩大党及红军的政治影响上，在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斗争上有伟大的意义，必定要宣布政纲才能吸收广大群众于政纲之下而奋斗。因此对于党的政纲的宣传和实施极为重要，在揭起红旗的头一秒钟即应向群众宣布党的政纲，使群众能了解红军的行动，使党的影响能在群众中增高。这一工作你们是注意到，但只是宣布还是不够的，主要的还是怎样能正确的运用这个政纲，使这个政纲不致于成为纸上空文，而实际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因此你们必定要根据各部分群众个别特殊的情形，在这个政纲总的原则之下提出斗争纲领和斗争口号，并且这些斗争纲领和斗争口号一定要能切合于广大群众的切身要求与客观的可能。

8、加紧武装保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两大任务的执行。

在前面已经指出党在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武装保护苏联

和反对军阀战争。在第一个任务的执行一定要使广大群众了解苏联——唯一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祖国国际意义，一定要使群众能了解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密切关系，更一定要尽量的向群众宣布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攻苏联（武装的侵略和政治的挑拨）的事实。过去你们对于这项任务的执行，是曾经注意到，在十月革命十二周年那一天曾经召集一次庆祝大会。但是这还是由“自上而下”的方式所发动，并不曾使群众对这个任务的意义有广泛的认识，这样当然是很不够的。关于第二个任务反军阀战争你们尤其要注意执行，广西是军阀战争的区域，工农劳苦群众而特别是士兵已经饱受了军阀战争的惨祸奇灾。对于军阀的怨恨，可以说到了极点，这都是便于你们执行这一任务的客观条件。你们必定不仅是口头向群众宣传军阀战争的罪恶，而且还要在实际行动上号召广大的士兵群众不去为军阀争地盘，挡炮火，号召广大的工农群众一致起来破坏军阀战争的后方、前线。

9、加紧反帝国主义和肃清国民党特别是改组派在群众中的残余幻想。

帝国主义在广西表面上仿佛没有多大的关系，实际上广西整个的经济都握在帝国主义手中。法国的纸币布满在市场，特别是右江更与法属安南接壤。因此你们绝不可丝毫忽略反帝国主义的工作，不仅利用广西边界的事实来反法帝国主义，而且要运用全国的事实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你们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来扩大反帝运动与宣传，提起广大群众反帝的情绪。同时要联系到拥护苏联反世界大战的宣传，这与将来的前途有极大的意义，绝不可忽视。其次广西西部群众的确一般的反国民党的情绪非常之高，同时你们在右江对于反

国民党特别是反改组派做了不少的工作，但群众并不能对改组派有很明确的认识，而右江群众还多少对改组派存有幻想。所以你们对于反国民党特别是反改组派在群众的残余幻想，工作必须继续加紧，特别是自己基础还未稳固时改组派还有发展其改良欺骗影响的可能，更要加紧向群众宣布国民党勾结一切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残酷的压迫剥削屠杀一切工农劳苦群众的罪恶，揭穿改组派欺骗群众压迫革命的阴谋。尤其是改组派在他走到日暮穷途的时候，一定会对群众大肆改组欺骗的毒辣手腕，企图暂时利用一下群众的力量，以遂其死灰复燃的野心。那么你们这种工作的进行，更是刻不容缓。同时反改组派必须与反改良主义的宣传联系起来，才能使群众得到明确的认识。

10、加强党及无产阶级的领导，反对尾巴主义的危险成了目前最严重的问题。

目前各地一般的现象是党及无产阶级领导的力量仍然异常薄弱，许多群众自发的斗争党不能领导，许多斗争群众已经走到前线，党的支部还不能起作用，在乡村斗争中很少无产阶级的领导，乡村无产阶级的组织很少地方有。特别是广西西部，党及无产阶级的领导更成了极严重的问题，必须发动并紧张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对于乡村无产阶级尤要很艰苦的将他们组织起来，团聚起来。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与防止农民意识的发展和尾巴主义脱离群众的危险。

11、坚决执行反富农的策略。

对于富农的问题的确很严重的摆在你们的面前，富农的反革命性和阻碍农村的斗争在你们那里也曾很明显的发生过

（如富农公开的在农会提出只抗地主的债，不抗农民的债等等）。因此你们必定要根据中央的路线坚决的执行反富农的斗争，以种种的方法来打击富农。特别是在党的组织中、军队的系统中、苏维埃的组织中、农会的组织，毫不迟疑的排除富农，在斗争中排除富农的影响。为要这样，在农村中一定要加紧雇农的组织，加强雇贫农的领导。一定要在农村中公开的提出雇农所拥护的斗争纲领，如富农反对则应以群众的力量来解决他，甚至在没收反革命财产的政纲之下没收其土地。左右两江的斗争领导权过去多在富农的领导上，转变这一领导权到贫农、雇农的手上，是极困难的工作，你们绝不可只用一道命令取消某几个富农的办法。这样，只能取消几个人，而不能根本肃清富农的影响，你们必须多用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方式来驱逐富农。

12、红军第七军发展的前途，无疑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联络，以争取广东先胜利的前途。同时应推动当地广大群众起来深入当地的土地革命。

红军第七军必定要向外发展才能实现其主要的任务，他的发展前途无疑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汇合起来，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的先胜利前途。目前广东代表大会已决定组织各种斗争汇合起来，如朱毛红军，闽西红军均入粤发展帮助东江发动整个的地方暴动，北江发动游击战争，南路发展琼崖的游击，以及加深全省的士兵运动，工农武装等等。这完全是争取广东先胜利的计划，红军第七军无疑的要与有一工作计划配合起来，使之能够实现。中央已另给朱毛与广东的指示，要他们迅速发动北江的地方

暴动，扩大湘粤桂赣四省边界的红色区域，经过这一游击发展可以与你们联络。因此，中央对于你们进攻南宁的策略，认为根本不能适用。不但会助长旧势力的发展，而且偏于割据，离开了与各方革命势力会合争取广东先胜利的前途。目前广西桂、张军阀的军事力量已偏重桂省中南部，中部以北已渐空虚，湘军亦因全国混战有撤退的趋势，因此更便利你们向湘粤发展。同时你们向湘粤发展时必然要将当地的农民队伍带一大部分出来，因为这些可以锻炼为红军中心战斗力量。

13、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加紧白色区域的工作。

红军不可能以单纯的军事力量来制胜敌人，红军的游击战争之扩大必须与群众斗争汇合起来，才能有胜利的保障。因此，必须用一切的可能，无论在政治的影响上，策略的正确运用上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使红军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使红军成为群众的武装。同时必须加紧邻近白色区域的工作以与扩大游击战争的任务联系起来。对于加紧白色区域的工作特别是在农民的保守观念下是很容易忽略的，望你们特别的注意。

14、猛烈的扩大红军的组织是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武装工农群众亦即所以扩大红军基础，故武装农民不宜用分散武装的办法。

尽量扩大红军的组织是目前主要任务之一，但红军的扩大，绝不是招兵买马的方式可以做到的。事实上你们已经感觉到招兵的困难，一定要了解只有在群众斗争的情绪提高时才有便利扩大红军的条件。同时也只有吸收工农武装中的进步份子来扩大红军才是最妥当的办法。所以你们必须经常注

意到鼓起广大群众参加红军的宣传，打破群众的保守观念。同时必须尽可能的帮助群众以武装，不可存好枪留着坏枪交群众的观念。固然补充红军本身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工作，但一定要认清武装群众加紧对群众的教育与集中的武装训练是扩大红军的前提。当然在武装农民不宜用分散武装的办法，而是要集中组织编为红军。

IV、各种具体策略问题的回答

A、群众工作方面

1、苏维埃的组织和工作。

除了一般原则在上面已经说明外还须注意下列几点：

(1) 苏维埃必须是群众的代表会议，由此代表会议举出若干人来组织委员会处理政权的工作，代表的任务在会议后即已完结，代表应将群众的要求报告于大会。同时要将大会的决议报告于群众，群众有随时撤退其代表的权力。(2) 工人代表应占主要的成份，某一企业或职业可以直接举代表到代表会议。雇农更有两重选举权——乡村群众大会与雇农工会，这样的办法对于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有很重大的意义。(3) 苏维埃的组织是由下而上产生的，其系统为村、乡、区、县、省苏维埃。村是苏维埃的基础，村乡苏维埃只设常务委员会，不设执行委员会，区县则应组执委与常委，下面设多少部或委员会由当地实际情形决定。(4) 苏维埃成立的第一天必须议决一些法令颁布出去。(5) 苏维埃是政权的组织，不可采用群众组织的工作方式，如在下设立小组等，失败后无疑的苏维埃自然取消，仍由工农会来指挥一

切。(6)富农在苏维埃中无选举权。

2、对工运的策略问题。

广西尤其是左右江的雇农工人是极少，但手工工人们具有相当的数量，他们仍然是先进的群众。乡村的农民运动如果没有城市工人的领导是不能上正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加紧工运的工作，最主要是在左右江发展他们的日常斗争，从斗争中去组织他们。应在群众中扩大赤色工会的影响，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党在赤色工会中应该要有核心的领导作用，提出适合于工人群众切身要求的斗争纲领，必定要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厂委员会”，经过工厂委员会，从斗争中吸收积极分子到党里面来。对黄色工会主要的策略应依照最近中央所决定的，一定要在黄色工会里组织赤色小组，不仅揭穿黄色工会的改良欺骗的假面具，而且公开的提出赤色工会的纲领来号召，使群众能脱离黄色影响之下而团结在赤色工会的周围。在左右江一带的失业工人，我们应该要很快的把他们组织起来，很快的引导他们到斗争方面来。雇农、手工工人是乡村中的无产阶级，应该要发动他们来组织雇农工会成为农村斗争的核心！在有农会的地方，雇农应在农会中成立小组，以便能在农会中起领导的核心，这个小组就是雇农工会的基础。雇农工会的组织系统一县有县雇农工会，一区有区雇农工会，一乡有雇农小组；县雇农工会必加入县总工会，所以雇农实际上有两重作用，将来也可以参加城市的政权而同时又得参加乡村政权。但是，这样并不是与贫农离开，雇农在乡村应要有独立的组织，实为了要起领导作用。

3、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问题。

第一，目前乡村的斗争最主要的是反对封建剥削与要求土

地，游击区域必须坚决执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的工作，才能实现消灭封建势力，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第二，富农在斗争中必然是反革命的，当然对反革命的富农不能对于没收其土地问题发生犹豫。在政纲不能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条文，这主要是在扩大政治影响的作用，但在政纲上必须在第二条就订出“没收反革命财产”的条文。对富农能遵守一切法令政纲的当然可以不没收其土地。第三，凡是带有封建剥削性的土地与财产，如祠堂庙宇等必须坚决的没收，即对孤寡的很少土地只要是他租给人剥削人的都要没收。一定要了解没收土地是一回事，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又是一回事。第四，没收土地后一定要宣传土地要天生的，打破私有的观念，并宣布土地所有权归苏维埃即是归群众自己，禁止土地的卖买。第五，没收土地后的处理问题，一般的运用，经过三种方式：地主的土地归原佃农耕种，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与共耕。这三种方式都有其客观适用的条件，我们不能机械的决定，必须交乡苏维埃按照群众的要求来处理，一定要相信群众有解决此问题的力量，不过一定要注意防止富农阻止分配土地的斗争，第六，分配土地的办法与标准必须以当地群众的要求为准则。第七，为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雇农，乡村手工业工人以不分土地为好，但亦不能机械的运用，或者仅消极命令不分，而应从积极方面颁布劳动保护法令来保障其生活使他们自愿不分土地，当他们要求分土地时，绝不可机械的阻止。

4、农协问题。

在成立了苏维埃的区域农协已失其作用，应该取消。不过有一个实际问题即在目前斗争时期，苏维埃区域仍时有失

败的可能。失败后仍要团结群众在农协之下，故在目前苏维埃区域仍应保持其相当的作用。但必须坚决执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使农协逐渐减少其作用，在农协在群众中尚有很大信仰时，更不应用一纸命令取消农协的办法。在农协中应坚决的将富农排斥出去。

5、农头问题。

广西的“农头”虽在反军阀、反豪绅的斗争有了长期的奋斗的历史，但是因为他的出身很复杂，还保留着很浓厚的封建色彩，尤其是多注重梁山寨式的领导，极妨碍群众直接的斗争。要是他们来找我们进去工作，我们当然不是拒绝而且我们自己还要找线索能够打进去。但是我们派人打进去主要的还是在夺取他下层的群众和转变他内部的成分，而决不是仅仅只就其“农头”暂时与我们合作就够了。反之如我们艰苦工作的结果已经在群众中有强固的基础，即是〔使〕“农头”表示不跟着我们来，我们也有方法解决他。所以“龙〔农〕头”的能不能转变都不成什么严重的问题，主要的还是要着重如何才能转变还在“龙”〔农〕头”率领下的下层群众。

6、城市贫民工作与组织。

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紧，军阀混战日益剧烈，人民生活，日益痛苦，城市贫民，必然日益走上革命道路。对城市贫民工作，绝对不要忽视，应发动其组织，领导他们做反帝，反国民党，反苛捐杂税及拥护苏维埃政权一切斗争，广西的城市贫民运动尚未开始，的确是过去工作之缺点。

7、土匪问题。

土匪的领袖，大都是投机分子，很容易被土豪劣绅利

用。但是土匪的群众都是失业的农民和工人，被生活压迫，流为土匪。我们应该夺取其群众，消灭其反动的首领。广西土匪，特别的多，若忽略了夺取土匪群众的工作，必然任土匪走到反动势力方面去，增加了敌人的力量，为红军发展前途的障碍。然而收编土匪必具有几个条件：一红军的武装力量胜过土匪；二有群众斗争来推动；三在土匪群众中有相当的工作。在赤色区域中必然有不少的土匪来投。我们收编的步骤：第一要他们能接受我们的政纲，并执行我们的政纲；第二派人去艰苦的工作，以转变其下层群众的心理。经过相当的工作时间群众已倾向我们，即应坚决执行第三步骤改编其队伍，若其首领表示动摇或不革命，当毫无疑问的以群众力量来解决他。即是〔使〕表示得很好，也应更调别的职务。要彻底的改变其组织，才能成真正革命力量，才能编为正式的红军。在开始收编的时候，万不可给以红军的名义。

8、学生运动。

对学生运动的工作，你们并未开始做，只曾注意到，曾派同志到学校里去组织委员会，曾提交学校补助金一千元。对于学生的解释，过去在党的决议中都有不妥当的地方，把学生看作是纯粹民主主义的分子，但是实际上的情形不是这样。学生中有许多是富农地主的子弟，这一部分富农地主的子弟，很容易接受改良主义的影响，到了土地革命深入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动摇。最近中央已经把这种意见更正过来，认为不能把整个的学生都看做民主主义的分子，也不是把所有的学生都看做工农的同盟军（虽然有一部分是民主主义的分子，是工农的同盟军）。所以还需要我们以共产主义的教育去影响他们，组织革命的学生会，去吸收学生中的革命分

子，真正民主主义的分子。

9、少数民族问题。

广西内部杂居不少的瑶民，这些瑶民虽然大部分同化汉族，然还有不少的种族关系。我们去同化他们一定要站在整个的阶级观点上，注意他们生活的苦痛，宣传汉瑶平等待遇，要发动他们的自决权。要他们起来反对汉人（是统治阶级，并不是整个的汉人）的压迫，要他们脱离酋长制的领导以求得本身的解放。对安南民族也要在斗争中去影响他们，号召他们对法帝国主义独立，并要与他们互通声气。

10、宣传工作。

宣传工作，是我们主要工作之一，应抽出一笔较大的经费，专作宣传之用，各个苏维埃和民众团体均应有定期刊物，前委除现办的《右江日报》以外，还要办一种党的刊物，对外公开的发行，主要的材料是党的对群众一切宣言，党的主要策略和路线，并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使群众对党有明确的认识，对外宣传的主要点，已散见前面，不再列举。

B、经济方面

1、对商人的态度与允许中小商人营业的策略。

对商人一般的策略，此地用不着详细说明，此地要特别指示出的只是我们决不能“明令保护商人的利益”。因为商人是剥削人的，我们工农革命政府决不能容许剥削人的人存在，更不应“明令保护”其利益。我们能容许中小商人存在只是为了保护工农兵的利益，但是虽然容许他，还是必要严厉取缔他在革命政权下继续过分的剥削人。所以我们在布告（只能用布告方式，决不能用告商人书）上一定要这样说

明，不然必会模糊群众的观点。对于大商人尤要特别的注意，到了革命紧张的时候，大商人必定反革命，应毫不迟疑的实行政治没收。

2、经济解决的主要来源。

对经济问题的解决，——对这一问题首先一定要明了，你们现在所占据的还是游击区，还是要在斗争中去求发展，因此解决经济的问题：第一必定与红军进攻的策略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我们不进攻以求向其他区域发展，则敌人可以用经济封锁“久困穷追”的方法来消灭我们。尤其是在处在广西一隅的你们，交通既不甚方便，经济的来源又不甚流转，对于这个问题更加要十分留神；第二必定要很广泛的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使广大的农民渐渐的认识红军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应自动来给养红军。当然这个前途目前还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使同志能了解并注意这个前途。在目前要广大群众自动来给养红军的前途，还没有到的时候，一定要以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及一切政治没收和征收统一累进税为给养红军的来源。

3、禁吸鸦片烟运动。

鸦片烟的害处是人人知道，在赤色区域，当然要禁止吸食。但目前政权还没有稳固，群众对于鸦片烟嗜好，还很深很普遍，绝不能以一道命令来禁止贩卖。同时广西最大的商业便是转运鸦片，如果我们只是据尔禁止其在我们的区域转运，事实上并不能禁止他从其他处（如从安南）转运，事实上也不能因此根本杜绝群众对鸦片的嗜好，只是反于经济的流通，商品的流转，更碰到困难，所以我们目前只能因鸦片的转运这件事体上存在商人的作用，而以加重其税务来解

决他。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利用抽来的税用来暂时解决我们军队中的给养问题，一方面可以使商人转运其他日用商品到我们区域来，使我们不致于发生大的恐慌。不过这绝不是唯一的经济来源，只是我们在目前困难环境中的一种并不违背原则的临时办法而已。所以我们还应从群众的本身来作反鸦片的宣传，而且这种宣传尽在右江还不够，还要扩大全国。如当地群众已有基础，工农会起来通过不吸鸦片烟，当然即可在当地以群众的力量执行严禁鸦片烟。但是这种禁止只能就当地执行，如贩卖到其他处去只是从当地经过，当地还不能执行扣留，还只能特别加重其税务。当然我们决不能对鸦片烟还“明令保护”，反之，我们还要向群众解释特别加重其税务的意义和加紧并扩大反鸦片烟的宣传，渐渐用群众的力量来解决他。总之，你们决不要把目前所能收到的鸦片烟税当做唯一长久的经济来源。

C、军事方面

1、游击战争的战略。

关于游击战争的战术，第一要有进攻的精神，不仅发动群众斗争要有进攻的精神，即是〔使〕经济问题，给养问题的解决都看我们能否采用进攻的策略为转移，保守观念或割据观念结果都只有走到被敌人消灭的前途。因为游击战争也只有进攻，如果割据一区，则敌人将用经济封锁、久困穷追的诡计来使我们归于失败。所以只有进攻才能保障我们的胜利，只有进攻才能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也只有进攻才能冲破敌人的包围。当然此处所说的进攻并不是“英雄好汉”式的、不顾一切条件的打硬战和无目的东打西征，而是说要经

常的有这个精神，利用一切机会以群众的力量去消灭敌人的力量。第二在我们不明了敌情或其他条件未具备、无胜利把握的时候，一定要避免攻坚或打硬战，这种避免当然站在进攻的精神上，一方面保持自己的部队不作无益的牺牲，一方面加强敌人所在地的群众运动以及敌人部队中的士兵工作，使敌人的势力由强变弱。第三一定要善于运用“集中”与“分散”的策略，“集中”与“分散”并不是两相对立的，也不能机械的应用，而是要有集中的指挥去应付敌人，要有分散的运动去推动群众，使“集中”与“分散”能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互相配合起来。其余如用绕圈子办法来避免敌人的追击，用波浪式的推动去影响其他区域的斗争在相当时也可以采用，但这不是主要的策略。

2、红军的编制。

你们的编制，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中央对于你们目前的编制是同意的。惟旧有的部队，未能分别改编，很容易被旧有的反动军官所煽动，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你们一定要立即改变原有的组织，将各部错综编制，而且要将农民群众参入进来。

3、农民武装编制与训练。

在目前政治形势之下，无疑义的要尽可能扩大红军，扩大红军，决不是招兵买马的方式可以做到的。集中农民武装编成红军，成为扩大红军主要方式之一。编制农军，不特是扩大红军并可保护苏维埃政权，若没有武装工农，在红军离开后，当地的苏维埃政权，是很难保存的。广西农民普遍的有枪支，惟大部被富农意识或反动豪绅所领导，使其能在我们政治影响之下，而加以编制，集中训练。编制农军的办法

要以建立红军基础为主要原则。编制系统目前应属于农会，我们党必定要在里面起领导作用，从斗争中训练成为红军。

4、士兵的训练。

因为你们这次的发动，是偏重自上而下的和平转变，所以对于发动士兵斗争，在斗争中去训练士兵的工作，的确做得很不充分，现在虽然你们的部队已转变成为红军，这个斗争，还是不能放弃。保留在你们部队中的政治上、生活上、经济上的弊病还多，还需要我们用很大的努力去发动士兵的斗争，加强士兵对我们的政治路线的认识，以求渐渐的消除。当然除发动士兵的斗争精神、在斗争中去训练士兵以外，是需要经常的采用很多的特殊方法，如早晚点名呼口号，个别谈话，集体的举行报告讲演会，办兵士壁报等等，以启发士兵的政治认识力。

5、士兵委员会的组织与作用。

军队营连均应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系统，系隶属于军中政治工作系统之下。士兵委员会的作用：1、推动民众的组织；2、训练士兵并管理士兵日常生活的秩序；3、审查军队的用费；4、对军中行政的建议；5、维持军纪，设立裁判委员会，以解决兵士中所发生的纠纷（如极小的事，可不提裁判委员会解决，可由长官执行，如到战场上军官有执行一切军令之权）。在这些权限的执行中，一定要防止对于军事行动有妨碍的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故兵委是经常受政治委员会与政治部指导的，如果有严重的错误时，政治委员〈会〉得解散而重新组织之。

6、士兵成分问题

虽然你们的军队已改变成红军，但是你们的军队原来是

由军阀部队改编过来的，里面的成分一定要改变。士兵的成分在原则上一定要吸收贫农，必须经过农军训练。对于老兵中十分不可靠的或者还保留他原有的旧习惯的，当然要设法淘汰。但大部分还可以保留，加以训练，分散到各队去用其军事技术，训练新兵。

7、薪饷问题。

红军绝对不是雇佣的军队，所以二十块的薪饷，是绝对要渐渐的使其废除。虽然在方才转变的你们的军队，要立即废除当然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一定要努力完成这个前途。在士兵群众中施行广大的宣传，并且经过经济公开，当兵夫役一律待遇平等，这些办法来使士兵群众自己起来废除薪饷制，只有零用钱及供给伙食衣服。

8、军队中党的组织工作与政治委员制。

前委是军队中最高政治指导机关和党的最高指导机关，前委之下有政治部，政治部执行前委的决议，对内施行政治教育，对外参加群众工作。政治部一定要是党的组织，政治工作人员并一定要是党员。政治部的系统，军有军政治部，纵队有纵队政治部，纵队以下则为政治委员，但军与纵队除政治部以外，尚须另设政治委员，此政治委员在政治上可以指导政治部并得至最高长官会衔施令。营以朱毛那里的经验，并不要设一政治委员。只设直属支部，但要是你们现在觉得感到困难，也可以设一政治委员。前委必成为所到地方党部的政治指导者，但一定要帮助建立地方党部独立的组织。至于军队中与政权的关系，决不能以党的名义，应以军队的名义，若要与政权机关合同筹划一件事，（如筹款）应以群众政权居主要地位，以使群众明了并不是军力统治政

权。除上述应健全党的组织系统以外，应加紧健全下层士兵支部的工作，支部以连为单位，应经常建立连支的中心工作，定期召集开会，定期到群众中去宣传，使每一个士兵都能自动的来了解党的决议。

9、收集反动武装。

广西地势险要，便利于革命势力的发展，也便利于反革命势力的存在。因此广西即是〔使〕在你们所游击的西南一隅，反动武装（如商团民团的武装）仍然很强。所以对于这一部分武装必定要加以注意不能忽视，在我们所能影响到的地方，一定要以广大的群众的力量来解决他。在每种特别情形之下极相当的可由军事阴谋来解决这类武装，但还是要经过群众的路线，在解决后一定要向群众作广大的宣传。

10、在周围敌军中的工作。

在周围你们的敌人军队中的工作，你们过去是未注意到，现在正值军阀混战继续扩大的时候，敌人军队士兵群众必定一天天的因为忍不住本身生活的痛苦而倾向革命，敌人的统治也必日益动摇。因此我们必定不能放弃这个工作，找线索有计划的征调同志及有斗争性的工农分子打入敌人军队中以夺取其下层群众，使其不为军阀当炮灰，不替军阀压迫工农，不打红军实行有组织的兵变，与工农红军携手。

11、军事交通网的建立。

为要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你们必定要建立单独的军事交通网。你们应在思林建立总的交通处，经过龙州、谅山与广东省委发生关系，由省委与中央发生联系，并由思林又直接与广西特委发生关系。除此以外，还应在平马、百色、东兰、凌云等中心区各建立一交通处，以便你们的行动能互相

配合。

(略)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11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1930年)

为布告事。溯自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以来，中国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被夺殆尽。而国民党军阀，竟不惜为帝国主义掠夺之工具，加紧剥削群众，屠杀工农。加之连年以来，各派军阀互争地盘，混乱局面，日益扩大，苛捐杂税，无微不至，各地贪官污吏、豪绅地主，更借国民党为护符，穷凶恶极，横行无忌，人民处于水火之中，惨状实不堪言。本军应革命之要求而产生，其目的在驱逐帝国主义出华，推翻国民党统治，肃清贪官污吏、豪绅地主等反动势力，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以解除民众痛苦为职志。现游击到此，已将反动驱逐，我劳苦民众，应各安生业，幸毋误听谣言，自相惊扰，兹特郑重将本军对各界民众态度，申明如左：

一、对工人：组织工会，夺取政权，增加工资，减少时间，待遇得改良，失业有保险；

二、对农民：组织农协，土地革命，打倒地主，消灭豪绅，租税尽取消，土地归农民；

三、对士兵：改良待遇，废除肉刑，提高生活，官兵平等，既得参政权，又有土地分；

四、对商民：废除苛捐，取消杂税，保护贸易，买卖公

平，严守我军纪，绝不扰商民；

五、对敌军：只打军阀，不打士兵，优待俘虏，不究团丁，愿来当红军，本军最欢迎；

六、对教育：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劳动儿童，免费入学，推翻旧礼教，创造好风俗；

七、对社会：抚恤老弱，救济赤贫，严禁烧杀，保卫安宁，努力来生产，社会得太平。

甚望各界民众，明了主张，共同努力，完成上叙之目的，本军有厚望焉。切切此布。

政治委员 邓 斌

军 长 张云逸

政治部主任 陈豪人

一九三〇年

（据广西博物馆所存原件）

中共中央给七军前委的信

(1930年4月20日)①

红军第七军前委：

自小平同志回去后，中央没有得到你们的报告，仅从反动的报纸得到你们一些消息。最近知你们有报告到广东，但又因密写的技术不好，洗不出来，仅由交通口述龙州部分已经退出，龙州与百色两部尚未能取得联系很简单的情形。最近广东有一电报来说，你们退出龙州没有大的损失，中央所知道你们的消息，只是如此而已。

小平同志回去时，带着中央很详细的指示。自小平同志达到后，你们的确相当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做了许多的工作，如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斗争，执行土地革命，龙州的转变及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法帝国主义的财产等等，这些的确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

但是照最近报纸的消息看来，你们执行中央的指示，尚有不够的地方，如：第一，你们没有能很快的集中力量，根据中央指示发展的路线，向着柳州、桂林取道湘粤边界向广东的北江西江发展，并且你们曾有进攻南宁的错误的计划，久留左右江卒至被敌人将你们切断；第二，最近报载你们内部发生问题，即是冯飞龙叛变，果然如此，则你们对土匪运

①原文无年代，1930年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动的策略仍执行得不正确，对土匪领袖没有能坚决的执行解决，保存他原有的组织，□□□□之内，以致被他出卖欺骗□□□们没有用最充分的作到（——）扩大红军。这是中央在□□□□简单的消息而与你们的批评，其他实际情形中央现在一点不知，无从指出。目前革命的形势更向前开展，国际的形势固然有利于中国的革命，而中国的统治阶级政治经济的危机的普遍与加深，军阀混战的扩大与继续，工农兵士的斗争，普遍而平衡的发展，红军的可惊的扩大，这些事实毫无疑问的是证明中国革命成熟的复兴，渐次的走向直接革命的前途。因此，目前党的总的任务是更加紧迫的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特别是争取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前途。所以党目前策略，对工人运动的是组织政治同盟罢工，农民运动是发展地方暴动游击战争，兵士运动是组织兵变，红军是猛烈的扩大。关于政治与策略详细情形，见中央历次的刊物及通告，兹不重述。惟在这一情形之下，你们的任务，当然是特别的加重。□□□……

中央因为对你们最近的情形不了解，不能作详细的指示，现在只提出下列几个问题引起你们注意：

第一，中央现在所最大的顾虑的仍是你们部队中兵士群众的基础不稳固，随时都可以发生问题，所以你们现在应用最大的努力，在士兵群众中去工作，加强士兵群众的政治训练，改善士兵成分，健全士兵委员会，发展士兵中党的组织，树立党在士兵群众中的核心作用，渐次的做到废除薪饷制度，使士兵能更□为本阶级利益而斗争，但是最主要的是向外发展，在斗争中吸收大批农民群众加入，来改进军队内部的成分。

第二，你们仍须坚决的执行中央所指示的发展的路线，应从速集中力量，审查广西敌人的实际状况，经过柳州取道湘粤边界向广东北江、西江发展，现在广东正在布置东江北江的地方暴动，你们应能在这一暴动中作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将来与东江、闽西红军向着广州取进攻形势，以争取广州胜利的前途，自然这里所谓争取广州，决不是单靠红军去打，而是在全国革命向前发展中，整个的广州暴动计划下，工人力量、红军力量以及整个的革命力量相配合而进行的，我们要认识这一前途，决不是一个遥远的前途，我们应时时准备与布置。

第三，你们必须坚决的发动广大群众斗争，特别要深入土地革命，在行动上使广大的群众认识你们的确是他们自己的武装，号召群众来拥护红军，自动的投到红军，你们即应在这一情形之下，来猛烈的扩大你们的组织，加强你们的力量，才能更加巩固七军的内部。

第四，你们对土匪运动的策略，必须很正确的慎重的运用，如果冯飞龙的叛变是事实，那更是教训了，我们绝对不能相信土匪的领袖是我们的同盟者，绝对不能收编整个的土匪队伍到红军中来，我们只能在有我们中心的力量或广大的农民势力包围中，收编土匪的群众，驱逐他们的领袖，改变他们的组织，同时，对于这些群众亦须分散改编到各部队中，而时时加以训练及防范，即对于其他旧式军队中的老军官，我们亦不可因其口头的表示，而存丝毫的留恋。总之，对土匪领袖或旧式军官的保留，稍一不慎都能发生以后的许多危险，希望你们特别慎重。其他一切问题，在上一次的指导信中，已经完全解决，现在因为对你们的实际情形不明了，

所以我们的指示，亦只能止于此，并望你们不断的作详细报告来。至要。

中 央

四月二十日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11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土地法暂行条例

(1930年5月1日)

苏维埃政府之主要任务，在推翻一切压迫工农劳苦群众之特殊阶级与解决群众之需要。目前中国革命任务之一是深入土地革命。而土地之取得，更为乡村农民之实际要求，故特颁布下列《土地〈法〉暂行条例》，仰各县、区、乡苏维埃切实执行为要。

(一) 农村阶级成分的分析

一、凡将自己土地全部或一部分佃给农民，而以佃租制度来剥削农民者，皆谓之为地主阶级。

二、凡利用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势力，剥削群众，压迫群众者，谓之豪绅阶级。

三、凡农民：(甲)除了自给外，还有剩余者；(乙)非豪绅地主阶级之放高利贷者；(丙)自己土地较多，须雇雇农耕种者；(丁)还有一种将自己剩余财产埋藏，而在乡村中有个人之经济地位者。以上数种，皆谓之为富农，仍是站在剥削穷苦农民之地位。

四、凡农民每年〈所〉得，仅能勉强自给，不剥削人，亦不被人剥削者，谓之中农。

五、凡农民每年所得，不足维持最低之生活，而必须为

人作短工、借高利贷，或用其他方法以维持其困难生活者，谓之贫农。

六、凡自己没有土地，亦未佃地主土地，而以帮地主或富农种田者，谓之雇农。

七、凡在乡村不种田地，而专以其他职业维持其生活者，谓之乡村工工人。

八、“自耕农”、“佃农”均不能成为代表一种成分的标准，因自耕农或佃农之中，均有富农、中农、贫农之分，应按上面标准以确定之。

（二）应没收之土地财产及处理原则

一、立即无代价的没收地主豪绅阶级之土地财产。

二、没收一切反革命的财产、土地，及反革命之标准如下：

（甲）勾结一切苏维埃之敌人（即一切反革命派）或与之作侦探，或在经济上帮助敌人者；

（乙）阴谋企图倾覆苏维埃政府者；

（丙）反抗苏维埃政府之法令者；

（丁）进行反苏维埃政府之小组织。

三、没收一切祠堂、庙宇地产，及其他公产、官荒或产生的荒地、沙田。

四、没收之土地财产，均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无土地或其他的农民佃用。

五、凡没收的土地财产之所有权，属苏维埃政府（即所属民众），绝对禁止自由买卖。

六、原属自耕农之土地，其管理权归苏维埃政府，其

〈使〉用权仍归原有土地之农民。

七、县苏维埃得于本县，酌量提出一部分土地作为该县移民垦殖之用。

八、销毁豪绅、地主、政府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书其口头的完全在内。

九、凡不分配之地产则不必分给各人，由苏维埃直接经营之。

（三）分配办法

一、分配土地应以乡为单位，由乡苏维埃召集大会或代表会议讨论执行，由县、区苏维埃切实指导之。

二、如甲乡与乙乡之土地与人口之比例，相差太远时，可由县、区苏维埃用移民等办法解决之。

三、凡没收之土地在甲乡者，由甲乡苏维埃处理之；在乙乡苏府者，由乙乡苏维埃处理之。

四、凡没收之土地，完全分给无地或地少的农民使用。

五、农民所耕种之土地，必须领苏维埃颁发之土地使用证。

六、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以出产之多寡，平均分配之。暂用每一劳动单位分全份，非劳动单位分半份之办法处理之。

七、出外当红军者，亦得分一份土地给其家属，并得请雇农耕种之。

八、凡贫农、中农因地域关系，出租他人之一部分土地被没收者，亦得于其本村，按分配原则〈享〉受分配土地之权。

九、凡地主之孤寡，其土地被没收后，不得再分给土地，生活另由乡苏维埃解决之。

十、雇农及手工工人如自愿不分土地，得按另行颁布之劳动法，解决其问题。

(四) 税 收

一、取消一切军阀政府及地方衙门所颁布的捐税，取消包办税则制，取消厘金。

二、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借约无效，并即刻焚毁。

三、实行单纯的农产累进税。

四、单一的农业累进税之标准，暂定按照各人出产，缴纳百分之五。

五、剩余较多之农民，得于征收单一税百分之五外，以累进税为原则，由乡、区苏维埃决议征收之，其标准如下：

(一) 有余谷五十斤至一百斤者，征收百分之四十；

(二) 有余谷一百斤至三百斤者，征收百分之五十；

(三) 有余谷三百斤至五百斤者，征收百分之六十；

(四) 有余谷五百斤至一千斤者，征收百分之七十；

(五) 有余谷一千斤以上者，即特别征收之。

征收累进税以一家为经济计算单位。

六、苏维埃收得之税项，完全作为政费、红军及赤卫队用费、社会保险、改良农业经济、办理教育、建设之用。

(五) 工 具

一、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之耕田工具，如耕牛等，均分给无工具或少工具之农民借用。

二、如不够分配时，则由苏维埃政府向耕具多之农民借出，发给无工具之农民使用。

三、如在一处工具无法普遍分配或缺乏时，得由各该乡苏维埃计划共同使用耕具之办法。

（六）其 他

一、苏维埃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帮助下列各项发展农业经济之事业：

（甲）办理土地分配；

（乙）改良扩充水利；

（丙）办理移民事业；

（丁）防御天灾；

（戊）办理农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经手办理低利借贷；

（己）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

（庚）一切森林、河道归苏维埃政府经营管理。

二、如在某种军事困难时期，乏人耕种土地时，可由苏维埃指定应用共耕的办法以解决之。

三、苏维埃政府应随<时>按照改良劳苦群众生活之原则，确定其一种或几种□□之□格。

（七）附 则

一、本暂行条例，自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之日实行。修改之权，属于右江苏维埃代表会议。

二、不遵守本暂行条例之规定者，以反革命论罪。

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

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颁布

（据广西博物馆所存原件）

共 耕 条 例

(1930年5月15日)

一、总 则

(一) 苏维埃政府为解除工农劳苦群众的痛苦，与保障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执行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深入土地革命。

(二) 遵照右江苏维埃政〈府〉土地问题决议案及土地法暂行条例，没收地主阶级及反革命之土地，分给无地及少地的贫苦农民。

(三) 土地的没收与分配，以一乡为单位，一切没收及分配方法，均要经过全乡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决定。

(四) 兹各乡群众大会有决定将全乡所有土地共同耕作者，右江苏维埃政府站在领导地〈位〉，使不致发生不好结果起见，特颁布“共耕条例”，以资执行。

二、土地的管理

(五) 全乡的土地，如田产、畜地、池塘、果园、森林、坟山、桐场等，完全归苏维埃政府管理，由土地委员协同经济委员负责。

(六) 全乡土地有在同一平面者，即铲除过去田界合零为整，以便划一。

(七) 全乡土地由乡苏维埃政府编号签订，并计算土地的面积及生产量。

(八) 全乡所有的土地，绝对不准任何人自由买卖。

(九) 全乡的土地如有过剩，应准别乡、区移民共同耕作，移民数量由区、县苏维埃政府决定。移来之民，与原乡民众享有同等之权利。

三、耕 作

(十) 全乡群众自十六岁至六十岁之男女，均要负责全乡所有土地的生产工作，但乡苏维埃政府应酌量各人之年龄与体力，分配以适当之工作。

(十一) 全乡劳动童子团，由乡团部分班编组，轮流教育并轮流牧牛。

(十二) 全乡群众耕作时间，由乡苏维埃政府按农作之需要，随时规定之。

(十三) 每日开工及收工，由乡苏维埃政府传析通知或由各组自定。

(十四) 负责耕作之群众，由乡苏维埃政府编十人为一组，公选组长一人，负责领导一组的工作，组长之人选，以有农事经验且能得该组民众之信仰为标准。

(十五) 各组之工作任务，由乡苏维埃政府决定分配。

(十六) 乡苏维埃政府应随时注意农事之考察，并经常纠正耕作中之各种缺点，与防止坏现象之发生。

(十七) 凡群众中有残废疾病，或有特殊情形不能耕作时，应向所属组长报告请假，由组长转报告乡苏维埃政府。

四、工 具

(十八) 全乡所有耕作工具，如犁耙耕牛等，完全归乡苏维埃政府管理。

(十九) 耕作工具缺乏时，由乡苏维埃政府得按照各组工作的需要，分发各组使用。

(二十) 耕作工具缺乏时，由乡苏维埃政府负责购置。

(二十一) 全乡群众应尽各人能力，改良耕作、工具，使增加工作效力。

(二十二) 如乡苏维埃政府经济充裕，可能购置新式耕具时，也应购置。

五、□ □

(二十三) 在共耕初期，粮食仍以由各人负责为原则，但在困难时，乡苏维埃政府亦可向本乡富裕农民征发其盈余之几分之几，作为耕作者火〈伙〉食之用。

(二十四) 炊□任务可由各家自己负责。

(二十五) 乡苏维埃政府审查各乡情形，有可能公膳时，由乡苏维埃政府负责办理。

六、肥 料

(二十六) 由乡苏维埃政府建造肥料贮蓄处及公厕。

(二十七) 凡牲畜粪料及农业副产物，可能作为肥料者，除留小部作为自己种菜园之用外，余均送到肥料贮蓄处贮积。

(二十八) 如肥料不足，由乡苏维埃政府出外购置使

用，或设其他办法解决之。

七、农产物的分配

(二十九) 乡苏维埃政府负责计算全乡土地生产的农产品及副产品的数量，及统计人口，按照平分的原则分配。

(三十) 凡一岁以上之男女均得分一份。(因婴孩必须有较好的营养故)

(三十一) 每年生产不足时，得由乡苏维埃计划用改农事，增加生产量，及各自经营其他副业，如养牲畜、经商等工作以补助之。

(三十二) 分配剩余的农产品，完全归苏维埃政〈府〉贮积管〈理〉，以备不时之需，或作苏维埃政费及建设公共事业之事用。

(三十三) 每年分配之方法、时间，由乡苏维埃政府召集民众大会决定之。

八、建设

(三十四) 乡苏维埃政府应负责计划全乡的建设事业：

1、救济机关；2、卫生机关；3、教育机关；4、经济机关，办理开垦及合作社等事业；5、娱乐场所；6、交通及住宅；7、其他。

(三十五) 一切建设事业由全乡群众共同负责，乡苏维埃政府管理。

九、纪律

(三十六) 共耕系极有组织之行动，故须有严密之纪

律，以维持整个之利益与行动。

（三十七）凡经乡苏维埃及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议之决定，全乡民众必须共守，不得破坏，如有异议，亦须经过合法手续，在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从新讨论解决之，但在未经复议之前，仍应执行原有之决定。

（三十八）在乡苏维埃规定召集之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期以外之时间，民众如有急迫解决之问题，得由乡苏维埃政府自动召集大会或代表会议解决之，否则经过全乡五分之一的小组之请求时，亦须立即召集。

十、附 则

（三十九）参加共耕之民众，必须按照规定工作，绝对禁止怠工。

（四十）如发生有破坏行动，妨碍公共利益及怠工之分子，得由乡苏维埃政府裁判，按罪之轻重惩罚之，并在大会中宣布。

（四十一）本条例自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之日，各乡得按照实际情形执行。

（四十二）本条例之修改由右江苏维埃代表会议决〈定〉之。

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

（据广西博物馆所存原件）

土地革命宣传大纲

(1930年)①

A、什么是土地革命

我们贫苦农民为保持生产、寻生活而反抗豪绅地主种种压迫和剥削（苛捐什税重租重利），消灭豪绅地主、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这种反抗豪绅地主的斗争，就是土地革命，他的目的要变更现社会的土地制度。

B、为什么要做土地革命？

我们知道土地是天然的地层面，在最初社会的时代的土地，都是归社会公有的，只要有耕种土地的能力，大家都有使用土地的权力。

不过后来社会上便出了一种坏蛋、可恶的人，他们专图个人的利益和安乐——坐而待食，用种种的诡计将土地霸为个人私有，这就（是）当时所谓领主，即今东兰所谓山主了。

现在的土地就变为商品性质了，得用金钱来买卖土地，致土地集中于少数人——地主的手中。地主籍〔藉〕土地以剥削农民为生存，所以我们农民多数失了土地，只得在无情的地主的土地（□□□□的土地）上劳动。因此，他们地主就

①原件无年代，据内容分析此大纲是1930年形成的。

不劳动而得食——住洋房、抱娇妻、纳美妾，过着很快乐的生活。我们农民整世劳动而不得食——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重租重利，拉人拉物）总是过着奴隶牛马般的生活。

我们□□□失了土地（无土地耕种）的贫苦农民，在豪绅地主无情的压迫剥削底下，都是过着非人的生活。因此，我们为要改善生活，解除一切痛苦，要反抗地主豪绅，实行不交租、不还债，消灭地主豪绅，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所以我们贫苦农民为要解除痛苦，一定要做土地革命，只有土地革命成功，我们农民的生活才得改善，我们农民的痛苦才得解除。

C、怎样去实现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我们贫苦〈农民〉必需的要求，也就是我们贫苦农民解除痛苦的唯一方法。所以我们贫苦农民必无疑地要实现土地革命。然而，要怎〈样〉去实现呢？这就必要去：——

1、加紧团结我们贫苦农民自己的力量，组织我们农民自己的武装——赤卫队，粉枪、大板刀等都要组织起来。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才是靠得住。国民党和现政府都是压迫、欺骗农民而不可靠的。

2、切实联络城市的工人，工人也是贫苦的人，他们因为在乡村没有田耕种，找不着生活，所以就跑到城市中去当〔做〕工来找生活。他们在工厂中受厂主压迫的痛苦，也和我们农民在乡村中受地主豪〈绅〉的压迫一样的痛苦。他们很赞成土地革命的，并且他们是革命的主力。所以我们乡村中的劳苦农民，必要切实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共同奋斗。

3、联合军队中的士兵，士兵是农村破产的农民，城市中失业的工人。他们也是贫苦阶级中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土地革命也很赞同的。因为土地革命成功，他们可以回来得土地耕种。所以应要向士兵告诉土地革命的道理给他们明白，使他们和我们农民联合起来，加强我们土地革命的力量。

4、组织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才是我们劳苦工农自己的政府，因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不是由某人命令或委定的，而是由我们劳苦的工农兵自己出来组织的，所以我们劳苦的工农群众为要实现土地革命，为要推翻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府，组织我们自己的苏维埃政府，没收地主豪绅阶级的土地，归我们劳苦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去处理，这样才能彻底消灭地主豪绅和一切反革命派，才能解除我们劳苦工农的痛苦，才能保障我们劳苦工农的利益。

5、接受帮助土地革命的政党的指导，国民党是帮助我们做土地革命的政党吗？不是。国家主义派是帮助我们做土地革命的政党吗？不是。我们知道国民党是勾结帝国主义，代表地主豪绅屠杀工农的政党。国家主义派也是勾结帝国主义、军阀摧残工农的政党。所以国民党和国家主义派都是我们做土地革命的障碍物、我们工农的敌人。真心诚意帮助我们工农做土地革命的只有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代表我们工农利益，铲除地主豪绅，实行土地革命，努力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建立我们劳苦工农群众苏维埃政府而奋斗的政党。所以我们劳苦工农群众为要解除痛苦，实行土地革命，必要接受共产党的指导，并且要拥护指导我们的共产党。

D、目前各地农民土地革命运动的情形

现在全国各地农民，因为不能忍受国民党军阀地主豪绅无情的摧残和剥削，而纷纷起来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如广东东江、海陆丰、惠东、紫金……等十余县；江西的西南部、福建的汀洲、龙岩、安溪……等十余县；河南的东南部、山东的胶济铁路一带、湖南的东西北部、湖北西北部、四川的涪州一带，已经是农民的政权。已经做到不交租不还债，铲除地主豪绅和一切反动派。已经没收了地主豪绅阶级的土地分给贫农。农民的生活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并且组织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所以现在全中国农民土地革命运动都复兴高涨起来了，并且，国民党军阀不断的发展为抢夺地盘的战争。这种军阀战争因也是为害我们贫苦农民的，我们当然要反对。同时在这国民党军阀□□□□□，就是我们工农自动的起来，用自己的力量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机啊！

亲爱劳苦的农友们，我们在这全中国土地革命发展情形之下，国民党军阀混战之中，我们赶快团结起来，联合工人、兵士，拥护指导我们做土地革命□□□共产党结成□□□的革命，□□实行不交租、不还债，铲除地主豪绅，实行焚烧契约、债券，没收地主豪绅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建立我们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这就是我们劳苦工农同胞目前唯一的出路。农友们起来罢！勇敢上前，努力奋斗，最后的胜利必定归于我们呀！

（据广西档案馆所存原件复印件）

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

(1930年)①

A、土地的所有及使用权的决定：

1、过去无论是个人、地方或政府经营的森林、矿山、农场等农业企业□□□苏维埃政府所有。2、在现时革命阶级的过程中土地应分给耕□□使用，但一切土地的管理及支配权，仍完全属于苏维埃政府，土地不准□□。3、农民无论男女在十六岁以上有自耕能力者即有土地使用权。4、红军退伍的兵士及失业的工人，亦得使用土地，但必须得苏维埃政府批准。5、凡地主豪绅、官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者原有的土地由苏维埃政府完全没收，取消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使用权。

B、土地的调查与统计：

1、调查土地以乡为独立单位，由乡苏维埃政府负责。2、乡的土地应分为：（一）地主豪绅及反革命者的土地；（二）自耕农的土地；（三）佃农领耕的土地；（四）公有的土地四类调查。3、土地面积的计算，暂以各乡习惯沿用的亩数为标准。4、两乡以上有关系的土地，归区苏维埃政府负责，两区以上关系的土地，归县苏维埃政府负责。5、

①原件无年代，这个时间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调查土地的表格及条例另行规定，由县苏维埃政府颁发。

6、调查土地工作由乡苏维埃政府负责向区、县苏维埃政府报告，各区土地由区苏维埃政府统计，全县土地由县苏维埃政府统计。7、调查及统计土地时，同时调查及统计人口。

C、土地的没收与分配：

1、由乡苏维埃政府彻底的没收地主豪绅及一切反革命者所有的土地。2、凡残病无依不能行耕作者的的土地，乡苏维埃政府得完全没收或没收一部分，乡苏维埃政府对其个人生活须负责维持。3、凡一乡之庙宇、祠堂、宾兴馆及一切公有的土地，完全归乡苏维埃政府没收。4、农林业企业的土地，属于一区或一县的，即归一县或一区的苏维埃政府没收。5、苏维埃政府所没收的一切土地，完全分配给无土地的贫苦农民。农民（一切农民）应向族维埃政府请领土地使用证，即得土地使用权。6、苏维埃政府对于土地的分配，以土地的肥瘠及人口之多少为标准，定十六岁以上能自耕作的农民男女为土地使用权的一份。如土地有余，四岁以上的如下□□□□□□□□。a、无土地农民。b、佃农。c、红军士兵。d、□□□□□□□□□□愿自耕者。e、自耕农兼佃农所有土地确分□□□□者。f、残病无依者。7、凡红军及残病无依者领到土地无力耕作得雇人代耕。8、关于土地分配问题，发生任何纠纷，应向上级苏维埃政府报告，由上级苏维埃政府解决。9、土地使用证由苏维埃政府颁发。

（据广西档案馆所存原件复印件）

王玉树关于七、八军情形报告

(1930年8月22日)①

省委：

抵第八军后，旋为八军解体。诸事急待决诸前委，作豫同志特命专赴右江报告一切，并解决收复残余及其个人问题。到达七军后，前委以交通梗塞，几月来已与中央及省委失了联络，非特一切函待报告，日时亦须详细指示一切，旋派树卸命来港，唯沿途险阻，携带艰难，祇能口头报告。因树同志到七军不久，只能据邓小平、陈豪人、雷荣英〔璞〕同志之口述简略报告，详细情形再由以后拟就或邮寄回港。

第八军一般情况，闻□□同志回港，前情谅悉，为不赘。关于刘桂廷部情形，略述于下：

1、组织——现分二营四连一机关枪连。

2、人数：约三百余。

3、枪弹：步枪二百卅左右，子弹各配三十发，水机枪一挺，手机关七支，打虎枪一支，手枪三十多支，子弹亦少。

4、党的组织：团副钟□、机关连连长、步枪连连长张□皆同志，并有士兵同志十多名。

5、同志的观念：张□同志较坚决，惟皆无抓士兵的把握及勇气，士兵同志更不必说。

①原件无年代，此年代是文件收文戳记上填写的时间。

6、战斗力：士气已沮，形成流寇，惟皆不致久留农民区域——农民觉悟的区域。

7、给养：只靠拉民缆的傻角偏〔骗〕火〔伙〕食，或供下乡村那〔挪〕掠。

8、主管官的分析：在团长刘桂廷方面，因懦弱李明瑞——（旧的关系的原故），尚未敢毅然加害作豫同志，而营长陈越、黄陆两个，殊属坏极。若在七军能附近时，他们必然的在无出路的今时，耿于李明瑞的旧关系来归。

9、作豫同志在邕郊时，只十五杆手枪，随身联同一批土匪掩护。自我去后，自在南宁失利，□□□□□□，托其率手枪共上右江，适抵金陵滩口，不能通过，枪支悉交土匪王阔伊，则同地方同志二人及其他关系人返港，业于初旬抵步。

邓小平同志谈话如下：

（1）邓同志抵龙州时，左右两江红军准备出发向南宁移动，察内部的改造未完备，和地方党的幼稚与革命委员会工作的不实际，即停止了其进行，并拍电七军停止行动，一面积极改造八军纵队，将第一纵队旧的基础改造完备，即向靖西方面游击，以消灭靖西的反动势，以利左右两江的联络。旋闻第七军已出发隆安一带，且已胜利，并即令八军肃清靖西向右江配合。因率一连赴右江，至中途闻隆安已失败，至马湖时，七军已退燕洞朔乙，省〔百〕色已为白军占领，完全退集东兰。到达东兰时，则已向柳庆方面游击矣。再赶至河池拟随大队，已闻远去，且只有一连之兵，殊难再去，以是转东风帮助地方工作。五月初七军自贵州师旋，至河池，即与汇合。

(2) 七、八两军的缺点：

1、不懂得游击战争；2、内部改造没有完备；3、不知运用群众策略；4、军事技术人〈员〉能力薄弱。

(3) 七军的组织：现在三纵队一炮兵连一特务连。一纵队七百余人，枪六百多支，子弹可配二百发，机关枪迫击炮各二。二纵队八百余人，枪七百支，机关枪迫击炮各二。三纵队八百余人，枪七百支，迫击炮机关枪各二。全军共三千人，枪二千三百多支，杂枪在三百左右，战斗力一、二纵队较三纵队强，三纵队基础较一、二纵队强（给养因反动势力封锁下游，一切皆赖征发）。

(4) 今后将组〈织〉扩充的拟议：凡缴得敌人的枪支则补充或编配，每纵队分三营十二连，一特务连，配机关枪迫击炮各二，每连枪六十杆，战斗兵九十名，统共四千三百五十名战斗兵。

第八军第一纵队在靖江游击时，为左右江失败，向巷〔省〕边隐伏，今在凌云方面，闻尚有六连兵约四百人，已可合并补充编为第四纵队。

在赤卫队中已着手抽调好枪组织第五纵队，惟迫击炮不够分配。

统共五纵队战斗兵七千左右，枪四千杆，子弹皆配足二百发。

惟军事干部人材太过缺乏，政治人员也是〔少〕，训练上殊不易。现虽办有教导队，正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实行政治委员制，现只空缺军政治委员，在全军中找三个以上人员充政治委员不易，纵队中现只有一个，可能的〔在〕营中也选不出三个，连是却〔更〕难物色了。

士兵会尚未见得坚强。设法积极进行打破薪水观念。

(5) 现在的行动：七军成立已数月，长期跋涉与战争中，旧有士兵死亡残尽（四大队的），形极疲倦状态，急待休养补充和训练，在这时期正好蓄下锐气。且在右江左岸还有不少豪匪，需要帮助苏维埃肃清。并几月来得不到党的政治路线报告与指示——近似向湘省游击。

(6) 对中央与省委的要求：关于人材的问题已如上述，请派军政人材补充，即任何项人，七军亦□洽当，不拘籍贯。

(7) 地方党部幼稚与群众力量薄弱，地方党数量上虽有东兰、凤山、凌云、百色、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九县，同志一千五百多，质量上要找二人懂得党的政策是不能够，支部组织不健全，不能起核心作用，常在不同状态中。因地域环境上的需要，由陈洪涛、雷荣英〔璞〕、高永平组织右委指导一切。

(8) 苏维埃的一般：苏维埃现有东兰、凤山、凌云、百色、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九县，思阳镇革命委员会。但一切都不能执行，政权尚停顿在富农手里，形成新豪绅阶级。至于土地革命，全属官样文章，其他更不待论及。（右江苏维埃只有雷荣英〔璞〕一人，无形中形成了他一人的右江苏维埃），在过去的最笑话的弄到有临时苏维埃的招牌。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命令，□能遵照执行，（现洪涛到各地巡视及帮助改组，邓小平、陈豪人去各地帮助一切工作）。

(9) 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妇女及其他：赤卫队现分四路廿八营，每营二百四十杆杂枪，分驻各地，唯军政

工作人员缺乏，训练上困难，纪律很差，常有奸淫掳掠事发生，（现已抽调好枪编红军第五纵队）。少先队、童子团才具有雏形，妇女尚无若何进展，现由红军的女工作人员介绍到右江的政府，着手具体进行发展工作。

（10）教育群众上尚停顿。

（11）群众对苏维埃的认识都有很多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12）近右江荒早已成，恐与政府有影响。

（13）自邓同志到右江后，一切已纠正，积极发展雇农工会，引导雇农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对于一切口号提出及各种事宜，皆依中央路线，在事实上证明中央路线正确。

（14）对俞作豫同志的错误，由中央、省委给予处分。

豪人同志补充说明：七军在广西战争后，于右江一带积极改造并协剿豪匪，以巩固右江苏维埃政权。

在二月间，因得不到正确的政治消息，据探报广西混战焦点已移浔梧南宁宜庆。已拟向下推进，以扩大政治影响，如不能达南宁，即到下游一带发展。谁料敌自梧浔一线转邕反犯，以三团人压迫右江，七军因只有一团人在前线，因布置欠妥至遭失败。于是退过平马，敌大队进迫，旋退燕洞朔乙。旋据探报敌直迫百色，百色已失，宣电回师攻平马，剧战一昼夜，陷半城，敌援至，遂星夜退回燕朔，并悉有少数敌袭东兰，拟抄〈敌〉后，致歼灭之。达停四与敌鏖战几日，百色之敌追来，如是决〈定〉退向河池，拟向〈湘粤〉游击时，湘军屯于桂北，黔军屯于湘西，柳州向无群众基础，且恩思有敌三团来，故改道攻贵州，陷榕江。榕江是贵州三大城市之一，有军二营，骤闻我至，惊慌失措为我击破，缴枪

数十杆，马骡数十匹，大炮一门，无线电台拆毁，卒因敌援至，□团之众向我包围，乃向桂地退却，因夫力无着，将无线电台及大炮毁灭，湘省敌军□□□□向该方进展，于是决〈定〉回右江，肃清一切豪匪再视以定行止。时百色的桂军岑建英团及黔军残部李胜在那里，共千余人，为我击破，获枪二百多杆，水机关三挺，旱机关□挺，迫击炮三门，掠〔掳〕敌师长□□，已枪决，跟着黔滇军入桂，探悉其来桂入右江之□，如张冲师约三千人，决计引诱深入，用群众策略消灭之。乃遇〔命〕二纵队至思林下游，在对岸□沙一带埋伏，一纵队退入乡村，探敌过则跟踪追来，三纵队剿豪匪，战五昼夜将敌击退，张冲受伤。十九团团团长张华德阵亡，伤十六团团团长。毙营长二人，连排长士兵四百余人，伤七百余。我们亦死三十余，伤七十余，获枪数十杆，驴马十余匹，子弹□□万，内机关炮弹均有，我方弹甚少，似无助我。

王玉树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6年11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前委通告（第六号）

——目前政治形势和右江党的策略

（1930年9月9日）

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力量日益巩固

1、近百余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整个的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下，所有历史上的大小事变，莫不是间接的或直接的以帝国主义为主要动力。

2、帝国主义为要苟延其垂死的命运，不能不加紧殖民地的夺取，世界上的殖民地差不多已经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了。中国变成了最后瓜分的一块肥肉。

3、帝国主义没有一天不在更积极的向中国劳动群众施行其压榨政策。中国一切权利已经大半落在帝国主义手中，农村中普遍呈现破产的现象，民众的生活日益痛苦。同时中国资产阶级决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外国工厂的势力压倒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能扩大发展，且日趋倒闭，或为外国资本家所吞并。就是政治上的权力，也一天天落在帝国主义的手中，帝国主义在中国日益横行无忌。

4、总起全国的事实，充分的表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力量日益强大而巩固，帝国主义的企图是要瓜分中国，现在帝国主义正积极施行其瓜分中国的政策，整个的中国一天天

逼近殖民地化的悲惨境地。中国现在很显明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是殖民地化；一是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决无第三条道路的可能。

二、军阀混战的局面只有延长与扩大

5、帝国主义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发生了极剧烈的冲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时期，帝国主义（主要是英、日、美）更要加紧特种之收买和势力范围的夺取，作为第二次大战之□。

6、在帝国主义这样的政策之下，其实行的方式便是各自收买一部分军阀作为实现自己的政策的工具，所以历年来中国军阀混战的动力，莫不是帝国主义。当然军阀本身抢地盘的欲望和资产阶级反封建阶级的斗争，亦是促成军阀混战的一个主要动力。

7、此次军阀混战，是从去年春季开始，直到现在已有一年半之久。这一长期的混战，表现出英、日、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策略和瓜分中国的冲突。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是复兴北洋系来割据整个的北方，组织北京政府，英国是要两广、长江上游为根据地。美国则积极的抓住南京政府来扩大其势力范围。所以这次混战的背景，很明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阎、冯、张学良与英帝国主义的桂系和改组派来对抗美国的蒋介石。这正是表现世界帝国主义冲突的缩影：英、日在中国问题□相当的联合，对抗美国的形势。

8、从一年半的混战局面看来，总是一次比一次要剧烈、要扩大，直到现在已经是没有一省不卷入混战的漩涡，为从前所未有。现在战争的形势是在久战相持中，双方都没

有大进展。在实力的比较上看，反蒋的力量为大，但因内部不一致，（阎冯之间、阎冯与改组派之间、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之间，改组派与桂系之间、张学良与各派之间，都已经表现出冲突来）。由于政治、经济地位均不及蒋派之优越，故只能形成一个相等的局面。兼之双方后面都有极强大的帝国主义作后台老板，这些后台老板都是决心在这次混战中取得一个胜利的地位，所以这次混战决不是一个短期所能解决，他的前途更延长、更扩大，且更残酷，即使很快的分出一个胜负来，紧接着必又爆发第二次、第三次以至于无数次新形式的混战，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一句：中国革命没有胜利之前，军阀混战是没有停止的希望。

9、军阀混战给于全国民众的只是痛苦，在混战中我们只能看到田地荒芜和灾荒的迭起，工商业的凋零，生活程度的提高，人民负担的加重，数十万士兵群众的死亡，工农劳苦群众所受压迫的加剧。此外一点好处都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决不能幻〈想〉那一派胜利之后能够给我们民众一点好处。我们更不能幻想那一派胜利之后就可以停止战争。我们只能用革命群众暴动的手段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消灭军阀混战。

三、中国革命高潮日益逼近

10、自从前年济南惨案后，中国革命开始复兴，近数月来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就从报纸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种现象。最近南宁报载的湖南红军占据了岳洲与帝国主义的军舰发生战争。湖北的红军向汉口进攻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接触。长江上游的城市几次为红军所占领。朱毛到了广东，各

地农民大暴动。江西的赤色区域与红军日益发展而扩大，使国民党军阀政府无法维持（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辞职通电是如此说的），广州工人有暴动的消息，各地罢工运动与农民暴动风起云涌，全国士兵觉悟一天天提高。兵变的事实日有所闻。各地的发展和赤色区域的扩大，其进步是非常迅速的。群众革命的情绪异常的提高，这些事实告诉我们革命高潮的象征，已经是日益充分地具备。只要我们加紧的工作，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是很远的前途。

11、同时军阀混战的结果，必然是增加群众与更迫切地要求革命。军阀混战愈长久、愈扩大，愈是要削弱统治阶级的力量，国民党军阀政府必愈加动摇。统治阶级的动摇是革命条件之一，所以在目前军阀混战日益延长而扩大的局面中，革命的斗争必然是更猛烈的，更尖锐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亦必是增加其速度的。

12、现在的事实，打击了一切失败主义的根据。假使不是丧心病狂的人，一定不会再说出中国革命遥遥无期的话来。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过分的估量，以为已经开始了革命的高潮。这样的估量，必然要使党的策略走向左倾，而忽视了基本的工作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甚至在短期内革命高潮还未到来时，又会发生失败主义的观念。

13、现在中国革命的高潮虽日益逼近，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是远的前途，但决不是已经到了革命的高潮，最主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还嫌薄弱。目前我们正要深刻的认识这一点，很艰苦的来打破这些弱点，促进革命高潮之到来。

四、目前党的总任务和右江党的工作

14、在这样政治形势之下，党的任务当然是发展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加紧党的政纲的宣传，加紧反帝国主义和军阀混战的工作，用发动群众组织暴动的行动来消灭军阀混战，驱逐帝国主义，加紧群众斗争和组织的力量，加紧深入土地革命与彻底肃清封建势力的斗争，扩大红军的组织和苏维埃的区域，加速地会合全国红军的力量。一句话，就是要会合全国红军的力量，集聚广大的群众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来促进革命高潮。我们党在目前革命中所负担的任务是极严重而伟大（大的）。

15、在任务之下红军第七军和右江的党应集力量注意于下列几个工作之执行：

第一，扩大党的政纲、反军阀混战的宣传，要在一切机会，一切集会中，有计划的来实现这一工作。

第二，加紧纠正过去许多的错误，正确的执行深入土地革命、改造苏维埃、赤卫军的工作，要使群众和苏维埃赤卫军发生密切的联系。

第三，加紧秘密党的创造，加强党在苏维埃、赤卫军和群众中的领导，同时要加强群众的组织工作，〈特别〉要注意雇农工会、秘密的农民协会（或劳农会）、赤色救济会（即人道救济会）的组织。

第四，加紧红军的改造与扩大的工作，这一工作要红军的党和地方党部用极大的努力来作。红军第七军在目前政治形势之下，无疑的是要很快的向中心区域发展，实现其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之主要任务。

第五，关于上面几点工作已另有通告发出，各地党部必须切实执行该通告之指示。

在全国革命极大发展，党的任务更加重大之际，各级党部和每个同志都〈要〉加紧我们的工作，纠正过去的一切错误。各级党部得到此通告后，必须立刻召集会议详细讨论，并决定执行通告的工作计划，报告前委、右委为要。

前 委

一九三〇年九月九日

（据广西右江革命文物馆所存原件）

前委通告（第七号）

——目前右江党的工作方针

（1930年9月19日）

全国政治形势之发展，是革命高潮日趋逼近，党在这一时期中工作，加重了夺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右江现在红军与当地群众力量割据之下，形成了广大的苏维埃区域。可是党在群众中的基础仍是非常的薄弱，特别是因为各县党部的策略之不坚决的执行，及不正确的运用，以致在群众工作中形成绝大的危机。建立党在群众中之力量，巩固苏维埃，创造群众的基础，是右江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但群众基础的建立要有正确的策略，〈否则〉，不但不能挽救目前群众工作的危机，且将使这一危机扩大，使党在群众中的力量与影响日益缩小而至塌台。对目前右江情况，党的群众工作策略有三种不同的形式：赤色区域、白色区域及半白半赤的区域，应各有不同的策略，兹根据每一个区域中的环境分别规定目前工作方法如下：

一、赤色区域中工作方针

1、深入土地革命。目前在赤色区域中土地革命的斗争主要是分配土地问题。坚决地执行分配土地，以深入土地革

命斗争，是各县党部的主要任务。过去这一工作中，各县发生了许多危险的现象，主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因为各县苏维埃政权多半操于富农及动摇知识分子之手，对于深入土地革命策略，他们向来是犹豫的态度，或且简直故意的阻碍或延缓而不执行。这些分子戴着革命假面具，操纵苏维埃政权，常利用其地位，不召集苏维埃政府的会议或群众大会，暗改决议等办法，及以进行调查土地关系之后再行分配等等理由来阻碍〈延〉缓这一工作。恩隆、果德等县至今尚未分配土地，就是这种现象。第二，新豪绅及富农包办了分配土地的工作，有许多地方的苏维埃委员成份，小地主占了过半，他们也利用其地位或者保存着其原来私有之土地，或者分配水田、肥田给自己及自己的朋友亲戚，而将瘦田、旱田分给贫农、雇农，这是站在新豪绅、小地主、富农方面，违反了贫农、雇农利益的分配方法，恩林就是如此。第三，各县党和苏维埃不去发动广大群众的行动，而只是站在群众之上，去命令群众分配土地，他们并不考察各地实际的情况、土地的关系、农民的成分、群众的要求与情绪，也不管群众对于分配土地办法的意见怎样，只是很简单的由自己头脑中想出一种分配的办法，好象命令一样去向群众宣传一下，就完成了这样重大的事件。这里〔种〕分配的办法当然未必适合群众的意见，而且对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策略的运用未必正确，必然的要引起群众的怀疑与不满。恩隆及许多地方都患了这一毛病。各县党部只有坚决的领导群众与这些倾向斗争，纠正这些错误，土地革命的斗争才能够深入。现在各县党部及苏维埃党团对于分配土地问题必须注意下列几点的工作：

(1) 审查过去分配之实际的状况，随时纠正一切错误。

(2) 如发现某处分配土地不当，则应召集群众大会讨论解决办法，必要时可举行重新分配。

(3) 分配土地应以乡为单位，开乡苏维埃大会解决之。

(4) 分配土地时应鼓动群众，提高其情绪，了解其意义，要有群众的行动，分配土地的各种办法，应向群众作详细的解释，根据群众大多数意见决定之。

2、改造苏维埃。改造各县苏维埃，以挽救苏维埃在群众中信仰，亦是极重〈要〉之问题。现在各县改造苏维埃情形只是表面上的工作，形式上提拔了几个贫农、雇农分子委员，实际上不发生一点作用，改造苏维埃仍然在一二动摇的知识分子操纵之下，他们并不站在贫农、雇农利益方面，政治上仍然是富农、新豪绅领导之下。这一现象若不加紧纠正，则群众对于苏维埃不满的情绪将不能消灭，苏维埃永不能在群众中建立起信仰来。因此，各县党部关于苏维埃工作问题要进行下列工作：

(1) 集中力量整顿乡苏维埃的工作，必要的由下而上的改造来。

(2) 检查县苏维埃如有组织成分不好时，右江苏维埃应该停止其职权，派员代行该县苏维埃政府职权，或号召群众改组之。如各县苏维埃中有一二不良分子〈混入〉苏〈维埃〉，该县苏维埃要即时撤换之。各级苏维埃□□对□□剥削者（小地主、富农等）□□。

(3) 苏维埃组织成分应以贫农、雇农□□□中农可参加，但不是组织的中心，参加苏维埃的贫农、雇农分子，必

须是斗争中表现勇敢坚决的积极分子，必要识字的，不一定能力很强，但党应该设法在苏维埃中教育他们，使他们学习〔会〕工作。

〈4〉肃清苏维埃中官僚化的现象，如讨小老婆，乱用公款，怠工，不接近群众等，推动苏维埃委员到群众中去接近群众，做群众工作。

（5）各级苏维埃要开始进行各种斗争的组织，如交通队、运输队、侦探队、破坏队、少年先锋队等等，使苏维埃下每一个群众都参加工作，与苏维埃发生密切关系。

（6）苏维埃对于文化运动、识字运动、娱乐机关及赤色救济会等工作要积极进行，以提高群众的革命情绪。

3、发展雇农工会的组织。土地问题只有在农村无产阶级——雇农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决，才能深入。因此，组织雇农工会为苏维埃的核心，最为重要。党应即刻在各县开始组织雇农工会的工作，各区组织雇农分会，各乡小组，每乡有三个雇农即可成立小组，雇农小组在各乡中必然的将起着重大的作用。各地实际的经验，有雇农工会的地□□□斗争就马上发动起来。党必须加紧雇农工会的工作，以雇农工会的力量，在苏维埃中起领导作用。只有如此，目前改造苏维埃及深入土地革命才有办法。

4、改造赤卫军。彻底改造赤卫军，赤卫军的（成分必须是）贫农、雇农的斗争分子，防富农加入进来。赤卫军的各级干部必须是对于革命坚决的分子，要肃清新豪绅、富农及不坚决斗争的动摇分子。过去赤卫军（多半）在动摇的甚至反革命的分子把持之下，收捐收税，压迫农民，强奸妇女，任意烧杀，无恶不为，致引起一般群众之强烈的不满，

将苏维埃、赤卫军的信仰破坏净尽。过去赤卫军组织不好，就是发出〔生〕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对于赤卫军组织问题，目前应根〔据〕赤卫军建立……如下：

第一，取消各县组织的系统□□□□枪支□□□个时□□归□□苏维埃直接指挥。

第二，各县编赤卫军一营，由各族县苏维埃直接指挥。各县赤卫军应□经常的集中训练。赤卫军的士兵当兵应有一定的年限（一年或两年），不能随时回家，任意叫人代替。□□□军队组织形式。

第三，编余赤卫军之士兵及枪支遣散回乡，强壮者送红军当兵。

第四，各乡应有赤卫队的组织，作为赤卫军的预备队，每二日或□日出操训练一次，平时在家种田或做工，有事时马上集中起来，如此才可以避免不〔参加〕生产人太多而引起经济恐慌的危险。

第五，建立秘密党的基础，目前各县党部应由半公开的状态转变入秘密的组织，这是极重〔要〕问题，假使党在此时不能建立起秘密工作，则政治变动或红军出外游击时，反动力量一到，一切工作必定□踏乏。过去各县党部丝毫没有注意到秘密工作，一切负责同志都兼作苏维埃工作，一切同志都是挂红带的，党的各种会议在苏维埃机关内公开开会□□快现象，这些现象必须很快的纠正过来。目前党要开始注意秘密工作，党要秘密机关，秘密交通路线的建设。党的干部要有一部分专做秘密工作，不参加苏府及群众的组织，只有秘密党的组织建立起来，将来白色势力到来时，党才能继续着活动。目前党的工作除秘密工作之外，还有应注意的几

点：（一）提拔从斗争中出来的贫雇农□□□训练成为干部；（二）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肃清反动腐化的分子，改造党的基础。同时发展贫雇农、工人同志创造新的基础；（三）建立党的生活，每个同志应参加党的会议，做工作，交党费，讨论党的策略，阅□党的文件，介绍同志，发动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斗争，自我批评等。

二、白色区域中工作方针

在白色区域中工作主要是扩大党及苏府的政治影响。于群众中及建立秘密工作的线索，但□秘密农协，目前红军及赤卫队应该派队伍往白色区域中作扩大的宣传，夺取群□□□设法分化豪绅欺骗之群众，公开宣传他们即刻回家，复业及缴枪回来，不究既往。同时应在与群众接近的机会，找出好的贫雇农、工人分子或暗中派遣没有色彩的同志到白色区域中工作，为秘密工作的线索，发展秘密农会的组织。假如在白色区域中，以红军或赤卫队之力量，能有相当时期占领，则肃清豪绅地主，发动群众斗争及组织公开农会亦是非常重要。只有公开农会组织，才能号召广大群众参加进来。但公开农会中，必须有秘密的候补员的存在。要以最好的分子组织委员会，以备红军及赤卫军退出时农会可转为完全秘密的机关，还能够在群众中活动。秘密农会在政治上仍然是要公开的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斗争，仍然是要以农会的名义去号召，只有如此，才能将广大农会的影响，才能扩大群众团结在农会之内，否则农会将缩小到党的范围里来，而失其群众组织的作用。利用一切旧的名义来组织接近群众的机会。团结广大群众也是在白色区域中群众工作的重要策略。

平民学校、拳术团、游□□社、俱乐部等都是最好形式。

三、半红半白区域中工作方针

半红半白区域就是已挂出苏维埃的招牌，但毫无群众基础，工作极不深入的地方，在这样的区域中工作，改选苏维埃、赤卫军、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与在赤色区域中同样的重要。但是要组织的农会，以建立群众组织的基础，同时发展党的同志，建立秘密的组织更为重要。

目前右江党的工作，应有以上三种区域中不同的方针的确定，此外，尚有二种危险倾向，必须严加纠正。特别是在赤色区域中，××地患了这两种危险倾向更为重要。第一□□□烧杀政策是驱逐群众投降敌人，压迫群众加入豪绅的队伍的方法。现在赤□□□□白色区域，就实行无目的烧杀，一烧数十百家，也不管是豪绅或者农民的房屋，见人拉到就杀，并不管他是农民或是豪绅地主，这是各的普遍现象。××地特别严重。这样无目的烧杀，不懂执行分化敌人夺取群众的策略，只有吓退群众，使党在白色区域中工作无法建立起来。因此反对烧杀政策，禁止无目的烧杀，是目前夺取群众的重要政策。党应以革命的意义及实际的经验教育群众，纠正其错误观念。第二机械的执行反富农策略，对于富农无条件的加以烧杀，以致引起农村中恐慌的现象。全数富农都联络反动起来，中农离开贫农雇农而与富农联络，这一现象若不即加纠正，则土地革命必然的要走入失败的道路。我们对于富农的策略，是要贫农雇农与富农争取农村中的领导权，富农反革命时，才可以取对待豪绅地主的办法对待他们；绝不是要杀尽一切富农。因为杀尽富农的政策，必然会

使中农由动摇恐□□□为富农的领导。如此则贫农雇农的力量孤立起来，土地革命终归失败。因此以后对于富农中已经在行动上表现反革命的分子，我们要以反革命的罪名杀之，并不是因为他是富农而杀他。凡尚未有反革命行动的富农，除排除他参加苏维埃政权（当苏维埃委员）及赤卫军之□，则一切得应与苏维埃下一切群众一样。党应坚决的与这种危险倾向斗争，否则，这种现象不□□下去，土地革命将走进失败的道路。

过去右委曾发出关于反富农问题之通告，对于反富农策略有详细之说明，但各地应用错误，应重新提出讨论至要。

□□对右江党的工作方针已如上之规定，各县党部接到此通知后，要详细加以详细讨论，并遵照这工作方针定出各地计划来报知为要。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11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七军工作总报告

陈 豪 人

(1931年3月9日)

一、七军成立前准备工作

1、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我们的策略。

自俞、李进攻广东失败之后，俞之部队几全数为旧桂系所掌握，所余者仅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及教导队三部。教导队中则有我们相当的基础，第四大队、第五大队中我们亦有工作，但第五大队基础极薄弱而已。俞失败出走，李明瑞率其特务营及第五大队（俞作豫的）往左江龙彬〔州〕一带，张云逸则率第四大队及教导队，往右江百色一带。因为俞、李失败后，广西旧桂系复兴，仍形成与广东对抗之局面，军阀混战仍未已，四、五大队在左右江之割据始能安然无事。

右江各县与滇、黔交界，在军事上对于广西局面非必争之地，且交通阻塞，经济落后，地形险要，易于形成一独立之区域。当第四大队至右江之时，俞之旧部第三队亦跟踪而来。该部多系土匪编成，约一团人，枪仅四百多支。三、四大队因同在俞之旗帜之下，虽两方猜疑甚深，表面上仍安然相处于右江各县。但右江土匪如毛，与第三大队均有历史关系。同时右江一带豪绅力量颇强，各县均有豪绅武装，已编

成队伍中共有枪二千余支。右江豪绅在历史上与俞作柏政权成对抗之局面，第四大队以俞之旗帜驻右江，所以各县豪绅蠢动，东兰、凤山、凌云各县县城均为其占领，有与第三大队土匪合谋解决第四大队之企图。

当时右江群众反豪绅之斗争情绪颇高，各地与豪绅武装冲突之事不断的发生，尤以东兰群众力量为大，因该县农民在韦拔群领导之下已有数年斗争之历史。不过其它各县群众之组织基础甚薄弱，农会才开始组织，武装亦甚少，党的领导力量更微弱，右江十多县中仅东兰、平马、思林、奉议四、五县有党的组织，且只有同志三四人、七八人不等。

第四大队虽在俞之旗帜之下，但大队长为我们同志，下级干部及士兵中我们亦有一部分力量。教导团的基础在我们掌握中，且俞已出走，客观的环境极便利于我们的工作。第四大队力量，共有三营人及机关枪连，人数千余，步枪一千杆，再合教导团约一营人，共有枪一千三百杆左右，尚有第五大队第五营，当时亦在右江，归第四大队指挥，惟该营营长极反动，且驻兵地方偏僻，实际上指挥不到，形成独立力量。第四大队除已编成队伍之力量外，在军械方面尚有从南宁搬来步枪千余支，子弹七八十万发，大炮四门，追击炮六七挺，水机关枪七八挺，轻早机关枪十数架，在军实方面不可讲不充足。惟当时俞之故旧及学生在四大队中充当干部者甚多，力量不弱。我们在兵士中基础又不广大，所以转变为红军之企图尚不能马上实现。当时军委（左右江军队中党的最高机关）即照以下之策略积极进行：

（1）积极发动群众斗争，充分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部；

(2) 改造第四大队，逐渐撤换反动军官，加强士兵工作，改造士兵成份（增加大批农民入军队中）；

(3) 号召群众并以军队力量协同群众扑灭豪绅武装；

(4) 解决第三大队，围缴其枪械；

(5) 扩充新的部队，培养新的干部；

2、改造第四大队与发动右江群众工作。

根据以上策略之决定，我们去进行改造第四大队与发动右江群众的工作。自一九二九年十月第四大队到右江以后，经过约二个月之工作，成绩颇好。兹将工作经过情形概述于下：

当时豪绅主要力量集中在东兰、凤山一带及平马的乡村中，与第四大队对抗，随时向农民袭击。我们到右江之第一天即开始武装农民，运来之五千杆步枪，大部分都是分给东兰、凤山、奉议、平马、果德、向都等六县农会，以武装群众，组织农军。右江群众得此大批武装，并眼见着第四大队站在农民方面反豪绅，莫不欢天喜地，斗争情绪益高，天天向豪绅进攻。农民与豪绅的武装冲突，遂蔓延右江各县，第四大队亦分兵帮助各县农军扑灭豪绅。在当时反豪绅的武装冲突中，每次都有广大群众参加，且在作战中继续不断的增加群众的数量，张曾给以第四大队士兵以深刻的影响。他们过去在军阀部队当兵，在军阀混战及剿匪时，只看见两方敌对兵力的对抗，绝未见过有群众热烈参加的情况，所以当时士气甚盛，士兵时常高兴地说：“我们的人愈打愈多啊”！同时“打倒土豪劣绅”的实际行动在第四大队中也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了。经过这样的武装冲突之后，东兰、凤山县城均为农民所占领，平马的豪绅也受重大打击。第四大队又

派兵光复了凌云县城，豪绅的气焰稍扼下去。不过在与豪绅的冲突中，农民群众实行烧杀政策的错误倾向颇严重，每攻下豪绅所占据之村庄，必焚毁一空，且亦不分别是豪绅地主抑系其统治下之农民，有见人即杀之势。此种倾向经严厉的禁止，多方的解释，虽稍为改正一点，但仍未禁绝。因烧杀政策之结果，豪绅所欺骗下之农民，几乎全是始终站在豪绅方面，极少投过来的现象。

在反豪绅武装冲突的过程中，微弱的党和群众组织的基础，均渐渐强大起来。在百色、奉议、平马、思林、东兰、凤山均已成立县委的组织，果德、向都也成立了特支。右江工作委员会，则早以〔已〕建立起来了。党员数量达五六百人，惟党的领导机关多系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反豪绅之初期斗争中均在领导群众而为群众中干部分子，在以后斗争深入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同志一部分因其经济背景之关系，有成为阻碍群众斗争深入者。当时党没有在工人、农民群众中吸收广大的积极分子进来，以巩固党的基础，这是极错误的事情。农会的发展更快，奉议、平马、思林、果德、东兰、凤山县农民协会均已建立起来，且有广大之群众。百色、向都、凌云虽尚未有县农协之组织，但乡农协亦有一部分组织起来。同时右委尚亦曾决定在平马组织广西省农协右江办事处。以指挥右江各县农民运动。右江农协办事处，当时在群众颇有信仰。在农协工作中，我们亦做出了极大的错误，就是各乡、区农协以至县农协中多在一般知识分子操纵之下，这些知识分子的背景，多半很坏的，有的与旧豪绅尚有关系，有成为新豪绅而为富农在政治上之代表，农军的武装好多操在他们的手里。这种现象乃种下以后右江工

作之恶果，以平马、思林为最严重。这种恶果在土地革命深入的时候，就充分的表现出来了！工会的组织，在百色及平马亦甚发展，百色为右江政治、经济之中心，商业颇繁盛，店员与手工业工人数量颇多。当时军委用很大力量做百色工作，建立十九个工会，工人群众情绪亦甚高，要求加薪改良待遇的斗争接踵而起（要求减时斗争甚少），均得到胜利。百色总工会于十二月初在二百多人之各工会代表大会中建立出来，在群众中颇有权威。平马的商业资本家多兼豪绅地主，自第四大队到右江后，这些店东早已逃走，商业停业者甚多，工人多散回乡村去，未能集中于县城，所以平马工人工作较难进行，虽亦组织了十多个工会，惟斗争甚少，工会群众不多。

在群众斗争的发展当中，第四大队内部反动军官渐恐慌，而至企图推翻我们的密谋。对于这些反动不革命的军官，我们亦用上级的命令逐渐撤换之，有时亦有发动士兵群众驱逐这些军官，但占〔有〕少数之例外而已。被撤换之军官（指带兵的）多安插以无实权之位置，此虽系当时应付环境之用意，但于后来工作亦留多少不好之结果。这些不良分子常有拐款潜逃，暗中制造谣言，时出怨言，以及各种不良于我们的密谋等事发生。这也是军委当时对于处置这些事情，欠于适当的地方。

当时对于士兵政治教育亦曾有积极之工作，第四大队队部之内设有政治委员会，为政治工作最高机关。各营、连则设政治委员（当时政治委员即指导员，并未有现在中央规定政委之含义）。政治委员随军，在与豪绅之武装战斗中，从实际方面，启发士兵之阶级意识，在平时则每〈周〉上政治

讲堂一小时至二小时，则举行个别谈话，举行士兵会，唱革命歌曲，娱乐游戏，及率领士兵到街道上、农村中向工农宣传等等。在这时期中，士兵稍形活泼之气象，工农兵联合反国民党的观念，渐深入士兵之脑海中。

同时我们召集了千多数〔名〕农民，扩充部队，组织特务营及机关枪营，并参加农民分子于各部队中，部队的农民成分增加，亦得了很好的影响。我们一方面进行扩充部队，一方面又加紧军事训练，并从打豪绅的行动中，增加了新兵不少的作战经验，壮了他们的勇气。

在我们积极改造部队、发动群众的行动中，共产党的半公开活动，渐为一般社会所窥见。且《右江日报》（我们到右江后办的报纸）之半公开的宣传，第四大队的色彩渐为人所看出。由是右江一般反动势力——第三大队、豪绅民团、土匪、第四大队内部少数反动分子，渐由大团结而谋解决第四大队之企图。当时我们对内部之整理稍有结果，外部之群众斗争也渐扩大起来，豪绅力量受了相当的打击。我们遂决心解决第三大队，扣留其大队长小军阀熊镛，围缴其部队枪械。约有一百多支枪逃出此役，我们又得枪三百多支，大部均发与农军，由此第四大队在右江的局面渐次稳定了。

3、转变时机的成熟。

第四大队到了右江以后，经月余工作，在部队本身之改造方面，发动群众斗争方面，及对反动势力之镇压均有相当成效。此时我们对四大队之掌握已相当巩固，后得中央之指示，我们准备更积极，并于十二月十一日决定广州暴动纪念中举行转变，成立红军第七军。在这一时期中，我们为要取得群众之同情，宣布了取消二三十种苛捐杂税，影响颇好。

我们并在报纸上公开提出拥护苏联、反对军阀混战、拥护红军、反对国民党种种宣传，一般群众及士兵的心理为之一变，对于国民党留下的心理渐次消蚀了。同时我们并刊行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共产党任务、苏联、土地革命、反国民党打红军、红军等小册子，对宣传颇收了一些效果。同时在党内开设训练部，更确定了同志的观念，党内更一致的热烈于转变工作，转变到了成熟的时期了。当时我们乃集中部队百色、平马二地，待期举行转变，以免部队分散，以免发生事变。

转变后关于新干部补充问题，亦颇重要，我们在准备时期中已顾虑到。当时即成立新教导队，开办军事政治训练所，招集右江一带革命青年加以军事、政治之训练。技术方面之转变，如布告、传单、旗帜等等，均在转变的前数日秘密进行。我们并于转变前数日，向商人筹得十数万现款。

二、七军转变的概况

1、转变的方式。

我们党在第四大队的工作，是在特殊顺利的情况之下进行着。当时第四大队在右江形成独立力量，上面并无任何长官统治着，又在两广军阀混战未已的时候，第四大队最高长官又为我们同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乃有和平转变的特殊情形。当时转变是采取了由上层的命令和士兵、工农拥护之下而进行之方式。当转变前一日，百色工人代表大会及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热烈的通过要求第四大队转变为红军，并拥护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当时未有政治委员制度）的决议。在士兵代表大会中，并且通过官兵平等

待遇，月饷二十元及要求肃清反动军官等决议案。会场空气非常紧张，情形热烈，“我们要当红军呵！”的呼声震天。次日（十一日）在百色，十二日在平马开群众大会，并由军长，政治部主任布告就职，第七军就在这样的方式之下转变成立。这种转变方式显然只能应用于七军特殊情形之下。

这种和平转变的方法，虽给第七军在转变时以许多便利，但亦留下许多困难于未来。因为这样的转变，还不是由士兵的自觉要求，主要的出于上层之命令。到了七军成立以后，乃有多数老兵不愿报国而发生逃走现象。关于月饷二十元之提出，原系我们顾虑到，未能掌握着全数士兵以这个口号号召他们赞同转变的用意，但一方加重了士兵雇佣观念，是不好的影响。以后经过了长久的解释，从斗争中锻炼了七军才废除了这个口号。当举行转变前一日，我们勒令百色商家将公枪和私枪一概自动缴来，围缴那□□□□之枪械，并告诉他们用这些枪支组织赤卫队，武装工人。同时扣留几个旧政府之官吏，枪决部队中两个反动的营长以肃清内部。

十二月十一日百色开群众大会，纪念广暴并举行七军成立典礼，到会工人群众数千，农民数百人（百色群众运动才开始，工人较发展），为百色第一次最盛大的大会。驻色部队千人全体参加，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革命空气甚紧张。十二日在平马开群众大会，到者竟达三四万人，为平马历史上说来未有之广大群众运动。会中演说声、呼口号声、欢呼声震天。开会时间迫击炮三声庆祝，会场群众有许多尚听不到炮响，可见群众当时之热烈，此亦表明右江群众对于红军之热烈拥护也。

2、七军成立时的一般情况。

七军成立时共有三个纵队，是由第四大队、第五大队之五营一部、东兰韦拔群所部农军（约六七百枪）及奉议农军一营合组而成。每纵队约等一团人力量，尚有军部直属部队，如特务营、小炮连、教导队、军政训练所等。当时第一纵队颇有战斗力，第二纵队只有一营人有战斗力，第三纵队名义上虽已编成，实在仍散在东兰、凤山两县各乡中镇压豪绅，未能集中，战斗力也薄弱。至于枪支、子弹则均精锐充足，一般士兵之政治觉悟当然以第三纵队久经斗争之农民为最好。因为当时安处在右江百色一带，粮饷充足，士兵亦未有如何不好表现，在一般老兵中，自然不能表现出彻底的阶级觉悟。

三、右江十县政权的建立与七军在隆安的失败

1、建立政权的斗争与反革命的两次进攻。

七军成立之后，一切行动均受前委之指挥，前委对于七军初期的行动策略，决定暂在右江各县实行分兵游击以深入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起来。百色、恩阳、奉议、平马、思林、果德、隆安、东兰、凤山、凌云、向都等十一县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产生之后，又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为右江政权之最高机关。各县政权以百色、东兰为最得群众之拥护。百色苏维埃以百色总工会为核心，苏维埃主要人员均系工人分子，确能代表群众之利益而奋斗，且无官僚主义腐化之倾向。东兰之群众斗争颇久，故苏维埃政府有广大之斗争群众为基础，亦甚稳固。平马、奉议、思林、果德、凤山等县苏维埃开始亦有广大群众之拥护，但因多为富农新豪绅所把持，在群众斗争深入之后，七军第一次

离开右江的时候，反为阻碍群众斗争之机关，而渐脱离了广大群众。恩阳、凌云、向都、隆安等县群众基础很弱，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待军事力量一去，亦同之瓦解。七军对于苏维埃问题未能加以十分注意，致多为富农新豪绅所把持，实为最沉痛之教训。

七军在初时，以百色、平马、东兰为三个中心，分兵各县游击。军部直属部队及第二纵队在百色，第一纵队和平马，第三纵队在东兰，常分散兵力肃清豪绅，每日派工作人员及士兵中干部分组下乡组织农会，没收豪绅地主财产谷子，分散给与贫苦农民。每到一乡，首先一二次号召农民来搬地主之谷子，他们都不敢动，后由士兵搬到他家里，再过二三月，大家都来争抢了，这样的行动极得到群众之同情。甚易发动他们起来斗争，右江农民斗争也如其他各地一样，开始时仅在反土豪劣绅口号之下而行动，斗争逐渐一步一步的深入。进到反对地主，不交租，没收土地，杀豪绅地主，直至于分配土地。当时我们提出不还债的口号，有些农民不大表同情，实际这个口号也有毛病，后改为不还高利贷。富农在土地革命斗争始由动摇而渐至于反革命，可由许多事实证明出来。

七军分兵游击时，又犯了驻兵太散的毛病。因此第一难于集中力量做群众及部队中工作，第二给了反动力量以有机可乘向我袭击之机会。因为游击之结果及右江土匪与豪绅之特殊关系（土匪与民团合作），他们乃大团结乘我百色兵力薄弱的时候来进攻了两次，结果都被我军击溃了，右江内部反动的武装民团那时已无能力再来蠢动了。

2、广西政局变化与游击南宁之决定。

当七军在右江工作有了相当进展之后，七军本身军事、政治训练也有了相当成效，那一时期蒋、桂正在粤北江、桂北一带剧战。这次大混战的结果，据我们得到的确实消息又是两败俱伤的形势，两方面均不能马上再战，在互相严重监视之下。当时桂系的主力集中柳州、桂林之线，桂系吕焕炎所部主力在梧州，忽通电降粤反桂，时值一九三〇年一月间，南宁驻吕部，杨义旅驻一团，蒙志仁团（第五大队叛变出来的约有枪四百多支）及警备第六大队张贯之部不及一团兵力（战斗力极弱），在吕之挟制之下均通电反桂降粤。但不久蒙志仁、张贯之联合解决杨义部一团，又反吕归桂系。当时前委估量广西统治阶级，在南宁极薄弱，仅蒙志仁、张贯之所部及解决杨旅一团所编过的一部，总计枪支不过一千五百支，且张部战斗力甚弱，以我们力量（七八两军）进攻南宁敌人颇有把握。前委更估量到桂系主力在柳州、桂林一带正受粤军及梧州吕部所压迫的时候，目前无力顾及南宁。当时七军士气很壮，一般下级干部及士兵心理均欲进攻南宁，前委乃站在扩大政治影响，决定游击南宁一次。游击南宁之军事布置，以右左江为后方，四日第二纵队两营守百色，赤卫军守平马，军部率特务营、教导队训练所（约一营）、山炮连、第一纵队全部、第二纵队一营、第三纵队两营及赤卫军千余人，从右江向南宁进攻。第八军全部从左江向南宁进攻。这个策略决定后，因八军及第三纵队之准备约半个月后，七军方集中果德、隆安一带，决于二月六日从隆安向南宁前进。二月八日在南宁附近与八军会合实行进攻后，因政局之变动，敌已先我们而来，南宁游击策略未得实现而失败。此次策略之错误，主要的在于前委未在政治上有

深刻的估计。南宁是广西政治中心地方，反革命无论如何必竭其全力以保守之，绝不致易于放弃。前委忽略了这一点，乃有此错误策略之决定。关于游击南宁的准备中，军中从上级指挥官至士兵都带有十分轻敌的情绪，游击南宁的策略很早就公开宣布于群众等等，这也都是错误中较小的问题。

3、隆安战后的失败。

当我们准备攻南宁的时候，广西战事又生了变化，即是在此时桂系在战略上有了大大改变。桂系主力移到南宁，决心以南宁及左右江为后方，向廉、钦攻广东。在桂系这一战略之下，乃分三团攻右江，二月三日早晨敌至隆安城边，我军才发觉敌情，城中竟第一纵队直属部队（机、迫、特务等连）及第一营仓卒应战，纵队长即受伤，部队乃由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及第一营营长协同指挥，战数小时，即将敌两团击退，夺枪百余支，机枪一挺。后敌又增兵一团，我军在隆安部队与之相持一日夜，以待援。二月四日后，支援部队陆续到齐，激战四日夜，我军均连连胜利，敌在最危险时候，将敌军集中向我反攻一点，我军士兵只能冲不能守，为其冲破一点全线乃溃退。此役损失约一营人，沈静斋同志指挥四日未睡，彼原是体弱之人，退出时走不动，为其俘虏死难。沈同志在党内任一纵队队委书记，为官兵及同志们信仰亲爱之领袖。今日尚有许多下级干部、士兵思念之，谈及此事尚觉得有所失。我军直退平马，敌跟踪来，我军离平马数十里之村庄休息，敌大队跟入直插百色，百色留守之部亦退至凌云向东走，方与大队会合。在隆安战役中，有以下教训：

第一，我们不应隆安应战，因隆安群众基础甚弱，且无

防可守，也不利于增兵，我兵力又未在隆安集中，诸多不利。当时如诱敌深入至果德、思林一带的方向。对我均有利，且可应用群众武装，较有胜利把握。

第二，我军士兵只能冲不能守，冲锋时任何强敌都当〔挡〕不住，为人所攻即难坚守，隆安之失败应在此。（后检得敌军日记，极述我军士兵之猛勇难当。依日记中有一句云：“共党放隆安狱犯到前线冲锋，饶勇异常”）。

第三，一般干部作战经验太少，在隆安战役中，竟有分队在未得到命令之时，敢自动增加前线的事情发生，可见当时干部在军队中习惯尚有未懂的。

第四，七军未注意到经理、军需、副官、参谋处各部分的组织，多用不负责的、对革命无认识的充当这些职务。隆安作战，后方经理处对子弹接济不及，当时有九连部队用尽不能应战。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反攻敌人的准备及其结果

1、反攻和准备及平马的胜利退兵。

隆安失败后，我军退平马附近之村庄，当时企图与留守百色之部队两营会合后，在敌分兵百色时即向平马反攻。但一般群众及地方党部，即欲七军恢复右江沿河政权时来作种种催促。不久右江党部及右江苏维埃政府忽来报告，说平马之敌大部撤退，听说下游有战事，仅留一营人留守平马，七军对此消息亦未加如何考虑即决定反攻平马。及至与敌接触时，发现敌约有一团多人，始知受骗，不得已应战，激战一日始将敌击退，占领街道之一部，敌大部向百色、奉议退却，小部仍占领街道，一部扼险死守，当夜连攻数次不破。

我军恐敌增兵赶到，乃自行撤退，惟有极小部及赤卫军未得通知，在街道与敌人战了两昼夜才退出。后又闻敌军一团到了离平马九十里之奉议县城，因见其大部溃退，又闻在平残部为我解决，亦不敢前进，然我军已行〔先〕胜利的退兵了。此役给与士兵与群众之不好的影响，大家都怪指挥官缺少进攻精神已至〔以致〕半途而废，事后论断七军的确缺少进攻精神。

2、停四〔亭泗〕遭遇战后困难的时期。

平马之役无结果而退，七军大部乃至平马与东兰交界处之市镇燕洞休息，此时士气经两次打击后已不振。不久第二纵队亦到会合，次日忽得敌绕道截我东兰僻路之消息。当时匆忙率队向东兰前进，决心背东兰待敌来与之作战，谁知敌已绕了两日的路程，经过了许多的苏维埃区域，包了我军的后方（苏区赤卫军惊慌逃走未来报告），在停四〔亭泗〕遭遇剧战一日，两败俱伤，我退敌亦退，但敌死伤较大。

七军成立时初期士气甚壮，精神紧张，连遭这三打击之后，士气为之衰颓，一部干部、士兵失败情绪均甚浓厚。停四〔亭泗〕失败后，在盘阳（东兰、凤山交界）驻兵月余。该地又是穷苦的地方，粮食时感困难，士兵之零用更是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部队中的整理训练工作都进行得极缓，群众工作也极少进行，党内也充分表现失败情绪之反映，一切工作都形成了停滞的状态。

3、向外游击的决定。

在这样情况之下，七军若困处右江偏僻的县分是没有出路的，由是前委乃有向外游击之决定。七军曾接受指示：湘、粤边界为发展之路线。所以七军出发游击时，即拟向

湘、粤边界游击前进。但因七军在隆安失败的时候，曾电知八军绕道桂、滇边界到东兰会合。当时八军亦必受敌之压迫，过来会合乃为上计。惟迟迟不得八军过来之讯，为着与八军之联络便利起见，前委乃决定留第三纵队留守东兰，军部率第一二纵队及直属部队在河池、南丹（均与东兰交界的县分）一带游击，发动群众斗争，待会合八军之后，则以全力向湘、粤边界发展。此种决定之后，出发部队乃由东兰向河池前进，实现这一策略。

五、桂、黔一带游击战争

1、河池的游击工作及思恩之失败。

四月初，七军到了河池。河池民众久在反动统治之下，受了反动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说什么“共产共妻，十五岁以下的小孩子，三十岁以上成年均在杀戮之列”等等无稽之谈，一般群众确是惊恐万状，逃避一空。但红军一到，举动确是“文明”，迁逃者二三日内渐渐搬回，商店亦照常营业。红军废除一切捐税之政纲大得民众之拥护，他们传说：“红军取消苛捐杂税，莫不欢天喜地。”占领河池县城，我军又分兵各乡宣传，没收地主谷子给农民，又大得农民群众之赞同，来报告豪绅之罪恶及行踪者接踵而至。我们召集了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数百人，有一青年上台演讲，反国民党情绪甚热烈。在大会中乃通过革命委员会之名单，河池革委即告成立，参加者有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之分子，红军亦有代表参加。驻河池七八日间，组织了几个农会、工会，士兵见了群众的欢迎，士气渐恢复了。

七军到河池后，得知庆远敌人甚少，庆远离柳州仅三日

路程，为重要商业县分，解决红军经济问题必有办法，前委乃决定派一纵队到怀远游击（怀远为庆远之第一镇，商业更盛于庆远），留一纵队在河池工作。并料定敌必来对付，乃决定到了怀远后，三数日即回河池。第一纵队到怀远，敌数百闻风先逃，过河至庆远。我军在怀远数日，筹款及发动群众影响颇好。后闻敌来，第一纵队由怀远退思恩。并约二纵队亦由河池至思恩会合。那知第一纵队到思恩敌已跟踵而来。稍抵抗即退却。此役损失三十余枪，死伤亦三十多人。

2、进攻榕江的胜利及其政治影响。

自思恩失败，一纵队经宜北县城，在桂、黔交界之乡村中才得会合第二纵队。七军初次向外游击又遭此打击，一切物质上均感困难，无法补充。当时得贵州内部有战事及榕江（即古州，为贵州重要城市）兵少的消息，前委乃决定向榕前进，攻敌不意。从桂、黔边界之荔波县境经苗山行军五日始达榕江，苗山道路崎岖为瑶民区域，绝少行人，故我军于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行至榕江城边，敌始发觉，匆忙应战，敌守城激战一日，卒将其全部约两营人解决。此役得枪四百多支，大炮一门，子弹十多万，迫击炮、机关枪各二挺，俘虏数十人（敌大部分死伤，仅逃走百人）及无线电一架。进榕后始知王家烈率兵八团向湘西发展，以榕江为后方，前委估量敌必回师反攻榕江，乃决定在榕三日即退，三日中筹款十多万，召集了一次群众大会，每日向群众宣传，没收反革命的军官财产分给群众，影响极好。对于敌伤兵招待亦优，敌兵颇为感动，待七军行时，一般民众与伤兵都有依依不舍之表现。榕江之胜利，士气又恢复，且政治影响甚大。

3、回师河池的决定改变为回右江之策略。

在榕江三日得报敌五团人向榕江包围，我军迅速向广西境撤退。几为敌追及，至未路因伤兵运输之困难，无法觅人招〔抬〕之，步枪百余支，大炮一门，无线电一架投入河中，因当时无群众组织不得不出此法。退出榕江之后，因第三纵队及第八军之消息尚未得到，及湘、粤边界有重兵驻在（正适粤、桂在湘南大战时）之关系，前委乃决定回师河池，与第三纵队第八军取得联络后，再向湘、粤边前进。

回师河池路过宜北县城，前次经过宜北群众受豪绅欺骗逃避一空。但我军军纪极好，又做了一番宣传工作，所以此次重返宜北群众甚热烈欢迎，召集一次群众大会，到者千多人，热烈拥护红军，参加红军打豪绅，投军者甚多。

至河池适邓斌同志从东兰出来（邓同志于三月前从中央至八军后到东兰，七军大部已出走），带来中央指示要七军在右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前委接受此种意见，乃决定回师右江，三个月后才向外游击。

六、重回右江后事变

1、回右江的策略及围攻百色敌人。

重回右江是根据以下策略而定：（1）攻敌不意，恢复右江沿河各县政权，肃清豪绅；（2）深入土地革命，分配土地；（3）扩大红军组织，改编赤卫军为红军；（4）联络第八军第一纵队。

从河池返右江，经东兰向百色前进，过百色边境时，敌人约两营人来进攻驻凤山第三纵队之一部，适遇我军大部，出其不意将其击溃，敌回散山中，极少回色者，只因我军未穷追致未得些什么。龙州之役，敌受重大打击，我军到百色

时，敌约一团人及豪绅武装数百据坚固之炮台顽抗，激战一昼夜，始得将其击溃，仅少部逃走，几全军覆没。此役得步枪五百支左右，迫击炮二门，机关枪一挺，子弹三四万发。到了百色后，我军及〔即〕分兵恢复奉议、平马。敌在沿河一带，尚有兵一营，未经作战，乃会合豪绅武装共千人逃避。沿河各县均次第为赤卫军所统领，重回右江。在百色又得此重大胜利，干部士兵莫不兴高采烈。我们正拟以百色为中心来实现以上四项策略，岂知政局又生变化，我军行动受了莫大影响。

2、滇军来桂与果化之役

我军下百色仅三四日，滇军三师人分左右江两路来攻南宁，一师约三团多人。后经百色过右江，我军即撤退平马，敌进了百色后即继续向平马、南宁方向前进。敌将至平马，我军又避开离平三十里之乡村，让路给敌通过。当时前委讨论对付滇军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主张待敌通过平马后，我军以一部在路上埋伏，大部跟敌后头，出其不意夺取辎重，收缴其一部枪械，在实际行动上以反对军阀混战，对付滇军后，再回师百色。百色必无滇军留守，恢复百色不成问题；一种主张我们只要号召群众来反对军阀混战，如召集群众大会，以小部赤卫军扰乱敌人等等办法，此次不可以红军主力去对付滇军。因为仅二团才经战斗之部队，敌则有三团富有战斗力之部队，且敌必留兵与右江豪绅共守百色，我们应待敌大部通过，迅速收复百色，以实现我们回右江之策略。两种不同意见争论结果，通过前一种主张。敌至思林被我伏兵两连截击，得一些辎重，敌继续通过至果化湾河，我大部从后面赶来攻击，敌过河了二团，尚有一团在河边顽抗，

我军猛击不下，战三日夜，敌架好浮桥，又增一团过来，我军乃转攻为守，据险要石坳相持，敌于当晚偷行撤退，我亦不能再追。此役我死伤颇大，失枪数十支，在榕江、百色二次所补充之子弹亦几打尽。

3、内部叛变不攻百色

我回师平马欲恢复百色，至中途，第二纵队第一营离大队约六十里，担任向百色警戒任务，乃该营第一连连长反动，勾结少数反动排长及兵油子将营长、副营长杀害，率领队伍向百色逃走。事变起时一般干部及士兵莫明其妙，受挟迫而走，此次事变给我们教训：

第一，部队尚未彻底肃清旧军官；第二，未实行肃清兵油子；第三，党的基础薄弱（在百色作战之后，第一营党的干部同志死伤殆尽），政治工作不充分。回师百色之任务，因受攻滇军不利及第一营叛变，子弹又告缺乏，终于不能实现。当时滇军已编杂色部队一团人，并勾结桂系为我击败之残部一营多人，及豪绅武装千人据百色险要炮楼图死守，我军卒因子弹缺乏攻坚不易，乃集部队于平马、奉议一带积极训练，当时因训练补充及集中兵力以备应付敌人之袭击，并为需要休养之故，采分兵游击。整理三个月，部队稍完整，每连均补充八九十人，一般士兵政治觉悟也相当提高，党的工作也建立了相当基础，各支部能经常开会，讨论问题，分配工作，党内政治水平也提高了。这一时期训练之结果得了相当成绩，但是发生了一种错误倾向——集中力量于军队内部，而忽视了群众工作。当时对于地方工作只是少数负责同志给与地方党部以一些帮助，为他们开训练班、办政治训练班等，及前委给各县党部以工作上党的指导之外，没有动员

军中党及士兵委员会去做群众工作，这是莫大之错误。

4、右江土地革命与反富农的斗争

右江工作经七军第一时期的发动，已有广大群众起来，土地革命逐渐深入，但当时因为工作路线之错误，富农新豪绅分子侵入于苏维埃，而至于把持政权机关，掌握了赤卫军，反而阻碍了土地革命之深入。因自七军第一次离开了右江之后，党的右江工作委员会，渐成为官僚机关，负责同志之腐化，党的指导机关与群众隔离，乃使右江苏维埃政府变成纯官僚之机关，丝毫不得群众拥护。因此不但大失群众信仰，且予新豪绅以藉口，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右江苏维埃忘记了土地革命工作，日〔只〕在计划扩充赤卫军之组织至二十营之多。因党的领导力量薄弱，赤卫军大半是新豪绅领导之下，右江苏维埃已失去威信，赤卫军连苏维埃的命令都可以不执行。赤卫军始则以单纯的行动对付豪绅，渐渐脱离了群众及至受了豪绅武装打击二次后，连与豪绅的武装冲突都不敢了。赤卫军不敢侵入豪绅统治下的地方，在苏维埃区域中，天天要群众供给粮食，而至于收捐、筹饷、勒索，无所不为，苏维埃赤卫军与广大群众已成对立的形势。待七军从游击重回右江。此种现象已经很严重。许多群众表示我们只要红军，不要赤卫军。前委当时对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从下而上的改组苏维埃，缩编赤卫军，编成四营，其余解散归各乡苏维埃，组织预备队，由此可以减少群众对于赤卫军之负担，可以剥夺新豪绅对于赤卫军之领导权。但当时右江党的领导权薄弱，前委又患了重大错误，没有动员全军党员及士兵去做群众工作，只是扣留了一个赤卫军的反动军官，所以对于苏维埃及赤卫军之决议成效甚少。同时关于反富农斗

争，在较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又机械的执行这一策略。实行见富农就杀的办法。机械的反富农之结果，中农因之动摇恐慌，而至于与富农联盟。在东兰、凤山，有好几乡富农领导中农向贫农、雇农进攻。有的有他们独立政治组织，如救乡团（？）等。有他们的独立主张，既反对豪绅、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说是要救乡，结果他们是勾结国民党豪绅向苏维埃进攻。许多县分，特别是平马、思林、果德各县，富农是暗伏在苏维埃内，用种种方法妨碍土地革命，如主张调查好再来分配，不召集群众大会讨论分配土地问题等等，延期敷衍的办法。或者实行分配了，将肥美的田分给富农自己及其亲属，贫农、雇农得到的是瘦田。分配了田地不解决耕具问题，而使贫农、雇农没有办法耕种等等。总括说来，右江工作除百色、奉议对于党的苏维埃的影响尚好外，平马、思林、果德曾经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组织都瓦解了。凤山则因机械反富农的结果，工作也受大打击。已经实行分配土地者，只东兰一县，及凤山、平马、奉议、思林、果德之少数乡村。分配土地的办法约分以下几种：

（1）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农、雇农，不侵患〔犯〕到富农的田地；

（2）没收地主的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

（3）实行共耕。共耕有两种：一种共耕共食；一是共耕分食（共耕共食者绝少）。

当时土地政纲中，尚有没收反革命者土地财产一条，系对富农而定的。当时我们对于反富农斗争，是以拿到其反动行为后，而对付之原则。分配土地以四岁以上为一个单位，因许多农民意见，小孩子比成人开销更大之故。

5、向外游击之决议与后方布置

回右江三月，七军本身问题已得到相当解决（补充训练），又改编奉议、平马、果德等县赤卫军为第四纵队。东兰、凤山及奉议，平马各一部赤卫军为第五纵队。此时七军决定出发游击，邓拔奇同志即从中央南方局来，代表中央南方局有所指示，七军乃接受中央之指示而出发。一、二、四纵队从凌云绕桂、黔边界会合八军第一纵队出河池，三纵队从东兰出河池会合前委。对于后方问题，决议留第五纵队在东兰、凤山一带作游击战争，再扩充第六、第七纵队（由赤卫军改编）。当时统计枪支、人数均已足额，第六纵队现已编成，第七纵队或亦有编成希望。

6、凌云行军间之事变与会合八军。

当改编赤卫军为红军时，前委规定了一个原则，将在新豪绅领导下之赤卫军编入第四纵队，随大队出发，到河池时（离他们家乡稍远时）再解决其反动领袖，整顿其队伍，所以第四纵队之部分力量是在这些坏分子领导之下，行军至半途桂、黔边界时，第四纵队第二营营长以奉纵队长命令，欺骗群众，连夜率兵五连逃回右江，我们估量其前途必为敌人所勾引。

第八军大部已早为敌人扑灭，仅第一纵队绕道至右江会合，途中被敌包围损失甚大，仅余二百支枪，至贵州边界编为护商队，至七军此次往接时才得到联络，共同向河池出发，乃与第四纵队余留之一部分为第四纵队。

七、七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与河池全军改编

1、代表大会之准备工作及当时党的组织状况。

代表大会定期到河池后召集，沿途准备大会的工作，主要的是举行各级党部讨论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及七军过去经验与今后行动方针等问题，并举行选举代表，选举支部书记，实现党内民主制度。因此，此次行军中党的工作，尚有多少进步。

当开代表大会时，全军党的概况，约有以下的现象：除第四纵队是才编成的队伍，过去未有发展工作，党员数量甚少，其他三个纵队各连差不多均有支部组织，支部亦能开会讨论问题，在上级机关指导之下可以工作。同志的总数约有五百多人，军队中下级干部颇占重要成分，比较的以士兵成分多一点。各纵队中以第一纵队工作最好，因历史较久，干部较多的缘故。一般的同志，政治水平均甚低，虽较七军刚成立时，则高的多了。代表大会中士兵成分仅占三分之一弱。当时一般同志革命情绪甚高，对革命前途颇抱乐观。

2、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及其决议。

代表大会会期仅一天，主要的议事日程如下：

(1) 中央代表政治报告；(2) 前委过去策略及工作的报告；(3) 过去策略与工作的检阅；(4) 目前政治形势与七军党的任务的讨论；(5) 选举前委。

邓拔奇同志从中央来，正是“立三路线”全盛时代。他带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的精神，向七军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因此，此次代表大会充满的“立三路线”的精神，对于目前政治形势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

中央南方局给七军的指示，是要七军在夺取广州，完成南方革命胜利的总路线之下，迅速向柳州、桂林发展，沿途创造地方暴动，夺取柳、桂，出小北江进攻广州。同时为要

达到这一任务，要七军猛烈的扩大。

大会中对于这一指示，也是照样接受了。不过更具体的确定以庆远、融县为二个中心，发动群众，造成包围柳州形势，惟七军为要与外面斗争能早得联系计，应绕道庆远、融县先出桂林。

大会通过了以上“立三路线”的指示，乃给予七军前途以许多危害。

3、全军改编。

代表大会闭幕第二天，七军一、二、三、四四个纵队，均集中河池进行改编为师团制。前委决定以第一纵队、第三纵队改为五十五团、五十六团，编为十九师；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改为五十八团、五十九团，编为第二十师；第五纵队及计划中之第六、第七纵队改为第六十团、六十一团、六十二团，编为二十一师留守右江，全军举行检阅，次日向庆远前进，沿途极得群众之欢迎。

八、三次战争中党的争论问题

1、进兵怀远后党内政治意见之分歧。

从河池全军向庆远前进，到庆远之怀远镇，敌约数百人过河，据河而守，阻我去庆远，据报庆远有敌一团。此时党内对进攻庆远问题，发生意见之分歧，一方主张应遵照一次代表大会之决议出庆远发动群众与扩大政治影响；一方主张攻坚不易，应绕道天河县出融县，过了大江之后，再同敌作战。争论结果，前委通过了后一决议。

2、四级〔把〕坳与天河之战。

我军从怀远向天河出发，至中途，在四把坳敌独立第三

师韩彩凤部约一团人跟踪来击，将其击溃，天晚未追。次日我军仍向天河前进，天河群众，又逃避一空。到天河后，主张不攻庆远之同志，又主张不出融县，再绕道长安过河，过河后再与敌作战，有些同志又反对此种意见。结果，次晨沿天河出发，二十师五十八团为前卫，行三十里，与敌教导师一团人相遇，战不久五十八团退却，敌亦不能追。同时后卫十九师亦发现敌情，系敌独立第三师全部，战不久，敌败退，隔小河防守。当晚前委多数同志主张，以十九师一团增加二十师向敌反攻，对后头敌人取守势，结果没有执行这一主张。次晚撤退三防，敌则分驻融县、长安二县防守。

3、党内对于进攻长安之争论及进攻长安之结果。

到了三防，主张不攻庆远，在天河不反攻之同志，又主张不取长安，绕道福禄过大江，过江后再战，当时一般士兵带有充分的进攻精神出来，对这数次军事行动大不满意，都怪指挥官没有决心，走了山石小路，又受敌打击。一般干部对这数次行动也认为前委没有遵照大会的决议案执行，有避免敌人，缺乏进攻精神，放弃以庆远、融县为中心发动群众的决议，有轻视群众工作的倾向。且估量我军力量比敌军大，应进攻长安（长安为广西主要的商业地方），以解决红军之补充问题，扩大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经过党的干部分子大会热烈之争论，决议进攻长安。

七军以四团力量进攻长安，敌在长安街边做好坚固工事，以一部守卫，教导师一团及特务营出来迎战，不久即败退街内。次日敌独立第三师三团及豪绅武装千余来反攻，又为我击溃，狼狈而走，绕道又入街道，激战四日，经我猛冲不进。后我们预料长安无法攻破，乃自行撤退。当时敌又增

两团，惟我已退。该役敌损伤大，我得枪支百余支，惟子弹几打尽，死伤干部极大，损失不少。长安之役，虽未得结果，损失过大，是算我们失败。但给敌以极大恐慌，七军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自此七军确信了自己的力量，还是有意义的。

4、绥宁的政治决议及攻武冈的失败。

长安撤退后，七军即向湘西前进，至边境又发生教导队副队长设计欺骗士兵共六十人做匪之事，又是沉痛之教训。七军至绥宁得报，始知国民党以全力对付江西红军，前委当时乃决定迅速出广东北江，发动群众斗争，以牵制敌广东部队，再向江西进攻，以为江西红军之声援。

但七军自右江出来后未得补充，天寒已结冻，官长、士兵都还是穿单衣，脚上没有草鞋，零用钱已九个月没有发了（只庆远时每人只发五毫），物质上困难极点，惟士兵政治觉悟，经一年来之斗争，已经提高不少，虽亦有吃不得苦而开小差者，但一般官兵都还未有怨言。在困难艰苦时期中此亦可给我们以兴奋也。为着补充衣服问题，前委又决心迅速取武冈解决衣服问题，再去北江。因当时武冈仅民团七八百人，离武冈三天路程之宝庆则有军队二团，故乘敌不意，取下武冈，就可解决一切。

武冈城极坚固，民团七八百人死守城内待援，我军攻城至第四日，几破城而入，遇敌援兵三团赶到（一团从长沙搭车来，二团从宝庆来），我兵分散围城。一时集中兵力不及，即退却，仍向广西边境撤退，敌追来，后头部队警戒不密，又略受损失。此役阵亡团长何莽（子祁）同志——对政治上极有认识，作战极勇敢之军官，损失约二连人。七军经

过几次打击，部队甚残破。

5、占领全州后，党对七军行动之决定。

当湘军尾追我军至广西边界，我军即向全州前进。当时全州有杂色部队一团人，我军正处前有敌人，后有追兵的情况之下，乃决心冲破全州敌人后，再来对付追兵。至全州，桂系杂色部队稍抵抗即退，后面追兵亦不敢深入广西，我军乃在全州安住三天，筹款补充衣服，都得到解决。我军进全州时，桂系有兵三团在桂林，因在长安之教训，不敢来犯，只在沿途布置防御工事。

到全州后，前委对七军行动问题，决议目前不可再战，应有短期间之休息，并决议经湖南江华出连州、粤北江，至粤、湘、赣边界与江西红军取得联络。我到全州时出来，现从报纸上消息，七军确已到江西了。

九、七军现状

1、全州缩编的结果。

七军自第二次右江出来游击，受了数次打击，干部死伤颇大，士兵中老兵没有政治觉悟均多开小差。从右江出来，新兵（农民）因思乡之念，也逃了一些。到全州后，每连只余四五十人。因战斗兵之减少，非战斗员就感觉多起来。前委为着整理使其坚实起见，在全州乃决议十九、二十一两师，缩编为三团。一面尽量减非战斗员，以补充战斗兵。缩编之决议未实现时，我已出来。但预料缩编为三团后，编制仍保持三三制，每连可有六十个战斗兵，干部亦不至十分缺乏。

2、七军的力量。

七军出发之部队，军部有直属部队二连、山炮连。各师亦有特务连，各团则有特务连、机枪连，迫击炮连及三营步兵，总计出来部队之人数约有六千人左右，步枪有二千七百支，山炮一门，迫击炮三门，水机关枪六挺。惟子弹甚感缺乏，政治工作干部甚少，政治部组织不健全。现军及师均有政治委员，团、营、连则仅有政治指导员。因人材之缺乏，无法将政治委员制度普遍的建立起来。一般干部都是过去南宁时代之教导学兵，成分大多数系右江农民，老兵余留下不及十分之一。一般官兵政治表现在斗争中日益锻炼，愈加进步，虽然现在政治路线之错误给予七军以许多危害，同时也锻炼七军日益坚强。

留守右江之二十一师至少已有两团人（多则已编成三团），枪支亦是精良的，迫击炮、机关枪、大炮都有，惟战斗力较弱。现在桂系主力集中右江，二十一师之行动当然比较困难。但东兰地形险要，群众基础强固，敌极难深入，推想东兰苏区必因二十一师拥护而存在。至于沿河各县少数乡村之割据，亦还可以保留一部分赤色区域。惟第二十一师与军部已无法取得联络，此后应由中央直接加以指示。

总之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之下，七军在中国革命前途上，可以担负一部分任务！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11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回忆文章

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

张 云 逸

大革命时期，广西和南方其他各省一样，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展开了革命运动，“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等口号，象春雷一样响遍城市、乡村，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的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当时，党也掌握了一部分武装，领导人民展开了武装斗争，声势浩大。

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叛变革命：进行清党反共、屠杀工农群众、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投降帝国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革命斗争，反对国民党投降叛变，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继续承担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荣任务。大革命失败时，广西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的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被反动派捕杀或监禁了，其余的转入了地下继续斗争，只有韦拔群领导着右江地区的群众，仍坚持着公开的武装斗争。

1929年夏，蒋桂军阀战争结束，李宗仁部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当了广西省绥靖正、副司令，俞作柏做了广西省主席。那时，我们党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时机，派遣一些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到李明瑞部队中进行工作，也有

的分头到左、右江农村进行工作，发展革命力量，争取领导权，以便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先后到达广西的有邓小平（邓斌）、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李干辉、袁振武（也烈）、李谦、冯达飞等，由邓小平负责领导。

二

我们到达南宁后，经过党的活动，并通过党员俞作豫（他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长，是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了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并且活动由我去负责。李明瑞果然答应了。

教导总队有3个营9个连，都是从部队里抽调来的班、排长，后来，我们又把广东和广西地方党陆续派来的工人、学生党员，除袁振武和一部分同志到第五大队进行工作外，其余的都安插在教导总队各个连队里当干部和学员，建立了各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以便于开展工作。这时，全队共有1000多人，9个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是选学员中思想左倾、比较接近我们的人来担任。另外有些党员，则以教员的名义在总队部工作，袁任远就是当时的政治教员。在我们控制全局的优越的条件下，大家紧张地展开了活动，加强对学员进行革命的政治宣传教育，加强党的秘密组织工作，两个月便发展了300多个新党员，李天佑、卢绍武等都是在这个时候入党的。

这时期，我们对政治上反动的旧军官，采取了“调虎离山”的办法，给这些人以较高的职位，让他们专门担任军事训练，实际上却是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力，使他们与群众隔

离开来。这样，他们的反动思想和行动，就无法影响群众，更无法利用指挥实权去支配群众和阻碍我们党对群众的领导。

我们将党的基层组织秘密设在连队里，也是能迅速争取群众的重要原因。正由于支部设在连队里，教育群众、争取群众，就自然的成为支部的一项日常的任务，使党员能更加适时地、灵活地、因而是有效地对更多的群众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同时，我们又把政治水平较高的党员都尽量地配置到连队里当学员，充实支部的力量，使每个党员都能与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更便于教育、争取他们到党里来。

在上述条件的保证下，我们抓紧时机积极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力量益发增强。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的发展，我们就没有可能使革命的影响在全队占据上风，从而争取更多的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也没有可能在后来给四大队输送了100多个党员，保证了党对四大队的改造。

一个多月后，通过党的活动，我又兼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这是李明瑞来广西后，收容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编成的队伍，成分复杂，纪律极坏。李明瑞知道：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由于有共产党员进行政治工作，战斗力之强是十分闻名的，那时我曾在那支队伍里干过师参谋长，李就想利用我来帮助他改造四大队。他找我谈话，我当即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军队太坏，要我兼任大队长可以，但要由我提名配一个得力的副大队长协助；第二，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他犹豫了一下，点头答应了。

党组织接到我的报告后，决定派李谦担任副大队长，并给予指示。我们一到那里，立即按照党所指示的原则，发动士兵群众，揭露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军官的罪恶行为。士兵群众一经发动，斗争异常坚决、勇敢，一致要求严厉惩办那些反动军官。我们当即严办了两个营长，只留下一个姓梁的营长（李明瑞的表弟）未动。连长以下的军官，除一部分撤职外，大多数送到教导队当学员，进行教育改造。又从教导队调来了100名左右的党员，担任连排干部，符禄和何子祁当了营长，连长以下的军官，几乎全是我们的人。这样一来，便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部队。然后又进行整顿，进行革命的教育，并且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军。只一个月，部队就从原来的1000多人扩大到2000多人，面貌焕然一新。

在党的秘密领导下，我们在四大队所采取的一系列坚定、果断的措施，保证了我们能够迅速地掌握和改造这支旧军队。首先是我们掌握了大队的领导权，从而各级的领导权也迅速地被我们掌握，这就使党的意图，能够通过行政的命令予以实现，并且得到贯彻的保证。在旧军队里，官长的命令是足以左右一切的。

其次是发动群众。在广大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民主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动他们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通过斗争，一方面揭发了反动军官的罪恶，打掉了他们的威风；另一方面，群众的革命觉悟也在实际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提高，更加拥护我们党的主张，从而益发密切的团结在我们的周围。而通过这一斗争，我们也便于抓紧深入地了解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加以培养教育，吸收到党的组织内来，以建立或充实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工作能够在每

一个连队中都得到组织的保证。这是改造旧式军队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再次，是迅速果断撤换旧军官。经过士兵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抓住群众要求惩办他们的时机，接受群众的意见，坚决撤换反动军官，并立即派遣党员干部掌握各级领导权，建立党的秘密支部，这样连队党的秘密领导核心，便迅速形成了。

最后，改造部队的成分。除了加强政治教育外，从组织上注意增加工农成分的比例，也是十分必要的。一支旧式军队，如果其中工农成分不占优势，那么它的坏作风、坏习气，就很难改变，这支部队也就很难为我们所掌握、很难得到巩固。我们在改造四大队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迅速增加了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这对我们能迅速巩固这支部队、联系和团结群众，起了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如果不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不依靠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持，要改造旧式军队为新型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

我们到南宁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李明瑞和俞作柏突然决定反蒋。在这年10月，便大举进攻广东的陈济棠。李明瑞只有3个主力师，内部又不一致，来广西时间很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都很薄弱。我们根据上述情况，估计他们一定会失败，因此，决定利用军阀混战之际，大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便借口还没有训练好，不能配合作战，建议他们不要把教导队、四大队及五大队带去作战，而担任维护后方的任务。经我们一再说明和坚持，俞、李终于同意了我们的

的意见，只是从教导队调走了300多人回各师去。

他们出发后，我们随即决定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去右江地区，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准备今后的工作，并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其余的部队留守南宁，继续加紧整顿补充。并且活动由我兼任了南宁的警备司令，利用这个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军械库里储存着五六千支步炮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再时，将汽船预备好停在邕江边待用，一面在部队中作各种应变的准备工作。

谁知，俞、李的失败来得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原来杨腾辉和黄权、吕焕炎等师长，久已心怀不满，队伍刚到桂平，他们立刻叛变，把3个师及特务营全部拉去投降，俞、李只剩下身边的几个马弁，黯然逃走，一回到南宁就向左江去了，前后17天的时间，就结束了他们的一场好梦。

一听到前方的消息，我们就按照原来的决定，立即组织大批的部队和民工，把军械、弹药搬上船，准备撤退到右江去。

失败的消息在教导队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学员们大多是从3个师里调来的，一听说部队倒戈，都闹着要回去。党员们虽然积极展开了活动，可是由于有些坏分子从中鼓动，风潮却越闹越大。

当夜，我们党组织就把各支部的书记和委员找来，研究对策，决定第二天分为许多小组，各组都有党员参加，对那些反动分子进行斗争，在群众面前尽量的揭露投降分子的反动本质，坚决反对投降的可耻行为；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同时，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以争取大多数可以争取的

人到我们这边来。经过一天的反复争论，大部分人都认清了是非，解除了实际顾虑，表示愿意跟我们到右江去干革命，但是还有些人坚持要走。

采取分散的小组的形式，组织群众与反动分子进行争论，是解决反革命分子起哄闹事的好办法。因为分散，反革命分子相互之间就无法联系，在态度上，情绪上，就不能互相支持、互相影响，易于被我们各个击破；再是，小组形式的会议，容易掌握，适合于我们作说理斗争；在真理面前，反动分子的恐吓、欺骗和煽动，是很难影响群众的。

在小组斗争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在这天午后，把全体学员集合起来。我说：“有些同学还是要走，这也可以，我们革命部队是由有革命觉悟的人组成的。现在就站队，愿意跟我们去右江继续革命的，站在这边，愿意去投降反动派的，站在那一边！”队伍立刻散乱了，大部分拥到我们这边来，那些反动的军官、兵痞、坏分子，就往那边集中。还有些人在中间犹豫，许多党员和进步的学员们就喊他们的名字：“××，站到这边来吧！”“一失足成千古恨哪。看清前途，不要干反动派去呀……”那些犹豫着的、甚至已经跑到那边去的人，又陆续走过来一些。最后查点人数，愿意跟我们的，有500数十人，坚决要走的有100人左右。

第二天，我们还特地举行了一次欢送会，对这些投降分子，作了最后一次教育工作，学员们纷纷上台讲话，都是说：我们是同学，是一家人，你们到那边干，我们在这边干，都应该为劳苦大众利益尽力，不要替军阀升官发财去卖命打仗……。我们把这批人的枪统统留下，发给路费，把他们送走了。这场斗争，由于党采取了依靠群众的正确的政

策，不但争取了大多数群众到革命方面来，而且提高了党员、积极分子的政治思想水平，有力地教育了广大群众；而对投降分子来说，也是给他们上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课。

三

当蒋桂战争结束，广西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的时候，党就决定加强右江地区的领导。在1929年9月，先派雷经天等人到右江去，建立党的右江特委组织，加强党对右江工作的领导，恢复工会、农会的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当时党的右江特委机关就设在田东（又名平马），特委书记是雷经天。在特委的领导下，右江沿岸各县都有群众的武装斗争与韦拔群领导的群众武装呼应起来，声势更大。

在李明瑞、俞作柏逃往左江后，邓小平即率领着党委和在地方作秘密工作的同志先两天离开南宁，并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上驶。我带着教导总队及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几天后，来到田东。从此，我们党组织便由秘密工作状态变为公开了。

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忽然看见叶季壮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20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祥。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哦！你就是邓小平！”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邓小平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

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邓小平就和我住在一起。这时已是10月了。

邓小平首先召开了一个党的委员会议（后来称前敌委员会，书记是邓小平）；会上决定了几件事：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第三，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根据党委的决定，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在部队中公开宣传党的主张，严办了一向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为大家所痛恨的梁营长（即先派驻百色的第二营），因而大大推动了部队的民主改革，战士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革命积极性也增强了。

部队整顿之后，便分散各地帮助群众打地主恶霸，收缴其武装，并将没收的财产发给群众。在部队和地方党的共同努力下，当地的群众革命运动便大大地开展起来，群众政治觉悟提高，热爱自己的军队，纷纷报名参军，因而部队便迅速地扩大了。革命烈火燃烧着右（左）江地区，声威震动了全省各地。右（左）江是壮族人民占多数的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也标志着壮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

团结战斗；而韦拔群则是右江地区出色的群众领袖，他领导着群众坚持英勇的武装斗争，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我们在党委会上还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四大队不能指挥地方政府，必须有个公开的行政名义，才能取得税收，为起义筹措经费。大家想到旧政府原设有右江督办和左江督办，便决定使用这个名称，并在右江宣布我为右江督办，在左江宣布俞作豫为左江督办。宣布后，我立即通知右江各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税款上缴。这一带比较富庶，特别是烟税更加可观，我们一次便收得了几万银元。

可惜的是那时毫无经验，对政权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对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体会亦浅。因而，当我们取得政权以后，只知道收税解决财政问题，却不会利用它来做更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例如那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发动农民群众向政府告状，揭发地主豪绅的罪恶及种种不法行为（如私设公堂、监狱、杀害人命等），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抄没其家财，收缴其武装，将他们一网打尽；也可用各种办法，如以编训名义，将各县土豪武装分别集中起来，然后缴下他们的枪械。我们没有这样做，这就使后来发动群众斗争依然遭到困难，并且影响了革命据根地的巩固。这是当时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缺点。

正如上述原因，地主恶霸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反革命气焰还十分嚣张。因此，我们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坚决地展开后，有的大豪绅竟跑到南宁去勾结反动的广西警备三大队，请求他们到右江来驻防，以对付我们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已先获得消息，早作了布置，决定让他们进到田东，立即坚决、干脆予以消灭。当该大队长熊镛派人前来联

络时，我便佯作欢迎。结果，预定的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除了一部分稍稍抵抗了一阵外，其余的几乎没有费我们一枪一弹，1000多敌人全部当了俘虏，缴了700多支枪。地主们这着棋输了后，气焰顿时收敛了不少。我们趁着有利形势，配合地方武装，展开活动，群众便更大大地发动起来。

四

过了几天，我们派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要我们在左、右江地区创建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我当军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我们再派龚回上海，把撤退到右江地区后部队和地方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且表示，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大概需要四十天的准备，就可就绪，那时便立即宣布起义。

邓小平当即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在这次会上，决定加紧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那天，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会议结束，把工作布置后，邓小平便带着一部分干部，到左江地区去布置工作了。后来，俞作豫领导的第五大队，在红七军成立之后，于1930年2月1日，也在龙州宣布成立了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委，何世昌为政治部主任。那时，俞作柏已逃去香港，李明瑞经过几番挫折，在我党的影响下，转到了革命营垒，随后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红八军成立后，有力地策应了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但不久

就遭到李宗仁部梁朝玘的进攻。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终于因为敌我力量悬殊，部队基础较差，而遭致了严重的失败。红八军最后剩下的几百人，由袁振武等同志率领，转战到右江，与红七军汇合，并加入了红七军。

在邓小平去左江后，我们便根据党委决定，将部队编成三个纵队：原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李谦担任纵队司令，沈静斋任政治部主任；将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黄治峰和阮殿焯所领导的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合编为第二纵队，胡斌任司令（后为冯达飞），袁任远任政治部主任，第三纵队是由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编成，由韦拔群任司令，李朴任政治部主任。一个纵队实力约相当于一个大团。后来改为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师。同时，扩大教导总队，从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班排连长及优秀的战士来训练，以培养初级干部。韦国清等同志，就是当时从第三纵队抽调来教导总队学习的。这时，部队成分也较前大有变化，战士中、从旧军队来的只千余人，其余的都是右江的农民和工人、进步学生。军部各部的机构也建立起来了，参谋长是龚鹤村（到中央苏区后调任中原军区参谋长，后来叛变了），政治部主任陈豪人（1931年1月我军占领全州时，脱离了红七军），供给部长是叶季壮（后任政治部主任）。

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就在1929年12月11日这天，在右江地区的百色起义，公布红七军的番号，同时在田东宣布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红军的干部和战士们，每人都领到一套新灰色军服，军帽上缀着引人注目的红五角星，个个精神抖擞。同时，上自军长，下至每个战士，都同样地领到了第一

个月的薪饷——20块银元。

这一天，右江各县城乡，都热烈庆祝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的诞生。前委派我到田东去参加当地的庆祝大会。天气特别晴朗，田东万人空巷，都聚集到镇北的广场上来。红军战士们威武、整齐地排列在主席台前；农民们敲锣打鼓，妇女和小孩穿红着绿，从百十里外赶来，广场上挨挨挤挤站满了成千成万的人群，红旗如海，欢声雷动，庆祝会开过后，就在广场上进行了各种文艺活动，演戏、唱民歌等等。这一带饱受国民党和地主豪绅摧残而新翻了身的农民们，当着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成立的时候，怎不欢欣鼓舞呢？这一整天，人们都沉浸在狂欢中，右江苏维埃政府招待外县来开会的代表吃了饭，让大家尽欢而归。

下午，我们乘着一艘挂满镰刀铁锤红旗的汽船回百色时，沿岸农民都从沸腾的村庄里涌到江边来，敲着锣鼓，举起红旗，朝船上欢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七军万岁！”我们船上的人也不断地向他们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河上河下，口号声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声浪。这时，晴空万里，阳光耀眼，红旗招展如画，许多同志在此情此景下，激动得流下泪来。大家一致地说“我们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我们的力量，巩固我们的胜利！我们一定要把红旗插到全中国去！”

红七军能够这样迅速、顺利地建立与发展，首先是由于党的坚强的领导和党员们团结一致、艰苦努力的工作。我们部队里的党员，虽然有些是外省来的，有些是广西地方上来的，还有大部分是在部队中新发展的，但是大家非常团结，革命热情很高，都能自觉地服从组织的决定。他们都是红七

军的政治骨干，也就是红七军能够发展和巩固的有力保证。

其次，是教育群众、争取群众。从旧式军队转变为新型的革命军队，必须提高广大战士的革命觉悟。而反动军官正是压制民主、阻碍群众革命积极性的一种恶势力，是改造旧军队中的绊脚石。广大士兵群众对反动军官的虐待非常痛恨，我们如果不搬掉这块压在群众头上的石头，就不可能更好地联系群众，甚至会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也只有通过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我们才能最迅速地取得士兵群众的拥护。因此，发动群众与反动军官作斗争，就成了改造旧军队的最实际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正由于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抓紧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因而我们就教育了群众，从而争取了群众站到革命方面来。

第三是争取领导权。我们采取了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党的活动，取得了部队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发动群众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在群众积极要求惩办、撤换旧军官的愤激情绪下，我们接受群众要求，即分配党员干部担任各级领导。由上而下地采取命令方式，使撤换、调配干部的工作顺利进行；又由下而上地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两者一结合，我们所掌握的领导权便不可动摇了，从而达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保证了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同时，部队也才能更加巩固。

政治上、经济上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也在制度上固定下来了，促使部队内部益发团结一致。这也是红七军建成和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除了上述部队的内部因素以外，革命武装的发展必须依靠地方党和广大群众。当时，广西还有韦拔群领导的一支群

众武装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因此，我们党选定在这块地区创建根据地是正确的。我们如果不到右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会合，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和得到巩固、发展；同时，也由于有了革命武装的配合，右江群众的革命运动才能进一步开展，并且迅速地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权。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依靠政权，这是革命武装建设的最重要的条件。

（原载《星火燎原》第一卷下册）

回忆百色起义

李天佑

1929年9月，党为了以武装斗争回答反革命对广西革命群众的残酷屠杀，在张云逸、邓小平领导下，将驻在广西南宁的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队的一部分，带到广西、云南两省交界处的百色，举行了武装起义，组成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建立了右江地区的革命政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百色起义。

这次起义的骨干是南宁的教导总队。当时我在这个教导总队的第八连当学兵。这个教导总队有千把人，原来是广西军阀从当时各部队调来一些士兵集训、以培养下级军官的，但里面却有我们党的组织，张云逸就是警备第四大队队长兼这个教导队的副总队长，在学员中，特别是在政治工作的政训教导员中有很多是共产党员，他们不断地向我们这些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记得有一次张云逸到我们连上课，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来问我们：“你们说社会上哪一种成分多？”（指的是哪一阶级人数多）我们想了想，一致回答：“工人，农民多！”他又说：“赞成工人农民成分多的请举手！”我们都把手举起来。他点了点头，笑了。

除了他这样直接教育和启发我们，我们也时常学习些新

的革命道理。我记得有一位政训教员，名字叫李布，是个共产党员，他就常给我们讲俄国十月革命的史实，当时我虽然不十分明了，却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受到了启发，懂得中国必须实行革命，必须学习俄国那样，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些教育就成了我坚决参加武装起义的思想基础。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常喊的口号是：“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实行革命外交！”平时这样说，晚上点名时喊的也是这几句口号，只是没有直接喊出“拥护十月革命”这句话罢了。当时党在总队里领导的革命活动是很活跃的。

自然，这里面也有反动家伙，就是那个大队的大队长。当时正进行蒋系和桂系军阀的战争，蒋系军队已进入广西，这个总队长想带着这支教导队去投蒋。这个情况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只记得这天晚上半夜12点钟左右，忽然传下命令叫集合，我们匆匆忙忙穿好衣服，电灯一熄，外面就打起枪，大家乱成一团。在混乱中我只听得李布在喊：“赞成革命的跟着我！”我就向他跟前跑，跑到跟前又听见他说：“总队长是反革命，抓住他！”那个反动的总队长看事不好，慌忙跑了。当时因情况突然，队伍绝大部分都跑散了，听说也有一小部分跟着那个反动的总队长走了，剩下约有300多人留了下来。这些人在共产党员带领下拉到了百色，参加了武装起义，成了起义的骨干力量，后来编成了中国红军第七军，这些人都成了红军中、下级干部，可惜参加这个行动的现在剩下没有几个人了，但现在回想起当时随着起义大队走上百色的大道的那种兴奋愉快的心情，还感到无限的激动。

部队拉到百色，党的工作比在南宁的时候更加活跃，口

号也更加鲜明：“拥护十月革命！”“拥护苏联！”各个连队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党员也增加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政训教导员（党员）问我：“共产党好不好？”那时一般的知道共产党领导工农进行革命，为广大工农谋福利；既然工农多，为工农解放的政党自然是好的。我爽快地回答了他。就在这时，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部队就着手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和教导总队同时进行起义准备的还有广西地方部队的警备第四大队，张云逸就是那个大队的大队长，听说那里的共产党员也很多。他们原来也住南宁，在桂系军阀失败时，党把这支队伍拉到百色来。

在起义前夕，11月间，首先将驻田东、田阳的反革命分子熊镐领导的警备第三大队缴了械。到田阳是从百色坐着一只小轮船去的，出发的名义是去演习。开船时，党员们集中在一个舱里开会，宣布了这次行动的意图，快到田阳时才向全体公开宣布，这次战斗打了半天，最后把这支反动军队解决了。部队回到百色，又把百色附近县城的民团枪支收缴了，并用搬来的枪支组织了赤卫队。为了防备起义时反动分子搞鬼，在起义的前一天，又把百色城的警察局缴了械。至此起义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12月10日——起义的前一天晚上，支部公开宣布：第二天举行起义，接着买来了一匹红布，每人扯一条，准备宣誓时戴起来。这天晚上我们兴奋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一夜都没有睡觉，静坐着等待那庄严的时刻到来。

拂晓时分，部队集合了，大家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到广场上去。在那里，全部起义部队四五千人都排好了队，静听着

一个同志讲话，他庄严的宣布：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光荣的中国红军第七军！当太阳刚刚上山，第一面鲜红的红旗飘扬在广场上空的时候，我们迅速地将国民党的帽徽撕掉，佩上了红带子。就在红旗下面，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

就在这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红军第七军胜利地诞生了。

（原载《广西革命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版）

广西的苏维埃运动^①

雷 经 天

一、右江和左江的情况

右江在郁江上游，东向顺流到南宁。右江地区原为广西的田南道属，以百色为中心，包括田阳（那坡、奉议）、田东（恩隆、思林）、东兰、凤山等10余县。西北接邻贵州、云南两省，南与左江各县相连，靠近法属安南；地多石山，边界地人烟稀少，瑶汉杂居，过去为土匪烟帮出没之处，政府统治的力量比较薄弱。因为人民的生活痛苦。性情慍悍，敢于斗争，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在大革命时代，韦拔群在东、凤一带，余少杰在沿河各县，均曾领导过农民运动，组织农会，建立农军，反抗豪绅地主，进行武装斗争。在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广西各地的农民运动相继失败，在右江虽亦受到严重的镇压，但农民的革命斗争，还能继续保持，农民组织的基础，仍然保存下来。因此，右江成为1929年广西苏维埃运动的根据地。

左江是郁江的支流，到南宁与右江汇合。左江地区的中心是龙州，属镇南道，有崇善、养利、靖西、龙茗等十多

^①此文是1945年雷经天根据延安红七军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写成的。这里略作删节。

县。西南即为法属安南，有铁道达凉山，乃国防要地，多数地方为土匪盘据，以冯飞龙在养利、韩飞虎在崇善最著名。

二、“十二八”右江起义

当俞、李在南宁宣布反蒋，继续进行军阀战争以后，我党即派雷经天到右江，预先布置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并组织工农红军。雷以广西省农协特派员的名义在平马设立办事处公开活动，先到思林与黄永达、阮殿煊、黄金镜等商量，再到恩隆、林蓬与滕德甫、滕国栋等讨论；后到奉议仑圩与黄治峰等接洽，并分配严敏去东兰、凤山与韦拔群、黄明春等联络；派陈洪涛去向都与农春荣等联络，要求各地立即恢复农会的组织，集中农民的武装，同时派陈洪涛在恩隆，徐逃生在奉议，张震球在思林，严敏在东兰、凤山帮助各地工作，成立党的县委。从此右江的农民运动，更加活跃起来。

在俞、李的军队里面，警备第四大队为张云逸领导，并兼教导队的副队长。警备第五大队为俞作豫领导，这两个部队都没有到前线去参加反蒋战争，留驻南宁。党决定，倘俞、李失败，这两个部队即到右江与农军结合，实行六大的决议，在右江成立苏维埃政权，割据右江。10月初，俞、李的部队在桂平、贵县前线已经崩溃，南宁形势混乱。教导队长许某某原是黄绍竑的部下，企图乘机带队投蒋。但在教导队中我党有李朴、袁任远、冯达飞等分任队长或政治指导员，即欲将许逮捕，但被他发觉。于夜半发生事变，李朴开枪打许不着，在混乱中给他逃跑，部队四散。后张云逸率领警备第四大队进城，教导队的士兵集合回来400多人。10月13日，俞作柏、李明瑞率领俞作豫的警备第五大队上龙州，护送俞

作柏经安南逃往香港。张云逸派雷祝平、李干辉率领第三营到右江平马，并将南宁所有的金库、枪械库、武器弹药全部向右江搬运。再后，张云逸率领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队，分水陆两路向右江并进。邓斌（即邓小平）、陈豪人、龚鹤村、叶季壮、许进、罗少彦、李谦、沈静斋、何子祁、冯达飞、许卓、袁任远、李朴等均同来右江，于10月20日到达平马。

警备第三大队，原是广西、云南边界的土匪，为俞作柏所改编，调驻南宁。当警备第四大队进驻右江时，熊镐亦率警备第三大队来右江分驻各地。但该部匪性未改，到处欺压群众，而熊镐亦则希图与警备第四大队争占右江的地盘，心怀叵测。当时右江各县旧的政权依然存在，对老百姓作威作福，而警备第三大队又与县政府的警备队互相勾结。我们即决定解除警备第三大队的武装，推翻旧县政府的政权。10月28日，我们调集恩隆、奉议、思林的农军300余人、群众千余到平马领取警备第四大队所发给的武器，连同该队驻平马的第三营，由雷经天负责指挥。在当天下午3时将警备第三大队及县政府包围袭击，收缴所有武器，解散其部队，并将恩隆县长及警备队长逮捕。同时，张云逸在百色将熊镐（警备第三大队队长）扣留。田州方面的行动较为迟缓，致警备第三大队驻田州的一部分武装乘夜逃跑。不久，即将熊镐及恩隆县警备队长枪毙。恩隆县长黄子衡是东兰人，愿意参加革命，经韦拔群担保释放。从此，右江各县完全为警备第四大队及农军所统治。百色的政权由警备第四大队政治部暂时代管。此后，奉议、恩阳、恩隆、思林、果德、向都、镇结、东兰、凤山几县的农会，相继改为各县的革命委员会，

成为临时的政权机关。但各县地主的民团武装依然存在，集中到寨子里面据守，保留着白色的据点。当时即派军队和农军分别进行肃清工作，并准备召开右江各县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

三、右江和左江的革命政权

1929年12月11日，正值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在平马召开了右江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到会的有百色、那坡、田州、平马、果化5处工会的工人代表和百色、恩阳、恩隆、奉议、思林、果德、隆安、向都、镇结、东兰、凤山11个县农会的农民代表，以及红军第七军士兵委员会的士兵代表共80余人。大会讨论了建立苏维埃各级政府、扩大红军第七军、组织地方的工农赤卫军、实行没收、分配土地、肃清反革命分子等问题，并通过一个政治纲领。大会选出雷经天为右江苏维埃主席，韦拔群（农民领袖）、陈洪涛（师范学生，党务工作者）、李南山（平马工人代表）、罗某某（百色工人代表）、韦玉梅（东兰瑶民代表）、刘伟谋（恩隆农民代表）、蒋某某（红军第七军士兵代表）等为委员。右江苏维埃政府即设在平马。

这一天，原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及右江农军正式举起红旗，改为中国红军第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长胡斌，纵队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长韦拔群，纵队政治部主任李朴。全军共2800人，在平马进行了检阅。恩隆、平马的工农群众，到平马来参加庆祝右江苏维埃政府及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大会的有

20000 余人。各县均同样召开群众的庆祝大会，一致愿为苏维埃政权奋斗到底。

随后，各县也召开工农兵苏维埃大会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百色县苏维埃主席关仲和；恩阳县苏维埃主席农夫；奉议县苏维埃主席潘宪甫；恩隆县苏维埃主席滕德甫；思林县苏维埃主席阮殿煊；果德县苏维埃主席黄书祥；隆安县苏维埃主席李干；向都县苏维埃主席农春荣；镇结县苏维埃主席某某某；东兰县苏维埃主席韦命周；凤山县苏维埃主席黄明春。

红七军成立后，党组织前敌委员会，以中央代表邓斌为书记，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李谦、何世昌（教导队学生）、黄某某（士兵）为委员，领导军队及地方的工作。地方党组织右江特委，以雷经天为书记，陈洪涛、陈浩仁、滕国栋、黄治峰、黄永达、严敏等为委员。

当右江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前委即派何世昌、严敏到左江龙州去帮助警备第五大队改编为中国红军第八军。但龙州已为叛军占领，俞作豫同志率队退至驮芦圩。李明瑞重新将部队整理，并收编土匪冯飞龙、韩飞虎两部。反攻龙州，将叛军驱逐。一直至1930年2月1日，警备第五大队才正式举起红旗，改为中国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何世昌任军政治部主任。严敏任地方党委书记。全军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原是警备第五大队的旧部，第三纵队是由土匪冯飞龙部改编成的，共2000余人^①。旋即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为各级政权的最高领导机关，而龙州、宁明、明江、崇善、左县、雷平、养利等县，均相继成立革命委员

^①红八军只有两个纵队，冯飞龙部改编为游击队。

会。

当红八军成立未久。左江的政权还没有巩固的时候，桂系军队即于2月5日进攻龙州^①。因冯飞龙的叛变，红八军不能在龙州立足，军长俞作豫即率主力部队千余人退出龙州，进驻宁明转入广东钦州。在途中又有一营长叛变，部队星散，俞只身赴港，在广九路被叛徒诱捕牺牲。何世昌转回隆安，亦被捕杀。严敏未退出龙州，后遭杀害。还有教领队长甘堪泽、崇善县革委会主席陈镇，均在龙州遇难。左江的革命政权，仅昙花一现，即告失败。

四、右江苏维埃各种政策的实施

右江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是由代表大会选出的以雷经天为主席，其他为政府委员组成的政府委员会。苏维埃政府中，李南山为劳动委员，陈洪涛为肃反委员，刘伟谋为土地委员，蒋某某为财政委员，韦玉梅为军事委员，韦拔群、罗某某为政府委员。但不负政府的工作责任，另委李铁南为政府的秘书长，分工负责，进行工作。

右江起义前，各地已开始有工人运动。起义后，百色的工人运动由红七军政治部负责领导，组织有店员、民船、鞋业、烟叶、药材、码头、泥水、木匠等八个职业工会，合组一个百色总工会，关某某为主任，关后来当选为百色苏维埃政府主席。各工会组织中，店员工人最多，码头工人次之，女工不少。在平马设有农协办事处，派滕德甫专做工人工作，也组织有店员、民船、烟叶、码头等4个工会，选李南山为平马工会主任。李后来当选为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此

^①桂系进攻龙州时间为3月20日。

外。那坡、田州、果化，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才成立工会。右江工人的生活很苦，一般工作最少12小时，工资很低。苏维埃的劳动政策，主要是把工人组织起来。使之参加政权，提出工作8小时，增加工资的口号。一般的工人工资是提高10%到30%，但工作时间没有减少，尤其是民船和码头工人常常因起落货做到半夜还没有休息。也曾有军队侵犯过工人利益的事件，如那坡黄恒栈被军队没收，打烂了几十架缝衣机器。连工厂里面工人的东西也拿光了。军队要工人帮助修理打破了的机器，工人死也不愿意。但是百色的工人，成立了一个工人营，参加红七军，编入第二纵队。

关于土地问题，苏维埃政府是根据六大的十大政纲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的主张，但土地革命在各地的执行、有各种不同的形式，1929年3月间，韦拔群在东兰、凤山就动手分反动派的土地，反动派被杀了，财产没收了，土地是分给愿意耕种的农民，但仍要给农会缴纳一定数额的谷子作为农军的给养，好象是耕公田一样，这样分配没有解决农民土地的需要，在后又将土地重新平均分配，以乡为单位，由政府按土地与人口为比例，每块土地经签定后，即确定土地的所有权。在韦拔群自己的乡里，原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共耕制度组织共耕社，但因劳动负担与生活需要的不平衡，有些农民不愿意参加，结果是失败了。在思林县，阮殿煊将自己所有的土地交给农民，提倡共耕共食，有些农民赞成共耕共食，有些农民赞成共耕分食。争论没有解决，阮殿煊的母亲出来骂了一顿。在恩阳县，农夫提出“实行共产主义”的口号，但不知道怎样实行的办法。有些是铲田塍。消灭土地的分界，有些是集中牲畜劳力，各行其是，

但都行不通。在百色、恩隆，分配土地是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开始时没有很好的组织动员，富农、中农不了解而发生动摇，后来富农把坏地抽出，雇农、贫农分补所得的是坏地，因此雇农、贫农不满，有些抽出中农的土地，中农也不愿意。最后按每乡的人口，土地平均分配。各乡所分土地数目不同，农民常到区、县政府来讨论而不能解决。一般的说，右江苏区的土地，除少数地区发生偏差外，普遍的是分配过了。进行的办法是将地主豪绅反动派的土地全部没收；富农按土地的肥瘦抽出一部分；中农财产根据他所有土地的情形决定，或者完全不动，或者抽出肥的补瘦的，或者抽出瘦的补肥的；贫农补给土地，雇农分给土地。反动的地主多数杀了，不反动的地方给一些坏地。农民的成份由乡政府审查决定，没收分配土地也完全由乡政府负责，县、区政府派人帮助，差不多一切权力属于乡苏维埃政府。

在右江起义的时候，警备第四大队第二营驻在田州，原奉命解决第三大队驻田州的武装部队，但营长黄建华没有坚决地执行命令，致警备第三大队的反动武装得以逃脱。当时为着巩固部队，执行纪律，即认为黄建华是国民党改组派分子，执行枪决。在亭泗战斗失败，三营副营长陈怪石开小差逃跑被捕，也认为陈怪石是改组派即予处死。这就是红七军的肃反工作，其实只是整顿军纪。还有一些改组派嫌疑分子（主要是俞作柏的亲信），如副官处的刘健、李治，参谋处的陈可福、陈可禄、梁某某等十余人仍留在部队工作。红七军决定离开右江时才遣送离队，而陈可福（即陈叔度）、梁某某等，一直随军到达广东连县，部队缩编并准许自由离队时始行卸职，从来没有大批的滥捕滥杀现象，因此，争取了

一部分旧军官及绝大部分的老兵。这个肃反政策的执行是正确的。在地方上的肃反，恩隆于起义时枪毙了一个县政府的警备队长，逮捕过一个60多岁的穷县知事。决定罚款1000元、款没有缴，人也不杀，在后还是释放了。但区、乡政府提到反动的豪绅、地主均直接枪决。还有在边界捕捉到侦探嫌疑分子，即行处死，绝少放松的。对于边区外的群众，一律视为反动派，互相仇杀，造成赤白对立的严重现象。这是在起义初期，各地农民的幼稚行为，但过后即逐渐的纠正。只准杀反动的豪绅地主、民团队长、敌人侦探，如捉到其他工农群众及民团壮丁，即行释放，随后滥杀的错误才被纠正过来。

右江地方虽然贫瘠，但为云南、贵州的鸦片烟土出口必经之路，故鸦片烟过境的收入，最为富裕。过去的军阀盘据右江，就是以鸦片烟税来维持部队的给养。右江沿岸各市镇的大商店，都是做鸦片生意的。这些军阀的部队，一方面包运包送，一方面就化装土匪出来路上截劫。但大利所在，商人并不因此畏缩。右江起义时，百色、那坡、田州、平马各大商店的鸦片，一律没收，即以此作为红七军的军饷，提高官兵的薪饷为每月20元。菜钱6元，粮食由政府供给（没收反动派的粮食）。同时在百色设立禁烟总局（叶季壮为局长）征收鸦片过境税，但因交通阻塞，鸦片不能出口，收入无多，虽设法打开交通路线，红七军第三营营长雷祝平以私人关系，电邀南宁、那坡大商人黄祖武（黄恒栈的老间，经营百货及轮船航业）来百色商量，但他乘轮刚进入苏区到达果化，即为红七军政治部下令第一营逮捕，认为他是一个大资本家，那坡的黄恒栈即行宣布没收（据说有一个连长在黄恒

栈拿了许多金条，发了洋财），还要罚款30000元，用鸦片缴纳，始得释放。此事发生后，各地的商人更不敢到右江苏区来，苏区的商业、对外贸易完全停顿，将自己封锁起来。在百色、平马的厘金总税局，虽然还保留着，但没有什么收入。其它苛捐杂税，一律取消，因此财政来源枯竭。那时的办法只有依靠在沿河几个较大的城市商人筹款借款，但不能经常的筹借，再就依靠赤卫军打反动派没收财产牲畜粮食以资维持。甚至有一个时期，红七军的部队没钱买菜，即去苏区以外拉牛作菜，以至影响到赤白区群众的更加对立，故红七军离开右江城市就没有钱用了。

右江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即将各地的农军改编为农民赤卫军，有工会的城市，就成立工人赤卫军。最初是每县集中完全没有武装的一个连，编成为县苏维埃政府的警卫连、由各县苏维埃政府管辖，没有统一指挥。红七军成立，原警备第四大队及教导队改编为第一纵队，抽调各县苏维埃政府的警卫连到百色集中，编成第二纵队，将韦拔群在东兰、凤山的农军编为第三纵队。1930年三四月间，红七军在隆安亭泗战斗失败以后，敌人已侵占右江苏区沿河各县。盘阳会议决定，第一、第二纵队离开右江苏区向外游击，留第三纵队在东兰、凤山，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当时右江苏维埃政府再令各县武装的赤卫军集中编成4个警卫营，直接由右江苏维埃政府指挥，组织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部。各级政府也改为战时的编制，指挥游击队，在敌人占据的地方，进行游击战争。果化、思林、恩隆、奉议各县政府均设在坚固的游击根据地，随时可以出扰敌人，并消灭反动地主豪绅的寨子。当红军尚未回师右江之前，即由赤卫军配合第三纵队夺

回恩隆、奉议、思林各县城。红七军的主力回师攻克百色，适邓斌从上海中央回到右江，即决定红七军全部离开苏区，汇合朱毛红军，并强令右江苏维埃政府指挥下的赤卫军全部集中，改编为红七军第四纵队，以黄治峰为纵队长。右江的赤卫军原是志愿兵制，但各县有的是用征兵制的方式，如恩隆、思林的赤卫军，是各家派出的，平时不脱离生产，需要集中时，才由各乡村自行派出一定名额，3个月就换班一次。故右江的农民，差不多都当过赤卫军，军队和农民是结合一致，血肉相连的。凡集中的赤卫军，生活由各级政府从打反动的豪绅地主的粮食拨给，无薪饷。给养不足时，赤卫军还从家里带粮食出来，武器装备也多是自己的（警备第四大队上右江时发一部分），以土枪为多，也有部分拿梭标的，所有快枪，大部分集中到红军中去，留在赤卫军的仅有少数。红军每次作战，地方的赤卫军即配合行动，如在隆安的战斗，沿河各县的赤卫军都参加了。战时，赤卫军的组织有响导队、侦探队、运输、担架队等，地方政府亦发动妇女组织慰劳队、洗衣队，凡能够帮助军队的工作，赤卫军都愿意去做。红七军与赤卫军的关系是密切的。

对于土匪，或剿或抚，视各种不同情况决定。凡是豪绅地主率领的土匪，如万岗的邓恩高，朔乙的黄海潮，大所的某某某，原来都是当过团总老爷的，也就是当地的土匪头子，老百姓非常痛恨，右江起义后，红军与赤卫军分头进剿，黄海潮被打死了；邓恩高逃出了苏区；大所的某某某也被杀了。这几处土匪窝，攻破以后，完全烧毁了。百色的罗明山，东兰的黄冕昌，原来也是土匪^①，但在右江农民运动的

^①据我们调查，黄冕昌不是土匪出身。

时候，罗明山很接近奉议的黄治峰，对做农运工作的人员经过他的地方都给以招待，没有任何的妨碍。后来我们派人去他的部队工作，改编成赤卫军的一个营，罗明山当营长，当初很能服从指挥领导，也曾参加过亭泗的战斗，后又编到红七军第四纵队，红七军离开右江时，他亦率队随到河池。又改编归二十师管辖。在河池出发第二天，他即率全营逃跑回右江继续当土匪。黄冕昌很早就与韦拔群有来往，后改编为第三纵队的一个连，归韦拔群指挥，随后红七军离开右江，在广西界首战斗牺牲了。黄冕昌自改编为红军后，进步很快，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原来是土匪的部队，完全改造争取过来了。还有一些土匪的工作做得不太好，编出来的不给以信任，以致不满逃跑。也有不愿改编出来的，不过在苏维埃政权的时期。苏区的土匪，大部分是肃清了，或者是争取过来了，只有少数零星小股跑到边界去活动。

在东兰、凤山一带，靠近红水河沿岸，杂居有少数民族的瑶民。韦拔群在东兰、凤山工作，与瑶民的关系很好，过去当地的汉人叫瑶人为“瑶子”，但韦拔群称瑶人为“瑶友”，瑶人非常的高兴，对韦拔群的信仰极高。在韦拔群的部队里，有许多是瑶人，因瑶人的性情慍悍，善于爬山，故在山地作战是最强的。瑶人所住的地方，多是石山，土地很少，除在石山上种一些包谷、番茄及杂粮外，再没有什么东西，生活非常困苦。过去汉人的政府是不准瑶人下山占有或购买土地的，对瑶人的徭役特别繁重。在苏维埃政府建立以后，瑶人立即得到解放。东兰、凤山的县、区、乡政府，凡有瑶人的地方，即有瑶人的政府委员。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委员

韦玉梅，也是东兰都阳^①的瑶人。苏维埃政府派瑶人下山来分汉人的土地。可以住在汉人的乡村，免除徭役，故瑶人完全拥护苏维埃的政权，说苏维埃政府是瑶人出头的地方。

在右江党政领导机关的干部，除雷经天是南宁人外，其他就是右江各县的地方干部。县级的党政机关，也有外来的干部参加工作，如徐逸生是广东海丰人，张震球是广西北流人，欧定贵（恩隆县委代理过县苏维埃主席）是广西贵县人^②。干部的政治水平虽不甚高，但一般阶级认识是很明确的。这些干部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只有牺牲，没有叛变。如韦拔群（右江苏维埃委员、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陈洪涛（代理右江特委书记及苏维埃主席）、陈浩仁（右江特委组织部长）、刘伟谋（右江苏维埃委员〈会〉土地部长）、滕德甫（恩隆县苏维埃主席），都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关于干部的培养和训练，除红军训练军事干部外，右江特委在某地和平马，也开办过两期党员训练班。但地方干部的工作能力还是比较差的。红七军直接帮助建立右江苏维埃政权，但没有用更大的力量来加强广西苏维埃运动，不但没有调派更有力的干部参加地方党政的工作，相反的在红七军要离开右江时，将右江党政的负责干部如雷经天、黄治峰、黄永达（均是右江特委委员）、阮殿焯、黄金镜、李干（均是苏维埃主席）、徐逸生、张震球（均是县委委员）等均调到军队中随军行动，完全放弃了地方党政工作，致使后来右江的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还有右江的地方干部在红七军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和重用，虽然

①应为都安都阳。

②欧定贵即欧贵祥，广西苍梧人。

韦拔群当红七军的第三纵队长，后改编为二十一师师长，黄治峰当红七军的第四纵队长，后改编为二十师副师长，但他们率领的部队编到红七军以后，仅给韦拔群一个特务连，而黄治峰调任军部副官长、实际上并没有给他们以指挥部队的权责。此外右江的地方干部再没有团级以上的干部，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不满，他们只知道为革命奋斗到底，绝不计较职位的高低。事实证明，在党的教育培养之下，广西右江的干部，始终为党工作，今天比较负责的干部，如莫文骅（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李天佑（师长）、韦国清（副师长兼旅长）、黄新有（旅长）、韦杰（旅长）、谢扶民（旅政治部主任）、冼恒汉（旅政治部主任）、张震球（旅长）、卢绍武（旅参谋长）、黄一平（旅参谋长）、阮平（军分区司令）、吴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都是广西或右江的地方干部，过去在红七军的时候，不过是一个连排长或士兵，他们确实是从实际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成为党的好干部。

凡出来参加红军或地方赤卫军（脱离生产的）的家属如家庭困难，生活不能支持的，首先由本乡的群众“周济”，不足时，由原乡、区政府拨给公粮，这就是优红的办法。但红属除孤寡无劳动力者外，向政府要求“周济”是不多的，因为广西右江的妇女都是大足，从来是劳动的，她们自己的生活并不难解决，婚姻制度是自由的，但红属离婚的事件很少，一方面因丈夫参加红军离开家庭的时间还不长，另一方面主要的还是没有生活的顾虑。

右江妇女的解放，在苏维埃提出的政纲是“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及社会上的地位与男子一律平等”。故在苏维埃政权机关及红军部队中，有少数的妇女参加工作，

并有几个妇女（如张旭）随军到了中央苏区。家庭的经济权力虽然还操在男人的手上，但右江的妇女能劳动，生活可以不依靠男子。在旧社会里，有些堕落（抽鸦片烟、赌博）的男子，反依赖妇女的劳动养活。至于文化，一般的都没有普及，因为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对整个文化工作注意得不够，当然对妇女的文化也没有注意，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因积习未改，也还没有怎样的提高，但在少数地区（如盆阳、赐福），对妇女解放的认识有错误，以为过去是男权统治，现在革命应该是女权统治，曾提出“以女治男”、“以女娶男”极端相反的口号，这也可以看到在妇女解放运动初期狂热幼稚的表现。

总之，在右江苏维埃运动的过程中，政策的实施是依据六大颁布的十大政纲所产生的右江苏维埃的政纲。但时间太短，前后不过一年，当然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甚至于也有不少是做错了的。

五、广西苏维埃运动的失败

广西的苏维埃运动，虽只有一年的时间，但在右江建立了11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在左江建立了8个县的革命委员会。我党直接领导下苏维埃运动的区域，几占广西全省面积的 $1/4$ 。但左江的革命委员会刚建立起来，因桂系军阀的进攻与红八军内部的不巩固，旋踵即告失败。右江苏维埃，则有一年的历史，虽在隆安、亭泗两次与桂系军阀作战失败，但红七军的部队比较坚强，并不因此溃散。同时右江各县农民，过去曾经过长期的斗争，群众运动也比较普遍和深入，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又经过土地革命，政权的基础也

比较巩固，故在失败后，于1930年6月间又能恢复。但因红军于10月间离开右江，且将右江地方武装的赤卫军集中带走，虽留有韦拔群、陈洪涛在右江支持残局，但已经没有力量来保卫右江苏维埃的政权。结果于1932年，桂系军阀和张发奎部极残酷的进攻右江苏区，韦拔群、陈洪涛牺牲，用了不知多少同志的鲜血创造起来的右江苏维埃政权，也就这样的倒下去了。

六、失败的原因何在？

当右江苏维埃和红七军成立未久，政权和部队的基础都未巩固，于1929年12月间，粤桂战争继起；粤桂两军混战于桂平、贵县之间，南宁空虚，我们拟趁此时机，夺取南宁，故很早就提出“打到南宁去”的口号。但红七军又迟迟其行，等待红八军的成立，以便会师进攻，至1930年1月，红七军的部队，始向右江下游果德、隆安一带移动，但3个纵队的兵力并不集结，而左江的红八军还未发动，桂系军阀已经知道，就从贵县前线抽调4个团上来先打左江的红八军，占领龙州，红八军溃散。2月初，敌人转打右江，在隆安与红七军接触，红七军的前头部队仅有一个营，众寡不敌。后来全军赶到，据守隆安，在城外展开激战，经5昼夜，因伤亡过重，即败退，右江沿河各县即告失守。部队撤退到亭泗，又打了一仗，才退到东、凤山地^①。这次失败在军事上是因行动迟疑，没有决断，以致兵力分散，第七、第八两军均为敌人各个击破；在政治上是向大城市发展的方针（右江苏维埃也准备搬到南宁去），敌我力量的对比的估计错误，而且离开

^①应是敌人先打隆安，后攻龙州。作者回忆的时间次序有误

了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区作战，这都是对我们的不利的。

隆安、亭泗两次战斗失败后，红军即在东、凤整编，召开盘阳会议决定今后的行动。当时认为右江的形势，要转为游击战争，这意见是一致的。但对于红七军的游击行动，发生了争论：一种是从红七军要补充资材弹药，以便长期作战的观点出发，主张红七军离开右江苏区，到白区去找机会打几个胜仗，发一点“洋财”来补充自己；一种是从保卫右江苏区的思想出发，主张红军不要离开右江苏区，可在苏区的周围打游击，一方面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苏区，一方面可以没收反动派财产来解决红七军的给养，且提出应该向西北贵州、云南边界发展。结果是依照第一种的主张决定行动。军部率领第一、第二纵队向东北河池、思恩进攻。第三纵队在东兰留守，占领怀远时筹到一批款项，但到思恩却被桂军截击，将两个纵队打散，到贵州荔坡，始再汇合。当时的弹药更加缺乏，失败情绪在部队发生影响。4月30日走到贵州的榕江（古州）边境即决定攻取榕江，经很大的伤亡（200多人）竟攻陷县城，缴获了大批的弹药，一门山炮、一座电台，部队得以补充，解决了主要的困难。但一路行军作战，没有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因此无法在榕江停留。当时湘、黔军阀混战，欲转入湘南，又不能通过，才决定回师右江。这一行动，只能达到补充弹药的目的，但人员受到了损伤，得不偿失。当时右江苏维埃政府则集中各县的赤卫军，编成4个警卫营，在敌人占领的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坚持保卫右江苏区，且在6月间配合红七军第三纵队，恢复右江沿河各县的政权，因为力量薄弱，未能将右江的苏维埃的政权，更向外扩展。倘使红七军不远离右江苏区转向贵州、云南边境游

击，而是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一定可以开辟桂黔滇边的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这个地区是处在“三不管”的山地，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力量非常薄弱，人民生活极为艰苦，原为土匪盘据的地方。而且当时在全国是军阀混战的局面，粤桂、滇桂及黔滇战争相继而起，对革命势力的发展是不能够阻止的。这样的政治环境，完全有利于革命。我们并不了解这种形势，不会利用这种形势，没有抓着这个最好的时机、最好的地理条件和最好的群众基础，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地区，增加红军力量。领导上或过左的迷惑于夺取大城市（打南宁）来扩大政权影响；或过右的对于保卫和巩固右江苏维埃的政权完全没有信心（认为右江苏区东有红水河，南面有郁江，受到地理的限制、地方贫苦没有发展的前途），急于要离开右江苏区。甚至无政治目的和原则的盲目行动（到贵州去打榕江，回思林打滇军），损失自己的力量，这都是极大的错误。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11月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纪念百色起义

袁任远、韦国清、陈漫远、莫文骅、吴西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等组织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至今已经52年了。这次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指引下，在毛泽东创造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推动下爆发的，它为祖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榨之下，灾难深重，民不聊生。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已经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屠杀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如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广西的革命运动，这时也几乎被军阀摧残殆尽。但是广西的党组织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征服、被杀绝，他们转入地下，继续着各种方式的斗争。

1929年初，爆发了蒋桂战争。桂系军阀在混战中失败。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了广西省政府主席和省绥靖司令。他们执掌广西军政大权后，要求与我党合作。党中央即派邓小平（当时名邓斌）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负责党的领导工

作，到了广西南宁，即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当时，俞作柏、李明瑞注意建立新军。新建的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即以党中央派去的共产党员张云逸、俞作豫为队长，张云逸还担任了训练干部的教导总队副主任。同时，经我党的要求，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清党”中被桂系军阀监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分子，并吸收他们到政府和军队中工作；俞、李还同意开放工农运动，恢复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给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自卫军发了一批武器装备。党的广西特委还抓紧恢复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召开了广西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武装农民，加强城市工人运动。

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转机的时候，俞作柏、李明瑞公开宣布反蒋。结果不出十几日，由于蒋介石收买了他们手下两个师长倒戈，粤军入桂进逼南宁，俞、李反蒋遂告失败。俞作柏去了香港，李明瑞到了龙州。在此风疾云涌的关键时刻，经过中央批准，邓小平、张云逸等决定按原计划把我党掌握的武器拉出南宁，到左右江地区，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武装斗争。去右江的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一部，携带辎重，在邓小平、张云逸率领下，到达百色。警备第五大队在俞作豫带领下开到了左江地区的龙州。

广西右江地区地处桂、滇、黔三省交界，原来就有我党的工作基础，特别是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素孚众望，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这里革命斗争也没有停止过。邓小平、张云逸等到达后，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立即筹划武装起义。邓小平召开了党委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六大”主张；改造和扩大部队，建立政治

工作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通过地方党组织，武装农民，开展打土豪劣绅的斗争。右江地区的革命活动日益发展，至十一月初，党中央批准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的番号，任命了领导干部。邓小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立即在百色和龙州筹划一切，具体部署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

1929年12月11日，也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百色城头高高升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宣告中国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和前委书记。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司令胡斌，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军部经理处长张逸秋（后叶季壮继任）。第二天，在平马召开了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陈洪涛为委员。

翌年2月1日，左江英雄儿女聚集在边陲重镇龙州，宣布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八军军长俞作豫，政委邓小平（兼），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何家荣（后离队），政治部主任潘思文；第二纵队司令宛旦平。同时还宣布邓小平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这时，左右江红色区域有20个县，100多万人，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革命风暴，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

反动派黑暗统治，极大地鼓舞了南部边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使桂系军阀大为惊恐。敌人首先以4个团的兵力袭击龙州。红八军由于内部尚不巩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尽管进行了英勇抵抗，但不得不放弃龙州。后来，红八军剩下的一部分，辗转进入右江地区，编入了红七军。

这期间，为了发展右江革命根据地，红七军在隆安等地重创敌人后，一、二纵队即转向桂黔边界活动。邓小平在东兰县与率领第三纵队的韦拔群等一起，则着力开展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邓小平向干部们介绍了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情况和经验，阐述了土地革命对于扩大红军、巩固和发展工农民主政权的重要意义。韦拔群是广西著名的农民领袖，工作的开展极为顺利。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宣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接着，红七军第一、第二纵队从贵州边境回师右江，进行整训，并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工作。经过土地革命，有20多万群众参加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地方赤卫队发展到数万人，各级党政机关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少数民族训练班，乡村宣传队，以及劳动小学、农村夜校等，遍布山寨村镇，整个右江地区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1930年9月间，红七军前委决定依托右江革命根据地向东发展。恰在这时，党中央又派来代表，指令红七军离开革命根据地，冒险去攻打柳州、桂林和广州，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后来发现这些大城市都有敌人重兵防守，我军处境不利，邓小平等力主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但是这种意见当时属于少数，没有通过。由于执

行“左”倾路线，红七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这时已进入隆冬，行军途上雪花纷飞，寒风怒号。红七军指战员们还穿着单衣、草鞋。大家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信心，翻山越岭，忍饥挨饿，且战且走。1931年2月初，红七军在粤北乐昌渡河时，遭敌截击，邓小平、李明瑞指挥主力渡河去，向江西崇义前进；张云逸率领的另一部在坪石以北渡过小北江，进入湘赣根据地。4月，这两支部队在永新会合，旋即协同红二十军、独一师在安福打了一个胜仗，连克茶陵等五城，配合中央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红七军自1930年9月离开右江，至1931年7月到达于都县桥头镇与中央红军会合，在长达10个多月的时间里，转战桂、湘、粤、赣四省，英勇地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终于实现了“汇合朱毛红军”的殷切愿望。从此，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直接指挥下，转战南北。

三

从百色起义到红七军进入中央苏区这一段时间里，许许多多党的忠诚战士，优秀的红军指战员、战斗员，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事业，前仆后继，英勇战斗，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红七军北上后，韦拔群根据党的指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了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与10000多名“进剿”的敌人周旋，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1932年10月19日，韦拔群惨遭叛徒杀害。龙州起义失败

后，红八军军长俞作豫到了香港，在找党的组织关系时，不幸误与叛徒接头，在深圳车站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狱中，他拒绝敌人的引诱，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并留下了绝笔诗：“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1930年9月初，被害于广州红花岗。

这里，我们还要沉痛悼念党的英勇战士李明瑞烈士。

李明瑞同志早期参加北伐战争，是一位著名的勇将。1929年6月，他和俞作柏主政广西后，作了不少有益于革命事业的事情，对我党在广西能够公开或半公开地活动，提供了条件，反蒋失败后，他随俞作豫到龙州。不久，龙州被叛变部队占领，形势异常危急，李明瑞沉着冷静，和俞作豫一起指挥战斗，收复了龙州，稳住了左江局面。11月间，邓小平到达龙州，部署武装起义。李明瑞毅然同意参加武装起义，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增补为红七军前委委员。在红七军开向中央苏区的艰险而漫长的征途中，李明瑞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他勇挑重担，指挥明智，忍受艰苦，临危不惧。李明瑞在指挥和维护部队方面是有重要贡献的。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亲切接见了，党中央委任他为红七军军长。

1932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搞肃反扩大化。红七军一些受过血与火考验的好干部，都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李明瑞也在这次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含冤而死——党对他们的冤屈业已昭雪。他们为人民事业而苏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经过历史风雨的洗刷，百色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所领导的许多次武装起义中的

一次起义，至今仍然光景如新。它是毛泽东“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在广西左右江地区的一次重要革命实践，是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贡献。它的历史经验，丰富了我们关于建党、建军和建政的思想宝库，特别是它所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正是今天我们抚今追昔所要学习的主要内容。让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发扬共产党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同心同德，排除万难，鼓足干劲，奋发图强，为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而奋勇前进。

（原载1981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

从百色到湘赣

袁任远

1929年12月11日在广西举行的百色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之一。这次起义在邓小平、张云逸领导下，短短几个月就席卷了广西左右江地区，并在广西西部近20个县的广大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百色起义已经50多年了，但是当年百色城头的红旗，红七军指战员转战数省英勇悲壮的事迹，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现将我的自传中有关百色起义的回忆摘录一部分，作为对百色起义纪念。

在广西教导总队

北伐战争结束后，各派军阀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明争暗斗，矛盾日益尖锐。为了争夺华中的统治，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反蒋，1929年3月，爆发了蒋桂战争。在蒋桂战争中，桂系的得力将领李明瑞、杨腾辉被蒋介石利用，倒戈拥蒋，结果这场战争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李明瑞倒戈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绥靖司令，统领全省的军事；俞作柏被任命为广西省政府主席。俞、李主政广西

后，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要求我党派干部到他的部队工作。党中央就利用这个机会，派遣一部分同志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其中大部分到李明瑞的部队进行工作。

六七月间，李明瑞的部队由陆路经湖南返回广西。李本人则从水路经上海、香港返回南宁。李明瑞到达上海时，他的秘书姜组武曾来找我。（姜过去曾和我在湖南一块进行革命活动，1926年北伐军攻克长沙后，党组织派他到李明瑞部队里工作，后来失掉了组织关系。这次李明瑞倒戈拥蒋，姜起了重要作用，因而为李明瑞所器重，任李的秘书。）我们见面后，姜约我去广西工作。因为我已在上海赤色总工会工作，不能随便行动，于是，我将上述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很快就约我谈话，认为这是开展兵运工作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同意我去广西，并给了我50元路费。我回机关向阿炳作了汇报，辞去了总工会的工作，经过几天的准备，就出发了。我是经香港去南宁的。因为当时广西还是特委，属于广东省委领导，省委机关设在香港。我到香港找到省委，换了省委的介绍信，然后经梧州到南宁。在南宁我找到了姜组武，就住在督办署。在吃饭的时候，姜组武把我向李明瑞作了介绍。两天以后，我去教导总队找石澄洪，接上了组织关系。后来陈豪人（他当时的身份是俞作柏的秘书）找我谈话，把我分配到教导总队当政治教官。我到教导总队后，通过姜组武的关系，又介绍了几个党员来广西工作。其中有余爱生，改名余惠，他来广西后，也在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

教导总队是我们党通过俞作豫（共产党员，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议而开办的，其任务是为李

明瑞的部队培训初级军官。教导总队的学员主要是从李明瑞的部队中抽来的班、排干部，也有一部分比较优秀的战士，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教育以后，仍回部队担任基层工作。我们党对教导总队的工作非常重视，由张云逸兼任教导总队的负责人。另外，中央派到广西来工作的党员和广东省委派来的党员，大部分都分配在教导总队工作，有的担任教官，有的担任连队的领导。教导总队一共九个连，当时连一级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我们还在连队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并发展了一部分党员。这样，我们就把教导总队的领导权掌握了。另外，我们对学员的教育也非常重视，着重加强对他们的革命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这样，在他们返回部队后，又可发挥作用，成为我们党的骨干力量。

百 色 起 义

俞、李主政广西后，广西的革命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势很好。如果俞、李政权能够延续一个时期，对我党逐步争取、改造李明瑞的旧部队，建立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对进一步开展工农运动是有利的。但是，在俞、李的周围既有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派出的代表，又有南京蒋介石政府的人在监督俞、李的行动，情况很复杂。我调到教导总队不久，俞、李由于受国民党改组派的拉拢、怂恿，和李宗仁、白崇禧旧部的威胁，同时，李也由于他们企图打下广东，统一两广，扩大势力范围的野心作祟，在1929年9月间突然提出反蒋。当时，李明瑞只有3个师，兵力不足，内部的意见又不一致，来广西的时间不长，立足未稳，成功的把握

不大。我们党清醒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时机不成熟，曾劝说俞、李不要上改组派的当。但是，俞、李的决心已定，没有采纳我党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俞、李建议将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留下来担任守护后方的任务，并建议由张云逸同志兼任南宁的警备司令。李明瑞看我们的态度坚决，只好同意了。

9月底，俞、李在南宁召开了反蒋大会，誓师讨蒋，大举进攻广东的陈济棠，还发了反蒋的通电。这个通电，是余惠帮助起草的。李明瑞看了电稿，只将数蒋罪状中把北伐的胜利果实归之于己一词，改用了“贪天之功以为己功”的成语，并将“天”字，改为“人”字。李明瑞的部队刚刚进到桂平，他的3个师全部叛变。俞、李反蒋前后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彻底失败了。俞、李只带一个特务连，仓皇逃回龙州。李明瑞留在龙州，俞作柏经越南跑到香港去了。

失败的消息传来后，我们立即按照原来的计划，把部队和军械库的武器、弹药等物资运到右江。因为右江的地理条件好，又有群众基础，便于我们发展。部队从陆路走，小平同志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从水路向右江进发。很巧，我和余惠是和小平同船而行。过去我们只知道小平是我们的领导，但从未见过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平。他当时化名叫邓斌，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小平遇事冷静沉着，机智果断。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健谈，有时也很诙谐。

我们到百色后，根据小平的指示和部署，积极开展工作。首先，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

二，把政权掌握过来，在我们力量所及的地方，撤换一些反动的县长，换上我们自己的人；第三，整顿部队，扩大武装。我们的部队是从李明瑞的旧部队拉过来的，成分复杂。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革命的军队，我们首先清洗了一些反动的军官。对他们不抓、不杀，发给路费，“礼送出境”。然后，在部队中实行民主革命，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在政治上、生活上一律平等，禁止打骂，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等。同时，整顿、改造了各县的警备队，建立了各县的地方武装；第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当时，在部队中我们党的力量很薄弱，有的单位党员很少，有的单位甚至连一个党员也没有。我们就采取派党员干部下去，分单位负责“包干”的办法，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如卫生部的建党工作，就是我负责的。我经常到该部了解情况，讲政治课，参加他们的讨论，对一些表现较突出的同志专门进行考查、了解，个别谈话。就这样，我在卫生部逐步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卫生部的部长就是第一批发展的。在这个基础上又建立了党的支部；第五，消灭地主武装，巩固根据地。广西的地主武装很多，土匪也很多，我们进到右江后，有的大豪绅跑到了南宁，但大部都跑到山里躲了起来，和我们对峙。熊镐的警备第三大队，原系广西、云南边境的土匪，很反动，有1000多人驻在田东，如果不把他消灭，将直接威胁我根据地的建设。我们采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把熊镐抓起来，消灭了他的队伍。熊镐的警备第三大队被消灭后，敌人的反动气焰才有所收敛。第六，加强对干部的教育、训练工作。对于干部的培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小平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他亲自给我们讲课。我记得党的“六大”

决议、“十大纲领”、苏维埃政权等问题，就是他亲自给我们讲的。他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很受欢迎。我们当时除了进行政治教育外，还注重军事教育。因为当时很多干部都是工农出身和知识分子，他们不懂军事，也没有打过仗。因此，请军事教官给干部上军事课，讲战略战术，讲游击战，讲毛主席在井冈山总结的“十六字诀”。此外，还讲了射击要领，并进行了实弹射击。

10月间，起义的准备工作加紧了。小平把右江起义的工作部署好以后，带领余惠和我准备到左江地区去布置检查工作，为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作准备。我们第一天到了田东，住了一宿，第二天在路上碰到了李明瑞和许进。许进原名许苏魂。1924年我在缅甸时，许在《仰光日报》任编辑，我们关系较好，他当时是国民党仰光支部的负责人，1926年国民党“二大”当选为候补中委。我们这次久别后相见，非常高兴，互相紧紧握着手，只是问好，谁也没有叫名字。因为我们都知道对方可能改了名字。待小平与李明瑞单独谈话时，他告诉我，他已改名叫许进。我告诉他，我也改名为袁任远了。小平和李明瑞两人谈了一会，便决定和李明瑞一块返回百色，这次我们的龙州之行没能实现。不久，小平又带一部分党员去龙州。在邓小平去龙州后不久，部队就进行整顿，共编为三个纵队。以原第四大队的两个营为基础，改编为一纵队。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以原四大队的一个营为基础，加上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二纵队，纵队司令符斌，后为冯达飞，政治部主任是我；韦拔群领导的地方武装编为三纵队，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另外，将教导总队的干部和学员分配到三个纵队担任基层的领

导。这个决定当时并没有宣布，直到起义那天，才正式宣布部队的建制和干部的任命。我当时还在军政治部工作。政治部主任是陈豪人，我任政治部总务科长，叶季壮任组织科长，余惠任宣传科长。以后，余惠调任秘书长，由许进任宣传科长，军部的参谋长为龚鹤村（又名龚楚，1934年在中央苏区时叛变）。

从这以后，我们就加紧进行起义前的一些具体准备工作，我和余惠是参加政治工作方面的准备，主要是起草起义的布告、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和一些标语等。我记得还发了一个宣言。除此之外，我们还翻印了党的“六大”的文件、“十大纲领”等。翻印的“六大”文件，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我抄写的，都是石印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参加。为了严守秘密，我们找来的印刷工人都暂时住在机关宿舍，以免泄露。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是另外几个干部负责。主要是准备军旗、刻制各种印章、胸章、臂章。胸章是分等级的，将级军官是红边，校级军官是黄边，尉级军官是兰边，在这些具体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大约在起义前的一两周，就广泛开展起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动员工作，并对部队进行起义的教育。

1929年12月11日，正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的时候，我们正式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及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分两地召开，一部分在百色，一部分在平马。在百色是红七军参谋长龚鹤村主持的大会，由政治部主任陈豪人讲话，并宣布了红七军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各纵队的编制。最后，我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在平马，由张云逸宣布红七军的组成。还选举了右江苏维埃政府，由雷经天任主席。

小平到左江后，对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的工作进行了部署，随后即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1930年2月，龙州宣布起义，正式成立中国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红八军政委，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

百色保卫战

百色的革命风暴，震动了敌人，严重地威胁着南宁。惶恐不安的敌人，千方百计的想消灭我们。当时，我们对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利用我们掌握的政权，进一步发动群众，肃清根据地周围的地主武装，巩固革命根据地。我们为策应红八军，把主力部队调去攻打南宁。这时，根据地空虚。一些地主武装约2000人，分三路乘机突然袭击百色。当敌人临近城边时，我们才发觉，只得仓促应战。因为只有一个连的兵力，我们就把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干部全部集中，带头上阵。龚鹤村带一部分干部和战士负责打东路敌人，我负责打西路敌人，罗少彦负责打北路敌人。我带领十几名政治部的干部和一个排，约50人奔向西门。这时，敌人已逼近到城外不远的地方，我带领干部从城墙上跳下去（因为女儿墙已倒塌，城墙不高），向敌人猛冲过去，把敌人打得懵头转向，仓皇逃跑。我们追了四五里，因沿途没有搜索，怕敌人设有埋伏，就撤回了城里。这次战斗，我军三路全胜。敌人退过河以后，就不再退了，准备伺机反扑。于是，我们就用大炮向敌人轰击，迫使敌人逃到山地。百色一仗，我们所以能以少胜多，保卫了革命根据地，全靠党员干部的带头，发挥了模范作用，他们真正做到了冲锋在前。

撤 出 百 色

我红七军主力一直打到隆安，敌人不与我红七军主力作战，却集中力量攻打红八军。由于红八军刚刚组建，还没有整顿好，战斗力不强，很快被敌人打垮。敌人打垮红八军后，反过来又集中力量打红七军。红七军主力在隆安战斗失利，撤到了平马。

当时我留守百色，经常和军部保持联系，这时，一连几天电话不通，我们曾派侦察人员前去探听消息，也因田东有土匪，未能通过。我们分析主力部队可能撤出平马，但撤到哪里不清楚。如撤向百色，我们固守百色就没有问题；假如撤向东兰，百色就一个营的兵力，敌人进攻时，部队可以冲杀出去。但全军的军需物资就会受到损失。在这紧要关头，需要我们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采取果断的措施。由于其他领导干部都不在，只有我和符斌负责，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商量了几次，经过反复分析、研究，最后下决心放弃百色。这一决定下达后，立即连夜动员，进行撤出百色的准备工作。我们雇了50多匹骡子，第二天上午带着全部物资，安全撤出了百色。就在我们撤出百色的当天下午，敌人占领了百色。我们经过凌云、凤山到达东兰的武篆，军部已先我数日到达，我们胜利会师了。由于我们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及时撤出百色，保住了辎重，使部队有了补充，全军上下非常高兴。

在苗山播下革命火种

我们到武篆与主力会合后，在武篆休整了10余日，当时大批人马常驻根据地，给养问题解决不了。再回右江已不可能，只有东北方向敌人的力量薄弱。为了扩大宣传，开展游击战争，调动敌人，寻找战机，打几个胜仗再回根据地，我们决定第一、第二纵队东渡红河，向河池进军。河池只有少数地方武装，敌人听说我主力部队到达，不战而逃。我们在河池驻了几天，发动群众，开展宣传工作，原准备继续向柳州发展，但是宜山的敌人向我扑来，我们就向北发展，进入了贵州的荔波。

在行军中，我主力曾被敌人截断，分成两路。两天后又会合了。这时，部队已进入苗山。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破坏民族团结，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造成了苗、汉之间隔阂严重。当我军进入苗山时，他们把寨门紧闭，不准我们进寨。由于他们对红军还不了解，我们向苗族同胞进行宣传，他们也不听。后来，张云逸军长亲自去叫寨门，我们向他们介绍说这是张军长，他们不懂，仍不开门。后来经过耐心的工作，苗族同胞才打开寨门。部队进寨后，向苗族同胞宣传我党的主张，宣传革命的道理，宣传红军是劳动人民的队伍，是为劳动人民打仗的。他们第一次听说共产党，第一次看到红军。由于红军纪律严明，不歧视少数民族，在苗族同胞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我们通过苗族区域就很顺利。每到一寨子，有苗族同胞给我们带路，为我们叫开寨门，替我们作宣传。这不仅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而且在苗山播下了

革命的火种。

榕江大捷

我们通过苗族区后，顺利地到达了贵州的榕江。榕江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老巢，也是王家烈的后方供应地，有许多军需物资堆放在这里。1930年4月间，湘桂军阀混战，王家烈把他的全部兵力开到了湖南，后方空虚，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我们得到这一消息后，便决定突然袭击他的老窝。4月30日，我军进攻榕江，敌人仓皇应战，一触即溃。这次战斗，我们消灭了敌人一个营，缴获了敌人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还缴获了几门大炮和无线电台，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电台。此外，还筹了10万元的经费。在这次战斗中抓获的俘虏，经教育后，有些愿意当红军的，就留下来补充我们的队伍。王家烈听说他的后方失守，急如星火，连夜从湖南返回贵州。这时，我们已分水、陆两路撤出榕江，经从江、罗城又回到河池。我们侦知桂敌已调到桂东北去了，右江空虚，就马上挥戈右江。我们首先打百色，再打田东、平马。1930年6月，我们第二次回到了右江根据地。

当我们回到右江根据地时，小平已经从中央汇报回来，并主持了红七军的工作。我们根据小平的指示，一方面整顿部队，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县、区游击队，另一方面，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小平同志还亲自到平马、田州一带做地方工作。右江根据地又得到了恢复，红军也得到了休整和补充。

河池整编^①

平马整训后，又调我回军政治部任总务科长兼教导大队政治委员。1930年9月，中央派邓岗到红七军，传达了中央对红七军的指示。中央的这个指示，是我亲自用药水洗出来的。中央指示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打下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广东军阀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打下广州，完成南中国的革命。中央的这个指示，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只是少数几个领导知道。红七军接到这个指示后，首先扩编部队，把县、区的地方武装编到主力红军里。另外，把部队中的女员及家属，疏散到各地进行安置。外省来的女员不好安置，就介绍到香港找省委或到上海找中央。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些长途行军方面的准备工作。在完成上述准备之后，就在部队中进行动员。军部率第一、第二纵队离开右江，韦拔群的三纵队留在右江，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10月上旬，红七军到达河池。在河池，我们召开了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改选了前委。会后，即在部队中进行动员，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同时，根据前委的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一纵队改为十九师，二纵队改为二十师，三纵队改为二十一师。每个师辖两个团。十九师辖五十五、五十六团；二十师辖五十八、五十九团。红

^①从“河池整编”起，作者回忆的时间与史实有出入，请参看本书的“大事记”和“专题研究”部分。

八军失败后，有一个营由袁也烈率领，经云、贵边境到达广西凌云县的向阳，与我红七军会合后，也编入红七军的建制。各级干部也重新配备。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

转 战 桂 黔 湘

部队整编后即向柳州前进。当我们走到宜山时，发现金城江有敌人重兵防堵，就立即改道从罗城的北面走。在罗城附近的四把，我们又同广西军阀遭遇，打了一个恶仗。10月24日，我军到达长安。长安是一个大镇，有三四万人，是个商业中心。我军决定打长安，筹点款。由于敌人固守，我们打了几天没攻下。当时，桂军的增援部队已从柳州赶来，我军遂向北进入湖南境内。11月3日，我军占领了绥宁。由于敌人的威逼和反动宣传，绥宁的老百姓全跑了，绥宁变成了一座空城。我们在这里只驻了一夜，便向武冈进军。11月7日，到达武冈城下。武冈驻扎敌人一个保安团，有六七百人。武冈县的城墙完好，又有坚固的设防，易守难攻。我军连攻3天，未能攻破，而且伤亡几百人。五十五团的团长在攻城时不幸牺牲。第四天，湖南的军阀何键又调4个团来增援，我们遂放弃围攻武冈，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南经新宁，过资源，突然袭击全县。敌人根本未料到我军来得这么快，毫无防备，连城门都未关，我军一举攻克。在全县我们休息了4天，筹集了几万元的现款。

由于邓岗、陈豪人在红七军中积极贯彻立三的“左”倾错误，使红七军丢掉了左右江根据地，并且在远离根据地的

情况下攻打大城市，不仅没有完成任务，反而使红七军减员很大，干部、战士议论纷纷。这时，他们借口向中央去汇报工作，离开了红七军。邓岗到上海，陈豪人到香港。不久，白崇禧亲自率一个师由桂林向全县进攻。我们于12月15日经永安关到达湖南的道县。部队在道县驻了一夜，就向江华进军。

在向江华进军的路上，正值隆冬腊月，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这时，有的战士还赤着足或穿着草鞋，身上穿着单衣、单裤。为了御寒，有的战士把过去打土豪时分的棉衣穿上了，不管是男的衣服，还是女的衣服，也不管是红的，还是绿的，凡是可御寒的都穿上了。有的战士因为没有御寒的衣服而牺牲了。到了江华后，前委决定休息两天，补充衣物、给养，突击治疗冻伤。在这里，我们召开了一个营以上的干部会，会上大家意见很多。我们当时虽然还不知道什么立三路线，但是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盲目的攻打敌人有设防的城市是不行的。3个月的浴血奋战，我们没有攻克一座较大的城市，而部队的伤亡、减员却很大。如果再这样干下去，部队就要拖垮。

江华会议后，部队进行了轻装。同时，积极准备冬服，征用了大商户的布匹、棉花，还购买了一些衣物、鞋袜等，分发给战士。不久，部队离开了江华，又回到了广西的贺县。这里是三省交界的地方，离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便于我们休整。在贺县，红七军又进行了一次整编。我们在河池出发时是8000人，现在只剩下三四千人了。由于部队减员较大，这次整编取消了十九师和二十师的建制，把两个师四个团缩编为两个团，即第五十五团、第五十八团。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这时，我又回到了五十五团一个营当政

委。通过这次整编和对部队进行教育，士气得到了恢复，冬服也准备好了，部队也得到了休整，战士们的斗志又旺盛了。

梅花村失利

贺县整编后，我们进入广东境内。1931年1月5日，我们达到广东的连山，在攻打连山时，我们接受了过去打武冈的教训，没有硬攻，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这时，城里的商人派代表出来与我们交涉。答应给我们30000元现金，我们也就解围了。然后，我军向乳源县的梅花村前进。

梅花村是一个山区，四面高山，地形险要。我们在梅花村休息时，粤军突然赶来。据侦察人员报告说，敌人只有两个团。于是，我们就决定反击。激烈的战斗从中午12时一直打到傍晚，后来，我们发现敌人不是两个团而是4个团。敌众我寡，敌人火力也比我们强，我军伤亡很大，不得不撤出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我这个营死伤一半，营长牺牲了，4个连长牺牲两个，负伤两个，其中有一个还是重伤。排长伤亡2/3，战士死伤一半。我们撤出梅花村时，敌人的4个团一直尾追我们。我们决心甩掉敌人，到中央苏区，会合朱毛红军。

进军湘赣

1931年1月16日，我们到达乐昌，决定从乐昌城南20里的地方过乐昌河。小平、李明瑞率领五十五团先过河。由于

船只少，部队渡河的速度很慢。我们一营继二营之后过河时，乐昌敌人已占领渡口北面的阵地，我营是在弹雨中强渡过去的。由于敌人的袭击，张云逸率领的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被敌人截住，未能渡过乐昌河。

我们五十五团过河后，经仁化到达江西的崇义，在崇义，我们一面休整，等候五十八团，一面开展群众工作。这时，我们已与赣南特委取得了联系，特委就在离崇义70里的杰坝。他们有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在杰坝建立了根据地，我们就把伤病员送到杰坝休养。

到崇义后，我们就分析了敌情，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据侦察，崇义敌情不严重，仅上犹县驻有敌军一个师，赣江的上游一带，敌人防范较严，渡河有困难，只有北上井冈山，沿途敌人的防守薄弱。根据这一情况，前委研究决定，如发生敌情，就上井冈山。同时，我还听说小平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七军的情况。

春节前，小平带几个同志到杰坝，一方面与地委开会，研究开展地方工作问题，另一方面慰劳红七军的伤病员。小平在返回崇义的路上，听到了枪声，他知道我们会按照前委预定的计划撤出崇义，向北转移。于是，小平又回杰坝，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让警卫员送给我们。

我们从崇义撤到营前时，小平的警卫员赶到，将信交给我们。小平在信中指定许卓、李明瑞、余惠、我和张翼5人组成前委，许卓任前委书记（我们把这个前委叫小前委）。他在信中还说，我在回来的路上听到枪声，知道敌人已向你们进攻，你们会按原计划撤退。我决定乘此机会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了解“富田事变”的情况。我们接到小平

的信后，即按小平的指示，成立了前委，并向井冈山方向转移。后来，我们经遂川到达大汾，得知永新是湘赣根据地的中心，遂转向永新。

这时，张云逸率领五十八团从宜章过北江，经过汝城、桂东，与红军独立师王震率领的一个团在酃县的水口会合了。他们在茶陵打了一个胜仗后，就转到永新的天河，在那里进行了休整，我们一直在打听五十八团的消息，忽然听说天河来了红军，我们遂向天河前进。3月19日，我们在天河与五十八团会合了。红七军的两个团胜利会师后，大家非常高兴。经过整训，部队的士气大振，在地方上又补充了一部分新兵，然后又回到永新。在永新，我们召开了红七军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经验教训，选举了新的前委。前委成员有张云逸、李明瑞、许卓、许进、叶季壮和我等。

三 军 联 合 歼 敌

1931年5月间，红七军、独立一师和红二十军三支兄弟部队配合打安福。适逢安福守敌五十二师韩德勤一个旅向我进犯，在廖塘桥与我军遭遇。红七军打敌右翼，独立师打敌左翼，红二十军为总预备队。战斗打响后，我军动作快，冲得猛，敌人的迫击炮还未架好，我们就冲了上去，把敌人打垮了。这一仗，我们消灭了韩德勤的一个团，敌残部逃回安福。这是三军会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我军缴获很多。安福大捷后，接着打宜春，由于敌人设防严密，城墙坚固，不好打。遂经莲花，攻打茶陵、攸县、安仁、酃县，以后又打下遂川。我军连克5县，所向无敌，军威大振，给敌人震动很

大。敌人立即调兵遣将，准备“围剿”我们。这时，蒋介石调集了3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中央遂将红七军和红二十军调往中央苏区，配合中央红军开展反“围剿”的斗争。从此以后，红七军就与中央红军会合了。红七军在湘赣根据地3个多月的艰苦斗争中，行动积极，英勇顽强，对保卫根据地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我因病未能随红七军去中央苏区，又回到大汾，就在大汾、草汾、井冈山的大院一带休息。7月间，中央派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林瑞生等到湘赣根据地。这时，我的病已接近痊愈，他们经过大汾时，要我留在湘赣根据地工作。9月间，我病愈后，随同遂川县委书记曹工农、妇联主任颜转姬，还有一个团委书记4个人一块去永新。在宁冈县境内，有一段约40里路的白色区，只能在天黑时走。我们整整走了一个晚上才通过。到永新后，我被分配到红四分校任政治部主任。校长冯达飞，政委李朴，都是红七军的。在学员中红七军的干部、战士也占一半，从此以后，我们就参加了湘赣根据地的斗争。

（原载《星火燎原》第六辑）

在红七军军部教导队里

磨 力

红日东升，朝霞满天。1930年7月15日，在广西省恩隆县（现田东县）平马镇古老的城隍庙里，红七军军部教导队开学典礼开始了。

这时，我们敬爱的军政委邓小平，穿着灰色的中山装，精神饱满地给我们作报告。早在红七军成立后不久，邓小平和张云逸就非常重视部队干部的培养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军部和各纵队都先后举办了教导队或训练班。为了适应红军队伍迅速扩大和革命形势飞快发展的需要，军部现在又举办了一期为时3个月的教导队，培养连排基层干部。教导队有队长、指导员、教务主任，下设3个区队，每个区队3个班，共有学员100多人，教职员和学员大部分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少数民族学员占大多数。我们第三纵队教导队选调了40个学员来学习，其中有我在内。我在这个开学典礼上，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在报告中从右江的革命大好形势谈到举办这期教导队的目的意义和要求。他的讲话简练有力，热情洋溢，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开学以后，张云逸军长经常到教导队看我们。邓小平政委在百忙中不断抽空给我们讲授政治课。任课表上写着邓小平当时的名字——邓斌。他按照课程表安排，几乎每隔几天就给我们上一次政治

课。讲授的内容有工农民主政权问题、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等。他讲课能够照顾到学员的不同文化程度，深入浅出，讲得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记得他讲到土地革命问题时，明确地指出：当前农村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而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目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深入土地革命，按“六大”通过的“十大政纲”，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铲除封建基础，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邓政委的教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经久不忘。

我们学习的内容除了政治外，还有军事课和文化课。军事课主要是学习军事理论和战术训练。每当清晨，嘹亮的军号声一吹响，朝气蓬勃的学员，就迅速穿好衣服，扛起钢枪，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雄壮的战歌，迎着东方的曙光，来到练兵场上，开始紧张的军事训练。有时到郊区进行战术演习。教导队对我们的训练很严格，我们也练得很认真，互教互学。练兵场上，呈现了一派团结战斗、龙腾虎跃的战斗景象。

在学习期间，我们还组织宣传队，敲锣打鼓，到圩场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巩固红色革命政权。起初，我觉得自己年纪小，文化低，不敢上台演讲。后来，在领导和同志们的鼓舞下，我才大胆登台演讲。每次演讲前，我都事先进行练习，做好充分准备。在宣传过程中，自己也受到很大的锻炼、教育和提高。

8月中旬的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幸福的日子：教导队党组织正式批准我的入党申请，接受我为中国共产党

候补党员（候补期一年）。这天和我一起上火红党旗下宣誓的有十几位同志，监誓人是军部总务科长兼教导队的政治委员袁任远。在宣誓会上，我只觉得心脏在激烈地跳动，浑身的血液在汹涌地奔流，我回想自己是一个孤儿，从小就失去父母亲，在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中挣扎，是党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地对党组织表示说：永远忠于党，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红七军奉命北上途中，各纵队集中河池整编，我们教导队也跟军部来到河池，参加整编后便宣布结业分配工作，我坚决服从组织分配，愉快地回到战斗第一线。

（原载《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一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平马镇初见邓代表

黄松坚

我从东兰县武篆区赶来平马，已是第三天了。

金色的十月，右江两岸充满着战斗气氛。平马街上，人们脸上带着喜悦、兴奋而紧张的表情，来去匆匆，其中有全副武装的士兵，也有前来领取枪支、弹药的农民自卫军战士们。

早上八时左右，我在右江农民协会办事处门口，看见远远走来了两个人。一位蓄着大胡子的人——中共广西特委书记、省农民协会特派员雷经天同志，是我到平马才认识的。另一位我不认识，约二十多岁，穿着灰布军装，人很精悍，边走边洒脱地与雷经天同志谈着话，不时的笑着，言谈举止给人一种干脆、利索和果断的印象，显得从容不迫和胸有成竹。雷经天同志的态度似乎对他特别尊重，认真地聆听着他的谈话，含笑地点头。这位是谁呢？为什么雷经天同志对他这样尊重呢？

我正想着，他们来到了我的面前。雷经天同志把我介绍给那位同志：

“这就是韦拔群同志的代表——黄明春同志。”（我当时的名字）

我当时是凤山县县委书记和农军总队长，又兼农会主席

及农运特派员。五天前，我突然接到韦拔群同志的指示，要我作为他的代表，连夜从凤山赶来平马，找雷经天同志报到，并交给我一封写给雷经天同志的亲笔信。我走了两天多山路，到了平马。雷经天同志叫我与农协办事处的同志一起发枪支弹药，发给从恩隆、奉议、思林、果德等地来的农军队伍。我们一直发了两天，武装周围这几个县的农军。

雷经天同志介绍以后，这位同志以敏锐的目光，迅速打量了我一下，热情地和我握手，随即用带有四川口音的话语和蔼地问道：

“哦，你辛苦了，来几天了？”

我说：“三天了。”

这时，雷经天同志才向我介绍道：“这位就是党中央代表邓斌同志！”

我一听，激动地向他伸出双手：“你好啊，邓斌同志！”我怎么也想不到眼前站着的就是早已听说的从中央派来的邓小平同志，更想不到我会在平马跟他认识。我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一股崇敬的心情油然而起：当时的形势我们都很清楚，自从党中央派了邓小平同志来广西领导工作后，广西的形势越来越火红，右江两岸的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前不久，邓小平同志和张云逸同志还把党所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及教导总队拉来了右江。这两天，我们发的军械还是邓小平同志亲自率领警卫部队，从南宁押运来的呢！见到邓小平同志，我的心情怎能不激动万分呢？我的注意力完全被他吸引住了。

邓小平同志很忙。他环视了一下农协办事处里的人员，便要求我马上去执行一个任务。我一听，邓小平同志要我执

行任务，感到多么光荣！原来他要我带办事处的人员到镇上各家各户去找南瓜。我心里打起了问号，现在一不是没有粮食，二不是没有菜，要南瓜做什么呢？我问他，他笑了笑，和藹地反问我：“你想不出来吗？”我说想不出来。他说：“那你先不要问，完成了任务我再告诉你。”说完又爽朗地笑了起来。

我虽然纳闷，但还是带着七、八个同志去找南瓜。街上的老百姓听说我们的队伍需要南瓜，个个都争先恐后地拿了出来，有的还主动帮我们送到办事处的门口，我们算钱给他们，他们有的坚决不要，还说，你们打仗为穷人，如今要些南瓜算得了什么。约九时许，金黄色的南瓜堆满了办事处的门口。我马上将邓小平同志请来，指着这堆南瓜说：“党代表，南瓜找来了，你拿来做什么用？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邓小平同志拍了拍我的肩膀，微笑着说：

“以后你会知道的。”

第二天，平马镇突然响起了枪声。在农协办事处里，只见工作人员有的进进出出，有的忙着摇电话，有的在翻阅地图标记着什么，好一派紧张和热烈的气氛。这是张云逸同志领导的警备第四大队与右江沿岸的农军，在平马等几个地方，同时向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发起了进攻。第三大队部设在平马，大队长是熊镐，士兵大部分是兵痞流氓。这支队伍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妄图扑灭革命的火焰。我党为了在右江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工农，扩大队伍，决定消灭第三大队。当天，驻平马的第四大队部分队伍，以演习和出操为名，在农军的协助下，直指驻平马的第三大队司令部。

不一会，战斗胜利结束了。

邓小平同志走来，高兴地对我说：我们这次战斗十分顺利，但事前不能不估计到会有受伤的同志，现在我们的药品缺乏，而这南瓜瓢拿来敷伤口就是很好的药呢。瓢可以作药，瓜肉又可以吃，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

他的一席话，说得我们恍然大悟。我不由自主地用手拍着自己的脑袋，呆呆地立在那儿，望着他那因为熬夜布满了血丝而又充满智慧的双眼，陷入了沉思：邓小平同志为了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白天黑夜忙着，不仅精心地研究整个广西的革命形势，部署整个革命运动，而且对这次战斗中细致入微的后勤工作也考虑到了，这是个多么难得的领导人啊！

正当我这样想着，邓小平同志又说话了，他交代我们一个任务，到我们到第三大队部去清点武器。我们高高兴兴地接受任务，足清点了两天。

清点完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同志叫我去。他亲切地对我说，现在你可以回武篆了，请转告韦拔群同志带领农军继续扫清南丹、凌云、乐业一带的地主反动武装，武装工农，扩大部队。他说的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肯定，使我现在回忆起来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接受任务后，第二天立即起程。归途上，不知是因为平马战斗的胜利喜悦还是因为见到邓小平同志后的激动心情，我总觉得浑身象有使不完的劲，步履越迈越有力，越迈越快。我还觉得似乎右江两岸的秋色今天变得格外秀丽，天空也特别的高、特别的蓝、空气也特别的清爽。我无限兴奋地想到：回到武篆，我不但要向韦拔群同志汇报邓小平同志

的指示，而且还得把他叫我找南瓜的事告诉同志们，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邓小平同志不单是一位卓有见识的指挥员，而且还是一位考虑事情非常细致周全、体贴士兵的好领导者。

（原载《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一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难忘的武篆野战医院生活

黄明政

1930年春，我们红七军第二纵队在隆安战斗后，转到恩隆（今田东）、奉议（今田阳）以北。敌人乘机占领了恩隆、奉议县城，为巩固其阵地，在恩隆县城的马鞍山建立了一个较大的前哨据点。我军在敌人立脚未稳时发起突然袭击。在这次战斗中，我身负三处伤，其中有一颗子弹从我的牙床、舌根穿过，伤势较重，遵照上级指示，我和其它伤病员一起到100多里以外的东兰县武篆临时野战医院去治疗。在沿途各族人民的热情帮助下，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医院。

到医院后，大家听到了一件激动人心的好消息：敬爱的邓小平政委要来医院看望我们。大家高兴极了，多么盼望早日见到军首长啊！

一天上午，邓政委来了！

他在医院领导陪同下，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地看望伤病员。我们坐在病房里等着，心里可急了。时间过得特别慢，好似偏偏跟我们作对。等啊！等啊！邓政委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病房。

邓政委神采奕奕，和蔼可亲，一进门，就亲切地向我们问好，察看我们的伤势，询问我们的困难。我们激动地望着他，嘴唇颤动着，却说不出话来。

“好！很好！”大家好容易才迸出这几个字。

邓政委笑了。他摸摸床铺，看看摆在病房的医药、用具，关切地说：现在医疗条件差，困难不少，可你们是革命战士，在战场上不怕流血，在医院不怕困难，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邓政委好象知道我们的心事：早日出院，重上前线。他劝我们不要急着出院上前线，勉励我们安心养伤，伤好后，上前线多杀敌人。

首长的话，真象一股暖流通向每一个同志的全身。大家一致表示：一定听首长的话，争取早日重返前线。

邓政委看望伤病员后，当即召集院领导、医护人员和地方党、政负责人在一起，嘱托大家要千方百计医好伤病员，研究各种办法改善医疗条件。

邓政委看望我们两天后，医院管理员发给每人一块大洋，说是邓政委、张军长决定奖给我们的。这些天，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我的家在凤山县平乐区相圩那雄村，贫苦得很，全家人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是韦拔群等同志宣传党的主张，使我看到了光明；是东兰、凤山一带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蓬勃发展，使我投身到革命中来。在革命队伍中，我积极参加斗争土豪劣绅，认真站岗、放哨。百色起义后，我抱着为穷人打天下的目的，参加了红军。参军后不久，我只受过一点简单的军事训练，就投入了保卫百色城的战斗。我们第二纵队第二营六连勇猛地从过去的县政府里面向大街冲去，毫无畏惧地扑向敌人。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我们胜利了，敌人逃走了。以后，我又参加了隆安战斗。这次，在马鞍山战斗中，我负伤后，连包扎都顾不上，

只管向前冲去，一直到战斗结束，才把伤口包扎好进了医院。这些战斗的往事，在我头脑中是那样清晰。我的每一点进步，都是来自党的教导和首长的关怀培养。我负了点伤，军首长这样关心，我永远不会忘记。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11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本文摘录前一部分）

第一次见到邓斌

周 志

一九三〇年三月初的一天，也正是我参加红八军的第四天。当时我是在红八军第一纵队二营部当勤务兵，部队驻防在雷平县，营部与纵队司令部都设在县政府。这天，纵队部忽然来了几个商人打扮的陌生人。顿时热闹非凡。司令员何家荣，参谋长袁震武，副官长钟夫翔及营级干部都来了。钟夫翔副官长赶紧吩咐我打水上茶；当我走进纵队部时，坐在堂屋中央的小个子、头戴礼帽的商人，正在比手划脚地说着话，不时引起满堂笑声。看到当时的气氛，司令员他们又是递烟又是上茶，我想肯定是来头不小。干完事我就赶紧出去到伙房帮忙去了。

这时，钟夫翔副官长正好到伙房吩咐做饭，我趁机问这些人是在干什么的。副官长告诉我，他们是中央派来领导红七、红八军的党代表，你看到的那个小个头戴礼帽的就是邓斌党代表。

不一会儿，伙夫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我的任务是站在旁边负责为党代表他们盛饭。看见他们有说有笑地围在一桌吃饭，我心里当时那股紧张劲也松了下来，我也大胆地仔细观察起这位个头矮小的党代表了，他留着短发，嘴边还有淡淡一撮胡子，吃饭的动作快而干脆，而且喜欢边吃边说话，讲

话也很有幽默感。当时，在坐的人都非常认真地听。看到司令员的认真神态，我想邓党代表的话一定非常重要，只是我当时并不大听得懂邓党代表所说的四川方言。

他很快就吃完饭，我赶紧递上毛巾，邓党代表边接过毛巾擦手，边和蔼地笑着问我：几岁啦，哪年参加红军的，参军怕不怕死？我赶忙立正紧张回答党代表的问话，这时二营杨营长上前说，你别小看这个小鬼，今年才十四岁，一天跟着部队行军七、八十里地也没有问题。接着邓代表摸着我的头说，不错，细老哥，（我们当地方言，我不知道党代表怎么也会说）好好干。当时大家都笑了起来，接着他们就到司令部去了。

天已经很晚了，邓党代表仍和司令员他们在一起研究工作，我进去送茶时，房里的气氛很严肃。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才知道由于龙州军部失守，邓党代表连夜赶往百色去了。

时间虽然过去60年了，但现在回忆起当时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同志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这纪念百色起义60周年之际，追记下这段回忆，以示纪念。

（原载《右江日报》1989年11月7日）

我所知道的邓小平同志

何家荣

龙州起义前后，我有幸结识了邓小平同志，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所见所闻，使我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

1929年12月上旬，邓小平同志在部署了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带着严敏、何世昌、袁振武（也烈）等一批共产党员来到龙州，加强龙州方面的领导力量，和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一起研究龙州起义计划。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举行，成立了中国红军第八军，邓小平同志任红七、八军总政委，我被任命为红八军第一纵队司令。龙州起义几天后，邓小平同志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从上海回到龙州。此时，龙州的形势已相当紧张，他对此异常关心，对左江情况作了全面的了解和分析。他首先决定停止红七、八军进攻南宁的军事行动，召集干部会议，确定红八军前委和左江根据地的工作方针：主要是分派部队到各县发动土地革命，解决地方反动势力，建立农会和苏维埃政权；清除不可靠的旧军官，切实掌握部队；提高警惕，密切与红七军联系，做好与红七军汇合的准备。

邓小平同志因须及时转回右江，乃于3月初从龙州带一个手枪班（班长李忠）赶到雷平与第一纵队会合。在雷平，我和袁振武、潘思文等整队迎接他的到来。我向他简略地汇

报了第一纵队的行动和在太平与安平打土司的情况。他赞许地说：“打得好，我们红军就是要为了穷人翻身而奋斗！”小平同志在雷平停留了约四天，主持建立了第一纵队党委。他对第一纵队无论在政治、军事及群众工作上都作了明确的指示。为了扫除左、右江之间联系的障碍，他随即亲自指挥第一纵队进攻盘据在靖西的郑超叛军。在行军途中，他曾对第一纵队官兵讲话，他说：“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学会使用两杆枪，除了你们手中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是一个战斗员，同时又是一个宣传员。对敌作战时，要一面打敌人，一面喊话，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仗。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呢？还是盲目地做了替军阀卖命的工具了？‘天下穷人都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我们欢迎你们过来！’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了。就能动摇和瓦解敌军，使他们人心浮荡，因而可能会弃暗投明，掉转枪口，或者是敷衍作战的。”他又说：“红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一定要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和老百姓亲如家人。”

小平同志的话深入浅出，言简意赅，象一座灯塔，照亮了第一纵队前进的道路。

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3月11日我所指挥的第一纵队包围了靖西县城的守敌，小平同志亲临前线，和我在南门外阵地（即现在之靖西大桥前面）指挥作战，第二天小平同志还亲自到迫击炮阵地指挥迫击炮轰击靖西南门城楼。但打完了仅存的三发炮弹未能破城，围攻到第四天，战斗激烈，仍未攻下，适向都县委书记陈鼓涛来到，报告右江情况，小平同志急于回右江传达中央指示。我遂派第八连长谭晋率该连和手枪班护送。从靖西经化峒——湖润（宿一晚）——土湖

——上映——把荷——紫徽——潞念（宿邓大寿家）。在潞念，小平同志召集向都县苏维埃主席林柏、赤卫军副指挥黄庆金研究工作。接着，从潞念过富义——大旺（天保县）——敏来——东江（宿一晚）——架龙（向都县）——巴麻，向都赤卫军总指挥黄绍谦带领战士和群众在村头迎接。第二天晚上小平同志在黄绍谦家召开会议。黄绍谦、黄绍君、麻挺龙等参加。会上，小平同志除传达中央指示外，还对向都县开展革命工作阐明了六个有利条件，即1、向都县的群众，经过长期斗争已经发动起来了；2、向都地区有了共产党并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3、各山乡已建立了农民武装——赤卫军；4、各地区粮食勉可自给；5、向都处在天保、思林、镇结、靖西四县之间，山岭重叠，地势险要，利于对敌作战；6、敌人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

接着，小平同志指出巩固根据地的三条基本方针：一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二是肃清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波浪式的向外发展；三是发展党，建立地方政权。小平同志的指示，给向都各族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

第三天晚上，黄绍谦派黄和仁、黄显林、苏廷作等护送小平同志经百弄——派腊——斜央——那赖——六榴——那料——因隆到达思林江边，然后由陈鼓涛同志亲自送过右江到达东吞村。邓小平同志离开东吞村时，这个村有三个女青年（韦荣、赖玉金、黎子青）参加了红军。之后，小平同志再从东吞村经林秀——兰芳——朔良——义圩——盘阳——巴品到达东兰武篆与韦拔群同志会合。

小平同志从靖西到东兰，沿途没有遇到敌人的阻挠，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在“文革”期间，曾有人别有用心地一

再问我：“你派一连人护送邓小平过右江，他在路上杀了人，你知道吗？”我说：“据我所知，并无此事。”1982年5月间，我沿红八军第一纵队当年转战的各县采访，以核实我所写的红八军的史料。同时查清了邓小平同志当年过右江所经过的路线，我找到那时护送邓小平同志的罗彪（靖西人）、莫自英（德保人）两位班长，他们可以作证。

邓小平同志在离开第一纵队时，叮咛我和袁振武等人，一定要把靖西攻下，使左、右江能联成一片，同时更密切地注意龙州方面的情况。他坦率而又亲切地教育勉励我说：“一定要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们干的是光荣伟大的革命事业，虽然我们现在的力量还小，也许会遭受失败，但我们不能退缩半步，无论在何艰苦危险的情况下，都要坚决干下去，以扩大革命的影响。”小平同志的话，鼓舞、激励着我和周围的同志们。我随即想起李明瑞对我说过类似的革命道理。原来李明瑞也是从小平同志那里获得教益的。小平同志具有真知灼见的教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成为红八军第一纵队行动的指针。

现在回想起来，邓小平同志当时只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党中央就赋予他领导广西革命的重任。他能够勇挑重担，从容地审时度势，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动员和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成功地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红七、八军组建问题上，亦足见邓小平同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具有的胆略和才智。据我所知，红七、八军能否建立和发展（特别是红八军），关键在于能否说服李明瑞坚决跟党走。须知道，此时的李明瑞早已是国民党军中的高级将领，是北伐战争第七军中声名卓著的战将，是喧赫一时的人

物。俞作豫同志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但他与李明瑞的关系极其密切（是表兄弟）；因而他对李几乎可说是言听计从（以后的事实也得到证明）。假如不是邓小平同志做好李明瑞同志的工作，红八军能否建立，不无疑问。若是左右江的行动不一致，就必然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局面。但就在此关系党的事业成败的严峻时刻，年青的邓小平同志对李明瑞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使其毅然决然地跟党走，从而有百色和龙州相继起义，有红七、八军和左、右江根据地的建立。尽管后来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红七、八军（一部分）还是长征到达了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继续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左、右江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在苦难曲折中一直坚持到广西解放。以上史实，说明邓小平同志在青年时期领导广西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才干、魄力。说明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很不平凡的。

当邓小平同志离开第一纵队（大约是3月14日）过右江之后，我们继续猛攻靖西，并粉碎了靖西、天保、镇边各县反动武装的反包围。战斗一直进行到3月17日。正当我军造好竹梯，准备强行爬城进攻之际，第一纵队与龙州军部之间的联系突然中断了。我们估计龙州方面可能出了问题，遂决定暂时放弃对靖西的攻击，急速回救龙州。果然，当我们第一纵队于3月20日到达雷平时，雷平街上已贴出敌军师长梁朝玘的布告。我们当即侦知3月18日优势的敌人突然袭击了龙州。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八军军部率第二纵队余部向凭祥、宁明方面撤退。龙州已为敌人所占据。

第一纵队在雷平停留了一天，因桂系军阀梁朝玘部已占了龙州，我们与军部以及第二纵队的会合已不可能。于是，

纵队领导作出决定：冲过右江与红七军会合。但当时与红七军未能取到联系，对右江的情况很不明了，从正面捷径冲过去危险性可能更大。如果仅仅是对付靖西地区的敌人，那我们是有把握的。于是，我们想起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扩大革命影响的指示，乃决定沿着越桂、滇桂边境游击过右江。这样，一方面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取得行动上的自由，同时也可以大大地扩大革命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成为第一纵队的行动指针，对我个人也产生巨大的鼓舞力量。就这样，第一纵队出敌不意，从雷平来个回马枪，顺利地到达越桂边境靖西县的岳圩。我军一到岳圩，越南的复国军（打着刘永福的黑旗）立即开到岳圩来与我军会合（因我曾两次率部越过越南境，群众对我军很有好感，要求与我军合力攻高平。弁说，越南人民是欢迎我军的。如我军进入越南，一切给养均由他们负责。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并打击法帝国主义，当晚我军即与越南复国军进入越南，以高平为目标，但正当顺利地进入越南十多华里之际，发现情况对我不利，我军乃绕道龙邦、葛麻、平孟、百合进入云南富宁县之福祥屯。再经富宁之东的板伦……而到达剥隘，在剥隘休息三天之后，即从瓦弄、八桂进入广西右江。约在四月中旬从凌云县的利周圩（现属田林县）到达彩村险地，被敌人包围伏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才冲破重围。因到凤山的通路为敌所阻，我军乃回师折向北行到达南盘江边的百乐。为了取得休整的时间，冲破黔桂反动势力的“围剿”，几经周折我军始渡过南盘江抵达贵州册亨县的蔗香（现属望谟县）休整训练。至七月间，趁贵州军阀内部混战之机，我军决然向贞丰县进军，企图发展，但当到达贞丰县

的百层河时（距贞丰32华里），因情况突然起了变化，不得已又回军蔗香。直驻到九月间才由袁振武同志率领部队渡过红水河到达现在乐业县之上岗岭与红七军会师。后来改编为红七军的一部分。

第一纵队自离开龙州，历时七、八个月，转战六、七千里，突破桂、滇、黔三省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与红七军胜利会师。这个胜利实在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我们干的是崇高伟大事业，不管遭到任何困难和危险，我们也一定要坚决地干下去，以扩大革命的影响”的正确指示的胜利。这个思想不但成为红八军第一纵队行动的指针，而且每遇到艰难困苦的严峻时刻，我总是以此作为团结鼓舞士气，坚定我和战士们的决心和信心的武器。在我个人以后的斗争路途中，也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和小平同志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他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革命作风：

（一）端庄淳朴，平易可亲。

邓小平同志无论在什么场合从不喜欢标榜自己，他的态度和作风端庄淳朴，平易可亲。生活艰苦朴素，不特殊化。他在左江指导工作期间和指挥第一纵队进攻靖西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跟我们穿一样的服装，吃一样的伙食。象普通战士一样和全体指战员亲密相处，我从没有过为了照顾他而感到紧张和费心，原本是配有一匹黑色骡子给他乘骑的，但他多是让给体弱的战士骑，战士们劝他骑乘，他总是说：“我也和你们一样能够走路嘛。”

记得在雷平时，有一天晚饭之后，我陪同邓小平同志到

郊区外打鸟，他手拿一支双筒猎枪，边走边侃侃而谈。他操一口四川话，语调不高不低，亲切热情，面带笑容，使我们毫无拘束之感。最后走到观音岩山脚下，他挂着猎枪又谈了好一会。直至暮色苍茫时才带着猎得的两只乌鸦尽兴而归。

（二）坦率热情，以身作则。

他和别人谈问题和指示工作时，总是坦率地说明道理，明确地下达指示、任务、令人诚服敬仰。最生动的例证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关于“扩大革命影响”的指示。他对人是这样说的，也是带头这样做的。他在指挥第一纵队围攻靖西作战的几个日日夜夜，几乎与我朝夕相处，做到身先士卒，不辞艰险劳苦。我在执行任务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因为他是上级、是领导，而感到有丝毫的拘束和缩手缩脚。他那信任的目光，爽朗的笑声，使我感到亲切和受到鼓舞，增强我和战士们战胜敌人的勇气和力量。

（三）勇敢坚定，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

邓小平同志指挥第一纵队围攻靖西敌人时，我和他同在南门外（今靖西大桥前面）指挥阵地上。那是一片茂密的竹林，城内守敌相当顽固，而且武器相当好，回击的火力十分猛烈。雨点一般密集的子弹，在竹林里发出尖厉的呼啸。其时，附近的群众拥军的热情很高，不少人冒着敌人的炮火，将食物香烟等供给我们，并挑到火线上来。小平同志感动地对我说：“看，老百姓多么好啊！把东西送到火线上来了。”看到群众在敌人火力射程之内，他又关心地指示我：“你快去劝说他们退到后方去，以免发生危险！”他又多次

提醒我要注意隐蔽。可是，他目光泰然地在原地注视敌阵，显得非常沉着镇定。

在他离开第一纵队之后，即西的战斗到了第七天早上，为了要到西门外与袁振武同志研究准备用竹梯爬城强攻之事，我从南门外到达西门外，经过一段在敌人火力控制下的漫长的开阔地，敌人在城头频频向我射击，子弹纷飞，常在我耳边呼啸而过，跟随我的两位战士，再三劝我注意隐蔽前进，但我考虑到路程相当远，加之攻城之事迫在眉睫，容不得拖延。耽误一分钟，就使战士就多流一分血。此时邓小平同志镇定自若的形象闪现在我的脑际，使我萌生了极大的勇气和力量。我终于义无反顾地与两位战士穿越了这一段危险地带。

还有一个有关的生动事例。有人曾告知我说，小平同志有一次遇险，但凭他的果敢却能化险为夷。那是他从百色过左江将到雷平的时候，路遇土匪突然袭击。其时护送他的部队不多，敌众我寡，交火中，我方某班长胆怯，畏缩不前，而在危急之中，小平同志一把夺过该班长手中的枪，率领战士向匪群冲击，终于把匪徒们冲跑了。事后，同志们都称赞钦佩小平同志的勇敢。

（原载《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93年第2期）

邓政委来到武篆

黄美伦

一九三〇年四月的一天，飘着毛毛细雨。近掌灯的时候，一位精悍的年轻人，戴着竹笠帽，提着拐棍，穿着草鞋，裤脚卷得高高，后面跟着一位红军战士，神采奕奕地来到我娘家的门口。

我娘家住在东兰县武篆区魁星楼旁边。当时，我虽然已跟拔哥的弟弟韦菁同志结了婚，又在县里搞妇女工作，可是见到这两个不认识的男同志，还是有点害羞，不敢抬头看哩！

“你们找什么人呀？”我低着头，羞怯怯地问。

“找韦拔群同志。”红军战士抢先回答。

“你们贵姓？从哪个地方来？”我把眼皮稍微挑高一点，看见他们的草鞋、裤子和上衣都被泥水沾湿了，知道他们一定走了很远很远的山路！

“我叫邓斌，从左江方面来。”精悍的年青人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回答。他的声音亲切、和蔼，使我那忸怩的紧张心情，一下子缓和多了。

我真不敢相信，站在我家门口的竟是我们的邓小平政委！我高兴地跑进屋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拔哥。

拔哥正在我哥哥黄书祥的小房子里看书。我哥哥到果德

县（今平果县）工农民主政府工作去了，空着的房子比较安静，拔哥经常在里面看书。他听说邓政委冒雨来了，喜出望外，立即放下书本出来迎接，亲切地说：

“邓政委，辛苦了！”

“拔群同志，你好！”

他们两人紧紧地握手，格外亲切。两对炯炯发亮的眼睛，互相在对方的身上端详了很久很久。

邓政委跟拔哥握过手后，又转过来想跟我握手。那时，我们壮族妇女还没有跟男同志握手的习惯，我不敢伸出手来，脸上胀得绯红。接着，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呀，做什么工作呀，慢慢地，我也感到不那么拘束了。

拔哥安排邓政委换了湿衣服，吃了晚饭，坐在我们壮家的火盆边，说个没完。他们谈的都是公事，我不好去打听。后来才知道邓政委刚从中央汇报工作回来。他趁红七军第一、二纵队到贵州打军阀的机会，直接来到武篆找拔哥一起进行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

第二天一早，拔哥便带邓政委上魁星楼去。

魁星楼，是一座六角形塔式的楼房，一共四层，四丈多高。朱红的墙壁雕龙画凤，倒映在水里，把我们壮乡装点得更漂亮。以前，这是人们祭祀文魁星的地方。现在，神牌菩萨被搬掉了，变成了农协会和工农民主政府办公的地方。平时，拔哥经常住在二楼上。这次，邓政委来到武篆，拔哥就在二楼上增加一张竹床和一张旧的八仙桌，供邓政委办公和学习之用。从此，魁星楼上的灯光，经常明亮至深夜。

邓政委在魁星楼上经常和拔哥一起召开军政干部会议、党员领导骨干会议，研究制定有关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

他向第三纵队主要党员领导干部，介绍了他在中央工作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来的土地革命的做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为了加强党对土地革命运动的领导，培训骨干力量，军前委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在武篆旧州屯，举办了一期干部训练班。学员共有一百人左右，其中女学员十儿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邓政委亲自给我们讲课，每隔三天来讲一次。主要是讲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和工农民主政府的建设问题，有时也联系到妇女翻身解放的问题。他一口四川话，遇到我们听不懂的地方，就请拔哥做翻译。记得有一次，邓政委在讲课时，采用启发式，向我们女学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妇女受苦受难，走路讲话都抬不起头来。现在为什么能和男人一起参加学习？”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搞妇女工作以来，经常听到一些女伴们不是叹命苦、投错胎，就是埋怨丈夫和公婆。我原来也是这样的想法，参加革命工作后，才逐步认识到只有打倒封建统治阶级，我们妇女才有出头的日子。想到这里，我鼓起了勇气，大胆站起来发言，我把自己前后的思想认识说了一遍，不知道是不是答得对路。心里怦怦在跳。

邓政委听了我的回答，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头。他接着问：“你再讲一讲，革命给妇女带来什么好处？”

“读书明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共掌政权，团结互助，铲除压迫……”，我把过去在拔哥办的农讲所里学到的道理，一口气搬出了十条好处。

邓政委听后，高兴地笑了笑。这时，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男女学员们都在七嘴八舌地评论我的发言。最后，邓政委联系我们武篆地区妇女的实际情况，从妇女过去受到的政

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说到妇女翻身解放的重大意义。他还赞扬了武篆妇女们的作用：组织妇女赤卫队、配合红军上山剿匪、护理伤病员、做军鞋、做米袋等等。同时，还指出今后妇女工作的方向。

在学习期间，我们每个学员都领到了两本油印教材：一本是《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另一本是《苏维埃的组织 and 任务》。这是邓政委亲自在魁星楼上的桐油灯光下编写的。他写好后还叮嘱刻钢板的同志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你们刻写时，字体要写得端正，笔划要写得清楚，使大家容易看懂！

训练班结束后，我到太平区（今三石公社）检查妇女工作，在陆浩仁同志家里碰见了邓政委。我爱人也陪他到了那里。我一点也不拘束了，主动伸出手去，同邓政委握手了。他说起刚到我家时的情景，诙谐地说：“现在不害羞了吧！大有进步！”接着，邓政委问我到太平区做什么事，我说召开妇女会议，研究成立妇女赤卫队和发动妇女参加土地革命、搞好后方生产和保卫工作的问题。邓政委听后指示说：要注意在斗争中发现和培养妇女骨干。他的话，说到我心上了。

邓政委从左江到右江，沿途跋山涉水，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会布置工作，找群众谈心，关心群众生活。听说路过向都县印茶区（今田东县印茶公社）一个小山村住宿时，看到村子里挑水困难，他便跑到很远的山泉边去洗脸。没有房子，就跟护送人员一起搭地铺，七八个人同挤在三张破旧的棉被里。夜里，他珍惜老乡的灯油，见油灯点着两根灯芯，就把它拔掉一根。这次，他来到武篆，也是深入土舍茅棚与

群众促膝谈心，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向群众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拔哥和我爱人经常陪邓政委下乡，看见邓政委在干部或群众家里，同群众一起吃玉米糊、木薯、猫豆，而且吃得津津有味。群众说：“邓政委象我们壮家人一样！”

武篆善学村（今巴学大队）设有一个临时野战医院，住有三、四百名伤病员。邓政委很关心他们，曾抽空和拔哥一起到医院逐个看望伤病员。同时，还同拔哥骑马到武篆板勉村红军兵工厂召开工人座谈会，勉励外地来的工人要与本地工人搞好团结。互相帮助，安心搞好兵工生产。

有一天，他和拔哥、雷经天、陈洪涛等同志一起，去东里屯参加了土地革命庆祝大会。我也跟在他们后面一起去了。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当邓政委听到拔哥家里带头烧毁田契时，高兴地称赞说：“做得对，给党员干部们做出了好样！”走着走着，东里屯传来了欢乐的锣鼓声，我们加快了脚步。邓政委他们进入会场时，首先佩上了红领带。那时，我们开群众大会，都要在衣领上挂红布条。大会开始后，拔哥讲了话，邓政委也讲了话。他代表红七军前委向我们东里屯各族群众表示热烈祝贺，鼓励大家分到土地后要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红军，巩固和建设好右江革命根据地。他说，要把眼光看远一点，心里想远一点，今天实行耕者有其田，明天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邓政委的话不长，却使我久久不能忘记。

邓政委为革命工作废寝忘餐，日夜操劳，头发长了也顾不得理。一天，雷经天同志向邓政委汇报工作后，看见他的头发太长了，便对他说：“我们警卫班战士什么都懂，理发手艺有两下子，让他们给你理发吧！”说着，就叫来了两个

警卫员，一个给他剪发，一个给他修容。邓政委一边理发，一边跟战士们聊天，虽然战士们听不大懂四川话，但都感到这是邓政委在关心他们。邓政委很喜欢这些生龙活虎般的警卫战士，后来，还向雷经天同志提出调几个到他身边工作哩！

邓政委在武篆魁星楼住了两个月左右，经常工作、学习到深夜。凌晨，我们妇女赤卫队员们迎着朝霞来到魁星楼下的草坪上操练，经常看到楼上的灯光仍在闪耀……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

护送邓政委

牙 美 元

1930年春夏间，我随红七军主力到黔桂边区打游击，行军到达贵州荔波县的板寨。5月初旬的一天，军部命令我从黔边回右江与第三纵队联系工作，经过几天的艰苦跋涉，我在东兰会见了韦拔群，联系好工作后，就准备返回黔边。

当月下旬的一天傍晚，突然接到韦拔群的通知，要我马上到他那里去，商量要事。当时我心里琢磨，有什么要事呢？于是我就和几个亲近的同志，如黄正文、黄明凯、牙有仕等立即去见韦拔群。拔群对我说：“邓政委从上海（中央）回来，要去找红七军，把红七军调回右江，组织决定要你护送。听拔群这么一说，我想到即将同久已盼望的邓政委见面了，心里十分高兴，但立即又感到当时形势有些紧张，护送政委责任重大，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拔群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你刚从军部那里来，情况熟悉，我相信你会很好完成任务的，还有什么困难吗？”面对领导的信任和关怀，我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责任再大也要担负起来，困难再多也要想办法克服。于是，我坚定地回答：“请拔哥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晚上，拔群召集我和黄正文等研究护送邓政委的有关事项。大家估计，这时红七军主力可能正向河池一带移动，便

决定以河池为寻找红七军的目的地。选择行军路线时，有的主张走近道，沿老路东进，这样可以早点到达河池。拔群想了想，问道：“走这条路行吗？”我想，沿大路走，必须经过隘洞、同乐、香河一带，而这是大恶霸陈子怀、韦祖荣的老巢，他们的反动武装经常在这一带出没，走这条路怕不安全，于是，我建议先北上长江，再绕道南丹、那地、大厂，前往河池。我说：“长江是我的家乡，这边的路线我比较熟悉，又比较安全。”最后，拔群采纳了我的意见，决定向长江方面进发。

出发那天早晨，天气晴朗，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我和黄正文、黄明凯、牙有仕等几个战友来到邓政委住处。邓政委和警卫班早在院子里等着我们，他见我们来了，邓政委迎面走来，亲切地向我们问长问短，并把我们上下打量了一番，好象在检查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4人围拢在政委身旁，注视着政委的容颜，等候着政委的吩咐。当时年仅24岁的邓政委，身着一套深灰色军装，头戴一顶红军帽，脚穿一对凉鞋，红彤彤的圆脸上，长有一对特别和蔼而机灵的眼睛。他的话虽然不多，但一言一语都使我们感到十分可亲。聆听着邓政委的教诲，仿佛有一股暖流正缓缓透过我们的心扉。

寒暄片刻，拔群牵来一匹大黑马，请邓政委上马出发，路上，我们4人和邓政委走在前头，短枪警卫班在后，当天下午到达长江区那耀圩住宿。第二天翻山越岭到达金谷的拉圩。第三天早上，我们来到了红水河边准备渡河，可是，邓政委的黑马望着滔滔的河水，怎么也不肯上船，我们只好找来一块黑布蒙住马眼，把他牵上木船。快到南丹边境的拉潭

村时，我考虑到这个村地处偏僻，是土匪出没无常的地方，便对邓政委说：“这地方情况复杂，请政委叫警卫班注意，握枪在手，以防万一。”邓政委微笑着说：“不要紧，用不了半分钟，枪就拿出来了。”说完又驱马向前，踏上了崎岖的山路。

行至中午，烈日当空，人马饥渴。不久，走到一个冷水潭边，邓政委停下马，要喝冷水。我忙劝说：“山泉水冷，喝生水容易生病”。邓政委说：“我喝惯了，不要紧的”。休息了一下，又继续赶路。

这天下午6点钟，到达那地住宿。晚饭后，我又和邓政委拉起话来。我说：“有人讲我们右江土地革命太激烈了。”邓政委说：“不镇压豪绅地主，农民那里得土地呢？”当晚我考虑第二天的行程，沿途地势险要，又有恶霸罗松等的反动武装布防，为保证邓政委安全通过，我便同那地县革委会主席韦国英商量，关于加强护送邓政委问题。韦国英决定派遣排长韦明宜、韦明日等同志，率领那地县赤卫军一个排，加强护送邓政委。

第四天清晨，我们和邓政委等从那地启程，翻过黄花岭到扬州，休息后继续向翁垌进发。途中休息时，我惋惜地对邓政委说：“国民党蒋介石实行清党反共，杀害了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同志，不然，我们的革命就发展得更快了。”邓政委说：“他们不清党，我们那里有朱毛？”

下午5时左右，我们到了大厂。这里离河池只有一天路程了。进店家住下后，邓政委对我说：“现在我写封信，明天由你带去找红七军，另给你5块法光作路费，我在这里等待。”说着，政委便掏出一支灰色铅笔开始写信。我从旁看

过去，只见他以流利的笔法，在信首写了豪人、裕生（即李明瑞总指挥的号）、云逸、李谦、胡斌等的名字。信写好后，邓政委对我说：“明早来我这里要了信出发。”

吃过晚饭，邓政委同我们一起上街散步，听到街民议论说：“前两天有大军到河池，打着铁锤镰刀的大红旗。邓政委亲自访问了许多街民，说法都一样。回店以后，邓政委对我说：“老牙，根据街民反映，红七军可能已到达河池，明天不用带信去了，我们一起去看看。”

第五天拂晓，我们立即上路，下午6时赶到河池，果然是红七军回来了。邓政委当晚就会见了军部的领导同志。我们经过5天的长途跋涉，虽已精疲力竭，但由于顺利完成了护送邓政委的重任，心里都非常愉快。

邓政委和红七军，在河池停了两天，集中开会，传达中央的指示文件并研究回师右江问题，就在我们到达河池的第三天早上，邓政委同军部的其他领导，立即率领全军开赴东兰，接着又向百色挺进。经过两天激战，全歼了盘踞百色城的岑建英部，胜利收复百色县城。

（原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89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邓政委指导我们工作

黄正昌

1929年冬，我们百色县武隆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地点在岩邦圩局董部旧址，我任肃反委员。那时，坡力乡苏维埃在坡晚屯覃福合家成立。此后，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政权等活动。

1930年5月，红七军政委邓斌，军长张云逸率数千人马从东兰到所略，要去光复百色。区政府接到指示后，派我和罗继业（粮干）、罗继荣（秘书）到坡力各乡筹粮。那时敌人常来骚扰，筹粮工作遇到不少困难。黄金廷、黄廷章各有一仓残谷，但没有舂，我们三人深入群众，召开了妇女会，发动了妇女们舂米。这样，各村寨连夜行动，两天就筹得1万多斤白米，主要在坡力、所圩、采乡。

一天，邓政委带人到武隆区筹粮点检查筹粮情况，首先来到了达力乡，跟着邓政委的有张军长、陈豪人、雷经天、罗文佳等领导人。在乡苏维埃政府时他们一一作了介绍。我看了看邓政委，他年轻英俊、身穿灰色军服，个子不高，但矫健、精干、结实，两眼炯炯有神，约20多岁。我姐当时也在区府工作，见了他十分钦佩。她对我说：“红七军真好啊，那么轻轻的年纪，就当上领导了，可是，人家为什么老说好铁不打钉，好仔莫当兵呢？这是不对的呀！”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乡苏维埃政府工作到深夜，邓政委突然前来视察。他一人走进筹粮处，其它战士在门外站岗巡逻。他和蔼地操着四川口音向我了解情况。

他问：“你叫什么，同志？”

“我是区苏维埃派来这里筹粮的，叫黄正昌。”

“好，好，好！”他拍拍我的肩膀说，“粮食有没有？”

“有！”

“我们找村里有威信的人来开会，向他们宣传，让群众懂得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是保卫劳苦大众的。这样，他们就送米来了。”

“现在得多少斤？”

“差不多得1万斤。”

“要不要派一个连来帮忙？”

“不必了，战士们劳累，让他们多休息吧。”

“好，好！要得要得，你们工作蛮可以哩。”

这时，邓政委看了看我的床铺，那是用3块木板直接摆在地上的，板上铺了一件蓑衣当席子。他微笑的说：“我和你睡行吗？”

我怕首长过不惯这样艰苦的生活，很难为情的说：“我这里没有蚊帐棉被，都叫土豪劣绅掳光了。”

邓政委又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蛮好的，不要紧！革命嘛，先苦后甜啰！”接着，顺势躺下。约几分钟后，他站起来对我说：“你休息了，明天还有工作。”说完，握了我的手，又到别处检查工作了。

邓政委才出门不久，“嗒嗒的”、“嗒嗒的”的起床号

响了，邓政委就这样度过了一夜。

红军战士们打好了背包，习惯地给群众上了门板，打扫卫生，挑满了水，就待命出发了。

这次筹粮，红军除了付给粮食费外，邓政委表扬了我们区乡干部，特地奖给我们8支步枪和一匹大黄马。

黎明时分，红军大队人马出发了，向百色方向走去，到采乡背后的雅尾坡，与敌岑建英部发生遭遇战，红七军很快将敌人打败。接着，邓政委和张军长又率军前进，光复了百色城，攻打了田州、平马，重新恢复了政权。

（原载《百色起义60周年纪念资料集》，百色市史志办1989年编印）

邓斌给我们讲课

陆显踞

我的书名显踞，又名善能，1905年生于天保县（今德保）隆桑乡，1929年春考入百色广西省立五中，在第17班，与马之义、陈志坚（毓新）、岑世恒、蒙瑞荣、黄玉珍、陈玉婷、骆瑶琼、滕善芝是同班，王振强在第18班。

进校时，学校有个学生会，会长叫黄显敦（凤山县人），还有个姓廖的。学生会曾组织学生闹了一次风潮。风潮的起因是有些老师水平太低，上课讲解错误多，我们学生会向学校提出撤换某老师，学校怕把事情闹大，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当时，杨柳溪是五中训育的主任兼体育老师，他平易近人，和同学们的关系很好，因此常和我们接近，除了上体育课外，还教我们跳舞，常给我们讲些形势。

12月11日百色起义那天，我们全校师生200多人到东门广场参加庆祝大会，会上有个农民代表向红七军领导人送印章，百色县苏维埃政府也在那天成立。起义后，五中改为“广西劳动第一中学校”，教师学生每人均发了一枚襟章，是白布做的。三寸左右的长方布章，正面印有蓝字校名，背后写个人姓名。学校照常上课，但《三民主义》那课就不上了。那时，18班的陆岗在放假时，还到军部抄文件，当文书。在

我记忆当中，印象最深的是邓斌、张云逸给我们讲课了。

每逢周六，学校都开“同乐会”。一天晚上，邓斌前来参加，邓斌在会上讲：“我们今晚开同乐会，是很快乐的，但是这只是少数人的乐，还有很多人在外面不得乐，他们有的没有饭吃，有的没有衣穿，他们在哭，不能象我们这样快乐。如果全百色、全广西、全国的人都得到快乐，那才是真正的乐！”“你们是学生，有责任唤起民众。有的人说，读书不问政治，但是政治要来问我们！”邓斌这些话，我如今记忆犹新。

还有一些难忘的事。我有一本书，书名叫《悲壮的五月》，是我叔从广州寄来的，这本书以五月发生的事件为内容，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杨柳溪老师从我这里借去，他看完后让我去要回，第一次去找杨老师未见，第二次进到杨老师房间时，看见他正在和邓斌谈话。杨老师即把我介绍给邓斌。

邓斌问：“你家是哪里的。”

“我家在天保。”我回答。

“天保有多少人在这里读书？”邓斌又问。

“有八九个。”

“你们回去组织苏维埃行吗？”

“我们幼稚，怕做不好。”我们心有余悸地说。

“不要怕，我们派人去指导。”

我想了想，说：“那我们放假回去，找我叔陆映商量，他读过军校，现任小学教师。”

“那也好。”邓斌同意了。

当天，邓斌把《悲壮的五月》一书借去了。

待到放寒假回到隆桑时，我联系了王振强、王克刚、陆才斌、陆文富、陆正基、陆显旋等同学，商量的发动群众组织苏维埃一事。后来，大家决定分为3个组，在隆桑、镇都、田东板立村活动。1930年旧历六月初八（7月3日），我们在板立村成立了“救国奋斗团”，有80多人参加；陆映南任团长。不久，又召开了第二次大会，有300多人参加，还任王有良为副团长，王克刚为参谋长，我为团助理员，陆文富为团秘书。这次会后，陆映南去百色找张军长联系要武器，可是，他到田东的大榄乡时，被县警抓住，押往田东县民团指挥部处，即辛子文家，不久，被辛杀害了。当我们得知陆被捕的消息时，筹集了几百元光洋，想把他赎回来，但走到半路，就听说他牺牲了。我们返回板立，领导人牺牲后，有的去跟黄绍谦。我后来又回到百色五中继续读书，直至毕业。

（原载《百色起义60周年纪念资料集》，1989年9月百色市史志办编印）

专题资料 and 文章

邓政委在恩隆

1929年10月初，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不听从我党劝告，举兵反蒋失败。中共广西军委当机立断，迅速把军委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撤离南宁，开赴左右江，筹划武装起义，成立红军，开创革命根据地。

10月14日，中共广西军委负责人邓小平（邓斌）率领委员、地方干部和警卫队乘军械船从南宁溯江上驶，张云逸同志带领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从陆路沿江掩护前进，10月20日先后到达了恩隆县（今属田东县）城平马镇。小平同志和云逸同志在中共右江工委住地（经正书院）听取了右江工委书记雷经天及委员汇报工作情况后，肯定了右江工委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活动所取得的成绩，并分析了当时右江形势和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意见。与会同志听了十分高兴，深受鼓舞，一致表示赞成小平同志的意见，下定决心把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更加扎实，为武装起义和建立根据地而努力。为了大造声势，唤起群众，共同奋斗，当天右江工委和广西农协右江办事处，还召开了近万人欢迎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到右江的大会。在会上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苏维埃！”等口号。会后小平同志提出次日启程百色，大部分军械都带去，暂时用不着的重武器和弹药，分散运往恩隆县七里山区和东兰保存，留下第四大队第三营驻守平马，大家表示同意。

同月21日，小平同志率领大部分开往百色，22日到达百色后，就千方百计开展各方面工作，为百色起义做好一切准备。

新桂系军阀眼看警备第四大队挺进右江，如“猛虎进山，蛟龙出海”之势，就迫不及待地密令广西警备第三大队长带领一千多名喽罗，紧紧跟踪第四大队进驻右江重镇，伺机吃掉小平同志领导的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小平和云逸一眼看穿了敌人的阴谋，为了先发制敌，决定于10月28日在各地同时智歼熊镐部。雷经天同志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于10月28日上午一次又一次检查驻平马的第四大队第三营和在平马配合第三营作战的恩隆、奉议、思林等三县的三百多名农军的准备工作，交待了注意事项。下午三时许，战斗打响了，前后约一个小时，击败第三大队设在平马的司令部及两个营，收缴枪支三百多，农军还包围恩隆县府，逮捕了主要官员及警备队长廖月波（后处决），战后小平同志高兴地说：“我们这次战斗十分顺利。”这一战斗以微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它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为右江苏维埃政府在平马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小平同志为红七军政委，云逸同志任红七军军长。翌年2月，左江又成立红八军，小平同志任两军总政委。

同年12月初，邓政委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1930年2月7日，回到左江的龙州，对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布置工作后，在红八军一连人的护送下，于3月14日到向都县北区的巴麻乡（今属田东县），当天住在向都县赤卫军总指挥黄绍谦的家，邓政委与绍谦促膝谈心，高度赞扬地主出

身的绍谦同志的革命精神，语重心长地说：“看一个青年革命不革命，不看其出身如何，主要看他本人的表现怎样。”白天没有谈完，晚上又心贴心地谈个痛快。邓政委的教导，使绍谦同志精神焕发，浑身是劲。次日，邓政委在绍谦家召开了有10多名地方干部参加的会议，听取汇报后，他总结了向都地区六个方面的有利条件，指出巩固根据地的三条基本方针：一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二是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有波浪式的向外发展；三是发展党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邓政委即将离开巴麻时，再次和绍谦同志恳切谈话，鼓励一番，并书赠当时颇为流行的诗篇：“男儿立志出乡关，报答国家哪肯还；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

17日夕阳西下，邓政委一行离开巴麻，摸黑赶路，走了9个小时，来到右江河畔。是时，七军主力已转移到黔桂边区游击，沿河城镇已被桂军占领。当时在中共向都县委书记兼中共思林县委书记陈鼓涛等人的接应下，拂晓前总算在坡烟渡口渡过了右江河。20日到达思林县兰芳村陇邓屯（今属田东）。邓政委在该村群立屯陆显仁家办了一期训练班，思林县（今属田东县）的地方干部20多人参加，邓政委多次到训练班讲话，他指出：“不学习共产党理论，就没有共产党的责任感。”仑圩人李锋在班上讲课时说：“没有掌握革命理论，怎能发动群众起来干革命呢！”邓政委连声赞扬说：“对！对！对！”有一天，赤卫军营长梁维祺召集战士100多人在六月村头开会，特邀邓政委讲话，政委说：“干革命要克服困难，要打破家庭观念，我们同土豪劣绅是势不两立的，我们不打倒他们，他们就打倒我们。”简短的话语，一

直激励着战士们上进。

4月1日，邓政委一行离开兰芳，当天到达那驮，恩隆县赤卫军大队长滕国栋向邓政委汇报说：“群众已转移深山，一时筹粮还有困难。”政委说：“不用愁，我们有干粮，今晚大家就用干粮充饥。”政委还布置今后筹粮方法并叮嘱随从人员：“一定要遵守纪律，进群众家住不要损坏东西。”次日邓政委一行继续前进，几天以后到达东兰县武篆区。

邓政委长途跋涉，在经过的地方一住下来，就不知疲倦地去检查指导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他对于部和群众的讲话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句句拨动了人们的心弦，使大家深受感动，增强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决心。

1930年4月底，红七军攻陷贵州省榕江后，5月初回师右江，6月邓政委到平马，7月上旬又到思林，在戎马倥偬中，还十分关怀妇女工作。他询问思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阮殿焯：“政府机构中妇女部健全了吗？”阮主席回答：“还没有健全呢！”政委说：“要赶快健全，才能很好地发挥妇女的作用。”不久，人员配齐了，果真发挥了妇女半边天作用。

7月上旬末，红七军主力集中平马一带整训，军部于7月15日在平马古老的城隍庙（今庆平小学）里举办了两个多月的教导队集训，参加集训的有各纵队连排干部约100人。开学这一天，邓政委穿着灰色的中山装，精神饱满地给学员作报告，他从右江的革命大好形势谈到举办这期教导集训的目的和要求，学员听后都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邓政委军政事务繁忙，还每隔几天就给学员上一次政治课，内容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侵华史等。他讲课时理论联系实际，形象生动，很有说服力。至今仍健在的学

员磨力等人回忆说：“邓政委的教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经久不忘。”

整训期间，前委决定在右江地区铺开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在平马西街（今田东汽车站）开办了两期地方党政干部训练班，邓政委亲自编写教材，登台讲课。前委还印发邓政委写的《苏维埃的组织任务》以及土地政策，党的知识等小册子，为土地革命铺开培训干部之用。邓政委还不断纠正土地革命中“左”右倾错误。那恒、上法、坛乐等乡村出现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

邓政委主持部队整训工作和指导根据地党、政、军、群团建设，忙得不可开支，头发长了也顾不得理。可是他还千方百计挤时间，经常深入村屯访贫问苦。有一天，邓政委在赤卫军梁连长陪同下，看望了一位患病躺在床上的老婆婆梁姆蕊，老人哮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诉说：“原来我家有九口人，由于天灾人祸，丈夫累死了，7个儿女，病死、饿死4个，实在无法度日，只好忍痛把八岁的男孩和十岁的女孩卖掉了，现在，家里只剩下我和大儿子，还是常常没饭吃。”政委听完她的话，同情地安慰一番。回平马后拿出二百个铜仙要梁连长送去给老婆婆，还吩咐梁连长带战士上山割茅草、砍木头，修好她家的破房子。当梁连长把铜仙交给老婆婆时，老人满脸泪花，连声称赞红七军是救命恩人，邓政委是穷人的贴心人。

9月30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又名邓岗）到达平马。10月2日，前委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先由邓拔奇传达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中央对红七军的指示，认为“全国革命到了新的高潮。”需要扩大百万红军，

指示红军要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粤、桂军向北增援，最后夺取广州，以保证全国红军首先夺取武汉的“争取一省几省的胜利。”对此，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邓政委实事求是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认为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张军长也认为部队只有近万人，力量还不小，确实无法完成中央下达任务；总指挥李明瑞对于攻打大城市的错误决定，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仗义执言，坚决反对攻打大城市。他们在会上开展了激烈的争论，虽然有的同志持不同意见，但是中央的指令，只能执行，待到走不通时再说。邓政委等领导人的疑虑和前委会上的争论，无疑是对推行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有力抵制，也是为红七军日后抛弃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会上，邓政委作了重要报告，指出红七军北上后，右江各县可能被敌人占领，根据地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他要求各部队、各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抓紧时间，在红军撤离根据地以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1）整顿和加强赤卫军，加紧战备；（2）抓紧秋收，储备粮食；（3）清洗不纯分子，处理敌特案件，纯洁内部；（4）整顿党组织，建立适应斗争形势的领导机构，做好撤退的准备工作。会议还作出了三项决定。

10月4日清晨，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率队从平马出发开赴河池，6日，邓拔奇和邓政委率军直属部队离开平马。

（中共田东县委党史办公室 陈遵诚）

邓政委在右江党政干训班

1929年12月11日，震撼南疆的百色起义庄严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接着在12月20日红七军前委发出第二号通告，其中强调指出：为了搞好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巩固红色政权，必须加强党员干部的培训。可是这项重要工作还来不及实施，反动军阀就开始了“围剿”。红七军先后组织了隆安、平马、亭泗等几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光复了一度被反动势力占据的右江沿岸各县。

同年7月，中共红七军前委领导同志从起义后的斗争实践中，更进一步看到加强基层革命政权建设、培养地方干部的迫切性，便在乎马镇西街举办了“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由邓斌（邓小平）政委主讲政治理论课，雷经天同志上阶级分析课，高永平同志上土改课。干训班学员来自东兰、果德、恩隆、奉议等县共五十多人，当时，我们俩作为工农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到训练班学习。

那年，邓政委才二十几岁，常穿一套半新旧的白色汗衫和灰布裤子，光着头，赤着脚，十分朴实。他平易近人，态度和蔼可亲，讲课的声音清晰、宏亮。记得那时多数学员的文化水平较低，为了让大家明白分析国内外阶级矛盾和利用矛盾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道理，邓政委结合红七军的斗争实际来讲，深入浅出，通俗易懂。1930年，滇军军阀龙云

与宣布反蒋的桂系军阀开战，派卢汉率领几万人沿右江直下，我红七军暂时避开滇军锋芒，退出百色、奉议一带，把兵力集中到思林、果德县的山地，待滇军主力过去后，便采取分割截击的战术，将滇军尾随的两个辎重团一举歼灭，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壮大了红军力量。这些事例都是学员们亲自参与或耳闻目睹的，听起来亲切，增强了革命的信心，而且进一步懂得提高斗争艺术的重要性。

这次干训班为右江地区培养了一批骨干，对提高全地区的革命斗争水平发挥了作用。学员们返回各县后，积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和扩大赤卫队等革命活动。各族贫苦农民更加热爱共产党和拥护苏维埃政府，踊跃参加赤卫队和红军，把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搞得如火如荼，很有燎原之势。

（李君蔚 赵润豪口述 黄大健整理，原载《右江日报》1981年6月19日）

邓政委三次路经德保进行革命活动

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邓斌）同志，于1929年10月中旬同张云逸等率领警卫部队和一批干部以及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与教导总队分水陆两路从南宁到达恩隆县的平马和百色后，在右江开展了一段工作，部署了百色起义后，又到左江研究和部署龙州起义。地处于左右江之间的天保县（今德保县），正是两地来往的主要通道之一，也是必经之路，因此，从1929年11月底至1930年8月间，邓小平同志曾三次路经德保县，来往于左、右江之间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活动，在德保县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光辉足迹。



1929年11月，邓小平同志在右江部署百色起义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应中共中央电召返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11月底，他率领何世昌、严敏、袁振武（即袁也烈）、潘邦亨等一批干部离开右江到左江开展工作，他们从百色起程，路经恩阳县的那坡、坡洪，天保县的燕洞、龙光等地。邓小平同志一行这次路经天保县境，在沿途向当地农协会和农军了解情况，要求继续扩大农协会和农军队伍，尽快建立起乡、村苏维埃政权，以利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严厉打击土豪劣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争取人民革命的早日胜利。

二

邓小平同志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于1990年2月7日回到左江龙州。向红八军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部署了工作后，3月7日，和何家荣司令员率领红八军一纵队指战员攻打靖西县城郑海波叛军和国民党民团卓锦湖部。因敌依靠坚固城墙作防备，一纵队多次强攻仍未克。小平同志因急着到右江传达中央指示，不等攻城战斗结束就准备到右江，适有中共向都县委书记陈鼓涛等人来到靖西，向邓政委报告右江沿岸情况，说明右江有果化县可通过。邓政委于3月10日夜和护送连队指战员向右江前进。第三天晚在楞念村召集向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林柏、天向赤卫军副总指挥黄庆金等人开会，研究和指示工作。3月13日，邓政委一行在当地赤卫军干部黄庆金、黄怀贞等人的陪同下，从向都县南区的楞念村出发，经富义屯和天保县的大省（今大旺）、三联、敏来、东江等村屯，当晚在天保县中军乡的东江村宿营。当天下午到达东江时，那里赶圩的群众未散，于是就派出莫显深（天保县人）、罗英（养利县人）等五六人的宣传小组，到东江圩场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号召穷人起来闹革命，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几百名赶圩的群众听了很受鼓舞，都说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很符合穷人的心，表示愿意跟共产党和红军一起闹革命。当夜邓政委一行到东江村小学校和东目屯老百姓家，东江村的农民协会和当地农军杀了一头大猪招待邓政委一行。邓政委鼓励当地农协会和农军要组织农民群众起来打倒土豪劣绅，进行

土地革命，要组织苏维埃政府，穷人要起来当家作主。3月14日，邓政委一行离开天保县的东江村，向向都县的北区进发。中午到达架龙屯，并在向导黄永丹家住下休息吃中午饭，晚上到达巴麻村。天（保）向（都）赤卫军总指挥兼北区常备营营长黄绍谦带领几十名战士和群众在巴麻村欢迎邓政委一行。邓政委一行在巴麻村住了三晚，第二天晚上，邓政委在黄绍谦家召集向都县的党政军领导人开会，对革命工作做了指示：一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二是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三是发展党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等。邓政委的这些重要指示，给天向地区的各族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和决心。

邓小平同志生活艰苦朴素，身穿一套灰色中山装，脚踏草鞋。在行军路上与战士同餐共宿，官兵平等。从靖西化峒出发时，一纵队配给他一匹黑骡，并配有皮坐鞍，给他路上骑用，但他一路上都不骑骡，而是同战士们一起走路，一起爬山涉水，让那匹骡子去驮战士们的东西。一路上，小平同志以身作则，教育战士们遵守群众纪律，搞好军民关系，启发群众，鼓舞革命斗志。邓小平政委的高尚革命风格，给红军战士和各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在红七军准备北上江西和中央工农红军会合之前，邓小平同志抽出时间由恩隆平马镇深入到天保、向都两县革命根据地视察，了解情况，教育群众，号召青年参军参战，壮大红军力量。

邓小平同志这一次到天保县，是先到向都，由县苏维埃政府县长林柏、赤卫军总指挥黄绍谦、农协会主席黄怀贞一起陪同，还有一百多名红七军指战员一起到天保县来。这是1930年8月8日，邓总政委从向都县(今属天等县)的楞念，经大合、上万等村屯，于中午到达天保县境的那怀乡坡门屯，在那里休息三四十分钟，即沿河朝微林村方向前进，当晚到达那练村住宿。第二天，到那练村附近一个大岩洞去参观。第三天，他们从那练村出发，爬过高山小松岭，经堪华、燕峒等地到旺峒圩，在那里三四十分钟，了解当地情况和县城情况，鼓励群众要跟共产党走，团结起来进行土地革命，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然后转回龙光乡。当天下午到“右江下游赤卫军第五路军指挥部”驻地陇香屯住宿。当晚，赤卫军指挥部领导人黄庆金等人设便宴热情招待邓总政委等人员。晚饭后，邓总政委不顾一天行军的劳累，抓紧时间召集天保、向都地区党政军领导人林柏、黄绍谦、黄庆金、黄怀贞、何其瑞、张振笔、农振邦、黄修道、潘大斌等人开会，赤卫军营以上干部都一起参加。邓总政委向到会人员了解情况，与大家分析形势，研究问题，部署工作，一直到深夜。他在会上强调要加强政治、形势教育，克服困难，坚持斗争，积极发展农军、扩充红军力量，在巩固和发展农民武装的基础上，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展生产。他还鼓励大家搞好军民关系，群众支援前方打仗，军队做好巩固根据地工作，并指出革命道路是曲折的，不是一帆风顺的，要时刻准备战斗的牺牲，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为了支持地方革命，他应赤卫军领导人的要求，他跟随他一起来的天保县籍人红七军第一纵队迫击炮队队长乔松（又名乔

景山)和干部许廷福两人留下协助赤卫军指挥部工作。后来,乔松任该赤卫军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许廷福任军事教官。第二天,邓总政委一行到向都县各地去视察。同年9月初,回到恩隆县平马镇召开前委会议。

赤卫军领导人根据邓总政委关于扩大红军力量的指示,分头深入各村屯动员青年参加红军。经过动员,天保县龙光乡青年周桂财、黄生丁、周桂英、黄河清、黄珍芳、黄杰、黎廷汉(即黎良仕)、黄永禧、农克邦和与龙光乡相邻的向都县青年韦乃永、杨东林等11名,在邓总政委离开陇香屯的第三天就报名参加红七军。天保、向都其它乡村的青年也纷纷响应,约有200多人前往田州集中训练,经训练后的天向青年正式编入红七军第一纵队第五十八团。

邓总政委一行三次到天保县进行革命活动的时间虽短,但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天保县的土地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在人们心目中点燃了不灭的革命火种。他的光辉形象仍历历在目,他的每一次亲切教导铭刻在德保县人民群众的心中。

(中共德保县委党史办公室 许英俊)

邓小平带领八军一纵 围攻靖西县城郑超叛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成立后，红七红八军总政委邓小平为扫除左右江地区之间联系通道的障碍，曾亲自指挥红八军第一纵队围攻盘据靖西县城的郑超叛军，在靖西留下革命的足迹，播下革命的种子，在靖西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郑超叛变的历史背景

郑超原系共产党人俞作豫领导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部属第三营的第三连连长。

1929年4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命刘峙等率军数十万，西上直捣武汉。事前，蒋介石派人赴港联络被李宗仁，白崇禧排挤的桂系将领俞作柏共同倒桂。俞作柏要求在港中共给予支持。中共即命贺昌赴港，调中共北流县委书记俞作豫等配合俞作柏去武汉与桂军前线代总指挥李明瑞共谋倒戈。在蒋军向桂军进逼时，李明瑞在湖北黄波前线宣告脱离桂系独立，桂军全线溃败。同年6月，蒋介石委派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后改为编遣分区主任）。俞、李主政广西后，愿意与共产党合作，

党中央派邓小平等一批党员干部到广西党政机关和军队中工作，由中央代表邓小平负责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在当时全国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广西出现了俞、李政权与我党合作的政治局面。在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俞、李推行了进步的政策，在扩建新军时，任用共产党员张云逸、俞作豫分别担任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的大队长，为我党掌握武装，恢复党的活动，举行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是收编桂军旧部组织起来的一支队伍，部队官兵成份复杂，急需进行整顿和改造而未来得及进行。

1929年10月新，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召开反蒋誓师大会，发出通电。会后，李明瑞亲赴前线，指挥部队向依时蒋介石的广东军阀陈济棠进攻。不料，俞、李所部第十六师师长吕焕炎、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和第十五师旅长黄权被蒋介石收买，倒戈拥蒋。俞、李反蒋不战而败。李明瑞率随从退回南宁。我党按原定的应变计划，由邓小平、张云逸率领警备第四大队上百色，李明瑞随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上龙州，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俞作豫到达龙州，派出营长李仲陶带领第三营进驻靖西。

1929年11月中旬，李明瑞欲乘粤、桂对峙，广西局势空虚之际，拟出发动已上左、右江的部队反攻南宁重占邕城的计划。俞作豫按李的计划，率领尚未整顿、改造好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开进崇善待命，命令驻靖西的第三营迅速赶到驮芦会合，向南宁进军。俞带领第一营作先头部队按时出发，后续部队由大队长蒙志仁带领。蒙趁队伍出发后龙州空虚，在半途中胁迫从陆路前进的第二和第四营六七百人回占龙州

城，实行叛变。与此同时，奉命从靖西开往驮芦的第三营三百余人，行军到达化峒的群策村时，三连连长郑超（靖西人）煽动士兵驱逐营长李仲陶，挟持部队哗变，而后带兵返回靖西县城，拒不执行俞的命令，盘据靖西，进行叛变。当郑超叛军返回县城时，县长江华波命令关起城门，不许叛军入城。郑超命令叛军将县城包围起来，提出条件要进城筹备粮饷后开往安德驻扎。当时城内只有民团，武器装备又不太好，守员害怕郑超叛军的势力，只好跟郑进行谈，开门让其进城。郑军入城后，迅速控制了城内各制高点和要处，以坚固的城墙作营垒，强驻靖西县城。

二、围攻郑超叛军的前后过程

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和靖西出现叛军后。在龙州，于12月3日经过一场激战，李明瑞、俞作豫平息了叛军，收回了龙州城。而在靖西，郑超叛军依然占据县城，扼制了左江地区和右地区联系的主要通道。

1929年11月，邓小平在部署了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后，带着何世昌、严敏、袁振武等一批共产党员来到龙州，加强龙州方面的领导力量。邓小平在龙州主持召开了有20人参加的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举行龙州起义，建立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介绍了右江准备举行百色起义的策略和工作准备情况。正确分析了左江地区的斗争形势，强调左江地区要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加紧部队改造和地方革命政权的筹建工作。会后，邓小平与李明瑞、俞作豫等一起研究商定了龙州起义的行动计划，然后离开龙州，取道越南，

前往香港，参加中央军委在港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补充报告。会后，邓小平从香港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在广西的工作情况。

1930年2月1日，李明瑞、俞作豫按邓小平原商定的计划，领导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举行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龙州起义后不久，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此时，龙州的局势还很不稳，新生的红色政权遭到挑衅。2月中旬，发生了收编的大土匪黄飞虎暴动，杀害了右江赤卫大队、龙州苏维埃政府主席何建南。这时红八军军长俞作豫从驮芦率队星夜兼程赶回剿匪，但狡猾的黄飞虎早已躲进深山野岭，俞军扑了个空。黄飞虎不除，其他过去受编的土匪头子蠢蠢欲动，一时谣言四起，人心不定，形势紧张，俞军长不得不忙于应付剿匪。邓小平对左江地区的情况作了全面了解和分析，感到敌情严重，党的力量薄弱，红八军不能孤军作战，便指示俞军长赶快收缩残匪兵力，向右江红七军靠拢。为了消灭盘据靖西的叛军，打通左江地区与右江地区通道，为红八军向红七军靠拢扫除障碍，红八军第一纵队1000余人由何家荣、袁振武率领，于2月下旬离开龙州向靖西进军。时邓小平需回右江向红七军传达中央紧急指示，于2月28日从龙州起到雷平县宝圩（今大新县）与一纵队会合。在此，邓小平发现一纵队的思想工作较薄弱，还没有建立政委制度，即帮助一纵队建立了纵队党委，由纵队参谋长、经北伐战争考验的党员袁振武担任纵队党委书记。纵队党委成立后，邓小平向非党员的纵队领导何家荣作了交代，凡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党委讨论来决定。随后，邓小平和何家荣、袁振武一起，带领红八军第一纵队从宝圩向靖西开进。

3月5日，行军到达靖西的湖润圩，在这里邓小平对一纵队的官兵作了动员讲话。他说：“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干都要学会使用两杆枪，除了你们手中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是一个战斗员，同时又是一个宣传员。对敌作战时，要一面打敌人，一面喊话，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仗。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呢？还是盲目地做了替军阀卖命的工具？‘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我们欢迎你们过来’！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了，就能动摇和瓦解敌军，使他们人心浮荡，因而可能会弃暗投明，掉转枪口，或者是敷衍作战的。”还特别强调说：“红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一定要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和老百姓亲如家人。”

邓小平的讲话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对一纵队官兵的行动起到巨大的影响，使一纵队的指战员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1930年3月7日（农历二月初七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红八军第一纵队包围了靖西县城的郑超叛军。环城的府后街、颞靠屯、主山、五里桥等地都有红军驻扎。红军按邓小平指示，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的纪律、宗旨，动员群众拥军支前。即日，攻城战斗先从南站打响。战斗打响前，红军先派人到南门外对敌喊话，开展政治攻势，叫郑超打开城门出来投城。郑超不敢出面，派其部下回话，拒不投降。喊话约进行一个钟头后，见郑超没有投降的诚意，红军在南门外民房上，开出枪眼，突然开火，当即击毙守城的几名叛军。接着，东门西门枪声四起，杀声震天，城内郑超和地方土豪急令叛军将麻袋装满谷子，堆压在城门前，加固城门，城下叛军加强防守，强令城内壮丁有枪拿枪，无枪拿

大刀、长矛、石头，上城墙助战。晚上，郑军怕红军摸上城墙，强收城内商家的火油，将油灌满竹筒点燃挂出城垛口，照亮城下，以使看清红军的行动。红八军第一纵队攻城战斗一开始，邓小平便亲临前线，和纵队司令员同在南门外阵地（现靖西大桥处）指挥作战。第二天，邓小平还亲自到迫击炮阵地指挥迫击炮轰击南门城楼。攻城战斗持续到了第四天，由于城墙高大坚固，敌军拼命抵抗，未能攻下。适向都县委书记陈鼓涛到靖西报告右江情况，说右江沿岸还有果化掌握在我们手中，还可从此过江。由于邓小平急着过右江向红七军传达中央的紧急指示，不能在靖西耽延太久。纵队司令员便和党委书记袁振武研究决定派第八连连长谭晋率该连和一个手枪班于10日夜护送邓小平离开靖西前往右江。邓小平在离开靖西时，指示一纵队领导一定要把靖西城攻下，扫除左右江地区联系的障碍，使左右江的革命根据地能连成一片，并随时注意龙州方面的情况。

送走邓小平后，一纵队围攻靖西城的战斗继续进行。被围困在城里的郑超强迫民团晚上城楼守夜，白天加强巡城，民团总局长卓锦湖，地方绅士黄大受为给民团壮胆，登城巡视，被红军用步枪点射，黄大受被击中脚，流血负伤，慌忙逃下城来。红军一迫击炮手战斗中中弹牺牲。

攻城战打到第七天（即3月14日），一纵队决定用竹梯爬墙强攻，正当造好竹梯装备强行爬墙进攻之际，一纵队与龙州军部的联系突然中断。纵队领导判断龙州方面可能出了问题，遂决定暂时撤出靖西回救龙州。一纵队连夜退下计隆、排弄村暂驻。当夜，庞任宗（靖西果乐人，原桂系军阀第七军团长辞职还乡）从龙临带民团来县城支援郑军乘机入城与

郑军会合。郑、庞以为红军溃退，次日打开城门进行追击。一纵队在撤出靖西后于排吞、大桥等地设下埋伏，出其不意进行阻击，给敌来个回马枪。敌军被红军打得惨败，把伤员抬到城内书院(今幼儿园)的临时医院后狼狈退兵回巢。

三、邓小平给靖西人民留下的印象

当年邓小平领导的红八军第一纵队来到靖西，由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宣传革命道理，和老百姓亲如家人，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在红军围攻县城郑超叛军时，城郊附近的群众拥军支前热情很高，在阵地上，尽管枪声在响，硝烟在弥漫，不少群众仍冒着敌人的炮火将食物、香烟等供给红军，有的甚至把新蒸熟的糯米饭和热腾腾的粽巴挑到火线上，送到红军手中。邓小平看到这般情景，十分感动，连连称赞说：“多好的老百姓啊！把东西送到火线上来了。”邓小平在指挥红八军一纵队围攻靖西县城时，和纵队司令员何家荣在南门外的阵地上，那里是一片茂密的竹林，离城内不远，敌人回击的火力十分猛烈，雨点一般密集子弹在竹林里发出尖厉的呼啸。邓小平当看到支援前线的群众来到敌人的火力射程内时，立即叫纵队领导赶快过去劝说他们退到后方去，以免发生危险，同时多次提醒纵队领导注意隐蔽，以免生产意外。邓小平对他人的安全是这样的关心。可是，对自己的安危却完全置之度外。在敌人子弹不时从头顶上飞啸而过的情况下，邓小平仍然在前沿阵地上注视敌人的行动，研究新的进攻方案，显得非常勇敢镇定。邓小平这种勇敢、镇定和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精神，给正在与敌人战斗的

红军战士增添了极大的勇气和带来巨大的鼓舞，给靖西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中共靖西县委党史办公室 黄正显）

邓斌和广西省立五中

李长寿

1929年11月上旬，是广西警备第四大队进驻百色城后，筹备百色起义，建立红七军的准备阶段。

根据部队党委的部署，在抓好部队兵运工作的同时，要抓好百色城的工运、学运、商界和城郊的农运工作。广西省立五中，是百色城的最高学府，建校已二十多年，较有名气，对社会影响较大。部队党委决定在每个周末下午，领导干部轮流到五中去上政治课。学校习惯称这种课为演讲。

这是一个周末的下午，邓斌、张云逸、陈豪人等领导同志，中午在司令部刚听完百色城工人关崇和、罗文佳和部队社会股长黄启滔（即黄一平）等人的工运情况汇报，就一起步行到五中去演讲。

在他们来到五中礼堂前，全校二百多名师生已集好队等候着。

女生张凤莲，陈玉亭、黄玉珍、陈莲芝、陈佩珩等二十多人站在前排。

邓斌、张云逸、陈豪人三位领导同志走进了礼堂，中共地下党员、体育教师杨柳溪带头鼓起掌来，接着礼堂内暴发出热烈的掌声。

掌声过后，张云逸同志走上讲台说：“各位老师，同学

们，我向你们介绍两位同志。”然后他侧过身去指着邓、陈二位首长说：“这是邓斌同志，这是陈豪人同志。今天，是邓斌同志为大家作周末演讲，主要是谈形势。”

邓斌同志站在讲台中间，用纯正的四川话开始演讲。他从国外讲到国内，分析了整个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情况，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经验情况。号召师生们团结起来，走俄国革命的道路。邓斌又分析了国内革命形势，并联系到右江和五中的具体情况，动员师生员工认清形势，选择为工农谋利益、求解放的光明前途。

邓小平同志对形势的分析十分精辟，对师生们有极大的感染力。

邓斌同志不仅亲自给五中师生演讲，平时还抽时间到五中和师生闲谈，参加学生的晚会活动，鼓励师生参加革命。

一天晚上，省立五中召开师生同乐晚会，表演文艺节目。当晚会快要结束时，同学们才发现邓斌同志在同学们后面观看节目表演。

晚会一结束，同学们鼓掌请邓斌同志讲话。邓斌同志微笑着向师生们致意后说：“……………我们在快乐之时，还要看到街上有许多人挨饿，许多人缸无隔夜粮，身无好衣裳。如果我们广西，我们百色的人，都能象同学这样快乐，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才会富强起来。……………”

在某天的一个傍晚时分，太阳已经下山，余辉映照着斑斓的天空。这时，邓斌同志到五中校内，找体育老师杨柳溪闲聊。在邓斌同志未到杨老师宿舍前，17班的学生陆显踞已在杨老师处看报刊。邓斌同志来到后，边站边聊，当他看到一本《悲壮的五月》的小书时，即翻开来，问道：“这书

是谁的？”杨老师介绍说：“是这位陆显踞同学的，是陆映南从广州寄给他的。这本书专讲历年五月份发生的壮烈事件，很有意义。”

随着杨老师的介绍，邓斌同志手里拿着书，和陆显踞同学谈起话来，他习惯地先问：“你家是哪里的？”陆显踞回答：“是在天保县”“你们天保县有多少同学在这里读书？”“有八九位同学。”“你参加过周末演讲会吗？”“参加过，长官的演讲很动听。”“我们不称长官，称同志。”“这名词很新鲜，很好听，同志的称呼真好”。“你们几位同学回天保搞苏维埃好吗？”“我们想搞，但我们还很幼稚，怕搞不好。”“不要怕，你们大胆搞，我给你们派指导员去，帮助你们。”“那好，好。”

天渐渐黑下来了，邓斌同志手里拿着《悲壮的五月》这本小书，和杨老师告别，步行回司令部去了。陆显踞同学仍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目送着邓斌同志的背影，静静地回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

邓政委在燕洞会议

1930年6月初，中共红七军前委书记、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右江苏区人民习称邓政委）与红七、八军总指挥李明瑞、七军军长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从河池回师百色，收复右江沿岸各城镇后，立即在右江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集中七军在乎马、田州一带开展整训。经过3个月的工作，使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改造、发展了七军，并在经济上准备了向中心区域发展的条件^①。因此，根据《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提出的“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汇合”及中央军委在香犁“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上要求七军“发展方向向湘粤边界，造成朱毛彭黄汇合的前途”的指示^②，同年9月底，前委正拟向外发展，决定在10月1日出发。出发之前一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邓拔奇）来到右江地区平马镇。10月2日，红七军在乎马召开前委会议。会上，邓岗传达了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和中央要红七军离开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指令。会议经过一番争论，前委接受了中央交给七军的任务，决定集中全军到河池整编，

^①邓小平：《红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载《左右江革命根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②见《左右江革命根据》第176页。

并在河池召开全军党代会，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10月4日，李明瑞、张云逸、龚鹤村率领红七军一、二、四纵队从田州出发，绕道凌云、乐业寻找红八军第一纵队，然后转赴河池整编；部队撤离右江沿岸之前，前委对根据地的工作没有来得及布置，决定由邓小平、邓岗在北上途中，到东兰布置右江工作。10月6日，邓小平、邓岗率领红七军政治部及特务营从平马出发，经恩隆县七里区向东兰进发。

在这次前委召开的平马会议上，改组了中共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由陈洪涛接任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七军撤离右江沿岸时，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各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也同时撤出县城，转移到山区活动。在邓政委出发去东兰那天，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也同时撤出平马镇。当时在右江苏维埃政府负责搞宣传工作的黄明高（1982年，76岁）回忆说，撤离平马的当天，陈洪涛带领陆浩仁、滕国栋（均为右江特委委员）、李绍祖（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韦纪（恩隆县特支委员）和黄明高等人，向七里山区出发，每人身带光洋400块、干粮、武器和文件等。一个多星期后，有一天下午，到达恩隆县七里区（也叫燕乐区）的燕洞街（今属巴马瑶族自治县）。当时在恩隆县苏维埃政府工作的赵润豪（1982年，76岁）回忆说，恩隆县特支和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先于10月5日撤出平马。当天，我们撤到那略（今林逢乡东养村），大家在那里稍住两三天。接着，转移到百定、那叭各住一夜。然后转到义圩，在义圩住了一个星期，才到燕洞去。到燕洞，看见邓政委、邓岗、陈洪涛等也在那里。才懂得准备在那里开会。

红七军第三纵队队长韦拔群是前委委员，前委召开平马

会议时，他率三纵在东兰活动，没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前委认为韦拔群是本地人，熟悉当地情况，又有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群众威信高，决定留他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所以，右江工作必须与韦拔群商议才能落实。前委原定在东兰召开会议。但邓政委考虑到右江沿岸各县代表到东兰开会路程太远；而东风工作，同韦拔群商量就可以解决了。基于这种考虑，邓政委把布置右江工作的会议改在燕洞召开。议定后，由陈洪涛派人到各县联络通知。

关于燕洞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根据上述两位革命老人的提供，约在1930年10月中、下旬交际之间。会期4天。参加会议的有百色、奉议、恩阳、恩隆、思林、果德等县、区党委、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及骨干约七、八十人。恩隆县去参加这次会议的5人，即：李绍组（县苏政府主席）、赵润豪、李大养（赤卫军骨干）、岑善节，还有一个姓谭的（名字已忘）；奉议县参加会议的有五六人，其中有百育区苏政府的覃少文。

会议由陈洪涛同志主持，邓岗首先讲话，大意有四点：（一）讲形势，即军阀混战及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二）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做好保护秋收、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凡是有武器（能杀人的长矛、梭标、马刀等）的人统统编为赤卫队；（三）要扩大红军，提出要广西组织十八万红军，可以夺得政权，可以保住广西；（四）要坚持开展游击战争。邓岗讲话后，大家对右江工作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对广西组织十八万红军问题，大家认为是不可能的。会议中，对红军北上问题，前委领导考虑红七军多数人员是当地农民子弟，怕留恋乡土不愿

走，所以，在讲话中没有提到，只是在讨论中要大家表态：“拥护红军向外发展”。

邓政委最后在会上讲了话，他指出：红军走了以后，右江根据地将出现复杂的形势，我们面临的斗争将更加困难。但不管怎样，你们要坚持斗争。邓政委要求各地整顿党和政府等组织，纯洁内部；整顿、扩大赤卫军，迅速建立县区常备军，加强军事训练；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坚定革命一定胜利的信心。邓政委对右江根据地的斗争作了最后的部署：红七军走了以后，右江的工作可以分为上游、下游两个区域。上游活动的中心是东、凤的十二弄，下游活动的中心是果德到镇结的十二弄。上下游的总指挥由韦拔群同志负责。他还要求尽快把上游和下游的交通联络线（即武篆—巴马—燕洞—朔良—兰芳—右江边）打通起来，以便开展活动。

会议结束，邓政委、邓岗就带领红军队伍经所略向东兰方向出发了。右江特委根据邓政委的指示，决定在东兰武篆开办“军政训练班”。参加燕洞会议的人员，得通知参加训练班的，散会后就到武篆去参加学习。学员约有五六十人，学习时间两个星期，主要是培养留在右江坚持斗争的骨干。训练班负责人是王晖（后任红七军二十一师参谋长），训练班开始时，邓政委、韦拔群亲自给大家上政治课。不几天，邓政委、韦拔群就到河池去了。

红七军北上后，韦拔群奉命留下来，于1930年11月中旬从河池回到右江，根据邓政委的指示组建红七军二十一师，并任师长，师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松坚（黄明春），有指战员3000余人。

（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办公室 农 武整理）

邓小平在东兰

陆秀祥

震撼南疆的百色起义后，红七、八军总政委邓小平，先后四次到东兰，他的英明决策，正确领导，实事求是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感人肺腑，令人钦佩。如今老同志仍记忆犹新，常常绘声绘色的叙说着。

首次来到武篆

1930年4月初，东兰各族人民翻身解放的第一个春天来到了。邓政委带着一班警卫，千里迢迢，从左江来到红七军第三纵队部驻地——东兰武篆。

邓政委是来向红七军传达中央指示的。但这时，军部已离开东兰，率主力部队到庆远方面游击去了。当晚，邓政委和韦拔群长谈了一夜，听了汇报，又作指示。次日清早，便立即出发，寻找军部。为了邓政委的安全，韦拔群派了两连兵护送。

第三天，将到东兰边境的则山顶时，忽遭数百土匪阻击。年仅25岁的邓政委，镇定自若，处事不惊。他准确地判断，沉着指挥。命令部队正面和侧面同时进攻。不到半小时，这股敌人被打得焦头烂额，四处逃命。我军仅有两名战士受伤。邓政委把马让给伤员骑，他自己和大家一起徒步行

军，继续前进。

到了河池县境内长老时，夜幕已降临，队伍就此宿营。这天走了百余里崎岖之路，且有战事，大家都感精疲力尽。但邓政委却不歇息，连夜带着身边人员，深入群众，问寒问暖，调查研究。他得知红七军主力已远去黔桂边，便决定回东兰工作。

领导土地革命

邓政委回到武篆后，紧紧抓住时机，和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一起，以东兰为重点，领导右江的土地革命。

邓政委首先召集东兰和凤山的党员领导干部到武篆旧州屯来训练。教材是他亲手编写的《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党的问题》、《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等。他白天讲课，晚上写教材。魁星楼上明亮的油灯彻夜不熄，促使整个训练班形成勤奋学习的良好风气。

邓政委讲课时，对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及奋斗目标，以及有关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讲的课，深受学员欢迎。

在此期间，邓政委根据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实践和东兰试点的经验，与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制定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两个重要文件。从此，右江根据地以此文件为武器，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

在分配土地中，邓政委严格要求干部克己奉公，不准以权谋私。他发现有个别区乡苏维埃政府干部把好田好地分给自己的亲戚，就给予批评，并提出重新分配。他对干部严，对自己更严。如他在东兰期间，和大家一起吃一样的饭菜，

和大家一起吸武篆的烟丝，生活上与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

在处理问题时，邓政委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东兰大批的青年参加红军去了，在许多红军官兵家里，分得了土地无劳力耕种。他对这一类的军属家庭，提出了可以请人耕种的解决办法。有的瑶族同胞，不愿下山要分配给的土地，就给予分配山地。他还明确指出：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的三个办法，由群众在乡苏维埃大会中自己选择。东兰绝大部分地区选择了平分的办法，只有东里乡选择共耕。对上述问题的处理，群众非常的满意。

东里是韦拔群的家乡，有近千亩耕地，五百多人口，群众基础好，一致要求办共耕社，得到邓政委的赞扬和支持。在召开庆祝共耕社成立大会时，韦拔群组织会议，邓政委在掌声如雷的热烈气氛中作重要讲话。他代表红七军前委和军部向东里乡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鼓励共耕社社员们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改善生活，支援红军，巩固和建设好苏区。他在会上问：“共耕社这样办好不好？”群众异口同声响亮回答：“好！”当年共耕社粮食生产，果然获得丰收，平均每人分得600多斤，人人吃上了干饭，还有一万五千多斤的公粮。

在邓政委的直接领导下，干部群众齐努力，这年5月中旬，东兰县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给群众发了《土地使用证》。

深入基层指导工作

红七军在列宁岩下的善学（今巴学）村，设立临时野战

医院。邓政委对医院和伤员十分关心，从长老回到武篆时，首先就到医院去。在韦拔群和医院领导的陪同下，逐个病房逐个伤员查看，问寒问暖。还摸摸床铺，看看药品和用具。他还指示医院对伤员在医疗上想方设法改善，在生活上尽可能照顾，管理部门根据邓政委的指示，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每个伤员发一块光洋零用，使伤员十分感动。

邓政委还与韦拔群一起，各骑一匹骏马，赶到兵工厂视察。兵工厂座落在水清如镜的板勉潭边，离武篆六里路，退可守进可攻，具有战略性。邓政委兴致勃勃走进车间，边看工人做工边与工人亲切交谈。他鼓励外来的技术工人和本地职工加强团结，搞好枪支弹药生产，多作贡献。当厂领导汇报说：主力部队上黔桂边游击，本厂奉命拨给一批子弹时，邓政委高兴地说：好！好！你们做得好。

太平区委书记陆浩仁，从武篆旧州训练班回去后，也办起了训练班。邓政委对此挺高兴，在县委组织部长韦菁的陪同下，不辞劳苦，跋山过坳，前往太平检查指导。他听了陆浩仁的汇报，肯定了太平区委注重对党员的培训，发挥党员在土地革命中的核心作用，是抓到关键了，今后对其他各项工作也要这样做。当时，恰遇太平区召开的妇女会，邓政委又对从县里来协助召开会议的黄美伦说：要认真地加强培养妇女干部，发挥妇女的作用。

会合军部收复百色

5月初，邓政委得知主力部队从贵州凯旋河池，便决定前往河池与军部会合。韦拔群派三纵队特务连指导员牙美元负责护送。路经那腰、拉圩，渡过红水河，到那地县苏维埃

政府加派一排赤卫军护送。连走5天到达目的地，终于与军部张云逸军长和李明瑞总指挥等领导人会合。

邓政委在河池两天，向军部和党员传达中央指示后，和张军长、李总指挥率部到达东兰城。这时，第一、二纵队奉命分两路，经太平和泗孟先向百色进逼。邓政委率军部和所属机关到武篆与韦拔群会合。

到武篆的第二天，邓政委在魁星楼上召开七军前委会议，具体商讨收复百色问题。邓政委在会上明确阐述了收复百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制定了作战计划，还决定留第三纵队一个营驻守东兰，韦拔群率两个营配合第一、二纵队作战。会议只开一天，翌日晨部队就出发了。

部队出发前，三纵队后勤部门，根据韦拔群的指示，弄一些好菜，让大家在战前饱吃一餐。由于条件有限，邓政委在三纵队和大家一起站着就餐，也不用任何人服务，边吃边开玩笑说，到共产主义的时候，生活要比今天的好。说得大家甜甜一笑。

用饭结束，邓政委和张军长立即命令部队出发，向百色进军。不几天，胜利的喜讯传开了，英雄山城——百色重新回到人民手中，革命的红旗又在山城上空迎风飘扬。

布置右江工作

1930年10月初，邓政委在右江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平马镇主持召开中共红七军前委会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在会上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中央决议精神，会议决定改变红七军一、二、三纵队的编制为十九、二十、二十一师，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长，留守右江，十九、二十师离开右江

向外发展。并决定全军到河池集中，举行阅兵礼，召开全军党代会，邓政委和邓拔奇到东兰布置右江工作及率原第三纵队出河池。

会后，邓政委和邓拔奇风尘仆仆，赶到东兰武篆。这是邓政委第四次踏进东兰的土地。这次他在武篆停留十几天，对右江的党、政、军和群众等各项工作，给韦拔群等作了具体的布置和明确的指示。邓政委特别强调：加强土地革命工作，扩大红军，以东兰为中心，以游击战士向都安推进。韦拔群等对邓政委的布置和指示，深感重要，表示坚决贯彻执行。

邓政委布置工作后，于10月底，与邓拔奇、韦拔群一起率领原第三纵队从武篆启程，经县城、隘洞、长老到河池。在河池，前委决定把原第三纵队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战士编入第十九、二十师，随军北上，二十一师由师长韦拔群在右江重建。韦拔群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服从党的决定。他参加党代会和阅兵后，于11月9日吃了晚饭，带着80个指战员和二十一师的番号旗帜先离开了河池，连夜赶回东兰。临行时，邓政委和韦拔群依依不舍，握手辞别，并给张军长和一连兵送韦拔群到20里外的宜龙。真是“河池池水深千尺，不及政委送别情。”

韦拔群回到东兰后，按照邓政委和前委的布置，与陈洪涛和黄松坚共同努力，于1931年1月初，建成了二十一师，并投入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

邓政委先后在东兰仅两个月，时间虽短暂，但东兰各族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东兰革命根据地，是邓政委和在邓政委领导下的革命家亲手创建的。

（原载《右江日报》1989年12月11日）

右江情深

——邓小平同志早年在左右江生活片断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历史编委办公室

邓小平同志领导左右江武装起义斗争，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是他在那硝烟弥漫中的战斗身影；在那千山万壑中留下的深深脚印；在那壮家瑶寨促膝谈心的音容笑貌……经常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同甘共苦

一九三〇年三月，邓小平同志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从上海回到广西龙州。他在那里停留了几天，向红八军俞作豫等负责同志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听取他们对龙州方面情况的汇报，并指示红八军要尽快向右江靠拢。接着，邓小平同志就翻山越岭，经靖西、向都过右江，到东兰武篆。一路上，他经过的地方，一住下来就不知疲倦地去检查指导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一天下午，邓小平同志在几个赤卫军战士的护送下，来到向都县一个山村（今属田东县）的一位壮族贫农家里，准备晚上召开骨干会。主人听说是“上头来的客人”，他身边

还跟着几个赤卫军战士，心里就明白了：“准是个领导同志！”霎时间，全家人都乐了起来。

主人为了表达内心的尊敬，决定要杀只母鸡来表心意。不料，主人的秘密被邓小平同志发觉了。还没有等主人动手，邓小平同志就告诉主人说，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煮点青菜就行了。他怕主人听不懂，又叫来一个战士作翻译。七说八说，主人实在无法坚持了，转身从一个瓦罐里掏出几把黄豆，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我们壮家的常菜。”

其实，这话也瞒不了邓小平同志。他对群众的疾苦，早已有了调查。这一带群众跟拔哥闹革命，被反动派三番四次翻箱倒柜，能用的拿走，可吃的抢光。这几把黄豆，不知藏在哪个角落里，才保存下来。邓小平同志不但操心群众的油盐柴米，而且也深深懂得壮族的风土人情。如果对主人的深情厚意执拗地辞却，他们的心情是不愉快的。甚至说你不是“同队”（壮语——意译：同志），不够个朋友。邓小平同志只好勉强地点了点头。

护送的战士看在眼里，内心非常激动。昨晚，政委工作到鸡叫，今天又走了那么多山路，吃得如此艰苦。睡，可要设法让他安稳点才是。于是，大家就动起手来，搬门板的、架板凳的，一心给首长搭个平整的睡铺。

这时，正在埋头写工作日记的邓小平同志看到了，立即掀起一张平时用作晒东西用的竹垫子走过来：“看，这又省事又平坦！”说着，把竹垫铺在地上。战士看了他这心满意足的神色，谁也不好坚持搭铺了。但是，大家的心里很不明白：“门板一架就得了，为什么偏要睡地铺？”越想心里越过意不去。

壮乡的春夜，北风还是刮得很猛。等邓小平同志开完会，与战士们一起躺下地铺时，一阵阵刺骨的寒风，从天井闯了进来，把主人的房门吹得砰砰作响。顿时，战士们才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政委同志为何不准用门板搭铺。原来他是考虑夜里起风，如没有门户遮挡，主人一家老少就要挨冻受冷。大家不胜感慨：政委这颗心呀，总是装着我们壮家的寒暖！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天没亮，主人就起来烧火做饭，盆不碰，水不响，一点声音也没有，好让客人养足点精神。哪晓得，当主人开门挑水时，邓小平同志也悄悄地跟了出去。主人挑多少担水，花多长时间，他都心中有数。

天一亮，战士们准备进厨房洗脸，邓小平同志一手拦住，忙把战士们带到水泉边去。主人一看急眼了：“没有什么招待，几瓢水还拿不出来！”

邓小平同志笑了笑：“一担水又何尝容易，往返要走几里路呵！”主人哪里知道在他挑水时，邓小平同志站在树底下，进行了一番“侦察”。

主人以尊敬的目光，久久地，久久地，望着邓小平同志的背影，眼里噙着激动的泪花，心里唱起了平日大家爱唱的那首《工农革命军人歌》：

谁是革命主力军，
我们工农兵，
工农和士兵，
原来都是一家人。

……

言传身教

在田东县印茶公社，每当人们提起烈士黄绍谦同志的事迹，大家就自然而然地想起邓小平同志跋山涉水，日夜兼程，亲自登门找黄绍谦同志言传身教的故事。人们说得那么生动，那么亲切，仿佛邓小平同志和黄绍谦谈完了话，才刚刚离去！

有一天，赤卫军大队长黄绍谦同志，正在家里聚精会神擦着他那支心爱的小手枪。这枪，是百色起义前夕，邓小平同志亲自指挥军械船运来发给的。此外，还有三十多支步枪。

黄绍谦同志边擦边想，突然间，前几天派出去送信的小战士，喜气洋洋地闯进门来，后面还跟着好几个不认得的赤卫军战士。一个头发剪得短短的青年人，肩背斜挂着一顶斗笠，走了进来。他眼睛炯炯有神，给人一种刚毅和充满信心的感觉。“这，不就是邓政委同志吗！”黄绍谦被这意外的相见，激动得喊了起来。他立即迎上前去，紧紧握住邓小平同志的双手，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

邓小平同志甜蜜地笑笑，仿佛在说：“没有想到吧？”

可不是，在红七军主力部队已转移到黔桂边境攻打贵州军阀，右江流域的反动势力又嚣张起来的时刻，政委却不辞艰险劳累，越过多少深沟险壑，走了多少山路，把心血浇在右江两岸的革命星火中，把汗水洒遍大山小岭，这怎能不使黄绍谦同志感到激动，而油然而生起一股崇敬之情！

邓小平同志的到来，使黄绍谦同志有点手忙脚乱，一时

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愣了一会，才想起烟茶待客的常礼。于是把家里那把玲珑精致的小烟壶拿出来，高高兴兴的递给政委。邓小平接过来看了看，然后边往衣袋掏烟边说：“还是我这个好！”接着对战士们招呼道：“来尝尝我这个。”一路上战士们已同政委有了交情，也就毫不客气地围了过来，你一撮，他一捻地卷起烟来了。黄绍谦同志看了这亲密无间的气氛，自己那拘束的心情也一下子解除了。政委刚进家门，就不声不响地给他上了一堂“官兵一致”的政治课。

饭后，黄绍谦同志准备安排政委休息。他从护送人员那里了解到，昨晚政委为了赶路，根本没有合过眼。可是邓小平同志半点倦意也没有，而是兴致勃勃地问长问短。开始，黄绍谦同志都认真作了回答，但当他一看到政委的眼角已布满了血丝，不由心里一阵难受。他借口要准备准备，好让政委休息一下。邓小平同志心里明白，也来个随机应变，先不谈工作，要跟他拉家常。黄绍谦对政委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打从心里敬佩。但听说拉家常，心里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邓小平同志叫他从“投笔从戎”谈起。政委这轻松的话语，一下子就给黄绍谦同志心里搬开了块大石头，他于是和政委促膝谈心，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说到学校反动当局对他的怀疑；从回乡组织青年宣传群众，讲到 he 变卖家产支援革命。说到这里，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指出：看一个青年革不革命，不是看其家庭出身如何，主要看他本人的表现怎样。政委的教导，使他心头发热，浑身是劲。接着，他就讲起攻打向都县城的战斗。政委问他：“反动县长怎么

跑掉了？”

提起这问题，黄绍谦心里很难过。可是，邓小平同志毫无责怪的意思，而是谆谆善诱，从力量对比、兵力部署、情况的了解、行动的保密，大大小小的问题上，引导他去找原因，查漏洞，好让黄绍谦“吃一堑长一智”，千万不可单凭热情蛮干。

白天没谈完，晚上住在后山的岩峒里，又心贴心地谈个痛快。政委的谈话没有长篇大论，而是深入浅出。当他讲起形势和任务时，说得你心明眼亮；讲起有利条件时，管叫你充满信心，干劲十足；摆起困难来，他启发你开动脑筋，知难而进……就象那呕心沥血的老师，教导学生一样。

第三天，邓小平同志要离开了，黄绍谦同志那既感激又难分的心情，从他那湿润的眼角里流露出来。邓小平同志看了，给他鼓励一番。完了，看到书桌上摆着方便的纸笔，一时心有感慨，就随手拿起笔来，书写了一首当时颇为流传的黄治峰同志的诗抄：

男儿立志出关乡，
报答国家哪肯还；
埋骨岂须桑梓地，
人生到处有青山。

从此，黄绍谦同志就把政委这笔锋刚毅挺拔的诗抄揣在怀里，把政委的音容话语刻在心头，成了他鼓舞斗志，战胜困难的力量。

邓小平同志离开右江，率领红七军北上之后，反动派更加疯狂起来，恨不得把革命力量一举消灭。这一来，黄绍谦同志也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国民党反动派给他写来一封封诱

降信，但始终动摇不了他那革命到底的铁石心肠。敌人一计不成，又来个围山堵洞，搞得鸟儿不敢投林，野狸也无处藏身。在这艰苦异常的日子里，黄绍谦同志经常把藏在怀里的诗抄，捧在手上吟诵，回忆邓政委对他的教导，以此来勉励自己，鼓励战士，任凭敌人围困万千重，他总是那么坚决顽强，敌人动不了他半根毫毛。久而久之，革命战士和群众由于对邓小平同志言传身教的敬佩，和出于对黄绍谦同志良好的祝愿，就誉这首诗抄为“护身符”。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就连那残暴的敌人，也信以为真，好不害怕！

一九三六年，敌人以重赏收买叛徒，把黄绍谦同志杀害了。黄绍谦同志身中三枪，在生命最后一刻，还大声疾呼“冲呀！”扑向匪徒，吓得敌人鬼哭狼嚎，最后，黄绍谦同志终于倒下了。敌人在他身上搜来搜去，搜到了那首诗抄，鲜血已把它染得鲜红，鲜红！

访 贫 问 苦

一九三〇年夏，红七军从黔桂边境回师右江，给敌人杀了个回马枪。收回百色、奉议、恩隆等县之后，队伍就集中整训。这时，邓小平同志为了部队的整训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头发长得老长也顾不得去理。可是，他还是千方百计挤出课余饭后的时间，经常深入到村里去访贫问苦。

有一天，邓小平同志在农民赤卫军梁连长的陪同下，来到一个穷人家里，这算是什么家呀！邓小平同志站在门口，满怀心绪这里瞅瞅，那里看看：房顶是用茅草盖的，由于雨淋日晒，茅草已经霉烂零乱。东边开了洞，西边穿了孔，怎

能遮雨挡风！再看四周墙壁，也是稻草拌泥巴糊起来的，只要轻轻一捅，就会穿个大窟窿。越看，邓小平同志的心里越沉重。他正想说什么，突然屋里传出几声咳嗽。接着，又是一串使人心寒的呻吟。邓小平同志一头钻了进去，走近一看，一个老大娘上气不接下气的躺在床上。邓小平同志不管老大娘懂不懂他的话，急着问她：得了什么病，家里有几口人？梁连长替病人作了回答：她叫梁姆蕊，原来家有九口人，由于天灾人祸，男人受苦受累折磨死了。从此，她生活更是难上加难，儿女七个，病饿死了四个。实在无法度日，她咽泪吞声，把八岁的男孩和十岁的女孩卖掉，她和大儿子相依为命，一把粗粮一把野菜活了下来……邓小平同志听到这里，立即转过身去。对老大娘安慰一番。

回来后，邓小平同志拿出两百个铜板交给梁连长，要他送去给老大娘。此外，还吩咐连长带领战士，上山割些茅草，把她家的房子修好。老大娘接过这两百个铜板时，满脸泪花，连声称赞红七军是穷人的救星，把邓小平同志当作是贴心人。

党的关怀和温暖，使老大娘的病很快就好转了。她带着大儿子来找邓小平同志，恳求他把儿子收下当红军。邓小平同志见她一片诚意，态度坚决，也就答应了。后来，红七军北上了，邓小平同志为了照顾这无依无靠的大娘，就把她的儿子编入当地的赤卫军，为老大娘想得一周二到。

革 命 心 连 心

右江人民都晓得，邓小平同志总是不辞劳苦，今天申这

村，明天到那寨，走遍壮乡的山山水水，把党的主张和温暖送到人们的心坎上。

这天，邓小平同志来到奉议县花茶屯，准备找当地干部开个会。会前，庙堂门口围着一伙人，在说说笑笑观看几个赤卫队员煮饭。邓小平同志也走过去与队员们亲切地交谈起来。当时，赤卫队员们不但筹粮不容易，就连厨具也被敌人抢劫一空。当中一位手拿铁锹作锅铲用的队员，正在比比划划跟大家开起玩笑来：说过去的皇帝权力很大，他使的家伙也比一般人用的大。邓小平同志听了，也笑哈哈的说开了：皇帝有什么了不起，今天，我们也拿起大铲，把那些皇子皇孙铲除干净！他这生动的比喻，说得大家哄笑起来。接着邓小平同志一本正经地问道：“怎么样，你们敢不敢？”赤卫队员们坚强地回答：“怕什么，怕的就不来当赤卫队员了！”邓小平同志听了这落地有声的回答，满意地笑了。邓小平同志善于抓住一切机会，用那幽默而又富于感染力的语言，去宣传党的主张，鼓舞人们的斗志。

会议开到深夜，邓小平同志还有事要赶到伦圩去。护送他的有四位赤卫队员。这晚天气转冷，走到一条夹道口，一股寒风照面吹来。大家感到刺骨的寒冷。邓小平同志看到前面那个队员，穿得比较单薄，立即把自己的棉衣解下来，披在他的身上。那位队员极力推让，邓小平同志只好以命令的口吻，叫他赶快穿好，还提醒他“注意敌情！”这下可把那队员唬住了，再也不敢吱声，只好老老实实把棉衣穿起来。整时，觉得周身都热乎乎的，脚步迈得更轻更快……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历史是最好的见证。“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掀起一阵阵恶浊的黑浪，不准壮乡儿女

歌颂邓小平同志，不准左右江人民怀念邓小平同志，并对邓小平同志进行种种诬蔑和迫害。然而，右江的激浪是不能逆转的，邓小平同志早年在左右江革命活动的事迹，就象那滚滚江水，永远在人民心里翻腾！

（原载《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一辑，1981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记百色起义前夕的小平同志

1929年10月17日，一支装满军械物资的船队由南宁邕江转右江逆水而上，驶上桂西重镇百色城。这就是闻名全国的百色起义序幕拉开前准备工作的开始。

船上均有护送货物的警兵。其中，昌平号船上有一位中等身材、个头和军装与普通士兵完全一样的警兵，和大家说说笑笑，特别和蔼可亲。他有时讲中国革命形势，分析广西政局和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的原因；有时问问其他警兵的家庭、生活、思想；有时面对右江两岸的美丽风光，赞叹不绝。他20多岁的年纪，神采焕发，举止安祥，冷静沉着，显得十分机智敏锐，有胆有识。讲时事，有理有据，辩清来龙去脉；讲军队生活，关心他人，问寒问暖；闲聊中，谈笑风生，妙趣横生，诙谐幽默。前方若有事，总是沉着冷静地分析，机智果断地处理。

他是谁呢？警兵们并不全知晓。另一名警兵叶季壮，他是负责这支船队的运输的。他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我们的首长邓斌（邓小平）同志呀！”大家才恍然大悟：几个月来，在南宁新组建的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不断以新的思想改造军队，是这位首长作指示和领导的啊！叶季壮在警兵中大家都已较为熟知，他是四大队的经理处长，又是四大队中共党支部书记。党组织决定把南宁军械库里的枪炮、辎重运往百色，他负责水路运输的具体工作。经他介绍大家知道自己

的首长后，都非常高兴，也很荣幸。想不到，自己就在自己的首长身边工作。因而更感到在这支船队上工作任务艰巨，责任十分重大。

桂西，是云贵高原的边沿地带。其中右江流域是广西海拔最高的地区之一，整个区域除右江河谷外，都是以崇山峻岭地形为主，森林密布，气候多变，自然生态绚丽多采。三十年代，这里就居住着一百万壮、苗、瑶、彝、仡佬、汉族等各族人民。他们依靠勤劳的双手，开辟这片美好的土地，创造社会财富，在这里劳作和生活，繁衍后代，生生不息。但，由于历代王朝歧视边远地区各族人民，特别是对少数民族，从汉代的时候起，就实行“以夷治夷”的政策。土司制度从宋元丰年间开始实行，直到清末改土归流，才改变了政治统治方式，但并不彻底，直到民国初期，许多地区仍保留着土司残酷统治的痕迹。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生存发展的正当权利都受到严重的侵害。加上匪盗抢掠，弄得民不聊生，穷困潦倒。各族人民不甘心忍受这种黑暗的统治，历朝曾暴发过多次反抗斗争，但缺乏正确的思想指挥和组织领导，终归失败。民国时期，人民的反抗斗争走向了新的轨道。1919年“五四”运动把马列主义传播到了右江地区。20年代初，韦拔群领导东兰、凤山各族人民起来革命，1923年，东兰农民三次武装攻打县城，1925年至1927年在东兰举办三期农民运动讲习班，百色、凌云、奉议、恩隆、思林、果德等县有农民运动骨干和青年学生参加，接受马列主义思想。1926年8月共产党人余少杰在恩隆县建立右江地区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中共恩奉特支，1928年冬建立恩隆、奉议、果德、思林4个支部，有党员20余人。在党的领导下，

农民运动如急风暴雨，革命的烈火不断燃烧。劳动人民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迫切要求推翻统治阶级的压迫，获得生存发展的正当权利。

小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代表，来到广西，看到这里有利的客观条件，踏上了右江之路。经过四天的逆水行舟，小平同志和警卫队以及军火船于20日驶进右江地区的腹地——恩隆县城平马镇。这是一个古老的小镇，水陆路交通方便。宋代在此设横山寨，此后历朝派兵驻守；同时设有马市，南方马匹在此交易，良驹或进贡朝廷，或挑为战骏，调往各地。街市虽小，但颇为繁华。座落在街北的经正书院，为光绪三年所建；是右江地区最早的官办文化教育学府。此时，由南宁同时与船队出发，从陆路带领四大队和教导总队掩护军械船沿右江而上的张云逸同志已先到达这里，在经正书院迎接小平同志。当邓小平、陈豪人、叶季壮等同志来到时，张云逸、雷经天等同志都出门迎接，相互一一握手，叶季壮同志介绍说：“这就是小平同志。”张云逸同志顿时欢呼雀跃起来，激动地说：“哦！您就是小平同志！几个月来，我经常得到您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许多工作中的疑难。多想见到您啊！”雷经天同志也迎上去与小平同志说话。他们畅叙革命形势和情谊，有说有笑，来到经正书院右江工委临时办公室。这时，小平同志考虑着整个百色起义前的部署，便召开了领导会议，研究教导总队和四大队力量在右江沿岸各城镇的摆布和带来枪械的收藏使用等问题，他说：右江各族人民勤劳勇敢，朴实忠厚，但长期受到反动派的统治和残酷压迫剥削，革命的要求十分迫切，经过几年来开展农民运动，革命思想在群众中已扎下了根，右江革命有了较好的基础；教导

总队和四大队来到这里，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与群众结合，他们一定更欢迎我们；现在，我们要抓紧革命前的准备工作。小平同志和大家作周密策划后提议：部队领导率教导总队和特务营进驻百色城，并随带大部分军械，暂不用的运往东兰、恩隆七里山区，第四大队一个营驻果德，一个营驻恩隆，一个营开往恩阳县城那坡。同志们都赞成小平同志的这一安排，立即紧张地分头做各项工作。

小平同志一路思考和部署百色起义前的各项工作，一边又指挥部队和做干部、士兵思想工作，十分辛劳，但无半点倦色，反而显得精神充沛，充满胜利的信心。10月22日他和张云逸同志率队进驻了百色城。这是桂西古老的小城，清初开始繁荣，雍正7年（1729年）建置百色厅，思恩府理苗同知迁至此，右江镇总兵也迁驻这里，自此各个时期均有重兵常驻。光绪元年（1875年）升为直隶厅，辖恩阳州判（今田阳县地）、恩隆县（今田东县地）、上林土县（今田东县思林镇地）、下旺土司（今属平果县）。这里又是交通汇口，水陆路可通南宁，水路可通至梧州、广州，水陆路可通云南剥隘等地，陆路可通贵州兴义、安龙。由于它具有政治、地理的特殊地位，便日益发展起来。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这里有商号150多家，建有粤东会馆、两湖会馆、云南会馆、五属会馆等外地商人集聚之所。城内还建有大大小小的客栈、旅店、酒家等。大小商贾云集于此。这里的文化教育事业也迅速发展。光绪七年（1881年）官办鹅城书院成立，私塾已发展至近10家，民国6年发展到15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始办中学，民国8年改为百色省立第五中学，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后来有的成为红七军的骨干之

一。随着社会的发展，百色城一直成为桂西政治、经济文化重镇。

邓小平和张云逸同志住进了粤东会馆。这座会馆由广东商人梁煜组织集资于1728年建成，四合院式结构，前厅和后厅、左右厢房的屋脊，为历史故事人物、鸟兽花草瓷雕琉璃瓦盖饰，大柱、横梁、窗棂、屋檐等，均雕龙画风，造型生动逼真，栩栩如生。成为广东商人最为喜欢活动的场所，曾是百色商会会址。红七军未正式宣布成立前和成立后，军部暂借商会设在这里。

小平同志虽然是党中央派的代表，但衣食住行没有任何特殊。他的穿着打扮与普通士兵一样，吃的是和士兵一锅煮的饭菜。他和警卫战士住在临时设于粤东会馆的司令部里，这虽然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古建筑，但没有豪华的卧室。他住在厢房的楼阁上，床铺和警卫战士的床并排着，是用条凳和木板临时搭成的，床上的被褥也同战士的一模一样，是普通战士行军打仗使用的被子。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床前多了一张借来暂时使用的办公桌。部队没有汽车，百色城也没有人力车，出门工作，不管远近，均需步行或骑马。平时看不出他和他的红七军领导们与士兵有何异祥之处，只有在工作时才看出他们在于有着不同分工的工作。这在他亲手创建的部队里，首长和士兵是工作上的分工，是革命队伍里新型的同志式的官兵平等的关系。

10月23日，小平同志紧急召开部队党的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后作出决议：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公开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继续改造和整顿部队，吸收新战士，补充队伍；武装工农群众，实现革命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掌握右江政权，筹

集经费，准备起义，扫除和消灭阻碍武装起义的反动力量等。这是百色起义准备工作最关键的会议。会后小平和张云逸等部分领导人到各处深入检查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把工作抓得很紧。自此，准备工作更紧张而有秩序的进行。

起义前，要扩大队伍，增加力量。按照“兵马未到，粮草先行”的道理，燃眉之急是筹集经费。同时，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进驻右江沿岸各县后，也存在着军饷来源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小平和张云逸同志在部队党的会议上与大家研究，决定使用旧政府右江督办的行政权力，领导和指挥各县旧政府，调动各县的财力。会后立即公开宣布张云逸同志担任右江督办。张云逸同志利用这个行政权力，通知各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各县税收全部上缴。其中一次就收得上缴税款几万银元。这是一项十分英明而行之有效的措施。当时右江的税收来源主要是云南、贵州鸦片过境税，小平同志与红七军的领导们引导大家开展讨论如何处理鸦片及鸦片烟税问题，得到了统一认识，决定暂时采取利用政策。为以利今后禁烟和掌握这项税源，张云逸同志把握右江督办的政权后，在百色城设立禁烟总局，宣布由叶季壮担任局长，负责征收鸦片过境税。这项税收来源不断，收入可观，后来提高部队给养，官兵发月薪每人20元，菜金6元。同时派兵二个连运送烟税至靖西支援红八军一纵队，并托红八军购买军需品等。部队还发动商人募捐，得到相当大的支持。由于经费有了保障，为百色起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物质基础。

小平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都把革命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作为重要的工作来做，经常到士兵、群众、青年学生中，宣传党的主张，用革命道理启发大家。周末时，小平同志与张

云逸、陈豪人等领导人到广西省立第五中学即百色中学去作演讲，介绍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和中国革命的形势，并联系右江革命的情况讲革命道理。小平同志精辟的论述，深入浅出的说理，生动活泼的语句，迎得师生的阵阵掌声。有一次周末晚会后，小平同志对学生说：“……我们在快乐之时，要看到街上有许多人挨饿，许多人家无隔夜粮，身无好衣裳”。几句话便把大家的思想引导到革命上，大家都感到小平同志说的很有道理，一下子大家便看到地主阶级对农民群众的压迫剥削十分严重，贫穷饥饿得难以生存，革命非常重要和迫切，大家联系到小平同志在演讲时经常讲到的“革命是唯一的出路”的话，更感到非常的有道理。革命在五中学生中已经形成很浓的气氛。师生纷纷投身到革命活动之中。校学生会按小平同志的指示，组织宣传队，或由部队带领、或由进步教师带队到百色城郊各村屯，进行革命宣传。部队也根据小平同志的布置，每个连队派出七八个人组织成一个宣传队到街道工人和居民中、农村农民中开展宣传。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迅速提高，纷纷要求进行革命斗争，实现消灭剥削阶级、当家作主的愿望。

袁任远是在小平同志身边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之一，常常在小平同志住处那里商量工作，经常最先得到小平同志的指示。如小平同志讲的六大决议、十大政纲、苏维埃政权等，最先听到，并看到有关文件。小平同志指示袁任远到百色城工人群众中去做发动工作，组织了百色总工会和各行业工会、工人赤卫队营，使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开展向资本家的斗争。小平同志布置袁任远，要印制好百色起义的各类文件，以备散发。袁任远就和百色城工人代表关崇和商量，并

和时中印书社店主商量取得同意后，借用石印工具和5名工人，到红七军政治部清风楼附近一间房屋秘密印刷文件。为了赶时间，袁任远和政治部的同志也参加了誊写工作。印刷的文件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的《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政纲》、《中国共产党十大政治纲领》、《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等，并把印好的文件分发各地。文件的分发，就象发放革命的火种，在工农群众、青年学生的心中燃烧，烧遍了桂西的大地。

宣传发动工作不断深入的同时，扩大武装的工作也逐步展开。小平与张云逸同志通过右江各县党组织，把带来的枪支发给农军和赤卫队。恩隆、奉议、东兰、凤山、凌云、思林、向都、果德等县农军和百色工人赤卫队，先后把5000多支枪领去，农军和工人赤卫队员手里有了枪，革命的劲头更足，打倒反动派的信心倍增。奉议县农军总指挥黄治峰带领农军领到枪支300余支、子弹100多箱，配合四大队消灭反动的三大队后立即组织惩办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地主、恶霸黄曹山，把他的住宅严密的包围起来，附近村屯农民闻讯，成千上万赶来支援，手执木棍参加战斗，经五个昼夜英勇围攻，虽遭到顽固抵抗，参战农军仍斗志坚强，直到第六天清晨攻下，消灭了反动民团武装。韦拔群率领的农军领到枪支弹药后，组织农军在正规部队的支持、帮助下，攻占了东兰、凤山县城。胜利的消息传到七军军部，小平同志夸奖说：“打得好，打得好！”。

武装起义准备工作逐一实施的同时，由广西、云南边界土匪收编而成，有1000多人枪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奉桂系军阀之命，打着俞、李旗号，分别进驻恩隆平马、恩阳那

坡等县城，和地主豪绅相勾结，图谋以换防为名取代第四大队，占领右江地盘，企图镇压革命。这里，一场恶战的阴云布满整个右江的上空。不把这股反动势力消灭掉，驱散阴云，革命将被扼杀，起义将受到严重影响。张云逸、陈豪人等同志主张强攻或智取，小平同志主张强攻和智取并用。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部队作了消灭反动的第三大队的周密部署。10月28日，张云逸电“邀”第三大队队长熊镐到百色“商议换防”事，熊镐这个原为土匪头子的家伙以为占据百色的时机已到，乘着电船由恩隆抵达百色城二码头，被宴请到公兴当铺“作客”。狡猾的熊镐有些防备，走到公兴当铺门口，示意他的警卫站在门口两旁，并佩带崭新的武器，威风凛凛，一派杀气，四大队负责安全保卫的士兵也有准备，按计划以一比一同时站在门口两旁，以示对熊镐“礼貌”。张云逸和熊镐入宴，互相寒暄，入席后不断举杯祝酒助兴，共叙军事前程。等待熊镐酒意正浓，醉意方兴之时，张云逸话题一转，劝熊镐参加革命。但熊镐故作不知，不予理睬。张云逸看到熊镐坚持反动立场，不可劝说，立即按原定计策，发出第一行动暗号：离开宴席！警卫连长李健带着潘文华等五个警兵看到行动暗号，立即机敏地冲到宴桌边，把驳壳枪顶住熊镐的胸口，叫“不许动，举起手来！”熊镐若无其事地说：“老弟，有话慢慢讲吧，何必弄刀弄枪的？”李健见他寻机反抗，再次命令他举手，下跪，不许乱说乱动！熊镐无可奈何，束手就擒。他的门卫警兵也被缴了械。这天上午，在恩隆县城平马、恩阳县城那坡，第四大队和农军也分别执行小平和张云逸同志关于解决第三大队的周密计划，缴了熊镐部队的枪，除了少数人逃脱外，共俘敌1000余人，

缴枪700多支。

群众发动起来了，工农武装起来了，影响百色起义顺利进行的障碍扫除了，部队的整顿工作已做好，队伍壮大到4000余人。特别是党的组织已得到很大的发展。建立了统一领导右江地区各县的党组织右江工委，恩隆、奉议、百色、思林、东兰、凤山、凌云等县建立了县委或县特支，党员发展到五六百人。这时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建立广西前委。原来派到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龚饮冰，11月初秘密回到了百色，带回了党中央关于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七军、红八军的批准和任命的领导人。小平同志立即召开前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各项指示。同志们听后，一个个精神振奋，热血沸腾，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如子弹上了膛的枪，填满火药等待点火的大炮，紧绷了弦的箭，只要一声起义号令发出，一场向反动派猛烈开火的大战就在祖国西南边陲爆发。小平同志第一次领导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即将顺利实现，这是他人生道路上走向新的阶段的开始，也是他领导中国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的开端，他兴奋的心情难以平静。正当小平同志抓紧做好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之时，党中央来电要他亲自赴上海汇报工作。这时，他遵照党的指示暂时离开右江和红七军，把起义的实施任务交给张云逸及其他领导人完成。

天空的乌云一层层、一团团的滚动、撞击，黑麻麻的云朵凝集得越来越重，大地升腾着一股股闷得难以忍受的热气，熏烤得万物骚动不安。天地之间酝酿着一场急风暴雨。饥寒交迫的各族人民多么盼望这样一场暴雨的到来，把世间一切污泥浊水冲刷得干干净净，换来一个新清美好的天地。

山雨即将来临了！贫困的人民似意识到有一位巨人正力助山雨的到来。

（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办公室 梁明辉）

邓斌同志在 百色起义中的故事

李长寿收集整理

1929年10月刚二十多岁的年青共产党员邓斌（邓小平）同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张云逸同志一起，从南宁率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进驻了百色城，进行百色起义的筹备工作，胜利地领导了百色起义。邓斌同志在百色起义前后，尽管工作繁忙，仍抽出时间深入群众，和干部群众谈心，了解情况，鼓舞人们进行战斗。曾经和邓斌同志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起当年和邓斌同志在一起的日子里，那些生龙活虎的情景，历历在目，就象在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笔记纪念册

农历10月，在北国已是冰天雪地，而在南国的百色城，还是秋风习习，气候宜人。一天下午，邓斌同志在军部部署工作之后，身穿灰色单衣，头戴军帽，和张云逸、陈豪人、何世昌等领导同志，来到政治部办公室附近的一个会议室，听取社会股长黄启滔（黄一平）等同志作关于百色城工人运动情况的汇报。

会议室里，早有几个人在等候着。为首的是社会股长黄

启滔，他是广西贺县人，1925年8月在广州参加农讲所第五期学习，十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先后在贵县、桂平等县从事农民运动，1929年10月随张云逸同志到百色。在座的还有关崇和、罗文佳、甘寿等同志，关崇和是贵州人，因家境贫寒，从小被卖到百色，在一家烟铺里当工人，后为刨烟师傅。罗文佳是广西钦州小董人，从小随哥哥到百色打工，在一家皮鞋店打工。甘寿是百色街人，读过几年小学，十五、六岁就在一家理发店做工，后为理发师傅。几位工人，都是黄启滔在做工人工作中发现的积极分子，经过培养锻炼，逐渐成为黄启滔的左右手，黄启滔常带他们一起在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

大约一支烟的工夫，首长们来了，他们一进会议室，均各自就座，坐在甘寿旁边的正好是邓斌同志。大家趁开会前的一段空隙时间里进行闲谈，张云逸同志和关崇和、罗文佳用粤语交谈起来，邓斌同志则用四川话和甘寿闲聊，顿时，会议室里谈笑风生。

邓斌同志关切地问甘寿：“你叫什么同志？”

“我叫甘寿。”

“家住在那里？”

“我是百色街人，家住在永安街。”

“家里有什么人？”

“有母亲、哥哥、姐姐、弟弟，靠做工维持生活。”

“你读过书吗？”

“读过五年小学，因家里穷就不读了。”

“现在你还想学习吗？”

“想，我很想读书学习，没有文化，工作很困难。”

随后，邓斌同志就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红皮笔记本，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好好学习”，落款邓斌，就把本子送给甘寿，并亲切地对甘寿说：“你好好学习，以后写工作体会，写笔记，你很年青，应为将来共产主义大踏步前进！”

会议开始后，黄启滔汇报了百色城工人运动情况，邓斌同志边听边满意地点点头，很为高兴。会议最后是张云逸同志讲话，他说：“你们要快清理土豪劣绅和贪污勒索者，这些人该杀的杀，该放的要放，使人民懂得罪大恶极者要严办，以发挥我们工人当家作主的精神，提高我们工人的威信。”

接着，工人骨干又在紧张地工作，甘寿在黄启滔等同志的帮助下，用邓斌同志送给他的笔记本，慢慢地学写工作笔记，提高了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他十分珍惜这个红本子，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并以之鼓励自己，为革命好好工作。

教唱国际歌

邓斌同志进驻百色城后，和张云逸同志一起住在粤东会馆侧面厢房的楼上，他的楼下住着一位从南宁随军上百色的“学生妹”孙醒依，年方十七、八岁，风华正茂。一天中午，孙醒依从码头工人那里工作回来后，正在院内散步，刚好碰见开完会议的邓斌同志从楼上下来，手里拿着一叠资料，边走边看。孙醒依为了不打扰首长同志，便自觉地走开了，邓斌同志却叫住了孙醒依，关切地问起她的工作情况。

“孙同志，从南宁来我怎么没见到你？”

“我在南宁是跟严敏同志上来的，他直接领导我的工作，所以首长很少看到我。”

“到百色后做啥子工作？”

“我去苦力工人（搬运）那里一段时间，做宣传工作。”

“其他还做了哪些？”

“还到过五中，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你去五中演讲我也知道，师生反映很好，他们说很爱听你讲形势，讲苏维埃革命。对了，学生们嚷着要我教他们唱歌，我不知唱什么歌好。”

“那你就教他们唱国际歌。”

“国际歌我不会唱呀！”

“那我来教你，你会唱了再去教他们。”

于是，邓斌同志慢慢地吟唱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为人民好好工作”

1930年初春，桂西的百色，虽然还刮着小北风，寒气还在袭人，但山上的小红花柴树毕竟绽出了小花瓣，它在向人们预告，春暖花开，鸟语花香的春天到来了。百色从郊区到边远的山乡，种玉米，犁田耙地，浸谷种，送肥料下地的人们，在田野里你来我往，一片繁忙景象。明媚的春光映照开始长出嫩芽的树林小草，织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使人心旷神怡，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就在这年3月，邓斌同志去上海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后，回到广西，由左江经右江，到达东兰县，和韦拔群同志在武篆搞共耕社试点。在春耕大忙前搞试点，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群众踊跃参加，顺利地开展起来，同年四月，李明

瑞、张云逸、陈豪人等领导同志，率红七军部队游击于黔桂边境，在“五一”节攻克了贵州省榕江（古城）县城，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部队在榕江作数天的短暂休整，即向广西右江“打马回朝”。5月下旬，部队回到东兰，邓斌、韦拔群和李明瑞、张云逸、陈豪人等同志汇合后，即从东兰开拔至百色县的所略、武隆一带休整两天。

部队休整时，军部首长开会，邓斌同志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随后，会议决定邓斌、雷经天等同志率部分队伍，由所略开往恩隆（今田东县），恢复苏区，由李明瑞、张云逸等同志率红七军一、二纵队回师百色，给敌以沉重打击，解放根据地的人民。首长们白天开会，晚间深入连队和区乡苏维埃政府，检查各项工作。

部队在所略、武隆一带休整时，适逢春雨初晴，稻田水满，农民正抓住时机进行春耕春种。武隆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边领导群众生产，边为红七军筹粮。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肃反委员黄正昌，正在坡立乡为部队筹粮奔波，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一天深夜，黄正昌在乡府办公室里统计筹粮数字，这时，邓斌和李明瑞、张云逸、陈豪人、龚鹤川、雷经天、罗文佳等领导同志，外加一班警卫人员，他们乘着朦朦的夜色，翻山越岭，来到坡立乡府检查工作。坡立乡府设在一间小土屋里，室内狭窄，首长们来到后，只有邓斌同志进了屋内，其他首长和警卫人员均在门外谈论他事，邓斌同志一进屋里，就和黄正昌同志打起招呼来：

“同志，你辛苦了！”

“首长辛苦。”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黄正昌，是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肃反委员，区政府派我来这里筹粮。”

“家住那里？”

“在所略坡晚洪爱屯，离这里不远。”

“工作顺利吗？”

“可以，我们区苏府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焚烧契约，组织群众生产。”

“分田分地，群众敢要吗？”

“开始有些怕，我们干部带头要，大家都要了，干部带头把契约拿出来，群众跟着拿，一把火就把一大堆契约烧个精光。”

“那好，干部是骨干嘛。这里敌人有什么活动？”

“有奸细，前几天我们已把给大土豪罗肇高送情报的奸细梁斗南杀掉了，很得群众拥护。”

“你们干得好。”

“我们还命令团统、村统、保统交出枪支二十多支，武装了两个班农民赤卫队。”

“好。”接着，邓斌同志轻轻地拍着黄正昌的肩膀问道：“粮食有没有？”

“有。”

“你怎样筹法？”

“我们找村里有威望的人来开会，经过宣传动员，群众懂得红七军是工农子弟兵，是保卫劳苦大众的，这样，就把米送来了。”

“现在筹得多少斤？”

“差不多三万斤。”

“还要不要派些人来帮忙？”

“不必了，部队劳累，让他们休息吧！”

“好。要得要得，你们工作蛮可以哩！”说完，邓斌同志坐在黄正昌用蓑衣作席垫睡的床上，并顺势躺下去，然后对黄正昌说：“今晚我在这里同你同床共枕咯。”

黄正昌谦逊地回答说：“这床连席子都没有，用蓑衣垫睡，恐怕影响着首长休息。”

“不必客气，咱们同甘共苦嘛。”邓斌同志说完，走出乡府办公室，高兴地和几位领导同志作了短暂的商量，决定奖给武隆区苏维埃政府步枪八支，大黄马一匹，以资鼓励。临别前，邓斌同志握着黄正昌的手说：“为人民好好工作。”然后和首长们到别处检查工作去了。

他们离开不久，东方已呈现出鱼肚白，接着，部队吹响了军号，新的战斗又开始了。

（原载《百色史志》第8期，1988年4月编印）

一次难忘的接待

1930年8月间，我在右江下游天等农向都民赤卫军第五路军三营六连当司务长时，曾经历过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

有一天，总指挥黄绍兼率领数十人枪，从田东县思林巴麻方向来到总部所在地龙光乡多龙村陇香屯，时已傍晚，三营副营长潘大斌对我说：“今晚有客人来，要想办法加点菜。”我感到很为难，部队在这里，连青菜已吃光了，前几天杀了1头牛，只留下斤把肉给黄庆金副总指挥，全屯60多户人家，几乎已搬进岩洞，天又快黑了，找菜实在困难。潘副营长带着命令式的口气说：“不管有多大困难，今晚一定要找些菜来招待客人。”在这情况下，我便逐户登门，找了大半天，才搞到1斤半黄豆，两斤红米菜。当晚就是这样黄豆炒牛肉，红米菜做鲜汤，简单招待客人。晚饭后，总指挥黄绍谦和各营的干部与年轻的客人围在一起开会至深夜，直至凌晨两点多钟，会后便在许世杰（即是副总指挥黄庆金的房东）家住宿。他们休息后，潘副营长到我住处交代说：“明早八时吃早饭，客人赶路，一定要准时做好饭菜，不准延误。”第二天一早，我又设法到外村买了3斤红米菜，1斤黄豆，做好饭菜准时开饭。饭后我去收拾食具，那位年轻客人紧握着我的手对我说：“司务长，你太辛苦了，谢谢你的招待！”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只说对不起，山村饭菜粗糙，一定不习惯吧！那年轻客人说：“好吃，好吃！”我收拾碗筷后，随

同指挥部售货员到屯外送客人。他们出发后，营长农振邦，副营长潘大斌才对我说：“那个年轻人是邓斌(邓小平)总政委，中央的特派员，是来检查布置我们工作的。倾听之后，我心里感到十分难过。便生气地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如我早知，可到外村屯找些好菜来招待。”潘副营长笑着说“这是军事秘密，不能随便泄露。再说部队处境那么困难，若你买了鸡鸭来招待，邓政委也会不高兴的。”我听了这些话，心中也就舒畅了。我最难忘的是，邓政委和蔼地紧握我的手，现在仍记得清清楚楚。

(黄振廷口述，韦显堂、李恒盈整理，原载《右江日报》)

邓政委从左江到右江

范文

夜宿东吞村

1930年2月间的一个傍晚，东吞村口的沙滩上烧着3堆火，围坐着数十名赤卫队员，他们是右江农民赤卫军指挥部的，当天上午接到上级命令：邓斌政委（即邓小平同志）从龙州出发，晚上要在东吞村过夜，要保卫好邓政委的安全。接应的暗号是在村头烧上3堆火，对方的暗号是晃3下火光。

东吞村离思林县城（今属田东县）15华里，北通东兰，西南往龙州，面向右江，背靠大山，是个偏僻的小村庄。1929年12月上旬，邓政委从百色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就经过这个村子。如今赤卫队员们听说邓政委从上海回来了，个个都很高兴。当他们接到接应邓政委的通知后，便在村头村尾及路口设了岗哨，检查来往行人。并规定只许进村，不许出村，免得走漏风声。天快黑的时候，思林县委书记陈鼓涛就带领赤卫队员在村口的沙滩上，烧了3堆火，等待着邓政委的到来。

“8点钟过去了！”

“9点钟又过去了！”

队员们既着急又担心地议论着，一双双眼睛都注视着河对岸。就在大家焦急的时候，对岸突然闪了几道火光，一名队员高兴得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邓政委来了！邓政委来了！”紧接着又是3下火光，对上了暗号；这边就立即把3堆火都熄掉了。

不巧，这时突然狂风大作，噼里啪啦下起大雨来了。为了保证邓政委的安全，赤卫队员们都坚守岗位。半个小时过后，雨逐渐小了，邓政委坐着渡船来到了沙滩上，随行护送的还有红八军战士。队员们都围上去一一作了自我介绍。

接着，陈鼓涛把邓政委带到赤卫队员黄本朝家里休息。吃罢晚饭，已经是深夜11时了。邓政委问黄本朝：“你们这里有一个脸圆圆的，头发蓬蓬的，他是农民赤卫军总指挥，现在到哪里去了？”黄本朝知道邓政委问的是黄永达，就回答说：“他外出执行任务了。”邓政委点了点头，又说：“你把农会干部和村里受苦最深的农民找来，开个座谈会。”黄本朝见邓政委走了一天的路，够辛苦的了，便劝他先歇息。可邓政委却乐呵呵地说：“时间还早着哩！”黄本朝只好把农会干部和农民代表找来，共20多人，把屋里挤得满满的，大家都想看看邓政委。

邓政委找了一张能坐四五人的长凳子，和大家坐在一块，转过身问旁边的李有才：“你家有几口人吃饭？”

李有才伸出一只手做了个手势回答说：“5口人！”

“有田地没有？”

“租土官的。”（当时对有权有势的人称土官）

当李有才说到收100斤谷子要上交给土官60斤时，邓政委气愤地说：“太苛刻了，你们应该组织起来和他们进行斗争

嘛！”

邓政委又问大家：“你们有什么要求？”

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最好是农民都有田耕！”邓政委笑了笑说：“只要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土豪，打倒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就有田耕啦！”接着他向大家讲了实行土地革命的好处、怎样进行土地革命，大家越听越想听，觉得他讲的每句话都是新鲜的。讲完后，邓政委又问大家：“起来革命，你们敢不敢？”大家说：“敢！有田耕还怕啥！”

“对！干革命就是要不怕死的嘛。记得你们这个地方有个姓黄的同志（指黄治峰，奉议县人，先后担任过右江赤卫队总指挥），刚参加革命就写书了‘男儿立志出乡关，报答国家不肯还，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的诗句赠送革命者，很有气魄，干革命就是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大家听得入神了，虽然已经是深夜，但谁也不想离开邓政委的身边。

就这样一直谈到下半夜4点多钟，大家才散去。

东 江 遇 险

天刚蒙蒙亮，东吞村头的大树脚下，红八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们象久别重逢的兄弟，热烈地握手叙谈。这时，陈鼓涛领着一个40岁上下的老乡向邓政委说：“这是向导黄大龙同志！”

“哦！老黄同志，你辛苦了！”邓政委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

头天，陈鼓涛知道邓政委要马上去东兰武篆革命根据地总放不下心来。因为自从红七军去攻打贵州后，右江一带“剿

共大队”活动很疯狂，这一路又是羊肠小道，山高路险。他找了一个熟悉这一带地形的向导，又增派了赤卫队一个班，配合红军警卫排护送。

队伍出发了，警卫员小张牵着一匹杂毛壮马要邓政委骑。邓政委嘱咐小张说：“我能走，把马让给小黄骑吧！”小张嘴里没有说什么，心里可老是嘀咕：这匹马虽然是专门配给邓政委骑用的，可是从龙州出发，一路上风风雨雨，已经6天了，邓政委一次也没有骑过，总是把马让给战士驮东西。昨晚小黄因为被雨淋湿身，得了感冒，又拉肚子。邓政委再三交代叶排长照顾好小黄，并把自己的马让给小黄骑。

为了缩小行动目标，预防在路上发生意外，邓政委把队伍分成3个战斗小组：赤卫队一个组作前卫，邓政委带着警卫排一组在中间，另一组作为后卫。一路上，邓政委和战士们谈笑风生，还经常帮战士扛枪。战士们很受感动，越走越有劲，一点也不觉得累。

天快黑了，队伍到了东江村。村里群众知道来了红军，高兴极了，老大爷上前问寒问暖，青年小伙子挑水做饭，妇女烧水给战士洗脚。晚饭后，邓政委记起昨天陈鼓涛介绍说东江村的群众革命积极性高，基础好，于是便带小张到农民家里召开贫苦农民座谈会去了。

深夜了，邓政委开完座谈会刚回到屋里准备睡觉，忽然村头南面山上“乒乓”响起枪声，紧接着村口小河上也有枪响。这时，叶排长向邓政委报告说：“村头村尾都发现敌人，我们被包围了！”邓政委沉思了片刻，叫小张把向导找来，详细地了解地形和分析了敌情：东江村四周环山，只有南面一条道通往东兰，现在敌人把道路堵住了，如果天亮前

冲不出去，部队将有覆灭的危险。

叶排长问邓政委：“怎么办？”邓政委象平常一样反问道：“你说怎么办？”

“现在，只有打，才能突围出去！”

“那就打吧！”邓政委说：“我们主要是冲出去，不能恋战！”接着他和大家一起具体研究了突围方案。

深夜一点多，突围战开始了。赤卫队老黄带着3名队员往西面村口的山头上引诱敌人，来个声东击西，其余的在邓政委亲自指挥下，向村南面小路前进。愚蠢的敌人满以为红军不敢突围，等到天亮就是插翅也难飞了。当他们突然听到村口山边的枪声，便急忙从南面调兵增援。趁敌人慌乱之时，邓政委带着战士们迅速向南面发起猛烈进攻。敌人知道上了当，又急忙从村口山头上调头回来，妄图把红军重新包围。在这紧急关头，突然村南面敌人的背后枪声大作，敌人乱作一团。

原来，陈鼓涛头一天与邓政委告别后，赤卫队交通员老农向他报告，说思林县保安团慌慌张张调集人马向东江方向去。陈鼓涛估计，邓政委一行可能被敌人发现了。于是，他二话没说，迅速地把赤卫队集合起来，紧随在敌人的后面。果然不出所料，他们快要接近东江村时，见敌人分成两路，包围了东江村。当敌人从村口山头退回南面还未站稳脚跟时，陈鼓涛就率领赤卫队赶到，向敌人开火了。

枪声逐渐稀少，敌人被赶跑了。邓政委紧握陈鼓涛的双手说：“谢谢你们！”

这时，东方已经露白，天已经亮了，邓政委和陈鼓涛带着队伍又继续上路。

巧打民团

经过一天的急行军，邓政委和红军战士来到了那塘村，邓政委再三劝陈鼓涛不要再送了，陈鼓涛执意地说：“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还会追来，我们一定要把你送到七里区！”

果然，思林县保安团在东江被打跑后，他们又迅速报告了右江“清剿大队”，由右江“清剿大队”调集各县民团围歼这支队伍，当时，这个“清剿大队”队长叫黄贵朝，是个满脸麻子、杀人不眨眼的流氓，当地群众习惯叫他黄麻子。他管辖着思林、恩隆、果德3县的民团，成立了右江“清剿大队”。黄麻子得报告后，立即调集3县的民团，向那塘村反扑过来。

这时，陈鼓涛向邓政委建议：“把3个县赤队集中起来，在这里与敌人展开决战！”

当时，黄麻子指挥的3县民团共有1000多人，而3县的赤卫队顶多只有600人，武器也比民团差。

“不能硬拼！”邓政委回答说。接着他详细向导老黄同志了解这里的地形，他想：这个村两面环山，好象一个猪槽形似的，只要把两头山路路口守住，就能顶住敌人；另外，黄麻子调集民团前来追赶我们，他的老巢必然空虚，不如叫各县赤卫队直捣敌人的老巢，使敌人不能兼顾，措手不及。于是，邓政委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陈鼓涛。老陈表示赞同。但担心这100多人的队伍，在这里要顶住1000多民团的围攻，要冒相当大的危险。万一顶不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邓政委看出了老陈的心思，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陈啊！”

红军战士都是钢铁汉，能顶得住。只要坚持3天，敌人自然会跑掉！”

这时，邓政委把队伍分成3路：一路迅速占领村北山顶上制高点，守住路口；一路在村南山坡上，堵住敌人从后面反扑；一路留在村里作预备队。邓政委刚把赤卫队布置好，黄麻子带着民团，就大摇大摆向那塘方向过来。但是，民团还没接近村子，就遭到红军的袭击。敌人拼命想占领山头，被山头上的战士顶住。激战打了整整1天，黄麻子的民团没能前进一步。

就在同一天，陈鼓涛按照邓政委的指示，分别派人向思林、恩隆、果德3县的赤卫队发出战斗命令：迅速集中攻打县城。这3县的赤卫队接到命令后，集中土枪土炮，还买了许多鞭炮，用火药做好炸药包，分别向3县的县城进攻。他们在县城周围，大放鞭炮虚张声势，以假乱真，把县里敌人吓得晕头转向。敌人马上派人向黄麻子报告，要求民团立即赶回。

黄麻子接到急信，急得满头大汗。他以为上了红军的当，立即命令民团撤出阵地，分别向思林、恩隆、果德县城反扑。

战士们见敌人中了计，故意高喊：“冲啊！追啊！”敌人惊恐万状，纷纷向县城逃跑。等到这3县民团赶到县城时，赤卫队早就撤退上山。敌人又扑了个空。与此同时，邓政委一行经过两天两夜急行军，顺利到达了七里区（七里区是当时的解放区，离东兰武篆只有40公里）。两天后，邓政委顺利地到达了东兰，又与红七军战士见面了。

（原载《广西军事志通讯》1989年第3期，题目已经编者改换）

专题研究

邓小平同志在广西

(1929.7—1931.1)

· 卢 行 ·

1929年7月至1931年1月，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广西出色地对当时主政广西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俞作柏、李明瑞做统战工作，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广西西部地区燃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1930年11月奉命率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桂、湖、粤、赣四省，途中，坚决地纠正了军内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苏勇地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于1931年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小平同志在广西写下的这段光辉历史，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小平同志这段革命实践的经验，对我党、我军的建设和我国革命事业是一个重大贡献，小平同志实事求是、指挥若定的领导艺术，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排除“左”的干扰 创造性 地对俞、李进行统战工作

1929年3月，蒋介石与广西桂系集团为了争夺地盘，在

长江中游地区调兵遣将，准备展开军阀战争。双方剑拔弩张之时，蒋介石通过与桂系李、黄、白有矛盾的广西军人俞作柏，策动在武汉的桂军师长李明瑞、杨腾辉倒戈拥蒋，桂系军队全线崩溃，李宗仁、白崇禧闻讯分别从上海、北京逃到香港。6月，俞、李率部占领梧州，随即进兵南宁，迫使北伐以来一直独揽广西军政大权的黄绍竑也离桂逃港，第一次蒋桂战争随告结束。之后，蒋介石任命李明瑞为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又称第四编遣分区主任），统领全省军事，任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

俞、李回广西主政后，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要求我党派干部来广西工作。俞、李是广西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俞作柏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曾在桂系军队中任过要职，后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长、广西省政府农工厅长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南宁军校）校长等职，积极支持工农群众运动，与我广西党组织早有联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李、黄、白排挤，寄居香港，当时广西籍的共产党员陈勉恕等也同住俞处，在港的国民党广西左派人士与中共党员共同组织了广西肃反委员会，以俞作柏为主席，共产党员邓拔奇、黄启滔等为委员，该委员会曾发表宣言，声讨黄绍竑的反革命罪行，我党广东省委领导人李立三、恽代英、杨殷等也常与俞联系。俞作柏准备拥蒋倒桂时，曾和杨殷商量过，俞的胞弟俞作豫是共产党员，参加过广州起义，对俞的思想影响很大。李明瑞是俞作柏的姑表弟，参加过北讨伐桂系军阀和驱逐滇系军阀的战役，在俞作柏部任团长，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师长、副军长等职，配合叶挺独立团参加过著名的汀泗桥、贺

胜桥战役，他对我党有好感，同情革命。这次他们回桂主政，感到广西的党、政、军系统蒋桂势力需要清除，部队需要改造，施政需要人才，而他们自己力量不足，地位也还不巩固。因此，愿与我党合作，要求我党派干部到广西工作。我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派一批同志进广西，到俞、李的政府和部队中工作，为建立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作准备。

192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同志为中央代表，到广西与俞、李接洽，做他们的统战工作，并领导广西党的全盘工作^①。派陈豪人、张云逸、龚饮冰、龚鹤村等来广西协助小平同志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和广东省委还陆续派了40多名干部于七、八月间分别到达南宁，进入政府机关和军队工作。当时，领导广西党的工作的特委属广东省委领导，被派到广西的同志，由广东省委介绍到南宁与广西特委接上组织关系，然后按照党的安排，到军政机关任职，以公开的身份，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张云逸同志到南宁后，任教导总队副主任兼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俞作豫任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陈豪人任省政府机要秘书，龚鹤村任南宁市警察局长、余惠、袁任远、王展、阎伯衡、何世昌等或任教导总队教官，或任连排长。

小平同志在龚饮冰同志陪同下，由上海到香港，听取了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同志介绍情况^②，然后到南宁。小平同志在南宁以党中央代表身份做俞、李的工作，同时领导整个广西党的工作。当时我党虽然能在南宁作半公开的活

^①见小平同志1984年8月29日对广西区党史办请示信的批示。

^②《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103页。

动，但党组织还是秘密的，党员之间只能单行联系。小平同志的身份，只有少数干部知道，小平同志对工作的指示，是通过陈豪人等几个同志去传达的，其他党员干部受陈豪人的单线领导。张云逸同志是通过国民党广东海军司令陈策介绍到广西俞、李政府“谋事”的，俞、李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为了不暴露他的党员身份，小平同志也没有和他直接联系，所以他虽知道小平同志到南宁已两个多月，但还没有见过面，只是从陈豪人那里取得小平同志的指示来进行工作，直至撤到右江时，才在平马见到小平同志。①

小平同志到南宁后，知道我党有一批干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被捕还被关在狱中，即通过关系向俞、李提议，要释放这批人并加以任用。俞作柏欣然同意这个提议，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通过释放并让他们在政府机关中任职。罗少彦、何健南、甘湛泽等就是这时被放出来的，这对于恢复广西地方党组织起了很好的作用。小平同志还提议，要清除国民党各级党部中的蒋桂势力，换上拥护新政府的人。这自然也是合俞、李的心愿，俞作柏即以省主席的名义通过解散国民党各级党部，并对恶迹昭彰的国民党“清党”委员和反动分子加以逮捕，使广西的反动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经我党推荐，俞、李任用了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如在大革命时期搞过海员工会工作的张子宪，在邕宁搞农运的莫俊峰，开设进步书店的赵子美，以及陈立亚、梁天梦等，分别被任命为县长、邕绥公路局长或省政府的科长。但这项人事上的除旧布新工作还做得不彻底，蒋桂留下的势力一时未能完全清除，蒋介石派驻广

①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

西的坐探郑介民还留在省政府任委员，这成了后来破坏俞、李反蒋的隐患。当时，在小平等我党同志的推动下，俞、李还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扶助农工”和“必须唤起民众”的宗旨，开放工农运动，支持恢复工会，成立农会，武装左右江的农民自卫军，给韦拔群的东凤农军发了步枪二百多支，组成一营农军，在南宁进行训练。

与此同时，小平指示张云逸和俞作豫在我们担任领导的教导总队、警备第四、第五大队中，抓紧开展兵运工作。为了加强教导总队党的力量，小平同志将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来的干部，大部分分配到教导总队去，张云逸同志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把三个政治上反动的营长调到训练处去，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然后，派我们的干部去任营长，九个连的干部都换上了共产党员。同时，在各个连队都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加紧发展党员工作，两个多月内发展了300多名学兵入党，从而把这支部队初步掌握到我们党的手里。在张云逸、李谦同志担任正副大队长的警备第四大队，是李明瑞来广西后收编游杂武装和散兵游勇组建起来的。小平指示张云逸和李谦同志，改造这支队伍一定要彻底，先发动群众撤换营连干部，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再改造部队的成份。张云逸同志便从教导总队调来一百多名党员和干部担任第四大队的营、连、排干部，在连队建立了党组织，并从社会上招收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1000多人充实部队，把一些成份不好表现差的调去教导总队学习，改造不过来的调到别的部队去。这样，这支部队也掌握到我们党的手里。在俞作豫任大队长的警备第五大队，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造，但对小平同志的指示执行得不彻底，他早年曾在这支

部队任过职，对旧部属没有下决心撤换，致留下了隐患。

小平同志到南宁两个多月，对俞、李做了很好的统战工作，为革命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鉴于党内在大革命失败后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对小平同志在广西与俞、李合作发展革命力量的做法，不相信也不放心，因此，中央和广东省委几次发来指示信，都强调俞、李仍是军阀政府，说他们与桂系李、黄、白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最多只是个激进的改良主义者，只是欺骗宣传，不管他们对我党的倾向与表示如何，我们都不应对他们抱幻想，要严防党内右倾的发展^①。但小平同志审度时势，认为俞、李虽然是国民军党人，不免仍有国民党旧军人的气味，而 they 与蒋桂的矛盾，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他们所采取的一切进步措施，我们应该欢迎、支持，我们与他们之间对革命有利的关系都应发展。正因小平同志能坚持从广西的实际出发，对俞、李搞好统战工作，所以俞、李虽然有他们的想法，小平同志却能巧妙地使之为我所用来实现我们革命的计划。当时年仅25岁的小平同志，能在俞、李和蒋、桂复杂的政治势力当中作有利于革命事业发展的周旋，他的聪明才智，使我广西党的领导同志十分钦佩。后来的实践证明，小平同志这段工作是做得对的，当时中央和广东省委的一些批评是错误的。

正确决策 领导起义

南方的9月，秋高气爽，稻黄果熟。我党在南宁开展的

^①1929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和1929年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致中共广西特委的信（第一号）。

革命运动生气勃勃，形势很好。这时，广西省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会上贯彻了六届二中全会精神，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提出了“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等方针、任务，但大会按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把工作重点放在南宁、柳州、梧州三城市的职工运动上^①。

省党代会后，广西政局发生急剧变化。改组派头子汪精卫策动在湖北的张发奎反蒋，企图南下进攻广东军阀陈济棠，夺取广东地盘作反蒋基地，汪感到张的兵力单薄，派薛岳到南宁游说俞、李共同反蒋，俞、李表示同意，准备出兵反蒋。面临突变的紧张局势，我党在部队的领导同志有主张随俞、李去打陈济棠的，有主张把部队拉到梧州、桂平一带另图发展的，有主张在南宁立即举行武装暴动的。正当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陈豪人同志来向大家传达小平同志的意见：根据目前情况，我们应当劝俞、李不要匆忙反蒋，我党继续在南宁开展兵运，准备武装暴动。如俞、李不听，即把部队拉出去，但不是到蒋、桂、俞驻有重兵的柳、梧方向去，因我们的力量还弱；也不能在南宁举行暴动，而是到韦拔群等同志已经工作多年、群众基础较好、蒋桂力量难及的左右江山区去，同韦拔群同志的农军结合起来，做好准备，举行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俞李要调动我们掌握的部队去打陈济棠，就说部队未训练好，不能拉出去打仗。同志们听了都点头称是，觉得小平同志确是想得周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随即分头去作应变准备。这时，小平同

^①1929年10月20日中共广西特委给中共广东省委的信——关于九、十两月的报告。

志找到俞、李，同他们分析了当时形势：回广西主政不到三个月，政府和军内蒋介石和李、黄、白的势力还没有完全清除，政权未稳，经济困难，兵力不足，不应仓促反蒋，不要上改组派的当。俞、李认为，张发奎已经出兵，若我们不响应，张发奎就有被蒋介石部队歼灭的危险，我们怎能置之不顾？其实，俞、李急于反蒋，也是形势所迫，因为蒋介石对俞、李回桂主政早就不放心，派郑介民等一批特务监视俞、李的行动，当发现俞、李采取有利于我党的措施，蒋介石即命俞作柏晋京，企图将俞扣留起来，俞警觉，以奔母丧为名拒绝赴京，时间一长，俞、李企图反蒋，蒋要消灭俞、李的图谋，彼此都心照不宣。同时，俞、李也想一举打下广东，占据更多地盘扩充势力，解决广西当时的经济困难。因而表示他们攻粤反蒋的决心已下，叫小平不要再劝说了。小平见劝说无效，即提出：出兵广东，南宁不能全部空虚，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还没训练好，不能配合作战，应留守南宁，由张云逸任南宁警备司令。开始，俞、李感觉为难，谈来谈去，终于同意这几支部队留下，但要从教导总队抽调一批干部回各师去充实领导，小平同志表示同意，后来，从教导总队抽出三百多名非党干部交回各师。

9月27日，俞、李通电反蒋，蒋介石于9月28日、31日两次打电报给李明瑞，威胁他不要“效尤李、白，重蹈张逆（发奎）自绝党国之复撤”。李明瑞置之不理。10月1日，俞、李在南宁召开大会，誓师反蒋，宣布由俞作柏任讨蒋南路军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出发攻粤。

俞、李的部队出发后，小平同志速即调遣部队作应变准备：通知警备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先去右江地区，警备第五大

队派一个营先去左江地区^①；派雷经天等一批同志去右江，派何健南等一批同志去左江，加强党的领导，发动群众，打好起义的基础。指示张云逸同志以南宁警备司令的名义接管省军械库，并征集船舶，以备一旦有变，即把军械库的几千枪支和弹药装船外运。令在南宁受训的韦拔群同志的农军营赶回东兰，准备起义。派龚饮冰同志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行动计划。

俞、李出发攻粤的部队刚到桂平，他的三个师全部叛变投蒋，蒋介石任命广东的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任命在梧州的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与粤军联合讨伐俞、李。俞、李出兵反蒋，前后只有十多天就彻底失败了，最后，身边只剩几个马弁，黯然返回南宁。

俞、李失败的消息传到南宁引起了骚动。在教导总队，从俞、李三个师调来学习的学兵，闻知部队倒戈反俞、李，即闻着要回去，反动的总队长许廷杰乘机拉人投蒋，共产党员、教官李朴、袁任远、冯达飞等决定逮捕许，被许发觉，半夜起来集合学兵企图拉队逃跑，李朴当众揭露许的阴谋，并向许开了枪，一时枪声大作，许在混乱中逃跑。小平同志得到消息，指示张云逸同志立即赶去隐定局势，在群众中揭露投蒋阴谋，尽量争取愿革命者，把队伍稳住，争取不了的送走。张云逸同志连夜到教导总队召集党组织会议，传达小平同志指示，党员连夜分头工作，到第二天上午，把还坚决要走的一百多人送走，把队伍拉到郊区西乡塘去整顿、巩

^①见小平同志办公室1985年6月20日答复百色地委党史办的信。

固，准备开往右江。这是南宁兵变的开始^①。

根据小平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研究决定，10月14日，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出发去龙州，俞作柏、李明瑞跟着前往，到达龙州后俞作柏出越南去了香港，李明瑞则留在龙州继续与我党合作。10月17日，邓小平、陈豪人等党的领导同志和部分干部带着警卫部队，指挥装满军械的船队溯右江驶百色，张云逸率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从陆路掩护前进。袁任远等许多干部在南宁虽然知道是小平同志领导他们工作，但都没有见过面，这次同乘一条船，才第一次见小平同志，大家感到小平同志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健谈、诙谐，都愿意和他接近，他与大家相处十分融洽。船行四天，到了恩隆县平马镇，张云逸同志率领的第四大队、教导总队也到了，经叶季壮同志介绍，张云逸同志才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张云逸同志一把握住小平同志的手，不禁欢呼起来：

“哦，您就是小平同志！几个月来，我经常得到您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那时我多么想见到您呵！”小平同志也很激动，紧紧握着云逸同志的手，说：“靠您和同志们努力，我们的工作才能胜利进行。”这时雷经天和右江特委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见了小平同志都很激动、兴奋，欢快地谈笑，对即将展开的一场新的战斗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小平同志随即召集领导同志研究，提出部队部署和武器弹药存放安排的建议：部队领导率教导总队和特务营明天启程去百色，大部分军械也随带去，目前暂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运往东兰、恩隆七里山区存放。第四大队留一个营驻恩隆，一个营开往恩阳那坡，一个营驻果德。同志们

^①张云逸：《广西革命形势的发展，红七军、红八军的成立》。

都赞成小平同志的意见。次日，大家分头出发。10月22日，小平和云逸同志率教导总队和特务营进驻百色。

10月23日，小平同志召开部队党的委员会议（后来改为前敌委员会），经过讨论作出决议：整顿、补充部队，宣传发动群众，掌握政权，筹集经费，准备起义。根据党委的决议，小平同志亲自到部队宣传我党主张，宣讲党的“六大”决议和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他的宣讲，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很受欢迎，云逸同志讲阶级关系、政治形势和民主改革。通过宣传发动，然后进一步对部队进行整顿，把部队中的反动分子和兵痞流氓清除出去。经过整顿，部队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之后，部队再分到各县，对各县的警备队进行改造，把右江地区的武装掌握到我们手上，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收缴地主恶霸的枪支武装自己，许多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军，使部队迅速得到扩大。

小平和云逸同志还到省立第五中学给全校师生宣讲我党主张，号召他们参加革命。五中学生受到很大鼓舞，主动组织宣传队，到城郊那毕乡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帮助组织农会。以后有不少学生参军，参加革命，成了武装起义的骨干。小平同志还派黄一平同志去发动工人群众，在百色城成立了各行业工会和县总工会、百色工人赤卫营，部队给他们发了武器弹药。同时，按照部队党委决议，张云逸以右江督办名义召集各县长开会，叫他们交出武器和公家财产，由各县农会接管旧政权，农会改称革命委员会，作为临时政权机关。

武装起义的积极准备，引起地主豪绅一片惊慌，他们勾结驻在恩阳、恩隆一带由熊镐带领的警备第三大队，妄图以

接防第四大队为名，抢占百色地盘。不消灭这股反动势力，将严重影响武装起义的进行。陈豪人与张云逸同志交换意见时，一是主张强攻，一是主张智取，征求小平意见，小平说，智取与强攻并用。可以商谈接防为名，请熊韬到百色来，一举擒下，同时，命令雷经天指挥在恩隆的部队和农军，将其驻平马的一个营包围缴械，命令驻那坡的四大队二营包围其驻那坡营。豪人与云逸认为这个计划很完善，便马上分头执行。百色和平马收缴第三大队武装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在那坡的行动却被敌人发觉，双方展开了激战。小平同志即派张云逸同志亲自带教导总队的两个连，连夜赶到那坡指挥，结果，敌人除逃跑一个连外，其余两个连都缴了械。消灭第三大队的战斗，共俘敌一千多人，缴枪七百多支，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

11月初，派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的龚饮冰同志回到百色，传达中央指示。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要求“迅速转变”，尽快起义，并批准建立前委，统一党和军队的指挥。前委委员七人，小平、豪人、云逸三人为常委，小平为书记，中央还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的番号，任命了两军的领导干部。本来，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得相当充分，当时宣布起义也是可以的，但小平同志还是召开前委会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检查布置起义工作：

- 1、按红军建制改编部队为三个纵队；
- 2、拟定政纲，印制宣传品，向群众开展宣传；
- 3、掌握动态，控制局势；
- 4、决定在广州起义二周年即12月11日举行百色起义。

部署后，再派龚饮冰同志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起义的行动计划。这时，中央电召小平同志回上海，但小平同志考虑，龙州起义准备工作还要检查布置，于是决定先到龙州后再赴上海。

11月中旬，小平同志带袁任远和余惠同志去龙州检查布置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走到恩隆和向都交界的榕树坳时，恰逢从龙州来的李明瑞和许进，李是想趁刚卷土重来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粤军在粤桂边争斗，南宁兵力空虚之机，到百色联络第四大队打南宁的。小平同志得知李明瑞的来意后，便和他坐下来，耐心地同他分析形势，指出目前南宁虽空虚，但我们两个大队的人马也是不易打进去的，即使打进去也守不住。劝他不打南宁，参加革命，与我们一同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李明瑞听了，表示还要考虑考虑。为做好他的转变工作，小平同志与他一道返百色。在百色，小平和云逸同志又和他谈，肯定他在北伐战争中为革命立了功，这次主政广西又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劝他又我党一道打起红旗革命到底。经耐心谈话，终于说服李明瑞同意放弃打南宁计划，表示愿意参加革命。三人遂一起研究龙州的工作，小平同志举了许多例子，强调改造旧军队的重要性，叫李回到龙州后一定亲自做好这个工作。李明瑞接受任务回龙州时，恰遇蒙志仁叛乱，便同俞作豫一起指挥战斗，打垮了叛军，稳住了左江局势。平息蒙志仁叛乱后，李明瑞更感到小平同志改造部队的指示重要，对这位年轻的有胆有识的领导人不禁由衷敬佩。于是，李明瑞同俞作豫一起认真抓了部队的整顿工作，为起义作准备。11月底，小平又带严敏、何世昌、袁振武等同志去龙州，加强那里的领导力量。

12月初，小平到达龙州，在龙州住了两天，和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研究了龙州起义计划，部署了各项工作，又召开党员干部会，讲明建立红军，举行起义的意义，介绍了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和策略，大家很受鼓舞，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举行武装起义。布置之后，小平同志又同李明瑞作一次长谈，同他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给他指出我党目前虽然困难，但我党基础好，主义正确，革命是人心所向，一定胜利的。李明瑞表示坚决革命到底，请小平同志放心。李明瑞在广西部队中有较高威望。这次反蒋失败后，蒋介石曾多次派心腹带着广西省政府主席、第十五军军长的委任状和巨款到龙州对他进行拉拢引诱，杨腾辉、岑建英等李、黄、白的军官也以老同事、老同学的身份，写信阻挠他参加革命，都遭李明瑞断然拒绝。争取李明瑞工作的胜利，一方面固然是他有倾向革命的思想，一方面也是小平等同志的工作做得好。不久，李明瑞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此后，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在革命的熔炉中，他成为我党一名英勇的红军指挥员。

布置龙州起义的工作后，12月上旬，小平同志从龙州动身，中旬到香港，在香港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在会上作了《补充报告》^①，报告内容主要讲了三点：一是起义为什么不在南宁举行？他说“到南宁以后我们就决定在短期间要将我们已有工作的部队发动游击战争，……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南宁动，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未准备好，且群众也没有动起来，……关于暴动的问题我们很久就注意到了，但是得到中央的指示以后使我们更坚

^①见小平同志1984年8月29日对广西区党史办请示信的批示。

决，不过必要准备工作，因此时间上并不能机械的确定，直到以后军队中我们已有强固的组织才决定广暴纪念日动，但这次发动并不是上级的命令，还是经过士兵们□□（原件不清楚）与众决定的”二是布置了龙州起义的工作。他说：“这次我来经过龙州驻了两天，会着×××等二十余同志，经我告诉他们发动的策略以后，他们都表示接受已准备发动，并已共同议定发动前的准备以及发动后的工作计划大纲，内容大致与右江相同，主要的发动群众斗争，与解决动摇不坚决的旧军官”。三是百色、龙州起义后“发展的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①。从《报告》可以看出，小平同志的工作从来实事求是，十分注意发动群众，发扬民主。正因为这样，才能使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举行武装起义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得以顺利进行。

按照小平同志和前委的部署，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我党领导驻百色和龙州的部队顺利地宣布起义，百色的部队成立红七军，龙州的部队成立红八军，同时产生红色政权右江苏维埃政府和左江革命委员会。

根据地建设着眼于培训干部发动群众

小平回中央期间，陈豪人主持前委，调动红七军大部向右江下游移动，红八军主力到崇左县集中，请李明瑞到右江共同指挥，想趁粤桂战争之机会师攻南宁。1930年2月4日，红七军与桂系四个团发生隆安战斗，激战三日，双方都伤亡很大，我军撤出隆安，退到恩隆县北部又与敌进行了亭泗战斗，后我军退到盘阳（今属巴马县）休整。七军前委在

^①中央军委1930年8月15日编的《军事通讯》第2期。

盘阳开会研究以后行动方向，决定由军部率第一、第二纵队去外线打游击，补充给养和弹药，第三纵队由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率领留守东凤根据地。1930年4月初，李明瑞、张云逸同志率红七军主力向河池出发，占怀远，经思恩（今环江县）、宜北（今环江县），出南丹，进贵州，入苗山，袭榕江，到5月上旬，才由贵州回师河池与小平见面。

1930年2月7日。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听了留守龙州的宛旦平同志汇报。知道红八军及左江工作的大致情况。但还不知发生隆安战役并已结束战斗。乃根据中央关于不打南宁的决定。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电告红七军停止攻南宁。命红八军撤回龙州。指出从主客观的条件来估计。攻南宁必遭失败。特别是红八军由于本身的问题更危险。电报发出后三天。收到七军复电报告隆安之战失利^①。

红八军撤回龙州后。小平同志召开左江党政军领导干部会。传达中央指示。建立八军临时前委。讨论决定八军及左江的工作方针；明确建设根据地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打好群众基础。机关所有党员都到群众中去做实际工作。分派部队到龙州附近几个县游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及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农会等群众组织；加紧八军本身的改造；迅速解决反动武装；开展反法帝国主义的斗争。

从2月7日到27日。小平在龙州领导工作。着重抓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嚣张气焰。派一纵队到崇善、雷平、靖西游击。二纵队到凭祥、宁明游击。围剿土匪。平息叛乱。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织农会。与左江革命委员会研究。镇压了七名欺压群众、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召开了声讨法帝国主

^①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

义的万人大会。由左江革命委员会带领群众包围法国领事馆和龙州海关、天主教堂等处。将窝藏在那里的土豪劣绅的武器弹药、金银搜出来。把法国领事嘉德夫妇、海关法国税务司彦格里及反动的法国神父驱逐出中国国境。并以左江革命委员会名义用英、法文通电全世界。小平同志发动反法斗争这件事。震动全国全世界，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曾发表社论赞扬。法帝国主义震惊之余，派飞机来侦察示威，适逢八军一营部队在宁明县明江开群众大会，法机掠过上空时，红军开枪射击，群众高呼口号，法机慌忙中坠落，机上三人，一死二重伤，枪弹被我缴获。

此时，小平得知红七军已退出右江，但不知到了何处，考虑到桂系如进犯龙州，龙州难守，小平同志与临时前委研究，决定亲自带八军第一纵队迅速打下靖西，打通左右江的障碍，以备八军向右江推进。

2月28日，小平同志到八军第一纵队驻地雷平县宝圩，知道这个纵队的主要领导不是党员，纵队还没有建立和健全党组织，感到没有领导核心很难发挥战斗力，便召开党员会议，帮助建立和健全中共第一纵队党委，书记为一纵队参谋长袁振武。小平同志向全体党员指出：党的委员会是部队最高的领导机关，纵队一切重大事情，提要经党的委员会讨论后才能执行。他把这一决定，公开向非党员纵队司令何家荣等作了交代，嘱咐他们要尊重纵队党的领导。一纵队由于建立和健全了党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后来虽然在独立转战桂、滇、黔边中遇到了重重困难，都能顺利克服，在纵队司令离队的情况下，全队仍能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直到与红七军会师。一纵队的指战员们后来回忆这段历程时，十分

感激小平同志帮助他们建立和健全党组织，正是这一重要措施，才能在危难中为革命保住了这支队伍^①。

3月7日至10日，小平同志率一纵队攻靖西县城，10日，右江向都县委书记陈鼓涛来，报告右江沿岸还有果化在我们手里，可以过江，小平同志决定即去右江传达中央指示，纵队领导派一连人护送。临行，小平对纵队领导指示：一定攻下靖西，随时注意龙州方面情况。并向龙州发电报，告诉八军要按前决定进行工作，加紧发动群众，地方政权有了基础，八军即向右江靠拢。可惜八军领导没有认真贯彻执行，致遭失败。

1930年3月10日夜，小平同志一行离靖西，3月17日晚过右江，因等待东兰消息，在思林县兰芳村住了近半个月，4月5日到达东兰武篆。沿途，只要有机会，小平同志都要找干部谈话，开群众会作宣传。在向都县南区和北区都找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和赤卫军的干部研究布置工作，指示他们依靠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巩固革命政权。在兰芳，开办农民赤卫军干部训练班，小平同志亲自给他们上课，讲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还召开群众大会，赞扬他们革命工作搞得好，鼓励他们革命到底。当年听过小平同志讲话的群众，现在回想起来，还绘形绘声地讲得津津有味，说小平同志同群众讲话，十分亲切，振奋人心，许多青年听了讲话，受到教育参加革命。

小平同志到武篆后，知红七军主力已向庆远方面游击，小平要追赶部队，拔群同志便派一连人护卫小平同志赶到河池，当时，七军一、二纵队已远去桂黔边，小平同志乃转回

^①袁也烈：《苦战七千里》（1981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1辑。

武篆，同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等同志一起，领导东兰、凤山的工作，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小平同志在武篆，经过调查研究，根据红四军在中央苏区进行土地革命的实践和东兰、凤山试点的经验，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以右江苏维埃政府名义，分别在5月1日和15日颁布。5月，东兰、凤山大多数乡村进行了土地革命。为了提高干部的 leadership 水平，小平同志在武篆的旧州屯办了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学员有韦拔群等红七军第三纵队的领导干部，雷经天（兼教员）等右江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及工作人员，东兰、凤山县委及部分区乡的党员干部，共100多人，课程多数是小平讲，训练班将结束时，小平将讲稿油印成小册子发给大家，计有：《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党的问题》、《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小平同志关心群众，关心干部战士，在武篆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访问群众，还同韦拔群同志到善学村（今巴学村）红军临时医院看望伤病员，这里住着隆安、亭泗战斗中负伤的几百名伤员。小平同志细心地察看了伤员的伤势，询问他们有何困难，检查医院的设备，劝慰伤员安心养伤，伤好后再上前线多杀敌人。之后，小平同志召集医院领导、医护人员和地方党政干部在一起，研究改善医疗条件的办法，并指示管理部门给每个伤员发一块光洋，这在当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使伤员深受感动。

李明瑞、张云逸同志率红七军主力从贵州回到河池时，已是5月中旬，小平同志得消息即赶到河池与他们见面。大家见到小平同志都十分兴奋，纷纷互道思念之情。接着，小平即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央指示，讨论今后行动问题。根

据中央指示和红七军面临的形势，红七军能否立即向湘粤边发展与朱毛红军汇合呢？小平同志指出：湖南现在驻有重兵，不易通过；且右江自红军去后，群众有失败情绪，七军需要回去巩固一个时期，回百色还可补充兵员、解决服装经济问题。大家对小平的分析有同感，一致同意回师右江，收复百色和右江沿岸各县^①。

红七军收复右江各县仅十天，与过路滇军在果化打了一仗，激战五日，敌军损失很大，我军亦有伤亡，双方撤出战斗后，滇军仍占领百色。小平同志与前委研究决定，红七军在恩隆、奉议、思林、果化一带开展土地革命，整训部队，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武装，巩固根据地。小平同志把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作为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来抓，亲自在平马西街办了两期党政干部训练班，培训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干部一百多人，小平同志给他们介绍东兰武篆进行土地革命的经验，讲开展土地革命的意义、目的和政策。培训后，学员便回本区、乡，按照《土地法暂行条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7月下旬，红七军集中平马整训。这期间，小平、豪人同志腾出时间，深入各地，检查指导地方工作。小平同志特地安排两天时间，和雷经天同志到思林县那叭村（伏击滇军时，战地医疗救护所设在这里）看望伏击滇军战斗中的伤病员。伤病员们看到邓政委逐个的察看他们的伤势，询问他们的病情时，个个热泪盈眶，向小平同志表示：一定不辜负邓政委的期望，赶快养好伤回部队，革命到底。小平同志非常关心干部战士，关心群众，每到部队，他就询问干部战士的

^①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

生活状况，去慰问伤病员；每到地方，他总是千方百计接触群众，访问群众。右江一带当年见过小平同志的革命老人和红七军的干部战士都说小平同志爱兵爱民，平易近人，和蔼可亲。8月，小平到向都县检查工作，所到区、乡，他都向干部强调要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群众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凡开群众大会，他都向群众宣传土地革命，勉励群众搞好粮食生产支援红军，号召青年参加红军，参加革命。9月初，小平回到平马，领导红七军整训，到9月底，经过三个月整训，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水平都提高了，党的工作也加强了，又补充了3000多名新战士，并把右江赤卫营改编为红七军第四纵队。红七军成立初期约有5000人，经隆安、亭泗、伏击滇军等战斗，部员减员较大，集训前不到4000人，这次整训补充，全军达到7000多人，整个部队精神饱满，战斗力增强。

这时，根据地各县分得土地的农民，秋收在望，各级工农民主政府经过调整充实有所加强。右江革命根据地形势好转。

平马会议和河池整编抵制左倾

回师右江时，原计划红七军在右江一个短时期，然后迅速向外发展。平马整训后大家又提出是否按原计划向湘粤边出发的问题，但因经济问题（部队的给养）没解决，秋收又快到，如果红七军离开，农民分得的土地及快要成熟的粮食必被地主豪绅抢去。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保护秋收，小平同志和红七军领导决定在10月1日出发。出发前一日，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即邓岗）赶到，要传达中央指示，故改在10

月4日出发。

10月2日，小平同志在平马主持开红七军前委会，由邓拔奇同志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央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向东发展，打下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打下广州，完成南中国的革命。执行任务的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这个指示是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物。虽然在1930年9月下旬中央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经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当时红七军还不知道，前委仍根据中央六月决议进行讨论。小平、云逸等同志认为：红七军力量不足，无法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但是中央指示只好执行，行不通时再说。邓拔奇、陈豪人同志则表示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去打大城市。最后决定按中央指示执行，部队到河池集中，举行阅兵，以鼓舞士气，并召开全军党代会^①。离开平马之前，小平同志考虑到，部队向北开进，女同志行军作战困难很多，必须在出发前把女同志安置好。遂指定军部经理处对部队中的女同志进行疏散，本地人由当地组织进行安置，外省来的在当地安置有困难，就介绍到香港或到上海去找党中央。余惠同志的爱人孙醒依就是这时被送走，到了香港。当时部队忙着轻装，作长途行军的准备，并向群众道别，彼此都依依不舍。

10月4日，红七军一、二纵队离开右江，绕道凌云，向河池出发。10月6日，小平和拔奇同志途经燕垌街时（今巴马县），在燕垌召开中共右江特委扩大会议，来开会的有右

^①邓平小：《七军工作报告》。

江特委和右江沿岸各县工农民主政府的干部70多人，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四点指示：1、整顿、扩大赤卫军，加强军事训练；2、大力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3、抢收农作物，把粮食收藏好；4、整顿党组织，加强党的工作，防备反动军队反扑。经与会同志讨论，对红七军离开后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作出了具体安排。会后，小平同拔奇同志到东兰武篆，与韦拔群同志率第三纵队到河池集中。

11月初，红七军7000多人集结河池，红八军一纵队300多人在袁振武（袁也烈）同志率领下，也到达河池，编入红七军建制。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河池凤仪小学召开，大会传达了中央6月指示，通过了如下决议：

- 1、执行中央命令，打柳州、桂林、广州；
- 2、整编红七军为三个师，第十九、二十师出发，二十一师留下番号，由师长韦拔群回右江重建；
- 3、改选前委，小平同志仍任书记；

大会提出了敌军士兵运动的问题，组织了一个兵委，陈豪人同志为兵委书记^①。

本来，小平同志对集中兵力打蒋桂驻有重兵的柳州、桂林、广州，思想很不通，很明显，以我军这点兵力去打数倍于己的敌人，取胜的希望是很小的。小平同志对此深感不安，为了减少部队损失，他在会上先建议不打柳州。李明瑞、张云逸同志同意不打柳州。邓拔奇、陈豪人同志表示不能改变打柳州的决定。

会后，前委即着手整编部队，把三个纵队改编为三个师。十一月九日，全体指战员集合在河池三里亭前举行整编

^①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

大会，军首长宣读各师干部委任令，授予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的旗帜，最后，军首长检阅了部队，并进行北上动员。

北上途中摆脱立三路线 胜利转战粤桂湘赣

11月10日，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7000多人从河池出发北上。

踏上征途后，小平同志始终不主张硬打攻坚。原来准备经庆远向柳州前进，到怀远时与敌人有一个小的接触，即占领了怀远。当时就发生了一个是否攻庆远的问题，一种意见是，中央指示集中攻坚，应攻庆远；小平同志反对攻庆远，认为庆远是敌人重镇，敌必出死力固守，没有攻下的把握，如攻不下，损失就大了。小平同志不但不赞成攻庆远，而且不赞成攻融县，主张及时渡江向桂林出发。李明瑞、张云逸同志等都同意不攻庆远，攻不攻融县到天河看情况再决定。到天河时讨论，根据情况，决定不攻融县。而经三防转移敌入视线，再到长安（现融安）渡河。次日忽得报明融县有一小河可涉过到长安，遂临时决定到融县，行不到四十里，即在天河县（今罗城）四把与敌来拦截的桂军覃连芳师遭遇，发生了激烈战斗，敌我相持三日之久，敌人不断增兵，小平同志等果断地决定撤出战斗，四把之战，红军伤亡2、3百人，歼敌4、5百人。甩掉敌人，连夜绕过敌人据点，离开天河转上龙岸到达三防，在三防因天雨，休整数日，即到长安。长安是融江上游的一个大镇，有3、5万人口。为了筹措冬衣，解决部队北上急需的钱物，决定攻打长安。其时长安已有敌重兵驻守，白崇禧又从柳州率一个师来增援，斩断

浮桥，背水死守。红军打了五天没有攻下，遂向北撤退。长安之战歼敌5、6百人，打出了红七军的威风，故我军撤退时，敌人不敢追出城外一步。红七军退到富禄渡江，向古宜（今三江县）前进，原打算经古宜到桂林，后因古宜有敌军教导师驻守，无法过河，又闻柳、庆之敌已移师桂林布防，乃改走湘桂边。进入湖宁的绥宁，由于敌人的反动宣传，老百姓都跑了，绥宁成了一座空城，红军在绥宁住了一夜，即向武岗进军。

到武岗时，原不打算攻城，后得消息说城内只有一个保安团驻守，约6、7百人。自进入湖南以来，天气骤冷，部队几乎全是单衣，粮饷均缺，为解决经济和冬衣等急迫问题，才决定攻城。武岗城城墙完好，又有坚固工事，红军攻了四日四夜，未能攻下，伤亡很大，英勇善战的五十五团团长何莽同志也牺牲了，原来估计敌人援兵来不得这样快，兵力部署没有准备，仍继续攻城时，敌湖南军阀何健调来的五个团援兵已至，急促退却，以致损伤不小。退出后，经新宁，过资源，突袭桂北的全州。全州城内守敌不多，毫无防备，一击即溃，红军顺利地进了城，得到了休整的机会。

原来红七军北上的任务是执行党中央的打柳州、桂林、夺取广州的命令，经过桂、黔、湘边近两个月的艰苦行军，战四把、打长安、攻武岗，虽然打得很英勇，但敌众我寡，没能攻下一座大城市，而且长期行军和频繁战斗（几乎天天有战斗），部队减员三分之一以上。1931年1月2日进占全州时，官兵失败情绪甚深，指战员们怀疑中央命令是否行得通？迫切要求解答部队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小平同志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根据当前的形势，决定放弃“立三路线”攻

柳州、打桂林的任务，一致认为部队需要休整补充，然后经湖南江华出连州越北江，至粤湘赣边界与江西红军取得联络。离右江后，小平同志虽然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与李明瑞、张云逸同志团结一致，努力摆脱“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但仍遭受很大损失，因此，在前委会上，小平提出：

- 1、部队在全州休整三天；
- 2、改变硬打攻坚战略；
- 3、改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

前委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会后，邓拔奇和陈豪人同志说要向中央汇报工作，离开了红七军。前委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将四个团改为三个团，把非战斗人员尽可能地充实到下层去，变为战斗人员，对伤兵也作了安置。在全州筹得了几万块钱，原打算添置被服，但探知白崇禧亲率一个师向全州压来，不能久留，被服未做得即撤出全州，向东南方向进发。

部队1月5日从全州出发，经永安关到湖南的道州（今道县）。发现湘军在宁远、临武一带布防，敌情严重。道州是空城一座，只少数贫民没有跑，商人都跑光了，无法筹款。红军在道县住了两天，知道湘军已从三个方向向道州攻来，小平同志感到我军这时决不能作战，遂照原计划向江华进军。

从道州到江华百里行军，当日大热来寒，刚冒大汗，又大雪纷飞，北风呼啸。战士穿的还是从河池出发时的单衣、草鞋，有的甚至还穿着短裤，为了御寒，战士们把在全州得的布拿来盖在身上，众人牙关打颤，脸色发紫，大家凭着坚强的革命信念，顶风冒雪，忍着饥饿，行进在冰雪覆盖的山路上。有些体弱的战士经受不了饥寒，实在走不动，想坐到路边休息，一坐下就冻僵，再也站不起来，就牺牲了。到

江华时，部队疲惫之极，军部决定休息两天，解决迫在眉睫的被服问题，突击治疗冻伤。前委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小坚同志让大家讨论解决部队御寒问题，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干部公开对立三路线表示不满，说离开右江以来，盲目地攻打敌人重兵防守的城市是行不通的，血的教训令人痛心！如果再执行中央要打大城市的命令，会把队伍拖光拼光。会上决定接收敌人的仓库，没收反动官僚的财产，征用大客户的部分布匹、棉胎，再购买一部分衣服，尽可能解决御寒问题，根据敌情，决定退回广西贺县桂岭山区开展工作，站稳脚跟，再图发展。会后，由于敌人要来，时间紧迫，没收征收和买来的棉花布匹还来不及做成衣服就发给大家，不够再到街上购买一些衣服，也不管衣服的颜色和式样，统统发给大家。指战员们穿在身上，五颜六色，花的、女的也有，只要能御寒，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部队还进行了轻装，将大炮等笨重的东西掩埋起来。第三天，部队刚集合准备出发，四面八方的敌人就打来了，枪声到处响，部队边战边撤，受了一些损失。部队急行军翻越桂、粤、湘三省交界的老苗山，回到广西贺县的桂岭。

桂岭是山区，交通不便，离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便于我们休整。原计划在桂岭多休息一个时期，发动群众，到后发现这里的地主豪绅力量太强，如桂系重兵来，将大不利于我。小平同志召集前委会议研究，决定在桂岭只停一个短时间，根据部队减员只剩四千多人的情况，缩编为两个团，军主要干部兼团长，师、团干部逐级下放，充实指挥系统，以鼓舞士气，增强战斗力。部队离开桂岭，即向广东的连县出发去北江。会后，将部队缩编，取消师的建制，缩编

为五十五团、五十八团，李明瑞兼五十五团团长，龚鹤村兼五十八团团长。部队在桂岭休整三天，缩编后，经过教育和鼓动，又得到休息和补充，冬衣也准备好了，战士的斗志又旺盛起来。

1931年1月中旬，红七军在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同志的率领下，离开广西，进入广东的连县，在连县休整七天，与来袭的粤军八个团激战两天，退到星子圩。后经乳源县境到达乐昌县的梅花村，与来犯的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梅花村战斗，损失很大，无法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遂甩掉敌人，强渡乐昌河（即武水）。1931年1月，小平和李明瑞同志率五十五团渡过乐昌河后，经仁化到达江西崇义。崇义县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游击区，到崇义不久，部队与中共赣南行委取得联系，小平同志统一领导该县党组织和当地红军，在那里做了20多天工作，发动群众建立了四个区工农民主政权，培训党员，健全各级党组织；拨出枪枝，武装地方部队，发展革命力量。1931年2月，小平同志把崇义的工作安排好后，经团委（当时军前委改为团委）研究决定，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了解“富田事变”情况带去中央。临行前已近春节，小平带几个同志到杰坝与赣南特委开会，研究开展地方工作的问题，同时慰问在杰坝治疗的红七军伤病员，然后离开队伍去中央。

红七军五十五团2月中旬离开崇义到遂川的大汾，向永新前进，张云逢同志率领的五十八团摆脱敌人后，避开乐昌县，到坪石渡过乐昌河，经汝城，桂东，3月中旬在湖南酃县的十都圩附近与王震同志率领的湘赣独立第一师第三团汇合。然后两支部队南下资兴、汝城、寻找五十五团。随后北

上，在茶陵打了一个胜仗，歼敌三百多人，以后转到永新的天河。1931年3月下旬，五十五团与五十八团终于在天河汇合了。4月底在永新召开了红七军第二次党代会，选出了新的前委。后来与红二十军、湘赣独立一师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第二次反“围剿”，在安福大胜蒋介石的韩德勤师，连克茶陵、攸县、安仁、酃县、遂川五县，军威大震。1931年7月，中央将红七军、红二十军调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此后，红七军就与中央红军会合，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连续参加第三、第四次反“围剿”，英勇善战，屡战屡胜。

红七军离开右江后，转战桂、湘、粤、赣，历时九个多月，行程7000余里，到与中央红军汇合时，红七军的老战士尚有2000多人。红七军转战四省，历尽艰辛，能够把这批骨干力量保存下来，实在是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排除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果。红七军的历史是用血写出来的，所以，小平同志1962年为《广西革命回忆录》（主要是红七军的回忆录）题词时这样说：“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象我们前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

（原载《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1期）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陈欣德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邓斌）和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陈豪人（陈导民）、雷经天、俞作豫（俞作榆）等分别发动和领导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威震南疆的英勇的武装起义。他们领导创建的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当时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位于广西西南部边陲。北与贵州省交界，西和西南面分别与云南省和法属殖民地越南毗连。它包括了左江、右江和红水河流域的百色、恩阳（今属田阳县）、奉议（今属田阳县）、恩隆（今属田东县）、思林（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属平果县）、隆安、向都（今属天等县）、东兰、凤山^①、凌云、那地（今属天峨县和南丹县）、镇结（今属天等县）、龙州、上金（今属龙州县）、凭祥、宁明、崇善（今属崇左县）、左县（今属崇左县）、雷平（今属大新县）、养利（今属大新县）、思乐（今属宁明县）、明江（今属宁明县）、龙茗（今属天等县）等二十四个县，和都安、那马（今属马山县）、隆山（今属马山县）、天保（今属德保县）、万承（今属大新县）等县部分

^①当时的百色、东兰、凤山、恩隆等县有一部分地区现属巴马瑶族自治县。

地区，及河池、邕宁、上思等县部分游击区。根据地面积约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50多万，有正规红军两个军，人数发展到一万人左右，地方脱产工农赤卫队有八九千人^①。根据地里的红军和壮、汉、瑶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摸索和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一、中共广西党组织对俞、李的统战工作和工作中心的转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在蒋介石新军阀统治下，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军阀混战连年不断。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军阀混战，给广西革命带来了有利的时机。4月，蒋桂战争以新桂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6月，蒋介石委派俞作柏和李明瑞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②（后改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7月，俞、李到南宁主政广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要求中共派干部到他们的军政机关协助工作。中共中央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出邓小平、贺昌、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化名龚楚，后叛变）、叶季壮、袁任远、徐冠英（又名徐开先）、史书元（又名史遽然，后被开除党籍）、许进、李谦、袁振武（即袁也烈）、胡斌、沈静斋、冯达飞、何世昌、李朴、许卓、余惠、宛旦平、章健、李干辉、王逸（后被开除党籍）林礼等四十多名干部，

^①据1960年3月《张云逸同志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

^②据1920年6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

通过各种渠道，先后来到广西，与原先参加过广州起义、后被派回广西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等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负责统一领导。

邓小平于7月到达南宁后，以非凡的胆略，一方面对俞作柏、李明瑞进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与掌握广西政权的国民党左派建立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担负着领导广西地方党组织（中共广西特委）的重任^①。

俞作柏和李明瑞两人是亲姑表兄弟，原在新桂系军队中担任要职，大革命时期，深受中国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影响，靠近中共，倾向进步，立过战功。后遭受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新桂系首领的排斥和打击，积愤不平，早就想摆脱新桂系的羁绊。他们主桂后，踌躇满志，想干一番称雄中国的大事业，但蒋介石对他们并不放心，派出了郑介民、卢奕农等一批亲信到俞、李政权中和军队中担任要职^②，暗中监视；新桂系军阀的旧部势力也不甘心失败，妄图从内部破坏和发难；国民党改组派头子汪精卫也派人到广西插手活动。在军事上，李明瑞从湖北带回广西的部队只有两个师，基本上是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旧部，成份极为复杂。再加上群众基础薄弱，政权很不稳固。当时，邓小平等从国内的阶级关系和广西的政治形势出发，正确分析俞、李主桂前后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和主桂后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情况。不囿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决议中对待中间阶级的错误分析，而采取了正确策略：既把俞作柏和李明瑞及其代表民

^①1985年6月20日邓小平同志办公室给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征集办公室的信。

^②1929年8月29日《中共广西特委给中共广东省委的信》。

族资产阶级利益、带有民主革命色彩的广西新政权与国民党右派相区别，团结、教育、争取其左派，与他们共筹反蒋、反新桂系军阀的大事；又坚持中共独立自主的方针，趁机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对新桂系中的顽固右派、亲蒋分子和国民党改组派，则给予坚决打击和孤立。邓小平亲自在上层人物活动，巧妙地通过中共党员俞作豫与俞、李的社会关系（俞作豫是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进行统战工作。这段时间，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通过党的内部活动，把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派来广西工作的干部安插到俞、李的军政部门任职；陈豪人到省府担任机要秘书，龚鹤村先任省府船务处长，后调任南宁市公安局长；徐冠英担任广西编遣特派员办事处总务科长；张云逸、史书元、石迟锋等到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担任要职。同时，俞、李还同意释放“四·一二”政变时被新桂系军阀监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群众^①，起用他们到政府和军队部门工作^②，并破格委任一批进步青年到各县担任县长。这些人后来很多为成武装起义的骨干。

（二）积极开展兵运工作，迅速发展武装力量，以此作为工作重点。当时，俞作柏、李明瑞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非常注重扩建军队，以充实其军事力量。邓小平等便趁机向俞、李建议开办以培养部队初级军官为目标的广西教导总队，并活动由张云逸负责领导^③。该总队设三个营九个连。

①据1983年5月21日和1984年6月10日梁君怡、谢伯达的回忆材料。

②《桂潮》创刊号（1931年1月10日）

③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

学员共1000多人，主要来自李明瑞部队中的班、排长和从地方招募来的进步青年。从中共广东省委派来的干部和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选送来的100多名工人、学生党员，也安插到教导总队的各个连队当干部或学员，有些党员则安排到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官等工作。对政治上反动的旧军官，则采取“调虎离山”和“明升暗降”的办法，让他们担任较高职位的军事训练工作，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指挥实权。当时，九个连队的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各连队都秘密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发展新党员的工作秘密而又迅速地进行着，仅两个月时间，便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同时，总队加强了对学员的政治宣传教育，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并通过各连队的党员，密切联系学员，宣传、教育、争取学员群众，使连队的政治气氛较为浓厚。这些学员训练后分配到各部队去，便成为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

当时驻守南宁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除一部分是李明瑞在广州招募的广西籍青年和俞作豫从北流带来的青年农民外，大部份是李明瑞回广西后收容的民团、土匪和散兵游勇，成份复杂，军纪较坏，很需要有丰富军事、政治工作经验的军事干部去帮助整顿。对此，中共党组织通过内部关系先后派俞作豫和史书元担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长和副大队长；派张云逸和李谦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长和副大队长^①。这两个大队编制均为三个营九个连，各1000多人。张云逸、俞作豫等到这两个大队工作后，按照党的指示，以合法的身份，有效地开展士兵民主运动和改造部队工作。首先是加强对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在广大士兵群众中，除了少数是兵

^①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

痞流氓外，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被迫抓去当兵的。他们在家受地主豪绅的压榨，当兵后又受着反动军官的虐待，往往是敢怒不敢言。经过耐心启发教育，他们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在此基础上，发动广大士兵群众起来揭发反动军官克扣军饷和打骂、虐待士兵等罪行。接着，抓住士兵群众要求惩办反动军官的有利时机，迅速、果断地撤换那些为广大士兵所痛恨的一批反动军官，另派一些党员干部到各营、连、排中担任领导工作。对连以下的旧军官，原多数送到教导总队当学员，进行教育改造。这样，使这两支军队都“已带了红色^①”，领导权很快掌握在中共党组织手里。在此同时，大力发动和吸收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学生参军，迅速增加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并在连队中秘密建立中共党组织，把士兵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组织来，使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三）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积极发展工农革命运动。经中共党组织的建议和内部活动，俞、李同意开放工农运动，恢复各地工会和农协会组织，选派“一部份青年与农运干部，拟实执到各县去工作，并以‘二五’减租为号召”^②。

随着各地农民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广西省农民代表大会，于1929年8月在南宁召开，会议选举雷经天为省农协会筹备会主任委员，韦拔群为副主任委员。会议期间，经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安排，俞作柏会见了韦拔群，同意以成立“右江护商大队”名义，拨给东兰、凤山地区农军一批武器装

^①1930年：《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

^②1929年8月29日《中共广西特委给中共广东省委的信》。

备。会后，中共组织又推荐一批共产党员、革命青年由俞作柏委任为左右江各县县长或农运骨干，进一步推动广西农民运动的发展。

在此同时，中共组织还派干部到南宁酱园、轮船、汽车等工会活动，并在汽车工会中建立了一个党支部^①，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四）迅速、恢复发展中共地方组织。当时，广西各地中共组织非常零乱^②。有一半党组织失去与广西特委的联系，“特委及各县指导机关多不健全”^③。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和贺昌等在抓紧兵运工作的同时，秘密向广西特委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研究部署广西党的恢复、发展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地的党组织逐步恢复、发展起来，并与省特委取得了联系。省特委曾于8月初在南宁开办了一个党员训练班，有十六七人参加学习，学习有关“政治、职工、土地、组织CY五课”^④内容。同时，还出版了党内刊物《党的生活》^⑤，以加强对党员的宣传教育工作。

为了传达贯彻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邓小平和贺昌指示中共广西特委于1929年9月10日至14日，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⑥，贺昌在会上作了详细的政治报告。会议根据“六大”和二中全会的精神，认真总结广西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大会最后选举产生新的省特委

①1929年8月29日：《中共广西特委给中共广东省委的信》。

②④⑤同①

③1929年9月：《广西党组织问题草案大纲》。

⑥1929年10月20日：《中共广西特委给中共广东省委的信》。

领导机构，并通过了《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等九个文件。在《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提出“推翻国民党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深入土地革命宣传和行动”、“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等正确主张，对后来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至此，全省已健全的中共县委和县特支有九个；正在恢复和健全的县委有五个；南宁已建立了轮船、汽车、机关等10个支部。全省党员共420人，团员130人^①。全省革命形势有较快的发展。当时新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曾这样哀叹道：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几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②。

中共广西省党代会结束后不久，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转机的时候，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改组派头目汪精卫派人到南宁劝说俞、李反蒋。另外，当时蒋介石发党俞、李与中共的关系，欲要解决俞、李，故俞、李便决定与广东军阀张发奎联合，共同反蒋。邓小平等接到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研究和分析，认为俞、李掌握广西政权不到半年，立足未稳，仓促反蒋，必然失败，这也将打乱党组织原来的工作部署。因此，便一方面真诚向俞、李陈明利害，晓以大义，劝说他们不要出兵参加军阀混战；另一方面，作出应变的决策，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向群众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农村，把党在南宁掌握的武装部队撤到左右江地区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此，邓小平和贺昌立即与中共广西特委商议，专门召开了左右江地区工作会议。会后，立即派雷经

^①1929年10月20日：《中共广西特委给中共广东省委的信》。

^②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军事经过概略》，刊《李总司令最近演讲集》。

天到恩隆县平马镇建立省农协右江办事处和担任中共右江特委书记，派严敏、陈洪涛、徐达生、张震球等分别到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思林、向都等县领导农运和筹建县党委，派何建南、麦锦汉、苏文灿等前往龙州县领导农民运动，成立“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由何建南担任主任委员。这进一步加强了共产党对左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使左右江地区党组织和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

9月下旬，俞、李不听中共劝告，决定通电反蒋。10月1日，在南宁举行反蒋誓师大会后，即出兵沿西江进攻广东。邓小平等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五大队未训练好、后方需要保卫为理由，建议把这些部队留守南宁，俞、李同意这一建议，并同意由张云逸担任南宁警备司令和接管南宁军械库等机关。当俞、李率兵离开南宁后，党组织便抓紧做好一切应变准备，在加强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和改造工作的同时，把所有汽船集中在邕江岸边待命，以便随时调遣。

不出所料，俞、李出兵反蒋后不到10天就失败了。俞、李部下的第十六师师长吕焕炎、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和第十五师四十四旅旅长黄权都被蒋介石以重金收买后倒戈投蒋，粤军军阀陈济棠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即派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三个师入桂逼近南宁。这引起南宁极大的骚动。反革命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一些反动分子于10月6日捣毁、破坏省农协机关^①。教导总队中没有改造好的反动军官趁机煽动学员离开队伍去投蒋。对此，教导总队中的中共组织连夜召集各支部领导成员会议，决定分组发动广大学员群众对反动分子进行斗争，揭露他们的投蒋反动本质，指出革命的光明

^①1929年10月20日：《中共广西特委给中共广东省委的信》。

前途。经过一天的宣传教育，争取了大部分学员，使他们认清了是非，站到革命方面来。

同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共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在当时军阀混战形势下，广西党组织必须加强对群众日常斗争和军队士兵运动的领导，“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发动到农民群众中去，实行游击战争，发展土地革命”。这些指示是正确的。但指示信中对广西的工作作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批评和指示，仍要广西特委坚持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城市为中心工作。中共广西党组织在邓小平等的领导下，根据广西形势的变化，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当俞、李反蒋失败的消息传来时，在革命形势突变的关键时刻，当机立断，沉着地按照原定的决策和计划，把中共掌握的武装拉出南宁，挺进左右江地区，并把南宁军械库的五、六千支步枪和大批弹药物资装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船运往左右江地区。10月13日，俞作豫率领警备第五大队撤往左江地区的龙州，俞作柏、李明瑞也随部队前往龙州^①；接着，邓小平率领警卫部队和地方机关干部，指挥装满武器弹药的军械船，溯右江而上，张云逸等则率领警备第四大队和部分教导总队从陆路沿右江掩护军械船前进。俞作柏到龙州后取道越南出香港，李明瑞则留在龙州后参加了革命。从此，广西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的右江地区，是广西农民运动开展较早的地区。它聚居有壮、汉、瑶、苗、彝、仡佬、回等民

^①1929年10月18日广州《公评报》：《俞、李出走龙州情形》一文。

族，其中壮族人口占一半以上。该地区虽然比较贫瘠、偏僻、且交通阻塞，经济落后，但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在地理环境上，境内多是大石山和丘陵山区，山高林密，峰峦起伏，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一个战略要地。在政治上，由于该地区各族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豪绅地主的残酷压榨（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仍残留农奴制式的土司制度），加上连年兵灾匪祸，盘踞该地的军阀和土匪司令对农民进行巧取豪夺，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故敢于反抗，敢于斗争，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早在20世纪初期，该地区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便开始在东兰、凤山一带领导各族农民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东兰县农民武装曾于1923年三次攻打东兰县城。1925年至1927年，韦拔群仿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做法，先后在东兰县举办了三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右江地区各县培训了500多名农运骨干，传播革命火种。1926年，余少杰、黄治峰、陆炳堂（陆玑彰）、黄书祥等也在恩隆、奉议、思林、那马等一带领导农民武装斗争。1927年2月，在平马镇成立了田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整个右江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也没有停止过，农军曾攻占果德、向都、思林、那马四个县城。在长期斗争风暴中涌现了一批象韦拔群那样叱咤风云的、有威望的优秀的农民运动领袖，这里的群众基础是比较深厚的。

1929年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等率领的武装部队到达了右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百色山城，当时的当务之急，就是与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相结合，缜密地筹划武装起义，做好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

作。为此，他们立即在百色召开了部队党的领导成员会议^①，分析、研究当时的形势，制定今后的斗争策略和措施，并决定暂时打着俞作柏的旗号，利用旧督办机构，宣布由张云逸出任右江督办，指挥各县地方政权，通令各县上缴税款，保存文书档案，以便稳定各县局势。

按照党委会议的部署，他们在一个多月内主要抓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利用集会（如十月革命节纪念会）和新创办的《右江日报》、《士兵之友》等刊物，在部队和群众中公开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宣传中共“六大”精神和“十大纲领”。部队经常举行士兵会，每天给战士上课一至二小时，同时，每个连队还组织七、八个人的宣传队深入到农村或街道进行革命宣传、发动工作，帮助地方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和工农武装组织。宣布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减轻工农群众负担。

（二）继续整顿、改造部队。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南宁时，虽经初步改造，但由于时间短促，改造尚未彻底，旧军官中的军阀作风仍十分严重，有的甚至窃款潜逃，或造谣惑众，图谋不轨。老兵的风纪也不大好。根据这些情况，便在官兵中着重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通过个别谈话、上课学习、早晚点名等活动，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发动士兵同旧军官中的军阀作风和贪污腐化行为作斗争，实行官兵平等。对那些经过教育仍屡教不改的旧军官则进行组织上的处理，或撤换、“调训”，或“礼送出境。曾严惩一个一贯克扣军饷、打骂士兵、深为士

^①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

兵痛恨的反动营长。在整顿部队同时，大量吸收工农青年和进步学生入伍，仅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共吸收了一千多名新战士^①，这不仅壮大了部队力量，而且增加了部队中工农成分比重。

（三）武装工农，大力支持工农群众运动。他们坚持与当地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一到右江地区，便通过中共地方党组织，立即把从南宁运来的五千多支步枪，分发给恩隆、奉议、东兰、凤山、凌云、思林、向都、果德等县农军和百色工人赤卫队，增强其武器装备，并派出军事干部到东兰等县帮助训练。各地工农武装领到这些武器后，如虎添翼，更加猛烈向豪绅地主和资本家开展斗争。如韦拔群率领的东兰县、凤山县农军在正规部队的支持、帮助下，先后攻占了东兰县城和凤山县城。同年11月初，黄治峰也指挥恩奉农军数百人攻打奉议县韦宁村土豪黄曹山的反动民团据点，双方激战五昼夜，后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派迫击炮连支援，终于攻破了这一据点，消灭了这股反动民团武装。

在工运方面，中共军队党委先后派出七位政工干部到百色，负责指导工运工作，经过宣传、发动，百色先后成立了12个行业工会，会员1000多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百色县工会联合会。平马、奉议、恩阳和果德县的果化区也相继成立了总工会和行业工会。同时，各县总工会还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共有1000多人，整个右江地区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日益高涨起来。

（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培训军政新干部。当时，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力量仍比较薄弱，有的部队机关单位，

^①1931年3月9日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

连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为此，在部队中采取派党员分单位负责“包干”的办法，从新入队的工农战士、老兵和下级军官中积极发展新党员，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至武装起义前，每个连队和大队部的机关单位都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地方党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建立了中共右江工作委员会（后改为右江特委）。恩隆、奉议、百色、思林、东兰、凤山等县建立了县委。果德、向都等县成立了县特支，整个右江地区共有地方党员五、六百人^①。

为了培训党政军干部，军队党委决定开办了新的教导队和军事政治训练所，吸收部队干部和地方革命青年加以军事政治训练。邓小平亲自给学员讲课。此外，还请军事教官讲战略战术，讲游击战、教骑马等。这为举行武装起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准备了干部条件。

（五）消灭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扫清武装起义的障碍。该大队原由广西、云南边界的土匪收编而成，有1000多人枪，大队长熊镐极其反动，他听命于新桂系军阀，打着俞、李旗号，跟随警备第四大队进驻右江地区的平马、那坡（今属田阳县）等地后，与当地豪绅地主相勾结，成为右江反动势力的支柱，他们图谋火并警备第四大队，镇压革命。邓小平和张云逸得到这一情报后，便与雷经天、韦拔群、黄治峰等秘密进行周密部署，决定10月28日共同行动，围歼第三大队。那一天，张云逸在百色指挥智擒了第三大队长熊镐；同一天，雷经天率领恩隆、思林、奉议等县300多名农军，紧密配合驻平马的第四大队第一营，包围设在平马的第三大队队部及其营地，守敌全部被缴械。第三大队驻那坡的

^①1931年3月9日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

部队，除了少数逃跑外，也于第二天被警备第四大队缴械。这次战斗，共歼敌1000多名，缴枪1000多支^①。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

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委（后改为红七军前委），由邓小平担任前委书记^②。统一左右江地区党和军事的指挥。通知中还指示退往左右江的第四、五大队及教导队，立即开始在左右江实行游击战争，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深入土地革命运动。当时，右江地区的东兰、奉议、恩阳等县的农民协会已改为革命委员会，该地区的局势已被革命力量所控制。

11月初，原从南宁派往香港向广东省委并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了百色^③。中央批准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根据地的计划，颁给成立红七军、红八军的番号，并任命了红七军、红八军的领导干部。

邓小平立即召开前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④。原中央要求十月革命纪念那天举行起义，因准备工作尚未充分，因而决定于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宣布举行武装起义。

会后，前委又派龚饮冰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准备武装起义和贯彻中央指示的情况。龚饮冰出发后不久，党中央来电要邓小平去汇报工作。这时，邓小平和张云逸对右江地区武装起义各项准备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和分工后，邓小平便带领

①《党声周刊》第一期（1931年8月25日出版）。

②1929年10月30日《广东省委通知》。

③1930年8月12日陈导民（即陈豪人）：《七军前委报告》。

④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

几位干部出发前往龙州，拟向左江地区传达中央指示和部署工作后他自己再去上海。但途中遇李明瑞从龙州来百色，邓小平便偕同李明瑞返回百色^①。李明瑞来百色的目的是要警备第四大队与警备第五大队一起配合张发奎反蒋，攻打南宁和广东钦廉，邓小平和张云逸耐心劝说他放弃参加军阀混战的打算，启发、教育他打起红旗，参加革命队伍，并以前委名义，请他在成立红七、八军后担任两军总指挥。结果，这位在旧军队有较高威望、赫赫有名的猛将李明瑞，在党组织的教育、帮助下，加上他自己亲眼看到左右江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和各族工农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烈拥戴，终于毅然表示参加革命。不久，李明瑞回到龙州，与俞作豫一起指挥平息蒙志仁叛乱。邓小平于12月初从百色途经龙州往上海汇报工作时，一方面对左江地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作了检查和部署，另一方面又继续找李明瑞谈心，进一步坚定其革命决心。1930年，李明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邓小平离开百色后，前委工作由陈豪人（陈导民）负责。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和原来的部署，以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为底子和骨干，以韦拔群、黄治峰领导的右江地区各县农民自卫军为主体，组编成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以原第四大队两个营为基础扩编而成，约1000多人；第二纵队由原部分教导总队、原第四大队一个营和恩隆、奉议、思林等县的农民自卫军改编组成，约1000多人；第三纵队由东兰、百色、凤山、凌云等县农民自卫军改编组成^②，也约1000多人。全

^①袁任远：《征途纪实》第5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据张云逸和红七军第三纵队老战士的回忆材料。

军共4000多人。其中右江地区各族工农子弟占三分之二左右，壮族约占半数以上。这些编制，尚未公开宣布，但已在部队中开始进行武装起义的宣传鼓动工作。

与此同时，前委组织起草和印刷有关武装起义的布告、标语、口号、实施政纲和其他宣传品等。至此，起义准备工作已告完成。

12月10日，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百色工人代表大会、警备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会议^①。会上，大家热烈拥护和通过前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和建立红军、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决议。当天晚上，前委又在百色商会俱乐部设宴，邀请百色、奉议两县县长和百色商会要员赴宴，向他们说明成立红军和苏维埃的意义、政策后，为避免泄密，便暂时把他们控制起来。同时，把军政机关中的反动分子和应回避的人员也控制起来，并于当夜收缴了百色公署公安局、禁烟局及百色、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大商团体的枪支共300多支^②。此时，右江地区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12月11日，正值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一面镶有斧头镰刀的红旗在百色城头冉冉升起。这一天，秀丽的百色山城红旗漫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万众欢腾。大街小巷贴满红纸写的革命标语，家家户户悬挂起鲜艳的红旗或五色纸旗。数千各族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市民热烈集会庆祝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和中国红军第七军的正式诞生。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担任军长，邓小平担任军前委书记（后兼任军政委），陈豪人担任军政治部主任。李谦、胡斌、韦拔群

^①^②1936年3月12日陈导民：《七军前委报告》。

分别担任红七军第一、二、三纵队长。军部和前委设在百色粤东会馆里。同一天，在恩隆县平马镇经正书院召开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有百色、恩阳、奉议、思林、果德、那马、凌云、向都、镇结、东兰、凤山等11个县的农民代表和百色、那坡、田州、平马、果化五个镇的工会代表以及红七军士兵委员会的士兵代表等80多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担任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担任委员^①。在11名政府领导成员中，壮族和瑶族的委员占了六名。这是右江各族人民第一次翻身做主人的重要标志。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前委提出的目前实施政纲和有关实行土地革命的决议。

12月12日，在平马镇举行有1万多群众参加的、盛况空前的庆祝大会，庆祝红七军成立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张云逸军长代表前委出席了庆祝大会^②。会后举行盛大示威游行，晚上举行各种文艺活动，各族军民扬眉吐气，尽情欢庆胜利。

随着右江地区各县的相继解放，在红七军的帮助下，东兰、凤山、百色、奉议、恩隆、思林、果德、隆安、向都、镇结、恩阳、凌云、那马、都安、那地等15个县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后来河池县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立即公布《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和《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公开申明我党我军为各族人民谋利益的宗旨和革命主

①雷经天：《广西的苏维埃运动》。

②据陈豪人的《七军工作总报告》和《七军前委报告》。

张。实施政纲主要内容是：“扩大反帝运动用民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推翻乡村豪绅地主的统治，乡村政权交乡村苏维埃。”“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汇合，实现割据两广！”“实行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并制定劳动保护法！”“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乡苏维埃，分给农民”“改良士兵生活，官兵待遇平等！”这些主张基本符合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总路线，符合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也是当时建设和发展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基本纲领和政策。

敌人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妄想卷土重来，曾在百色起义后的第七天和12月下旬，纠集了2000多豪绅地主武装和土匪武装，乘红军主力在田州、平马、果德之机，两次偷袭百色，妄图把红七军和新生红色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但都被英勇的红军指战员所击退。接着，红七军又与各县农民武装相配合，肃清各地反动武装，先后消灭了恩隆县大土豪谭典章、那地的匪营长韦锦成、百色属大所的大地主罗肇修、罗肇高等反动武装，保卫和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

1930年1月，粤桂军阀混战。红七军前委认为桂系军队的主力被粤军牵制在柳州、桂林一带，无暇顾及南宁，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便作出进攻南宁的决定，约定红七、八军主力于2月8日到达南宁附近会合，然后夺取南宁^①。但是当时的粤桂战争仅仅杀成“隔江对峙之局”^②，加上红七军在

^①1931年3月9日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

^②《李宗仁回忆录》（下册）。

进军南宁前，过早公开进攻南宁的口号，事先惊动了敌人，新桂系军阀立即改变战略，决定以南宁和左右江地区为后方，然后再攻钦廉粤军，便命令熟悉右江地形的师长李画新（李琪）为总指挥，率四个团的兵力，“自梧浔线转邕”^①，先向右江根据地的前哨隆安县城大举进攻。开始，红七军驻守隆安的只有三百多人，战斗开始后增援部队才陆续到达。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与敌激战四昼夜，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重创敌人的有生力量后，被迫撤出战斗，向平马一带撤退。在平马赤卫军配合下，袭击了驻平马城外马鞍山的敌军据点，曾追敌至平马城下，又主动撤出战斗，向根据地大后方的东兰、凤山方面转移。当撤到恩隆县北部的亭泗村（今属巴马县）时，又遭到敌蒙志仁团的截击，双方经过三个小时激战后，敌人溃逃，红军顺利进入凤山县盘阳区赐福乡（今属巴马县）休整。前委在盘阳举行了会议，会议根据当前新的形势，决定留第三纵队在东兰、凤山一带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和建设，第一、二纵队则由总指挥李明瑞和军长张云逸率领，出发到黔桂边界开展游击战争，以扩大政治影响，避开敌人注意力，解决军需供给问题。

红七军主力出发后不久，邓小平恰从中央汇报工作后回到右江地区，于4月初到达东兰县武篆区。这时，右江沿岸各县城已被敌占领，红七军一、二纵队已转战到黔桂边。邓小平便决定留在武篆^②，与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一起，着手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和根据地建设工作。

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根据井冈山土地法和东兰土地革命的试点经验，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5月15

^{①②}据1931年8月22日，王玉树关于红七八军情形的报告。

日，又以右江苏维埃政府名义，颁发了《共耕条例》。在《土地法暂行条例》中，对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对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的原则，对分配土地、耕牛、农具的方法，以及对发展农业、商业的措施和税收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成为后来右江地区各县开展土地革命的准则。对于《共耕条例》，只要求在群众政治觉悟高、干部力量强的乡村试行，并强调“各乡得按照实际情况执行”。

在此同时，右江苏维埃政府把各县农民赤卫军编成四个直属常备营，成立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部，由黄治峰担任总指挥。其主要任务是配合红军保卫革命根据地，并在敌人占领的地方进行游击战争。

张云逸、李明瑞率领军部及一、二纵队3000多人从盘阳出发后，经南丹八步，于同年4月初到达河池，在河池帮助成立了农会、工会、妇女会和县革命委员会^①。后经怀远、思恩，进入贵州边界，4月30日到达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老巢榕江县城下，经过一天激战，攻占县城，歼敌一个团，并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5月1日，召开群众庆祝大会，宣传共产党主张，并将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随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从贵州回师河池。邓小平闻讯立即前往河池与李明瑞、张云逸等会面，在河池召集了一次党员大会^②，传达从上海带回的中央指示精神，讨论红七军今后的行动方针，决定利用粤桂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一、二纵队回师右江地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壮大红军，然后再向外发展^③。此时已是6月初。会后，邓小平与李明瑞、

^{①③}1930年3月9日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

^②1931年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

张云逸率领第一、二纵队收复了百色重镇。接着，挥师东进，连续收复了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恩阳等县城，与东兰、凤山、凌云等县连成一片。7月初，当滇军奉蒋介石之命假道右江地区去进攻南宁的桂军时，被红军在果化鹧鸪坳伏击，这一仗虽然不利于集中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去打击当前主要敌人，但也打击了滇军盛气凌人的嚣张气焰。

这时，根据地形势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红七军前委便集中精力，在根据地进行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军事和党政等方面的建设。

（一）广泛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就根据中共“六大”提出的“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民”的精神，先后通过颁布《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行政纲》、《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右江苏维埃政府通令》、《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等文件和印发《土地革命》等宣传小册子，对土地革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邓小平在东兰县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后，右江苏维埃政府正式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根据各族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军前委按照这两个条例（主要是第一条例）和东兰县的做法，在右江地区各县条件成熟的乡村，普遍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前委在平马开办一期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党政干部训练班，每期参加学习的有各县党政干部50多人，邓小平曾亲自给学员讲课。右江地区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是：“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土地”，“没收一切反革命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分配方式一是“平

分”、一是“共耕”两种办法，由各乡在苏维埃大会中自己选择。结果，除东兰、凤山两县个别乡试行共耕外，其余多是采取平分土地的办法^①。这段时间，军前委和右江特委曾分别发出有关土地革命的通告、指示，发现问题，及时给予纠正。如1930年9月19日发出的《中共右江前委^②通告》（第七号）、1930年9月14日发出的《中共右江特委通告》等。中共东兰县委也于1930年8月2日发出《土地革命问题》的指示，明确强调执行“土地革命的总路线”和“土地革命的策略”，“以鲜明反地主阶级的目标”，“统一乡村反豪绅地主的战线”，“消灭独占土地的地主以解决社会的矛盾”。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右江地区的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思林、果德等县的部分乡村都进行了普查土地、烧毁土地契约、废除债务、没收地主豪绅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工作^③。广大各族贫苦农民分到土地后，扬眉吐气，革命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更加热爱红军和新生政权。但运动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开展早一点，分了地当年就获得好收成，不少地方由于开展较迟，刚分配完土地或尚未分配土地，红七军主力便离开了根据地，不久敌人来进犯，土地又被地主豪绅夺回去。

（二）加强军事建设

为了总结红七军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整顿组织，提高全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水平，红七军前委于同年7至9

^①1931年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

^②即红七军前委。

^③1931年8月9日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

月集中在平马、奉议一带进行全军整训。其主要做法是从总结经验教训入手，通过首长作报告，学习有关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全军指战员进行一次政治思想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和军事技术教育。同时，前委在平马组建了军部教导队，培训各纵队连排干部。通过三个月时间的整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一般士兵觉悟也相当提高。党的工作也建立了相当基础”^①。部队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各级设有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同时，扩大、补充了部队，据1930年8月统计，仅东兰、凤山两县农军加入红军的就有6000人左右^②。当时，每连队均补充八九十人，并新组建了第四纵队，由黄治峰担任纵队长。至此，全军共有7000多人。成为全国一支瞩目的人民军队。

为了保证红军军需供给，红七军在东兰县武篆勉峨屯、思林县兰芳村、果德县四弄等地开办了小型兵工厂；在平马等地开办了红军被服厂和铸银手工场。

此外，红七军还派干部帮助各县整顿、训练赤卫军。在红七军帮助下，各县地方武装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东兰县各区乡均有“农民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妇女赤卫军（以后男女均编为农民赤卫队，没有妇女单独的军事组织）的组织，全县的农民群众均已参加军事组织。”^③至1930年10月，整个右江地区的地方武装发展到近万人^④。

（三）加强党政建设

红七军前委为加强对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在百色

①1931年3月9日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

②③1931年8月1日：邓拔奇给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的通讯。

④据1960年3月《张云逸同志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

起义后不久，军前委便于1929年12月20日发出了《红七军前委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对健全党的组织系统、健全支部生活、实行党内民主化、培训党的干部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但因战事繁忙，军队和地方党组织建设工作尚较薄弱，加上当时的党员，大多数来自农民小资产阶级，存在不少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红七军回师右江后，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工作，先后发出了《前委通告》第六号、第七号，指出当时右江“党的任务是发展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加紧党的政纲的宣传”“加紧纠正过去许多的错误，正确的执行深入土地革命、改造苏维埃、赤卫军的工作”。为此，军前委和右江特委在努力发展党组织的同时，通过举办训练班和支部活动等形式，组织党员学习军前委印发的《党员须知》，以此为中心内容。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政治理论教育、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除了1930年4月间邓小平等在东兰武篆旧州屯举办党政干部训练班外，前委还于1930年七、八月间在平马举办党政训练班，各级党组织也先后举办了短期的训练班。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右江地区的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党员干部的素质也有较大的提高。据统计，至同年11月河池整编前，地方党员共有1500人^①，军队党员有500人。在军前委领导下，各纵队设有纵队委，各营设有营委，各连设有支部。“各连差不多均有支部组织，支部都能开会讨论问

^①1930年9月9日：《前委通告（第六号——目前政治形势和右江党的策略》。

^②据1930年8月22日王玉树《关于七、八军情形报告》。

题”，“一般同志革命情绪甚高，对革命前途颇抱乐观”^①。

在政权建设方面，既以中央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为榜样，建立、健全各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又根据右江地区的实际，充分发挥壮、汉、瑶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选拔和积极支持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红色政权的管理工作，根据地的地方党政机关干部中，除了少数是外来干部外，多数是本地壮、汉、瑶等族干部。部队中的连排干部，大多数也是本地各族干部。通过实际斗争锻炼，一批土生土长的各族党政干部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在各级政权中，发挥了党与各族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作用。

在加强党政建设的同时，右江革命根据地还注意加强群众组织（包括工会组织、农民协会组织、青年团组织、儿童团组织、妇女会组织、赤色救济会组织等）的建设，发动和组织广大各族群众参加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和建设。

（四）加强文化教育建设

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的方针是：“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②。“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劳动儿童，免费入学，推翻旧礼教，创造好风俗”^③。为了执行这一方针，各县苏维埃政府内设立文化委员会，区和乡苏维埃政府设立文化委员，专人管理文化教育工作。当时，有条件的地方都创立各级劳动学校和农民夜校。如百色县曾把省立第五中学改为广西劳动第一中学，由百色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

①1931年3月9日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

②《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

③《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会主席、中共党员杨柳溪担任校长；还把百色模范小学改为百色县劳动第一小学。东兰县城创办了高级劳动小学，由中共党员白汉云担任校长。各类劳动学校，面向工农子弟，不收学费。为了帮助文化比较落后的瑶族地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东兰县苏维埃政府曾拨出专门经费，在西山16个乡办起初级劳动小学，8至16岁的适龄少年儿童都得免费入学，教师由县苏维埃政府派出，学校经费全部由县供给。各校课本一律采用右江苏维埃政府编印的教材，如《工农兵识字课本》等。

各级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宣传演唱队，运用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粤曲等形式，大力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既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又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三、龙州起义和左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与右江地区毗邻的左江地区。西部和西南与越南接壤，东及南宁、钦州，北连镇结、隆安、向都，南靠十万大山。境内多是贫瘠的山地和丘陵，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历史上曾被称为“蛮烟瘴雨”之地。居住着以壮族为主的包括壮、汉、苗、瑶等各族人民。作为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龙州，是桂西南边陲的重镇和战略要地，1885年中法战争后，被开辟为帝国主义的商埠。旧桂系陆荣廷、谭浩明曾发迹于此。旧桂系垮台后，新桂系又接着经营，因此，这里的反动基础比较深厚。但各族人民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斗争传统，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左江地区各族人民便参加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进行抗法斗争。1907年，孙中山在镇南关发动起义时，凭祥等县人民也起而响应。1922年，壮

族进步青年高孤雁等人在龙州下冻小学任教时，曾热情向学校师生和农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为该地区革命运动的兴起做了启蒙工作。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陈霁、易挽澜等被派到该地区领导农民运动，成立了“镇南道农民协会办事处”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县的农民武装仍坚持武装斗争，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1929年10月中旬，俞作豫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到达龙州后，也同右江地区一样，积极地进行军事暴动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作。他们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和左江地区的实际，先后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如下工作：

（一）打着俞作柏、李明瑞的旗号，由俞作豫就任广西全边对汛督办公署督办，接管督办公署事务，收编了督办公署直辖的13个武装巡逻队和原留守在龙州的新桂系吕焕炎师部教导队400人，并在邕宁、宁明、明江、龙州、凭祥等县新招募一批新兵，分别编为警备第五大队第四、五、六营，使原来警备第五大队的三个营1000多人扩大到六个营2000多人。此外，对当地土匪武装采取剿抚并重的政策，先后收编了龙州的黄飞虎和养利的冯飞龙部，分别改编为第一、二路游击队，委任冯飞龙、黄飞虎为第一、二路游击队司令。同时，以对汛督办公署名义，先后委任了龙茗、万承、宁明、明江、养利等县县长，这为稳定和发展左江地区的革命形势打下了基础。

（二）在收编、扩大部队的同时，派出一批干部，深入农村、城镇，宣传、发动各族工农群众，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和工农武装组织。在第五大队的帮助和何建南领导下，龙州县下冻区东、西、南、北四乡的农民协会很快恢复发展起来，会员共有2000多人。在组建农协会基础上，每乡

组建了一支有 100 多人枪的农民赤卫军连，下冻区成立农民赤卫军大队，共 500 多人枪，由何建南兼任大队长。接着，龙州县城在 14 个行业工会相继成立的基础上，成立了县工人联合总会和龙州县工人赤卫队，后又以龙州县工人赤卫队为基础组建成左江工农赤卫大队，共有 1000 多人枪。由何建南任大队长，邓生为副大队长。队员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其它各县的工农群众运动也迅速恢复、发展起来。至龙州起义前，共有 11 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会员约 3 万人，部份县建立了工会，仅龙州工会会员便有 2000 人。各县共建立工农赤卫军武装五六千人^①。为了加强地方工农武装的装备力量，第五大队曾把从南宁运去的部分武器和没收吕焕炎留在龙州军械仓库的武器弹药，一起分发给龙州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赤卫军。使他们后来成为龙州起义中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地方工农武装。

（三）平定蒙志仁叛乱。1929 年 11 月中旬，李明瑞与俞作豫商议决定：趁粤桂军阀混战桂平、贵县一带，南宁守敌空虚之机，由俞作豫率部队攻打南宁，李明瑞则前往右江联络第四大队会攻。当俞作豫率第一营为先头部队乘船东下到达驮芦时，警备第五大队副蒙志仁被桂系军阀所收买，竟胁迫从陆路前进的第二、四营等后续部队退回龙州，实行叛变。当时留守龙州的只有新编的第六营和部份机关工作人员，被迫退出龙州。俞作豫获悉后，立即放弃进攻南宁计划，率队从陆路日夜兼程回师平叛。29 日，俞作豫率队抵达距龙州县城 20 多华里的上龙乡水窿村时，恰遇见李明瑞率卫士队和一个步兵连从右江回来，立即召开排长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分析敌我形势，决定发动工人赤卫队和农

^①1930 年 2 月 8 日左江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

民赤卫军助战，合围龙州城，并断绝叛军的粮草。当晚，连夜分兵四路进攻县城，双方展开激烈战斗。经过三天三夜激战，击毙叛军营长潘益和参谋长王国连等官兵100多人，蒙率残部溃逃南宁。12月4日，光复龙州城。

平定蒙志仁的叛乱后几天，邓小平率领何世昌、严敏等一批党员干部从百色来到龙州，传达中央关于建立红八军的指示和最近在百色召开的红七军前委会议精神，分析、研究龙州的形势，与他们共同制订发动龙州起义和起义后的工作计划大纲。前委原要求龙州于12月11日与百色一起同时举行武装起义，因龙州发生蒙志仁叛乱，而决定推迟起义日期，待条件成熟时才宣布起义。邓小平部署好工作后，便从龙州经越南、香港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四）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吸取蒙志仁叛变的教训和借鉴右江地区改造警备第四大队经验，加紧整顿改造部队工作。当时，第五大队的编制不健全，原来六个营只存下第一营和新编第五、第六营的一部份。他们便以第一营为基础，加上新编进来的部份农民赤卫队和边防巡逻队，合编为一个旅，番号改为“讨蒋南路军第一军第二旅”，李明瑞为总指挥，俞作豫为旅长。下设二个团六个营。原第一、第二路旅击队的番号和组织不变，先后委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部队和旅击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为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成立了中共左江军委（后改为中共红八军军委），先后由徐开先、宛旦平、何世昌负责^①。

在改编部队的同时，着手对部队进行整顿、改造工作，开展革命的宣传教育活动和民主运动，成立士兵委员会，发

^①1930年涂毓吾（即涂振农）：《红军第七军报告》（给苏代会）。

动士兵揭发和批判旧军官中的军阀作风。对个别坚持反动立场和军阀作风的旧军官（如第一团团长江凤川），则采取挖基倒墙、赶虎出山的办法，礼送出境。这对纯洁组织内部、团结教育广大官兵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干部力量薄弱，对部队的整顿工作仍不彻底。

为了加强对左江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同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派王逸（龙州起义失败后逃往香港）、林礼（后牺牲）等到龙州负责党的组织工作，12月15日建立中共龙州县委，由王逸担任县委书记^①。县委成立后，发展了几批新党员，党员人数由7人增至34人。接着，派党员到凭祥、崇善、养利等县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

1930年2月1日，威震中外的龙州武装起义胜利举行。它与百色起义相呼应，沉重打击了国内外阶级敌人，极大地鼓舞了南疆边陲各族人民。

当天，龙州古城，张灯结彩，红旗飘扬，1万多军民在新填地广场举行庆祝大会。会上，庄严宣告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八军军长为俞作豫，政委邓小平（兼），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参谋长宛旦平，左江革命委员会主席王逸。同时宣布李明瑞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红八军以原警备第五大队（后改为讨蒋南路第一军第二旅）为基础扩编而成，下辖两个纵队，何家荣、宛旦平分别担任第一、二纵队长。全军共3000多人。

当天晚上，红八军党委和龙州县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中共龙州县委改为中共广西左江特委^②，由王逸担任书

^{①②}1930年2月8日左江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30年涂德吾：《红军第七军报告（给苏代会）》。

记，加强党对地方的领导。

随着左江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龙州、凭祥、上金、养利、崇善、龙茗、左县等县革命委员会也在2月中旬前相继成立。雷平、思乐、宁明、明江等县，有的已委任了县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后因形势变化，尚未正式成立。但这些县已在左江革命委员会控制的范围之内。邕宁县、上思县部份地区也成为游击区。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均有少数民族的干部担任委员。如左江革命委员会中，便有何建南、杨春秀、周和平、张兆梅等壮族干部担任委员，发挥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

红八军成立后，向各族群众公布了《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行政纲》，主要内容是：“扩大反帝运动，用群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工农兵联合行动，以阶级战争消灭国民党军阀战争”；“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苏维埃政府，建立乡村苏维埃，彻底推翻豪绅地主统治”；“实行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增加工资”；“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乡村苏维埃处理，发给土地使用证，分配土地给农民”。此外，还颁布了劳动法二十二条、土地法二十六条^①。这些政纲和法令体现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和“六大”精神，指导和推动了左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2月7日，邓小平从中央回到龙州。他在龙州召开了红七军军委和左江特委联席会议^②，传达中央有关指示，分析龙州形势，制订以龙州为中心发动左江土地革命的工作方

①②1930年涂镜吾：《红军第七军报告（给苏代会）》。

针。会议决定将红八军军委改组为红八军临时前委^①，由邓小平任书记（邓小平离开龙州到右江地区后由何世昌代理，并决定由涂镜吾接替王逸担任左江特委书记，以加强党对地方工作的领导。特委下辖3个特支9个支部^②。在此会前，邓小平根据中央不打南宁的指示和敌我力量情况，立即电令红七军、红八军停止进攻南宁（电令发出时，红七军已在隆安失利），指示红八军迅速向右江革命根据地靠拢。这些分析和指示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的，只是因为当时红八军一些主要领导人贯彻不力，思想轻敌麻痹，故造成后来不应有的损失。

龙州起义严重打击法帝国主义在左江地区的势力，故他们对龙州起义极端仇视，又是造谣、诬蔑，又是多次发出照会，扬言要“越南总督拨派武装卫队55名及机关炮车一辆”^③进驻龙州，甚至派出飞机入侵左江地区，武装干涉我国内政。法帝国主义在龙州的领事馆和天主教堂，明目张胆窝藏龙州反动地主豪绅的大批武器和金银财物，这更激起了广大军民的无比愤慨。为了打击法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3月12日，龙州《工农兵报》发表《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郑重提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等四项严正声明。接着，于2月19日，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县城体育场召开了一万多军民参加的声讨帝国主

①1931年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

②1930年涂镜吾：《红军第七军报告（给苏代会）》。

③1930年2月：《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

义罪行的群众大会。大会发出通电，反对法帝国主义无理干涉中国内政，并用英、法两种文字电告全世界。会后举行示威游行，还没收了洋人的不法财产和窝藏在领事馆、天主教堂内的豪绅地主财产，驱逐了七、八个破坏左江革命的法国领事、武官、传教士等出境。崇善、凭祥等县也采取了行动，与法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了直接斗争。当时，党中央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左江军民的反帝斗争。1930年2月12日发出九十二号《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声援广西的反帝斗争。3月22日，中共中央出版的刊物《红旗》，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赤色的龙州》的社论，赞扬龙州军民的反帝斗争“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反封建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号召“全中国的革命群众，起来援助龙州的苏维埃，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国民党军阀”。这给左江地区各族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红八军在开展反帝斗争的同时，为保卫革命根据地，立即派出主力部队，分赴各地游击、剿匪，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第一纵队先后到崇善、雷平、靖西等县游击，在雷平太平镇，发动群众清算当地土皇帝李昭和李德普的罪恶，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人民，并根据群众要求，枪毙了李德普，为群众伸冤除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第二纵队到凭祥、宁明、明江等县游击，攻下了土匪占据的宁明县城，枪毙了勾结土匪的明江县反动县长。俞作豫亲自率领一营红军到上金、龙州下冻剿匪，打击地方反动武装。

为了培训军政干部，红八军在龙州县城开办了“中国红

军第八军军事政治训练学校”。俞作豫任校长，宛旦平任教育长，甘湛泽任总队长。甘湛泽带领该校100多名学员到下冻一带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工作。当时，正值春耕季节，为了不误春耕生产，学员们一面配合农协会干部丈量、登记土地，一面组织群众实行共耕。在他们的宣传发动下，下冻区的河渡、坡目、农招、那造、那城等村都相继实行了土地共耕。后因敌人进犯，土地革命未普遍开展。

为了发挥工人阶级的作用，2月上旬，龙州召开了全市工人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150多人，邓小平参加了大会，并给大会作政治报告^①，大会号召广大工人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反资方的斗争，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在龙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为了赶回右江地区传达中央指示，便于2月下旬离开龙州，途经雷平县城宝圩时，帮助正在那里休整的第一纵队建全党委会，并率该纵队攻打盘踞在靖西县城的郑超叛军，以便打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联系通道。邓小平在攻城战斗开始后几天，前往右江地区。当第一纵队经过七天激战，正准备竹梯爬城歼敌时，纵队部与龙州军部的电话联系突然中断，估计龙州出了问题，便决定放弃攻城计划，挥师回援龙州。

原来，新桂系军阀得悉红八军主力已分赴各地游击，龙州城防薄弱，便趁机命令其驻南宁的第十五军第一师师长梁朝玘率四个团兵力，并勾结地方反动武装约4000多人，分两路沿邕龙公路和左江北岸向龙州进犯。3月20日，龙州新填地广场上正举行追悼革命烈士何建南的群众大会。红八军对敌人的偷袭行动事前毫无察觉，当敌人直逼龙州城下，枪声

^①1930年涂镜吾：《红军第七军报告（给苏代会）》。

大作时，才仓促应战。红八军驻守龙州只有军部卫士队、二纵队一个半营，加上农军、赤卫队，不足2000人。战斗发生后，俞作豫军长率领卫士队巡视各个阵地指挥抗敌。但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一纵队未能赶到，红军浴血奋战一天，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后，俞作豫率领军部和第二纵队突围撤出龙州，转战到凭祥、宁明、明江、思乐、崇善、绥淦、扶南、邕宁、钦县（现钦州市）等地。到达钦县县属的南间圩时，俞作豫迫于形势，决定自己率30多名党员政工干部离开部队，把军权交给营长刘定西指挥。后刘定西带着留下的几百名官兵，接受了军阀的改编。俞作豫辗转钦县、邕宁后赴香港寻找党组织汇报情况时，因在香港误与叛徒接头，在深圳被敌诱捕，同年9月6日在广州壮烈牺牲。

红八军第一纵队从靖西赶到雷平，便接到龙州失陷的消息。这时，敌人已把主要力量指向第一纵队，在四面受敌的严重情况下，纵队党委决定按邓小平的指示，转移到右江地区与红七军会合。但当时与红七军尚未取得联系，情况不明，不能从正面冲过去，便决定避开敌人的正面攻击，从雷平绕道沿中越、桂滇边境北上前进，路经靖西的岳圩、云南富宁县的田蓬、板仑、剥隘、田林县的利周、在凌云县的彩架遭到敌人的伏击，损失100多人，后转到贵州省望谟县的蔗香圩暂驻休整，终于在1930年10月下旬，在凌云县讲肥村岗里屯（今乐业县上岗村）与前来迎接的红七军第一纵队第一营胜利会师。红八军一纵队前后苦战行程数千里，历时半年。与红七军一纵队一营会师后到河池县编入红七军。

四、红七军主力北上与右江革命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李立三等人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不久，李立三等人又作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先后命令红一军团、红二军团、红一军、红十军、红七军分别去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幻想实现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

同年9月底，红七军前委正拟向外游击发展，这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邓拔奇）来到右江地区的平马镇。10月2日，红七军和平马召开前委会议^①。会上，邓岗传达了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和中央要红七军离开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指令。同时，邓岗还传达中央对右江工作的批评，说右江的土地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显然，这个批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红七军前委成员听了邓岗传达后，展开了热烈的争论。邓小平和张云逸等认为：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以红七军现有几千人的力量，去执行那样大的任务是困难的。邓岗、陈豪人、龚鹤村则坚决主张执行中央的指令^②。经过一番争论，为团结一致对敌，前委会议终于接受中央交给红七军的任务，决定集中全军到河池整编，并在河池召开全军党代会，贯彻中央指示精神。

^①1931年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

^②据1960年3月《张云逸同志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

会后，邓小平和邓岗于10月6日从平马出发，到恩隆县北部的燕峒时召集有百色、奉议、恩隆、恩阳、思林、果德等县、区苏维埃负责干部70多人参加的会议^①，贯彻中央指示和平马前委会议精神，指出红七军主力离开后，根据地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要求各地抓紧整顿党组织，纯洁内部，整顿、扩大赤卫军，迅速建立县、区常备武装部队，并加强军事训练；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坚定革命到底的信心；组织群众抢收农作物，收藏好粮食，防备敌人进犯。邓小平和邓岗部署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工作后，便前往东兰县，与韦拔群一起率领第三纵队到河池集中。

11月初，红七军四个纵队和红八军第一纵队余部分别集结于河池。途中各纵队抓紧进行党代会的各项准备工作；组织各级党组织讨论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及今后的行动方针；选举出席全军党代会的代表，健全党内民主制度。

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在河池召开^②。大会主要议事日程是：一、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作政治报告，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和中央给红七军的指令；二、红七军前委作过去工作报告；三、讨论目前政治形势与红七军党的任务；四、选举前委，会上，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袁振武、许进、许卓、李朝纲、黄一平等被选为前委委员，龚鹤村、胡鹤林、杨英为候补委员^③。邓小平仍为前委书记，陈豪人为兵委书记。大会决定接受中央交给的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指令。

^①据黄明高：《燕峒会议的回忆》。

^{②③}1931年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

党代会闭幕后的第二天，部队进行整编，全军改编为师团制。主要领导人是：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前委书记兼政委邓小平，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下设三个师：以第一、三纵队合编为第十九师，师长龚鹤村（兼），政委邓小平（兼），下设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团；以二、四纵队和红八军余部合编为第二十师，师长李谦，政委陈豪人（兼），副师长黄治峰，下设五十八、五十九两个团；第二十一师（待组建）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松坚。全军共7000多人^①（不含二十一师）。前委决定：第十九、二十师出发执行中央任务，第二十一师留在右江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

部队整编、检阅后，韦拔群率几十名老弱战士返回东兰，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率领十九、二十师于11月9日从河池出发，踏上艰苦的征途。出征后，他们原准备经庆远（今宜山县城）攻打柳州，因庆远守敌有防备，便绕道渡过龙江到罗城，在罗城四把又遭顽敌阻击，激战后撤往三防，在三防稍事休整后，指挥部决定按原计划，拟经融县（今融安县）过融江攻打桂林。12月5日，红七军攻打融县长安镇，没有攻下，撤往桂黔边的三江富禄镇，前委派人往桂林了解情况，后得悉柳州、庆远的敌人已移师桂林布防，便转向湖南的通道、绥宁进发。这时，已是雪花纷飞的寒冬，广大指战员穿着单衣、草鞋、忍饿挨冻，翻山越岭。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决定攻打湖南武岗县城，未克，即向广西全州撤退。1931年1月初，前委在全州举行会议，讨论中央的命令是否行得通和部队去向问题。会议在邓小平、张云逸、

^①1931年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

李明瑞等的努力下，通过总结离开根据地以来艰苦转战的教训，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改变硬打攻坚战略，拟将部队开往湘粤边，到江西汇合中央红军^①。会后，邓岗和陈豪人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便率队向湖南江华进发，发现湘军已在宁远、蓝山一带布防拦截，便离开江华，在敌人夹缝中大踏步前进。到湘桂粤三省交界的广西桂岭圩进行休整，把部队缩编为两个团后，挺进广东的连县、乳源县（今乐昌县）。拟在乳源县一带建立根据地，但红七军到达乳源县梅花村第二天，遭敌三个团围攻，被迫与敌人血战五小时后退出战斗，此战伤亡很大，遂决定北上江西与朱毛红军会合。1931年2月5日，红七军在粤北的杨溪附近强渡乐昌河（又名武水），被敌截为两部：邓小平与李明瑞等率领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份渡过河后，向江西崇义前进，在崇义帮助地方建立政权和武装，进行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后经团委（当时军前委改为团委）研究决定，邓小平离崇义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张云逸率领未能过河的其余部队，转到坪石以北渡过武水，经桂东进入湘赣根据地与湘赣独立师第三团会合。1931年4月，李明瑞和张云逸分别率领的红七军两部份部队在江西永新县重新会合。旋即与红二十师、独立一师等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先后打了安福、茶陵、安仁等几个大胜仗，配合中央主力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同年7月，红七军到达江西于都县桥头圩与彭德怀率领的中央红三军团胜利会师。在这漫长的征途中，红七军前后行程达7000多里，历经桂、

^①据1960年3月《张云逸同志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和1931年3月9日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

湘、粤、赣四省，时间10个月。英勇粉碎了敌人多次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终于实现了“汇合朱毛红军”的愿望。此后，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份，编入红三军团序列^①。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后不久，正值滇军在南宁败退，新桂系军阀在追击沿右江溃退的滇军时，乘机侵占了右江沿岸的果德、思林、恩隆、恩阳、奉议、百色等县县城。

韦拔群参加河池整编回到东兰武篆后，即与陈洪涛、黄松坚等商量组建二十一师和坚持根据地革命斗争问题，决定把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果德等县的赤卫军常备营扩编到二十一师来。下辖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和独立团共四个团。各县新建赤卫军常备营，区、乡建立赤卫队。1931年1月上旬，师部在恩隆县七里区乙圩（今属巴马县羌圩）举行廿一师成立庆祝大会。到会各族军民5000多人，韦拔群和陈洪涛在会上号召大家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战斗，保卫革命根据地，坚持到红七军主力打回来。

会后，刚组建的二十一师，立即投入保卫、巩固根据地的艰苦斗争。韦拔群抓住敌人未进犯的时机，一方面指挥部队扫荡各地残余反动武装，巩固内部；另一方面，举办军政训练班、地雷训练班等，培训各种军事政治技术干部，准备与反革命势力决斗。在此同时，各县党政机关和赤卫军转移到山区农村活动。中共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迁到恩隆县七里山区的那拔村（现属田东县那拔乡）办公。

1931年3月，新桂系军阀为镇压革命，调派廖磊（先任

^①袁任远：《征途纪实》第71页。

第七军十九师师长，后任第七军副军长、军长）纠集1万兵力，分三路从东、西、北面大举进犯东兰、凤山根据地，敌人摆下大包围圈的阵势，采取步步为营、分进合击的战术，并命令东兰、凤山、凌云等县民团给予配合，企图在东兰、凤山消灭红军，摧毁右江革命根据地。

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情况下，中央右江特委和二十一师的领导成员冷静分析敌我形势，决定动员军民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避开敌人锋芒，运用“敌少我打，敌多我盘旋打圈子”的灵活、机动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发挥土地雷的作用，抗击进犯敌人。并根据各路进犯敌人的兵力强弱，作了周密战斗部署。师部转移到地势险要的东兰与凤山边界的西山，以此为基地，指挥各地反“围剿”斗争。

3月中下旬，敌人攻占东兰县城。接着，廖磊设指挥所在武篆，指挥三个正规团开始向东兰、凤山根据地中心的西山、中山和东山进犯。敌人所到之处，兽性大发，见房就烧，见人就杀，见洞就搜，见水就放毒，见农作物就放马踏毁。原来生机勃勃的根据地，在敌人的残暴践踏蹂躏之下，变得满目疮痍，赤地千里。

韦拔群和陈洪涛获悉敌人重点“搜剿”“三山”的消息后，便在西山弄峒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动员各族军民。坚壁清野，内线坚守、抗敌，外线游击，歼敌。在右江特委领导下，各地一面抓紧进行春耕生产，一面做好坚壁清野和转移群众工作，使敌人每到一处，要粮无粮，要柴无柴，要菜无菜，而迎接敌人的是使敌人胆颤心惊的土地雷和一张张《骂国民党反动派四字经》、《告国民党军阀士兵转变为红军四字经》等传单。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仅被地雷炸死、炸伤的官兵不下千余人^①。

在此同时，驻守凤山的红军六十三团在隆山寨猛烈打击黔军王海平部后，又利用黔军与桂军的矛盾，展开政治攻势，运用离间计，使黔军两个团哗变。当黔军与桂军互相撕打时，红军乘机袭击黔军和攻占凤山县城，黔军只剩下二、三百人，狼狈逃回贵州，解除了北面敌人的包围。

战斗在右江沿岸的红军六十二团和独立团，与广大各族群众一起，也英勇袭击进犯敌人。1931年3月，当敌人疯狂进犯东兰、凤山时，滕国栋率领六十二团，在七里山区配合六十一团牵制和阻击了两个团的敌军。7月，黄书祥指挥独立团和向都县赤卫军1000多人，攻占了向都县城，赶走了反动县长，打开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革命青年和群众。当时南宁的报纸，曾惊叹右江沿岸的田州、平马、思林、果德、向都城镇，“均已陷入于严重的状态中”^②。这些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东兰、凤山根据地反“围剿”斗争。

5月，因军阀战争继起，新桂系军阀为了向外发展，命令廖磊率队撤出东兰、凤山，开到田州、平马，以便出兵湖南参加反蒋战争。至此，敌人对东兰、凤山的第一次“围剿”宣告破产。本来，廖磊扬言三个月摧毁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但其结果，正如解放前国民党一随军记者编的《东兰痛史》所哀叹的：“军因分山搜剿，计已期月，所捕获者，不过是顽瑶羸汉，毫无伤红匪”。

8月，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道生来到右江地区，传达中央关于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整编红军和地方政权的指示。为了贯彻中央指示，中共右江特委在兰泗孟乡丘板屯召开

①②1931年8月1日，邓拔奇给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的通讯。

扩大会议，决定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把红七军二十一师的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①（又称右江独立师），师领导成员和下属三个团的番号不改变；把右江苏维埃政府改为右江革命委员会，由黄举平担任主席；各县苏维埃政府也改为县革命委员会。

会后，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和陈道生率师部直属队和六十一团（团长、政治指导员分别由韦拔群和黄松坚兼）800多名战士从西山经中山到东山的苏托、苏邦、麻品峒一带进行整训。六十二团（后独立团并入该团）团长滕国栋、指导员黄书祥和六十三团团长沙国英、指导员兰志仁等也率该部队回原地整训。通过整训，传达贯彻了中央指示精神，总结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了反“围剿”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同年11月，新桂系军阀为了消除向外发展的后顾之忧，除了抓紧组织各地民团，巩固其统治基础外，又“不惜繁费浩饷”^②，调集第四军三个团、第七军一个团加特务营和各县民团共7000多人，开始向东兰、凤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进攻重点，仍是西山和中山、东山。红军仍采取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利用西山的有利地形，时而据险伏击，时而主动出击，灵活机动地袭击敌人，敌人在西山仍找不到我红军的主力，屡搜空回，“不能一次奏功”^③。

1931年12月底，中共右江特委会和中共红军独立第三师党委在西山朝马峒召开特别常委会，决定缩编红军队伍，化整为零，取消团、营、连编制，把枪支集中埋藏起来，把骨

^①1931年9月1日，邓拔奇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

^{②③}《东兰痛史》（下编）。

干分子组成10个杀奸团，每团30人左右。这些精悍的杀奸团，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2年1月下旬，中共右江特委和红军独立三师党委又在西山弄京果六峒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为保存党的干部力量，决定抽调黄松坚、黄举平、黄大权等30多位干部，分两路到外线的黔桂边和右江下游去开辟游击新区。同年4月，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兼东兰县委书记黄举平率15名干部到达黔桂边，会合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韦国英等，先后建立了中共黔桂边委员会和黔桂边革命委员会，领导南丹、凌云和贵州省罗甸一带人民的斗争；黄松坚和黄大权则率领20多位干部到达右江下游，会合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原六十二团领导人滕国栋和黄书祥等，先后建立了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委员会（后改为中共右江下游党委）和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领导右江下游军民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1934年，黄松坚又带领精干的红军小分队，挺进滇桂边，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并扩建了一支有1000多人枪的武装部队，开辟了云南省富宁县七村九弄的游击根据地。

同年6月1日，中共右江特委发出《为时局告群众书》，指出“右江革命虽暂时受挫折了，但是全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还是向前发展。”号召各族人民在党领导下，“坚决奋斗到底”！

在这段时间里，右江下游的黄书祥与陈鼓涛（中共向都县委书记，后牺牲）等，率领红军和农民赤卫军和平治、果德、那马和向都一带与敌人周旋，伺机打击敌人。

1932年8月，蒋桂军阀矛盾暂趋缓和，新桂系军阀又增派近一万兵力，对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第

三次反革命“围剿”。白崇禧在南宁召开了专门军政会议，制订“军事经济政治同时并进”的“进剿”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敌人采取“缩网收鱼”的狠毒策略，步步为营，节节搜索前进。同时，为了断绝群众对红军的接济和联系，敌人除了继续采取杀光、烧光、抢光、掳光的“血洗政策”外，还强迫驱逐西山周围群众分别到各个峒场里集中管制，不许群众带一粒粮食和一根火柴上山，妄想把红军饿死、冻死、困死。但是，与红军血肉相连的各族群众，为了支援红军，他们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给山洞里的红军送粮、送盐、送情报。正是有广大各族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才能这样一天天坚持下来。

廖磊在派七路重兵“搜剿”西山的同时，还派罗活指挥一个正规团和凌云、东兰、凤山、河池等县民团5000多人，气势汹汹地进犯巴暮地区。当时，坚守巴暮的红军和赤卫队只有400多人。他们分五个防线，英勇抗击十倍于我、装备精良的敌人，但由于敌众我寡，红军各防地的联系先后被切断。退守在甘孟山上的80多名红军战士，经过与敌人三昼夜的激烈战斗，只剩下十几人，他们宁死不屈，子弹和石头打光了，便与敌人肉搏，最后，有的抱着敌人一起跳下悬崖，用生命最强音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保卫革命根据地的英雄赞歌。

巴暮根据地丧失后不久，白崇禧亲自从百色赶到东兰，密商围捕韦拔群、陈洪涛的毒辣计策和组织，“东风善后委员会”等事宜。韦拔群和陈洪涛深感形势的严重和危急，他们正研究准备暂时分头向贵州方向转移时，不幸，韦拔群于10月19日被叛徒杀害。韦拔群牺牲后不久，陈洪涛也不幸被

捕牺牲。右江革命根据地受到血洗而丧失。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后，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中共右江下游委员会书记黄松坚（后又担任中共滇黔桂边委书记）和中共黔桂边委书记黄举平（后又担任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主席）等继续担负起领导整个右江地区革命斗争的任务，先后建立了东兰中心县委、田向中心县委和那马中心县委等组织，不断恢复发展革命力量。英雄的右江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坚持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一直至广西全境解放。

在左江地区，由于红八军撤离该地区，左江革命根据地已宣告丧失，各地党组织和工会、农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无数革命群众遭受敌人惨杀，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是，广大各族人民，在白色恐怖下，并没有屈服，留下的共产党员和工农赤卫队员，转移到山上或中越边境，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反抗敌人的疯狂“围剿”。龙州县下冻区的中共左江特委和左江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谢玉芳（又名谢匡，后叛变）周和平（后牺牲），便把当地农民赤卫军集合起来，并联合上金县原受过红八军收编的黄立忠部队，组成“左江游击队”，这支拥有 200 多人枪的农民游击武装，以中越边境武德地区的科甲、陇罕、陇海和水口地区的罗回、北胜、独山的深山密林为据点，活跃在龙州县西部与上金县南部交界的山区，坚持与敌人斗争达半年之久。万承、龙茗、养利等县党员领导的农民赤卫军也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原红八军游击大队长唐光天，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继续率领 500 多名农民武装队伍，在十万大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至 1936 年。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虽然丧失了，但它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苏维埃政权的种子播到少数民族聚居的祖国南疆，策

应和配合了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其伟大意义，正如1930年3月2日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中所指出的：它“虽然出现于偏僻的广西，……但他在全国政治同样有极大的意义，他同样是发展游击战争摧毁统治阶级促进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在他的发展很快可以影响到全国”。

（原载《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88第1期）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是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胜利

· 卢 行 黄林毅 ·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以坚持实事求是而著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把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从而使全党的思想大解放，使党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得到很好的贯彻，出现了改革开放的繁荣局面，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所称道。其实，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思想并非今日始，早在1929年党中央派他到广西领导工作时，他就出色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领导，从而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成功地举行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事实说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胜利。

一、实事求是发展党员，迅速壮大广西党的力量，恢复广西党组织的活力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结束，蒋任命李明瑞为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统领全省军事，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

席。俞、李回桂主政，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要求我党派干部来广西工作。192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为中央代表，到广西做俞、李的统战工作，并领导广西党的全盘工作。

邓小平同志到广西时，正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广西党连续遭到多次严重破坏，省级领导成员半数以上被捕牺牲，各地党组织非常零乱，有一半党组织与当时广西党的领导机关——广西特委失去联系，“特委及各县指导机关多不健全”^①党的活动大部分停止。党员从800余人锐减至400余人，到1929年9月统计，全省仅有党员420余人^②。党的领导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广西党组织这种情况是很难担负起领导广西革命斗争的重任的。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等在搞好与俞、李统战工作和开展兵运的同时，把迅速恢复广西党组织的活力和大力发展党员当作重要工作来抓。他迅速向广西特委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研究部署广西党的恢复、发展工作。省特委于8月初在南宁开办了一个党员训练班，有十六七人参加学习，学习有关“政治、职工、土地、组织、CY五课”。同时，还秘密出版了党内刊物《党的生活》，以加强对党员的宣传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地的党组织逐步恢复、发展起来。并与省特委恢复了联系。在此基础上，1929年9月10日至14日，广西特委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③。会议根据“六大”和二中全会的精神，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和斗争

^①广西党组织问题草案大纲（《1929年9月》）。

^{②③}中共广西特委给广东省委的信（1929年10月20日）。

策略，选举产生了新的省特委领导机构，通过了《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等9个文件，在《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提出“推翻国民党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准备武装夺取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的奋斗目标。这次会议将对全省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思想统一到准备开展武装斗争和推动武装起义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也是广西党组织的工作趋于正常和活力得到恢复的标志。这时，全省已健全的县委和县特支有9个；正在恢复和健全的县委有5个；南宁已建立了轮船、汽车、机关等10个支部^①。

与此同时，为了开展兵运工作，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经俞、李同意，邓小平将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来的40多名干部大部分分到我们党干部张云逸和俞作豫担任领导的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去。张云逸在教导总队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把三个营和九个连都换上共产党员当营连长，在各个连队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加紧发展党员工作，两个多月就发展300多名学兵入党^②。同时，在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右江地区也发展了一批党员。这个时期的发展党员数与邓小平刚到广西时全省的党员数相等，使广西党员数在短期内成倍增长。到1930年秋，全省党员发展到2500余名。邓小平领导广西党工作的时期是广西党自创建以来发展速度最快、力量最强的时期。党组织活动的恢复和力量的迅速壮大，为取得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胜利打下了牢靠的基础。这是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克服当时党内在建党方面仍过于强调党员成份的工人阶级化的“左”倾错误的结果。邓小平到广西后，根

^①中共广西特委给广东省委的信（1929年10月20日）。

^②1960年3月《张云逸同志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

据广西经济很不发达，现代产业工人极少，以及当时广西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与广西特委研究，制定了符合广西实际的发展党的方针：在不忽视发展工人入党的同时，主要地在农运和兵运中涌现出来的农民、士兵积极分子中发展。个别的甚至如李明瑞这样的国民党上层人物，只要他真心投向革命，党组织同样吸收他入党。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胜利，充分证明邓小平实事求是迅速发展党的力量的方针和策略的英明、正确。

邓小平不仅重视党的组织建设，更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他的建党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全面的。1929年12月20日，红七军前委按照邓小平的指示，颁发了《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分析了右江苏区的形势和党组织的状况，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对于红军与根据地的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指示各级党组织要以最大的力量来注意党的建设。指示规定了党的组织系统、支部生活和党内民主的具体原则，指出红七军前委是军队和地方党部的最高领导机关，各级党组织必须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遵守党的纪律。指示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通过开办各种训练班等，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量。为加强党的建设，红七军前委按邓小平的指示，大量印发了《党员须知》，邓小平亲自在平马、百色、东兰办训练班，对党员进行党性、政策、党纪教育。邓小平还亲自编写党员教材，印成小册子发给学员学习。正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建党思想，加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加强了党对红七军（红八军后来并入红七军）的领导，使红七军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不但保证了百色起义的胜利，还保证了

红七军北上的胜利。

二、实事求是与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建立统一战线， 为发展革命力量和发动武装起义创造良好的条件

1929年夏，邓小平到广西做俞、李的统战工作时，我党对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尚“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①。确实，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国民党已蜕变为反革命政党，民族资产阶级也脱离了革命阵营。但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完全依附于蒋介石的。其中有坚持中立的，也有倾向革命的，就是蒋介石反动集团本身也由于利益分配不均经常发生各种矛盾冲突。当时由于我党处于独立领导革命的初期，对此缺乏正确的分析，党的“六大”的决议案还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国民党各派完全是反动的”。1929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二中全会虽然承认“现实统治营垒中，仍存在有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根本矛盾”^②，但没有制定利用这些矛盾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对中间阶级和国民党左派还是实行关门主义和打击政策。邓小平到广西后，党中央和广东省委（当时领导广西党组织）对广西的革命斗争指导也存在这种错误，名义上派邓小平来做俞、李的统战工作，实际上并没有把俞、李当作真正的同盟者看待，还是把他们当作敌人。如在分析俞、李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时，认为俞、李与坚决反共的桂系在“根本上并没有什么不同”^③，提出广西党

^①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日。

^②《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十号》1929年7月9日。

^③1929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

对俞、李政权的“工作路线，总是破坏他，绝对不是巩固他”^①。要广西党对“政府的一举一动……必须公开党的面目与之对抗”^②。邓小平并没有为这种错误指导所影响，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俞、李的历史和现实，认为俞、李是大革命时期广西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北伐名将，“四·一二”后继续坚持革命立场。俞作柏曾对我党领导的潯州四属农军暗助枪械，与广西共产党员在香港成立广西肃反委员会，进行反对新桂系军阀清党屠杀政策的斗争。李明瑞曾在其领导的部队中秘密掩护过被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员。俞、李策划倒戈反桂之初，曾将其先倒桂后反蒋的意图告诉广东省委，并邀请我党派干部与之合作，尽管当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反蒋反桂的力量，以巩固他们对广西的统治，但他们与蒋、桂有很大的矛盾，他们反对反共。邓小平认为，俞、李是国民党军人，不免有国民党旧军人的气味，而他们与蒋、桂的矛盾，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他们所采取的一切进步措施，我们应该欢迎、支持，我们与他们之间对革命有利的关系都应发展。而且当时蒋、汪、桂各派系为争夺俞、李已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在这种情况下，做好与俞、李的反蒋反桂统一战线工作，打击主要敌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不但完全可能，而且十分必要。如果机械执行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采取破坏俞、李政权的工作路线，必然于己于友不利。为此，邓小平与俞作豫、陈豪人等亲自做俞、李的统战工作。

当时，邓小平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与俞、李建立关系的，这样便于和俞、李共商反蒋、反桂系军阀的大计，对外则为省府秘书。邓小平和广西特委及党中央派来的党员干

^{①②}1929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

部在与俞、李进行统战工作时，注意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把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上层统战和下层兵运结合起来，以防发生突然事变。

由于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组织与俞、李建立了反蒋、反桂统一战线，解决了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但没有解决好的争取中间阶级成为革命同盟者的问题，为我党在广西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得到俞、李的默许和保护，我党得以在广西半公开活动，这对刚受严重破坏而元气大伤的广西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十分好的环境。当时我党能很快掌握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的领导权，并把这几支约四千多人的部队改造为革命军队，成为红七军、红八军的基础，也是因和俞、李合作而取得的结果。通过对俞、李的统战，推动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革命的措施：一是通令开放工农运动，确认其合法地位。设立由我党领导的慰问农民运动办事处，并派代表慰问各县农民，支持农会反豪绅的斗争。二是下令释放“四·一二”以来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进步人士，并加以任用。三是通令解散新桂系残余分子控制的各级国民党党部，逮捕惩办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四是对蒋介石派来的“百余名之黄埔学生，不曾给予工作全部遣回”^①。俞作柏还同意，广西特委于8月上旬在南宁召开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广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并以建立“红河护商大队”为名，拨给东兰、凤山农军200多支步枪和两万发子弹，拨给南宁郊区和左江地区农军一部分枪械。这些措施，对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当时，如果以邓小平为

^①1929年8月20日《中共广西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

首的广西党组织机械地执行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与俞、李进行公开的对抗和斗争，不仅这样一个发展革命力量的大好时机将失去，甚至连邓小平等由党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到广西工作的干部在南宁都难以立足。如此，广西的革命斗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将没有那么顺利。

当时，邓小平在广西与省一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统战关系，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大革命失败后，我党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党派、集团建立统一战线的最初的也是最有成效的一次实践。它突破了我党自“六大”以来形成的对中间阶级的错误认识和错误政策，为以后我党制定对国民党左派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形成正确的完整的革命统一战线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实事求是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农村去，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我党由于缺乏对国情的充分认识，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照搬苏联经验，主张通过城市暴动和占领中心城市来夺取全国政权，这种“城市中心论”当时在全党居主导地位。1929年，党中央和广东省委对广西革命斗争的指示，也完全是这种“城市中心论”。192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委的信》要广西特委“必须集中力量注意三大城市（注：南宁、梧州、柳州）的职工运动”。10月8日党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也要广西党以中心城市为工作重点。

邓小平到广西后，虽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党中央、广东省委这些“指示”，但也没有照着去做，而是认真汲取南昌

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放弃攻打城市、挺进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把工作做到农村去，开展农民运动，重视在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7月，邓小平刚到广西，即劝说俞、李开放工农运动，恢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取缔的农会组织；8月，领导广西党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由中共党员雷经天、韦拔群任正副主任的省农协筹备处，随后派出党员干部组建省农协右江办事处和左江农运指导委员会，将广西特委一半委员派往左右江地区工作，组建中共右江工委，加强党对右江地区工作的领导。同时，还通过俞、李同意，推荐十多名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左右江地区担任县长，使我党合法地掌握了这些县的政权。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左右江地区农运的空前高涨，使左右江地区成为全省革命力量发展最活跃、群众基础最好的两个地区。到10月，仅右江地区的东兰、凤山等县“有组织的农民十六万，可以号召二十万，经常有武装一千一百^①”这些行动，是邓小平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汲取秋收起义的经验，切实加强农村工作，特别是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较薄弱，农运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的工作的实际步骤。

1929年9月底，俞、李在汪精卫改组派的策动下，决定出兵反蒋。邓小平预料俞、李仓促反蒋，必遭失败，经劝说无效。邓小平面对突变的紧张局势，随即增派干部率警备第四、第五大队两个营去左右江，为我党掌握的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撤往左右江作准备。

10月，俞、李反蒋失败，邓小平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研究

^①1929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

决定，由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去龙州，俞作柏、李明瑞跟着前往。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等率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去百色。两支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先后在百色、龙州举行了武装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和左江革命委员会，随后，左右江地区先后有20多个县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到1930年2月，拥有5万多平方公里、150万人口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它的建立是邓小平领导广西党实事求是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丰硕成果。

邓小平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还表现在他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和实践。根据地建立后，是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为中心，建设根据地呢？或是靠到处游击攻占大城市来取得经济，维持根据地呢？邓小平是主张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为中心建设根据地，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盲目攻占城市的。

1929年12月初，他部署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后，奉召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邓小平回中央期间，陈豪人主持前委工作，调动红七军大部向右江下游移动，调红八军主力到崇左县集中，请李明瑞（当时已参加革命）到右江共同指挥，想趁粤桂战争之机会师攻南宁。1930年2月4日，红七军与桂系4个团在南宁西北之隆安发生战斗，激战3日，双方伤亡很大。红七军撤出隆安，后退到盘阳（今属巴马县）休整。之后，红七军前委派出第一、第二纵队去外线打游击，以补充部队的给养和弹药。留韦拔群领导的第三纵队在东兰驻守根据地。此时，右江沿岸各县除果化还在我军手中外，全被敌人占领。1930年2月7日，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

州，听留守龙州的同志汇报，知道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大致情况，即电告红七军停止攻南宁，命红八军撤回龙州。电报发出后3天，收到七军复电报告隆安之战失利。红八军撤回龙州，邓小平即召开左江党政军领导干部会，传达中央指示，讨论八军及左江工作，决定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及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农会等群众组织。2月间，左江地区的土改试点就是在小平同志的指示下才进行的。针对红七军前委在他离开期间没有注意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为中心建设根据地的工作，而是匆忙地指挥红七军和红八军去攻打南宁的错误，他指出：“对于此次行动……不仅忽视了敌人，主要还是忽视了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苏维埃的错误^①”，“前委没有将中心工作摆在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上面^②”。邓小平认为，在没有实行土地革命，群众还未充分发动起来，根据地还不巩固的情况下，冒险去进攻南宁，“必遭一个失败的结局”，“有全部或大部被敌人消灭的可能^③”。事实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1930年3月底他回到右江，当时红七军主力已向桂黔边游击，根据地的右江沿岸各县已失守。他遂去东兰，找到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红七军第三纵队的纵队长韦拔群和右江苏维埃主席雷经天等，研究开展土地革命工作，并亲自在东兰武篆抓土改试点。5月，根据土改试点的经验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法，领导右江苏维埃政府制订并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制定了土改的方针、政策。6月，红七军主力从贵州边境回师河池，邓小平闻讯立即赶赴河池，传达中央指示，决定主力回师右江，收复沿岸各县，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壮大力量，再图向

①②③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

外发展。从而扭转了红七军成立后未能对土地革命给予充分注意和忽视开展根据地建设的倾向，回右江后，全军投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广大农民由于分得千百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土地，更加拥护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许多农民踊跃参军，红七军力量急剧壮大。这一时期是右江革命根据地最巩固的时期。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成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邓小平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和认识到它的严重危害，并在实际斗争中自觉地坚决抵制的结果，邓小平是主张先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再夺取城市的思想的重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他领导创建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一，它对于毛泽东总结我党大革命失败后斗争的经验教训，形成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有极重要的意义。

（原载《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92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与百色起义、龙州起义

· 陈欣德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在祖国西南边陲领导发动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相结合。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囿于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在广西这一舞台上，导演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工农武装割据”的话剧。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通观其起义全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结论和启示：

一、坚持实事求是，必须用全面、发展的观点分析国内阶级关系及其变化情况，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进行革命斗争，我党能否正确分析和解决作为革命中间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

当时，随着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更加突出起来，出现了由一种片面性转向另一种

片面性的现象：由大革命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估计高于其反革命性的估计转到对其反革命性的估计高于其革命性的估计；由过去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转到怀疑甚至不提统一战线。这时，如何正确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能否在局部地区与国民党左派重建革命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尚未解决的问题。也是百色起义、龙州起义面临解决的首要问题。

1929年7月，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南宁后，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我国和广西阶级关系化的“实事”出发，正确解决了这一十分复杂而又难于解决的问题。

第一，唯实不唯上。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是给予声援和帮助的，但在1927年至1935年这一时期中，“共产国际基本上是错误的，对我们中国党影响最大”^①。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中国各阶级特性和阶级关系有着许多不同于俄国的根本特点，对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公式化、定型化的分析。认为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标志着“资产阶级已背叛民族革命运动，成了积极的反革命力量”^②。1927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来信，信中“对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分析得不正确，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叛变了”^③。至1929年10月26日，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共产国际给中共

①③《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5页。

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第1辑。

中央信中，指示要“揭露国民党各个集团的反革命作用”，“揭露他们的反革命本质”。这里，他们讲的“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各个集团”，都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内，把民族资产阶级列入革命对象范围之内。

在共产国际“左”倾错误影响下，加上党内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政策的激愤，党的“六大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①，“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②，把国民党反动政权断定为“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底国家政权”，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③。

当时，中共中央对在第一次蒋桂战争中掌握着广西军政大权的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也作了错误的分析。如1929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中，认为俞作柏、李明瑞是“改组派”，是“军阀”，与旧桂系“没有什么不同”，认为在蒋桂战争中派生出来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广西新政权是“广西军阀政府”，对俞、李的革命性一面持否定态度，说什么“即使俞、李本人，主观上是愿以士兵群众为其投身革命之基础，但当其军阀制度未被推翻以前，士兵群众还未发动起来投身于革命斗争以前，俞、李个人又何以表现其革命行动？”“即使这些当权分子中，有倾向于我党的人，但在其在位一天，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

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6页。

③《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9日。

我们总不能与之发生正式的组织关系”。

面对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左”倾阶级政策，邓小平同志没有盲目执行。他通过深入调查和了解，全面剖析了广西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及其矛盾斗争情况，既看到俞、李在蒋桂战争中利用蒋介石的力量倒桂，又看到他们与蒋介石、国民党改组派和新桂系军阀的矛盾；既看到俞、李的极限性，又看到他们在大革命和大革命失败后的进步倾向；既看到俞、李主动要求我党派干部协助工作，以巩固其统治地位意图，又看到他们的请求给革命带来的有利时机。因此，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以无产阶级的非凡革命胆略，在广西这一局部地区，与主桂的国民党左派重建革命统一战线。其主要的统战策略：既把俞作柏、李明瑞与国民党右派相区别，对他们实行团结、教育、争取的方针，与他们共筹反蒋、反新桂系军阀的大事，又坚持我党独立自主原则，依靠广大工农群众，趁机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对新桂系中的顽固派、亲蒋分子和国民党改组派，则给予坚决打击和孤立。

第二，邓小平同志卓有成效地亲自做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

“中国雇佣式军队的特点，军官在军队中是很大作用的”^①。邓小平同志在统战工作中，把重点放在对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物的团结、教育、争取工作上：一是经常与他们真诚相见，宣传和解释我党的政治主张，共同商讨反蒋、反新桂系军阀的重大事情；二是教育和劝告他们不要参加军阀混战，及时向他们陈明利益，晓以大义；三是俞、李反蒋失败后，其思想是十分苦闷和彷徨不定时，给予热情的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3页。

关怀和帮助，派人护送他们到龙州安身并主动找他们谈心，介绍《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给李明瑞阅读，指出其革命前途和出路，启发他打起红旗，参加革命；四是给予充分信任，面允成立红七军、红八军后，请李明瑞担任两军总指挥。

经过邓小平同志的耐心教育帮助，这位在旧军队中享有较高威望的猛将李明瑞，终于与旧营垒决裂，毅然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与我党一起，积极参加龙州起义准备工作。他就任红七、八军总指挥后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后为革命牺牲。

第三，坚决顶住各种错误批评和压力。

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多次批评邓小平在广西对俞作柏、李明瑞的统战工作是“幻想”^①，指示红七军前委“对李明瑞绝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他斗争，加紧在群众中宣布其军阀的罪恶，加紧左江下层群众的工作，以群众的力量来赶跑他”^②。至1930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红七军前委指示信》中，对“李现仍留在第七军，并且与以总指挥的名义。而前委已通过他加入党”等问题，向红七军前委提出严厉的批评，说这是“一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问题”，应“驱逐他离开该地”，“丝毫不让李个人在军队中占据领导”。

针对这种错误批评，邓小平同志一方面向中央解释、说明，表示自己的不同看法和意见，认为对李明瑞“暂时利用他的线索去发动其下层群众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主要

①《中共中央给毅兄并转广西平礼两兄的信》1929年11月14日。

②《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1930年1月。

的要发动下层群众工作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①另一方面，对李明瑞仍给予信任和器重，不仅没有赶走他，而且让他继续“占据领导”，有职有权，大胆指挥部队，充分发挥其军事指挥才能。1931年2月，又根据李明瑞同志在艰苦革命斗争的表现，增补他为中共红七军前委委员，使他在红七军北上的艰辛征途中，发挥更重要的历史作用。

事实证明，当时邓小平等同志对俞、李的统战策略是正确的，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论断和中共中央对邓小平等批评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中国和广西的革命斗争实际的。其理由是：

第一，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只表明中国资产阶级的右翼背叛革命，不能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另外，随着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对内外反动政策的实施和排斥异己斗争的加剧，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每况愈下，对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政策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其政治动向已发生离异。广西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一面更为突出。

第二，由于我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党要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不仅要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且还必须建立一个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局限性的斗争，也只能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进行，即把此种斗争纳入我党为推翻三座大山斗争的轨道。

第三，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之所以能如此顺利举行，广

^①《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1930年1月。

西的革命斗争形势之所以能在短时间时发生如此迅速的变化，这是与邓小平等同志坚持正确的阶级分析和正确的阶级政策，卓有成效地开展对俞、李统战工作分不开的。李明瑞的思想转变和成长，不仅对争取、教育他原来的部属起了很大作用，且对稳定左右江地区局势，分化瓦解敌人也具有重大意义。这正如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六大’认为在官长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后来的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江西第二十六军的起义，都是由军官领导的”^①。

这一实践经验，在当时全国是罕见的和难能可贵的。

二、坚持实事求是，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探索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时，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搬外国武装起义的模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矛盾并不是离开客观事物的抽象存在物，而是通过千差万别的各自不同形式存在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普遍性和特殊性，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即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

我们的革命事业，是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的，但又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的。由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情况与外国不同，因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从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结合原理上，去探索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这是难度较大的创造性工作。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3页。

中国革命道路核心问题是把全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还是放在城市，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长期争论并在极力探索的问题。

当时，由于我党在理论上和经验上尚属幼年，对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特点、规律尚缺乏了解，故在“八七”会议前后一段较长时期内，党内盛行着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教条化、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把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模式搬到中国来，把武装斗争的发展目标选择在城市上，总是企图通过城市暴动，在短期内赢得中国革命胜利。可以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是仿照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以“城市为中心”思想为指导的一种战略上探索。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率领秋收起义剩下的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进军，开始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但这个经验未得到党内重视。

党“六大”制定的政治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它受了“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①，“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②，因此党“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中，仍强调“城市领导作用底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底高潮，都将要表现它的决定胜负的力量。”会后，党中央仍把全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甚至认为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就是“不要城市，就是否认共产党是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

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6页。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否认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①”

1929年初，蒋桂战争爆发，军阀混战迭起，给革命发展带来了有利的时机。朱德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率领红军主力挺进赣南闽西，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创建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湘鄂赣等地区的武装斗争也迅猛发展起来，革命的星火在农村开始形成燎原之势，日益突出农村斗争在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党中央仍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羁绊，对中国究竟应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192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共广西特委的信中，指示广西特委“必须集中力量注意三大城市（即南宁、柳州、梧州——笔者注）的职工运动”。同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广西特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中，又强调广西“现时应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沿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这些指示，都是脱离中国和广西革命实际的。因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其实质是农民革命。在我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如果不以广大农村为依托，脱离广大的农民同盟军，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发生在党内出现第一、二次“左”倾错误之间，面对着党内教条主义盛行的思潮，起义的领导者，没有照搬俄国的模式，而是根据我国和广西革命斗争特点的“实事”并借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以敢于开拓敢于探索的大无畏精神，突破了“城市中心论”的框框，实现了广西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到农村的转移。

①《中共中央致湖北省委并转鄂西特委信》1928年9月24日。

第一，正确选择武装起义的立脚点，这是关系到起义的命运问题。

1929年9月下旬，当俞作柏、李明瑞在国民党改组派的挑动下，不听我党的劝告，草率决定参加反蒋战争时，我党面临突变的局势，立即做好应变准备，确定武装起义的立足点。当时，有人认为经过几个月的统战工作，我党在南宁已掌握约三千人的正规武装，主张在南宁举事；有人主张把这些正规武装拉到靠广东交通较方便的梧州、桂平一带，另图发展；有的甚至主张跟随俞、李去参加反蒋战争。邓小平等同志经过调查、分析，果断地选择左右江地区为武装起义的落脚点，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其一，左右江地区地处桂、黔、滇三省边境，西南还与法属殖民地安南（越南）毗连，虽然比较贫瘠、偏僻，人口稀少，交通阻塞，经济落后，但反动“政府统治的力量比较薄弱”^①；

其二，在地理环境上，境内多是大石山和丘陵山区，山高林密，峰峦起伏，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以守，是一个可以凭籍依托的战略要地，“易于形成一个独立之区域”^②。

其三，群众基础深厚，各族人民因深受帝国主义、封建豪绅地主的残酷压榨，其生活特别困苦，容易接受革命宣传，其反抗斗争精神特别强烈。早在20年代初期，右江地区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同志，便在东兰、凤山一带领导各族贫苦农民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在党的领导下，该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

①雷经天《广西的苏维埃运动》1945年1月。

②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1931年3月9日。

也没有停止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风暴中，涌现了一批象韦拔群、黄治峰等那样叱咤风云、有威望的农民运动领袖。故该地区有“广东海陆丰”之称。

邓小平同志确定这一立足点之后，立即与广西特委商定，于同年九月底在南宁召开关于加强左右江地区工作的专门会议^①。会后，即派出广西特委领导成员雷经天、严敏、陈洪涛（占广西特委委员总数的一半，其中一个为常委）和一批党员干部，分别前往左右江地区工作，在该地区建立了中共右江工作委员会（以雷经天为书记）、广西省农协右江办事处、“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等，为百色、龙州起义作好准备。

第二，正规武装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

1929年10月中旬，当俞作柏、李明瑞反蒋败回南宁，亲蒋的粤军入桂逼近南宁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当机立断，按照原定的应变计划，立即率领我党在南宁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部分教导队约三千人武装，分别挺进左右江地区。

他们挺进左右江地区后，立即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积极支持农民群众开展对豪绅地主的斗争，帮助农民训练和增强武器装备，充分发挥韦拔群、黄治峰等同志的作用，与他们一起共筹武装起义工作，做到统一领导，统一部署，互相配合，共同战斗。这正如1931年3月9日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同志写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说的：“我们到右江之第一天即开始武装农民”，帮助各县农

①《中共广西特委给广东省委的信》1929年。

②《访问杨翰峴的记录》1979年8月13日。

军扑灭豪绅。

在党的领导和正规部队帮助下，左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更加猛烈发展起来，达到空前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这为武装起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为即将成立的红军提供了大量的后备力量，“造成乡村割据的前途”^①。

第三，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举行后，便以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为底子，以左右江地区各县农民武装为主本，组建新型的人民军队——中国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共约7000多人。接着，在20多个县、约5万多平方公里、100多万人口的左右江地区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并在条件成熟的乡村逐步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

在创建革命根据地过程中，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第六十号通告，仍指示红七军前委“只要有胜利的可能，有群众可发动的便须向主要的城市进攻，以至占领这些城市就是占据极短时间，也有伟大的政治影响”^②。以邓小平为书记的红七军前委，从广西的实际出发，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当敌情严重时，主动撤离右江沿岸县城，选择群众基础更为深厚、地势更为险要的东兰、凤山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以此为基础，巩固革命根据地，并波浪式地向前扩大、发展。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之所以能把地处偏僻、落后的左右江地区农村造成一个先进的革命根据地，这是当时广西党工

①《中共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委信》1929年11月19日。

②《粤省委对七军前委的指导信》1929年12月25日。

作中心转移的结果，它进一步揭示了革命力量在农村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证明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①。这也从实践上批判了“城市中心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为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道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根据本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的“实事”，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起来，不搞“一刀切”和简单化。

在充满矛盾的世界里，事物的矛盾是具体的、多样的。“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②。客观事物及其矛盾的多样性，决定了解决矛盾形式的多样性。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客观事物的具体性和多样性，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原则和科学方法。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发生在以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住有壮、汉、瑶、苗、侬佬、彝、回等民族。在历史上，壮、瑶、苗等民族曾被反动统治阶级称为愚顽的“土人”和未开化的“原种人”。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有些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仍残留着农奴制残酷的土官专制制度。另外，各民族的信仰、爱好、风俗习

①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惯、文化教养及语言等情况也各不相同。我党如何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领导武装起义和根据地建设，这是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当时，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分析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和自然、经济和政治、历史和现实等情况，因地制宜，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既讲统一性，又讲多样性，正确地发动和带领该地区广大各族人民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

第一，不搞同一的武装起义进度

由于右江地区和左江地区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党的领导力量、干部力量以及武装起义筹备进展工作情况不同，故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没有在同一时间举行，而是分别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举行，中间相差了一个月。

第二，不搞同一的革命政权机构。

百色起义和龙州胜利举行后，根据各地的群众基础，在左右江地区分别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因“正式的苏维埃政权一定是直接从群众代表会议（绝不是仅限于各地革命团体代表）选举出来，……在正式苏维埃政权还不能组织以前，最初的政权形式是临时的，这临时政权即是革命委员会”^①。当时，在右江地区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或临时苏维埃政府，而左江地区则建立革命委员会（有的区、乡建立苏维埃政府）。

第三，不搞同一的土地分配方式。

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右江地区土地革命时，根据各地群众基础和干部条件，分别采取了“平分”、“共耕”、“没收

^①《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信》。

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由群众在乡苏维埃大会中自己选择”。“东兰、凤山分配土地的结果，共耕仅有两乡，多数地方是平分土地，还有一些地方是仅就没收的土地分配”^①。当时，邓小平同志对办共耕社很慎重，只在个别乡村进行试点，没有全面铺开，并强调“各乡得按实际情况执行”^②。因为从分散的小农经济到农业集体化，是一个十分艰巨、内容十分复杂的过程，不是民主革命时期所能立即操切从事的。

另外，对“瑶民分配土地，有些瑶民不愿下山，则分配山地”^③给他们。

以上的做法，不仅照顾了各族群众的不同情况和要求，且从多方面探索了土地革命的经验。

第四，不搞强迫命令和瞎指挥。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过程中，注重从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水平出发，进行宣传、教育和说服工作，反对搞强迫命令和瞎指挥。如对禁吸鸦片烟的问题，采取“正确不背原则处置”；“在目前政权还未巩固，群众对鸦片的嗜好还不能尽行消灭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强迫采取最后的手段，还应从群众本身作反吸鸦片烟宣传，并且这种宣传要普及全国，只是顾到右江一隅还很不够，然而如当地的工农会起来通过不吸鸦片烟有群众的基础即可在当地执行禁止鸦片烟”，“如果我们不去从群众本身上去作反鸦片烟的宣传，不用群众的路线来解决，即使发几道命令禁止鸦片烟，甚至于所有的烟都拿来烧掉，群众还是莫明其

①③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

②右江苏维埃政府《共耕条例》1930年5月15日。

妙，而且说不定会得到反响”^①。当时，百色是广西转运鸦片的中心，对如果贩运只是从当地经过的而还不是当地贩卖的没有扣留，而以加重其税收来解决。这也可以说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一个表现。

四、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真理，摒弃错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要经过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我们只有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既包括有益的经验，也包括引为鉴戒的教训），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正确的认识，纠正原来的错误。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虽是一次比较成熟、规模和影响较大武装起义，但这两次起义也曾受到当时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和干扰，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曲折或失误。他们曾率领红七八军主力去攻打南宁，曾执行李立三为首党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令，有的失误甚至反复出现。但他们可贵之处是：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敢于面对失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纠正失误。

1930年1月，红七军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恰到党中央汇报工作，由陈豪人同志代理书记）认为新桂系军队的主力被粤军牵制在柳州、桂林一带，“无力顾及南宁，当时七军士气很壮，一般下级干部及士兵心理均欲进攻南宁，前委乃站在扩大政治影响，决定游击南宁一次”^②，约定红七、八

^①《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1930年1月。

^②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1931年3月9日。

军主力于2月8日到达南宁附近汇合。但是，当时的粤桂战争仅仅杀成“隔江对峙之局”^①，当红七军主力正在向南宁进军途中，新桂系军阀已派四个团的兵力大举向我军进驻的离南宁150公里的隆安县城进攻，在敌强我弱情况下，红军与敌激战四昼夜，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后，主动撤出战斗，先转移果德休息，并进行该役的检讨会，通过总结，认识到“南宁是广西政治中心地方，反革命无论如何必竭尽全力以保守之，绝不致易于放弃。前委忽略了这一点，乃有此错误策略之决定”^②，遂决定停止进攻南宁计划，把红七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的大后方东兰、凤山一带。这个决定是符合当时广西革命实际的，“如到南宁打了败仗有全军覆灭的可能。”^③

1930年9月底，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同志在广西传达李立三主持通过的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指令红七军离开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以便实现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红七军前委对此指令展开了热烈的争论。邓小平同志从广西敌我力量对比的“实事”出发，认为红七军这几千人“力量还不够大”^④，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故他“不大赞成打大城市和北上”^⑤。张云逸、李明瑞、雷经天等同志也“感到两广军阀很多，有一定的势力，一下消灭是有困难的，对中央这个指示存有怀疑”^⑥。但当时邓小平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尚属少数，经过一

①《李宗仁回忆录》（下册）。

②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1931年3月9日。

③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

④⑤⑥张云逸《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1960年2月。

番争论后，为团结一致对敌，“避免党内的分裂”^①，红七军前委终于接受了中央的指令，拟“待走不通时再说”。^②

红七军（红八军的余部已编入红七军）从河池出发转到全州时在近两个月时间里，虽然广大指战员表现得异常英勇顽强，但都经常处于敌人围、追、堵、截连连受挫的被动局面，不仅没有按原定计划攻下敌人一座城市，而且使部队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减员三分之一，若不是邓小平沿途从实际出发，尽可能使部队避开敌人和避开攻坚战，部队的损失将会更严重。严酷的事实引起广大指战员的深思，逐渐产生对中央指令的怀疑和不满情绪，迫切要求解决“部队到底往何处去”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严峻问题，1931年1月初，红七军前委在全州召开会议，集中讨论中央的指令是否行得通的问题。当时，虽然未接到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指示精神，但会上，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同志因势利导，实事求是地总结了部队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两个月以来艰苦转战和攻打大城市的教训，“认为攻桂林已不可能，七军的迫切需要是迅速找一个地方发动群众，休养，安置伤兵”^③，结果，通过总结和辩论，前委终于“决定不打桂林了，同时也抛弃了攻打大城市的思想”^④，转向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为主要任务和目的的策略，这标志红七军开始抛弃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从此，红七军在行动上，不再以攻打大城市为目标的盲目硬打攻坚，而是主动避开与强敌作战，在敌人夹缝中踏步前进，使红七

^{①②④}张云逸《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1960年2月。

^③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

军逐渐从敌人前堵后追的被动局面解脱出来。

全州会后几天，红七军前委立即在江西的江华县城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公开讨论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指令和给革命带来的危害问题。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气氛活跃。通过大家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表示拥护丢掉立三路线的主张”^①。

总之，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它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走自己的道路，这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之本，成功之路。

今天，我们必须发扬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作风，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原载《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92年第1期）

^①袁任远《汇合中央红军去——红七军长征片断》。

试论邓小平同志在右江革命 根据地的群众路线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三大作风的重要内容，是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充实、发展、完善而形成的。邓小平同志在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和右江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认真地实践了群众路线。

邓小平同志对群众路线的实践，是充分相信群众，深入宣传发动群众，正确执行群众路线。由于邓小平同志的群众路线是从实际斗争中来的，是从实践中获得的，所以，不但促进了红七军和右江根据地的发展，而且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完善作出了贡献，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一、充分相信群众

相信群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群众观点的中心，是党能否成功地发动和领导群众的关键。只有相信群众，才能更好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和领导群众。1929年7月，邓小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广西做俞作柏、李明瑞的统战工作，领导中共广西党(特委)的组织和革命活动，10月，到百色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和右江根据地。这时党的群众路线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面

对尖锐复杂的对敌斗争，邓小平同志只能靠自己去实践、摸索，才能掌握群众工作的方法。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既深入了解和掌握俞、李等广西上层人物的情况，也通过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汇报，全面了解和掌握右江革命群众运动的情况。当时右江地区在国民党反动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下，右江农运虽然“受到严重镇压，但农民的革命斗争，还能继续保持，农民组织的基础，仍然保存下来。^①”这使他对右江地区的群众工作产生了好的印象，认为右江地区有革命群众基础。9月，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贯彻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精神，同时按照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确定南宁、梧州、柳州三大城市为最重要的工作区域^②。”虽然如此，他仍把着眼点放在左右江地区上。当劝俞、李不要反蒋，俞、李不听，俞、李反蒋失败，使广西局势发生急剧变化而复杂化时，他坚信左右江地区有革命的希望，立即分别派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各一个营到左江和右江做应变的准备工作。可见他对左右江地区群众的信任。后来百色起义准备工作布置好后，他奉中央电召赴上海汇报说：“发动群众的路线，在这次转变中是注意到的^③”。可见他对右江地区的群众是充分相信的。这种相信，具体地说，是以如下情况为前提的。其一，右江地区各少数民族群众具有高涨的革命积极性。右江地区居住着壮、瑶、苗、彝、仡佬等各少数民族，长期受到封建制度下的土司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没有政治地位，生活极端贫困，对统治阶级有着刻骨的仇恨，有迫切的革命要求。其二，右江

^{①②③}分别见《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第600、80、18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

地区的工农运动可以进一步深入发动起来。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开展得比较早，在壮族革命领袖韦拔群的领导下，向统治者开展多次猛烈斗争。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已经发动起来，这个积极性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而不断增强。发动群众工作完全可以深入下去。其三，马列主义可以进一步深入右江各族革命人民的心中。马列主义在右江地区的传播始于1926年广西省立第五中学即百色中学进步学生黄永达、滕煊甫等8人将中共创办的《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在学生中传阅，在周会上演讲，对马列主义在群众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韦拔群、黄治峰等分别在东兰、奉议、恩隆等地举办农民运动讲习班，进一步宣传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的思想，为马列主义继续深入宣传打下了好的基础。因此马列主义的深入传播，并为广大群众所领会和掌握，这不但是继续深入宣传的必要，而且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正是邓小平同志这样的相信群众，到右江地区发动和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和右江根据地充满了信心，并产生了强烈的革命积极性。

二、深入宣传发动群众

革命事业本来就是群众的事业。因此，必须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没有群众的参加，革命事业是不能成功的。红七军1929年12月制定的《目前实行政纲》，第一条就提出用民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百色起义前后，邓小平同志组织拟定的《右江苏维埃各级政府组织与职责》，就明确规定区、乡苏维埃政府中的青年、妇女、工人委员要做好发挥

这些群众组织的作用的工作。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共右江前敌委员会于1930年9月9日发出第六号通告，规定了“右江党的策略”，指出党的任务是发展组织，加强党的力量，加紧党的政纲的宣传，“集聚广大的群众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来促进革命高潮。”^①前敌委员会于9月19日又发出第七号通告，分别规定“右江党的工作方针”，在赤色区域、白色区域和半红半白区域的具体要求。在赤色区域，要求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加强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发展农会和赤卫军组织；在白色区域要求“公开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斗争”，以“团结广大群众”为“白色区域中群众工作的重要策略。”^②在半红半白区域，要求“组织农会，以建立群众组织的基础”^③。这充分说明，邓小平对群众工作是不满足于已取得的基础，而是要把宣传发动群众工作深入下去。为了实现党的策略和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志走到哪里，就把群众工作做到哪里，并且把深入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当作最迫切的任务来抓好。邓小平同志抓群众工作的方法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深入到干部群众中去，做过细的宣传发动工作。小平同志来到右江各地，常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他常常和其他领导人一起，深入到百色广西省立第五中学的教师和学生中去，有时还到街道工人中去，通过与教师、学生和工人交往，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用革命的思想对他们进行宣传。他到恩隆、奉议、东兰等地，常常和干部群众促膝谈心，讲革命的道

^{①②③}分别见《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第336、346、36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

理。他在宣传中，态度和藹可亲，平易近人，讲话诚心诚意。如他到向都县赤卫军总指挥黄绍谦家，与黄讲许多革命道理，促膝谈心，首先肯定黄绍谦的革命行动，然后语重心长地说：“看一个青年革命不革命，不是看其出身如何，主要看他本人表现怎样。”并鼓励黄绍谦继续投身革命。他的谈话使黄绍谦十分感动，提高思想认识，效果很好。黄绍谦后来在革命极为艰苦复杂的斗争中，成长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为革命做出牺牲生命的贡献。

第二，通过召开各种会议，做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宣传发动群众，要达到广泛的程度，就要有一个好的方式。邓小平同志在右江根据地宣传发动群众最常用的方法，是召开各种群众会议来进行。如百色起义前夕，他曾与张云逸、陈豪人等领导人，到广西省立百色中学利用学生会召开的会议和学校的周会、班会进行演讲；在城镇则组织街道各行各业工会开会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在农村则分别召开农运骨干、青年、妇女、儿童团会等来做宣传发动群众工作。由于宣传面十分广泛，参加的人多，造成一种大声势，易于产生共识，宣传发动群众效果更好。

第三，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通过他们去做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邓小平同志在创建右江根据地的斗争过程中，曾在各地举办过这类训练班多次，对提高参加学习的骨干的思想水平和经过骨干去宣传发动群众，都有很好的效果。如为了在右江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邓小平同志1930年4月在东兰举办一期党员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200多人，随后在东兰各地先后办了6期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1000多人。1930年7月邓小平、张云

逸同志在恩隆县平马镇西街办一期党政干部学习班，学员50多人，来自东兰、果德、思林、镇结等右江沿岸各县。培训这些骨干，学习邓小平、韦拔群东兰武篆的土改试点经验后，到东兰、凤山和右江沿岸的果德、思林、恩隆、奉议等县各地广泛宣传群众，很快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风暴，使根据地的建设得到蓬勃发展。由于这些干部、党员经过学习提高，去做群众工作，更能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因为这些干部、党员是群众的代表，和群众的关系更直接，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更能从实际出发，结合群众的思想做工作，更有说服力，群众容易接受。

第四，利用书、报、标语、布告等宣传方式，做宣传发动群众工作。红七军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创办《右江日报》、《士兵之友》刊物在群众中和士兵发行。右江苏维埃各级政府成立后，推行重大措施，都形成布告、通告、告民众书等形式，张贴各地公共场所，宣传共产党的各项主张。这种宣传发动群众的形式，效果更好。群众常常层层迭迭围观，争先恐后，一睹为快；有的看了又看，深入领会；有的抄录下来，互相传看；有的文盲群众还请先生读给听。右江苏维埃政府还根据小平同志的建议，编写《工农兵识字课本》第一、二册，在兴办的农民夜校里作为教材发给农民群众学习，两册课本仅几千字，其内容是党的性质和共产主义理想、党的方针政策、剥削阶级的本质和罪恶，等等。对广大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产生深刻的影响。夜校里教唱的革命歌曲、唱的山歌，都是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宣传发动群众的方法，使革命道理深入人心，同时普及文化知识。对群众的宣传发动作用很大。

三、正确执行群众路线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类世界离开人民群众的创造，这个世界就不能存在和发展。中国革命是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共同来做，革命力量才大，革命才能获得成功。但发动人民群众共同完成的事业，就必须有一条发动群众的正确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这条路线还需要党的领导者和广大党员共同实践和总结。在右江根据地，邓小平同志对群众路线的实践，既非常认真，又大胆去做，既力求稳妥，又积极开创，努力做到正确执行群众路线。邓小平同志正确执行群众路线，主要做好如下方面的工作：

1、突出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

百色起义后，右江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各级政府，人民群众得到了政治上的翻身，但人民群众最渴望最迫切需要得到的是经济翻身。这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如果革命能解决群众这个问题，革命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百色起义前后颁发的纲领、各项方针政策，都把土地革命作为重要内容，为了实现解决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同志从上海向中央汇报回到右江根据地，立即在东兰、凤山、凌云等县开展了土地革命。接着又在右江沿岸的果德、思林、恩隆、奉议等县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广大的各族贫苦群众祖祖辈辈历来少有或没有土地，经过土改，长期梦寐以

求的土地一下子得到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各族人民群众无不欢天喜地。因此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大大高涨。他们不但积极送子参军，还积极生产种地，多打粮食，支援革命。各地人民群众还根据苏维埃政府制订的法令、法规等，没收地主的粮食和其他财物，分给贫苦的各族农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还给予各种特别的照顾。如瑶族，他们居住在高山上，生活条件艰苦，生产条件很差，政府就分平地给他们，他们不愿要就分山地给，瑶族人民第一次享受到了民族平等的权利。

由于抓住解决群众根本利益的关键问题，右江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轰轰烈烈，势不可挡。根据地的建设迅速发展，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整个右江地区各地城镇和乡村，都出现革命胜利的喜人景象。如果不解决群众的根本利益，革命不可能得到各族群众的拥护，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发动，更不可能使革命深入发展，持久和巩固。抓住解决群众根本利益的方法，是邓小平同志摸索和实践的群众工作方法，是开创性的群众路线的经验。

2、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是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党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以为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利益为目的，除此没有别的。因此，每个共产党员为党工作，就是为党、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牺牲自身利益的实践。邓小平同志走上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和右江根据地，是以为党、为人民谋利益和以牺牲自身的利益为目的，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为党的群众路线做出的实践。邓小平

同志在右江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早已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革命斗争的艰苦、恶劣、残酷、危险，对他是习以为常的事。在从上海到百色的数次往返中，是穿梭于敌人的枪眼里工作，在指挥战斗中，他常常冒着弹雨的危险。但他从容不迫，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如1930年4月间，邓小平同志由韦拔群派营长黄昉日从东兰武篆带两个连士兵护送去找李明瑞总指挥和张云逸军长，当走到与河池县交界处一座山腰时，被东兰县民团司令带200多团丁在路两旁夹击，情况十分危急，邓小平同志想的不是如何脱身，而是想方设法打败敌人。邓小平同志立即命令战士们卧倒，又命令黄昉日冲向前去，由于敌人占据了制高点，冲不上去，邓小平同志又命令他从侧面绕道抢占山头，向敌猛烈射击，使敌腹背挨打而急速溃退。

邓小平同志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多方面的。他在行军中，宁愿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或驮行李；他每到红七军的某一部队，就要到战地临时医院去查看伤员病情，安慰和鼓励他们养伤，并尽量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在红七军经费极端缺乏的情况下，还安排给伤病员发零用钱；他到根据地各地去视察，常常到老贫苦农家去访贫问苦；对困难的户特别照顾，安排红七军干部给困难的户送去必要的钱；派红七军干部战士帮助住处破烂的群众修补房屋，等等。

对群众路线，邓小平同志在领导百色起义中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姿态，做出了巨大贡献。

3、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小平同志为了把右江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搞好，他和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于1930年4月首先在韦拔群的家乡武篆搞试点，在东里屯办了共耕社，亲自到共耕社成立大会上讲话，接着在附近的江平、上圩搞点，取得了初步的经验。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东兰、凤山等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邓小平、韦拔群、雷经天等同志总结了这两个县部分乡村进行土地革命的经验，并结合红四军在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实践，研究讨论和制订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这两个文件，分别于5月1日和15日以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名誉颁发到右江根据地各县。果德、思林、恩隆、奉议等县以这两个文件为依据，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

一个试点的带动带来了整个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全面开展。这是邓小平同志对群众工作的科学创造。这种方法在当时党的历史上是一种开拓和创新。这一群众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领导方法上的体现。一开始就显示了实践真理性的优点：一是用具体、生动的实践经验来宣传、教育、发动群众，使群众易于接受；二是工作方法上的稳妥性，避免陷入盲目性；三是说明邓小平同志和红七军领导集体探索一条我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显示邓小平同志青年时代领导中国革命的卓越才能。

4、认真组织和发挥各种群众组织的作用。

相信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真

理，就要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而这正是正确执行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群众组织是党和群众相联系的桥梁，它起到党的方针政策能够顺利畅达于群众之中并且得到贯彻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创建右江根据地的斗争中，处处注意发挥各种群众组织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到右江地区前，这里的农民协会组织如雨后春笋，普遍在农村各地建立起来。邓小平同志来到右江地区后，加强对农民组织的领导的同时，加强了对工人、妇女、青年学生等组织的工作。（一）宣布废除地主、资本家对工人、农民的剥削制度。如给工人增加工资，工人工作时制废除后，工作时间由原来的10多个小时定为8小时等。（二）派红七军战士、党员、骨干等，到各地去，健全农民协会、协助建立工会等组织。陈豪人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中说：“当时军委用很大力量做百色工作，建立19个工会，工人群众的情绪甚高，要求加薪改良待遇的斗争接踵而起……均得到胜利。^①”前委于1930年9月19日发出通告第七号《目前党的工作方针》，就规定各级苏维埃进一步发展“进行各种斗争的组织，如交通队、运输队、侦探队、破坏队、少年先锋队等等”，“发展雇农工会组织”，各县组织雇农工会，各区组织雇农分会，各乡组织雇农小组。^②这些组织在根据地的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三）为群众组织制订工作职责。如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制定的各级政府与组织的职责，区、乡政府职责中分别同时制订了工人、妇女、青年委员的职责^③。（四）在苏维埃各级政府的委员中，安排工人、农

^{①②③}分别见《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第347、344、152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

民、妇女、青年委员，提高群众组织的地位。以便发动各阶级、阶层群众参加革命活动。（五）把革命工作任务交给群众组织去做。如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用船把军械运到百色后，为了安全，安排苦力工会派出50个工人把军械卸下后运到红七军政治部清风楼附近的临时仓库存放；为了保密，红七军宣布起义前印制的宣传品是邓小平同志指示袁任远，由百色总工会派出5个工人印刷的；邓小平同志指示广西省立五中百色中学青年学生组成宣传队，到百色城郊进行革命宣传；安排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组织配合红七军战斗，做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等等。

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利用群众组织去做党的工作，对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乃至党的各项具体任务，具有可靠的保证作用。因为：一是具有直接实践的意义。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具体工作安排，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来考验，群众组织去完成党的工作，就是带着问题出去，以解决问题而归。实践结果是否正确，十分清楚。二是具有检验的作用。群众组织是在群众中工作的，是革命分子溶化到群众的海洋里的，与群众有更直接的联系，党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一旦贯彻到群众中，就可实现检验的直接性作用。三是（随着前二点）可根据情况，尽快调转和纠正党的方针和政策，争取革命的主动，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办公室 梁明辉）

论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

由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韦拔群等策划和领导，1929年12月11日，举行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简称红七军），创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简称右江苏区）。百色起义后，右江苏区党（统称右江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有中共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和中共右江特别委员会。在红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的领导下，苏区共辖15个县，其中有10个县建立了县一级的党组织。全苏区有党员2000多人（其中红军党员500余人）。可以说，百色起义的胜利，红七军的诞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以至整个右江苏区的创立和建设，都是在右江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各族人民艰苦奋斗而取得的。邓小平领导的右江党的建设有以下的特点：

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党

右江苏区地处桂、滇、黔、三省交界，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人口110万人。它是广西边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山区，这里不但没有大工业和正统的产业工人，而且长期遭受豪绅地主的反动统治和残酷的民族压迫。虽然阶级剥削和民族仇恨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容易为各族人民所接受，并从1926年秋起就建立了党组织，但是人们毕竟缺少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和先进思想。在这样的地方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要受到农民思想的影响和干扰，一些党员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淡

薄。正如1929年9月间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广西党过去组织工作未上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一）各级党组织全停留在小资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基础很薄弱；（二）没有无产阶级的成份参加党的指挥机关，党的指导受了农民意识的反映。”^①这个决议精神后来也在右江党内进行传达贯彻。各级党组织根据决议指出的问题，在开展党的建设中，特别注意进行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教育，不断克服和抵制农民思想意识的影响。

右江党组织特别重视在党员和革命骨干中进行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教育。在每次发展党员和成立党组织时，或者在党的各种会议上都反复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使党员和骨干分子对党的性质有一个明确的认识。1930年4月，红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在东兰武篆开办党员训练班，用的《教学笔记——政治常识问答（党员须知）》中写道：“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领导工农兵（原件缺13个字）级，使世界无产阶级得到彻底的解放，实现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②还指出：“共产党是工农劳苦群众中之最坚决、最勇敢的分子组成的，他是革命的指挥部。”^③接着还把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性质的根本不同作了对比，说明在当今中国只有“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领导被压迫阶级，推翻帝国主义、铲除军阀地主”^④的政党。可

^①《广西党政治任务决议案》（节录）（1929年9月13日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见《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5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②③④}《党员须知》（1930年4月）。

见当时对党的性质的解释是很准确的，对党员教育是很深刻的。

此外，为了使党的性质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右江党组织还通过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性质和革命主张。当时编写并组织群众学习的《工农兵识字课本》第一册第20课的题目是共产党，课文为：“共产党领导工农做革命，他是无产阶级的救星。”^①第二册第11课的题目也是共产党，课文为：“共产党是为工农兵及劳苦群众谋利益的政党，所以能够得到工农兵贫民的拥护。”^②通过对党的性质进行这样简明扼要的宣传教育，加上在现实斗争中是党领导工农兵群众斗豪绅，分土地，全心全意为他们谋利益，使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深深地扎根于苏区的工农兵群众之中。

还有，针对阶级敌人对中国共产党恶意诬蔑和歪曲宣传，以及部分群众对中共党性质的怀疑和误解，右江党组织特别注意在对外发布的各种通知、布告、标语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主张。这些广泛的有针对性的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宣传，更加扩大了党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无产阶级政党，重要条件之一是因为它以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右江党组织除了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教育和宣传外，在实践中非常注意以无产阶级为基石和核心。百色起义和红七军建立不久，1929年12月20日发布的《前委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中第二条关于建党“注意中心工作”指出：“地方党部

^{①②}《工农兵识字课本（第一、二册）》，均见《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二）第138页、第145页。

（特别是百色、平马、那坡）须注意政治、经济中心之市镇圩场及交通要道的乡村中党的中心工作。而且要特别注意贫农及农村无产阶级。”^①第九条规定“发展组织”要“最大限度的发展同志，特别注意在工人中发展”。^②由于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在起义前后就非常注意城镇中的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工作，把虽然只占少数的工人阶级发动起来，组织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如百色县在百色起义前夕就成立了总工会，会员有1000多人；恩隆县成立平马总工会，下辖苦力、泥水、烟丝、理发、五金等9个行业工会，共有会员300余人，此外还有田州、那坡、果化等工会，会员也达1000多人。通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工人当中涌现出一批优秀分子和中坚力量，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城镇工人中建党，发展工人党员，毕竟还是少数。右江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主要靠在农村中发展党员。为了保证党员质量，保持党的先进性质，右江党组织的发展，非常注意以农村的雇农和贫农作重点发展对象，把雇农和贫农当作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当时发展的党员大多数是雇农和贫农，正如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关于红七军红八军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指出：右江地方党组织“共有千余党员，成份上是雇农、贫农占多数，余为中农，还有很少数的富农及知识分子（都是比较老的党员）。”^③右江党组织雇农贫农党员占多数，是由右江党领导机关建党的指导思想所决定的。1930年9月在《前委通告（第七号）——目前右江党的

^{①②}《前委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12月20日），均见同①第125页。

^③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

工作方针》指出：党组织要“发展雇农工会的组织。土地问题只有在农村无产阶级——雇农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决，才能深入。因此组织雇农工会为苏维埃的核心，最为重要。……党必须加深雇农工会的工作，以雇农工会的力量，在苏维埃中起领导作用。”^①由于右江党注意在农村雇农、贫农中建党和发展党员，发挥了他们核心作用，使苏区的土地革命不断深入，各级苏维埃政权雇农、贫农占优势，红军和赤卫队不断扩大。一些贫苦出身的共产党员，带领本地农村的革命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在革命斗争中成为农民领袖和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党组织和党员

革命理论是革命行动的指南。右江苏区各级党组织的顺利建立和迅速发展，正是这里的党组织重视和不断加强革命理论学习，搞好党的建设结果。

百色起义胜利之后，右江党组织注重理论学习，首先在党的各种文件中规定了各级党组织的理论学习、培训干部的任务。百色起义后的第九天，前委就发布了《前委通告（第二号）》，这个文件的第三大部分是“创造干部分子”，专门提出了举办训练班，学习基本理论，培训党员骨干的问题。该文件指出：“平马、百色、东兰即开办中坚同志训练班，在短期内施以基本理论之训练。……多召集活动分子会，报告各种重要问题。”^②这个文件在第四大部分“健全

^①《前委通告》（第七号）（1930年9月19日），见同①第342页。

^②《前委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12月20日），

支部生活”中还提出：“支部人数多时分小组，小组会议多讨论党的基本理论问题。”^①遵照前委这些指示精神，红七军和右江各级党组织都全力以赴，在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的学习，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工作。

在贯彻前委第二号通告的过程中，前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作出了表率。1930年4月，前委书记邓小平、前委委员、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前委委员、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等在东兰武篆开办了一期党员训练班，党员来自右江的各县的党员干部共200多人，时间一个月。邓小平、雷经天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仍亲自编写教材，亲自给党员讲课，轮流隔三天讲一次，风雨不误。他们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常常采用启发式教学，党员们既明白，又爱听。解放后收集到的《政治常识问答（党员须知）》、《革命常识问答》、《经济教授提纲》等3篇教学笔记，是这个训练班使用的教材。把3篇笔记作为训练班的教学重要内容，其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一是进行宣传教育，帮助党员弄懂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任务，培养学员树立革命思想，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二是帮助学员领会、掌握当前党的中心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使学员能在党分配的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战斗作用；三是帮助学员充分认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右江地区农村，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为右江党组织的发展，并由地下活动状态逐步转向公开活动创造条件。当时这样的训练班仅东兰县1930年就举办过6期，培

^①《前委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12月20日），

训的学员达1000人左右，全县的党员干部基本轮训过一次。

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和适应形势发展，1930年7月红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在恩隆县平马镇西街创办了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为右江各县培训干部。这个训练班先后办两期，学员来自东兰、果德、镇结、恩隆、奉议等县共100多人。邓小平、雷经天等亲自给训练班讲课。邓小平讲课的内容，是阐述国内外阶级矛盾和我们如何利用矛盾，壮大自己的策略；还讲党的有关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实行耕者有其田等等；他还介绍东兰县东里村共耕社和东兰、凤山开展土地革命试点的情况。雷经天讲解《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社条例》的内容和右江苏区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步骤和办法。这些课，理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学习结束后，大家掌握了武器，又分别回到各地去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建立和扩大工农武装的革命活动，右江地区的革命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右江党组织还注意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理论和党的主张。1930年初，在苏区兴办了劳动中学和劳动小学外，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农民夜校，由乡干部和劳动小学教师兼任夜校教员。当时，编写和出版了《工农兵识字课本》（第一册）、（第二册），作为群众夜校的教材。第一册有40课近1200字，第二册有26课近5000多字。课本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共产主义理想；二是阐明当前党的斗争任务及方针政策；三是揭露豪绅地主、军阀、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罪恶。当时在根据地内普遍组织群众学习这两册《识字课本》，一方面可以达到识字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对群众一种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及党的知识的宣传，收到很好的效果。当时为了公开宣传党的主张和大造革命舆论，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进驻右江地区以后，广西前委（1929年10月30日通知建立）曾在百色城办了一张对开铅印小报《右江日报》。《日报》每天出一期，成为右江苏区唯一的新闻报纸，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另外，还组织宣传队深入群众到基层宣传，1929年12月18日《右江日报》登有《宣传队下乡情形》的新闻。说的是百色起义后第3、4天——12月13、14日，红七军政治部宣传队下到百色城附近那毕村宣传的情况。两天内宣传队到那毕村、石龙村、绿料村和那马村进行宣传，每次听众均两、三百人。他们一面宣传红七军的革命主张，一面组织农民协会。群众称赞“红军第七军真是工农群众革命之先锋队”。①除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有专业的宣传队外，在苏区的各县、区乡，也都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组织了有青少年、妇女积极分子参加的宣传队。宣传队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活动，鼓舞群众斗志。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30年11月红七军改成师团建制后，十九、二十师7000余人北上江西中央苏区，只留二十一师在右江苏区坚持斗争。因兵源不足，前委只颁给二十一师番号。当月末二十一师在右江苏区将各县赤卫军组建成4个团，共3000多人，师长韦拔群，师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松坚（黄明春），参谋长黄大权，政治部主任陆浩仁。1931年春至1932年秋，国民党反动派三次派兵大举“围剿”右江苏区，豪绅地主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右江革命斗争转入低潮。在革命越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右江各级党组织及党员群

①《宣传队下乡情形》。

众更加坚信革命的信念，同阶级敌人作殊死的斗争。韦拔群、陈洪涛等二十一师的领导人，带领全体军民浴血奋战，从不动摇。后来，由于叛徒出卖，韦拔群、陈洪涛、黄大权等遭敌人杀害；1932年冬，根据地基本丧失。但是，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

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根本组织原则。右江党的组织，围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和建设根据地等任务，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党建设成组织严密、思想统一、纪律严明、队伍整齐、步调一致、团结战斗的坚强组织。

首先，右江苏区加强宣传和学习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1929年9月13日，中共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决议案》，后来这个决议案在右江苏区各级党组织普遍作了传达和贯彻。决议案对民主集中制提出这样的要求：“建立健全支部……厉行集体的指导。发展党内的讨论”。^①从贯彻广西党代会这个决议精神的时候起，右江各级党的组织认真总结过去不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把贯彻这个党的根本原则提到党的工作和议事日程。1929年12月20日，中共红七军前委发布了加强党的建设的第二号通告，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建设，作了比较全面和具体的规定。前委第二号通告指出：“平马、百色、东兰即开办中坚同志训练

^①《广西党政治任务决议案》（节录）（1929年9月13日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见《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5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

班，在短期内施以基本理论之训练。”^① 1930年4月，前委和右江特委在东兰武篆举办党员训练班，教材《党员须知》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党的主要问题应该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一切问题在未决定之先，党员可尽量讨论，发表个人意见。但在成为决议以后，只有绝对服从决议，上级机关应采纳下级机关意见，下级机关要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指示。”^② 由此可见，右江党组织对民主集中制的宣传和学习是比较深刻，比较系统的，党的干部和基层党组织对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思想认识上是明确的，在贯彻执行是有力的。

其次，右江党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党的组织机构。各级党组织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明确了党组织上级下级的关系，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党同政权及群众组织的关系等等。红七军党的组织系统，前委第二号通告是这样规定的：“1、前委之下，各纵队设队委。2、纵队之下，各营设营委。3、每连设一支部，军官与士兵同志混合组织。4、各营委及各支部由各直属队委指挥。教导队支部、训练所支部、政治部支部、军部支部及特务营营委直属前委指挥。”^③ 关于部队党组织同地方党组织的关系，通告指出：“地方党部与所在地军队中最高党部发生平行关系，但受前委之指挥。”^④ 通告还规定了部队负责健全地方党部的任务：“1、指定一部分同志专负地方党部工作。2、军队中党部应给地方党部以各种帮助。3、引进积极的农民分子参加地方党部指导机关。”^⑤ 至于地方党组织的建立要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员

^{①②③④⑤}《前委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12月20日）。

须知》明确规定：“党的组织系统，以共产国际为最高指导机关，其下为各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省委员会、县委员会、支部。”^①还指出目前建立党组织的一些原则：“1、从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纠正和平发展的现象；2、加紧改造旧的组织基础；3、建立中心工作；4、健全地方党部；5、创造支部生活；6、党员职业化、生产化、群众化。”^②根据这些原则，党组织在各个时期都建立了领导关系明确、组织系统严密的党的组织机构。在百色起义胜利建立各级政权之后，在各级苏维埃及青年团、工会里的党组织的建立问题，前委第二号通告也有比较明确具体的规定：“党在群众指导机关中，如有三同志，即须组织党团，暗中起领导作用。”^③

其三，坚持党集中统一的领导。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辩证的统一，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右江党组织在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党的集中统一，强调党的集中制，特别强调关于党的方针政策和各种重大问题，要经过集体讨论，统一认识，作出决策，反对家长式，反对个人独断专行的错误倾向。在前委第二号通告中，第五个大问题就提出“注意集体指导”的问题。这个问题规定这样3条：“1、党内一切重要问题均应召集各级委员会讨论决定。2、临时问题及日常细小问题可由书记解决，但解决后应向各委员（或干事）报告。3、在指导机关中同志（如前委委员或队委、营委委员、

^{①②}《党员须知》（1930年4月），见同①第171页。

^③《前委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12月20日），

支部干事)应经常的注意党的工作问题,不可一切问题推在书记身上。”^①这些规定,既体现了党的集中统一的原则,又体现了分工负责领导制度。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右江党组织还做出有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规定。1929年在《关于各级党委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中指出:“各级党委及负责人对于带有全党性全面性的问题,应根据上级传达发言,不得标新立异,自以为是。县委(县工委、县特支)、团委会(直属营党委)不经请示批准,不得自行对外发表政治性的谈话,以及政治性的行政谈判。如属必须进行谈判,不能传达者,也应事后迅速报告。以避免错误或减少错误。”^②

其四,严格党内纪律。右江党组织为了完成革命斗争的各项任务,始终把加强党内的组织性纪律性,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战斗力,当作建党的头等任务来抓。前委第二号通告关于“严格执行纪律”提出3条:“1、下级机关服从上级机关的命令。2、党的一切决定任何同志均须遵从,不能随便以个人意见而更动之。3、同志怠工或表现不好,经警告后仍不改,着即驱逐出党。有贪污、破坏党在群众中义信者,毫无疑问的开除出去,必要时可向群众宣布。”^③根据这几条要求,后来红七军一直把加强军队纪律当作建设无产阶级军队一项重要内容,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真贯彻实行。为了使红七军的纪律深入人心,在根据地的军民中普遍要唱《红军纪律歌》,它的歌词是:“红军纪律十分的严

^{①③}《前委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12月20日),均见同^①第125页。

^②《关于各级党委请示报告的制度》(1929年),原件存右江革命文物馆。

明，凡我同志都要记清，这是我军主要的生命，沿着革命前途飞进；我们都是工农出身，工农痛苦知道最深，工农的东西得来不容易，一草一木不得损害；没收豪绅地主的東西，不得自己贪污归私，服从指挥员上交给养队，遵照规章统一处理；红军处处爱护群众，莫把群众利益损害，若要发洋财即是反革命，严重处分不得留情；为要发扬红军的强威，一切行动要听指挥，上级的命令下级要服从，不论官兵不得违背；无论战争时平时与行军，爱护群众保卫工农，力量真强大打得敌人怕，中国革命才得成功。”^①红七军书写在墙上的标语口号，有不少是宣传红军纪律的。如“不拉夫不发洋财”、“不奸淫掳掠”、“公平交易”、“不强买强卖”等等。红七军实行这些纪律，正确处理了军队内部和军民之间的关系，使它能够在民众之间，同时为民众所爱戴，从而不断发展壮大和节节取得胜利。

右江党和红七军不但制订了要求严格的革命纪律，而且还有严格实行纪律的制度，对违犯纪律也有一套的处置办法。在《党员须知》中，关于党的组织原则这一章，规定了违反党纪的处分共有四项：“1、口头警告；2、书面警告；3、留党察看；4、革除。”^②同时，这份《党员须知》对违反党纪的处罚制订了一个正确的方针和原则，即党的处罚不是惩办主义，而是着眼于教育提高党员的觉悟。这份《党员须知》提出：“但是党的处罚不是惩办主义。无论何人决免不了一时错误，若无教训的精神，徒呆板的惩办，是堵同志革命的道路，是减少革命的力量。所以，对于同志

^①《红军纪律歌》，见《右江革命史料汇编》（二）第151—152页。

^②《党员须知》（1930年4月）。

的错误，应深刻的批评，应严肃的处罚，不能放宽一丝一毫。但是要说服他，要想方法纠正他，即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也要在工作中去纠正他。若是对革命绝望的人，当然要开除他。在党内决没有死刑的处罚，即是反革命的，但是开除之后，所凭革命政府的处置。”^①由于对违反纪律的处分有了这一正确的原则规定，使右江党及红七军在处理违纪工作中，没有犯过“左”和过右的错误，能够团结全党同志，包括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同心同德，为党的革命事业英勇奋斗。

(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办公室 农武)

^①《党员须知》(1930年4月)。

邓小平实事求是创建人民军队的两点经验

· 黄林毅 ·

邓小平同志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人民军队过程中，提出了两点十分宝贵的经验。

1、开辟了创建人民军队新途径，丰富了我党兵运斗争经验。

从争取、改造李明瑞，进而争取、改造他领导的军队这一角度讲，邓小平突破了党的六大以来把兵运工作过于强调放在士兵，忽视甚至反对做军官工作的错误倾向。他领导广西党组织把对上层的争取和对下层的改造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丰富了我党兵运工作经验。当时中共中央称这一行动是“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图的一次兵变^①”，并将经验传达推广至全党。1944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评价说：“六大以来认为在官长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后来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如李明瑞一个师变为红军、江西二十六路军的起义，都是军官领导的^②。”固然红七、八军的创建不仅仅是争取、改造了国民党上层军官的结果，但这是一个重要条件，也是它们在创建基础和起点上有别于全国其他红军的一个特点。为我党创建人民军队和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新鲜经验。

2、较早地提出了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思

^{①②}中共中央军委《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1930年1月）。

想，并制定贯彻这一思想的相应制度。

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是我军建军路线最根本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毛泽东于1929年12月起草的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首次在理论上提出和予以系统阐述的。这是我军建军路线形成的标志。在同一时期，邓小平在领导创建红七、八军的斗争中也提出和实践了这一思想。1930年2月间，他在帮助红八军一纵队健全党委时提出：“党委是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一切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党委讨论通过才能执行。”在实践中，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制定并执行了两项有力的制度：一是学习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的建党建军经验，部队的党支部建在连上，营以上皆建立党委，军部设前委为部队最高领导机关；二是建立政治委员制度，连以上都设立政治委员或政治指导员，由各级党委书记担任，与各级军事指挥员同为部队行政首长。当时红七军是党组织比较严密和政治工作机关比较健全的部队，因而战斗力也是较强的。值得指出的是：红七军在学习红四军，制定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一些具体制度上有所创新。如当时红四军在营一级不设党委和政治首长，只设直属支部，而红七军两样都设立了^②。后来全国红军在营一级都普遍设立党委和政治首长的事实证明，红七军在此方面是先行一步，起了开创作用的。红七军作为当时全国的主力红军之一，它的建党、建军经验，对于丰富毛泽东建军思想和建立它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及推动我军形成一系列建军原则和制度，其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①②}袁也烈《苦战七千里》（1981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西革命斗争回忆》）

邓小平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禁烟策略初探

民国时期，鸦片种植、交易及过境，是百色地区独特的经济现象，也是广西省财政的支柱。百色起义后，如何对待鸦片生产、贸易、过境，在一定程度上对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产生重要的影响。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红七军正确地处理这一棘手问题，给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实事求是处理鸦片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策略思想。

右江地区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种植、交易鸦片。北部的西林、隆林、田林、乐业、凌云等县，因有适合的土质、气候和政治条件而成为右江地区主要的鸦片种植区。到民国年间，年种植一般为2万亩，最高年份达8万亩，产量一般为100万两，最高达400万两。右江是鸦片贸易和过境的黄金水道，年交易和过境量2000万两，最多的达3700万两，绝大部分是云南、贵州烟土。鸦片种植的增多和贸易的繁荣，成为广西省政府财政税收大户，改变了右江地区经济结构，也给人民以极大危害。

首先，桂军和广西省政府起家和本钱，就是在右江地区收取的鸦片税。1926年，广西实行寓禁于征政策后，把禁烟罚款征税正式列入省政府预算，每千两烟土收禁烟罚

金国币500元。一般年度的烟税收入1000万元以上，最多的达1500多万元，占省财政收入一半以上。1926年，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变卖刘日福在百色收缴的70万两烟土所得的70万元，开办广西银行，继而用该银行资金办工厂、学校，修公路，办农场等，启动了广西经济。而1936年，桂军发动“六·一”反蒋运动，蒋介石命令云贵两省贩运烟土不准经过广西，当年广西烟土税只有400万元，桂军被迫屈服，并蒙受重大经济损失。此外，驻右江地区的桂军也大肆收取烟土保护费，云贵到百色每两收二三角，百色到梧州等地每两收六七角之多，仅此一项，桂军每年即可收取几百万元（有的烟帮不请桂军护送），再加上军队可“依法”没收“非法”烟帮的烟土作价变卖，可见桂军、桂省政府的存在和发展，非依赖右江地区烟土不可了。

其次，对右江地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产生了影响。种植鸦片，除极少部分自用外，绝大部分作为商品来交换。鸦片的贸易和流通，极大地刺激鸦片的种植，给自然的农业经济以极大的冲击。但必须指出，在当时，种植鸦片仍采用自然农业经济生产方式，而鸦片贸易与流通严重地违背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鸦片战争时殖民主义者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同样，广西军队和政府用刀枪和棍棒撬开了右江闸门。在鸦片种植和贸易过程中，右江地区没有摆脱落后的经济境况，表现在：到1929年，仅在百色、那坡、平马等镇有些小工业，总资本10万元左右，才是一个烟帮一次烟土交易的四分之一；农业还处在典型的自然经济状况，土地分散，粮食平均亩产低于广西平均亩产的1/4，缺粮户占农户90%以上，商品贸易以烟土为主，无商不贩烟，土特产开发经营很

少，工业品市场很小。可见鸦片并没有多大改变右江地区自然的农业经济格局。

再次，引起桂军和桂省政府对右江地区的重视。新旧桂系时代的陆荣廷和李、白、黄，都派重兵驻守右江，先后有刘日福、马玉成、陆云桂等。旧桂系参加护送烟帮和直接参与贩卖，或采取扣押办法中饱私囊。新桂系上台后不久，即于1926年颁布禁烟令，省和地方设立禁烟局，但军警、政府、禁烟局并不禁种、禁运鸦片，而把禁烟罚款正式列入省政府的财政预算，把驻军就地筹的烟饷也改归省财政厅，禁烟令被用作为收取烟税的法律依据。这就是桂省政府的所谓“寓禁于征”政策，禁是为了征，征是为了鸦片贸易和种植的发展，种植和贸易发展了，征得的越多。不禁，种烟贩烟不违法，收取罚款于法无据，禁令越严，罚之越重，征之越多。各级禁烟局实际上是收取罚款局，在新桂系时期，鸦片越禁越泛滥，个中原因，就在于寓禁于征。所以说，桂系对右江地区的重视，只重视鸦片税，而工农商学事业则撒手不管或者理之甚少。

二

鸦片问题，不少革命根据地都碰到，但在处理上则不尽相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财政很困难的时候，就采取没收变卖的办法处理过鸦片问题。在鸦片肆虐的右江地区，邓小平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坚持党的原则，又采取灵活的策略和措施，即从禁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出发，以禁烟为原则，采取寓征于禁的策略，又禁又征，禁征并举。邓小平采

取的这些策略，是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典范。

在处理鸦片问题中，红七军首先设立禁烟机构。起义前，禁烟之事由张云逸以右江督办身份亲自办理。张云逸以右江督办名义通知右江各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烟款上缴，一次便收烟税几万银元，起义前夕还禁锢各县县长和禁烟局长。起义后，红七军在百色设立禁烟总局，由叶季壮任局长，专事禁烟和收鸦片过境税（一说设禁烟督办，张云逸任督办）。县区乡无禁烟机构，由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兼管，但禁烟之事重大，主要由红七军禁烟总局专司负责，政府管理的甚少。

其次，集思广益，民主讨论确定禁烟策略。在禁烟与不禁烟问题上，邓小平与红七军其他领导人持坚决禁的态度。但在如何禁的问题上，领导人中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要禁烟，就马上坚决禁种、禁贸易、禁过境、禁抽吸，见烟土就没收销毁；一种意见认为，禁烟是一个较长过程，当前只能在根据地内禁烟，但允许烟土税后过境。陈豪人。1930年1月给中央写的《前委工作报告》中说：“在转变前二、三天，百色有烟土六□□□捣乱运往南宁……平马……，当时对于是否扣留烟土问题，在党在（内）争论颇久，最后仍决定放行”^①。同月邓小平到中央汇报时，也汇报了红七军处理鸦片的态度和他的看法，汇报说：“我们现在扣留鸦片已有数十万两，因为尚不能即刻用焚毁方法，故还是由加重其税务方法，约可收税十余万”^②。这引起了广

^{①②}的资料分别来自《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162页、178页。

东省委一些领导的不同看法，他们在讨论布置红七军工作时说：“我觉得鸦片要一定不能用税收方法，而且靠这笔钱来给养红军，对于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坏，一定要有没收的前途”^①。邓小平在讨论中再次阐述自己的观点。讨论的结论基本上与邓小平的观点一致。讨论的结论是：“对于鸦片烟的问题，要有正确不背原则处置；……如果贩运只是从当地经过而还不在于当地贩卖并不要扣留，还是要加重税务的方法来解决”^②。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对禁烟问题也有类似上述的指示。可以说，邓小平的禁烟策略是经七军前委讨论并得到中央的赞同的。

在禁烟过程中，邓小平采取寓征于禁的策略。这个策略与桂军的寓禁于征政策貌合神离，表面上两者都有禁有征，性质上禁的手段和征的目的不同。根据邓小平和红七军领导在各种报告中提到的有关禁烟资料，右江革命根据地采取禁烟策略的主要内容是，既禁烟，又允许鸦片烟贸易、过境。禁烟是原则要求，是共产党和红军努力争取实现的目的，是长期任务。禁烟的手段和范围，在当时是禁止红七军官兵、赤卫军官兵、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吸用、营运鸦片烟，在根据地内不得种植、贩卖，没收大商家的鸦片，同时向根据地群众作反鸦片烟宣传，待群众觉悟后全面禁止吸用、营运。允许鸦片贸易和过境是权衡利弊的暂时的应变策略，即只在根据地内禁种、禁贩卖，在红七军、苏维埃政府等革命人员中禁吸用、营运，其他人员贩运过境的不予没收扣留，只是特别加重税收后放行，有的还派军队护送到南宁。可见禁的

^{①②}的资料分别来自《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年11月版第185页、193页。

手段是征，征的目的在于禁，而禁的范围和对象逐渐扩大，这与桂军的寓征于禁有着本质区别的。

对于采取寓征于禁的策略，邓小平态度很坚决。邓小平从党的原则和右江地区实际情况及特点出发，认定只有用这个策略才能在右江革命根据地解决好鸦片问题。邓小平认为：“我们如果马上就做到没收鸦片则我们在经济上，日用商品供给上一定要发生很大的恐慌，当然这个没收的鸦片决不能拿来卖，也不可能拿出卖，而且就是这样做也未必能杜绝民众对鸦片烟的嗜好，鸦片烟还是从其他处可以运卖。因此我们目前还是重其税务，当然我们还应做反鸦片烟的宣传”^①。当然，中央对邓小平这一禁烟策略也极力支持。中央认为：“在赤色区域，当然要禁止吸食。但目前……绝不能以一道命令来禁止贩卖。……而以加重税务来解决他。……我们还应从群众的本身来作反鸦片的宣传，……如当地群众已有基础，工农会起来通过不吸鸦片烟，那当然即可在当地以群众的力量执行严禁鸦片烟。但是这种禁止只能就当地执行，如贩卖到其他处去只是从当地经过，当地还不能执行扣留，还只能特别加重其税务。当然我们决不能对鸦片烟还‘明令保护’，反之，我们还要向群众解释特别加重其税务的意义和加紧并扩大反鸦片烟的宣传，渐渐用群众的力量来解决他”^②。概括起来，邓小平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禁烟策略有几个特点，一是区域性，即在红色区域禁烟，二是渐进性，即先进行反烟土宣传，群众觉悟提高后再行禁烟，三是人员限制性，即对革命人员禁烟，四是暂时性，即课重税后

^{①②}的资料分别来自《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87页、240页。

暂时放行，五是禁烟任务长期性，即在右江地区禁烟需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才能收到成效。

三

邓小平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禁烟策略，在客观上是右江地区经济特点决定的，同时也以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商政策为依据，在主观上是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思想灵活的结晶。

邓小平的禁烟策略是从右江地区经济特点出发的。如前所述，右江地区经济特点是工农业生产非常落后，一般商品流通很不发达，而鸦片贸易、鸦片过境则非常发达。对这一经济特点，邓小平到右江不久就了解得很清楚，正如他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右江地区经济状况时所说的：“当地无产业工人，只有市政工人”，“当地农民生活很苦，自耕农多，富农较少，雇农也较少，地主有，但还是中小地主占优势，大部分土地都分割在中小地主手中，故自耕农民很穷，每不够自己吃”，“当地商人多做鸦片烟生涯，甚至于小商人都加入股，在分红利上虽然有许多不平均，但是内部冲突和分化都不甚鲜明”，“此区商品的交换以鸦片为中心，商人都贩卖鸦片，鸦片烟公开的招股，甚至于小商人入股以求赢利的，都普遍异常”^①。在这种经济特点上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不能很快地靠发展工农业生产来维持，而应抓住特点，暂时在流通领域想办法，采取灵活的策略不失时机地维

^①资料来自《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8页。

持和发展商品流通规模，而右江地区商品流通以鸦片为中心，鸦片问题非常敏感，如何处理，关系到整个地区商品流通的兴衰，同时影响到红七军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如果红七军一成立就明令禁烟，禁止一切鸦片交易，堵截一切鸦片过境，就等于禁止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后果不堪设想。同时鸦片商可以易地交易，改道贩运，所以，邓小平从这一经济特点出发，提出了重税后放行的策略，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思想。

邓小平的禁烟策略是党的正确的工商政策的具体化的表现。民主革命时期，党对工商业的正确政策是保护并促进其存在和发展。《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施政策纲领》第十三条规定：“保护交通和商人营业”^①。右江苏维埃政府也明令：“疏通水陆以利行商，维持商场金融，保护商人贸易，禁止各机关无故没收商店，严防大资本家操纵商场”^②。鸦片烟虽有毒害人民的一面，但在右江地区，鸦片贸易制约广西经济，暂时驱动着商品流通。禁烟一方面是针对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腐败，另一方面涉及商人利益。所以禁烟在原则上具有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作用，而灵活的禁烟策略又有维持商品流通、保护商人利益的作用。如红七军成立后立即禁止一切鸦片交易和过境，其他商品交易就会随之停顿，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不符合党的工商政策。在苏维埃政府还不够巩固，群众对鸦片的毒害认识不深的时候，“在鸦片的贩运上还存有商人的作用”时，“如果贩运只是从当地经过而还不在于当地贩卖并是不要扣留，还是要加重税务的方法来解决，

^{①②}的资料分别来自《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05页、120页。

并且要与商人订合同，要他们以其他白色区转运日用品到红色区来，这样既不背原则又暂时可以使经济流通”^①。不没收不扣留商人的鸦片（反对革命的商人除外），这本身就是对商人利益的保护，同时也能消除商人对根据地的恐惧心理，增强对党的工商政策的信任，敢于贩运日用品到根据地交易，促进商品流通，具体体现了党的保护商人利益和促进商品交易的政策。

当然，鸦片不是一般商品，鸦片交易也不是一般的商品交易。所以邓小平在看待鸦片交易和流通上，把它同一般商品严格区别开来。仅从课税方面来看，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税种很少，税率很低，可对鸦片交易税，邓小平每次强调要加重税务后才放行。再从寻求解决红七军和根据地经济问题的主要经费来源来看，邓小平并不把收取烟土税作为红七军给养的主要经济来源，而以进行土地革命力求发展工农业生产来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目的。本来桂军每年在右江地区可收取上千万元的烟土税，红七军如收入到桂军的零头，则可维持经济不至恐慌，可是从禁烟原则出发，邓小平及其领导下的红七军，仅仅把收取烟土税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暂时的补助手法。1930年3月，邓小平回到右江后，在东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他认为红七军成立后没有立即开展土地革命是一个重要的错误，他指出：“惟当时前委没有将中心工作摆在发动群众深入土革上面，而决定了打南宁的行动”，“我们对此次行动指出了不但轻视了敌人，主要的还是忽视了发动右江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右江苏维埃政权的错误”^②。

^{①②}的资料分别来自《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93页、195页。

从这些认识出发，邓小平在东兰及整个右江革命根据地致力土地革命，指导右江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红七军从贵州到河池后，邓小平召集党员大会传达中央指示，决定回右江一个时期，并指出在这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右江土地革命及发展改造红军。这才有红七军回右江并在右江沿岸一带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既禁又征的策略的形成，反映了邓小平实事求是和灵活处理特殊问题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思想，在创立和发展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中是这样，在处理鸦片烟这一复杂问题时也是这样。首先，禁烟是党和人民大众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需要。鸦片战争后，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倾销鸦片，给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所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都禁烟。同样，鸦片也给右江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和人民带来极大的影响，所以红七军必须禁烟。但由于各根据地实际情况不尽相同，邓小平在右江根据地处理鸦片烟时没有照搬照套各根据地的做法，而是采取不明令保护也不明令禁止的办法。其次禁烟的策略符合右江实际经济政治文化特点。如前所述，在右江地区，烟片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特殊的问题。采取灵活的策略，既可维护党的禁烟原则的严肃性，又可兼顾右江地区的特点而保证禁烟的可行性。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就能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内逐步解决好鸦片问题。

在实事求是的同时，邓小平的禁烟策略还反映了其思想的灵活性。一是灵活地掌握和执行党的禁烟原则，不失时机地要求禁烟，而又采取灵活的禁烟办法。二是灵活地借鉴桂

军禁烟的经验教训，既禁又征，以征为禁，渐次进行。三是灵活地处理鸦片与一般商品的关系，遵照党的工商政策，巧妙地利用鸦片贸易和过境来达到促进根据地商品流通的目的，维护根据地的经济秩序。四是灵活地掌握禁烟与根据地存在发展的关系，暂时征税以图长远禁烟，利用鸦片烟的经济作用为根据地、为红军服务，利用鸦片烟的反作用作好禁烟宣传，排除鸦片烟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不良影响。

（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办公室 莫亚人）

浅谈邓小平在右江与“城市中心”

路线的斗争

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论述中曾指出，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除了帝国主义间接统治之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受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这些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他的政策的不错误。这一条件，才能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但是，当时的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处在低潮，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也正处在探索阶段。“左”倾及右倾错误思潮都存在于党内，因此，广西的革命斗争也必然受到错误路线的影响，就广西革命斗争的情况来看，在起步时期就受到了“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而表现就集中在认为党的工作重心应侧重于城市之上的“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上。广西党的工作重心在初期就是放在了南宁、柳州、梧州三大城市的职工运动之上。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到广西主持工作，灵活运用政策，对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批判，创建了轰轰烈烈的右江革命根据地。

I、百色起义准备工作中的斗争

1926年7月，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一方面，为了巩固他们在广西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俞、李本身在大革命时期曾倾向于共产党。因此，他们要求共产党协助工作，以争取民众的更大支持。这就给广西革命带来了时机。中共中央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从中央及广东省委派出了邓小平、贺昌、陈豪人等数十名干部赴广西开展革命工作，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负责统一领导。

就从当时的中共中央来说，虽然经过1927年“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但未能明确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群众斗争的相互关系，对如何去开展武装的认识较为模糊，当时党没有明确提出把工作重点转入农村，也没有防止“左”倾思想的滋长，在中央及广东省委对广西地方的工作指示中，出现了“城市中心论”的论调及不可调和的斗争路线。在中央及广东省委的指示中，虽然指出“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是广西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但这任务中又提醒广西党“必须集中力量注意三大城市的职工运动”^①。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中也指示“现在所最怕的就是党的犹豫不前，党的机会主义的等待……现实应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沿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②。从中央乃至广东省委的角度上说，注意力集中在城市，而对广大农村的农民运动并没得到切实的注意。邓小平

^①《中共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委的信》（1929.8.17），《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

^②《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1929.10.8）《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

同志到广西后，认识到士兵运动与农民运动的重要性。看到了右江地区群众革命运动的开展，在坚持争取俞、李作统战工作，开展士兵运动的同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及农村土地革命运动。1929年8月，领导广西党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由中共党员雷经天、韦拔群任正副主任的省农协筹备处。后派出党员干部到有群众基础的右江组建省农协右江办事处，并通过俞、李同意，推荐十多名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左右地区担任县长，加强我党对右江地区工作的领导。同时，大力发展农民武装，在邓小平等同志的推动下，俞、李曾拨给韦拔群的东凤农军枪支200余支，组成一营农军，并在南宁进行训练，武装右江农民自卫军，到年底，右江地区的东兰、凤山等县有组织的农民16万，可以号召20万，经常有武装一千一百的^①。这些，都是邓小平同志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冲破“中主城市论”的路线，实事求是的开展工作，为后来百色起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1929年10月初，俞、李出兵反蒋，不到10天就失败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给中共广东省委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中要求广西党组织在当时军阀混乱战形势下，加强对群众日常斗争和军队士兵运动的领导的同时，仍要广西特委坚持以南宁、梧州、柳州等大城市为中心工作，这无疑是错误的指示，但是，广西党组织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没有机械地去执行，而是挺进左右江地区，并把南宁军械库里的枪支五六千支及大批弹药物资装船运往左右江地区。因为邓小平等同志认识到南宁中我党的力量尚未准备好，更重要的是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而且到达百色后，也并不是匆忙就举行起

^①《中共广西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9.10.20）

义，而是经过充分的准备工作。邓小平首先召开了一个党委会议，决定：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第三，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继续清理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①当时的革命武装利用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的身份，根据党委会议的精神，深入乡村，利用各种方式，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整顿和改造部队，大量吸收工农青年和进步学生入伍，扩大革命武装，并武装各地工农，大力支持各县的工农运动，同时，在部队和地方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培训干部，加强党对武装及工农运动的领导。最后，解决了驻扎在平马、那坡（今属田阳县）等地的反革命武装广西警备第三大队，从而扫清了武装起义的最大障碍。经过一个多月的的工作，确在“部队本身之改造方面，发动群众斗争方面，及对反动势力之镇压均有相当成效”^②之后，最终才决定12月11日实施起义。这些工作，使得百色起义得以胜利进行，红七军迅速壮大，根据地不断巩固及发展。

Ⅱ、红七军发展时期的斗争

红七军一经成立，就受着中央决策的影响，在发展的方向上。“毫无疑问的是应向着湘粤边界，只有这样才能与广东的群众革命和朱毛的游击战争相联系”。这是广东省委对七军前委的指示，中央也完全同意这一决策，而且认为“红

①《七军前委报告》（1930.1）《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

②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1931.3.9）《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

军第一步的工作，应集中在百色、平马与东兰一带，发展当地的群众斗争，使这几个中心区域成为右江群众斗争的基本力量”，但同时不忘“对于城市的夺取，在现时亦非常重要”，认为“过去避免夺取城市、主要城市的策略必须改变”，而且指出“只要有胜利的可能，有群众可发动的便须向主要的城市进攻，以至占领这些城市就是占据极短的时间，也有伟大的政治影响”^①。因此，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红七军始终是以军事斗争为主线的。

在根据地建设初期，红七军前委陷入了盲动主义。1929年12月初，邓小平同志在布置好百色起义后，奉召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期间前委工作由陈豪人主持。当时的前委认为，桂系军队的主力被粤军牵制在柳州、桂林一带，无暇顾及南宁，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便作出了约红八军联合进攻南宁的决定。就红七军前委对南宁进攻的策略上看，亦不是有着充分的准备，它最多只“假定”敌人有三个团，而且在进攻南宁的目的上，指出一是扩大党的政治影响，震红军声威，鼓起全国革命空气，二是发动群众，三是夺取白敌的战具、子弹及有其它用品来补充我们的势力。又指出到南宁到目的，六天即归回上游的决定，至于出击后的后方部署上，认为“假使力量有，不必即将不甚重要的县份放弃，等待回归时再占据。如白敌进兵多，则退东兰向柳州发展”^②。因此，在后方尚未完全巩固的情况下，去攻打错误估计了的敌人，认为“到南宁即到目的”。从红七军前委的策略上看，

①《粤省对七军前委的指导信》（1929.12.25）《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

②《七军前委报告》（1930.1）《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

是倾向于把工作重心放于城市的。

1930年2月7日，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知道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大致情况，立即电靠红七军停止进攻南宁，命红八军撤回龙州，在邓小平认为“对于此次行动……不仅忽视了敌人，主要还是忽视了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苏维埃的错误”，“前委没有将中心工作摆在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上面”，在这种根据地尚未很巩固的情况下冒险地去进攻南宁，“必遭一个失败的结局”，而且“如果有一小胜利，直追南宁，有全部或大部被敌人消灭的可能”^①事实上，1930年2月4日，红七军即与桂系4个团在隆安发生战斗，激战4日，后红七军被迫撤出隆安，退盘阳休整，后红七军派出一、二纵队外线游击，以补充部队的给养，留韦拔群的第三纵队在东兰驻守根据地，红七军主力的外线游击，使右江沿岸各县除果化外，全被敌人占领。

邓小平同志认为，在发展红七军、巩固根据地上，土地革命及群众工作是必要条件，在邓小平的《七军工作报告》中就曾指出“过去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错误路线”而导致“结果常常是处在被动地位”。因此，1930年4月初，邓小平在东兰找到了韦拔群及雷经天、陈洪涛等。立即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和根据地建设工作。

5月，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右江苏维埃政府制订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等，成为当时右江地区进行土地革命的依据和准则，6月，红七军主力从贵州回师河池，邓小平闻讯立即赶赴河池，传达中央指示，决定主力

^①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4.29，《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

回师右江，收复沿岸各县，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壮大力量，再图向外发展，这一决定，扭转了右江根据地的被动局面。

在右江土地革命的尝试中，邓小平对此工作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就从根据东兰县武篆东里屯的共耕试点工作经验推广的《共耕条例》来说，它必须遵照右江苏维埃政府土地问题决议案及土地法暂行条例，只是在分配土地后由群众在自愿基础上实行的，不是土地革命所必须的方法，而是在自愿基础上实施的一种方法。而且，为了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邓小平与其他领导人一道，亲自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1930年4月在旧州屯的训练班中，邓小平为训练班编写了《苏维埃》、《共产党是什么政党》、《土地革命》等教材，并亲自讲课，后根据根据地恩隆、奉议、思林、果德一带土地革命的开展，邓小平又亲自在平马西街办了两期党政干部训练班，培养右江沿岸的党政干部100多人，在宣传《土地法暂行条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土地革命的热烈开展，调动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使红七军得以猛烈地壮大，士兵时常高兴地说：“我们的人愈打愈多啊！”而且使根据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当时瞩目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Ⅱ、河池整编中的斗争

1930年6月，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路线控制了中央，并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10月，红七军在平马召开前委会议，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传达了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和中央要红七军离开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指令。在中

央的指示中提出：“目前党的总任务是更加紧迫的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特别是争取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前途。所以党目前策略，对工人运动是组织政治同盟罢工，农民运动是发展地方暴动游击战争，兵士运动是组织兵变，红军是猛烈的扩大”。这些在总的指导思想，带有严重的“左”倾色彩，同样重复陷入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路线。大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邓岗，陈豪人，龚鹤村主张应坚决执行中央的指令，确定红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桂林、广州去。消灭两省军阀，阻止南方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进攻，完成南方革命。这样一来，红军的战术必然是集中攻坚，并且沿途发动群众暴动。但是，邓小平、张云逸等人认为，在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的情况，以红七军仅有的几千人的力量，去执行那样的攻坚任务是很困难的，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党的任务应该把部队集中起来，在提高军事及政治素质的同时，加紧完成土地革命，但是，为了团结一致对敌，前委会议最终接受中央交给红七军的任务，决定河池整编。

七军前委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虽然为了团结而认为“红军第七军在目前政治形势之下，无疑的是要很快的向中心区域发展，实现其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之主要任务。”但仍然清醒地指出“要防止过分的估量，以为已经开始了革命的高潮。这样的估量，必然要使党的策略走向左倾，而忽视了基本的工作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甚至在短期内革命高潮还未到来时，又会发生失败主义的观念”^①，在前委决定执行中央命令后，邓小平在前往河池途中，和邓拔奇等在恩隆县燕洞

^①《前委通告》第六号（1930年9月9日）《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

圩（今属巴马燕沿圩）召开中共右江特委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整顿、扩大赤卫军，加强军事训练；大力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抢收农作物，把粮食收藏好；整顿党组织，加强党的工作，防备反动军队反扑的指示，后在东兰，邓小平又对工作进行了布置，指出红七军主力离开后，要“加强土地革命工作，扩大红军，以东凤为中心，用游击战术向都安推进。”邓小平始终把开展土地革命，大力发动群众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使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红七军主力北上后，红二十一师师党委及右江特委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在红色区域内继续实行土地革命，猛烈地扩大红军，红二十一师成立时人员就达到了三千人，而且多次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培养了壮、瑶等民族干部，由于右江党组织坚持走群众路线，发动了广大的群众，以致“右江的农民，差不多都当过赤卫军，军队和农民是结合一致，血肉相连的”^①而且在红七军主力北上后革命根据地的反敌人“围剿”斗争中，虽然敌军投入了极大的兵力，常常也“只能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贸然向我军活动地带发动进攻”^②，也正因为有了党组织在群众中之基础，才得以使右江地区的红旗始终不倒。

（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办公室 王拥军）

① 雷经天《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

② 李天心《三十六坡斗争纪实》《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事记

1929年

7月 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南宁，对在广西主政的俞作柏、李明瑞进行统战工作和领导中共广西党组织的全盘工作。在此前后，中共中央还从中央和广东省委等派出贺昌、张云逸、陈豪人（陈导民）、龚鹤村（龚楚）等40多名干部，通过各种渠道到广西省政府和军队中任职。通过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工作，俞作柏、李明瑞同意开放工农运动，恢复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推行了利于革命的进步措施。

9月10日至14日 邓小平指示中共广西党组织在南宁市郊津头村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传达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制订广西斗争任务。

9月 中共中央派到广西工作的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人，对俞作柏、李明瑞的仓促反蒋进行劝说无效，即作应变反应的准备。

9月下旬 邓小平、张云逸对俞作柏、李明瑞出兵反蒋劝说无效后，力劝将广西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第五

大队留守南宁，保存力量，并由张云逸任南宁警备司令，获得俞、李同意，实现了中共组织掌握广西教导总队、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武装力量得以保存的目的。

10月初 邓小平通知警备第四大队派出一个营到右江地区，警备第五大队派出一个营到左江地区，派雷经天等一批同志到右江，派何健南等一批同志到左江，加强党的建设和发动群众，打好革命的基础。

10月1日至16日 在俞作柏、李明瑞出兵反蒋期间，邓小平和张云逸等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学员将俞、李在南宁军械库的全部轻重武器，装入船只，做好调走到百色举行武装起义的准备。

10月17日 邓小平与陈豪人等党的领导人和部分干部带着警卫部队，指挥1支军械船队从南宁出发，溯右江驶向百色，开始了百色起义前的行动。张云逸率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沿右江河岸掩护军械上百色。

10月20日 邓小平经过四天的水路行程，到达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与张云逸同志第一次会面，并召集党的领导人会议，发一部分武器给在右江沿岸各县农军，安排部队领导率教导总队和特务营沿江继续上百色，第四大队在果德、恩隆、恩阳各驻一个营，暂不用的军械运往东兰和恩隆七里山区存放。

10月22日 邓小平和张云逸率教导总队和特务营到达百色城。把随带的武器步枪1000余支、迫击炮6—7门、水机关枪7—8挺、旱机关枪10余挺和70—80万发子弹搬进临时仓库（今百色一小校内）存放。

10月23日 邓小平召开部队党员领导会议研究决定，在部队和群众中公开宣传党的主张，整顿、补充部队，宣传发动群众，掌握政权，筹集经费，准备百色起义的各项工作。

10月下旬 邓小平和张云逸、陈豪人等同志多次到广西省立第五中学即百色中学向全校师生宣讲党的主张，号召青年学生参加革命，五中学生深受教育和鼓舞，此后积极配合百色起义开展学校活动和到城郊那毕乡等处宣传革命，组织农会，并积极报名参加红七军。

10月下旬 邓小平、张云逸到部队作宣传，邓小平讲党的“六大”决议和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张云逸讲阶级关系、政治形势和民主改革。通过宣传发动，进一步把共产党的主张贯彻到士兵中去。同时，对部队进行整顿，把部队中的反动分子和兵痞流氓清除出去，建立士兵委员会。经过整顿，部队士兵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10月28日 邓小平对解决反动势力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意见是智取与强攻并用，并作了部署，由陈豪人和张云逸分头执行。分别把驻在百色、那坡和平马镇的第三大队的战斗力量全部消灭，共俘敌1000多人，缴枪700多支，拉开了百色

起义的序幕。

10月30日 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成立（后改为中共红七军前委），邓小平任书记，统一在右江党和军队的领导权。

11月初 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派龚饮冰往上海请示党中央，得到同意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正式批准成立党的前委，由七人组成，邓小平为书记，小平、豪人、云逸组成党委。中央还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番号。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进一步检查布置起义各项工作。决定将红七军建制改为三个纵队；拟定政纲；继续宣传发动工作；掌握和控制局势；决定在广州起义二周年即12月11日举行起义。

11月中旬 中央电召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

11月中旬 在去上海前，邓小平先到龙州检查布置起义准备工作。

11月中旬 邓小平带袁任远和余惠去龙州，途中，在恩隆和向都交界的榕树坳与从龙州来的李明瑞、许进相遇。即一同转回百色，耐心地动员李明瑞参加革命，举行起义，经小平同志思想工作，李明瑞表示愿意参加革命。

12月初 邓小平带严敏、何世昌、袁振武等去龙州，

到达后，和李明瑞、俞作豫等研究了龙州起义计划和部署了各项工作，和李明瑞再次长谈，使李明瑞坚决革命到底。

12月上旬 邓小平从龙州动身去中央汇报工作。

12月中旬 邓小平到香港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作补充报告。

12月11日 遵照邓小平同志的部署，我党掌握的广西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与右江地区农民武装相结合，胜利举行百色起义，宣告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

1930年

2月7日 邓小平从上海向中央汇报后回到龙州，听取红八军宛旦平汇报龙州起义情况，根据中央关于不打南宁的决定，电告红七军停止攻南宁（红七军隆安战斗后已回撤恩隆）。从7日至27日，邓小平领导了龙州的革命。

2月28日 邓小平到红八军一纵队驻地雷平县宝圩，召开党员会议，帮助第一纵队建立和健全党委，书记为第一纵队参谋长袁振武。邓小平指出纵队党委是部队最高的领导机关，一切重大事情都要通过纵队党委讨论后执行。并把这一决定公开向非党员领导纵队司令何家荣等作交代，嘱咐他们要尊重纵队党的领导。此后一纵队转战桂、滇、黔边区遇到

重重困难，都能胜利克服，在纵队司令离队的情况下，全队能团结在党组织周围，直到与红七军会师。

3月2日 邓小平任红七军前委书记。中央发出《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指示信》，指出扩大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今后最主要的工作路线，信中对根据地的党、政、军建设和工农学生运动、少数民族工作、经济工作等作了指示，并批复了红七军前委和军部领导成员名单：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为委员，邓小平为书记，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为党委常委，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

3月4日 邓政委与红八军第一纵队党委书记袁振武、纵队司令何家荣率队从宝圩向靖西县进发。

3月5日 邓政委在湖润向红八军一纵队讲话。邓政委与红八军一纵队司令何家荣、参谋长袁振武率一纵队经硕龙、下雷到达靖西县湖润圩。在湖润邓政委对一纵队指战员讲话，号召每个战士都要掌握两件武器，一件是手上武器，一件是宣传武器，做到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

3月7日 邓政委率一纵队围攻靖西县城郑超叛军。上年11月中旬，俞作豫在李明瑞出发赴百色后，即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近2000人枪，按李明瑞原计划，从龙州东下崇善向南宁进军，俞作豫率第一营到驮芦镇时，第三营连长郑超

（郑海波）策动该营300余人叛变退据靖西县城。为了打开左江向右江的通道，邓小平等率红八军一纵队围攻占据靖西县城的郑超部。敌人顽固抵抗。红八军一纵队包围县城，并在县城附近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开展农村斗争。连攻县城数日未能攻下。

3月10日 邓政委在红八军第一纵队第八连的护送下，趁夜离开靖西县城。在未离开前有右江中共向都县委书记陈鼓涛报告说，右江沿岸还有果化未被敌封锁，可以通过，邓政委为了早日与红七军取得联系，即指示第一纵队领导要攻下靖西，扫除左右江联系的障碍，并随时注意与龙州联系。即由陈鼓涛带路，经湖润、雷平（今大新县地）与天保两县交界向向都县前进。

3月14日至15日 邓政委在向都县北区巴麻，住在农民运动领导人黄绍兼家里，与黄绍兼促膝谈心。黄绍兼把自己从学校回到家乡后组织青年宣传人，变卖家产闹革命，组织农军打土豪，攻打向都县城的事向邓政委汇报，得到邓政委赞扬和鼓励。

3月16日 邓政委召开向都县、区机关干部会议。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遇到巴麻，邓小平停留在此，即召开向都县、区党、政、赤卫军领导人会议，指示大家，要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继续发展赤卫军武装，巩固扩大苏维埃政权。

3月17日 邓政委离开巴麻。离开前书写一首当时颇为

流传的诗，赠送黄绍谦，诗曰：“男儿立志出乡关，报答国家那肯还；埋骨终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吃完晚饭，陈鼓涛继续带路出发，走了几个钟头，到达思林县的坡烟渡口，陈把邓政委送过右江，到江边的古芬屯。

3月18日至20日 邓政委行路到达兰芳村。邓政委18日由思林县赤卫军总指挥黄永达和其爱人等人带路从右江边古芬屯到局良村住宿，19日到桥儿屯，20日转到兰芳村陇邓屯（今属田东县）。

3月21日至4月初 邓政委在兰芳村开办农民赤卫军一期短训班，亲自讲课，讲土地革命及其重要性；召开群众大会，发动开展土地革命，号召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

4月5日 邓政委到达东兰武篆，住在韦拔群家，听取韦拔群汇报第三纵队及其它情况。与韦拔群亲切交谈，对第三纵队的军事行动和根据地的工作作了指示。

4月6日 邓政委去找李明瑞和张云逸。韦拔群派三纵队七、九两个连，由连长黄昉日带队，护送邓政委，越过红河到与河池县交界处一座山腰时，与东兰县民团副司令陈子怀200多团丁发生遭遇战，敌在左右两侧开枪夹击。邓政委沉着镇定，指挥战斗，打败敌人。

4月7日 邓政委得到情况，李明瑞和张云逸带领一、二纵队已远离河池，即取道三旺、花香、下坡豪，过苏托红

河渡口回东兰武篆。

4月8日至5月中旬 邓政委与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一起，领导东兰、凤山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在韦拔群的家乡东里屯试办共耕社。并根据红四军在中央苏区进行土地革命的实践和东兰、凤山试点，制订《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分别在5月1日和15日，以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名义颁布。5月，东兰、凤山县大多数的乡村进行了土地革命。

5月 邓政委在武篆旧州屯办了一期干部训练班，学员100多人，其中女学员十几名。邓政委每三天讲一次课，内容是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工农民主政府的建设及妇女解放等问题。印发邓政委编写的讲稿《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党的问题》、《苏维埃的组织 and 任务》等文件。

5月 邓政委到武篆善学村（今巴学）红军临时医院看望伤病员，细心地查看伤员的伤势，询问有何困难，安慰伤员安心养伤；召集医院领导和地方党政干部共同研究改善医疗条件办法，并指示管理部门给每个伤员发一块光洋。在当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使伤员深受感动。

5月 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等领导人带一个警卫班人员，在百色县罗文佳的陪同下，到武隆区坡力等乡检查筹粮工作。邓小平等领导人和区、乡工作人员黄正昌等谈话，并奖给步枪8支和大黄马一匹，鼓励他们努力工

作。

5月中旬 七军主力从贵州回河池，邓政委赶去会见，决定回师右江，收复百色和右江沿岸各县，经过10日战斗，就收复恩隆、奉议、思林、果化等县，并按东兰、凤山等地土地革命的做法在右江沿岸各县开展了土地革命。

6月 邓政委到恩隆县城平马镇。

7月上旬 邓政委到思林县苏维埃政府检查工作，问苏维埃政府主席阮殿煊：“政府机构中妇女工作部健全了吗？”阮回答说：“还没有健全呢！”邓政委说：“那要赶快健全，才能很好的发挥妇女的作用。”

7月15日 邓政委在红七军连排干部约100人集训会作报告。集训期间，每隔几天给学员上一次政治课，同时亲自编写教材，印发邓政委写的《苏维埃的组织和作用》以及土地政策、党的知识等小册子。

7月中旬 邓政委在赤卫军梁连长陪同下访问平马附近农村贫苦农民老婆婆梁姆蕊，作了安慰，回住地后拿200个铜板要梁连长送给老婆婆，还要梁连长带战士上山割茅草，修好她家的破房子。

7月下旬 红七军集中平马集训，邓政委同陈豪人到各地检查指导工作，并和雷经天到思林县那叭村战地医疗救

护所看望伏击滇军战斗中受伤在此疗养的伤员。

8月 邓政委同志到向都县检查工作，宣传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勉励群众搞好粮食生产支援红军，号召青年参加革命。

9月初 邓政委回到平马，领导红七军整训，月底，经过3个月集训的红七军，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有很大提高。红七军经过集训，吸收新兵，又补充了3000多名战士。

10月2日 邓政委同志在平马主持召开红七军前委会，由邓拔奇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央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攻打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一省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邓政委等认为七军力量不足，无法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但中央指示只好执行。

10月2日 邓政委在离开平马之前，指示部队经理处，把红七军中的女同志进行疏散，本地人由当地组织进行安置，外省来的在当地安置有困难，就介绍到香港和上海去找党中央。余惠同志的爱人孙醒依这时送走到了香港。

10月4日 邓政委离开右江平马镇。

10月6日，邓政委和拔奇同志途经燕峒街（今属巴马

县)，在燕峒召开右江特委扩大会议，右江特委和右江沿岸各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和赤卫军干部70多人参加。邓政委作了整顿扩大赤卫军、大力发动群众，抢收作物、整顿加强党的工作的指示。

10月中、下旬 邓政委到东兰武篆，与韦拔群同志作好第三纵队离开东兰前的工作。

11月初 红七军7000多人集结河池，红八军一纵队300多人在袁振武带领下也到河池，编入红七军，11月7日，邓政委在河池主持召开了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中央代表邓拔奇提出打柳州、桂林等大城市，邓政委思想不通，提出暂不打柳州，邓拔奇坚持不能改变打柳州的决定。同时，红七军改选前委，邓政委仍任书记。

11月9日 邓政委和李明瑞、张云逸等检阅红七军。

11月10日 邓政委和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红七军7000多人从河池出发北上。

(梁明辉 整理)